



# 麦克米伦回忆录

## 2

战争风暴

商务印书馆

# 目 录

致谢	1
序	2

## 第一篇 最初几年

第一章 最初几个月	11
第二章 俄国的突击	21
第三章 冬季之战	34
第四章 斯堪的纳维亚之役和政府的倒台	64
第五章 举国武装	83
第六章 新盟国	149
第七章 战时的殖民帝国	164

## 第二篇 地中海战役

导言	191
第八章 法国的分裂	197
第九章 盟军总部	216
第十章 卡萨布兰卡会议	232
第十一章 X 舰队	264
第十二章 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	282
第十三章 走向联合之路	303
第十四章 走向承认之路	337
第十五章 意大利的投降	358

第十六章	出使法国:最后阶段 .....	404
第十七章	意大利:敌乎? 友乎? .....	444
第十八章	“铁砧军事行动” .....	492
第十九章	从阿尔及尔到卡塞塔 .....	502
第二十章	意大利的新政 .....	526
第二十一章	希腊的解放 .....	549
第二十二章	希腊的叛乱:1. 雅典之战 .....	582
第二十三章	希腊的叛乱:2. 缔和 .....	613
第二十四章	战役的结束 .....	650
第二十五章	德国投降 .....	685
附录	.....	693
一	对俄国的供应(议定书)	
二	在英国军舰《纳尔逊号》上的谈话纪录和1943年9月29日艾森豪威尔给巴多利奥函	
三	1945年1月17日寄自雅典的文件: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和驻节大臣麦克米伦致首相和外交大臣电	
四	1945年2月24日的“新政”指令	

## 致 谢

我所参考的一些史实记载、传记和自传,尤其是在脚注中提到的那些,叨惠良多,不能不再一次在此铭志谢忱。

安妮·格林-琼斯女士曾为本卷连续地进行过研究工作,安妮·麦克弗森女士和邦蒂·莫利女士以出色的技巧和耐性为本文多所尽力,也同深铭感。

在突尼斯的我的朋友、陆军元帅亚历山大伯爵将他所搜集的照片供我随意选用,尤所心感。

本书所载的正式文件,版权为王室所有,凡所转载,均承蒙皇家文书局局长核准。

哈罗德·麦克米伦



## 序

1938年5月我收到了一封意义深长的信，其内容如下：

亲爱的先生，

万一发生入侵，卡克菲尔德乡区委员会将会需用额外的公路车辆，供作紧急救护之用。您能否惠借几部？……汽车的类型……不要福特牌载重一吨的货车……或任何送牛奶的汽车或马车。马拉的车辆可于万一汽油缺乏时作为备用。……甚盼驾驶人员能进行登记作为防空义勇队员……并接受对受伤和中毒者施行紧急救护的训练。

对于我们村上这位受人尊敬的居民发送传阅的这份油印号召，我的苏塞克斯乡邻们是以一种既怀疑又惊慌的独特心情来接受的。可是慕尼黑立刻减轻了霍斯特德·凯恩斯的焦虑。

经过许多个年月的踌躇之后，在1939年9月英国政府、议会和人民才省悟到他们命运的真正意义。但是是否为时太晚呢？只有作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弥补在破坏成性的人们当权的年月里所造成亏蚀和虚弱。是不是在1939年9月我们已经摆脱了一切人类犯罪的本性呢？我们这一代是不是负有罪责的一代呢？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临头时，我年方二十。不管我们有什么缺点，我们年轻人总是无罪的。其所以有缺点错误，那不是我们政治上的过错或失算。纵使我们可以把1914年的劫难归罪于欧洲各国的政治领袖们，然而英国人民却问心无愧。我们的政治家，不管是保守党的还是自由党的，都力图争取和平，同时他们大规模地加强海军。海军是有所准备而足够强大的。虽则我们的陆军规模不大，但是训练之精，装备之好，却令人赞叹；我们所允诺我们法国盟邦向大陆提

供六、七个师兵力并无任何困难。由于意识到这样一支士气昂扬的劲旅，法国情绪乐观。虽则在四年战争期间胜负无常，并有几段时期令人焦虑不安，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曾经片刻想过被称作失败的任何事。甚至1917年兰斯多恩勋爵的著名干涉，也不是基于对失败的担心。这一举动不过是主张欧洲人民尽早结束战斗，以便及早医治战争的创伤，不致由于种种力量的蹂躏而损害至高无上的欧洲传统，结果使得欧洲文明荡然无存。

但是经过我们青年时代所遭受的一切痛苦之后，而竟不能使我们下一代免于另一次战争的恐怖，现在要承认这一点的确是令人痛苦的。我们这寥寥几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似乎未能尽到我们的责任，辜负了我们死去的朋友。这一切是多么不可思议啊——1914年重又出现，而却没有那种动人的情节：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少在最初阶段，曾经谱出了一支伊丽莎白时代的曲调，有它的诗人，它的艺术家，它的那些象一支十字军或早年骑士般浩浩荡荡走上征途的倜傥少年，他们是从日常生活中陡然间出其不意地应召来到气象万千的比武场的。现在没有一点这样的情绪了，而只有负罪感。在此次悲剧般地迫于情势而陷入浩劫过程的后几个阶段中，曾经尽了我们最大努力的，在我辈之中固然也颇有人在，但是正式的政党组织，保守党也罢，自由党、工党也罢，却都表现出同样的颓废糊涂。在这次浩劫之前的几个月，英国人民已经开始以一种悻悻然听天由命的态度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无可避免。9月3日那天下午我从下院步行回家时，路上想到了我的儿子。他现在十八岁，是牛津大学的学生，正象二十五年前我自己的情况一样。他要去打仗了，他可会安然归来？我现在不象年轻人那样以青年出乎本性的轻快心情考虑战争，而是以一个中年人现实主义精神考虑战争了；不是以作儿子的身份考虑战争，对于父母无时的焦虑、甚至坐卧不宁的心情不甚理解，而是以作父亲的身份

设想战争了。此外，一切同样卑鄙无耻的勾当都会卷土重来。诚  
xiii 然，开始时将实行国民义务兵役制。这的确会祛除旧日的一些不  
平等。然而还是为不想去打仗的人留下了很多以这种或那种方法  
进行选择的余地。在各部冷飕飕的走廊里，无疑将有很多适龄青  
年要经过征兵运动的严格甄审。在我所预见到的年月里，一定会有  
很多人马革裹尸，将再一次表明他们是好样的。

“喏，现在你已经得到你所想望的战争了，”一位朋友挖苦地对我  
说。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饱尝忧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命中注定还要吃些苦头。他一向是张伯伦和“姑息政策”的一个五  
体投地的赞助者。是的，可是今天我们是在怎样条件下参战的啊！  
我们保证拯救波兰人，可是从水陆两方面我们都无能为力，而不久  
又证明我们也不愿从空中给以任何支援；我们还曾向那些我们根  
本无力相助的国家提供保证，如罗马尼亚。俄国这个冷若冰霜、不  
友好的中立国，仍然在给德国以物质上的协助。既然捷克斯洛伐克  
一下子就抛弃了三十多个师的陆军，既然他们的大兵工厂和军械  
军需的库存都不费一枪一弹而转移到希特勒的武器库中，德国在  
东面自可高枕无忧，那末波兰的战败和被瓜分就只不过是几个星  
期的事了。法国军队在精神和技术上既都准备不足，法国人民又  
因意见不合而四分五裂，跨过西线发动认真进攻的希望也就微乎  
其微了。在1936年莱茵兰重新武装以前，形势就已是何等悬殊。  
正是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我们被迫投入一场冒险行动。

在那个星期日上午，即战争爆发当天上午我们鱼贯走出下院  
会议室时，大家表情严肃，但并不恐惧。我们心里了然，这是历史  
上的另一个大转折点：1914年8月4日；1939年9月3日。这一次  
我们会遭受些什么呢？战争的结局又会是怎样呢？我们中间很多  
人曾亲眼目睹踵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成堆的问题和混乱——  
不仅仅是可怕的损失和苦难，而且给国家的正常生活带来了紧张

和压力。我们也看出紧跟着第一次震撼而来的国内和世界各地的一些变革——往往是革命性的变革。第二次震撼会出现些什么呢？那副图景的轮廓，尽管当时是那样模糊不清，现在却已经变得比较容易辨认了——也许比较容易领悟了。虽然有很多东西是我们预测不到的，但是即使在难以逆料的蒙眬的战争初期我们就已意识到我们正临近一个时代的终结。对未来的担心并未曾使我们畏缩不前，或使我们心寒意冷。今天也不应该如此。得神救而获永生的名册依然敞开着，求生者不可不读。 xiv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来得如此之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西欧各国物质方面的优势和精神方面的无上权威以及他们世界范围的权力体系，都将是一个几乎致命的打击。就英国来说，在相对力量和权威方面无可避免的衰落，将因我国悠久历史中最为光辉灿烂、最令人难忘的岁月所取得的胜利而蒙上一层假象。

随着战争岁月的迁延，英国和美国在反德斗争中所发挥的相对军事力量开始有了改变。即使如此，却正如丘吉尔始终不厌其烦地向美国人指出的那样，在地中海的所有大的战役中，甚至在解放法国的初期阶段，英国在海、陆、空三方面如果不是占优势也仍然是一个同等的伙伴。然而，由皇家领地、印度和殖民地拱卫着的这个古国所进行的斗争尽管是那样英武，到战争的最后阶段却明显地起了变化。总的来说，它那至高无上的军事强国的地位已开始转向别人了。

同样，在经济方面，虽然在战争中作了艰苦的努力并不断给予刺激，其重要性仍不是很明显。但是，它的力量依然还是起作用的。英国的雄厚财富不得不再一次作出牺牲。我们所有或差不多所有的国外投资都花费在共同对敌斗争事业上了；我们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暂时地，也许是永久地转移到了中立国或美国人手中，因而给工商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金融方面，伦敦的历史性优越



地位将再一次受到威胁，也许最终会垮掉。经济破产的危机，在战争期间靠了租借法案才得以渡过，在战争刚刚结束之后，靠了大规模  
xv 的借款，才有了好转。然而根本问题却依然存在。

美国以其雄厚的人力资源和生产力，崛起于世界的一端，苏俄以其抵抗力和实力的料想不到的坚强出现于世界的另一端；其国家和人民第二次沦入自相残杀和你死我活斗争中的西欧和东欧，又复陷于自我毁灭之境，并从而造成了欧洲在东方的权力和威望的莫大损失，所有这一切，都在这些年代中展现在观察这一历史进程的人们眼前。

幸而英国人民没有受这些重大问题的影响，也不了解这些历史的力量，他们立即起而应付迫在眉睫的危机。现在他们最美好的时刻不久就要到来了。可是，在丘吉尔(随着张伯伦)称之为“黎明之战”(美国人很不客气称之为“欺人之战”)的那段不可思议的插曲结束之后，入侵的威胁又将变成冷酷的现实。在一个多世纪之后，军队将再一次集结，平底船将再一次麇集于法国海岸。我们这个岛将再一次面对一个被征服了的、在恐怖统治下的欧洲整个庞大的实力。甚至最微不足道的人也都能感到自己已投身于历史的缔造。当一支新的无敌舰队正准备攻打我们的时候，我们似乎真的不愧是伊丽莎白女王及其舰长们的后代。所有过去的伟大人物——德雷克、雷利、马尔巴勒、查塔姆、沃尔夫、皮特、纳尔逊、威灵顿——似乎都死而复生了，并且几乎就站在我们身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坚不可摧。我们受到了历代最伟大英国人的鼓舞。我们已经渡过了含垢忍辱的深谷。我们孤立无援，但是我们并不引以为耻。

但是，我能作些什么呢？我年纪太大了，不能效命疆场。我曾试图回到我的联队预备队，但是他们不要我这样年龄和体格的军官。比我年轻力壮的大有人在，除非有异乎寻常规模的战斗，我



看不出有任何被录用的希望。我轮不上了,但我的儿子正是时候。我不能服役了,但是我的儿子曾经不到几天的工夫就离开牛津大 xvi  
学,正如我当年的情形一样,投笔从戎。我没有任何岗位,甚至连最低级的行政职务也没有。在这最初几个星期中,议会似乎并不象要在这出正开演的大戏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所以前景似乎平淡、毫不令人鼓舞。但是在我的业务方面和在尽我们力所能及自行组织起来应付我们所面临的商业和金融问题方面,却有很多事情可做。在家里也还有些要做的事情,如帮助我的妻子照料“疏散的人们”。果真世局每况愈下,入侵来临,那么我也许会去给卡克菲尔德乡区委员会驾驶载货汽车。



# 第一篇 最初几年

(1939年9月—1942年12月)



## 第一章 最初几个月

3

送致德国的最后通牒在 1939 年 9 月 3 日星期日上午 11 时限期届满。11 时 15 分张伯伦对全国发表讲话。他的讲话扼述了他一生最后几年亲身经历的悲剧。但是讲话主要是一套自我表白的辩词,而不是一个战斗的号召。“你们可以想象,我为争取和平所作的长期的全部斗争已归于失败,这对我是多么惨痛的一个打击。然而我不相信我还能做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做到。”他以下述几句令人感动的话作为结尾。“现在愿上帝保佑你们大家,愿上帝保卫公理。因为我们所要与之斗争的是一种邪恶势力,一种残暴的力量,是背信弃义的,非正义的,压迫和迫害人的。”他在下议院说明了最近几天事态发展的经过——德国侵略波兰,英国同法国一起决定以宣战来履行它的保证。“我所努力以求的一切,”他补上一句说,“我在公共生活期间所相信的一切,全都幻灭了。”

如果在这个失败和失望的时刻他把肩负的重任移交给一个坚强果敢的人,事情也许可能好些。因为对德国力量强大和对西方盟国力量脆弱的正确估价,都将肯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战争必是长期的,而结果是未可预卜的。只有一个历史清白无瑕的领导人,和一个举国团结一致的国民政府,才可望面对这样严峻的未来。尤其是,在最初阶段,我们无所作为,自然不能不增加公众的失败感,甚至屈辱感。我们本身既不能采取任何有效行动去援助波兰,那就只有指望法国军队作为唯一可供牵制进攻虽非救援之用的手段。但是法国人对于自己的处境是如此焦虑,以致法国当局非但不愿让他们的军队在德国主力正在别处作战之际而进攻德国西 4



线,而且因为生怕招来报复,还劝我们不要对德国进行空袭。

张伯伦在此后几个月竟生活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幻想世界之中。他对于结果虽抱有信心,但对于现实简直不大理解。他信赖封锁的效力;信赖德国的经济困难;信赖中立国的舆论以及战争在德国国内的日益不得人心。他不相信敌人能对付第二个冬季。<sup>①</sup>看他这种心理状态,真好象在欢迎他所谓的“黎明之战”。当这出惊心动魄的大戏第一幕正在演出的时候——波兰的复灭和瓜分——下一幕立刻就揭开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相继成为供德国争夺世界霸权之用的那部贪得无厌的机器的牺牲品。

在国内,最初几个星期,以至几个月,情况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对照,一面是等着出其不意地猛烈地挨炸,而一面在事实上又无所作为。人人都早已等着破空而来的大规模轰炸。鲍德温不是讲过轰炸机总会穿空而至吗?因此,以异乎寻常的规模准备好病床,并从人烟稠密的城市,特别是从伦敦大规模地疏散妇女和儿童。不管疏散计划有什么困难,这的确成为后来闪电战真正开始的一次极好的排练。在未来的危险之中还包括着毒气弹袭击的威胁,几个月中没有一个人出去不戴防毒面具的。虽然它的真正价值殊可怀疑,但是它却给了我们不少精神力量。在没有任何进攻或防御武器的条件下,防毒面具变成了一个抵抗的象征。

在这期间,我的妻子为照料我们的小客人,为从我们的房子里往村舍迁移忙得不可开交。<sup>②</sup>一个可喜的插曲是11月底皇后的来访。这件大喜事在随即到来的艰难日子里,也没有淡忘。

政府差劲最令人莫解的,或许就是动员步伐的缓慢,无论如何

---

<sup>①</sup> 基思·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Life of Neville Chamberlain)(伦敦,1947年版),第428页。

<sup>②</sup> 伦敦的一个幼儿园已经搬到苏塞克斯我的房子里;参看本书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第558、605页。

在工业和经济方面是这样的。失业人数仍然非常之多。<sup>①</sup> 尽管军事工业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急切的，但在某些地区失业人数竟还有所增加。政府在反抗德国的经济措施方面以及在组织英国的人力和机械力量方面，似乎同样手忙脚乱。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对于德国的出口并没有建立全面封锁。全面封锁只是作为对“阿西尼亚号”轮船沉没的一种报复手段才认为是名正言顺的。一上来，商品配给也没有准备妥当，还是原来那个老样子。实则在这一年的冬季，我们还曾嘲笑德国人就衣着和其他必需品实行凭票购买制度呢。

在秋冬两季，曾经就经济协调和经济战的问题举行过两次重要辩论。在两次辩论中，我都曾发言。在第一次辩论时，我提醒下院说，战争一旦到来，就一定是总体战，这一点是早就为人们认识了，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句话的含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必须把国家的全部能力组织起来，用以取得最大限度效果，因此，政策或行政上的任何错误，哪怕是在经济活动的细微末节上，也要以延长战争从而牺牲更多的人命为代价。<sup>②</sup>

工业计划，不管在和平时作何主张，在战时显然是有必要的。但是出口必须保持不辍，在为重新使用闲置劳动力和资源的计划拟妥之前，将企业关闭是错误的：

在战争的初期阶段，已使上万工人陷于失业，今天他们情殊可悯地寻找一点工作，俾使自己得以糊口并保全自己的尊严；而这个新失业的 6 阶级却不能根据失业保险条例得到保证。<sup>③</sup>

战争的最初反应所以是紧缩，就是因为增加战时生产的机器，经过那样久的耽搁之后，还没有开足马力。

供应部的情况如何呢？无疑部长在尽其全部力量，但是这个

---

① 在 1940 年 1 月，数字几乎是一百三十万。

②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9 年 10 月 18 日。

部成立太晚了。这不是我的朋友或我自己的过错，而是“由于政府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固不化”。<sup>①</sup> 战时经济部又在作些什么呢？

〔它〕在搜求海军部据以厉行封锁的敌国贸易情报方面，曾经……作出了至可钦佩的工作，但是经济战并不仅仅以阻截敌国的供应为限。它还有它创造性的一面。它必须进行三项至关重要的工作：它必须采购和运输我们自己所需要的原料；它必须给出口贸易以这样的便利和支持，以便使我们建立能供支付这些供应所需的国外资产；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它必须从中立国尽量购买敌国所需要的一切，而不管价格大小，甚至也不管我们自己是否需要。<sup>②</sup>

我所要求的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下届政府的迫切任务。

1940年1月间，战时经济部部长罗纳德·克罗斯采取了一个信心十足的方针，并且告诉我们说，德国在经济上目前已处于上次战争开始两年以后所处的地位。我不能不指出，这可能是确实的；但是德国为这次战争准备武器已有五年之久，而我们却刚刚开始。我接下去说：

德国拥有多种供战争之用的必需物资的大量储备，我认为，如果我们对目前德国的处境和困难采取一种过分暗自得意的想法，那么我们大有使我国人民不愿意去了解自己要作出多么大牺牲的危险。<sup>③</sup>

至于分配制度，我指出，以幸灾乐祸的态度去看待德国的分配制度是不智的：

从战争开始之日起我们原就应该对几乎每一种物品都实行配给。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讥笑德国人；我们自己早就应该实行了。<sup>④</sup>

政府的人选也没有得到普遍的信任。战争开始时，人们以“温斯顿回来了”的著名讯号发送到舰队，丘吉尔以海军部首席大臣的身份参加了政府。然而丘吉尔并不是国防大臣，所以在这一时期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39年10月17日。

② 同上，1939年10月18日。

③④ 同上，1940年1月17日。

里,关于联合作战计划,他无权越过他本身的地位和海军部职掌的权限。艾登也回到了政府,这两项任命自然是我的朋友们满意的。这两个人是我们的真正领袖,我们信任他们。但是,撇开格威利姆·劳埃德-乔治这一例外不谈,在张伯伦政府最后几个月期间所进行的其他一切变动都是令人厌烦的官样文章。虽然那些旧家伙有时也调来调去,但升迁则仅以慕尼黑危机中张伯伦最最忠实的支持者为限。报纸上开始问道:为什么不给象艾默里和达夫·库珀这样的人以职位,为什么不给象罗伯特·布思比、理查德·劳、罗纳德·卡特兰和我自己这样一些反对慕尼黑的保守党人以任何机会。海运部的设立是经过很大压力之后才为首相所肯定的。但是他却遴选了一位年迈而温厚的政治家约翰·吉尔摩爵士充任大臣,实际上他不过三、两个月就与世长辞了。

政府仍然是一党政府。首相则在越来越多的人看来就是近年来应付事态、主持大计而结果却弄得不可收拾的那个人。自由党和工党虽然给以本诸爱国主义的支持,但是对于政府殊无热情可言。局势的发展并非不象 1916 年的情形,而当时阿斯奎斯,尽管有其所长,却也不得不避位让贤,以个性坚强的劳合·乔治继任首揆。但是现在谁将扮演这个角色呢?在 2 月 1 日的一次辩论中,我大胆提出了一项预见性的意见:

曾为这种斗争孤军奋斗达十年之久的,论其首功,自非……海军部首席大臣莫属。因此,他是国内据有崇高地位的一个人物,为本院任何议员 8 所不能望其项背。①

如果说在政治和行政管理方面,下院对政府是抱批评态度的,那么在军事方面也同样是惶惑不安——举国莫不皆然。9 月 6 日当德国空军正在对波兰城市进行最骇人袭击的时候,政府在下院提出的一项报告说,德方只是在轰炸军事目标。这自然是完全“与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0 年 2 月 1 日。



事实不符”，正如波兰大使迅即向他在下院的朋友所解释的那样，也正如所有报纸所清楚了解的那样。在为完全抛弃波兰人提出抗议一事上，斯皮尔斯将军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虽然挑起战争的——纵非大战的肇因——是德国，可是不论我们，还是法国人，都不打算给以波兰任何空中支援。究竟空中支援在后勤方面或技术方面是否可能，公众固然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对于“闪电战”所作的无济于事的反响，却把局势弄得更糟了。这个反响是采取了在德国全境空投小册子的方式。我们不去袭击德国的飞机场和交通线，以期多少减轻一点不幸的波兰人所受的压力，却只不过是去作那个沉迷于后来所谓的“彩纸战”<sup>①</sup>。真正的动机现在已难以弄清。在张伯伦和他的朋友们的心里也许萦回着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如果我们引起了所谓“善良德国人”的共鸣，他们就会起而推翻希特勒。既然直到当时为止，希特勒所进行的冒险没有一次没有获得成功，那么这种想法似乎也就无异是异想天开了。

这个时期心理状态上的一个异乎寻常的事例，可以从利奥·艾默里向空军大臣所提建议的记述中反映出来，他主张我们应该设法以燃烧弹将黑森林付之一炬，因为那一带地方是一个保存木料的重要所在，并且库存满满的。金斯利·伍德却相当激动地拒绝了这项建议。轰炸应以严格的军事目标为限，无论森林或库存<sup>9</sup>都不能称之为军事目标。甚至轰炸埃森那里的兵工厂也不应该，因为那些工厂毕竟是“私人财产”。<sup>②</sup>

法国方面也是袖手旁观，没有给波兰人以任何帮助。据我们现在所知，德国人对盟国空军按兵不动曾大为诧异。何况法军果真对西线发动进攻，他们是大有成功希望的。德国的防御工事决

---

① 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习俗，在婚礼等事中投掷五彩纸屑以示庆祝。——译者

② 见艾默里《我的政治生涯》，第3卷：《无可宽恕的岁月，1929—1940年》(The Unforgiving Years, 1929—1940)，伦敦，1955年版，第330页。



没有达到完善的地步，而且留在西线上的已经没有几师兵力。但是西方盟国看上去无论在空中或在地面都处于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英国人，无疑意识到了他们本身的弱点和他们对盟国的任何努力所能作出的贡献的微不足道，所以不愿或不能鼓励法国人。法国政府分裂了，法国人民是不幸的。很多人仍然抱着真正的战争总还可以设法避免的奢望。英国政府，天公地道的说，却没有一个失败主义分子。但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中，无法有所作为。我们必须充分进行我们的封锁，加强我们的经济压力，发展我们的武力，并对未来抱乐观态度。

由于有了这种想法，一些具体计划现在也就好办了。大家同意征募五十五个帝国师，其中三十三个师将由联合王国提供，因而采取了自十八岁至四十一岁的征兵制。每年造船拟从八十万吨提高到一百五十万吨；耕地拟增加二百万亩。所有这些都是妥善的目标。但要达到这些目标，势必需要新的心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力量。这却有待于将来。

在这期间，海战已如火如荼，我们遭到了严重的困难和损失。由于法国方面踌躇不决而迟迟未宣战，致使我国海军未能成功地制止整个德国舰队的活动。两艘袖珍战舰幸免击沉，潜水艇则开始了争夺优势的长期斗争。那艘一万三千五百吨的《阿西尼亚号》<sup>10</sup>战列舰，于战争爆发的次日就被击沉。航空母舰《勇敢号》也在9月份中弹沉没，并且在同一个月中，在冰岛和费罗群岛之间，《拉瓦尔品第号》经过同《沙恩霍斯特号》一番英勇但无望的战斗之后，葬身海底。在10月间，《皇家橡树号》在斯卡帕弗洛被一艘侵入防卫线的敌潜艇用鱼雷炸毁。德国对船舶的袭击，其方法的残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如出一辙，实际上甚至更加不择手段，过去对于灯塔船还网开一面，现在它也变成了目标。这些海军方面的损失（在

陆上和空中他们并没有获得任何相应的胜利)使公众为之瞠目,并给这位最无可訾议的阁员招来了物议。丘吉尔的朋友郁郁不乐。他的敌手却振振有词了。

在整个这段时期,全体阁员还继续大发谬论,说什么只能袭击军事目标,德国的兵工厂应排除在袭击目标以外。当然他们还告诉我们,说什么美国将会对我们的克制获有深刻印象。实则恰恰相反,美国舆论大为震惊,并且对于“这种欺人的战争”公开加以嘲笑。

西方盟国所有这一切举棋不定、踌躇不决,恰好给希特勒以迅速可乘之机,为其“和平攻势”制造气氛。劳合·乔治早已要求政府不要马上拒绝可能来自德国方面的任何和平建议。实则他赞成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试图解决一切争执中的问题。这一意见却给这位现正迅速衰老的政治家——他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招来了达夫·库珀和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工党议员“戴”·格伦费尔两面夹攻的猛烈而有效的责难。虽然如此,和平之说却风传甚盛——无疑是在大陆上——并且在10月6日,希特勒既经解决波兰之后,就提出了他的建议。这项建议立刻遭到了张伯伦以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名义坚决而断然的拒绝。但是和平的宣传仍继续不已,尤其是在法国。在法国生活的每一部分,自上至下,都有懦弱的因素。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都在千方百计制造对英国的怀疑。为什么英国两次大战都抛弃法国?英国的军队在哪里?为什么法国要11 国要为波兰而战?现在德国和俄国已经勾结起来,还有什么胜利的希望?最好立刻缔和,以免后悔莫及。等等。

整个冬季,在政界维持着一种不自然的休战状态。张伯伦尽管改变了主张,但是作为战时首揆,却既没有经验,也缺乏想象力。对于战争所必需的组织工作简直一窍不通。实则,我们在即将发动的斯堪的纳维亚战役中所以失败,缺乏任何明确的体制或任何

坚定的领导把各业务部门熔合成为一个有效的工具，正是原因之一。何况他由于个人的原因也遭到了严重的障碍。他从来没有能控制下院，而鲍德温对此却能轻而易举。反对党不仅仅在政治上反对他，而且也厌恶他本人。这一则是由于他的态度，一则是由于他对同自己意见不合的人有着按耐不住的真正蔑视。他也没有使阿斯奎斯至少渡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八个月的那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智力。工党，正如不久所表明的那样，不准备同他合作；自由党对他无好感，而他自己也不想把分裂了的保守党重新团结起来。1940年5月间他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很多议员以私人身份成立的小组出现了，其中有一些是慕尼黑以后已经组成的那些小组的延续。反对慕尼黑的保守党人每星期三在艾默里的主持下举行聚餐会。一个以布思比和托马斯·霍拉宾<sup>①</sup>为干事、而事实上由一个自由党人克莱门特·戴维斯领导的全党行动小组，常常集会。不久之后，一个看守委员会在索尔兹伯里勋爵<sup>②</sup>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以保罗·埃姆里斯—伊万斯<sup>③</sup>为干事。所有这些小组都专心致志于改进和改善政府、工业和军事方面的战时机构。所有这些小组都生怕丘吉尔会越来越卷入他们所认为的日益逼近的失败之中。我们当中特别是身为丘吉尔朋友的那些人，深知如有长期战争，那就不可能另有其他领袖。然而丘吉尔却具有如此天赋的忠诚和雅量，以致他竟成为多年来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自己和 12 自己的呼吁的那位首相死心塌地的同僚。

我以不令人满意的情况和当前的险状警告我的选民。我对他们说<sup>④</sup>，我认为德国将无可避免地要进攻荷兰和比利时。我们将不能不忍受极大的困难，然而却没有理由认为我们为什么不能一

① 北康沃耳的独立自由党（后来工党）议员，1939—1950年。

② 第四代索尔兹伯里侯爵。

③ 德比郡保守党议员，1931—1945年。

④ 1939年10月16日。

如既往地加以克服。但是,如果我们要打一场总体战的话,那就需要作出更加彻底、更加果断的新努力,“我们终于对付过去了上次大战,这次我们不敢再掉以轻心。”在这当口,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注意,一个新阶段就要开始了。这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所订条约的另一个不祥的后果。俄国既然对德国无后顾之忧,于是在攻取了波罗的海各国之后,接着就要对芬兰发动进攻了。

## 第二章 俄国的突击

13

从俄国革命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签订这二十二年间,英国对俄国的感情一直是起伏不定、混淆紊乱的。成为沙皇政权及其一切粗鄙浅薄和残酷野蛮的告终标志的1917年3月革命,曾经被欢呼为一桩可喜的大事。我们希望会从此为伟大的俄国人民开创一个民主生活的新时代。而且我们相信这会给俄国军队的抵抗以新的动力,因为他们现在可能是为一个新自由理想而不是为一个腐败的帝国制度而作战了。

这种心情持续了不过三、两个月。由于11月布尔什维克少数派的夺取政权和随后所有自由主义派人物的消失或清洗而产生的反感就踵随而来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新名词被看作只是一个新起的革命夺权集团的帷幕。在随后几年中,英国尽管对于新政权的那些被看作是革命的必然产物的残暴行为抱有反感,但是对俄国人民却深具同情。我们希望能象法国大革命时一样,从开始几年的血腥场面中,逐渐发展成一个比较安定、稳固、以致终于比较民主的制度。

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我们给予苏维埃新政府以承认,而在这段间隔期间,我们的关系,虽常常因季诺维也夫信件的发现<sup>①</sup>和全俄合作社的查抄<sup>②</sup>等类事件以及维克斯工厂工程师的逮捕和审判而中断,但一般是友好的。

鉴于英国本身的经济困难,尤其是在出口市场上,我们为扩大

---

① 本书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第152页。

② 同上书,原书第13页。



15 同俄国的贸易,自然是作了一番不屈不挠的努力。但是,所取得的成功却有限;苏维埃政府统治下的俄国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莫测高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希特勒的实力日增,随着他的野心日益彰明昭著(除了那些看不见或不愿看见的),下院出现了一个强烈的要求,力主应设法和苏联结成某种同盟,或至少达成某种谅解,以便在东方建立一个遏制德国侵略的防御体系。多数保守党人对于这种前景是不抱多大热情的。不过,内维尔·张伯伦这位首相和他的重要同僚,也都厕身于这种怀疑论者之列。然而,希特勒在他每一次侵略行动之后,要求某种协议的压力总是随之而加剧。在慕尼黑危机的某一阶段,外交部曾自行发表了一项声明,声言德国如果侵犯捷克,必将遭到英、法、俄三国的抵抗,这与其说是基于坚定的部署,毋宁说是一种虚张声势。在慕尼黑以后,要求直接交涉的呼声更形强烈。劳合·乔治反复谈这个问题。他声称,没有俄国,西方盟国就招架不住新德国的兵力。实际上,我们未能同俄国谈判成功,的确使他在战争最初几个月看上去有点陷于失败主义的情绪。

虽然政府对于东西方联合反对希特勒的概念,兴趣不大浓厚,但是下院所有各方面对政府抱批评态度的人都以日益迫切的心情策励他们对此下决心。在1939年3月希特勒攻占布拉格之后,英、法两国政府终于采取了断然措施,于是谈判在莫斯科开始。不幸,张伯伦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提出了出乎意外的、有欠考虑的保证,从而增加了困难。因为东欧的反共各国虽然惧怕德国,但是对于俄国的担心,也并不稍逊。在商谈慢腾腾地开始之后,才清楚地知道,他们对于作出让俄国军队开进和假道各该国领土的任何保证都一概敬谢不敏,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也同样心怀疑惧。所以商谈迁延不决;结果,苏联政府认定他们最可靠的最保险的,不是同各民主国家而是同纳粹德国缔结条约。

由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商谈并由希特勒和斯大林予以批准的这一著名条约,并没有任何真正的信任基础,甚至在签字人之间也是这样。秉性多疑的俄国人肯定认为西方盟国要是看到俄国被拖进一场反德战争而自己则置身事外,是不会引以为憾的。果真如此,莫斯科是不会上伦敦或巴黎的圈套的。苏维埃政府要建立他们因斯大林的清洗而削弱了的军队并加强他们的战略地位,也需要时间。当然他们会同样希望有一场局限于德国和西方盟国之间的长期的、两败俱伤的战争,从而产生消耗两类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后果。这样,一个中立的、不伤毫毛、不受侵犯的俄国将会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以更强大的地位出现。俄国人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希特勒主义的不自然结合的力量和持久性,殊乏信心。诚然他们继续供应德国以军需品和原材料,而且这后来还造成对他们本身的不利。<sup>①</sup>但是左右斯大林的决定的最有效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他不费一枪一弹之劳就得到了战略和领土上的利益。这都是由俄德条约的秘密条款保证给他的。尽管他对于德国在中欧和东欧的扩大的根本焦虑一定非常之大,然而眼前的利益还是难免令人垂涎欲滴。

属于内陆国家的俄罗斯帝国自有史以来就一直追求两个主要目标:通往暖水海洋的出路和西境上的一圈防卫地带。革命政府象过去历届政府一样地追求这同一目标。人民对于1812年拿破仑的入侵一直念念不忘,这个教训并不只是对政府——而是深深

---

<sup>①</sup> 在1940年1月1日至1941年6月22日之间德国收到了下述的交货:一百五十万吨粮食,十万吨棉花,二百万吨石油产品,一百五十万吨木材,十四万吨锰和二万六千吨铬。鉴于英国的封锁,最后两项具有特别重要性。据料俄国人收到了工业设备作为报偿,但是这项以货易货的片面性可以从俄国的二亿三千九百万德国金马克顺差的估计额中看出来。在战争结束时,俄国人并没有对这笔款项提出赔偿要求。亚历山大·沃思:《战时的俄国,1941—1945年》(Russia at War, 1941—1945)(伦敦,1964年版),第113,114页,以西德政府的弗里登斯堡教授的证据为依据(德国经济研究所)。

地铭刻在所有俄国人心坎上。彼得大帝曾经征服了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并将其并入俄国版图。1918年，在所谓解放战争中，这些国家把自己从俄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被承认为独立国。大财产如果说不是全部也已经大部分为当时所进行的土地改革所打散，一个强大的小农社会已经建立起来。但是苏维埃以及俄国的帝国政策的始终如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的威权重新加在这些国家的头上。它们的财富和人口是无关重要的，但是它们的战略地位却是意义重大的。再加上芬兰，它们可以任便封锁或开放通往现在叫作列宁格勒的圣彼得堡的去路。诱使彼得大帝占领这些国家的同样理由——也就是保护他的新首都和他的西部主要港口——并非不适用于目前。

苏维埃政府因势利导，唯恐不及。1939年10月间，在希特勒的同意下，斯大林取得了他那一份东波兰，并开始使用俄国的那套老办法。地主阶级、资本家和商人很快地遭到了“清洗”，有时杀害，有时监禁，有时放逐，分别予以对待。在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已经奠定的波罗的海各国中，运用同样方法是不那么容易的。对于它们小心翼翼保持中立的外交政策，也没有什么空子可钻。因而就劝诱它们为保护它们自己而同意让俄国大军入境。因为它们无力抵抗，所以占领很快就大功告成。反共分子和爱国分子受到了同样的残暴待遇。不知有几千几万人因下狱或枪决而失踪。用丘吉尔冷峻的话来说，“这套办法叫作‘互助条约’”。<sup>①</sup>后来在战争期间，在法国陷落之后，波罗的海各国就不声不响地被一一吞并了。

18 1939年的这些措施，尽管骇人听闻，也许还有词可解，虽则已经不能见谅于人；因为俄国人深知自己那样令人啼笑皆非地同德国签订的条约，作为他们国防的基础是太脆弱了。所以这些领土

---

<sup>①</sup>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风云紧急》（伦敦，1948年版），第382页。



的占领，尤其是位于通往列宁格勒路途上的爱沙尼亚的占领，正是一个迹象，表明苏维埃政府已预见到迟早总会发现他们自己同希特勒及其军队兵戎相见。

但是如果说波罗的海各国在战略上是重要的，那么芬兰也是一样。到10月的第三个星期，红军的陆军和空军已经如愿以偿地进驻波罗的海各国，苏联驻屯军分据要冲。但是沿芬兰湾北岸通往列宁格勒的道路以及通过芬兰本土的进出大路，依然是一个大患。斯大林决定立即采取了断然措施。

然而芬兰人民，他们不仅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军队和英勇果敢的精神，而且他们已经成功地执行了一种介乎左右之间的不偏不倚的政治路线，工业、商业和农业结构也无不欣欣向荣。因此他们是团结的。他们也许会被打败，然而却是吓不倒的。

自1200年左右至1809年，芬兰曾经在瑞典的版图之内达六百年之久。据说芬兰人本身是亚洲民族，和侵入拉多加湖以西和以北地区的匈牙利人血缘很近。但是大约人口的百分之七和几乎整个统治阶级是瑞典人。1809年作为震惊世界的拿破仑战争的一个后果，芬兰人民沦于俄国的保护之下，可是俄国的兼并并没有完全破坏他们和瑞典的维系。

但是芬兰并没有沦落到俄国一个省份的地位。虽然它的人口不多——在1800年不到一百万，到1914年也不过只有三百万——它的经济价值也不大，但是芬兰人民却没有被俄国这个庞然大物所吞没。宪法、法律和法庭大体上依然存在。路德教教会获准仍然作为国教——鉴于帝俄政府严格信奉正教，这无异是一个重大的让步。全国的教育制度和经济生活也没有改变，只有国防和外交由帝国政府控制。在其他方面，芬兰的地位和十九世纪英 19 帝国的自治领颇为相似。这种宽大政策给俄国人和波兰人都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随着尼古拉二世的继位，沙皇对芬兰的态度开

始有了改变，自 1894 年起，俄罗斯化政策一直雷厉风行，直到 1917 年沙皇政权崩溃时为止。于是芬兰人看到了并且抓住了这个机会，在 12 月 6 日，宣布成为一个独立共和国。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其或者真诚相信或者为了宣传目的的自由主义情绪鼓舞下，立即承认芬兰为独立国。这种讨好，接着立即变成邪恶的用心。在 1918 年全年和 1919 年大部分期间，芬兰共产党力图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帮助下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到 1919 年，芬兰合法政府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已经赢得这场斗争。因而在那年 7 月，一部以一切自由权利为基础的共和国宪法通过实施，所有那些自由权利我们一向是将它们和真正的民主联系在一起的。

在国际事务方面，芬兰执行的是一种明智地严守中立的政策。当 1919 年秋尤得尼奇所领导的俄国白军逼近彼得格勒时，他们很想同反布尔什维克分子进行合作。但是芬兰严守它的中立和不偏不倚的路线，因而在 1920 年 10 月，芬兰和苏联之间在有利于芬兰的基础上签订了多尔帕特和约。芬兰的旧边界得到了承认。它在北部对佩特萨莫地区的占领（1864 年在原则上早已让与芬兰以换取卡累利阿地峡的若干领土）得到了确认。芬兰一直避免进行俄国所不欢迎的任何联系，但是却存在有一种潜在的敌意，尤其是关于卡累利阿问题。在 1920 年条约中，俄国曾许诺东卡累利阿人以自治权，但是他们违反了这项保证。东卡累利阿人举行了反抗，并且得到芬兰志愿军的援助。俄国则试图在芬兰鼓励共产主义革命作为报复，虽然未获成功。

直至 1935 年为止，芬兰一直依靠国际联盟的保护。随着国际  
20 联盟威权的没落，它的地位就越来越岌岌可危。它唯一的安全办法就是中立。所以它理所当然地同斯堪的纳维亚中立集团结成一体，这个集团在 1935 年年底包括有瑞典、挪威和丹麦。在 1927 年，同俄国的关系尽管棘手，对签订一项俄芬不侵犯条约却曾进行

过一些终于流产了的谈判。这项条约最后在 1932 年签字，并于 1934 年续约，为期十年。俄国的加入国际联盟和当时俄国外长李维诺夫所提倡的政策给予芬兰以鼓励。然而冲突依然继续不已。俄国力图确保它的毗邻各国国内政策不构成对“苏维埃政府的威胁”。这事实上就意味着它们非建立共产党政权不可。由于至慕尼黑投降而臻于极点的西方民主国的积弱之势，致使这种压力变本加厉。在这种气氛中，芬兰重又提出阿兰岛的设防问题，阿兰岛位于芬兰和瑞典之间，早于 1921 年已被作为非军事化区。虽然波罗的海其他各国一致同意，但俄国不愿首肯。虽然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芬兰人民对于行将于 1940 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比对战争的威胁更加关心。<sup>①</sup>

芬兰人，对于西方尽管具有民族的同情，却受到了希特勒的震撼和侵扰。既被迫处于德、俄两国的野心之间，而又不能依靠西方各民主国家，芬兰的地位确是险恶万状。在 1938 年，一位俄国特使亚尔采夫曾经和芬兰的阁员举行谈判，并曾经论证说，德国人迟早将要发动对俄战争；又说德国前线的左翼将会通过芬兰进行军事行动。俄国是经不起等待的。它要求给以援助芬兰的权利，并要求由俄芬两国对阿兰岛共同设防。面对这些要求，芬兰人继续维护他们严守中立的主张。波兰、罗马尼亚以及早一些时候的捷克斯洛伐克所早已面临的问题，现在又在这里重新出现。中立是一个有力而明智的政策，但是芬兰人会不会有力量支撑得住这个政策呢？就某种意义来讲，情况和比利时对西方盟国的情况颇为相似。我们原想同比利时缔结一项具体协定，但是它宁可信赖中立，以致产生致命的后果。比利时之所以不到几天的工夫就惨遭蹂躏，正是因为比利时人的国王甚至在战争开始以后还不愿意让

---

<sup>①</sup> 约翰·沃里嫩（编）《芬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4》（纽约，1948年版），散见各页。



法国人或英国人进占前方阵地，甚至不愿举行参谋人员会谈。因此我们对于俄国的主张倒给予一定的同情。也许芬兰人这个非常坚韧而顽强的民族对于俄国方面的忧惧没有充分予以估量。但是象东欧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他们无疑是生怕一旦让俄国人进来，从此就无法把他们请出去了。

1939年8月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签订，在芬兰人看来一定认为是完全有利的。因为如果这两个紧邻友好相处，和平就可能靠得住些。德国政府向芬兰人保证说，条约中没有任何有损于芬兰的关于势力范围的条款。这是欺人之谈；因为在秘密草约中，在有关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协定之外，据协议，不但俄国应在芬兰有一势力范围，而且应以佩特萨莫的部分地区转让，并将俄国的边境从列宁格勒向西推进到芬兰本土以内，以便把维普里或维堡的城镇和地区一并划入俄国版图。如果俄国要再兼并更多的土地，那么德国就应该得到芬兰西部的某些地方，以保持平衡。换句话说，芬兰的命运、或许说芬兰最终的瓜分，已经无情地、讽刺性地列进了希特勒和斯大林曾把他们的名字放上去的那个条约之中了。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俄国人在1939年10月间，既经取得对波罗的海东岸的整个控制权之后，就气势汹汹地向芬兰政府提出交涉。后者深谋远虑地同意了派代表去莫斯科进行谈判。但同时他们动员了他们的军队并决心以进行自卫作为最后手段。他们坚决拒绝同苏俄结盟。他们准备满足俄国的其他一些要求，不但包括对卡累利阿边境的某种调整，以便给列宁格勒以更大的安全，而且包括芬兰在北冰洋上的唯一不冻港佩特萨莫的租让在内。但是他们坚决拒绝租借汉科港。汉科港位于波罗的海入口处，俄国人要求以之作为海、空军基地。放弃扼芬兰湾要冲并为首都赫尔辛基存亡所系的汉科，就无异放弃任何真正的独立了。

11月初，斯大林本人开始参加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虽然谈判在11月13日以失败告终，但是一般并不认为战争已迫在眉睫。然而芬兰却已经身不由主地卷入了俄德关系的根本动荡之中。俄国力求防范德国背信弃义的进攻。如果一个严守中立并决心保卫其中立的自由民主国家非遭到牺牲不可，这真是一个不幸的结果。

芬兰代表刚刚离开莫斯科，俄国报纸和无线电上的宣传运动就开始了。11月26日，俄国人甚至声称芬兰部队曾经在边境的对面开火，要求他们从国境撤退二十至二十五公里。芬兰人立刻否认这种说法，说这是一个侵略者在发动战事之前的一种几乎惯用的指责，并要求进行联合调查。两天之后，在11月28日，苏联政府片面地宣布废除1934年的十年互不侵犯条约并断绝外交关系。芬兰仍继续提出和解的建议，但是无济于事。30日，战争开始。俄国人在漫长边界的若干据点上发动了进攻。他们还轰炸了首都赫尔辛基。苏联无线电广播以极权政府所特有的那种极其笨拙的手法否认轰炸，声称俄国飞机飞临赫尔辛基上空是为了空投面包救济贫民的。对于有着自己严酷幽默感的芬兰人，这些炸弹立刻就以“莫洛托夫的面包篮子”而家喻户晓了。

西方舆论对于俄国的暴行大为震惊。芬兰要是在汉科基地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也许更为明智，但是俄国对领土扩张的野心太露骨，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命运上，也是那样迫不及待。一个巨人般的邻国对一个蕞尔小国的这种侵略行为美国舆论深为激动。罗斯福总统立即提出调解的建议，芬兰人接受了，但俄国人则拒绝。在英国，愤激之情也是同样强烈的，这一则是因为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早就造成了愤慨，一则是因为我们对一个弱小民主国家传统的同情。“援助芬兰”变成了普遍的人民呼声。

芬兰根据它的传统，向国际联盟发出了呼吁。这时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种非常愚蠢的“不知所云的滑稽自白”。他们否认苏联曾



同芬兰发生过战争，并声称于12月2日已经和“芬兰民主共和国”的新政府签订了一项互助条约。所谓“芬兰民主共和国”是由一个名叫奥托·库西宁的共产党鼓动家领导的纯粹的伪组织。德国人立即在挪威找到了一个叫做吉斯林的声名狼藉但不幸更加成功的库西宁的效法者。俄国人声称，根据条约，芬兰的合法政府为镇压旧的反动头目已经要求俄国出兵相助。也许除了某些俄国人，这种无稽之谈自然是谁也欺骗不了的。

国际联盟拒绝承认库西宁的伪组织，并于12月14日，由大会宣布俄国的行动违反了对俄国有约束力的一般条约以及芬、俄之间的特殊条约，所以国联会员国应给予芬兰一切援助。俄国违反盟约，因而被开除出国际联盟。这几乎是当时正奄奄一息的国际联盟的一个临终前的最后一举。这最后一举也许是不无价值的。

战争开始于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到了12月底，出乎一般意料之外，局势竟陷于僵持状态。

情况现在清楚了，虽然当时并不明白。俄国人曾以一师兵力  
24 在最北部从芬兰的一小支部队手里成功地夺取到佩特萨莫。在其他各地，俄国的进攻遭到坚决的回击。在卡累利阿地峡方面，侵略军尽管在人数上占很大优势——俄国人在进攻时部署了十二个师的兵力——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曼纳海姆线屹立不动，曼纳海姆线是以那位1918—1919年战争的英雄而现在还在统率芬兰全军的大元帅的名字命名的。再往北，俄军在沿边境的各据点大举进犯。但芬兰人证明在技术上和决心上都是占优势的。他们慢慢地逐步向森林中撤退，借以把敌人诱到固若金汤的阵地上去，然后，一面顶住正面的进攻，一面对两翼及其后卫猛攻猛打。靠了这种战术，俄国的整个阵势在某些情况下遭到了严重的击破。

由于这种种情况，不但产生了对芬兰人的激情，并产生了要求盟国尽管有其他许多呼吁也不能不供给芬兰人以一切可能援助的

强大压力，但是也产生了过于仓促地对俄国军队的战斗力作出判断。我们的军事专家轻易地断定俄军士气已遭受严重的挫折，其原因部分由于斯大林于数年前用以肃清一切“危险”分子的骇人的清洗，部分是由于据说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鼓舞他们人民的献身精神遭到失败。然而，紧跟着冬季战争这第一阶段结束后的片刻沉寂，证明这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在这期间，弱小的芬兰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举世的敬佩。他们的军队甚至不为优势的兵力所压倒，他们的精神不为他们未曾防范的持续不断的残酷轰炸所损伤。1940年1月初作为第一个象征性的步骤，英国内阁批准了对芬兰运动的组织提供援助，其中包括招募一小批国际志愿军。我通过利奥·艾默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一个工作委员会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成立的。虽然政府对我们的努力给以充分支持，但认为至少保持一私人事业的外貌是比较明智的。芬兰驻伦敦公使格里彭伯格担任了主席。除艾默里之外的其他成员，有伯利的鲍尔弗勋爵、菲利莫尔勋爵、戴维斯勋爵、麦克多诺将军和我自己。我踊跃地应邀参加了这个团体。首先是因 25  
为我对于一般人对芬兰人的英勇精神的钦佩之忧具有同感，其次是因为经过好几个月的战争之后，我发现自己还没有任何同战争有任何联系的工作可作而深以为苦。在我同意效劳之前，我曾就商于丘吉尔。他鼓励我，而且我从他言里言外意识到，对于英国，其中还可能存在一些比援救芬兰人更大的利益，姑且不问援救芬兰人是多么孚众望又是多么荣耀的事。他力主采取断然措施，以防止，或至少减少德国船舶经由挪威的领海装运宝贵的铁矿石，为此他一直进行着长期的斗争，这段经过当然我并不知情。我也不了解帮助芬兰人的任何重要的努力都非利用纳尔维克作为基地不可。

要是纳尔维克能够变成盟国接济芬兰人的一个基地，那么要防止德

国船舶在这个港口装运矿石安然直驶德国,肯定会是易如反掌的。①

在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这些计划的轮廓也就渐渐涌现出来。

我们的委员在经历方面和气质方面彼此都不相同。菲利莫尔勋爵是一位卓越的法官和著名的慈善家;伯力的鲍尔弗勋爵具有十字军战士的满腔热情;麦克多诺将军既精明又老练;戴维斯勋爵则兼有令人不解而又风采动人的品质。他既是一个大富翁又是一个极端的急进主义者。他曾经以蒙哥马利急进党议员的身份在下院服务多年,并曾担任劳合·乔治的私人议会秘书。他也一度在同一时期豢养两群捕狐的猎犬。在两次战争的间隔期间,他曾经变成一个宣扬以军事手段强制执行集体安全原则的代表人物,为提倡这类理想而成立的“新英联邦”协会,曾经给丘吉尔的“武器和盟约”运动以殊为可贵的支持,那个运动曾在一个关键时刻差点要冲破政府的顽固不化和人民的漠不关心。②

26 我们的援助将包括武器和人员。外事处的哈罗德·吉布森是委员会的秘书,他处理事务努力而灵活。委员会会议是在史密斯广场的索内大厦召开的。我们在招募人员方面不是很成功,最初只招募到五百名左右,其中约有三百名在战事结束以前到达芬兰,虽然没有达到前线。

瑞典政府不许可志愿人员穿着制服通过瑞典,所以他们不得不改穿便服佩带袖章前往。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志愿军组织主要来自美国方面无疑会得到相当规模的加强和发展。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是“特迪”·罗斯福的一个儿子克米特·罗斯福——一个具有相当魅力和大无畏精神的人物。志愿人员终于达两个营。

武器问题是比较复杂的。美国政府给予芬兰一笔三千万美元的贷款,但是美国的中立法案不许用这笔钱从美国购买武器。不

---

① 丘吉尔:《风云紧急》,第430页。

② 本书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第478页。



过在战争的这个早期阶段，少量武器和军火仍然可以从私人那里获得。军火商比比皆是，英、法两国政府可给予非正式的许可。如果足够谨慎的话，也不难说服某些中立国政府出售一些军火。虽然如此，主要的供应来源当然还是英法两国所能节省下来的东西。

2月5日，最高军事会议在巴黎开会。在1月份整个月中，芬兰各条战线一直屹立不动。因此原则上决定在适当时候派遣两个英国师和从法国军队中调拨五万名训练有素的志愿人员——共总十万人——前往援助芬兰人。他们必须在4月间到达芬兰。为使这项军事行动发生实效，那就有必要夺回俄国人已经攻占的佩特萨莫，或者利用纳尔维克和挪威的其他港口。纳尔维克一旦到手，防止德国夺取挪威的铁矿石问题，当可迎刃而解；并且还可以使在对付德国上所取得的这项实际上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同援救水深火热之中的芬兰这一利他主义的目的结合起来。在芬兰就可能开辟一条新战线，起到萨洛尼卡<sup>①</sup>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委员会得到的有关这些决定的充分指示，给了我们工作新的兴趣和热情。当然，显而易见的是，任何这类计划的成败都取决于挪威和瑞典政府的同意与否。所以英、法两国通知瑞典说，根据国际联盟的决议，允许转运任何军队过境前往援助遭受侵略的受害者，是它应有的义务。对于这项声明，瑞典人和挪威人的反应是踌躇和惊恐。实际上对于它们的缄默是不能深责的。

由我们委员会派遣一个代表团去芬兰已作出决定。使我高兴的是，戴维斯勋爵和我奉派前往。芬兰公使馆的萨尔拉丘斯上校将伴同我们前往。因而在1940年2月10日，在巴黎作出决定之后五天，我们一同从伦敦启程。正在这时，俄国人已将一批训练精良的部队约三十个师，并在重炮和坦克的新装备支持下，调到了卡累利阿地峡，新的攻势已经箭在弦上了。

<sup>①</sup> 萨洛尼卡是希腊港口城市。——译者

## 第三章 冬季之战

28 2月12日清晨我们到达斯德哥尔摩。这次远行是以喜剧开始的。

戴维斯勋爵把他的假牙遗失在火车上了。一阵大乱，接着就是许许多多的外交活动。……

戴维斯勋爵把他的护照也丢掉了。

没有多久，戴维斯勋爵的护照找到了，但是他的假牙还是没有下落。他以大西铁路董事的身份要求瑞典铁路方面交出他遗失在卧车上的假牙。已经作了一次认真的搜查。因为马尔默列车和柏林列车是相衔接的，所以推想假牙是被一个盖世太保的特务盗窃去了。①

过了不久：

戴维斯勋爵的假牙已经找到了。②

下午4点钟左右，我们乘飞机动身去芬兰。天气苦寒。

当我们动身的时候，天色已暗下来，只有从雪上反射出来的一点微光。我们先往北飞，继而东转。航线跨过阿兰群岛，然后东转朝向土尔库。……当我们到达芬兰海岸的时候，已经暮色苍茫了。

波的尼亚湾一片冰封。这倒助了芬兰人一臂之力，因为一条跨海的汽车运输线已经形成，川流不息的货车和机动运输车辆正从瑞典载来军需品和所有各种物品，从而减轻了铁路的压力，节省了大量时间。

29 我们快飞到土尔库机场时，可以看到一、两点灯光——象灯塔一样——继而当我们飞近时，一整圈的灯开亮了——显出了一片通光明亮的广场。探照灯找到了飞机；驾驶员利落地降落在这个小小的机场上。飞机刚刚着陆，所有电灯都一齐关闭，只有一线亮光把它引导到大楼前

---

①② 这几段和下面各段的引句摘录自这次旅行我所写的日记。



面，四面一片漆黑。……

这一行人当中，有塞尔拉丘斯上校、戴维斯勋爵、也有带着致瑞典驻赫尔辛基公使紧急公函的伦博格先生（国际联盟秘书处）和我。……

7点30分左右我们动身，乘汽车……要走大约二百五十公里的一段路程。离开〔航空港〕大约两、三英里，我们路过土尔库，尽管一片漆黑，（靠了汽车前灯射出来的光）还是能够看到遭过俄国人猛烈轰炸的那个城镇的断壁残垣。……

深夜1点钟左右，我们到达了赫尔辛基。……

1939—1940年冬季是一百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气温在零下十五度或二十度。这在某些方面对芬兰人倒是有利的——例如，横跨波的尼亚湾的冰路。我准备了一件上好的皮大衣作防寒之用。这件大衣原是我岳父的，由内兄借给我。我在瑞典又买了一顶毛皮的白色“楔形帽”，这在去曼纳海姆线是特别有用的。后来在1959年我以首相身份戴着它访问俄国时，这顶帽子出了名。既然我毫不怀疑俄国对于我的履历有颇为完备的记载，所以我索性拿这顶在冬季之战时买到的帽子来寻寻开心。

在第一次空袭之后，大使馆和公使馆——包括英国的在内——都从赫尔辛基搬到大约十五英里外的一个村庄上。外交界的这种胆小如鼠举动造成了很坏的印象，使西方国家受到一般老百姓的轻视。我们的陆军武官古登上校却一直守在他的岗位上。事实上，城市似乎并没有遭受多大破坏，因为大部分轰炸都漫无目标，而且炸弹是从高空投掷的。听说，其他一些内地城镇遭到了低空轰炸，毁坏得疮痍满目：

工厂被迫采取新工作时间——从下午4时到半夜12时。但是他们非常沉着镇静。所有儿童都从城市中疏散出去，不许迁回（正如他们在 30 赫尔辛基打算作的那样）。很多观察家把没有出现慌乱的情况归功于强制性的持续疏散儿童。事实上，在上一个星期俄国对城市的轰炸已经缓和下来（有人说是因为缺乏汽油），但是今天下午在距离这里大约五十公

里的博尔卡，又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空袭。

在这一天(2月13日)的下午，戴维斯勋爵和我要求晋见总理里斯托·吕蒂，他和芬兰银行总裁合署办公。我们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俄国人以更大的力量和规模大得多地恢复空袭的一些消息：

这些持续不断的空袭终于使俄国人在曼纳海姆防线上取得了一些立足点，致使政界人士焦虑万状。俄国人有无穷无尽的军队——其数目只为调动和给养方面的困难所限制。芬兰人，据我了解，在地峡方面只有大约五个师——也许还有仓促集合起来的一、两个师作为后备。在北面，他们还能截住俄国人并把他们困在那个艰险的地带。但是在地峡方面，俄国人的轮番进攻却大有终于要挫败疲惫不堪的芬兰军队的危险。……

吕蒂先生殷勤备至地接待我们，并且看上去，似乎像所有芬兰人一样，绝对沉着，绝对镇静。戴维斯勋爵说明了在英国招募志愿军的努力，并讨论了在爱尔兰、加拿大而尤其是美国招募志愿军的可能性。我向吕蒂先生〔提出了〕时间因素的问题和草草训练的志愿军的有效性问题。关于第一问题，他非常安详却又非常坚决地强调需要的紧迫性。关于第二个问题，他也和我一样地具有同感，怀疑真正的志愿军的战斗力，而对那些伪装的志愿军的战斗力，我们却都不那么怀疑。所谓伪装的志愿军，指的是在英国编成和训练的队伍，他们以志愿军的身份进入芬兰，但到达芬兰后，便重新加以改编。

关于军需品问题，他只是说他们统统需要——当然，尤其需要的是飞机和重炮。

31 从这次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形势是岌岌可危的，这一点后来还得到戈登上校的证实。至于来自西方的援助，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些飞机已开始到达芬兰：

轻轰炸机特别需要。要是能得到足够的飞机，芬兰人就可以袭击列宁格勒周围的部队集结点和铁路交通，但是由于缺少飞机，所以现在还办不到。

俄国人调配了一千五百架飞机到这前线。最初几次空袭都是同时

出动一千架以上的飞机进行袭击。俄国的飞机不错，但是战斗员不高明。一旦遭到攻击或炮火射击，他们掉头就跑。……最初几次对赫尔辛基的袭击，他们飞得很低。在后来的空袭中，因为高射炮射击越来越准确，他们就飞得很高，漫无目标地投弹了。

戈登上校就我们两人都向无所闻的一个因素，说明如下：

冬季结束将不会使形势有所好转。由于土壤是砂质的，加之今年的降雪量异常之小，所以融化的积雪不会使地峡一带成为寸步难行的地区。北方积雪的融化，在最初阶段，这一地区的条件会有所改善，因为积雪在表层上依然封冻。真正的夏季将会在北方给俄国人造成困难，但自然也会使芬兰人失去他们精于滑雪这一有利条件。

第二天，2月14日，戈登上校来访，给我们带来了前方最近的消息：

陆军元帅已经堵截住俄国的进攻，并且收复了陷于俄国人手里的一、两处阵地。但是炮弹奇缺，所以他曾经下令，除非俄国人实际上已在进攻，不准发放一炮。（1915年我国军队在法国的处境，我们记忆犹新。）他曾经要求戈登上校电询帝国参谋总长（艾昂赛德），另外还有什么军需品和弹药可供利用以及什么时候可以运到。如果能准确知道这一点，那么他就可以动用一些现在非留在手边不可的储备。

在进一步的谈话过程中，我体会到疾病正在给俄国人造成很大的困难：

俄国人一直苦于严重的支气管炎，并且因病而造成了大量死亡。这种病影响肺部，也像一种流行性感冒一样，最初的症状是感到非常疲乏，同时出现高温。……病症于是就在肺里扎根，接着就出现肺炎的一般症状，并有恼人的剧咳。芬兰人说他们很远就能听到俄国人的咳声，这甚至影响了俄国的侦察工作，因为他们会因此而暴露。这种病症在北部特别严重。……

傍晚，英国驻芬兰公使托马斯·斯诺来同戴维斯勋爵和我在旅馆里共进晚餐。他就他所了解的一般形势给我们作了一个全面

的叙述。我们对于他的知识和研究问题的客观态度获有深刻印象：

1. 俄国人一直打算征服芬兰，也许还打算占领挪威，特别是纳尔维克港。
2. 自从李维诺夫下台之后，这一直就是俄国的政策，纵使以前不是。
3. 英国的政策似乎是以生怕促使德、俄关系更加密切为基础。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已经进行全面的合作呢？
4. 瑞典的政策是以生怕开罪德国为基础的。瑞典给芬兰以帮助是不是就一定会使德国卷入呢？

他接下去说明了拯救芬兰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如果要援助芬兰，应注意几个不同的方面或阶段。

(一) 他们现在正在地峡作殊死战——曼纳海姆所说的“每天一场塞尔莫皮莱<sup>①</sup>之战”。

在今后的三、两个星期中他们有被打败的严重危险。在那种情况下，尤其是他们如果不能及早撤退，那么对芬兰的征服只要“扫荡”一下就行了，即使芬兰人拼命挣扎，也无希望。

33 (二) 在现阶段上——至少直到4月初为止——西欧各国的军队，无论是真正志愿军、伪装的志愿军或正规军，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都无法进行成功的军事活动。

(三) 现在要想援助芬兰人，就必须立即提供（比如说）一百架轰炸机，以便袭击列宁格勒、铁路联络站以及军队的集合点和交通，并供应野战炮及军火。供应品的清单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四) 另一个办法是，进攻佩特萨莫并占领摩尔曼斯克铁路。这就会结束北方的战争，让芬兰人缩短他们的战线，并加强地峡的防守。这将鼓励挪威人和瑞典人采取进一步支持芬兰的行动。

(五) 如果这些措施能取得成功，那么，志愿军就可以有效地组织起

---

<sup>①</sup> 塞尔莫皮莱，是希腊东部的一个山口，公元前480年，斯巴达人同波斯人大战于此。——译者



来,并在4月间运到这里参加战斗。

女王陛下政府必须权衡利害。但是如果不作(1)大炮和轰炸机或(2)北方的牵制性进攻之类的帮助,那么芬兰的抵抗——除非出现奇迹——一定会在俄国这些势不可当的攻势之下一败涂地。

第二天,2月15日,我们一早就乘汽车动身去博尔卡,即波尔伏那个拥有各式各样木材工业的繁荣的城市。两天前它曾经遭到俄国方面的猛烈空袭:

大约有七十到一百幢各式各样的房屋已经完全炸毁,仍在冒着烟,上面覆盖着从救火龙头喷出的水结成的一条条冰。消防队的工作一定非常有效。他们在河里凿了一个冰洞抽水。这里似乎并不缺乏消防用具。我猜想在他们的城市中火灾一定是经常的一种危险,所以消防设施平常就有这样大的规模。

大家都照常办事。附近没有几个儿童,因为儿童大部分已经依照计划疏散到农家去了。

我们于是返回赫尔辛基,参加在工业中心大厦举行的军官聚餐会。我坐在陆军部长尤霍·努卡宁和陆军元帅驻陆军部代表弗尔登将军之间。在座的还有芬兰驻伦敦公使的弟兄格里彭贝尔格少校和其他几位军官。得知有很多重要军官都是木材工业和造纸工业的实业家,我大吃一惊。他们都是为战争而参军,并且都被安置在重要位置上。在现役军人和后备役军人之间似乎没有任何隔阂。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马吉尔少校也参加了我们的餐会。他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青年人,在不打仗的时期从事于芬兰的木材贸易,能讲芬兰语和瑞典语。他新近到达,担任助理武官。

席间,大家谈论的都是局势问题。尽管信心和勇气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是一种内心的焦虑却也不难察觉。因为今后六个星期几乎不可能希望从志愿军方面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帮助——甚至瑞典方面的人数也不到七千,而且质量参差不齐,所以芬兰人非得到大炮和飞机不可。目前,俄国人完全占有空中优势。他们以大约一千五百架



飞机投入这场战争。有时有多达一千架的飞机同时临空；他们差不多能随心所欲地袭击芬兰的村庄和城镇。虽然人民照常活动，但是工业生活自然受到很大损害。在前线，芬兰人为了控制炮火的消耗，而不能吝惜飞机。（芬兰人现共约有飞机一百架。）他们对自行暴露的庞大目标也保护不了。

部长应我的请求，授权弗尔登将军给我提供一份已经送达伦敦的呼吁物质援助的清单和当时得到的回音。在这一天晚些时候，马吉尔少校又给我们一份他访问前线和他同参谋长、作战部长和陆军元帅谈话的详尽报告。下述判断是他呈复陆军部的：

35 尽管俄国人反复进攻并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成功，但整个说来，曼纳海姆防线依然据守如故。为显示俄国作战的规模，在一条长仅两英里的战线上，一天之内就发射了三十多万发炮弹和子弹。芬兰大炮对此却完全不能加以还击，因为他们奉命除非在俄国步兵真正进行进攻时不得使用大炮。俄国人昂首阔步地前进，虽则他们总是挤在一起，并且看上去在森林地带很不习惯。乌克兰的机枪手是优秀的，他们的炮火射击也在改进。大家怀疑（陆军元帅也同抱这种怀疑）是否德国人在指挥当前的攻势。但是这种怀疑只是以下述事实为依据的：攻势的构想远比以往高明，执行得也比以往有效。但是战线依然据守如故。芬兰的参谋长认为战线将在遭受战术上损失的情况下据守到积雪的融化。但也可能随时崩溃，主要是因为芬兰军队在体力上已经精疲力尽，军官伤亡惨重。

在这一天，从我们同芬兰人和英国官员的谈话中，才了解到，一个令人焦虑万状和千钧一发的时期已经迫近。但如果有一些物资运到，芬兰人还是可以渡过这个难关的。难道不能采取一些措施吗？戴维斯和我决定拍几封私人电报给伦敦。我多少有点怀疑我们是否有权这样插手其事，但形势是这样严重，我们的朋友又是这样焦急，所以同意了这样做。因此我拟妥下述一封电报，由公使馆以密码发出：

呈首相并

外交大臣

密件

敬请作下述考虑：尽管芬兰军队英勇抵抗并具有百折不挠的信心，但据此间芬兰指挥部军事专家的意见，认为局势非常严重。除非进一步的物资援助能迅速运到，否则局势将极其危险。迫切需要各种口径的大炮和相应的弹药以及轰炸机和战斗机。如果这些东西可立供使用，相信阵地可据守到积雪融化，获得短暂喘息之机。之后，我们的志愿军或军队即可在此采取行动。在此期间准备工作应加紧进行。于征询此间芬兰和英国方面意见后，冒昧陈词。

哈罗德·麦克米伦

温斯顿·丘吉尔阁下，

36

海军部

请索阅今天致首相电。此间形势要求火速采取行动。请尽力而为。

哈罗德·麦克米伦

戴维斯勋爵另致电劳合·乔治、阿奇博尔德·辛克莱（自由党领袖）和哈罗德·吉布森。他也要求让利奥·艾默里了解这种局势。

芬兰人决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仍然相信只要能再支持几个星期，春季攻势将会是可能的。两项最可能的计划如下：

1. 如果能有三师外国军队可供利用，那么，这三个师，或者由外国军队接替，将芬兰部队调出，这样就能对坎达拉克沙发动一次进攻。坎达拉克沙是距离摩尔曼斯克大约一百五十英里的一个据点，距离芬兰防线仅仅大约五十英里。芬兰人相信，他们用两、三师兵力就可以将它攻下，一旦成功，就会自动地使这一据点和摩尔曼斯克之间的所有敌军动弹不得，并终于使他们饷尽粮绝而投降。

2. 在彼得罗扎沃茨克可以同样的兵力进行同样的军事行动，如果成功，结果也是一样。

第一项计划，是把树从大约树腰的地方砍断。第二项计划，则是从根砍断。

参谋长和作战部长都确信，只要有部队可资利用，这些计划就可以成功。

2月16日下午，我们

37 同塞尔拉丘斯上校一起去看夺自俄国方面的战争物资展览。正在展出的有各种类型的大炮、坦克、飞机、机枪、反坦克炮和军服。截至昨天即17日为止，被芬兰人击落的飞机共有三百八十七架。大量的坦克被摧毁，约有四百辆之数。因为坦克不能射击太近的目标，所以芬兰人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爬进射击不到的地方，一直爬到坦克旁边，然后或是用重铁撬打坏机枪口，使它们失去战斗力，或是把一块木头插进坦克的履带，使坦克不能开动，或是从坦克的后面经冷气装置或排气装置向坦克投掷一听汽油。有时他们跳上坦克车顶，俄国人一打开顶盖，就投进一枚炸弹。他们用这种办法已经使这四百辆坦克失去了战斗力。由于大炮太少，这自是他们所能采取的最好方法。

那天晚上我们同英国公使一起进餐，他似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赫尔辛基度过的，尽管他的使馆已经疏散。来自前方的消息更糟了。俄国人已经在若干点上成功地突破了曼纳海姆防线。虽然如此，我们决定继续照原来安排的行程，于当晚8点钟乘火车动身去维尔普拉。我们这一行人包括戴维斯勋爵和我自己在内，由塞尔拉丘斯上校和马吉尔少校陪同前往。

于星期六(2月17日)凌晨到达维尔普拉之后，塞尔拉丘斯上校就把我们带到曼塔的耶恩涅米地方他的家里，那是一幢规模相当大的非常华丽的住宅。下午，一位原籍德国但现在已是芬兰人的维楚姆伯爵，和塞尔拉丘斯上校刚刚从德国回国的儿子，向我谈了一些他们对瑞典的处境、德苏条约、德国现状和其他有关问题所持的看法。一些主要的颇堪玩味的问题有下述几项：

关于政策。

1. 德国并不打算同英国打仗。他们对于在慕尼黑得到的东西这样多——他们知道自己无权得到——真正感到诧异。所以他们希望把〔波

兰]走廊夺去,在那方面(照他们的看法)他们更为名正言顺。他们万没有料到张伯伦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

2. 德国不愿看到俄国征服瑞典,说不定已经向瑞典提出了保证,担保他们不会容许发生这种情况。(这可以说明瑞典何以袖手旁观。)

3. 德国现在不想同英国拼一死战。它将不会进攻西线或荷兰和比利时(除非希特勒突然神经错乱),但是希望经过八个月或一年僵持不下的战争之后,英国将进行合理的讲和。

4. 德国的野心仍然是乌克兰而不是英帝国;在从波罗的海到俄国的“强制行动”中并不打算把征服芬兰包括在内。

5. 德国将不反对瑞典援助芬兰,然而它可以想一想英、法对芬兰的支持是如何危险。

关于德国的情况。

1. 汽油没有任何显然的短缺情形。柏林出租汽车很多。虽然如此,他们相信汽油终于会短缺,并且汽油问题是为同俄国结盟辩护的主要理由之一(除两线作战一般不可取这一原因之外)。

2. 德国食品很多。

3. 里宾特洛甫是德国最不得人心的人。

4. 里宾特洛甫在这方面已经取代戈林而成为德国仅次于希特勒的最有权势的人。

小塞尔拉丘斯和维楚姆都理所当然地把俄国看成是全世界的真正敌人,而把德英战争看作是愚蠢的阅墙之争,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的只有俄国。

这种观点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似乎认识到希特勒想要独霸全世界的愿望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这一天戴维斯勋爵身体欠佳。于是决定让他留在塞尔拉丘斯上校舒适的家里,不要他跟我一起上路。因此上午8时,马吉尔和我在来自总部的一位芬兰中尉福莱利乌斯的陪同下,动身去卡亚尼。福莱利乌斯是兰开郡纺织业的正式职工,他在那里娶了一个英国籍的妻子并定居下来。他因战争而回国,充当后备役军官。



他说一口流利英语,是一个很好的同伴和向导。消息凶吉难测,元帅已经发出号召,呼吁部队勿忘海格“破釜沉舟”的著名指示。火车不断因空袭警报而停驶,遇到这种情况则须遵照下述既定办法行事:

39 所有旅客……须遵照命令下车,到树林里躲避。我们照办了,每人都在深色大衣上面披了一件公司准备的白被单,一副滑稽可笑的样子。从火车上跳到深深的雪堆里(一跳几英尺),在齐胸的雪里踉跄地走了二十码,然后爬上一个堤,再翻过一道尖木桩的篱笆,最后坐在枞林里面,头上戴着一顶皮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漂亮的伦敦皮大衣,披着一条白被单,手里提着一个公事包——这副滑稽可笑的、令人厌倦的样子,我们再也不想来一次。大约十分钟之后,发出了“解除警报”,旅客千辛万苦地爬回火车,我们又登上征途。

这一次发生在上午10点钟,又一次发生在11点钟。每一次发出“解除”警报,德洛伊僧模样的人物都一个个从树林里回来,重新登车。我们在伊萨耳米换车,傍晚又遭到轰炸,虽则没有造成任何真正的损失。天气极好,严寒——零下10或15度,但是没有什么风。空气清新。没有一个人欢喜这种天气,因为无论在陆上或在空中俄国人都可以进行更有效的袭击。人人祷告刮大风,降大雪。最后,我们在2月18日下午7点30分左右到达卡亚尼,没有再遭到任何意外。

卡亚尼是长约二百公里的一条战线的指挥官托姆波将军的总部所在,这条战线南起皮埃利湖附近的皮埃利斯亚尔维,北迄琼图斯兰塔附近的基安塔湖以北。应付这项任务,他只有不到一个师的兵力。托姆波将军派他的幕僚维马中尉来迎接我们,带我们到他的总部进餐。晚餐后,将军就这一区域的战争经过给我们作了动人的描述。马吉尔少校担任翻译。他们用许多地图来说明这段经过。



将军解释说，芬兰人在他这一区曾经冷不防地受到攻击。在战争开始以前，很难得到情报，因为他们没有一架侦察机，而且双方的边防军都是非常能干的。他们现在得知，在1939年春季俄国人就建造了两条新公路——一条起于库土湖北边的乌图亚，另一条起于莱波拉。因此一上来的几次进攻，芬兰人毫无准备，以致阵地受到包围。在这两个地带的南面，俄国第五十四师虽则饱受芬兰人的袭扰却一直岿然不动，托姆波将军把这一师看作是指挥既得法而且战斗力又很强的部队。但是在北面，芬兰人曾经采取了一种非常成功的战术：

〔他们〕从索木斯萨耳米经由希伦萨耳米撤退，让俄国人前进。然后他们潜入俄国人的背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成功地袭扰他们的交通线，并且最后予以切断。靠了现已闻名的这种战术，他们成功地打垮了第一百六十三师。派往增援的敌第四十四师，沿着索木斯萨尔米的公路前进，并且攻占紧靠公路的一个森林中的阵地，这恰恰是兵家之所忌，因而这一师也被打垮。

在这些战斗中……至少有一万名俄国人被击毙。芬兰人自从收复了这一带地方之后，已经收集并掩埋了大约这样一个数目的尸体……〔俄国人〕还损失了大量的坦克、大炮、被服、车辆和各种装备。

在库莫的第五十四师，因为未能带足汽油，所以无法使用他们的坦克。

他们自行组成一种“车阵”，他们的坦克深深埋在雪里，直到炮位。他们派出强大的侦察队，但是这些侦察队在森林里不很顶用，轻而易举地就被人数少得多的芬兰部队歼灭了。例如，各拥有大约六百人的三个营均系挑选出来的滑雪能手，奉派援助在库莫的那一师人。他们正要接近那个师的时候遭到了攻击，芬兰人大为得手，敌人全部就歼——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幸免。这位将军同样地告诉我们，他们刚刚听到一支由六人组成的侦察小队获得全胜的消息。这六个人遇到了进行侦察的四十四名俄国人，一举击毙了四十二名，活捉了二名。

尽管有这些难免的同时也造成芬兰方面担负不起的官兵伤亡的大捷，托姆波将军并不存任何幻想。虽然俄国人甚至比帝俄军队更缺乏主动精神，但是他们有比芬兰军队不啻天壤的精良装备，并且有着一切俄国人的传统的勇敢。坦克、重炮、轻炮、机枪、自动步枪的供应看上去是无穷无尽的。而且他们还有取之不尽的兵源。

芬兰资源的短缺到了荒诞的地步。这位将军的战线有二百公里，他仅以四、五千人和三个中队的轻炮据守着。援救是不可能的。他没有一架飞机。

关于关系重大的地峡前线战事的进展情形，托姆波将军每日收到总部的消息。他认为形势非常严重。

芬兰军队想长期支撑下去是不可能的。……虽然他毫不怀疑他的部队能够战斗到底，但他却清醒地认识到，除非外援能大规模到达，否则他们是要完蛋的。

马吉尔、福莱利乌斯和我当夜寄宿在卡亚尼的一家旅店里。第二天，2月19日清晨4时马吉尔和我在维马中尉的陪同下，乘将军的汽车启程。福莱利乌斯留下来等候可能发来的电报。这一天我们曾有一次令人心惊胆战的经历。我们要乘汽车走一百六十公里，途经索木斯萨耳米。我们在一个粗木制的路标前面停下来。路标上标明通往卡里少校营部的去路。

虽然芬兰人已经把大部分尸体掩埋了——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并且把所有有价值的物资都从歼灭在这个地区的那两个俄国师手里拿走，可是还有数目极大的炮车、货车、双轮马车和其他各种辎重散置在道路两旁，迤迤数英里。芬兰人辛苦了十天才把道路清除干净，以供他们自己使用，并把整个这一大堆物资都抛到路旁的积雪里。四处还有很多尸体，我们仔细考察了一天。自然，由于天气寒冷，全都没有腐烂。死尸的肉色和面貌完全未变；他们的衣服也没有明显的坏烂。……我们对于他们死得这样惨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被击中头部或颈部的。……

每一种东西，书籍、小册子、笔记本、钢盔、世界地图和一切意料得到的随身用具，都仍然丢在那里。在这一森林和深厚积雪的寂静中，呈现 42 出一幅不可思议的凄惨景象。

我们对于营部周围人们居住的方式颇感兴趣：

每一处都是围着一颗活树立起一个帐篷，就用那颗树作为搭帐篷的柱子。帐篷四面都是用大约三英尺见方的硬纸板搭成，为了保暖这是再好不过的。硬纸板用木架镶牢，帐篷外圈的高度约三英尺，顶部是用木板和纸板做成帐篷的样子——中间的高度足可让一个人舒舒服服地站直。顶的外面覆盖松枝，伪装得可以乱真。

帐篷的门是一个硬纸板的拉门。帐篷里用一个铁炉子取暖，炉子上装有一个通到顶篷外面的铁管，凭以把烟散出去。炉子里烧的自然木头，既供取暖又可做饭。帐篷里暖气融融——但不太热，因为屋顶装有充分的通风设备，必要时当然还可以把门敞开。

帐篷里的地上铺有各种不同的草垫和寝具。从俄国卡车和货车上取来的皮面弹簧垫子，他们也加以利用。捉来了很多马匹，但是其中大多数因为饿得奄奄一息而被毁掉。

目前〔卡里少校的〕营部位于三条林间公路的交叉点上。往东大约五公里，就是他的逼近最前线阵地的各连，横跨在这三条路的每一条路上。每一连都有大约一半兵力驻总部，另一半左右在往东二至四千码（视情况而定）的战壕或哨所中。这些前进哨所构成了真正的战线。少校举止安祥，血色不佳，瘦瘦的中等身材。他不会讲英语，但是他把他的经历详细地告诉马吉尔，他一边讲，马吉尔一边口译：

虽然他在一次令人惊服的胜利中立下了骇人听闻的汗马功劳，虽然以他的一小支兵力事实上消灭了俄国的两师之众，但他没有一点轻敌之意。

虽然他们似乎不了解森林生活，但他们正开始学习。起初，他们没有给他们的士兵提供取暖办法或御寒设施（禁止升火）；他们只能驻扎在冰天雪地里。他们最多也不过是用绿树枝作一个极其简陋的藏身之所。现在他们——就侦察兵所能观察到的——正在自己的“车阵”中制造一

种掩体，作一些挖掘工作，建起茅屋。（所有这一切，当然他们都能完全安心去作，因为芬兰人在这条战线上既没有一架飞机，而他们的寥寥几尊大炮，除非在敌方展开密集进攻的情况下，又不准放。）他们也正在学习滑雪，但尚未精通。他们极其勇敢，视死如归。自然，他们的兵源是无穷无尽的。你歼灭一师，他们又调上来另一师。

但是他们没有什么主动性。他们毕竟是奴隶——不是自由人。这句话他重复了不止一遍。显然，在卡里少校看来，与其受奴役还不如死。

我们是在7点30分左右达到卡里的总部的。我们回到交叉路口，坐汽车前往哈罗拉上尉的阵地。

他这一连……位于三条道路的中央，离卡里的总部约五英里。在这里我们发现路上有一个瞭望楼，离开大路几百码是上尉的总部。总部设在我们现在已司空见惯的一个帐篷中。卡里少校一进去，每一个帐篷里所有的人都利落地一齐立正。他说了一句问候话，大家一齐报以雷鸣般的热诚回答。

哈罗拉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满脸讨人欢喜的笑容，不知惧怕为何物，诚恳而又富有幽默感。

他听到托姆波将军告诉了我们担任侦察任务的六、七个芬兰人把总共四十四名俄国人击毙了四十二名，活捉了二名，感到特别高兴。这些都是他的部下，他看待这次功绩，多少有点像一个精明的户主看待他的[选手]在户际比赛中的一次重要表演一样。

我们在他的辅助阵地上作了一番巡视，士兵们在那里休息、伐木或拂拭装备。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一排大炮——四门法国75S式的——很好地伪装在树林中。

44 我们终于向哈罗拉和他的官军们作了很不情愿的告别。

我感到了真正的诚挚和友情。这些人也不是不通情达理或不愿意承认英国处境的困难。对于把他们抛弃给俄国人而不加闻问的作法就是有任何怨愤的话，也会是针对瑞典人和挪威人的。

我简直没有看到过任何部队有像这些出色的芬兰战士这样高昂的



士气。

这些部队的纪律给我的印象极好，在很多方面都有点像英国的警卫旅。操练、敬礼和向长官讲话时的立正——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少校一走过，离开数码的兵士都会立正。每进一个帐篷，大家都立刻站起来。我注意到一项很令人欢喜的习惯小节。一个士兵呈递一件公文给一个军官，在呈递时两个人都一直在敬礼。就这种高度的纪律看，在军官和士兵之间似乎存在着（像在警卫旅中一样）亲切的感情和袍泽之谊。……

我怀着深刻的记忆回到卡亚尼。我一到就见到塞尔拉丘斯打来的电报，电报中说，由于地峡方面形势险恶，我不可能到那里去，元帅也不可能会见我。因此建议我回去找戴维斯勋爵，他现在身体见好了。他已经搜集了一切必要的消息，正在前往瓦沙的途中。他会在那里等候我。

此后两天则消磨在漫长的和有点令人厌倦的旅程上。俄国人正在对火车进行一连串的袭击，企图切断整个铁路。然而，尽管有长时间的停车和接连不断的空袭，却没有混乱和慌张。在前六个小时我们只走了大约六十公里。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个车站在着火，有时因反复发出空袭警报而被一再赶下火车。幸而 21 日，星期三，狂风大雪，使得有可能减少一点空袭。

在国内，空袭使我们不久就变得司空见惯。在这期间，芬兰人<sup>45</sup>所采取的办法是让我们先尝试一下马上就将要求我们所要忍受的。

这是一个等待的日子，多次的空袭以及因空袭而在所难免的一切总是造成没完没了的等待。整天……俄国人一直在袭击各交叉点，甚至这条铁路上的小车站也不能幸免。目前，芬兰人除了靠真正的勇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抗它。通常的办法是这样的：关于“空袭警报”（halytys），如果在一个稍具规模的城市，是由像我们那样的警报器发出（发出一种“颤抖的”音调）或是由工厂的汽笛发出。在某些小城镇里，一天之中曾经有十一、二次这种警报。那时你的办法是（一）耽在家里，继续工作或



作乐,或(二)到地窖里去,或(三)到广场上或其他公共地方的任何防空壕里去。(这些防空壕,顺便提一句,只能防弹片。有些最严重的伤亡就是由于直接命中防空壕而造成的。)或者(四)你可以躲进邻近的一片树林里,站在一颗树下。等待空袭过去或发出“解除警报”,通常是以教堂鸣钟为信号。

### 发放警报的系统非常原始:

因为没有收听装置可用,唯一报告俄国人行动的方法就是靠驻在城镇周围的观察员,或者靠邻近各点的电话(如果还安然无恙的话)。

顺便提一句,应该注意到的是,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穿一件白衣服,以便使自己尽量让人看不出。军队和平民都穿着这种保护服。这种衣服有时做得像长斗篷,带有一个像和尚头巾那样的风帽,有时分成两片像一套睡衣。

2月21日下午6点30分,我们到达里希马基,在那里不得不呆到半夜以后。

可是我们发现有一家饭店还在营业,里面挤满了去度假的或度假归来的部队,那里供应精美的香肠土豆餐,〔还备有〕啤酒或咖啡。这里发生了〔一件〕使我忍俊不禁的……意外,我打听厕所时,看门人告诉我说(由福莱利乌斯中尉担任翻译),我必须到外面去出恭,因为男更衣室里

46

不幸有一枚还没有爆炸的哑弹。

在星期四凌晨1时我们搭上了另一列火车,并终于在下午2时30分到达瓦沙。我相当激动地向我的向导福莱利乌斯告别。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我在领事的家里看到戴维斯勋爵和对组织志愿军感兴趣的另一些军官和平民。

我们对芬兰的访问至此告一结束。虽然我明知芬兰的抵抗不大可能再拖延下去,但我仍然希望出现奇迹。那些英勇的、无所畏惧的人民,在我有生之年会永远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下午,戴维斯勋爵和我从瓦沙乘飞机前往瑞典。这时天气比较暖和了。俯视波的尼亚湾,我们可以看到冰上有很大的裂罅和

裂纹，以及偶尔有一条条没有冰覆盖的海水。所以看来冰结的道路也用不了多久了。在芬兰停留一阵之后，来到瑞典的确是新奇的。我们离开了为自己生存而斗争的一个国家，现在似乎进入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一到斯德哥尔摩，我就接到我国大使维克多·马利特的通知，要我去大使馆。他拿出外交副大臣“拉布”·巴特勒的一封信给我看，建议我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耽几天，分访一些重要人物，尽量了解一下他们的观点，认为这将是于不无裨益的。维克多有鉴于此，认为最好把外交部公文和他本人通讯等各项案卷拿给我过目。我也读到了2月16日发生的“阿尔特马克号”事件的详尽记述和相继而来的各种外交换文。我们在芬兰时虽已有风闻，但未得其详。英国政府决定在挪威领海中拦截德国船“阿尔特马克号”以解救船上的大批英国俘虏，这一决定在国内受到了兴高采烈的欢呼。在挪威，而实则在瑞典，却是以多少有点惊喜交加的心情对待这一举动，政府的惊恐同人民的满意恰好不相上下。

下午4时30分，维克多陪我到外交部去会见部长克里斯蒂安·冈瑟。在他看，

瑞典政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避免卷入世界大战，对一切问题的考虑都不能忘记这驾凌一切的一点。

他认为英国一向低估了瑞典曾经给予和现仍给予芬兰的支援：

例如，瑞典军队已经拿出了高射炮的一半和反坦克炮的大部分，事实上之所以抵挡住俄国人对萨拉的攻势，正是靠了这些反坦克炮；第二……即使瑞典出兵援助芬兰人，也无法结束对俄战争。

他继续谈到，瑞典人除了保卫他们的国家而尽最大的努力所能提供的兵力，不过是两、三个师。这不会起什么决定性作用。冈瑟先生并不认为：

瑞典出兵芬兰一举将招致德国的报复。这点他并不担心。他所担心的

却是瑞典的军事支持不会起决定性作用，瑞典和芬兰迟早将不得不谋求进一步的支持，而这只能来自英、法两国，这就将招致德国报复的对俄国战争的第二阶段。换句话说，虽然他认为德国人看到瑞典出兵援助芬兰，并无所谓，但是他们却不能容许英法出兵援助瑞典和芬兰，因为他们害怕影响铁矿的供应。

于是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瑞典对盟国远征前来援助芬兰将会采取什么态度。例如，他将怎样看待通过纳尔维克并从那个基地假道瑞典的调动？关于这个问题，他是十分干脆的。他认为这是破坏瑞典的中立，他们不能同意。甚至连并不涉及破坏瑞典中立的利用佩特萨莫问题，英特尔先生也是一种惊慌失措的态度。我追问一个问题：如果采取这一行动，他认为德国的反应将如何。

48 英特尔先生回答说，“德国将不是以对瑞典而是以对芬兰的进攻作为报复”。德国人是否会同意去作芬兰布尔什维克化的帮凶并为此目的而给以军事援助，对此，我表示怀疑。但英特尔先生是坚定不移的。他认为：

德国人也许会把它入侵芬兰说成是为保证芬俄争端取得合理解决的一项努力。

我们继而转到瑞典对德国的铁矿石贸易问题上。他认为英国政府高估了这项贸易的重要性：

德国要求停止一切瑞英贸易的危险是始终存在的，而这对我国利益的损害要比对瑞典利益的损害大得多。德国毕竟能以强制手段来达到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的行动比盟国更为迅速，力量比盟国更为强大。

在这一点上的确证明他是不错的。

显而易见，英特尔先生极力赞成俄国和芬兰早日缔和以作为唯一的出路。他也认为“俄国人或许会在接近于他们原来的要求时就不再前进，无论如何，就目前来说，这是可能的”。我不禁提醒他想一想捷克的遭遇——先是慕尼黑，继而布拉格——但是他不

接受这个类比。

我对于所有这一切的结论是，虽然瑞典政府对于无论瑞典本身或盟国现正给予芬兰以尽可能最大限度的援助，表示赞成，但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应该始终是不要作任何会导致德国人参加进来从而把瑞典卷入这场全面战争的事情。

在我离开伦敦期间，英、法两国的态度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变。虽然实际上所提供的军需品少得令人失望，而且真正交到的更少，<sup>49</sup>但是情绪比较好了。实则，首相后来多少有点不老实地声称，芬兰所提出的一切要求无不有求必应。法国人也同样越来越渴望开辟一条芬兰战线。进攻纳尔维克的计划已经在制订之中，援救芬兰和切断瑞典铁矿石的供应也已经成为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特别热心而张伯伦也比较积极的两国共同政策的一部分。23日下午当新闻参赞彼得·坦南特来访，在英国大使馆的一次谈话中，我第一次了解到这种发展的迹象：

他似乎因伦敦寄到的新训令而多少有点茫然不解，训令中责成英国使馆对英国正在给予芬兰的援助尽可能加以宣传。因为这同以往的一切训令——要想方设法对这一点尽可能保密——完全背道而驰，他对于执行这项新政策的方法以及他应写或已写的一切文章的调子似乎都有点吃不准了。

英国驻芬兰公使在第二天向芬兰宣布了盟国将出兵二万至二万二千人的计划，几天之后(2月28日)又由我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向芬兰人保证说这批部队即使不是4月底以前也将在4月底，就可供有效使用。我们的疑团解开了。

第二天早晨(2月24日)我和芬兰驻斯德哥尔摩公使埃利亚斯·埃尔科有过一次非常痛苦的会见，在2月12日我途经斯德哥尔摩时曾经会见过他。他很悲观，愤愤不平，和我第一次遇到他时的那种轻快和乐观态度，恰恰成为一个可悲的对照：



他看上去心烦意乱。他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告诉我说他得到了很坏的消息。他真正像是不宜于作任何长谈，但是我想他在这种心情下也许比以后会更开诚布公一些，所以我等待着。他手扶着头停了好一阵之后，突然眼盯着我说，“那好！你们国家打算怎么办？瑞典人是不想再作什么了。这就算完了。大势已定了。”

他补充说，英特尔先生终于就瑞典国王最近所宣布的决定给他以明确的证实，说瑞典不打算干预芬兰战争。他接下去非常激动地说：

我们必须了解你们打算怎么办？如果瑞典不帮助我们，你们也不帮助，我们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听任整个国家被摧毁吗？

芬兰政府现在必定在考虑和谈的可能性，我就是抱着这种信念离去的。

24日下午戴维斯勋爵动身去伦敦。他将把我们所能搜集到的一切消息带给政府，他将对芬兰的需要详加核实。有鉴于巴特勒的电报，我决定再耽搁三、两天，然后去奥斯陆。

第二天，2月25日星期日，我应埃尔科先生本人之邀于下午4时再去拜访他。他对于瑞典人和对于自己国家的长期延宕和踌躇不决，痛心之至。虽然瑞典在物资方面的援助数量不小，但始终是勉勉强强的。

简直像拔牙一样。为什么他们不能确切地说出他们在物资和人力方面准备怎么办呢？甚至核准的志愿军人数也始终不予确定。

英国人也是一样。为什么他们不能明确地说出他们在物资和人力方面能给予多少援助呢？这样芬兰也好据以制订它的政策。

当我问他所谓“制订政策”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

喏——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将得到什么帮助或将得不到什么帮助，那就好决定怎么办了。可是，甚至英国，我们得到的也不过是前后矛盾和踌躇不决。

他接下去说：

只要确定一下英国还能做些什么，他们也是会很好谅解的。可是只要芬兰政府不确切知道英国可以支持和援助我们到何种程度，那就无法制订政策。我再一次问道，“制订政策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否是说议和呢？” 51

埃尔科先生肥胖的身躯激动得颤抖起来。他举起双手喊道，“是的——我想是这样。”

埃尔科先生虽然心情激动、神情沮丧，但在整个会见过程中却一直保持他的风采和动人的笑容。他带着深厚的感情同我告别。我非常感动，意识到他和他的同胞的处境十分困难。

第二天，我谒见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多夫，他以特有的殷勤和亲切态度接待我。他虽然对于给予芬兰以一切可能的帮助抱同情态度，但是显而易见，他同外交大臣并没有什么两样。

他开诚布公地说，瑞典无论如何不愿卷入西方战争。“这对我们有百弊而无一利。”

我回答说，“我们也是这样。”他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战争对我们也是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但是要想抵抗希特勒独霸欧洲的企图，总要有人挺身而出。他放声大笑，并且说他认为的确是如此。

外交部的首脑人物博赫曼先生告诉我两段逸话：

瑞典外交部由于俄国飞机轰炸瑞典村庄而使俄国大使夫人自讨苦吃，感到非常好笑。

科隆塔伊夫人最初含着眼泪（“她伏在我怀里哭泣，”博赫曼先生这样说。）承认俄国人曾经轰炸了这个城镇；说这自然是一个纯粹的错误；他们会赔偿全部损失的。

后来，俄国政府正式否认在附近一带曾经有过任何飞机，并且说整个事情完全出于捏造。……

他还告诉我一个关于希特勒的自信和狂妄想法的可笑事例：

他曾经提出了一个订购瑞典花岗石的巨额订单，要求战后交货，其数量之大，足够重建德国一半的城市。 52

我从斯德哥尔摩接着又前往奥斯陆，在那里也听到了大同小异的叙述。我的主要印象是各方面都极其神经过敏。人人心里实在都是亲英的，但是畏惧德国人。3月1日我回到英国。

在这期间，事态发展得很快。在2月的最后几天中，芬兰人在地峡的地位已严重恶化。虽然在3月2日达拉第宣布，如果他们接到芬兰政府的正式吁请，法国准备从法国军队中调派五万名志愿军和一百架轰炸机于3月底赶到。但是万一挪威和瑞典拒不允许他们过境那又该怎么办，依然没有任何明确的声明。<sup>①</sup>这项最后建议的真正原因是舆论方面日益增加的压力，尤其是在法国。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俄国人已经突破了曼纳海姆防线，撤退已成势所不免，虽则撤退始终没有变为溃败。到3月初，战线已后撤到远至维普里。俄国人于是提出停战建议，条件比芬兰人原来预料的好些。他们抛弃了他们所建立并夸示于世的库希宁傀儡“政府”。这表明他们不打算夺占整个芬兰。那是很自然的，芬兰人曾进行过最后一次无可奈何的努力——向德国发出求援的呼吁。德国无意给以任何援助，而劝告他们接受他们所能争取到的条件。条件委实苛刻，但还不是亡国的。整个汉科半岛、卡累利阿地峡全境，包括维普里在内，以及拉多加湖北岸地带须一并割让，并须支付巨额战争赔款。3月9日，陆军元帅曼纳海姆不得不呈报他的政府说，他的战线现在已经完全守不住了。芬兰政府因而接受了俄国的要求。3月11日签署和约，次日战斗结束。

53 我回国后的最初几天，一直郁郁不乐。芬兰的悲剧使我惘然若失。但是我们的委员这时已无事可作，只有等着事情的到来。我自然欢迎3月2日的法国建议，但也明知已经为时太晚。最不公平的是，在芬兰崩溃以后，英国报纸曾经出现这样一种并非完全

---

<sup>①</sup> 依照丘吉尔的说法，达拉第提出这项建议事先并没有同英国政府磋商。见丘吉尔：《风云紧急》，第453页。

没有政府鼓励的倾向，说英国提供的援助过头了，并对芬兰人的投降大加责备。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正的。尽管设词辩解，英国舆论还是为之哗然，下院也同样不安。我们迄今所插手的每一件事似乎都已失败。我们迄今所保证或试图帮助的所有那些国家似乎都已注定遭殃。表面上对于战事的进展而实则大部分集中于芬兰事态的这两天辩论，就是在这种情绪下在3月19—20日进行的。

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准备我对事实真相的陈述，并且有鉴于我刚刚从芬兰回国，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下院议长会要求我发言。张伯伦发表了一项漂亮的开会词——坚定、坦率而有力。但是他作了若干声明，这些声明至少是支吾其词的。一个星期以前，在答复询问时他曾经说：

芬兰政府曾经一再要求给以物资接济，对于他们无不有求必应。……<sup>①</sup>

在辩论之前不久，关于英、法两国运往芬兰的物资的数量，《泰晤士报》曾经发出一项言过其实的报道。所以我对于首相所将采取的方针并非完全没有准备。但是我并没有想到他竟会那样丝毫不爽地照本宣科。虽然如此，他重又肯定他以前的声明。“举凡芬兰政府向我们提出的吁请，”他对下院说，“无不有求必应。”<sup>②</sup>他于是提出了一项有关项目的长长的详细清单。所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他对于战时最高委员会和拟议中的远征准备工作所作的叙述，却不那么能令人信服。挪威和瑞典是否有可能同意军队过境的问题，依然弄不清楚。虽然如此，我感到，在我等待的时候，政府已经靠了巧妙地利用前一天的报纸并靠了首相的讲话，大大削弱了芬兰人的道义地位，甚至对他们的诚意和勇敢也投以怀疑的

---

<sup>①②</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0年3月13日。



眼光。

7时30分我应邀发言——这不是一个很适当的时刻。但是下院座无虚席，并且始终满座。我讲了将近四十分钟——比通常我讲话惯用的时间要长。我意识到了来自下院前座议员们的极端敌意，也意识到了来自保守党的某些督导员方面的极端敌意，这种情况连在我过去背离党的路线时，也是不多见的。甚至有相当大的压力要制止我发言。然而回顾这一次的发言——我在下院后座最后的一次发言——以听众对我抱敌意始，但终于把他们争取过来，象这样的经历倒是罕见的。张伯伦的终结发言也没有能够消除这种影响。我注意到这一天丘吉尔或艾登一直都没有出现在下院前座，这使得我的工作轻松了不少。

我从我在战时和停战以后同芬兰人的密切接触中得悉所供应的军火的确切数字。尽管在交通方面算是有种种困难，这也仍然是一个令人遗憾的过程。使我和我曾相与讨论过这件事的一些朋友感到诧异的是，这种耽擱延宕、这种出尔反尔、这种优柔寡断和踌躇不决，在我们看来，与其说是基于任何敌意和胆小怕事，毋宁说是基于颡顽无能。为了争取听众的支持，我一开始就心平气和地否认我为政府未能挽救芬兰免于它的厄运而有任何批评政府之意。鉴于地理上和外交上的种种困难，我这样说，就是作最乐观的估计，这也是一件棘手的、冒险的事业。我也不认为芬兰人有怪罪我们的意思。他们了解我们正从事于关系我们生死存亡的一次战争，而这次战争也许会发展成我国历史上最可怕、最血腥的一次大战。实际上，我认为未能把芬兰事件看作是我们的事情的一部分，或者看作是我们可加以有益利用的一个战区，是有强有力的论据的。关于军火问题，我却不禁要说：

55           天呀，我们从不从绰绰有余的物资中，而却从我们的不足的物资中提供一点东西，而我们之所以不足，正是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过去几年我们

自己的愚蠢做法。……①

我先要求在秘密会议上进行讨论。既遭拒绝,我就接下去说:

……我意识到每一位议员在战时的公开讨论中,为避免堕入各方面的圈套,颇感左右为难。一方面,认为如果要对辩论有所补充,那么开诚布公、言必诚实,自是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也清楚意识到,凡有发言,决不能有损于民族利益,这更是应负的义务。……②

于是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描述了我所谓的“第一幕”——三个月的战争。这对下院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全院对我就芬兰人民的艰难困苦、临危不惧所能描绘的图景深为关切和感动。但是我确想澄清某些误解。首相曾经非常强调要芬兰政府提出这样一项要求:公开吁请援助。法国总理达拉第甚至威胁说,如不照办,则战后将被抛弃。我要求英国政府否认这项声明,因为这项声明即使只是意在逼出这样一个公开的吁请,似乎也有失宽厚。何况,到了提出这项建议的时候——3月初——已经为时太晚了。

至于战争物资,由于英、法两国报纸上所作的声明,公众很可能怀疑何以既有这样大量的接济,而芬兰的抵抗竟崩溃得这样突然。首相再一次重申,凡有吁请,无不有求必应:

我不知道他用“应”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他用这个字的意思究竟是说,吁请得到了回答,还是说要求得到了同意。……

我认为一般的印象是,并没有“应”,真正的“应”是既回了信,又整个说来,要求也得到了同意。这是同我在芬兰时弗尔登将军和陆军部长给我描述的以及我现在所要揭示的情况迥然不同。他们给我的印象是,芬兰发出过一连串要求大量物资援助的吁请,对于这些吁请起初几乎是充耳不闻,最后虽然运去了一些物资,但是非特总是杯水车薪,而且又为时太晚。……我承认在物资离英的时间和到达战场的时间之间必然会有

---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0年3月19日。

很大的耽延。我们知道今天在运输方面还存在有如首相所提到的种种困难，但是在战时内阁对物资的批准和实际发送的日期之间，却存在有几乎同样的耽延。<sup>①</sup>

于是我开始逐项讨论数字。在这一点上个别议员提出了一些抗议。但是我提醒下院说，政府曾拒绝举行秘密会议，而他们自己又引据了数字，那现在就不应该反对我这样做了：

公众在报纸上的这类声明中曾经读到核发物资的庞大数字，但是他们是否都了解，最终核发的飞机虽有一百四十八架——这正是今天首相所举的数字，也是他非常坦率告诉我们的——但发送的却只有一百零一架呢？现在我不是说到达芬兰的数字，而是说从英国起运的数字。是否也了解在这一百零一架之中，在12月间从英国起运的只有四架；1月间只有四十四架；2月间只有二十七架；其余则是在3月间补足的呢？

我想一般公众是不了解的，但是首相既然提出了这些数字，我就有权加以说清楚。大家是否都了解，芬兰陆军元帅曾要求一百门反坦克炮，而我们一门都没有运去？运去的若干挺反坦克枪，大约是在2月28日前后从英国起运的。究竟会在什么时候运到，谁也不能十分肯定，但发送出去肯定是非常晚了。要求一百五十门榴弹炮，而我们只运去二十五门；要求一百六十六门野战炮，则只运去三十门，而所有这些都是提出要求一个月之后才发送出去的。…<sup>②</sup>

57 至于小型武器的弹药，情况就极难说了。1939年夏季芬兰政府曾向英国制造商订购了大量弹药雷管，在欧战爆发之前，这些订单就被搁置下来，但是芬兰人为了礼貌起见，所以迄未提出任何国家诉状。在俄国人对他们发动进攻时，芬兰政府说，“至少那批应该在6月间拿到而我们自愿放弃的物资总该发送给我们。”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重又由于种种耽误和手续，直到最后时刻一批也没有送到过：

---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0年3月19日。

……报纸上普遍谈论盟国在出让它们的战争物资上是如何慷慨大方。所谓慷慨大方，当然是说甚至在战时还准许出让物资，而不是说发送的条件。在两种情况下——我想到某些飞机——这些东西是赠予的，而且是慷慨的赠予，除装、运费用之外，不取分文。但是在所有其他的情况下，则是要付款的，或以现金支付，或根据出口信贷计划支付——也就是说在交货时付百分之十五的现金，其余则以若干年为期的票据支付，息金百分之四。当我们想到芬兰是唯一不曾延期偿债的国家，而且不象我国那样，仍继续支付它对美国债务的息金时，他的信用是相当高的，虽然我知道从来不曾有过任何相反提示的官方声明发表，但我怀疑，一般公众是否了解除上述两种情况外，整个这批战争物资都是在通常商业基础上出售给芬兰人的。<sup>①</sup>

这项说明似乎使大多数议员都感到震惊，我为防政府设词辩解，于是补充说：

不妨这样说，这种手续的真正理由是，为了便利这批物资通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所以应该在伦敦就把它们过户作为芬兰的财产。但是这个理由也同样适用于作为赠予的那一部分物资。无论通过赠予或通过购买，都可以变成芬兰的财产，所以这一点是无关重要的。<sup>②</sup>

我接着转而谈到人力问题，不论是志愿军问题还是正规军问题，都谈到了。一支小小的志愿军显然只能有象征性的效果。芬兰曾经在不同时间提出过很多的建议，但是英法两国首揆却都曾暗示，芬兰之所以出乎意料之外地陷于崩溃，正是3月间他们拒绝提出正式公开要求的结果。这自然是欺人之谈。

我认为一般公众应该重新读一读3月11日星期一首相的声明和星期二达拉第先生的声明。我并不提出任何非难，但是公众一定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芬兰人所必须作的只不过是提出一项正式要求，于是十万人左右的一支远征大军就会立即乘船驰援。公众认为只要芬兰提出要求，远征军就会扬帆出发。“那么，为什么，”公众问道，“在有那样多的英

<sup>①②</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0年3月19日。



勇表现之后，又踌躇不决呢？是不是变节或士气瓦解了呢？”（我曾经听到过这种提法。）理由是什么呢？这些是不是健全的、可理解的理由呢？还是歪曲的呢？但是，先生，这是对局势未免太肤浅的一种看法了。<sup>①</sup>

一项公开的要求恰恰可能对瑞典和挪威两国政府产生相反的效果，该两国政府当时对于军火过境和一些志愿军的过境一直是佯作不见的。他们也许会暗地里同意而拒绝作公开的许可。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当芬兰军事地位变得更加绝望的时候德国所施加的压力。德国人明白表示，如果芬兰人坚持毫无希望的战斗，他们将无法反对俄国人对1809年边界的要求——那就是说吞并整个芬兰。

我们应该公平对待作出英勇抵抗的芬兰人。既缺乏物资，又拿不准万一瑞典和挪威拒不假道，盟军是否有强行通过中立国国境的准备，而且他们所应付的军事形势几乎是无望的，这就必然使  
59 我们大家不能不一致认为芬兰政府采取了唯一可行的办法，他们的名誉不应该因恶意或误解而稍损其光辉。我以下述一段带预言性的话结束我的发言：

至于这段插曲的一般教训，我没有足够的战略知识来了解我们总的说来是有所得还是有所失。……但是我认为它却在政府的现行机构和方法上投射了一束烛照隐微的强光。延宕迟误、优柔寡断、出尔反尔以及在作出决定以前今天站在这边而明天又站在那边——这些都是昭昭在人耳目的。从这三个月的战争中为未来吸取的教训是，用伯克的话来说，“是一个意志薄弱所起作用的无法否认的明证。”<sup>②</sup>

督导员们鼓动一、两个保守党议员试图给我以回答，但是没有什么效力。辩论是以张伯伦和我两人之间的舌战而终场的。我所举的数字已经在下院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首相则几乎完全

---

<sup>①②</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0年3月19日。

专心致志于力图反驳这些数字来结束这场辩论。凭借他的巨大权威和靠了保守党大部分党员依然给予他的几乎盲目的支持，他得以再一次给这个问题蒙上了一层乌云。虽然如此，整个芬兰事件所给人的惊慌失措；处理乖张，议员们却仍旧深深铭刻在心。当几个星期之后同样令人忧郁的事在挪威战役中重现时，芬兰事件的记忆复起于心。多少个月来举国所有意或无意企求的，乃是一个能以一手指挥全局的人物，或至少是一个由少数同僚组成的强有力的班子，既能从中央统筹调度又能为一个目的而管理军、民各部门。张伯伦政府倒台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没有掌握一个适当的机构来领导战争。他是一个升平时期的杰出的行政家，他所最为关心的是社会改革和内政问题，而作为一个战时的首相却茫然不知所措，只能作绝望的挣扎而已。真正的危险是，如果他一旦倒台，这种情况若真的出现，那谁是唯一可能拯救国家的人呢？这立刻就成为一种真正的焦虑了。

## 第四章 斯堪的纳维亚之役 和政府的倒台

芬兰的崩溃对法国总理达拉第是致命的。法国有那么一些势力集团,部分出于真正的同情,部分由于对苏俄的憎恨,部分抱着希望战火不要蔓延到法国领土的妄想,急于想给芬兰人以帮助,而达拉第正是维护这些势力集团的。3月21日新政府在他的主要对手保罗·雷诺的领导下组织成立。雷诺命中注定要主持政府直到法国崩溃。

虽然对于张伯伦的影响不是这样严重,但是他的威权却由于为援助芬兰人所采取措施的手忙脚乱和耽延迟误而朝不保夕了。

又有另一个小国已经成为侵略的牺牲品,而西方民主国家竟不能给以有效援助。不管促使盟国作出援助芬兰人的各种不同决定的复杂动机是什么,事情的结果已又一次失败。公众惶惑不安。因为得不到其他消息,所以关于芬兰投降条约辩论的报道就广为人们所阅读,成为街谈巷议的题目了。我可以根据自己所收到的大量信件这样说:虽然首相没有费多大气力就在议会里站住脚了,但是抱各种不同政治见解对于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深感不解的,却大有人在。张伯伦试图以4月初在一次保守党集会上发表的一篇充满信心的演讲来对付这种焦虑。<sup>①</sup>在这次演讲中,他竟因自己一句不幸的话而咎由自取。他相信时间在我们这一边,随着时日推移,盟军的力量会增长而德国的力量会衰竭。“希特勒,”他这样

---

<sup>①</sup> 1940年4月4日保守党和统一党协会全国联合会中央委员会。

大声说，“已经失掉时机了。”<sup>①</sup>

在芬兰接受俄国条件的那一天（3月12日），“英国内阁决定恢复这样一项计划：接着在斯塔万格和卑尔根登陆之后就在纳尔维克和特隆赫姆进行军事登陆，以作为所期待的对芬兰援助的一部分。”<sup>②</sup>但是在芬兰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这些部队被解散了。已有两个师调到法国，因而后来在作出兵挪威的决定时就减少了可供立即调动的部队。3月28日最高战争委员会在伦敦开会，作出了两项决议，然而都成为马后炮了。这两项都关系到丘吉尔久已主张的攻势行动。第一项决议是在挪威领海布雷，借以防止德国船只从纳尔维克装运铁矿石到德国。因为这项运输是在三英里的限界以内，所以这几个月一直畅行无阻而没有受到英国的干扰。在这带海域布雷是严格违反国际公法的。然而要想因此就逃避掉我们的封锁，却是不能容忍的。尽管在技术上违法，干涉却完全师出有名。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采取过同样行动。人所共知的这项计划的名称就是“水路布雷”。

第二项决议是一个比较有独到见解的但同样雄心勃勃的计划，它的代号是“皇家海军”。丘吉尔在他自己顾问的帮助下，曾经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从空中向莱茵河多处不同地点投放水雷，借以干扰以至完全破坏德国生存所系的一条运输线。这两项建议都经过了长期的辩论。第一项是丘吉尔在1939年9月一回任原职就提出的。它在内阁中经过长期议而不决的辩论，直到讨论了七个月之后方才得到了同意。日期先订为4月5日，后来又改为4月62  
8日。第二项，虽则终于巴黎原则上予以接受，但在法国被入侵后

---

① 读过斯皮尔斯将军的《敦刻尔克的序幕》(Prelude to Dunkirk)(伦敦,1954年版,第99页)的人将会记得,丘吉尔在同一天私人谈话中,由于一个奇妙的机会对盟国用了这个比喻。“Nous allons perdre l'omnibus”,〔我们将坐失时机〕他对可望领会其总的含义的法国东道主这样说。

② 丘吉尔:《风云紧急》,第453页。



的那几个惊心动魄的星期中抛到九霄云外了。不管“皇家海军”会有什么结果，在冬季几个月中在挪威领海布雷是不致遭到任何困难的，德国也不会作出任何反应。事情也真巧，这项行动最后恰恰是在希特勒确定入侵挪威的当天夜间开始的。在战时，对于一个次要战术行动的构想和执行之间竟耽延了七个月，这未免太久了。

毫无疑问，踵随所有这些援助芬兰的风声而来的“阿尔特马克号”事件已经是对希特勒的一个警告了。因而在英国人和法国人举棋不定、踌躇不决的时候，希特勒就以闪电的速度拟妥并实行了攻取丹麦和侵占挪威一切重要港口的计划。这是4月8—9日夜间的事。德国军队搭乘装运铁矿石的空船溯流上驶，甚至到达纳尔维克。接着就是一片乱哄哄的时期，许多矛盾的计划相继提出。盟国政府不能不对挪威求援的呼吁作出反应。丘吉尔想要集中力量进攻纳尔维克。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能有一支部队驻守在那里，就不难阻断铁矿石的运输，并可转而运往盟国，非但这一方面会有重要收获，而且可至少在挪威领土上保有一个基地，供作挪威国王及其政府建都之用，以便继续推动和展开抗战工作。

抱着这样的目的，内阁这时同意派出一支海、陆两用的远征军。4月12日护航队怀着极有成功希望的心情驶离我国海岸。继舰长沃伯顿—李在纳尔维克峡湾进行的一番速战速决的英勇战斗之后，惠特沃思海军上将又消灭了德国残余的驱逐舰和供应船只，因而满怀信心地报告说，用一支不太大的兵力就可以攻占该城本身。不幸，这支远征军一上来就是事事舛蹇。指挥机构缺乏实效，依照我们后来的想法，简直是幼稚的。海军上将科克勋爵，那位英勇果敢的猛将，独负指挥海军之责。而麦克西将军则总揽陆军大权。作为一个整体的远征军却没有指派任何统帅，等到亡羊补牢，已经措手不及。在这期间，两位司令官各接受各自参

谋长的指令。麦克西为人谨小慎微，墨守成规。他认为这个城镇，当时虽只有人数很少的一支德军据守，但贸然发动进攻，也是太冒险的一个举动。在欣尼岛的哈尔斯塔地方已经登陆的大约两万人的一支大军，竟按兵不动达整整四个星期之久，坐视德国在纳尔维克稳步增强它的驻军。科克勋爵在他的旗舰上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只是在5月12日科克勋爵总揽指挥全权之后，才对峡湾的顶端发动了一次进攻。5月28日攻占纳尔维克，但是到这个时候西线战事已如火如荼了。这支兵力如能用以防止战事蔓延法国，仍未始不可起决定性作用，德国的猛攻对盟军既造成了威胁，要再让它留驻挪威北部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根据一致的同意，决定撤退确有必要。为达成这个目标，攻占这个港口及城镇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也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虽则付出了一些代价。终于在6月8日，有二万四千名法、英、波军队，连同大量的军需和装备成功地重新装运上船。

就纳尔维克而言，我已经逆料到这个悲惨事件的结局。主要的大戏是在其他的地方演出的。4月13日，尽管丘吉尔和奥利弗·斯坦利（国防大臣）表示怀疑，内阁还是决定要为攻夺挪威的旧都特隆赫姆立即作出努力。在这个地方挪威人可以重整旗鼓。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形成一个坚强的基地，以便在挪威进行一场决战。德国侵略军的力量仍然薄弱，还不曾有任何大军远达这样靠北的地方。我们很可以捷足先登。

集中海军力量，准备夺路进港的命令已经下达。这将是另一次达达尼尔海峡之战，但是成功的一次。经过了进一步的审查之后，直接进攻的计划又立刻放弃了。据认为海军的风险太大，因而 64  
陆军在港口登陆太无把握，代价也颇为不赀。4月18日作出了包围特隆赫姆的决定，并决定为此目的把已经在纳姆索斯未遭任何抵抗而完成的小规模辅助性登陆以及在翁达尔斯内斯进行的一项

新登陆，发展成为主要的进攻。第一个地点在特隆赫姆以北一百英里处，第二个地点在它以南一百五十英里处。这每一个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都证明是彻底失败，虽则作战的英勇是尽人皆知的。条件委实不利。积雪时而融化，时而结冰，造成很大困难。空中支援不大可能，或全无可能。因而不能不下令撤退，于是在5月1日和2日，将这两个地方一并放弃。撤退是在没有遭到过分损失的情况下完成的。

除在纳尔维克的军事行动之外，斯堪的纳维亚战役就这样结束了。除了陆、海两方面均遭惨重损失外，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表明我们的努力。但是，当时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从事态发展看，却有一个结果，倒未始不可以使我们引为快慰。我们海军的损失固然严重，但还不是不可收拾。我们海军总的优势非但没有减损，而且得到了加强。德国的现役舰队却已减少到只有八英寸口径的巡洋舰一艘，轻巡洋舰八艘，另驱逐舰四艘。这样，他们虽有一些重要舰只在相当时期内可以修复，但是当希特勒征服法国之后，在大有入侵英国可能的这个存亡攸关的夏季中，德国海军却完全失去了战斗力。<sup>①</sup>

德国入侵挪威、占领丹麦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无不发指。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显然英国已经被人占先一着，遭到出乎意外的袭击，中了他人之计，尽管我们的海军实力还拥有席卷全局的优势。4月11日的辩论，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追究失败之责，丘吉尔竟首当其冲，而丘吉尔却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真正信赖的唯一大臣。他虽暂时成功地让下院平静下来，但是消除不了根深蒂固的焦虑。丘吉尔的朋友们特别感到快快不乐，因为我们把未来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几天之后，进攻特隆赫姆的拟议披露了，希望重又高涨起来。不担任政府职务的议员，除阅读报纸和同

<sup>①</sup> 丘吉尔：《风云紧急》，第519页。

大臣们接触外,简直得不到任何消息。而报纸却往往过分乐观,老实说,有些大臣本人也是如此。 65

5月初特隆赫姆远征军撤退的消息透露后,议员们的最初的反应是将信将疑。接着就越来越感到怒不可遏了。至于我自己以及照我想来我的很多朋友,所主要关心的却是这些灾难对丘吉尔的地位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当中很多人久已有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为了领导战争,物色一位新首相,组织一个新政府是根本之着。这种感觉并不仅仅以下院为限。忧心忡忡的选民也开始加以很大压力。甚至在当时一直忠心耿耿的保守党议员也开始动摇了。

在4月11日丘吉尔讲话之后,我曾经参加过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看守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延揽了代表党内各种不同分子的上、下两院议员。会上提出的一种强烈的意见是,认为要丘吉尔同时承担海军部首席大臣和军事协调委员会主席这两种职务是不可能的。索尔兹伯里勋爵负责把这个意见转达给首相。无疑也把这一点报告了丘吉尔。由于为人谦恭有礼、公正不阿,加之经验丰富,索尔兹伯里勋爵自然成为一个代表不同观点的机构的一位深受尊敬的人物和令人钦佩的主席。首相,无疑在丘吉尔的请求下,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因而在整个挪威战役中自行兼任了军事协调委员会的主席。5月6日发布的丘吉尔今后将是三军在内阁中唯一“发言人”的通告,没有使任何人满意。首先它的含意不明。“发言人”是什么意思?是国防大臣吗?他的权限是什么?他的权力又是什么?无论如何,就斯堪的纳维亚战役来说,已为时太晚了。

在特隆赫姆失败的消息发表之后,压力日益增加。我的朋友和我都怀疑,为政府辩解的人有把整个责任推到丘吉尔身上的明显愿望。他们至少已肯定他决不可能想要摆脱他的全部责任。



66 所有持异议的各集团,特别是由艾默里主持会议的那个小组,这时已决心要政府改组。但是由于我同丘吉尔的友谊和我同布伦丹·布雷肯的密切接触,我清楚了解丘吉尔的忠诚和责任感必将使他坚决支持张伯伦,力劝他一天握有多数就一天奋斗下去;事实也证明如此。但是由于我们确信政府维持不了多久,我们越来越担心丘吉尔同这次灾难性的战役紧紧地牵连在一起,将有碍于膺选我们认为最近将来非他不可的那个最高职位。

5月2日,以克莱门特·戴维斯任主席的全党小组召开会议,会上决定利用5月7、8两日圣灵降临节的休会期间布置一次摊牌。据传有人力劝作为反对党领袖的艾德礼进行一次不信任投票。幸而他本人决定不采取这一着。因为,虽然辩论可能展开,但是保守党人要想畅所欲言、投票或动议休会而停止讨论,都是轻而易举的。这些也许是议会的小小微妙之处,但却是事关重要的。在这个场合下也许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在辩论的前几天,舰队司令罗杰斯·凯斯爵士在下院的会客室里忙得不可开交。他非常激动,因为他把海军不愿闯进特隆赫姆港看作是一种胆小的,即使不是懦弱的行为。想到达达尼尔战役中他所认为的前车之鉴,他对于这次的重蹈覆辙,简直怒不可遏。他告诉我说,他打算发言,并且要身着舰队司令的全套制服去出席会议。他的仪表肯定会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是他纵然不能说是结结巴巴,也是一个口齿不清的演说家,所以我不敢说结果如何。但是他所要征求我的意见的,并不是关于他的服装问题,而是关于他的演讲方式。我力劝他不要去管下院的清规戒律,拟妥一篇简短的发言稿,把自己所要讲的东西一齐包括进去,写成书面,然后照本宣读。他照办了,收效甚好。

67 关于5月7日和8日这两个历史的日子,已经有不少记述。有些是个中人撰写的,有些是出诸旁观者手笔。这的确是一场

决定性的辩论，因为它改变了英国和英帝国以及世界的历史。在议会的悠久历史中所作出的更伟大的演讲无疑是有的，然而具有这样效果的却寥寥无几。通常，至少近年来，我们议会的“正式”辩论都是具有表演性质的演讲或辩论，与其说想要左右院内的投票，毋宁说想要影响院外的舆论。这些辩论所争的都是其直接结果多少已有几分把握的事情。但是这一次却一切都是在变化莫测之中。问题的关键自然在于保守党议员的投票。多少人会投政府的反对票呢？多少人会弃权呢？在幕后或在议席上会作出什么样的一些可能影响事态发展的承诺或建议呢？谁将发言呢？甚至连这一点也不确知，除张伯伦当然致开会词，丘吉尔会作总结发言。

我常常听到有人建议，不妨说服下院采用一种代表投票制，一如很多年前上院放弃了的那种制度。一位年轻的保守党议员最近同我谈到这件事，他似乎也赞成这个意见。我不能不指出，在1940年我们没有这样一种制度是件好事，否则我们也许要遭受失败。在这次辩论中，无论如何议员们是摇摆不定的——不论是为论据所影响也罢，或者为情绪所左右也罢。要是他们的投票能够交到督导员手里，那么，结果——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一切——一定是迥然不同的。

我坐在下院反对党一方普通议员席后面的位子上聚精会神地听了差不多两整天。这些议席是因为保守党人数众多而分配给他们的。我发现这些议席无论就发言还是就观察来说，都是很方便的。因为我是坐在大臣席的对面而不是后面。在整个这番紧张的、起伏不定的讨论中，我被自己的两个愿望弄得心神交瘁。第一个愿望是政府必须垮台。第二个愿望是丘吉尔必须出任首相。随着辩论的展开，我对于自己的第一个希望越来越有把握，但对于第二个却越来越乏信心。在这整整两天中，下院一直是座无虚席，只 68 有几次短暂的时间，有一位无聊的发言人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

们到会客室或吸烟室去核对一下笔记和彼此的印象。首相首先发言。有人认为他会宣布组织联合政府；但是我们大多数人都确知工党不愿同他目前的大多数同僚合作，或许也不会老老实实地答应他蝉联领导的职位。但是他却满足于对最近局势的一篇罗列事实的叙述。他的发言一再粗鲁地、不公平地被打断，这种举动是不幸的，是一个重大场合所不应有的。“是谁失掉了机会？”（张伯伦的用语）的呼声此起彼伏。张伯伦的发言就形式而论是条理明晰的，但是达不到解决这样重大问题的要求。所露出来最重要的一点，也许就是前一天简单宣布的丘吉尔的新职，实际上是给他提供一个参谋长（伊斯梅将军）、一个他自己的小工作班子以及对三军参谋长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劳合·乔治立即追问是否他既担任这些新职而依然负海军部之责。答复是，那要取决于丘吉尔本人的意愿。这似乎是建造一部指挥战争的新机器最不费脑筋的办法。何况一位将军同时指挥一支海军陆战队和一师陆军的这种想法是多么荒谬，这在议员当中还是有足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积极参与者可以了然的。但是有一件事得到了澄清。丘吉尔除作为海军部首席大臣以及作为战时内阁和军事协调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而并不对挪威的战役负直接责任。这使他的朋友得到宽慰。

虽然如此，张伯伦的演讲尽管不甚高明，却也不失为巧妙。他试图降温，倒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他纵使消除了恐惧，却并没有激起热情。他含糊提到在政府的性质和结构方面变革的可能性，却没有宣布任何确实的东西。反对党的领袖，艾德礼和辛克莱，所采取的方针是意料之中的。他们所讲的话，虽然没有什么足以吸引踌躇不决的保守党人，倒也一点没有拒他们于千里之外的意思。但是那天所发表的演讲却有两篇是有助于创造历史的。凯斯以他对海军部的攻击和他自称代表正在作战和“出海”的海军



讲话而使下院大为激动。无论决定不闯入特隆赫姆峡湾是对还是错，这篇演讲揭露出了议员们早已抱有的怀疑——三军内部缺乏确定目标和合作到了惊人的程度。

如果说舰队司令的发言是因为憨直诚恳而动人，那么艾默里的发言却是我平生所仅见的一位前大臣对一位毕生老友兼同事所发表的最猛烈的攻击。因为艾默里的整个政治生涯一直是以伯明翰为中心，张伯伦的传统是深入他的血液之中的。他所崇拜的英雄是“乔”那位伟大的激进改革家和帝国主义者，凡是他的门徒，在全盛时期，对他的忠诚都是真诚的。艾默里也象奥斯汀·张伯伦和内维尔·张伯伦一样，曾经占有伯明翰的议席达四分之一世纪以上。这三个人曾一起参加政府。虽然在1931年艾默里未被延揽入阁（在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成立的时候），他似乎并不觉得任何遗憾。在印度问题大争论时，他曾经给政府以可贵的帮助。在其他问题上，他虽往往抱批评态度——但却是建设性的。

艾默里之所以不能在通常情况执掌更大的权力，不能跻身于一较高以至最高的地位，这正是政治上的奥妙之一。他兢兢业业，见闻广博，学有专长，富于想象力，而且以至诚待人，对于世界事务理解的精湛，远非所有霍尔氏和西蒙氏加在一起所能望其项背。他还具有许多人缺乏的素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气魄。他对于帝国了如指掌，并且同帝国的重要政治家都保有亲切的友谊。他曾周游欧洲各国，在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朋友。他能抓重大问题的根本，这是他的同事很少能以此自诩的。他虽身材矮小，但是斗志昂扬，不屈不挠，与一位训练有素的保卫英国本土的战士无异。这时他颇为下院各方面人士所喜爱；他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进步观点和他的进步思想，尤其吸引了很多工党议员。在他本党之内，左、右两翼无不钦佩之至。靠了他在1940年5月7日这一天所发表的演讲，他有效地摧毁了张伯伦政府。这决非言过其实。70



在这两天的过程中，促成这个最后结果的还有很多辅助性因素。但在我看来具有决定性的，却是艾默里的发言——条理分明、字字有力、无可驳辩。一记一记地狠予痛击，一点一点地击中要害，反复不已，毫不容情，几乎是恶狠狠的。所以，在下结论的时候，看上去并不是生硬的或夸大其词的，而是水到渠成、无可避免的。艾默里以罕有的技巧引证了这样一段话，把每一个听众正在内心形成着的思想都一总包含了进去。这个议会和举国上下对一批庸人的蝉联所要说的，正是克伦威尔对长期议会所说过的下述一段话：

你们坐在这里太久了，作不出什么有益的事情了。嘿，走吧，让我们同你们一刀两断。以上帝的名义，走吧！

利奥·艾默里的发言成为他一生经历的顶点。在随后一段人心紧张时期，有过一些这样的议论，认为他也许是接替张伯伦最令人满意的继任人选。哈利法克斯被慕尼黑的刷子抹了一脸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社会主义者依然不信任丘吉尔，很多保守党人亦复如此。艾默里自1929年以来就没有担任过官职，所以象丘吉尔一样，保有清白的纪录。纵使艾默里听到了这些风传——他告诉我们说他是听到过<sup>①</sup>——但在作出最后选择的时候，他一点没有表示出任何失望或沮丧的样子。毫无疑问，他原想在战时内阁中占一席位，并同领导战争的工作有些密切联系。虽然如此，他还是毫不踌躇地接受了印度事务部，不声不响、胜任愉快地执行着那随着日本侵略临近次大陆而越来越艰难的工作。在他这长期政治生涯的终了，按情理讲，他原可以指望得到甚至更大的尊荣显贵。但艾默里是个诚实无私的爱国主义者，具有天赋的气魄，能以同样的高贵风度对待在公共生活上所遭到的失望和在个人生活上所遇到的烦恼。

---

<sup>①</sup> 艾默里：《无可宽恕的岁月，1929—1940年》，第370页。

当议员们或在吸烟室和会客室聚会或在俱乐部休息的时候，关于第一天辩论的经过，大家的意见是没有什么分歧的。政府的支持者可能把舰队司令的发言贬为文不对题和戏剧性的，但是没  
71  
有一个人能否定或低估艾默里那远非他通常所能比拟的卓越的演讲。因为他的发言往往是冗长的，千篇一律的，而语调又毫无抑扬顿挫，犹如牧师讲道一般。这天晚上却是条理明晰、激昂慷慨、怒火中烧，但都是语言简炼而动人。在政府方面，那一天所发表的言论之中只有一篇使全院为之感动。阿诺德·威尔逊尽管他年事较高——已五十五岁——仍作为一个后卫机枪手参加空军。他的勋绩功业在国内、外都负有盛名。他一贯是一个诚笃的“张伯伦派”。他的话虽不很有说服力，但他向他公平而宽厚下院同事的陈词却是质朴而体面的。他后来不久就战死疆场，我认为他是求仁得仁的。除此之外，他没有作过任何真正的辩护。陆军国务大臣奥利弗·斯坦利曾给政府“打气”。但是他的隽言妙语，虽往往投下院之所好，此时却不合乎他听众的情绪，因而全无效果。

那天晚上显而易见的是，甚至政府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对于政府能否苟存下去，也抱怀疑态度了。但是变革怎样发生呢？会有一次分组表决吗？关于圣灵降临节休会的动议，自是不平常的。我亲自和克莱门特·戴维斯的接触使我确信总会想办法举行一次分组表决。除非临事畏缩，规避责任，反对党要把这次胜利的机会失之交臂，将是愚不可及的。但实际上并不是稳操胜券。甚至通常富有战斗性的休·多尔顿也抱怀疑态度，这无疑是生怕举行一次投票反而会有助于加强保守党的支持者并使他们团结在政府周围。

我同多尔顿关系很好，尤其是自从慕尼黑危机以来。他告诉我说，工党执行委员会将在上午开会，来决定究应建议他们的党采取何种方针。我将这一点报告了索尔兹伯里小组，这个小组也在

5月8日上午开会。快到午餐时，我听说反对党已经决定要求举行一次表决。<sup>①</sup>还没有确实得知这个消息之前，索尔兹伯里勋爵就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万一举行表决，保守党的批评派应该弃权。但是大多数党员开始认为这样一种抗议未免过于软弱。艾默里所讲的话，言犹在耳。在这期间，督导员以职责所在，一直孜孜不倦。撇开呼吁或劝说这类正常的方法不谈，首相的亲信又采取了一项分头作说客的新办法。他们在辩论恢复之前，先分别同持异议的各小组成员碰头，对他们说，如果在分组投票时投政府的赞成票，那么首相将会在第二天接见他们，以虚怀若谷的态度讨论他们的要求。暗示政府会有大刀阔斧的改组。当然，凡是说客光顾的人，都把这种发展告诉了他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都认为已经来不及了。政府如果在战争刚刚开始，或在圣诞节时进行改组，那还不算晚。西蒙、霍尔之类的这一伙人都必须去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也非退出唐宁街不可。首相似乎并没有认清已经激起的情绪的深度，也没有认清大家越来越认为他不适合于作为一个战时政府的领导人。

我们的主要焦虑就是对于丘吉尔的关心。我们知道他已经决定忠实地站在他的同僚的一边，并且将作为政府的发言人来结束这场辩论。我们决心倒阁，而且我们达到目的的可能性似乎每小时都在增加。但怎样才能把丘吉尔解脱出来，以免玉石俱焚呢？如果第一天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推翻政府的话，那么第二天的主要使人焦虑的问题就是如何营救丘吉尔。第一个任务事实上是由艾默里完成的。对于第二个任务将有几位发言人作出他们的贡献。赫伯特·莫里森的发言主要是以他声明反对党打算要求举行一次

---

<sup>①</sup> 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微弱多数采取了这一立场，而为议会工党所同意。休·多尔顿：《回忆录：命运攸关的年月，1931—1945年》（Memoirs: The Fateful Years, 1931—1945）（伦敦，1957年版），第305页。

分组表决而著名的。他要求举行一次应该“表现举国一致精神”的投票。在这一点上，已经发表过开会词的张伯伦竟然从中插进一段极其不适宜的话：

我对我的朋友说，……我接受挑战，我在下院是有朋友的。实则我欢迎挑战。至少我们将看出谁站在我们这一边，谁反对我们，因此我号召我的朋友今天晚上在等候投票的走廊里给我们以支持。

这是一些不适宜的词句，似乎把一个民族的危机看作一个党的甚至个人的问题了。随后的发言者必然要对这个错误大加利用。

但是，莫里森，尽管对政府进行全面的批评，却曾力图开脱丘吉尔。同样，在慕尼黑时期退出内阁而现在声明打算投政府反对票的达夫·库珀，他回忆过去，也谈到当前的危机，他说：

今天晚上，我们无疑将听到第一海务大臣的一番雄辩而有力的发言……我几乎希望这一发言将是从他过去常常占据而现在空着的普通议员席的那个座位上发表的。他将以他的雄辩口才为那些长期拒听他的意见对他的劝告等闲视之的人进行辩护。他无疑会象一贯的那样成功，而那些常常在他的舌剑唇枪面前发抖的人们，只有为自己能得到他的庇护而无限高兴。

但是为保护丘吉尔免于大祸临头而作了最大努力的，却是劳合·乔治。他在前一天已经提出这样一个事实：直到挪威战役结束之后，丘吉尔才被任命为拟议中的一种类似国防大臣的新职务。当劳合·乔治在第二天的发言中表示最近的一切灾难不应归咎于丘吉尔时，丘吉尔立即起而承认了全部的责任，“我承担我的一整份责任，”他的话并非不激动的。但是劳合·乔治以全院为之捧腹的俏皮话答复说：

这位尊敬的议员先生不应该让自己变成一个防空洞，来防范碎片击中他的同僚。



虽然劳合·乔治的发言象往常一样不乏警句,即如“希特勒并不自行对议会领袖们或公务员铨衡长官负责”云云之类,可是我觉得他最后的抨击未免过于尖刻。他使得很多议员反而对深受这样一系列打击之苦的张伯伦重新表示同情。

74 他曾经号召牺牲。只要领导有人,举国上下是准备作出一切牺牲的……我郑重地说,首相应该作出一个牺牲的榜样,因为没有任何事比他牺牲自己的首相大印对这次战争的胜利能作出更大的贡献了。

这是冷酷无情的语言,像艾默里书中谈的,<sup>①</sup>这些话弹出了一个错误的调子。令人莫明其妙的是,为劝请劳合·乔治发言,曾经费了不少气力。只是第二天张伯伦接受了反对党的挑战之后,他才决意发言。他不能有多少时间准备;但是他的发言却是多年来他所发表的最为动人的一篇。这也差不多是他的最后一篇了。

在黄昏时刻,我在吸烟室看见丘吉尔。他向我招手示意,我走过去同他攀谈。我祝愿他吉星高照,但是补充说,希望他的发言不要太让人心悦诚服。他问道,“为什么不要?”我回答说,“因为我们必须有一位新首相,这位新首相是非你不可的。”他粗声粗气地答称,他已经为这次航海签了字,并且要死守在船上。但是我不认为他是恼怒我了。

下午9时,在楼上的一个委员会会议室里举行了重要会议。保守党批评派在艾默里的主持下开会。我们听说,在赫伯特·威廉斯领导下包括三、四十名议员的另一个小组,鉴于政府有改组之议,已经决定不表态。但是我们却一致同意投票——而且投这项动议的反对票。所以大势已定。现在我们所应该作的就是听命于丘吉尔,并愿上帝保佑他不致蒙不白之冤。

他的发言几乎完全局限于挪威战役的事实经过。他的话曾多次被打断,但并未因此而语无伦次,实则我想他是欢迎这种举动

<sup>①</sup> 艾默里,前引书,第367页。

的。但是对于他来说，除忠实执行自己的职责外，别无作为。他不图辩解，而只满足于说明真相。到这时，事情已经清清楚楚，所有那些海、陆战役都是由于我国的空军劣势而大吃其亏的。但无论如何没有人能因此而责备丘吉尔，因为他早在大战之前，不论适时或不适时都为重整空军军备而大声疾呼过。

他以一项要求团结的呼吁结束他的发言。他说，对于这个领导战争的政府不予信任，采取这样一个重大的决议，实非其时： 75

且息战前的党争；且忘私人的嫌怨；让我们切记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深仇大恨。

这些话的确表达了他在当时和整个战争期间最深厚的思想感情。

这次分组表决是我所知道的最紧张的一次。自从1886年在爱尔兰自治法案二读会上的分组表决以来，还没有任何一次堪与比拟。但那一次是国内危机。现在安危所系的却是不列颠和帝国的整个前途。当督导员偕同戴维·马杰森从右边走进来的时候，他知道政府已经获胜。但是以多少票获胜呢？主任督导员以单调的声音宣读了数字。赞成的二百八十一票，反对的二百票。下院犹豫不决了——因为通常的多数是二百四十票以上，现在则只是八十多一点。反对党高呼“辞职！”；政府的忠实支持者茫然坐着，虽然他们在首相离场时掀起了一片欢呼。“约希”·韦奇伍德（一位倔强的、虽则多少有点古怪的工党议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以英勇作战著称）唱起了“大英统治”曲。我试图随声附和。但是因为两人没有一个擅长歌唱的，所以不是十分出色。

随着暮色渐浓，议员齐集在吸烟室里，张伯伦已被说服继续留任的消息传来传去。实则我立刻就听说这是丘吉尔的劝告。但是第二天数字分析出来了。投政府反对票的保守党员有四十三人。不参加投票或未约定弃权而不出席的在八十人以上。这时再清楚

不过的是，只有一个真正举国一致拥护的新政府的新首脑方能适应国家的需要。

在大辩论（5月9日）的后一天，事态进展很快。在清晨下院重新集会之前，全党小组开会，由克莱门特·戴维斯担任主席。有很多新的拥护者出席。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赞成成立  
76 一个包括所有三个政党在内的新政府。下午，曾经投政府反对票的那些保守党议员在艾默里的主持下开会。主席试图把讨论限制在原则方面而避开人事不谈。但是要阻止我们当中一些人不发表自己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看法是不可能的。我直言不讳地坚决反对哈利法克斯进行游说想当下任首相，而赞成丘吉尔。当天早一些时候我在索尔兹伯里勋爵主持的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曾经提出过同样的主张。自然，督导员和首相对于这一切经过都是一清二楚的。实际上艾默里小组曾向报界发表过一项声明，公布了这样一个总的看法——我们愿支持一个在得到最大支持的领袖领导下按功绩选出的真正举国一致的政府。

谣言甚嚣尘上。有的说张伯伦将留任；另一些声言哈利法克斯将接充。还有一些则认为丘吉尔当仁不让，无人可与之争锋。据说工党领袖倾向于哈利法克斯。丘吉尔长期而积极的政治生涯给他带来了忠实的朋友，也带来了不少敌人。哈利法克斯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人物。张伯伦毫无疑问是欢喜哈利法克斯的。但是决定性会议（虽则我不知道）就在那天下午举行。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的传记作者曾作了详尽的记述，虽则丘吉尔暗示会议举行于5月10日晨，但无可怀疑，会议是在9日下午举行的。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丘吉尔在内阁会议室开会。当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之后，丘吉尔的缄默——在他是少见的，照该传记作者的说法——解决了问题。无论如何，这时在欧洲即将展开的这场大戏已明显地必然以丘吉尔的胜利而告终。如果在9日那一天哈利法克斯还不

怎么清楚的话,那么第二天他一定了解到,尽管他有那么多长处,但是要驾驭这时即将以飓风般力量刮起来的风暴,他却非其人。

我记得在5月9日深夜遇见了布伦丹·布雷肯。他虽守口如瓶,但是看上去仿佛喜形于色,并且说保证我也会高兴。第二天(5月10日)传来了希特勒入侵荷兰和比利时的惊人消息。张伯伦最初的反应是,留掌国政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一定要避免政府更迭的一切混乱。但是他立刻为人所劝阻。清晨过后,显而非组织一个举国一致的政府不可了,而且只能在一位新首相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艾德礼和阿瑟·格林伍德劝请他们的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参加政府的决议,然后再由工党在全体会议上予以批准。他们赞成哈利法克斯,但是丘吉尔也未始不可接受。当天下午6时,丘吉尔晋謁英王,接受了他的委任。于是他肩负此重任后来历经五个峥嵘岁月。

继两天辩论和第三天各式各样私人讨论和会议扰人心绪之后,又是5月10日清晨那项轰传于世的重大消息,我们真是精疲力尽了,除等待之外,再不能有什么作为。下院已经休会,但是各俱乐部都处处人满。我尽我力所能及作自己份内的工作,但是心潮起伏,很难保持平静;何况布伦丹·布雷肯还时常打电话给我。10日清晨他为张伯伦试图恋栈而大为光火,“这简直象是一具死抓住印把子不放的僵尸。”他这样说,话虽含有隐喻,却丝毫不能掩盖他的愤怒之情。但这只是一瞬息间的挫折。我们终于有了丘吉尔。

这里还有最后一道难关。丘吉尔由于他特有的那种宽宏大量,曾就下院领袖和财政大臣的职位就商于张伯伦。无疑他也希望能确保获得保守党的支持,而保守党还有不少忠于张伯伦但由于他的倒台而迟疑观望的人。可是工党领袖听到了5月10日夜间接张伯伦在他的临别广播中宣布的这项任命,殊不同意。丘吉尔



遭到了很大的压力，一次严重的危机似将不免。不幸，为了急于组阁或是其他原因，丘吉尔没有把他打算挽留张伯伦担任这些高级职位和作为战时内阁成员的决定告诉他的工党新同僚。

我们的保守党集团也同样恼火。最后，索尔兹伯里勋爵出面调停，劝丘吉尔改变他的计划。经商定，以张伯伦改任枢密院院长而不任财政大臣，仍留在战时内阁之中。丘吉尔将亲自领导下院，而以艾德礼作为他的副手。

78 这样就开始组织新政府。重要大臣的名单于5月11日公布，其余则在此后几天之内公布。这的确证明是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自右翼的多罗布兰的劳埃德勋爵直到左翼的埃伦·威尔金森女士（“红埃伦”）。战争结束时他给在这五年间任何一段时期曾在他领导下服务的所有同僚颁发纪念章，在纪念章上有他称之为“大联合”的字样。这种说法的确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往后的一两天内，新首相派人来找我，表示要在这个光荣的班子里给我一个职位。要我去供应部担任新大臣赫伯特·莫里森的政务次官。这是否中我的意呢？实际上正中我的意；因此就这样决定了。

经过大约十六年之后，后座议席处于一种无忧无虑有时败事有余的不负责任的局面，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告一结束了。直到二十四年之后，我才离开下院，而在这二十四年之中，除最后两三个月，或在职，或厕身于反对党前座议席。四十年也足够了。

## 第五章 举国武装

79

正当丘吉尔组织政府之际，德国的汹涌狂涛通过低地各国<sup>①</sup>滚滚冲入法国北部。不到两、三个星期的工夫，英法两国军队就被切断了，并且被迫后退。虽则，靠了看上去几乎是一次奇迹的行动，英国远征军（总共在三十万人以上）的大部分跨过敦刻尔克海滩，撤回本土，得以作为核心形成一支新部队，重新投入战斗，而实际上他们的全部装备已损失尽净。到6月中旬，法国军队已面临败溃，没有出这个月就被迫接受了城下之盟，比之1870年的那一次甚至更加完全彻底，更加屈辱备至。团结一致声援法国的英国和英帝国所属各国，这样就面对这时有着法西斯意大利伙同一气的一个高唱凯歌的纳粹德国了。意大利以其特有的精明审慎，只是在墨索里尼认为战斗即将成为过去的时候方始参战。英国和英帝国孑然孤立达一年以上。在1940年8月和9月间，在我们岛国上空展开了争夺制空权之战。皇家空军靠了技巧和忠诚予以击退之后，纳粹推迟了他们入侵不列颠的计划。对英国城市和港口狂轰滥炸接踵而来，历经秋冬两季直到1941年初夏，激烈的程度一直有增无已。在海上，皇家海军刚刚开始慢慢地控制住大有切断我们生命线之虞的德国潜水艇的第一次袭击，又面临了1942—1943年冬春两季卷土重来的新猛攻，这就是大西洋之战。

既然几乎整个欧洲都落入希特勒的魔掌，英国军队作战的场所只有非洲一隅了。1940年年底和1941年年初，韦维尔将军在这个战场上靠了从陷于围困和威胁之下的英国大胆赶送坦克的增

<sup>①</sup> 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译者

80 援，才得以将意大利军队逐退。这些胜利以及我们在塔兰托湾和  
马塔潘角对意大利的海军大捷，在一个艰难的冬季给了我一线希  
望。美国表明了像一代以前曾经下过的那种同样的决心，希望置  
身于战争之外，但把对我国战争物质进口的法律限制加以放宽或  
听之任之。由于我们的资金开始耗竭，物资进口变得越来越无望  
了，这种情况一直到1941年春由于有了“租借法案”才有所好转。  
在整个这段期间，俄国仍然一直给德国运送军火和物资。1940年  
10月间，意大利进犯希腊。希腊军队进行了十分英勇的抵抗，以  
致在1941年4月间希特勒终于不得不分兵援助他的同伙墨索里  
尼。英国军队不辞艰险，奉派前去帮助希腊人。但是他们招架不  
住德国的压力，而不得不先从大陆，最后在6月初从克里特岛撤  
退。在这些场激烈的战争中，双方都损失惨重。

大约同时，英国在西部沙漠的一次攻势也告失败。于是德军  
在隆美尔的指挥下，以装甲部队和来自非洲和西西里基地的空军  
为支援，重新发动猛攻。韦维尔将军已经由奥琴勒克将军所接替。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俄国发动空袭。丘吉尔以摧毁纳粹主  
义为唯一宗旨，立即宣布我们必须给予苏联一切可能的援助。这  
样，在一年的孤立之后，英国终于有了一个盟国。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同时他们  
进袭马来亚。两个月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大约八万五千名军  
队在新加坡被迫投降。日本暂时夺取并掌握了太平洋的霸权。德  
国对美宣战。这样，自1942年初起，我们就知道局势已定了。但  
不管战斗进行多么久，多么激烈，英帝国、俄国和美国的资源终必  
战胜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美国卷入的后果要显示出来，是需要时日的。同时北非的战  
局又再度转为对我们不利。六个月后由于奥琴勒克在1941年年  
底所发动的攻势取得部分成功，局势起了一些变化。1942年6月

间,托布鲁克连同大约三万五千名英国和英帝国军队,竞步新加坡<sup>81</sup>的后尘。到7月间,隆美尔已进抵埃及国门。墨索里尼怀着轴心国必胜的信心,到了非洲,带着一匹雪白的战马,准备在开罗举行入城式之用。

这些事态发展无异是我们倒霉透顶的标志,对我们的士气是个最严峻的考验。在第一年我们孤军作战的时候,我们曾经靠了一种兴奋感和精神上的狂热而得到支持。那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时刻。但是月复一月地迁延下去,甚至在俄、美参战之后,看上去我们还是事事不顺手。要抵得住一定程度的“惊慌失望”,确是需要有坚强的意志。然而,不到两、三个月的时间,局势就幡然改观。隆美尔的前进在阿拉曼第一个战役就受挫了。在1942年10月间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亚历山大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赢得了显著的胜利。他们的军队立刻尾追敌军,节节西移。正如丘吉尔所记载,这已成为否极泰来的标志。几乎可以说,“在阿拉曼以前我们从没有过一次胜利,在阿拉曼以后我们从没有过一次败绩。”

在地中海的西端,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的一支英美部队于1942年11月8日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缓缓地但万无一失地向前挺进,以期同由西而东推进的英军会师。

所以到1942年年底,第一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希特勒没有能征服俄国。英国的战时生产,经过初期的一切困难之后,已经在组织和产量方面达到了最高的效率。美国的雄厚资源终于利用到这个事业上面来。钳子开始收拢了。虽则最后一击还需要再等将近两年半以上的时间,但是结局已无可再怀疑了。

我正是以这种惊天动地的事态发展为背景作为丘吉尔大联合政府中的一个次官,作为我国历史上向所运行的最强有力的政府机器中的一个小小钝齿,生活和工作了两年半之久。在这段时日的大部分期间——总共二十个月左右——我一直服务于供应部,



该部尽管工作种类繁多，但就某种意义来讲却是武器生产庞大机构的中枢和核心。

在供应部，我先后同三位大臣共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经历，  
82 因为他们三人的出身极不相同，品质迥异。第一位是赫伯特·莫里森，第二位是安德鲁·邓肯爵士，第三位是比弗布鲁克勋爵。他们对我都是真诚相待。但是我常说，他们讲话一位是伦敦音，另一位是低地苏格兰调，第三位是加拿大腔，我从未听到其中的一位大臣讲过一个字是正确的英国音。他们的工作习惯也是很特别的。莫里森上班不太早，但一直工作到相当晚的时候。邓肯很早到部，但是在合理的时候下班。比弗布鲁克则二十四小时都工作——但是大体上是比较欢喜在夜间工作的。莫里森和邓肯是他们所出身的那种家庭的典型。比弗布鲁克的情况则很独特，与众不同。

莫里森具有伦敦人的一切特性。他性格坚强、想像力丰富、精神活力大。对于新职范围之广，开始似乎有一点茫茫然，不知所措。正如他自己说的，“供应部这个职位简直令人不敢问津。”<sup>①</sup>这个职位也确实不大适合于他的特性或经历。我怀疑他是否真正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因为他对于业务、生产或劳工管理毫无实际知识。然而，他精神饱满、勇气十足地开始了他的工作。作为一个行政官，莫里森是勤勤恳恳、虚怀若谷的。加之，他为人光明正大，因而为他的属员所信赖。他在他的短短任期内所作的主要贡献，是延聘乔治·盖特尔爵士来协助原常务次官阿瑟·鲁宾逊爵士。鲁宾逊爵士是白厅的伟人之一，但这时已经年老力衰。凡负责主要生产部门的官员，他无不给以忠实支持。但是他实在力有不逮，因而并非不愿意调动一下职务。

---

<sup>①</sup> 兰贝思的莫里森勋爵：《赫伯特·莫里森自传》(Lord Morrison of Lambeth, Herbert Morrison: An Autobiography)(伦敦,1960年版),第178页。

莫里森在宣传艺术方面给我上了第一堂课，这对我来说是十分新颖的。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最重要的一个人似乎就是那位公共关系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我们的公共关系官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叫作塞缪尔·莱斯利，在伦敦郡议会就是莫里森的左右手，一直跟着他从一个职位调到另一个职位。我竭尽全力支持他为保持我部大臣的主导地位所作的种种努力，因为他遭到了以强有力的劳工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为一方，以新成立的飞机生产部的那位多少带点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首脑比弗布鲁克为另一方之间的大量炮火的夹攻。我记得在就职的最初几天中曾偕同这位大臣去出席在邻近戏院匆匆召集的一个大型记者招待会，莫里森向他们发表了一篇令人叹服的演讲，其中充满了鼓励和热诚。也正是在这次招待会上他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口号——“迎上前去”。后来跟着就是它的下半句——“坚持到底”。（好讲俏皮话的人后来说，我部的一个更加适当的格言也许是“逃之夭夭”。）他并没有给听众任何很具体的东西，却留给他们一个办事急切和意志坚决的印象，但这却是不无裨益的。

在1940年10月初，随着内维尔·张伯伦因病重辞职，丘吉尔在他的内阁中作了一些重要调动。其中包括我部大臣赫伯特·莫里森由供应部转任现在改为国内安全部的内政部这一调动在内。以他的才能和经验而论，对于这个职位显然是人地相宜的。他对于伦敦的知识，像萨缪尔·韦勒一样，是“既博又专”。他由于在伦敦郡议会服务有年，所以对于这个大城市的人民和制度了如指掌，他是以在这个城市土生土长引以为荣的。他的行政才能在他的新职务中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他建立了国民救火会；组织了空袭灯火管制警戒员；采用了新式防空壕。靠了这些以及类似的方法，对于保持民气作出了不少贡献。赫伯特·莫里森是一个很可亲近的上司，我们越来越彼此喜爱。后来，这种情感并未因政治上的争

论而有所减弱或误解。当他在下院的一番长期卓越经历告一结束而转入气氛比较安宁的上院时，我能起一些媒介作用，这是我深感快慰的。

莫里森是由一位脾气迥然不同的安德鲁·邓肯爵士来继任的。邓肯是一位典型的低地苏格兰人——谨慎、勤勉、井井有条，虽缺乏想象力，但讲求实效。我将同他共事到第二年6月间，并且84 越来越钦佩他的精于判断和对细节的掌握。他不是一个容易亲近的人，但一贯是具有同情心的，体谅人的。虽然他给部里带来了健全的组织经验，但是他却完全没有他的后任比弗布鲁克的那种见机行事和勇于进取的天赋。邓肯已不再是一个下院议员，但是他很快就清楚了解下院的气氛。他不惮其烦地去会见议员，倾听他们的不满之言。这样，纵使 he 不能总是满足他们的要求，却至少给了他们一个充分征求他们意见的感觉。在他主持供应部部务的后期，供应部受到的批评火力越来越强，什么意见都有。虽然有很多是文不对题的，但是有一些，尤其是对我们坦克生产未能满足部队需要的那些，并非全然无道理的。

在1941年6月间，邓肯调任贸易部，这一调动在部内引起了一定的诧异和很大的遗憾，因为他在整个这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中，一直勇于为我们辩护，并且是一位谦恭有礼、容易共事的上司。当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的确感到难过。他在我的工作上给了我很多自由活动的余地和慷慨的帮助。他深为他的知己所热爱；但是对于不那么熟悉他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有点难以接近的人物。他在一生之中，担任过很多重要工作，无不圆满完成。他未能长寿是国家的巨大不幸，因为他无时不准备为需要他的地方服务，为自己认为能作出有价值工作的地方效劳。

当我们听说他将由“比弗”继任，部里面情绪波动很大。直到大战开始，除在1930年有些接触外，我和比弗布鲁克勋爵几乎是

不相识的，<sup>①</sup>由于这次认识只是一面之交，所以始终没有发展。在此后七个月我将是他的政务次官，是他在下院唯一的代表，并且同他最重要的任务密相关联。比弗布鲁克的任命确实引起部内重要官员的焦虑和担心。然而在焦虑和担心之余还兼有一点暗自高兴的兴奋心情，甚至因祸得福的欣慰之感。我们曾经那样长久地苦于——或至少抱怨——飞机生产部在他的领导下对我们进行的攻击，以致这一调动似乎是命运之轮殊可庆幸地转过来了，倒让我们可以因他那种独立不羁、不落窠臼的方法而大受其益了。 85

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具有典型性的。他非常厌恶我们所占用的那些办公处所，因为人多，搞得伦敦到处皆是。我们的建筑物虽新，里面却阴暗无光。我们隔壁就是“纳波思的葡萄园”，谢尔—梅克斯大厦，设备既现代化而又一应俱全，凡是供大臣和我们自己享乐之所需，无不应有尽有，包括可以让比弗布鲁克纵情享受他所喜爱的日光浴的一个阳台。这座大厦的一部分原是钢铁管制委员会占用的，经过一番短暂而激烈的交涉之后，决定让他们留在那里，说得更恰当些，把他们赶到底层中去。而其余部分我们很快就加以盘据、巩固和保卫。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原先所占用的各部分。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毫不留情的办法弄到手的，如果说我们并不赞同，至少也博得大家的钦佩。然后大臣的私人班底和个人支持者开始蜂拥而入。著名的工业家们被介绍进来，其中有一些是在这位大臣先前主管的部里为他效过劳的，大有一种门庭若市、群情振奋以至一片忙乱之感。

关于比弗布鲁克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和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生活，已有不少记述。在涉及他那段漫长的、活跃的和不可思议的政治生涯的年月的几乎每一部回忆录和历史书中，他当然都占有他的地位。我本能地认为，像他这样一个人，要以一定的超然态度来

<sup>①</sup> 本书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第 256 页。



看待,方为明智,因为他的性格有某些方面是我认为讨人厌恶的。他有一点有仇必报的味道,甚至有点残忍。但是他也同样能够分外仁慈,而且他的仁慈行为往往是对他既得不到丝毫个人利益也决不会给他以任何形式报答的人们的。他的魅力,只要他愿意施展的话,就几乎是不可抵抗的。我想,人人都有自己的道德修养,有善有恶。然而,老实说,我们大多数人的本性都多少有点善恶难分。比弗布鲁克有时几乎看上去是双重人格。有些人只看到他的恶,另一些人只看到他的善。无论如何在他担任我们上司时,他的声名就是这样的。

86 要以一个不担任政府职务的议员的地位换成一个大臣、甚至次官的地位,就非有一番心理上的巨大调整不可。作为一个后座议员,可以对广宽领域的每一方面事态和发展冷眼旁观,在俱乐部和议会休息室里和朋友一起闲谈,而不承担任何具体责任,但是一个低级大臣,特别是一个具有高度技术性部门的大臣,会突然发现自己割断了一切正常的爱好,而简直来不及弄清楚局势的发展,却把精力全集中于逐日分配给他的琐细工作之上。自然,在战时则更加是如此;因为我们不久就要开始实行这样一种制度了,在这种制度下,办公时间之长几乎难以忍受,而且既无假日,又几无社交可言。当然,一个阁员会接到一些官方电报和备忘录,不管在不在战时内阁中,在这个期间,总会勉强得知一些战事的进展和国外发生的大事。但是一个低级大臣,除与各该部有关的事宜以外,是看不到这些东西的。我发现我自己随着时日推移,越来越埋头于自己的繁冗工作中,同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少了。

因此我们这些低级大臣如有机会出席议会,借以会见朋友,交换一下消息,自是欢迎不置的。但是,除去难得的机会外——比如,在丘吉尔发表一篇重要演讲时——我很少出席。下院提出的很多议会质询案是由大臣答复的。只是在1941年6月间比弗布

鲁克继邓肯主持供应部之后，这项任务才全落在我身上。但是有时我代表我的上司出席部际委员会，使我可以跳出这个部的狭窄圈子，得到一种愉快的调剂。我奉派去参加的第一次这种会议，至今仍历历在目。我们对于议事日程并不太感兴趣，但是我对自己的发言却是仔细推敲的。我渴望把事情作好，并且把我的担心对我们的政务次官威廉·帕尔默爵士加以说明。他给我的令人钦佩的劝告，使我一直铭记不忘。“任何事不要谈细节，”他这样忠告说，“否则你会把讨论引到枝节问题上去。”要言不烦，一语破的。

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去学习处理部务的方法——即掌握我们试图要处理的一切公务的全貌并用我们曾经用过的<sup>87</sup>手段解决复杂问题。供应部只是经过长期政治斗争之后方始成立的。鼓吹成立这个部的运动开始于1936年以丘吉尔为主要角色之一的大辩论中。直到三年之后，经过多次踌躇，政府方始屈从。在1939年4月底姑息政策终于破产之后，才采取了必要的立法。由于这番长期的耽延，第一任大臣——莱斯利·伯金爵士——直到7月才选定，这个新机构则直到战争爆发的前几个星期方组织起来。所以在“黎明之战”告一结束和希特勒对西欧发动突袭之前，这个部简直还来不及在它的新形式中把一切布置就绪。

这个部的结构和职掌一直是建筑在实用主义的考虑而不是建筑在任何合理的或有系统的计划基础上。海军部本身的大部分生产继续由该部直接管理。空军部和后来的飞机生产部则负责飞机生产。所以，供应部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军需部一样，只作为一个生产经理机构，并一直关心武器制造的主要项目，主要负责陆军方面的需要。但是，所有三个军种某些最重要类型的武器和弹药，也由我们负责供应。其中有高射炮、各种口径的自动火炮和步枪。撇开火炮不谈，为空军生产的轻武器弹药就包含有大量极其复杂的各种特殊类型，并且是一个经常焦虑的根源。但是，尽管有这些

军种之间的需要,概括说来,我们的主要顾主却是陆军,所以这个部也正是建立在陆军部各个部门和各种传统的基础之上。

虽然,海军除皇家造船厂外,早已同一些专门企业建立了长久的关系,空军的军需也已由于战前作为空军大臣的斯温顿勋爵的远见卓识以“影子工厂”预为之计,但是陆军却直到最近还是重  
88 整军备哑剧中的灰姑娘<sup>①</sup>。在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再也掩饰不住之后,才以一种惊人的、实则很不现实的速度,扩大陆军的规模,因而也扩大了它的需要。1939年3月间,陆军计划扩为六个正规师,其中有两个将是装甲师,另有国防军十三个师。4月间,经决定将国防军增加一倍,总共三十二个师。9月间,战争刚刚爆发之后,内阁同意将增至五十五个师。不管招募和训练新兵需要多久时间,必须以所可利用的资源按这种规模供应现代武器,的确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可凭以建立的牢固基础。因为近年来,陆军和军需生产的规模都早已降到了非常之低的程度。3月的估计兵员——十九个师——就几乎认为不可能完成,更何况五十五个师呢?

由于很多原因——一部分是因为武器由私方制造,在两次大战之间这段期间深为许多政界人士所头痛——陆军方面相当一部分军需,至少精密武器,是由两个主要来源供应的。第一是皇家兵工厂,第二是以维克斯厂、伯明翰轻武器工厂、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和其他两、三家为主的一批公司。与海军部不同,海军部已经把主力舰的建造集中于私人造船厂,而将海军部造船厂供作小船、修理和研究工作之用。除开寥寥可数的这几个以外,在英国实际上没有一家公司具有生产整套武器的经验。所以供应部的机构不能不适应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皇家兵工厂,由于它们发展到了惊人的

---

<sup>①</sup> 童话中的人物,被继母驱使,日与煤渣为伴的美丽姑娘;后忽得仙姑的帮助,成为王子的爱人。——译者

规模,其分支部分大部分只得靠私人企业去经营,尤其是在填料工厂方面。但是在整个生产比例上,它们仍然担负着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在生产的高峰时期也不例外。到战争结束时,皇家兵工厂已有四十三所,拥有工人三十万以上——占供应部合同雇用工人估计总数的百分之二十。<sup>①</sup>此外,自1940年以来,代营工厂已开始奠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同样基础,凡是厂房、设备和机器都由政府供应,而在付给手续费的基础上,委托私营公司经营管理。到 89 1945年3月,这种办法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sup>②</sup>大大小小口径火炮的生产仅占全部生产的一小部分。在维克斯厂和帝国化学工业公司之外,不少私营企业(其中有一些是有悠久历史的)握有炸药和轻武器军需生产的大量合同。

但是,总的说来,问题所在,是近月来摆在供应部面前的需求原已大幅度增加,而由于法国方面的损失供应不久又要激增,那么以现有的资源或以迄今所订合同的范围,如何方能加以应付。问题比过去劳合·乔治所不能不面临的甚至要更加困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期攻坚战期间,所需要的是以大炮,尤其是以炮弹为主。这些东西毕竟是以大规模生产的方法大量生产的。现在随着越来越把科学用之于日新月异的技术需要,我们就不能不供应愈益多样化的高度复杂的武器。办法只有一个,必须扩大已经掌握或能学会承担这些项目生产的承包商的名单。对于筹划并监督为精密武器的成品制造部件和组装的分包商和间接分包商的巨大发展,也同样重要。现在对于生产能力的发掘、工具的改造、劳力的征集和训练以及对工人的照顾和舒适条件所作的新安排,都已经开始了。

---

<sup>①</sup> M. M. 波斯坦:《英国的战时生产》(British War Production)(伦敦,1952年版),第422页。

<sup>②</sup> 当时供应部已有一百五十九个代营工厂,飞机生产部有八十七个,海军部有十九个。同上书,第434页。



这时我们部内的各大生产部门都置于总监哈罗德·布朗爵士的广泛监督之下。这是一位才能出众的人。他先是以海军总工程师的名义奉命从海军部调到陆军部服务，并早在1936年就接受了军需生产总监的职位。在1939年供应部成立时，他继续留该部供  
90 职。他在历任大臣的领导下执行他的职务，总是兴致勃勃，笑容满面，从不慌张，既讲求效率又富有魅力，所以深为同仁所喜爱，也为大家所信赖。作为一个工程海军将领，他具有丰富的专门知识和经验，我们所有的主要承包商几乎都和他本人相识。随着时日推移，他的地位由于和他平行或隶属于他的其他各部门的先后建立而益形加强，而他的影响自始至终都是深入人心的。谨慎、谦恭、温良、沉着的哈罗德·布朗爵士，不久就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直到现在。

这时部内最能左右一切的人物也许就是那位韦尔勋爵。他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无与伦比的经验，并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奉委协助重整军备方案。他本身主管的部门虽属重要，对所承担的任务也从来没有贻误过，但毕竟是有限的。他肩负着整个炸药计划，不论是公家生产的还是私方生产的，统统在他掌握之中。就某种意义而言，他是部中的耆宿。对任何有关组织或政策的问题，他总是随时协商，并且总是以他那种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但明确果断的态度提出他的看法。除了对苏格兰人生性地有所偏袒外，他研究任何问题都是抱一种不存成见的客观态度。

然后就是有关各式各样“储存”的主管部门，在这方面问题比较简单，但也有它本身的困难。弗雷德里克·马斯爵士以得心应手的效力管理这些储存，以致不久就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粮食大臣，而象伍尔顿勋爵那样闻名全国并为国人所信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新兵有好几个星期领不到制服，以致在心理上起了破坏作用，这种麻烦，在他的指导下，至少可以不至于发生了。这就是

我和他初次相逢而后来成为我的亲近朋友和同僚的那个人。

要想把这一团乱丝理出一个头绪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委托给沃尔特·莱顿勋爵的那种职能。作为统计处即后来计划处的处长，他的职责是逐周审查生产报表，并将主要的落后方面在我们的周会上提请各部门主管和大臣注意。他对这项工作，早已具有无人比拟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始终服务于军需部，在该部赢得了巨大的应得的荣誉。首相有他自己的统计机构，由 91 林德曼教授即后来的彻韦尔勋爵主持其事，他不但对我们的数字详加核对，而且加以不留情面的分析。许多争论、许多苦恼、和有时许多互相责备，随之而来。沃尔特·莱顿，尽管他表面上胆小怕事，尽管易于为“教授的”偶尔的夸张战术所压服，却常常能坚持己见。我通常代表我部大臣出席唐宁街的这些会议，因此有幸在每次会议结束时获得丘吉尔的片刻交谈和款待。

除所负的这些直接生产责任外，供应部还必须代表一切军、民生产部门处理除劳工和粮食以外的一切主要生产手段的供应和管制，其中包括工厂场地、机器工具和原料，无论是进口的还是本国生产的。这些种类极其不同的各式各样“管制”是尽可能由公务人员和暂时招募来的具有专门经验的商人共同执行的。在两次战争之间，我用了不少时间促进<sup>①</sup>一种工业合作制度，凡是这种制度已经有了发展的地方，战争一开始就有了一个现成的机构随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这项工作。钢铁管制委员会也许是最先进的一个；但是对于其他各种原料——非铁金属、木材、纸张和其他种种——也已设计了一个机构，当时只以差强人意的效率进行工作。铝和我们现有的一切铁矾土的来源，都由于希特勒对西欧和北欧的占领而已经丧失殆尽。这项管制为了明显的理由是交由飞机生产部负责的。但是其他一切则都由我部主管。

<sup>①</sup> 本书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第 420 页。

我们的整个计划一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财政部虽然在其他方面宽大为怀，但是在原料必须从国外采购时，却自然是百般挑剔。向使用硬通货的国家进行采购，非经特准不可，甚至在租借法案和美国参战之后，这项困难还依然存在。进口计划由于各种不同<sup>92</sup>的和更带威胁性的原因而产生的波动，使我们同样头痛。随着潜艇战的起伏，进口计划时而扩大，时而削减。在最不幸的时刻，我们对于无论是自己用的原料还是对其他部门负责的原料，都不得不接受出乎意外的和具有破坏作用的削减。

在整个这段期间，我们望眼欲穿地期待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援助。恰恰在法国崩溃之前的两、三个星期，法国政府在美国订定的为数至巨的原料和军火合同的前途问题，已开始在白厅讨论。因为这些合同主要影响到我们这一部，所以莫里森要求我代他掌握。在随后几天，为如何把这些重要项目转到英国帐上，制订了一项计划。这是我会见琼·蒙内特的第一个机会。在战争稍后阶段他来到阿尔及尔时，我常常和他见面。蒙内特早已是一个全心全意的“欧洲人”，并且历来证明是欧洲概念最得力的讲解员之一。他一直是英国的一个忠实朋友。

一些范围更广的美国供应问题不久就开始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战争的开头几个月，供应部曾经在所谓“现金交易、运货自理”的基础上向美国订购了大量战争物资。在战争爆发之前，中立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对任何交战国的武器装运实行禁运。一个听起来在原则上不偏不倚的禁运，实际上在应用时决不会是公正不阿的。这一点在1935年对阿比西尼亚的武器禁运上已经得到了证明。<sup>①</sup>因为侵略者已经有了充分准备，而侵略的受害者却常常处于赤手空拳的状态，何况禁运的严格执行，势必使英国的制海权归于无效。这项禁令终于在1939年11月底取消，准予在严格的现金交

<sup>①</sup> 本书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第420页。



易基础上购买军需品。但是“现金交易、运货自理”的原则却毫无通融余地；到1940年秋季，情况越来越清楚，我们的美元储备对于所受的压力不久就要顶不住了。迄当时为止，凡我们收到的东西，<sup>93</sup> 贷款都已付清。但是眼前还有大量贷款有待支付，而且我们还要发出更多的订单。我们已经支付的或必须支付的现金在四十五亿美元以上，我们手上却只剩下二十亿美元，而且大部分是投资，其中有一些是畅销的，另一些则只能以等于白送的价格出售。<sup>①</sup>

在这种严重威胁到我们对德作战能力的险境下，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谅解和同情挽救了危局。总统拟订了租借计划，并使这项计划终于能在1941年3月间在国会中通过。从这个时刻起我们才知道美元的短缺将不致妨碍我们的继续作战，即使是孤军作战。虽然在1941年我们订单上的几乎一切东西都须付现，但是根据新办法所订购的东西，将不用现金了。

丘吉尔正确地把租借法案称为“任何国家历史上最纯正的行为”。这项协定在我们部里无疑是备受欢迎的，因为它给我们开辟了一个供应的广阔新领域，又不需要同财政部争执不休。但是法案却还有我们当时几乎没有认识到的另一面。美国没有处于交战状态，所以总统仍不得不以严格的实施办法来为不付现金的货物供应作辩解。关于接受租借物资的资格，订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制度。就是具备了这种资格，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也还不能产生效果。事实上，1941年英国进口美国货的增长证明是几乎很小的。1941年整整一年，我们对我们所取得的大多数武器和军需品仍须付现，因为这都是旧办法下购买的。我们终于得到了我们需要的东西，有一些供应，象谢尔曼式坦克，是非常有价值的。然而我们为把世界从纳粹的暴政中拯救出来，终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

---

<sup>①</sup>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最光辉的时刻》（伦敦，1949年版），第493页。



的美元事实上已经枯竭，我们暂时不再是一个出口国了。我们牺牲了我们自己的前途来保卫文明的未来。

94 在搜求原料方面，我部的职责之一就是搜集各种废料。这是一项需要行政能力的工作，它大部分取决于能否鼓励地方当局采取行动，它需要对“公共关系”作巧妙的运用。起初我们集中力量于废金属。当时任飞机生产大臣的比弗布鲁克已经为他的飞机所需要的铝发出了紧急号召。供应部大臣为搜求各种废料也发出了一般呼吁，包括公私所有的铁栏杆在内。但我们主要依赖于废品商。随着月复一月时光的流逝，我们涉及到了范围极广的另一些原料，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纸张。但是在早期阶段，由于一时的热情，作了不少蠢事。数以百万计的具有爱国心的主妇把完好的厨房用具成批交出，其中含铝量肯定是很小的，价值也殊属可疑，但比弗布鲁克的呼吁是所向披靡的。同样，在我们的鼓励下，大批大批的铁栏杆和铁门从大大小小的房屋上取下来，匆忙地在当地成堆地堆积起来。后来引起了不少公愤，在议会询问案中反映出来，因为看上去这些垃圾堆永无缩小之日了。有时爱国心是带有偏见的。把鲍德温的铁门取去是一个听来逆耳的故事，但是从全部贡献出来的废品来看却是有真正重要性的。例如，单单在1940年一年，收回作为废品的电车轨就不下四十英里。曾经有一项协议，要把交通指挥灯撤除，作为废品处理。这项协议终于为一些有关当局所驳回，虽然莱斯利·霍尔一贝利沙在下院吵闹很凶，要执行这项建议仍有很大阻力。

我不久就懂得，废品，尤其是废金属，引起了极度复杂的专门问题。合用的废品必须有适当的高炉提炼，否则就会造成严重损害。有一位须髯皆白的耆绅，原是一位大专家和大废品生意的头头之一，他对我和一些官员详加指教。这确是一种耸人听闻的经验。例如，他以一个艺术批评家评论绘画的那种虔诚和知识，辨别

铁栏干的样式、含量和年代。

在比弗布鲁克来我部担任大臣时，他对于我们同国会纠缠不清的问题和举国沸腾的物议，深感头痛。各种形式的废品搜集原则上都是受到赞扬的，但是实际上却不得人心。有一天他对我说，“这是一件不划算的交易，绝对得不偿失，去把它卖给别人吧。”当时我已懂得他的话意，于是开始承办这个任务。我去到一位又一位大臣面前，对他们进行游说。“比弗布鲁克勋爵希望我对你说，他感到无力主持全国废品搜集这项极其复杂的工作。他相信您是唯一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作到功程圆满的人。不妨顺便提一下，他确信，丘吉尔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继他而担任首相的一定非您莫属。战后，您必定要起主导作用。您是一位鹤立鸡群的人物，他恳求您肩负他所不能胜任的这项国家的重任。”我按照这个路子试探了很多位大臣，并且几乎把这项业务推给其中的某几位了。但是不幸，他们都受到各自警惕性很高的常务次官的警告，而使这事功亏一篑。最后我去看工程大臣里思勋爵。自然，我同他太熟了，不好意思对他拿出我认为也许对别人合适的那套游说伎俩。我只能请求他接受这项任务，来对我们这个负担过重的部帮一个大忙。他慨然应允，这样我们才摆脱掉这项不胜其烦的工作。但是不到三、两月的工夫，这时和我在供应部同任次官的波特尔勋爵接掌了工程部。当时他对我的成功曾经是由衷欣赏的，但是后来他却认为我难以宽恕了。

在重要性上仅次于原料管制，但对于任何形式的生产都同样不可缺少的，这就是机械工具的管制。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为大家所信赖的出类拔萃的人物——甚至经过相当斗争之后，也得到飞机生产部的信赖了。这个人就是珀西·米尔斯。我第一次遇见他正是在这个时候，后来在很多事业中他都是我的一个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同僚。他把工业家和商人之中最精明强干的人延揽到他

手下供职。他把他的活动从大工具扩展到小工具，而小工具，无论是供作一般用途还是单独一个用途之用的，不久就都变得几乎象大工具一样紧张、一样缺货了。他逐渐发展了一套非常完善的<sup>96</sup>制度，以保证机械工具在全国得到适当的利用。我有幸在早期阶段对这个部门担负名义上的责任。没有一桩困难，我不得到他忠告或指教，严格讲来无论这是在他本人的职责范围以内或以外。

随着战争的演进，随着生产需求开始超过国家的生产能力，甚至就工厂的建筑和改造、工具的调集和采购、以及工人的招募和训练各方面而言，显而易见，要应付货币逐渐失去其重要性而价格规律不再起作用的这样一个世界中所产生的种种情况，也非有一种中央计划制度不可。政府越来越成为唯一的购买者，它不能不找出一个办法来限制它本身的需求。为应付这种情况的第一个尝试是用一种所谓“优先”制的办法。但是要严格实行这种制度，就会造成不合理的情况，因为凡是标明为第一类的每一种东西势必都要先生产出来，然后才可以生产第二、三、四类中的东西。一套有效的“分配”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因为很多公司与不止一个部订有合同，而有关各部训令之间的显然矛盾性质又愈益加剧，所以这种制度尤其有必要。成为战时内阁一部分的所谓国防供应委员会只是过问一些原则而又原则的事情，所以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它似乎是高高在上的。1940年5月间，成立了生产委员会，以便处理日常工作。这个委员会由三个生产大臣（海军部、供应部和飞机生产部）、贸易部大臣和劳动部大臣所组成，而以不管部大臣阿瑟·格林伍德为主席。但是它必须接着把概括的原则或空泛的愿望拟成为详细的命令，以便能以通过一套承上启下的机构下达给制造家或生产者。

因此生产委员会在下面附设了两个委员会，即原料分配委员

会和工业能力委员会。<sup>①</sup> 在供应部成立之前，一个粗略的分配方法已经拟订出来，至少在有关稀有原料方面。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这项工作从贸易部移交到供应部。随着其他压力的增加，它变得越来越重要。所有原料都成为稀有原料，而这一切都给日益短缺的硬通货以冲击。我们非但必须供应有关作战的各部门的需要，而且还要时时想到国内最低需要和出口这极其重要的两方面。这个机构是我的朋友兼同僚卢埃林上校加以发展和改善的。凡是要求分配的各部，都派代表出席由卢埃林上校担任主席的这个原料分配委员会，包括不重要的部门在内，代表有时多达二十人。卢埃林靠了他的常识和公平正直，不久就博得了普遍的尊敬，他的决定是很少被内阁或任何内阁委员会抵制的。

至于工业能力，也已经拟订了一个初步的办法。一项登记工作已经完成，尽可能把所有主要承包商和分配给每一个主要部门的总生产能力的百分比作了登记，一直到最近。例如，一个公司可能被认为已把它的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分配给海军部，百分之三十分配给供应部，另百分之二十分配给飞机生产部。虽然这种办法由一个受雇的小型专业班子巧妙地执行，但很快就无法应付日益增长的需求方面的压力。于是由我接替担任主席的那个工业能力委员会取而代之——或补其不足——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方法与原料委员会大同小异。但是，按这种比较消极的方法工作是不令人满意的，所以不久就设计一套新的办法，以便有效地利用我们的生产能力，并打破特别有破坏性的瓶颈。

在竞争的各部之间的分配工作，总要设法予以落实，而我们所掌握的工具大体上还不是不令人满意的。卢埃林和我按照同样的

---

<sup>①</sup> “工业能力委员会是生产委员会用以对供应组织作出它的最重要贡献之一的一个工具”。斯科特和理查德·休斯：《战时生产的行政工作》（The Administration of War Production）（伦敦，1955年版），第411页。



98 方法推动我们委员会的工作。这两个委员会在正式会议上对原料和生产能力进行正式分配,但有上诉权。我不记得在三、两个月之后有任何案件上诉到生产委员会或然后再到内阁。这部分是因为我另外借重于靠“老关系”作出的私人安排。碰巧我部的业务主管人哈罗德·布朗爵士、飞机生产部的查尔斯·克雷文爵士和海军的检查官布鲁斯·弗雷泽爵士,都是旧日的海军军官和同船战友。和他们有联系的是在海军部负责商船修理并公认为海军一员的詹姆斯·利戈爵士。这些人,如果争长论短,那早就会使全部生产努力付诸东流了,然而万幸的是,碰巧他们是亲密无间的老友,由最最牢固的关系,也就是海军的传统,维系在一起的。在整个白厅以“锅炉制造商”知名的这个集团每星期在老卡尔顿饭店餐聚。卢埃林和我相互轮流,每隔两个星期,在我们各自委员会开会的日子出席一次。在很多问题上面,这些军官和他们的代表在公开场合下未始不会有激烈争辩,但在私下却能以这种亲切的态度予以解决。随着他们越来越互相信任,他们能采取各种不同的特殊安排。例如,海军部也许正建筑一个双管自动高射炮厂,分配到了一大批机械工具,并且有一些正在发送之中。但是他们承认厂房至少要六个月方能完工,所以根据协议并凭由准定会在需要时把工具交还的这种信任,布鲁斯爵士就让查尔斯爵士或哈罗德爵士去使用这些至关重要的车床和切截机了。

午间聚餐的规矩是我们每个人轮流付帐。詹姆斯爵士是非常富有,非常慷慨的,但是象很多低地苏格兰人一样,对不必要的开支却抱批评态度。在轮到他付帐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最名贵的酒、最名贵的雪茄。詹姆斯爵士虽照数付帐,有时却难免面带苦笑。

不记得那些年月的人,要领会整个那段时期日常生活的强度和情绪的紧张是不容易的。在1940年5月和6月那几个星期中,

有一种敬畏感和振奋感支配了整个国家。起初，当我们读到布尔日之战(照我们当时所作的称呼)时，我们仍然希望德国装甲部队所造成的突破口可以堵住，可以形成一条牢固的防线并加以据守。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和斯皮尔斯将军在一个小型宴会上一起进餐，法国前总理莱昂·布吕姆也在座，他使我们对于进行成功抵抗的可能性感到十分乐观。但是随着一个个星期的流逝，点点滴滴传回来的消息却越来越糟。5月29日，我象政府任何级别的其他每一个成员一样，收到了首相的一件铅印通知，我已经把它珍藏很久。其内容如下：

#### 绝密

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如果政府中所有同僚以及高级官员能在各自范围内保持高度士气，不缩小事态的严重性，但是深信我们有能力，也有百折不回的决心，要继续作战到把敌人称霸欧洲的意愿粉碎而后已，本首相将不胜感激之至。

决不容许有这样一种思想，认为法国将独自缔和；但不管大陆上有什么变故发生，我们决不能对我们的责任有所怀疑，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捍卫本岛，捍卫帝国，捍卫我们的事业。

温斯顿·丘吉尔

但德国的进攻证明是所向披靡的。它不久就打垮并切断了盟国的部队。英国司令官和本国政府所面临的抉择是：要末通过英伦海峡所可利用的各口进行一个成败难卜的撤退，要末接受类似于全军覆没之类的一个结局。凡是没有经历过敦刻尔克那幕戏剧性事件发生后的那几个星期生活的人，谁也不能充分理解那时在国内的人们顷刻难释的焦虑心情或随着安全撤退的人数开始增加而产生的那种如释重负之感。我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以生命为孤注的近亲或密友。关于舳舻蔽海、船舶如流的种种报道唤起了英国人历史性海上霸权的整个自豪感，参加援救的包括皇家海军

100 和商船舰队的船舶一直到最小的游艇。当我终于听到几乎全部军队都成功地载运回国，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一次歼灭性的惨败已经变成一次类乎胜利的战果。但是正如丘吉尔所说，“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胜的，不管撤退多么成功，”而且从我部的利害观点来看，我们不胜惶恐地得悉，人虽救出，武器却已丧失尽净。实际上我们除为建立未来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的努力外，现在还要补充五个师的全部装备。

同时我们注定要目睹另一场惊人的和更加悲惨的角逐——法国之战。撇开日益绝望的战术形势不说，法国的民气和士气已经由于多少年来的领导无方而摧毁殆尽。丘吉尔和他的同僚毫未踌躇，为忠实履行他们的道义责任，把所能迅速集合的一切部队都派回大陆，再一次和他们的法国同志们一起在法国领土上进入他们的阵地。这在很多人看来一定是勇而无谋。我们所能作的贡献固然很小，而法国军队恢复元气的可能性则更微乎其微，因此在6月底我们不能不面临最后阶段出现的第二次撤退以及第二次生命和装备的损失。

6月21日星期一上午5、6点钟，我在伦敦的小小寓所里电话铃响了。这是值勤官员打来的电话。问我可以立刻到部里来吗？我一进我的办公室，就看到我的科学顾问高夫博士和另一、两位官员。和他们在一起的有一位形容憔悴的青年人，胡须未修，双目无神，身着一件又脏又旧的战壕雨衣和一条法兰绒长裤，但却显出一派斯文高贵的风度。我们握手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说明了他的来意。他被委托随身带来——确实放在外面的出租汽车上——一大批工业用钻石，约值四百万英镑。他也带来一种所谓重水的东西和几位法国科学家。当时我不懂什么是重水，但我慌张得没有来得及询问。可是还有话要听下去。“我有一批人，”他这样说，“随身带有更多的这类东西等待在波尔多附近的海岸上。”那批东

西里面,就我能看出的,包括更多的重水和一大批机械工具,还有更多的科学家。他又说,“里面有一幅大型地图。我让这些人在指定的地点。只要派一艘船过去,照我的安排打出闪光,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当然,整个这件事立刻就从我手里交出去了。大臣到了,也征询了海军部首席大臣的意见,一切安排都是在所谓最高层作出的。但是我却永远忘记不了那个最初的时刻以及我同这个既富有魅力而又举止奇特的怪人的那段谈话。后来我同他熟识起来。但这是我同一个真正伊丽莎白时代人物的初次相逢。 101

在1939年秋季,曾有过军人、农场主、科学家多种不同经历的萨福克勋爵,由于健康的原因没有能参军。他作为同巴黎军备部接洽的联络官在供应部供职。他立刻赢得了和他打交道的人们的信任,并且在法国临近崩溃之际,他能当机立断,敢作敢为。法国军备部部长拉乌尔·多特里是一个有气魄的人,只要能出力无不假以援手。凭着这位部长的介绍,萨福克开始了他的冒险活动。他知道在入侵之前已有大批工业用钻石从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运抵巴黎。存放这些东西的保险库所属银行的老板们似乎已经准备把它们丢在那里,任凭德国人掠夺。这完全不是萨福克的意思。凭着多特里的名片并靠了他自己的手枪和一些私人警卫员的支持,他居然搜集到大量工业用钻石,打算把它们运走。他还弄到了重水,这原来是在德国进攻以前从挪威运到法国的。他延揽了一批正和他在一起共事的科学家,在保证为他们移居英国作出安排的条件下(这主要是给以希望而并不能保证),说服他们来到波尔多。在到达这个港口时,他发现局势逐渐恶化,运输工具非常困难。他登上了一艘法国战舰,上面的军官在那个形势变化莫测的时期仍然是亲盟国的,因而从那里得到了一挺机枪和一批警卫人员。但弄到一艘船的可能性却非常渺茫。此后三天他一直都在码头上荡来荡去,希望能说服一位法国船长冒险一行。在第 102



四天他发见了一艘英国煤船，暗轮轮船“布鲁姆帕克号”，正扑扑地溯河口缓缓上驶，对当地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全无所知。船长和水手自然急于要尽快地离开，钻石和化学品都装上了煤船。刚刚运到波尔多的一大批美国机械工具也被夺来装上去，还有几位科学家也上了船。所有其余的宝贵财产和人员都集中在沿岸的一个地点上，并在这位智多星随身携带的比例很大的地图上仔细予以标明。他已经说服他的这一行人耽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当一艘英国船出现并按照他的指示发出闪光信号时，就可以把他们带去。事情也证明确是如此。派去了一艘英国驱逐舰，一切都照计划进行无误。

后来我出席了由莫里森主持的一个会议。萨福克勋爵以多少有点超然的态度把他的奇特故事重新讲述了一遍。象萨福克这样一个人物看上去和莫里森是极不相同的。他全然不能理解这一套话。他所主要关心的似乎是不久就会在他本人和比弗布鲁克之间对机械工具展开的一场争夺战。但是要在实际生活中遇到一位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和斯卡利特·平珀内尔的混合型人物，却是他的那个天地中全然没有的事情。

一回到英国，萨福克就用他的知识专心从事于处理炸弹问题的研究工作了。在我们的科学顾问帮助下，他成立了第一个实验性的实地考察单位。最大的优先权立刻就给予了炸弹处理小组。实则到战争结束时在英国已经处理的各式各样未爆炸的炸弹达五万枚以上。萨福克的实验小组必须学会如何使信管失效，并把炸弹打开，把炸药取出。这自然是一件极端困难、极端危险的工作。他从法国回来之后，从事于这项工作有将近一年之久。这是一件特别冒险的工作，一方面是因为有许多以前所不知道的类型信管，一方面是因为许多炸弹所在地位是十分危险的。兹摘录在他死后所颁发乔治勋章的公报如下：

他所取得的成功,实笔不胜书,但是萨福克勋爵充分了解他所冒的危险, 103  
这一点可从下述事实表明出来: 在很多这类场合,他总是把所有人都赶出危险区,然后再独自进行工作。他日日置身于冒险之境,而并非不自知。……

终于惨遭不幸。在1941年5月12日,萨福克和他的那一队人把一枚未爆炸的炸弹带到伦敦东南的沼泽中去研究一种新型信管。炸弹爆炸,他和他的同志全部牺牲。他年方三十五岁。

第二十世的萨福克伯爵是伊丽莎白时代一个高门巨阀的直系后裔,这种不顾一切的奋发的生活性格似乎不少是从那个时代传给他的。但是他还可能从他母系的混合血统中有所继承。一个英国贵族的子孙和一个美国百万富翁的结合在丘吉尔身上出现了良好的结果;萨福克的情形亦复如此。也许他所叨惠于他的外祖父,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芝加哥小麦大王利瓦伊·蔡格勒·利特,正和丘吉尔叨惠于伦纳德·杰罗姆的不相上下。我有幸在一生之中遇到很多英武的军官和勇敢的壮士,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能这样了不起地兼备勇敢、专门知识和难以名状的魅力于一身。<sup>①</sup>

在1940年5月和6月份的撤退中,英国军队遗留在法国有相当于八至十个师的装备。损失的装备计有野战炮八百八十门,大口径炮三百一十门,高射炮约五百座,反坦克炮约八百五十门,反坦克步枪约六千四百支,机枪一万一千挺,坦克约七百辆,摩托车二万辆,机动车和卡车共四万五千辆。此外,还有大批的弹药,也都抛弃了。所以我们在长期计划之外还面临一个短期计划。由于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已运往法国,现在我们发现自己不但孤立无援,而且赤手空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拼凑出两个师的装备。但是 104  
这时我们不但要为将来在欧洲或其他地方的远征军,而且要为应

<sup>①</sup> 为了重温我对某些细节的回忆,深深叨惠于《星期六晚邮报》,1942年11月28日和12月5日,以及《读者文摘》月刊,1943年5月号。并参阅黑尔—斯科特的《关于英勇行为》(For Gallantry)(伦敦,1951年版)。

付迫在眉睫的入侵威胁供应存亡攸关的物资。甚至在面临这种极其严重的考验时,还要以一批批的坦克送去援救中东,这正是首相及其同僚永垂不朽的功勋。但是就目前而论,我们大多数人却全神贯注于英伦海峡。

以国民军重新命名并为人民永志不忘的地方自卫志愿军,不能不发给军装、某些步兵武器和弹药。美国方面应丘吉尔之请,运给我们一大批,以应燃眉之急。我们等待每一艘如获至宝的船只的到达,如大旱之望云霓。我们收到了五十万支步枪,不是.303而是.300口径的,因而给我部又造成一个新的麻烦。幸而这一批货里包括有大约一亿二千五百万发子弹,据估计,至少可以给每一个国民军孤注一掷地射击一阵。我们也得到了五万五千挺“手提”机枪和八百九十五门法国旧式75毫米口径的大炮,连同炮弹——仅仅一千发——但是没有牵引车,这就给我们的总监造成了另一件头痛的事。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还不得不赶速生产各式各样的手榴弹、斯登炮、史密斯炮和类似武器,“以便应付”。我们甚至发出了征集鸟枪的呼吁,并且由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迅速生产出一种弹药筒,来提供一种不用枪身击发而可击中目标的子弹。这项要求的反应异常热烈。我在供应部里最初几个星期的生活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度过的。因为空军的需要理应给以头等的、凌驾一切的优先权,所以我们发现自己在为满足这时调集起来保卫我们本土的专业和业余小型武装部队的基本需要而进行的斗争中,往往被这个友好的(有时也不太友好)对手所挫败。

关于比弗布鲁克对不列颠之战的贡献,已有不少记述,但也有一些评论家试图缩小他的功绩。答复是简单的。法国战役差不多刚刚结束,不列颠之战接着就开始了。在5月17日和6月1日之间损失了现役飞机四百五十八架——超过了当前生产所能补充的数目。比弗布鲁克作出一项重大的决定,集中一切可资利用的力

量——原料、工具、废部件、熟练和非熟练工人——生产五种类型的飞机：韦林顿式、惠特利 Vs 式、小猎犬式、飓风式和喷火式，不惜一切牺牲来使最大数目的这类飞机升空以取得制空权。凡是为制造这类飞机之用的各种原料和设备，无论在飞机生产部的正式职权范围之内或之外，都给以凌驾一切的优先权。所有这些办法是否有效验则要看其结果如何。英国的前途，实则世界的前途都取决于不列颠之战。这一战最后仅仅是险胜的，但毕竟打胜了。而且，飞机的损失尽管惊人，但自 5 月至 9 月生产已上升到了能补足损失而有余——至少在原料方面。“战斗机指挥部在秋季战役之后，所拥有的飞机比战役开始时还要多。”<sup>①</sup>

诚然，局势迫使飞机生产部并在很大程度上迫使供应部（因为我们必须生产必要数量的大炮和弹药）不得不作出迅速调整和承担临时任务，这却是将来一个操心的根源。但是如果这一切办不到的话，那么也许根本就无将来的操心了。

不列颠之战开始于 8 月 8 日，一直持续到 9 月 15 日。在双方战士在空中展开英勇战斗的同时，德方还试图破坏战斗机基地。我们仍然，并且我希望永远能以 9 月 15 日这一天作为我们胜利的纪念日。也许最令人焦虑的时刻就是近 8 月底的时候，其间有一天我们的损失是如此之大，以致非冒动用我们最后储备的风险不可。

9 月 7 日是我记忆之中的一个伟大日子，因为当时我们听说入侵已迫在眉睫了。“克伦威尔”这一信号已经发出，随着这个口令飞快地口口相传，随着教堂钟声的鸣响，军队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国民军也枕戈以待。我们等待这伟大的时刻。但是德国却龟缩不敢一试。在 9 月 17 日，据我们现在所了解，希特勒把入侵推迟到“等候进一步通知”。然而，入侵的危险持续了很长一段时 106

<sup>①</sup> 波斯坦，前引书，第 116—117 页。



间，丘吉尔和三军参谋长必须为未来的很多个月采取预防措施。但是不管军事专家怎样谆谆告诫，公众却认为这个时刻已经过去，而且认为不管会遭到什么意外，英国决不会让一个外国入侵者登上它的海岸而屈膝。

我一直保存着这个英雄时代的两项纪录，两者都具有执笔人的特征。第一项是同1940年5月29日那一件相类似措词交各级大臣传阅的一项通知：

在可能是试图入侵的前夕，也就是为保卫我国本土而战的前夕这个时刻，本首相希望凡在政府、作战单位或民政部门身居负责地位的人员，勿忘自己肩负保持警惕和坚定信心的职责。虽然我们要及时而尽力地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目前已经有了作战准备的我们的强大武装力量，对于向我国登陆的德国部队不能全部予以歼灭或俘获，不管它是从空中或是从海上来的。皇家空军已处于随时应战的状态，其战斗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德国海军向未如目前之薄弱，而英国国内陆军也向未如目前之强大。本首相切盼英王陛下所有身居高位的臣仆，能坚定不移，刚毅果敢，以身作则。对自己周围或自己的属员中，如有态度暧昧、意见荒谬者，应予警告或惩戒。遇有文武官员有意扩散不良影响，以图淆混视听、使人意气销沉，或谣言惑众，散布惊慌沮丧情绪者，应立即报告，必要时，立即予以撤职。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在陆、海、空各条战线的那些以大无畏的精神挺身迎敌的作战人员。

温斯顿·丘吉尔

1940年7月4日

在8月19日，也就是在不列颠之战的中期传阅的第二项通知，也是同样具有代表性的。其内容如下：

107 在我们的工作中，大家都必须阅读大量的文件。几乎所有的文件都极其冗长，需花很多精力从其中寻求要点，这样就浪费时间。

我要求各位同事及其工作人员，嗣后报告务求精简。

(i) 报告应段落分明，要点突出。

(ii) 报告中如有复杂因素需详加分析,或需附统计数字,凡此种种,均应列于附录之中。

(iii) 有时最好不写正式报告,而采用提纲挈领备忘录的形式,必要时口头予以补充。

(iv) 请勿再用下述之类的词句:“切记下述各节也是事关重要的……”,或“是否可行,应予考虑……”。大多数这类暧昧词句都是浮词赘语,可一并省略,代之以一简洁之言。不要怕使用表达力强的短语,即便是口语式的也无妨。……

如果这种伟大的战时文件能在历史上占有它们的光荣地位,这同最后这一项训诫是永远分不开的。我至今仍然欢喜回想丘吉尔8月的那一天如何坐下来提醒我们勿忘精简的重要意义,当时英国正处生死存亡之际。

继不列颠之战而来的是“闪电战”。既不能战胜皇家空军又不能使它们的飞机场失去作用,德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战术。他们这时试图陷各大城市及其居民于毁灭和绝望之境。他们的闪电战从伦敦开始,部分在日间,但越来越在夜间进行。第一个紧张阶段,自9月7日起,毫无间断地延续了七个多星期。之后,他们虽给伦敦以短暂的喘息时间,却对考文垂、加的夫、布里斯托尔、伯明翰和其他很多大城市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接着又试图使各主要港口陷于瘫痪。对伦敦的袭击简直毫无间断地从1940—1941年持续了整整冬春两季,而以5月初的猛攻臻于最高峰。就在这个月内,下院的大厦被炸毁了。

凡是生活在伦敦历经过闪电袭击的人,都能回忆自己所遭遇的经历。我自己认为在这整个过程中最难受的就是灯火管制。在黑暗中摸索是最讨厌的。我们这些低级大臣不供给小轿车;但无论如何谁也不能认为在空袭期间要司机出去开车是有道理的,除非为了某种特殊任务。我视力不佳;虽则我要走的路程不远,只不

过从河滨大街到帕尔·马尔街或圣詹姆斯街的一个俱乐部，然后回到皮卡迪利街上我自己的寓所，但是想起当时在黑暗中一路摸索前进，只靠炮火的闪光偶尔照亮一下的那种紧急时刻，心里总是怪难受的。11月初，真够倒霉的，我在黑暗中被一辆出租汽车撞上了。毫无疑问，这完全是我自己的过错；但是我再一次幸免于难，正如以前和以后常有的情形那样。我遍体鳞伤，但总算骨头没有折断，两三天之后我就照样上班。但是车子把我撞休克了，好久一阵我“失去知觉”。在卡尔顿俱乐部被炸毁的那天夜里，我也很侥幸。<sup>①</sup>8点钟左右，在从部里回家的路上，我已经走了进去。当时炸弹如注，并且因为这时我们的高射炮已开始起作用，所以不少弹片乱飞。我没有再往前走，心想不如拐进帕尔·马尔街的卡尔顿俱乐部去。我已走进轩敞的休息室，正坐在一个角落里同戴维·马杰森、威克多·沃伦德和另一、两位大臣谈话，忽然整个天花板似乎要在我们周围坍下来。这个房间的另一端的檐板中了一枚炸弹。炸弹如果直穿下来，我们无疑就逃不出去了。我们正朝着大厅的方向摸索着往外走，发现有些人从餐厅跑出来，原来餐厅里落了另一枚炸弹。这些人当中有海尔沙姆勋爵和他的儿子昆廷；并且，正如丘吉尔所记载的，这位父亲是靠了儿子的孝心方得以脱险。虽然在俱乐部的会员和服务人员一定有百人以上，但是空袭本身没有造成任何伤亡，只有一个人是在跑出去的时候被一块落下的石头砸死的。由于保守党人这次奇迹般地幸免于难，我们工党和自由党的朋友颇为逗趣地向我们表示祝贺。

马杰森和我一同去找他的车子，但是车子已被炸毁。我们想正是晚餐的时候，所以我们穿过马路到卡尔顿饭店去（饭店当时还存在，后来在闪电袭击中炸掉），想在那里吃一餐饭，喝两盅酒，宽慰一下自己。饭店老板以一种非常疑惑不解——虽不能说怀疑——

<sup>①</sup> 1940年10月14日。

的态度接待我们，平时他同我们俩人原都很熟。我们对着镜子一照，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头发、面部和衣服全都被灰尘烟雾弄得污黑。我们满怀感激地接受好意洗了一个澡。这时候，天色已相当晚了，所以我得到普拉特俱乐部去（在圣詹姆斯街的帕克广场上），在那里遇到了我的姻兄弟埃迪·德文希尔。我们正坐在那儿，有一个人跑进来说，他的房子卡尔顿花园2号已经着火。我们想最好我们都上那儿去。火势渐渐控制住以后，我们才得以进入屋内，搬出几件傢具和一些其他什物。（幸而比较值钱的名画和艺术品已经送到德尔比郡去了。）我们靠了许多自告奋勇的帮手，把这些东西堆到门外的小花园里，我又设法从圣马丁街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弄到一块柏油防雨布，来防范这些东西遭受风吹雨打。第二天，我的妻子和她的一位姐妹带了一辆卡车来到这里。可是有一件令人头痛的事，那儿有一颗未爆炸的炸弹，然而她们靠了女性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成功地得到了警察方面的许可，将这些东西搬走。这幢房子里面的东西都搬空了，只在最近才由房主皇家地产公司恢复旧观。

在闪电袭击开始时，莫里森很担心我的安全，要我在我们办公室下面一个宽广的地下室过宿，在地下室的一角为他设有一个床位，用帷幕同大宿舍隔开。我试过一晚，但是完全不令人满意。所以我依然死心塌地住在我几年前租下的皮卡迪利街九十号的那套小公寓里。我妻子住在乡下的小屋里，几个小孩住在学校，大儿子在部队里。我这所小小寓所的唯一麻烦，是它座落在这幢房子顶层的阁楼上，德国轰炸机盘旋的噪音简直令人神魂不定。但是 110  
有一夜，这个困难解决了。那夜我一直工作到很晚，才到普拉特俱乐部去进晚餐。在我走进皮卡迪利街九十号时，我发现照料我的仆役在厅堂里给我留了一个条子：“你的房间已经炸毁。我把一些东西放在某某先生的房间里。”这是底层的一套房间。我在那里看



到有睡衣、浴衣、拖鞋和寓所主人的一些东西，布置得清清爽爽，牙刷和玻璃杯各得其所，毛巾则照惯常那样叠放在脸盆架上。这个大有人在闪电袭击整个期间一直留在他的工作岗位上。就在这一夜，“之形”俱乐部（在我们隔壁）一部分被炸毁了。我幸蒙休·沃尔波惠允，能够搬到他的第一层楼的一套公寓里。我在那里一直住到1943年初我去北非时为止。

我偶尔可以在星期六或星期日晚间去苏塞克斯一次。站在我们门外看伦敦空袭，却是一个非凡景象：探照灯、炮火的闪光和烛天的熊熊烈火。惊人数量的炸弹落在我们附近，也许是飞返基地的德国受伤飞机丢下来的，也许是不敢飞临炮火网的未受伤飞机投下来的。后来据我计算，在我们的土地上大约每十亩就有一颗炸弹，但是除了一条牛和一只野鸡外，别无任何伤亡。我把这些都分别记录在狩猎簿上各自适当的地方，牛则列于“杂类”项下。

伍利奇兵工厂和自治市遭难惨重。回忆起伍利奇的某一夜，至今犹历历在目。我想我最好还是偶尔在那里露面一下，于是商定在一天下午和兵工厂厂长查尔斯·麦克拉伦爵士偕同前往。麦克拉伦是一位著名人物——苏格兰工程师最优秀的典型。轰炸猛烈，但毫无惊慌神色，他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在空袭期间我们和其他很多工程师一起坐在厂长办公室里。这些工程师似乎都是苏格兰人，漫不经心地谈论着他们在世界各地的经历。这是一个真正诗人基普林的场面。威士忌酒的豪饮和奇闻逸事的高谈阔论都是同样纵情尽兴的。当空袭看上去已经过去，大家就都开始工作，去估计损失并订出第二天的计划。

我因为职责所在，在这些月份中不得不作大量旅行。在一次剧烈空袭的夜间，恰巧我在加的夫。在我同我们的地区代表等人会谈之后，他们在一个饭店里用晚宴来招待我。正在进餐或刚刚饭毕，轰炸开始了，连续几小时之久。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场

面，轰鸣的炸弹声、熊熊的烈火，由一个表面上燃烧着的城市映托出来的城堡和大加的夫公共建筑物的轮廓。损失是惨重的，但是人们仍无一点惊慌，而且人人似乎都知道如何行事。我有一次在布里斯托尔，夜间遇到了猛烈的轰炸，市长已经为我安排了一次正式宴会，邀请了很多陪客。我刚刚站起来为答谢祝酒要发表演讲的时候，轰炸开始了。我问他是否要把演讲缩短一些。他似乎对于这种想法不但很不高兴，而且为之愕然。所以我持续讲了约定的整整二十五分钟，保全了面子。区防空委员休·埃利斯悄悄出去照料他的组织工作，后来我们也绕道去到他的防空总部。傍晚市长把我带到市长官邸，我们就在官邸的酒窖中过了一夜。在布里斯托尔·米尔克的酒窖和供市长夫妇休息的酒窖之间给我设了一个床位。在喧嚣声渐渐静下来之后，我感到环境侷促，于是又回到我的房间去补足睡眠。市长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坚强的工会会员和一个了不起的爱国主义者。

随着对伦敦袭击的扩大，德国人像投掷炸弹那样借重燃烧弹了。在星期日夜间伦敦起火的时候，我正在部里。当然，在这一夜，伦敦几乎成了一座空城，但是消防工作还没有布置就绪，或者是一直遭到忽视。象这样一个地区竟听任其没有适当的预防措施，似乎是不可原谅的。随着我们把自己的消防工作组织起来，我们全体都轮流值勤。在部里的屋顶上有一个很好的岗哨，轰炸的情况在那里可以一目了然。一种岗亭的监视哨已经建立，可凭以防范弹片，除非直接命中（这种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有时候我去看看我的兄弟丹尼尔，他夜间多半都在圣马丁街，负责消防工作。麦克米伦出版公司最上面两层楼已经在几年前改成新辟的贮藏室。我的兄弟常常带着苦笑说，那里放有一些滞销的书籍，他怀疑任何德国炸弹是否能炸穿。

人类对于那些日子的记忆是忘不了的。伦敦的广大居民全无

保障，他们的小房子亦复如此。安德森防空壕和后来的莫里森防空壕是如此的有效，所以致命的伤亡比较少。但是苦难和损失的景象，令人触目伤心。每个人到工厂或办公室去上班的那种勇气，真是了不起的。我到班早的时候，常常同清洁工闲谈。他们多数人住在炸得一塌糊涂的伦敦东部贫民区。他们的房子很多都炸掉了；有时他们的邻居、朋友或亲戚已惨遭伤亡，但是他们始终工作如常。

在部里，我们在闪电袭击期间主要的焦虑就是生产的损失。但是甚至在最猛烈空袭之后，工厂要不了两三天的工夫就把人员配置齐妥，照常开工。实际上，轰炸所造成的全部破坏证明是并不象一度看上去那么严重。虽然如此，在生命损失之外，还造成了严重的停工，以致一些存亡所系的工厂，包括伍利奇兵工厂的主要部分在内，不得不另迁场地。关于疏散问题，议论纷纭，因为要疏散就不能不造成眼前的一定的减产。我们有一些厂无法轻易移动；另一些则比较容易处理。我们采取了一种适中的疏散政策。结果，我们的生产能力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

哈罗德·布朗爵士没有被这些额外的困难所压倒。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去看他，发现他几乎是一付得意洋洋的样子。“有什么事吗？”我这样问道。“哦，”他回答说，“他们以一些二十五磅重的炸弹炸毁了我们主要的车辆制造厂。几个星期以来，首相一直在谈论车辆生产正跑在大炮生产前面的事情。现在要有六个月生产不出任何车辆，所以我们或许不会再听到这种议论了。”

113 在全国各地，虽然建筑物损失严重，有时也伤亡惨重，但是我们随即发现工具却很好地保全下来。虽然局势已经扭转，虽然皇家空军对德国大规模袭击所投炸弹的重量远比我们自己所受到的要大，但是战后我们得知，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活仍一直在继续，而且产量的损失也没有我们预料的那样大。



在这次长期空袭战的初期,由于开始时采用空袭警报系统,无论在办公室中或工厂中都损失了很多工作时间。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其他无数细节问题上一样,首相都很快采取了措施。不久就采用了一个新计划,依照这个计划,以“空袭警报”作为第一次警告,而在建筑物屋顶或其他显著位置上值勤的空袭警戒员只有在敌机临近时才发“紧急警报”。遇到空袭警报,不必理会;等到紧急警报,再进入底层也不迟。这当然包括整天断断续续持续下去的白昼空袭在内。在修订章程未采用之前,浪费了很多时间。一些额外的风险无疑是有的,但这种变革却为大家所欢迎。空袭警戒员通称为“吉姆·克劳斯”。不管他们及时发出的警告是否有效,他的确有助于使人人坚守各自的岗位。记得我曾问过站在供应部屋顶上的值勤人员,他是如何发警报的。“喏,先生,”他这样说,“我一看到敌机飞过演技场,我就摇铃。”无论如何,有过当初我们从房间里被赶到地下室而耽搁很长时间的一番丢脸经验之后,这种新办法是很受欢迎的。

在闪电袭击期间白厅大遭其殃,因此为把内阁和各重要部门的核心迁入正赶速建造的各坚固场所,作了非常适当的准备。事实上除海军部新建要塞用作指挥总部之外,这些防空要塞并未加以利用。这一至今给骑卫队操场增光或者说有碍外观的建筑物,大家认为是仿效冰山的原理建造的,有六分之五以上在地面以下。它很快就获得了“列宁墓”这样一个绰号。

在1941年的头几个月中,空袭越来越分散到全国各地。普利茅斯、利物浦和克来德塞德,都损失惨重,但是这些地方的遭害者又仍然是个别人,而并未影响生产的产量和造成人民的紧张。

5月10日是伦敦大轰炸的最高峰。正是这一天的夜间,下院被炸毁。第二天凌晨我去看看破坏的情况。炸弹直穿屋顶而下,但还是可从等候投票的走廊中走过去。我拾到一张烧焦了的动议



通告单，一直保存至今；还拾到了其他几件纪念品。过了许多年下院才迁回旧址。我们先迁到教堂大厦，后来又搬往上院。后来我们自己议院重建时，完全是按照以前的模样。

“闪电袭击”这时即将结束，至少到1944年夏季，当希特勒的“秘密武器”——V.1和V.2——终于被揭穿时，它是结束了。这些武器没有更快地臻于完善，的确是一件幸事。在这期间，虽然我们的伤亡——死四万三千人，重伤五万一千人——是令人痛心的，但是希特勒对英国的袭击却未能达到其主要目的。

希特勒——虽然我们并不知道——不久就要转向另一些目标。我们已孤立无援地赢得了不列颠之战；我们已孤立无援地抵挡住闪电袭击；我们现正孤立无援地面临卷土重来的潜水艇威胁。还有其他的种种考验摆在我们前面。但是我们孤立无援的日子将没有多久了。

在这期间部里的日常工作照旧进行。它的职责范围之广，只要浏览一下议会的询问案，就不难看出。铁栏杆的搜集（几乎每星期重提一次）；亚麻管制委员会；甘油的用途；锯木厂的设备；废皮革的利用；街头报纸的销售；风琴制造业的前途；羊毛的可能剪毛量；厨房废品的收集（一种特殊的爱好品）；国民军护士和助产士钢盔的供应；塑料管制；木材储存的数量和安全；望远镜的收集；印书用纸；棉价管制；北爱尔兰水泥的生产；所谓糖蜜的不断失窃；波兰期刊的纸张供应；在印度生产的军需品；以草造纸的可能性；苛性钾的供应；圣诞节贺片的用纸；为已婚女工准备的托儿所；橡皮的废品利用；国产木材的利用；数量调查的原则；铁路工厂供军需品制造之用；木制品公司的前途；卫生纸的供应；木材代用品；苏塞克斯的铁石矿床；废瓶子的利用；地区组织及其利用；科学研究；供应部对威尔士高地铁路运载原料的要求。信手拈来的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提供答案的各色各样、大大小小的问题。

莫里森和邓肯都把很大一部分议会询问案交由我去答复。在比弗布鲁克接长部务之后，所有这些询问案就都落在我身上了。我开始学习我看到的别人多年来用惯了的那种手法，以及如何避免各式各样的圈套。在1940年7月间德国的入侵随时可能来到的时候，一位英勇的军官不断问我关于“各种号码的”手榴弹的供应情形。“大臣满意吗？”他这样问道。这是一个很老的圈套。“我的尊敬的朋友，”我回答说，“一点也不满意。就手榴弹问题而言，我可以说他的心情是一种抱有适当乐观主义的心情。”

撇开议员们对于如何保证效率的理所当然的焦虑不谈，还有很多问题不幸使旧有的政党之争，风波再起，或者说侵犯到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一方面，我们往往有必要利用我们的战时权利来调换一个工厂的经理人员。工厂也许不错，但是经理人员很糟。如果连从外面派进去一、两名顾问进行协助也无济于事，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采取最后措施，把现有的厂方丢开，另外安置一个主管人。有时——虽则很少几次——我们不是因为公司财力薄弱，就是为了其他原因——而不得不使用我们的权力强制征购其财产。这两种办法，不难设想，都是不合很多保守党议员胃口的，因此我不得不在辩论中为此辩护，以对抗猛烈的批评。同样，我们随即发 116  
现为如此迅速成立的皇家兵工厂采用私人企业的经营办法乃是必要的，但这项政策又为政府内外的社会主义议员厌恶之至。为了某种理由，他们怀着几乎宗教式的赤诚，深信一个皇家兵工厂的经营成功就是国有化胜利的明证。把这些新机构交由私人经营管理，实际上就无异是社会主义失败的一纸供状。实际上在想出保全面子的解决办法以前，这个问题不得不送请战时内阁决定。

我们工厂的人事问题很快就变得比这些无益的争执迫切多了。随着现有机械工程工业的动员、新厂的建造、雇用成千上万妇女的为数极多的填料工厂的设立，出现了无数的困难，而这些困

难,由于战事迁延不绝,更由于,用当时的术语来说,“平民”的“集中”,却不能不予以解决。不但为了供应,而且为了照顾劳工,也必须作出安排。填料和炸药工厂自然要设置在离开人口稠密地区尽可能远的地方,而这就不能不为之安置住所,并为他们的交通运输、购买东西、娱乐和他们不当班时照料我们的人提供便利。我们一上来把住所的经营管理委托给各式各样的机构,诸如青年会、女青年会、假日联谊会、合作假日联谊会和工人旅行协会之类。后来比弗布鲁克作出了一个出色的新任命。他一贯认为一个人比一个委员会好。(他在房间里挂有一张巨幅的标语,写道:“委员会把用于战争的精力消耗掉了”。)所以他劝请比利·巴特林接手这样一项任务:组织住招待所中女青年的照顾并提供适当的消遣和娱乐。巴特林在这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除了那些势必无谓地占去一大部分时间的问题——正如在部里供过职的人所了解的——不谈,有一些更广泛的问题是以诚心  
117 诚意的态度和有益于事的愿望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大部分起因于对错误和管理失宜的真正怨言,而这类情况却在这种大规模工业调整之中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比如工业能力的闲置,机械工具的滥用以及劳动力的利用等等。

在最初的大扩展中,各部门产量负责人员自然是依靠他们所了解并对完成任务使他们放心的主要承包商。他们信任这些承包商必要的转手分包的有效安排,自认为已经为保证照订单交货作了适当部署,所以尽管议会和新闻界对大部人力和机器力量的闲置施加压力,但他们却不为所动。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生产作战单位所需要的供应品,而并不把为处境困难的产业工人或为停工的工厂提供就业和开工的机会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他们极愿并渴望雇佣和训练工人,但是他们自然是从自己角度看问题,宁愿把工人和工具转移到大厂而不愿分散给小单位。他们需要货物,



并想尽一切办法要将它们弄到手，但是他们并不相信劳资双方在战时生产中具有以各自所长并在各自环境中进行工作的固有权利。

在最初几个月，这是很合理的。但是随着压力增加，可利用的工厂总能力越来越多地被占用，更随着工人问题越来越棘手，这种态度就维持不下去了。随着进口受到限制和相应地把力量集中于非常专门的出口项目的生产，越来越多的平常供应一般民用必需品的企业发现自己被挤掉了。在高度熟练的技术人员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一种愤怒和潦倒之感勃然而生。最棘手的——也是具有典型性的——问题之一，就是木工。由于进口的限制，木料的使用必需尽量节约。落锤锻取代翻砂的机械工程技术方面的变革，已经开始使木框和木模制造工失业了。我用了不少时间为有训练的木工在我自己和其他各部的各生产部门多方寻找工作。在这项工作方面，我所主持的工业能力委员会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猎枪制造商，诸如珀迪商号、丘吉尔商号等等，大都需要经过专门训练的高度熟练的工人。目前他们的产品，除了一些仍供出口外，不再有需求了。那么我们怎样利用这些工人呢？我们可以用一种合作组织的形式把这些工人组织起来，并寻找既适合于他们的技术也适合于我们需要的十分合适的工作。同样，雇有高度熟练的男女工的印刷机制造商，也不能轻而易举地适应军需品的一般生产。他们最后被吸收进机枪和类似武器的某些部件的制造方面，并且对于一项迫切的需要作了良好贡献。但这是需要时间的；在问题正设法解决的时候，物议沸腾起来。

所有这一切不久就成为地区分权对抗集中领导这样更大范围问题的一部分了。这或许是一件与我有关的最难办、争论最激烈的事。地方委员会（后改成地区委员会）的制度，在早期阶段就已经建立，是由三个生产部的地方官员组成的。舆论认为很多武器



和设备的生产都适合于以委托订货和委托加工的方式来处理。在工作错综复杂并由不同部门主管官员负责的情况下，这种意见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正确的意见是，一大部分分包和再分包工作，包括如何就地对劳动力和工具作最有效利用之类的问题在内，可以由兼有官方和非官方人员的当地或地区委员会予以有效处理。

在这期间，某些地区，特别是伦敦地区，在采用使小企业之间能迅速交换机械能力这样一种办法方面，开始取得显著进步。在国内很多地区，尤其是在东南部，并在一定程度上在米德兰，有很多职工不到五十人的小企业，但加在一起，产量却也可观。凡是这类地区，这种办法就特别有效。当然，工人和机器可以转移到较大的工厂去，但往往行不通。可能厂房不敷用，可能机器经不起搬动，在工人的交通和居住条件方面也许有困难。所以从伦敦地区开始，对负荷过重或负荷不足的情况采用了用电话交换消息这样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一个小厂未始不会有一些切截机、刨床或车床在一个合同和另一个合同的间隔期间有一、两个星期空闲，另一个小厂也许有它承办不下来的工作，而需要这类机器的产量以补其不足。开始于伦敦的“生产能力交换中心”作出了榜样。到1941年年底，这一建制已经在全国发展起来。这类中心的扩大和监督成了地区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

这些问题是和机械工具管制委员会的工作息息相关的。珀西·米尔斯和我立即决定举行一次机械工具普查。在1940年8月间严格的进行了一次，在11月间又进行了一次更加详尽的复查。有二万五千家机械工程公司令其填具报表，后来又决定每两、三个月举行普查一次。跟着就是一次小工具的普查。机械工具管制局局长派驻地区的官员注定要在保证机械工具的最有效使用方面起主导作用。但是对于白厅的生产部门显然不愿利用地区制度或充分发挥其潜在能力的情况，议会不断发出批评。对于这类怨言，我深

表同情。

我所主持的委员会还有一些解决特殊问题的任务。例如，也许会发现一个公司的订货簿混乱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他们承接了远非自己力所能及的所有三个部的任务。为了解决这个紊乱现象并把一些工作转移到其他工厂，我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在这方面，我越来越倚重珀西·米尔斯和他的副手斯坦利·哈利。每项工作都要依靠大大小小的工具、夹具和量规。视察员赋有设法使工具得到适当而充分利用的权力，于普查之后也能有效地行使这项职权。如果工具得不到充分利用（并在这方面地方或地区委员会有了它本身的财产），就必须作出分包的安排。如果分包已不可能，甚至通过地区的“生产能力交换中心”也办不到，那么就只有把工具取走，放到其他一些厂里去。所以通过居于中心地位的工业能力委员会的同心协力，通过机械工具管制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的密切合作，我们开始为我们天天遇到的问题研究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我们从上届政府承继下来并以悠久传统为基础的生产组织，由于一点缺陷而深受其害，批评者于是迅即对这一弱点加以利用。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克服部与部之间的妒忌和竞争，设立一个由有关各部大臣组成的生产委员会而以一个独立身份的人士为主席也好，重新指派一个由大臣本人组成的生产执行委员会也好，但这类机构实际上都是只有靠这个中心及其所属各级单位的个人诚意方能发挥作用的一种权宜办法。大体说来，尽管大臣们各有其强烈的特性，这一建制还是行之有效的，尤其是在头几年。但是随着劳动力和原料的越来越缺乏，随着工业能力因所有各部门的努力而已经成功的加以使用，某种中央管制的必要就愈益明显了。在从1940年6月至1942年春季的所有辩论中，这一直是批评我们的人们大作其文章的题目。

虽然在1941年1月设立的生产执行委员会管理着全国的几乎每一件事情——工人、工具、装置、原料——但是不幸，它却不总是有效地管理着它自身。因为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通常拒绝出席，而派他的政务次官带着多少有点消极的指示来代替他本人。为对付这种情况，委员会曾经以一种策划得很出色的巧妙手法作出了一项努力。决定嗣后就以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办公室作为开会地点。起初这倒将了他一军，但是他随即找到了一个从后门溜走的办法。曾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在讨论某种二、三流而却是至关重要的金属可能短缺的问题时，他一度相当注意。但是讨论了一半他溜走了。商谈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等委员会散会之后，他们发现他正坐在他私人秘书的房间里给美国打长途电话。

121 在他所得到的消息警告之下，他便急匆匆为他自己的飞机生产部买下一切可利用的物资。这个故事也许是不经之谈，但确实是说明问题的。

一个特别专心致志于生产问题的有组织的反对派，自丘吉尔当政的最初几个月起，就开始亮相了。伊曼纽尔·欣韦尔第一次以他后来在整个战争期间所担任的那个角色的姿态登场了。他既然一直不愿意以一个次要角色参加政府，那么他所想要的当然就可能是对他最有益、对他最能大显身手的岗位了。他的发言一贯是吹毛求疵的——甚至是刻薄的——但一般讲来是见多识广，耐人玩味的。他的错误是，他所谴责的范围太广，反而削弱了他的主要之点的效果。他所深恶痛绝的贝文给他的回敬是非常尖锐的。

这个集团领袖人物之一是克莱门特·戴维斯。他也没有在政府中得到任何职位，所以他就扮演了耿直朋友的角色。他发言的优点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缺点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冗长。和这两位批评家伙同一气的，其最为百折不挠的竟然是伊普斯威奇的资

本主义—社会主义议员迪克·斯托克和独立派奥斯汀·斯托克斯。后者虽身体力行基督教济贫之类的事物，却不兼备基督教慈善的美德。其他采取同一方针的人有后来担任生产部次官的乔治·加罗—琼斯；一位言语动人的演说家但因自己的经历而处于不利地位的霍尔—贝利沙；一位见解过激的、精明强干的工程师托马斯·霍拉宾，以及和这样一个集团殊不相称的温特顿勋爵。

时光月复一月的流逝，温特顿和欣韦尔开始并肩穷追猛攻，并且成为穷追猛攻时形影不离的伙伴。温特顿形容憔悴、面目可憎、瘦骨嶙峋，虽兼有职非重要、政绩平凡的长期纪录和一种莫名其妙的、几乎幼稚的自命不凡，倒也有一些讨人欢心的特性。他有一种可爱的品质。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年纪很轻就进入了下院，并且他那种动人的天真幼稚，始终不减当年。当这个身材高大的丑陋人物同走路时两脚带着小跑的欣韦尔在议会走廊中闲荡时，人们无可避免地要想到唐·吉诃德和桑乔·潘萨。<sup>①</sup>在这个时候，<sup>122</sup>一出风行一时的新戏以《砒霜和旧花边》这个名称连续上演，这两个人——这位鼓动家和这位贵族——很快地就获得了恰如其分的绰号。他们偶尔得到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的支持，沃德洛—米尔恩爵士担任国家支出审查委员会主席，而国家支出审查委员会总是以虽然值得赞赏、毕竟惹人嫌厌的热诚钻研我们的一切记录，他正好身居其位，自可信手加上一条吹毛求疵的意见。但是，一般说来，他还是养精蓄锐以待在大问题上较量一番。

不管其他所有大臣都屈居其下的那样一位单一的生产大臣在原则上怎样有吸引力，实际上是困难重重的。人们各有其特性，像比弗布鲁克和贝文这样两个人，他们在交锋时都是毫不示弱的，毅然决然的、高度个人主义的。而且，范围太广，一个人是难以管理

---

<sup>①</sup> 唐·吉诃德是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的名小说及其主人公，一个典型的空想主义者。桑乔·潘萨是唐·吉诃德的随从，一个庸俗而富有常识的典型人物。——译者



好的。丘吉尔一直抵制那种个人发号施令的压力达两年之久，我认为这是对的。何况，甚至在武器生产已达于极峰，而所有各部的组织已尽可能臻于完善的时候，于1942年3月奉派为生产大臣的奥利弗·利特尔顿还是有不同于战争初期历任大臣所面临的任务。到了现在，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增加总产量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建立单一的管理权的问题，这是为了使当时看来无法再把产量提高的那些方案具体化，尤其是为了在即将必须与美、俄两个盟国进行协商时，好用统一的口径代表英国发言。

关于工人的调配问题，其发展方向也大致如此。在1940年11月，欧内斯特·贝文曾断然拒绝任何强迫劳动的概念：

123 不管我有什么其他弱点，我认为我可以自认了解本国的工人阶级。我必须就究竟要作一个领导人还是要作一个独裁者这一点作出决择。我过去宁愿，现在还是宁愿作一个领导人，而我的尊敬的朋友锡哈姆港议员（欣韦尔先生）如果在任的话，有鉴于今天上午他所发表的言论，我敢说他会采取另一条路，会采取一个独裁者的道路。究竟哪条路会产生最好的结果，这正是我们必须进行的一个试验。<sup>①</sup>

这是他的辩护的主题。但是差不多整整一年之后，他在议会提出了国民服役议案，并获得通过，这个议案事实上是以强力调度男女工人的。然而，我认为贝文是对的。时机尚未成熟，工厂也没有作好准备。贝文确实是一个高尚的人，是我在漫长的一生中所认识的最重要、最出色的人物之一。他身材高大，两颧有力，庄重严肃，确是从一个英雄的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在中央管制下各式各样交换和联合的一个时期中，我曾以工业能力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成为他的部下。我发现他是一位忠实可爱的上司。他能坚苦奋斗，而决不挟嫌记仇。

在1941年4月间，我巡视各区。在各地区委员会的成员之中

---

①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0年11月27日。

仍然有这样一种信念，认为他们是生产界中的灰姑娘，“饱尝失意之苦。也有这样一种感觉，认为地方上的工业资源还没有充分开辟，地方委员会所正在作的也不是应该动员地方工业资源的工作。”<sup>①</sup>

我的报告和建议为三位生产大臣所接受。地方委员会重新命名为生产执行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并须以法人组织的资格对生产执行委员会负责。增加官方委员以便将有关各部一并包括在内，并指派一个执行委员会进行日常工作。所加给地区委员会的职责多少有了扩充，后来把帮助工人充分动员起来的工作也一并包括在内。但委员会的主要目的仍然是组织和管理生产能力的交换。这是它们最重要的职能，也是最适合于它们的一项工作。这类中心不久就顺利地在全国达到三十六个，都是以伦敦的模式为依据的。这些改革既在实际上是对生产有价值，而在政治上也是有裨益的。如果没有贝文经常不断的帮助，恐怕没有一项是我能够贯彻执行的。

地区结构的这次恢复生气，标志着向前迈进一步，直至渐次发 124  
展到地区委员会直隶于生产部管辖下这一最后阶段时为止。翌年，沃尔特·西特林所主持的委员会进行了一次视察，并且就取得了多大的改进提出报告。如何把工作分配给现有工厂而不建新厂，并设法把工人集中在这些厂里等等，这一整个问题，是具有真正重要性的，尤其是在不能适用大规模生产方法的情况下。在这方面，不应忘记的是，两次大战的不同需求相差是多么大。

在这一年（1941年）3月底，当时任贸易部大臣的奥利弗·利特尔顿公布了“生产集中”的政策。这个政策，就工人而言，是恰合时宜的。我们的大型填料工厂和其他进行反复性工作并使用非熟练工人的工厂，这时已随时可以配备人员了。妇女就业的大量增

<sup>①</sup> 波斯坦，前引书，第263页。

加随之而来。在我们的一般工厂和我们的承包商的工厂中，这时已有很多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可用来训练新手，并且足可使我们实行两班以至三班制了。

实际上，到1942年春季，概括地说，各供应部已经将战争开始时可供利用的所有失业工人吸收尽净，正成功地吸取着因民用生产集中而解放出来的男女工人。大大小小的新旧机械工具几乎都以最大限度的效率加以利用。但是当新工具靠国内生产或美国进口正在不断增加时，现有的生产能力几乎全都被发掘出来并加以利用了。交换中心在十二个地区的每一区中，都正在东南地区草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旧有的优先权之争早已成为过去，分配制度正以一种友好的、有效的方式运行着。研究英国战时生产的历史家，一致认为，到这时为照顾海、陆、空三军和其他主要机构的需要，全国以最高的速率摆开了阵势，包括妇女劳动力的最大限度使用在内。

125 1941年5月初，援救希腊的企图完全归于失败了。丘吉尔立即要求举行一次信任投票，尽管劳合·乔治的发言多少带点失败主义味道，丘吉尔还是达到了目的。但是议会和全国都怀着一种迷惑不解、将信将疑的情绪。似乎事事都不对头。在希腊事件之后又出现了在利比亚的挫折。

在议会中，霍尔·贝利沙对供应部提出一项猛烈的抨击，特别是因为未能提供足够的性能适当的坦克和武器。其他议员也是如此。到了5月的第三个星期，要求举行关于供应问题的秘密会议的压力很大。在举行秘密会议时，竟然像是一个反高潮。邓肯以他那种明确、简洁、条理井然而又不动感情的风格，发表了一篇令人心悦诚服的讲话，这是非常投合议员们的口味的。

坦克的供应一贯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在丘吉尔组织政府的前夕，一致同意成立一个坦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用官方历史

学家的话来说，“实际上〔无异是〕一个调查委员会。……一种可悲的，实则危险的情况”被揭露了出来，“即所犯的失职罪——再加上忽视坦克战的性质和可能性——比在执行任务中所犯的罪要大得多”。<sup>①</sup>

各军种以他们原来的标准需要以及军需品消费率和原料消耗率为基础提供尽可能精确的估计数，供应部原来据以进行工作的计划就是以基于这项估计数所作出的对武器、军需品和车辆的需要为依据的。在战争爆发之前，这一切都不过是纸上谈兵，无疑都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所作出的看来象似合理的估计，以及按照推测的情况为另一次战争所作的可能采取的作战形式而拟定出来的。但是事实竟然和任何合理的预料大相径庭。在1940年夏末之前，英国军队已经把他们几乎所有的坦克和大炮都丢弃在法国。继而战争出乎意料之外地转移到非洲；在摧毁了东非和阿比西尼亚脆弱的意大利帝国的那次成功军事行动之后，战斗则集中于北非。在辽阔的沙漠战场上展开了主要由坦克进行的骑兵式战争。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整套的新焦虑。因为陆军的需要陡然大为增加，变化之速大有一日千里之势。

战争性质的千变万化，在所需武器的类型的同样千变万化之中反映了出来。在战前所要求并大量生产的轻坦克在北非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不久就对重装甲的大坦克和火力更强的进攻性武器提出了需要。同样，较大口径的反坦克武器也变成必不可少的了。但是在英国的造船传统以至在比较有限程度上生产大炮的传统还根深蒂固的时候，谁也不大真正懂得坦克——如何设计，如何发展或制造。实则我们不久就面对这样一种侮辱性的似是而非的议论，说什么发明这种新武器的国家似乎不能从他们的兵工厂中提供足够数量的有效武器。这正是我们不了解两次战争有所不同

<sup>①</sup> 斯科特和休斯，前引书，第221页。



而付的沉重代价的一部分。

新的职位设立了，委派了一些非官方的设计主管人员。设计和改进工作同生产分开；新的原料供应局和坦克装配局分别建立起来。大臣每有更迭，这些重要职位就会有新人委派下来，结果自然造成一定的脱节和延误。尽管作了一切努力，这个变化无常的新机构却迟迟未能运转自如。

如果坦克的设计和生产是受到了批评，那么，坦克上所用的武器是同样受到了抨击的。坦克上用的大炮的射程和火力据说都不合格。这一点后来靠了发展大口径炮和穿透力强的炮弹而得到补救。但是这一切都是需要时间的，而战事的失败却归因于德国——不是意大利——在武器方面所占的优势。我们的装甲也受到批评，有时因为它太轻，有时又因为它太重。对于操作时的性能和损耗的数目，啧有烦言。“备用品”也向来不敷用。不管这些批评是否正当，然而却是源源不绝的，具有破坏性的。对不同类型坦克的要求随着战术的改变而改变。德国方面搞设计比我们久，比较能变通适应。美国方面自然可以在大规模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大量非常有效的运载工具。我们或许陷入了力求完善和大量需求的夹缝中。我们似乎不能按照陆军要求的速度供应他们所要求的一切，这就成为不断愤懑和遭受挫败的一个根源。但是无论在政府和工业界，其中一些最精明强干的人物，却都已献身于这项工作，因而不久就精通其事。我却很遗憾未能遇上那段最糟的时期。当时常常遭到广泛的批评，而那些批评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不无道理的。甚至在我离部之前，设计和生产就都有了莫大的改进。为增加生产，“援俄坦克周”和其他的鼓励办法，已开始从工厂方面得到热烈的反应。

海、陆、空军和商船舰队都以种类繁多的武器，自双筒自动高射炮至机关枪，对现有的生产能力提出急如星火而又互相矛盾的

要求。它们都使用同一类型的特殊工具和同一类熟练工人。我们为增进各部之间的合作所作的早期努力之一，就是拟具一项导致最后成功的计划。在彼得·贝内特爵士领导下成立了自动炮委员会，以便为所有使用者服务和防止他们之间的非生产性“竞争”，并随着这类武器渐渐可供利用，有了一个大加扩充的计划和一致同意的分配制度。

在1941年的头几个月中，比弗布鲁克和贝文之间关系之紧张感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这与其说是一种原则的冲突，不如说是一种个性的冲突。比弗布鲁克要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办事。“机构是随机应变的敌人”是他的一句得意的名言；这样一句印制的标语和他对委员会的谴责之词，并排挂在他的房间里。但是，当然，他的这些话不见得有一半是当真的。贝文对于自己认为是事关原则的事情也不肯轻易让步。他们的脾气和看法迥然不同。贝文尽管心地宽厚，能够了解一个普通保守党的政治家并能同他一起共事，却认为比弗布鲁克无从捉摸的性格是他难以理解的。反过来比弗布鲁克却忍不住要讥笑他的脚踏实地的对手，此人看上去常常是反应既迟钝而行动又笨拙。贝文是富有牛性的公牛；比弗布鲁克却是斗牛士。正如常常有的情形那样，真正争论的问题无几，而且都未始不可轻而易举予以解决。 128

这时，比弗布鲁克的健康也大有问题。后来我认识他之后，我才了解到他因之送命的气喘病对他的影响是多么严重。有时一连几天简直彻夜无眠。所以在5月1日比弗布鲁克辞去飞机生产部职务时，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感到意外。但是他依然作为国务大臣留在战时内阁中。约翰·穆尔一布拉巴宗奉派继任他的遗缺。

6月22日，德国发动了对俄国的袭击。从我们部里的观点来看，丘吉尔把英国视为俄国的盟国这一迅速决定导致了更进一步的需求，因为要用种类繁多的武器、军需品和原料去接济需要孔急

的俄国部队。丘吉尔是说干就干的。在德国进袭俄国的第二天，他就开始计划以一切可能的形式援助我们的新盟国。不到几天功夫，又宣布了内阁人事的大规模调动。利特尔顿离开了贸易部去担任驻节开罗的国务大臣，但依然是战时内阁的一个成员。邓肯由供应部转任贸易部，丘吉尔也说服了比弗布鲁克回来担任供应部大臣的那个活跃的行政职务。撇开他在解决围绕着坦克生产的很多问题上所作的贡献不谈，此后几个月将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活跃、最富有成果的一段时期。他变成英国在伦敦、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错综复杂谈判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代表。他去东、西方的访问将是具有历史重要性的。他成为大同盟中的一个重要枢轴。

比弗布鲁克的工作方法是特别的，方法尽管奇特，但却具有实效。他带进来很多亲信，其中有一些曾经在飞机生产部和他一起共过事。在这个生产坦克机构的上层管理方面，他作了一些迅速而果断的变革。一般说来，他实际上整个一天都不理会我们。在六、七点钟以前，我总能够料理我自己的工作，其他各部门的主管也129 也一样，一到六、七点钟就开始在大臣办公室举行会议。虽然看上去人人都同时发言，有点乱糟糟的样子，实际上很多事都迅速得到解决。其间供应一次很丰富的茶点。在九点或九点半左右，他常常请我们当中三、两个人同他一起到萨伏依饭店共进晚餐。后来他在部里设立了一个小小的餐厅。晚餐后继续工作：择重要问题，作出进一步决定。大约午夜或午前一点钟的时候，我们才散会。在我们惯常称之为“残夜”时分，大臣又应邀去唐宁街十号进晚餐。

“比弗”的到部，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战战兢兢的大事。这时，在1941年7月间，在战争进行了将近两年、在部里拼命工作了十四个月之后，我竟然和这位非凡的人物有了密切接触，朝夕相处，倒真是一件趣事。

这位大臣刚刚就职，就问我哪些工作是我认为刻不容缓的。我

对他说，撇开我们整个计划中一些不重要的改进和迫切感的增加不谈，我们主要的麻烦在于坦克和坦克用大炮的生产方面，我们对坦克必须有更好的保护装置和更重的大炮。我们一直在为丘吉尔式坦克——装甲舰队的主力舰——而努力，但是它仍在给我们很多麻烦，特别是在传动系统方面。如果沙漠中的战争再起，我们虽已相当不错地以轻坦克装备起来，但是我们必须有敌得过德国人的装甲车和武器。

十八个月之后，当我在北非的时候，我在日记里记了下述一段话：

著名的丘吉尔式坦克（费尽了心血加以改进的一种）刚刚在这里开始投入战斗，并且在昨天和星期一的关键性战役中发挥极好的作用。

在坦克之外，关于非常规武器也有不断的烦恼，特别是近发引信和不旋转的子弹。在发展这种武器方面，经常受到唐宁街十号的压力。克劳博士在这方面的活动是我们部里一个兴奋和焦虑交相混织的根源。制炮局局长和军械局倾向于对他的某些想法抱怀疑态度。在枪管中采用螺旋凹线毕竟在历史上已经是滑膛武器的一个进步。但是丘吉尔对这新的设想坚定不移的支持证明是不错的，好也罢，坏也罢，火箭总归成功地出现了。至于要在目标相当近的时候使子弹爆炸而还要保证发射安全，必须是怎样精巧的一种信管，在研究、改进和最后投产中会有何等在所不免的苦恼，自不难设想。但无论如何这些麻烦都是公众看不到的。

1941年6月29日比弗布鲁克勋爵奉派为供应部大臣。此后我就成为供应部在下院的发言人。迄当时为止，我在部里供职的短短期间所参加的最大最具有考验性的一次辩论，就是在7月9、10两日。我必须在第一天傍晚结束本部的发言。

讨论自行分成为两个不同的类别——有关供应部本身的问题和有关供应部为其中之一的各生产部的一般组织问题。我可以在



所提出的下述各点上给以很多详细保证——诸如我们的工厂开工可采用两或三班制；我们对熟练工人的有限供应作最具有战略性的使用，以便能最大限度地吸收非熟练工人；关于发订货单节省时间的方法；关于鼓励新的发明创造等等。关于下院极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政府机构问题，我以自己较低的次官地位，不能多所申辩。但是为了大事化小，我说，虽然据通常的说法，赋予飞机生产部的优先权在1940年初造成了某种混乱，但是关于这一点，我还不能作出定论。我继续说：

虽然我还没有能征询我的尊贵朋友的意见，但是我认为可以毫不迟疑地给委员会一个积极的保证，无论如何，从现在起，对飞机生产部的这种特别照顾不会再继续下去了。<sup>①</sup>

因为“比弗”仅在几天之前才接长供应部，所以下院认为这项保证是既令人满意，也令人欣慰的。

在主要论题上，我指出，向一个集中化的生产机构方面的发展  
131 在这段时期一直继续不断，事实上已经超过了人们所认识的程度。我们凭以发展这个趋势的方法计有三种。第一，由一个部代表所有各部进行原料的集中采购。人们似乎没有看清供应部除对陆军方面所负的责任外还负有多么重大的责任：

我们制造一大部分海军用炮以及一些供海军用的高射炮和备用枪身，供三个军种用的步枪和左轮手枪，一切自动步枪，和除少数例外，供所有三个军种用的一切轻武器弹药。我们负责一切子弹和炸弹的填料，供空军用的一切烈性炸弹，供一切发射火药用的炸药以及供所有各兵种和民用的车辆，包括，根据最近所作的安排，供私人自备车辆之用的备用部件。<sup>②</sup>

此外，我指出，供应部已经为空军和海军担任了一切毛织品、棉织

---

<sup>①②</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1年7月9日。

品,靴、鞋、内衣、手用工具、绳索和其他许多必需品的置办。我们采购空军的军装、军帽、被服、医药和外科用品以及帐篷设备。我们供应所有各军种供民防和野战用的钢盔。这是当时集中化的首先一个方面。

第二种方法是由一个部凭以代表所有各部(虽则合同依然以三个为不同兵种服务的各部的名义签订)进行设计的制度——不妨称之为集中控制的生产计划。

根据这种办法,供应部已经承担了车辆、起重机、静态内燃机和抽水机的责任。海军部则承办锚链。①

我解释了这样处理的产品的品种正在我所主持的委员会,即工业能力委员会之下不断增长的情况。我们每发现一个工业负担过重,就把各部门召集在一起,共同布置,由其中一个部门,往往是最大的使用者,代表我们全体负责计划生产。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发展之一就是自动炮委员会。 132

第三种方法是在卢埃林所主持的原料委员会领导下成功地进行了十八个月的原料分配。

我最后提到通过我自己主持的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业能力的分配。集中化正凭以成功的手段,事实上——即使不是理论上——是多种多样的。我以下述一段话结束了我的发言:

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要把全国的整个经济组织从一个为价格制度所左右的基础上转变到一切考虑都必须服从战争武器的最大限度的生产这样一种经济上来。②

那天傍晚我收到了下述一封信:

亲爱的哈罗德,

欣闻今天在下院的发言,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

①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1年7月9日。

对于这篇发言，我听到各方面一致备极赞扬，誉为议会中一篇最辉煌的杰作。

我在下院有这样精明强干、这样令人信服的一位辩护士，实不胜幸运之至。

你的永恒的朋友

马克斯·比弗布鲁克

这在比弗布鲁克是很典型的。在我和他一起辛勤处理重大关键性问题的那几个月里，尽管他那不知疲倦的工作和心劳力拙的身体对于种种高度的要求正应付不暇，而这种客套话却总还不厌其烦要重说一番。我越来越看出他怎样善于利用这套褒扬和鼓励的办法。在简单的讨论以及偶尔在全院规模的辩论中，我对所提出的质询案负责为我部辩护达一年以上。我们往往苦于下院的一个小小集团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公平的批评，更有时苦于报界昧于内情的责备，令人备极心酸。我第一次作为我部在下院的唯一代表，就要代表我部作一席长篇发言，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所以从  
133 我简直素昧平生的一位新大臣手里收到这样一封信，自是加倍高兴的。但这却是“比弗”独具的特性。

为了某种理由，丘吉尔却认为我们没有把来自常见的那伙人关于指派一个单一生产大臣问题的反对意见充分平息下去。自然无论布拉巴宗还是我都无权处理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战时内阁的成员方能这样作。所以在7月15日丘吉尔插手其事，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重申他以前常常提出的论证，反对把各部合并成为一部或在各部之上再指派一个高级大臣。在7月底的进一步辩论中，他还大力维护他的立场，但实行变革的时刻却已日益临近了。

我们集中全力于我们自己刻不容缓的困难问题还没有几天的工夫，新问题又发生了。1941年7月中旬，美国租借法案执行署

署长哈里·霍普金斯前来讨论由于俄国战争而影响拨给我们的租借物资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虽然美国依然处于和平状态，但是远东方面的阴霾密布，已经使它的军事当局越来越坚持他们本身的需要应享有头等的优先权。如果我们所期待得自美国的租借物资现在必须同俄国平分，或许几乎全部转让给俄国，那么我们的计划势必相应缩减，而且在某些场合下将无可救药地失去平衡。

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哈里·霍普金斯证明是一个具有同情心的、坚定不渝的朋友。比弗布鲁克这一次正如其他很多次一样，给予丘吉尔以可贵的道义上的支援。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丘吉尔那样倚重比弗布鲁克，为什么和他共事那样引为快慰。我想理由很简单。马克斯·比弗布鲁克尽管有许多缺点，却有一样显著的长处。他散发出力量、权威、决心和活力。在局势险恶或压力重重的时候，在盟国艰难困苦或作战不利的时候，他好像是用他自己生命的一种活力给丘吉尔的电池重新充电。果真如此，这正是对事业的一种非常可贵、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8月初，首相搭乘“威尔士亲王号”去同罗斯福举行会议，这是 134  
今后四年注定要举行的多次会议中的第一次。总统由他的亲信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陪同。这次会见的地点是纽芬兰的普拉森夏湾。为了要全面商谈美国对俄国的供应问题，他想到在旅途中有比弗布鲁克在身边会是有好处的，因此他要求比弗布鲁克参加，因为丘吉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生怕失去我们所期待和那样迫切需要的一切”。<sup>①</sup>说来奇怪，这样一来，指派一个生产大臣的长期争论问题事实上得到了解决，虽则采取最后步骤还要再等六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年年底，当美国人自己渐渐卷入这一全面战争时，作出

---

<sup>①</sup> 丘吉尔：《伟大的同盟》，第 383 页。



决定已经刻不容缓。我自己已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项结论：设立一位独立地总揽一切的大臣连同生产参谋部，已经成为必不可少。但事实上使问题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关头的，是外部而不是内部的压力。在1941年下半年，当美国虽则本身还不是一个交战国而蓄意要帮助俄国的时候，英国有一个独立的主管当局在一切必要的讨论中为自己的立场作辩护，是极其重要的。丘吉尔把比弗布鲁克找到纽芬兰去，正是这个长期辩论的问题接近解决的预兆。

丘吉尔是由海路走的，比弗布鲁克为要及时赶到那里只好乘飞机。近二十年来空中旅行的发展是那样的神速，以致当时这种长途旅行使上了年纪的司令官或政治家蒙受的紧张劳累之苦，在今天是难以想像的。那时轰炸机上的炸弹架往往是唯一可供旅客占用的地方。当时没有任何密封装置。在一万英尺以上的高空飞行，没有氧气是危险的，然而却并非总有氧气可供利用。高空苦寒，非大毛皮衣无以活命。飞渡大西洋又非有多次降落不可，先在爱尔兰，继而在冰岛，等到旅客达到的时候，很可能是衣冠不整齐、  
135 狼狈万状。可供选择的，还有南路一线，这一线要在百慕大群岛或后来的亚速尔群岛起落一次。对于一个有比弗布鲁克的那种久病之身的人来说，这类旅行是特别难以忍受的。

8月13日比弗布鲁克偕同哈里曼飞往华盛顿，直到24日才返回伦敦。比弗布鲁克鼓励美国人努力生产，“提高他们的眼界”，做了许多工作。他不顾所涉及的一切风险，极力主张给予俄国一切可能的援助。在9月中旬，他再度在哈里曼的陪同下登上了一次新旅程。战时内阁给他的训令是，商订一项对俄国部队的长期供应计划。他们经由海路自斯卡帕湾驶至阿尔汉格尔斯克，于9月底抵达莫斯科。

比弗布鲁克在莫斯科的磋商自9月28日持续到10月1日，

终于有了通称为议定书的一项文件的签字。<sup>①</sup>由莫洛托夫、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共同签署的这项协定是我们的圣经。我们保证认认真真、切切实实地予以执行。这的确是一项值得注意的文件。其中详细列明我们准备以英、美资源给予的一切援助项目。所加诸英国的负担大大的侵占了我们的武器、原料和必需品的储备。我们也有一些适度的反要求；但是美国和联合王国所保证供应的总数字确实是庞大的。甚至在9月会议以前，丘吉尔就已经同意送去两中队旋风式战斗驱逐机和其他供应品作为我们所要供应的一个象征性和预先的尝试。当然，从我部的观点来看，这些供应品是否用以供我们本国军事民防部队之用，或是否必须把它们交给俄国人，不是一个由我们决定的问题。我们的本分是生产物品。至于它们的分配如何决定，则在于我们的上级主管当局。但是这项新负担自然要鞭策我们作出新的努力，尤其是因为我们要每天同军事部门进行磋商。他们觉得，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这无异是在一片片地剥去他们的皮”。<sup>②</sup>

援助的发送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迅速。在10月6日丘吉尔就 136通知斯大林说，“周而复始的每十天派出一次的护航队”已经安排就绪。<sup>③</sup>二十辆重型坦克和一百九十三架战斗机将于10月12日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到11月6日将有多达二百六十辆的重型坦克、一百架旋风式驱逐战斗机、二百架战斗机以及若干勃伦式小战车、反坦克步枪和子弹以及发射两磅重炮弹的大炮一齐到达。经由波斯的另一批坦克和发自加拿大的一批托运物资已经装船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不顾及有没有美国的供应情况下，而从我们的库存中提供的。在我们想到日本越来越咄咄

---

① 如附录(一)所转载。

② 丘吉尔：《伟大的同盟》，第402页。

③ 同上书，第418页。

逼人和我们在远东不久必将面临的那些新危险时，这一长系列援助的第一批可说是既迅捷而又慷慨了。

至于如何逐项完成这一协定并决定用何种方法并在何时履行所承担的保证，却是我们的职责。供应部大臣为此目的所采用的程序是打破陈规的，尽管表面上混乱，但证明是迅捷而有效的。他将陆、海、空各军种的军官连同各有关供应部门的所有代表邀集到他的大办公室里举行大型会议。因为他欢喜以遥控的方法办事，所以他派我为各大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的组织者。在有关各部常务次官的帮助下，我们拟订了一项议事日程，而把主题分成为适当的特殊协议事项。高级文武官员都坐在一长排桌子旁边，有点像乡间的惠斯特牌比赛那样，共同讨论如何贯彻执行这些繁重的计划以及对我们处境的影响。像司仪宣布调换号声时那样，看到他们不时从一张桌子搬到另一张桌子上去。这种讨论要一连持续几天，或不如说几夜，如果我记得不错，从大约5点钟我们大家把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开始，一直继续到第二天凌晨。正常的程序是一直继续到9点钟领导人出去用饭，给其余的人端上三明治和其他小吃的时候为止。然后会议重新开始，在午前2、3点钟结束。

137 有一次提出了医药供应问题。这位大臣像茶会上的主人那样在一张桌子和另一张桌子之间走来走去，碰到大量的问题正在考虑时则偶尔过问一下。他向我问道，“谁承办这些事？”我回答说，“您承办，大臣。”他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说，“相干的，大臣。所有医药贮存都在供应部主管之下。”“我不相信，”他回答说。我坚持我的说法。“喏，不管怎样，我们该怎么办吧？”我说，“在您手下有一位非常精明强干的公务员承办所有这一切业务。”“他叫什么？”“他叫沃伯顿。”“现在哪里？”“他多半睡在床上。我没有料到今天晚上谈到这个问题上来，否则我原会预先要他等在这里的。”“那好，派人去找他来。”所以在下午9点半钟左



右，把大臣的罗斯—罗伊斯的小轿车及时派到那个官员所居住的郊区。我们休会进餐；在刚刚午夜过后各种会议已经进行到远远超出医药库存这个题目时，门开了，刚刚赶到的那个人被引进来。沃伯顿是一个非常干练但多少有点墨守成规的最优秀文职官员。平常他是酷爱整洁的，但是今天他被从床上拉起来，急忙穿上衣服，塞进汽车的，他那副衣冠不整的样子，使我想起童年时代我们常常穿着大衣，围着围巾去上“早课”以掩盖我们的服装不整的情形。“这是沃伯顿先生，”我说。比弗布鲁克勋爵以他那种照例令人倾倒的殷勤态度向他致候。“想喝点香槟吗？”“哦，大臣，喝香槟，时间有点晚啦。”“噢，不晚，给他来一点。喏，你看看这个单子。这些都是什么呀？”“这些特殊的项目，大臣，是安眠药。”“那些是什么呢？”比弗布鲁克说。“喏，”沃伯顿说，“它们通常分成三大类，又各分为不同的纲和目。在第一大类中很可以将镇定剂放进去。这些可以分成为……。”“天啊！请看在上帝的面上把他带走吧！再给他一点香槟！但是把他带走！我可真受不了！”这样又给了可怜的沃伯顿先生斟了一点香槟酒，把他匆匆带出办公室，送上罗斯—罗伊斯小轿车，凌晨时分在珀利下车。

比弗布鲁克再没看见过他，照顾英王的这位可钦佩的臣仆便是我的责任了，而且我也认为应该好好地待他。一切都很顺利。我们丝毫不爽地履行了议定书的这一部分，供应了包括使这位大臣大不耐烦的那一切药物在内的一大批药品。沃伯顿在和我的谈话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段插曲。我想他简直说不准究竟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还是一场恶梦。他可曾确实在黄昏后从他那宁静的郊区坐进一辆罗斯—罗伊斯小轿车，被送到部里，渴了几杯香槟又在破晓前三、两小时送回他那可尊敬的家中？也不清楚沃伯顿夫人的反应是什么。我想最好还是把这一切都丢在沃伯顿无意驱散的疑云里为是。这是在比弗布鲁克到职以后使得供应部里的生活



如此纷纭扰攘的小事故之一。但是这并未妨害在他手下供职的人们辛辛苦苦、始终如一的鼓足干劲，而他也决不吝惜自己，总是朝着自己的目标疾驱猛进。

读者只要浏览一下议定书，就会很容易地看出我为帮助处于危难之际的俄国人作出了何等惊人的贡献，承担了何等重大的牺牲。在那些漫长的日日夜夜，在那些各个部门埋首于精细审查的白昼，在那些辛苦讨价还价的长夜之中，我们终于就履行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代表团在莫斯科所承担的重担的时间表作出一系列的决定。但是事情并未到此告一结束。我并没有参加发送这一切供应品的设计工作，只有一、两次，由于比弗布鲁克缺席，我出席了为决定护航的组织问题而特别召开的由首相主持的会议。在所难免的惊人损失可以永远作为英国不惜以重大代价执行它所承担工作的诚意的证明。我们部的职责就是保证要有物资可供利用，但是在波斯铁路未发展以前，当时所可利用的唯一路线就是自英国至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海路，而把所有这些东西运至俄国一路所包含的危险，我们自不能熟视无睹。我们从来没有从我们悻悻然的盟国口里得到过一个谢字，可是这也并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从事于援

139 俄工作人员的热诚。

当这一切工作在进行的过程中，政府内外的压力继续不已。比弗布鲁克保持了他那种自扫门前雪的立场，部分是有意让贝文着恼，部分是因为他不喜欢让自己职权以内的事受到任何干扰。在这段期间我竭力排难解纷，因为作为工业能力委员会的主席，我负有效忠职守的双重义务。主要的争论之一是关于工人的分配问题。比弗布鲁克渴望达成他自己的目的，并且不是不想利用非官方的渠道。贝文对于他的“权限以外的和不正大光明的”活动，啧有烦言。我费了很多时间力图寻找各式各样的折衷办法。早在7月间贝文就曾反对过新任命的一位官员的活动，这个官员是比

弗布鲁克为在兰开郡自己作主招募监工而雇用的。贝文对比弗布鲁克说,这位先生努力的结果很可能“要造成极大的混乱和遗憾”。他补充说,“我们的官员已经讨论过,并且正在采取措施来整理这团乱丝。但事实依然是,这团乱丝我必须进行强有力地可能的干预。”<sup>①</sup>比弗布鲁克抱着顽童般的高兴心情把信交给我,要我作复:但是我只能设辞推诿,因为比弗布鲁克已决定利用他自己的招工组织招募他认为所需要的特殊工人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具有奉公守法精神的贝文特别厌恶的。

关于原料和机械工具的最后权限问题,发生了另一次争执。在这方面,无疑供应大臣是有义务代表所有各部门行事并公平处理的。历经秋冬两季,一直吵得不可开交。波特尔勋爵和我试图找出某种解决办法。我至今还保存着我们拟具的协议。但事实是,比弗布鲁克规避为讨论这些问题所举行的一切会议,而决心照他自己多少有点海盗式的办法去作。他是一个眼明手快的对手,总是比贝文抢先一着。

由委员会进行高一级战时生产管理的努力一直是显著成功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非变更制度这些问题就无法再处理的关头。真正需要有一个单一的主管当局了。议会内外要求作出决定的压力变得越来越有效,并且损害着首相的地位。在10月间,政府受到了猛烈攻击。因而在10月28日我送了一份备忘录给比弗布鲁克: 140

一个生产部(要包括劳工在内)是绝对需要的。

1.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需要。我们正面临困难的日子;下院和全国都不满意目前的生产安排。

2. 这是一个实际上的需要。十八个月来,我已经注意了(并且参加了)各种计划和各种规避根本问题的手法。我们所有的麻烦都是来自试

<sup>①</sup> 1941年7月25日函。

图以一些部际委员会来代替一个领导人。

一旦我们有了一个领导人，这个机构的所有其他部门全都会谐调一致地运行起来。这就是一切——除非还要加上这样一句话，在国内只有一个暂时可公认作为领导的人——那就是您自己。

对此，他作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答复，谦和但托辞推诿。

历经11月一个月，这种鼓动继续不已。在1941年12月8日，议会开会面对一个新敌人。紧接着珍珠港事件之后，英国宣布对日本宣战。国内、外都必须采取新的紧急措施。其中包括一项国民服役法案，这项法案是在12月提出并完成了立法手续的。事实上，这是一反贝文以前的一切声明，而建立一种等于不分男女的普遍强制性的军役和劳役制度。

如果在生产领域一项长久保持的立场必须放弃的话，那么其他的怎么办呢？难道辗转至今还不应赶快把权力集中在单独一位大臣的手里吗？

当这类讨论正在进行之际，在东方海域却遭到了损失两艘主力舰——“却敌号”和“威尔士亲王号”的沉重打击。我国人民现在对于陆上的挫败甚至灾难是习惯了，有史以来我们就一直不得不毫不畏缩地承担这一切。但是海上的败绩却是另一码事。我清楚<sup>141</sup>记得，在12月11日我们听到这项消息时那种苦恼得透不过气来的情景——不是失望，而是羞愧和几乎难以置信。

在沙漠方面形势一时有了好转。11月18日，奥金莱克将军多少有点勉强地发动了进攻。尽管在指挥官之间有一些混乱和争论，进攻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攻占了巴尔迪亚和哈尔法耶，俘敌一万四千人。但我们的优势只是昙花一现。到1月底我们遭到一次严重的挫败。又一次据说是罪在我们的坦克。

自12月中旬至1942年1月中旬，比弗布鲁克一直留在美国。他回国之后，我警告他说，我所预见的政治形势现正在发展中。报

界和公众变得越来越惴惴不安。贝文和比弗布鲁克之间的争执已经是家喻户晓，应该采取行动使之告一结束。我越来越相信一个生产部现在是必需的了。所以，在近1月底的时候，我在大臣的许可下，散发了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备忘录，这被研究战时生产的历史家描述为：

这项建议的立场在于使供应、飞机生产、造船、工程和建筑、甚或其他各大臣一并隶属于一个新设的高级大臣之下。（负责造船的大臣将是海军部的一个文官大臣。）生产大臣接受国防委员会的计划，他有权管制生产各因素——原料、工具和劳工——并分配给所属的各大臣，由各该大臣负执行计划的直接责任。这个部的工作班子基本上是由随着管制权一同移交来的和调自劳动部的工作班子所组成。这个组织的基础是由调自供应部和战时内阁秘书处的的工作班子所建成的一个计划班子。麦克米伦先生的建议，原来只不过是设计一个最后的新生产管制制度的复杂而又牵涉面很广的试图中的第一个。<sup>①</sup>

这自然会导致和贝文的正面冲突。但这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sup>142</sup>而且必然是，这个职务要末由比弗布鲁克担任，要末就由贝文来担任。

同时，我开始向比弗布鲁克力陈，接受生产大臣一职是他义不容辞的。在珍珠港事件和美国参战之后，尤其紧要，因为美国参战，我们两国之间在战略和供应方面的全面合作就刻不容缓了。为了这个目的，两国政府不久就一致同意成立“英美参谋长联合会”，机构设于华盛顿，英国海、陆、空三军参谋长都派有代表参加。在军需品供应方面，由美国指派一人——唐纳德·纳尔逊主持全局。所以我们也必须有一个负责英国生产的整个事务，以便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代表英国并以纳尔逊相同的地位行事。

此后两、三天证明是决定性的。在2月2日夜间，比弗布鲁克

<sup>①</sup> 斯科特和休斯，前引书，第431页。



告诉我说，他有意接受生产大臣一职。他整个新职权的范围是一个尚有待于决定的问题。他想把战时运输包括在他的职掌之内，而这也多半是莱瑟斯勋爵所会同意的。劳工是另一个问题，依然还没有解决。2月4日，在议会宣布了生产部的成立和任命比弗布鲁克勋爵担任该职。安德鲁·邓肯爵士回任供应部大臣。一个长期的争论就此告一结束，而议会的压力又一次获得了显著的成功。诚然，计划从未全面完成，要这个新部了解本身的职责还需要另一年的时间。官方历史学家又一次正确地分析了这种形势：

在这期间，新机关的概念从麦克米伦先生提出的那种概念第一步改变为这样一种概念：不是顺着一个部的路线而是顺着一个扩大了的大臣私人办公室的路线来配置班底的一个协调单位，第二步才改变到既有一个主管部的因素，又有一个协调单位的因素这样一类的机构。<sup>①</sup>

143 比弗布鲁克还告诉我说，他将不能在下院派有代表。因为他的职务是监督性质的，所以他将只由一个小小的但专门性质的工作班子而不是由一个通常部的全班人马予以协助。如果设有一个政务次官，会在其他各部之间造成猜忌。将要作出的安排是，以供应大臣之一于必要时代表他答复询问和发言。这使他感到非常难过，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在一起共事了。但是他已经和丘吉尔谈到我的前途。丘吉尔也已经同意任命我到由上议员担任首长的机关。第二天早晨，丘吉尔派人来找我。他向我说明了已成之局，并要我去殖民事务部担任政务次官。因为莫因勋爵主持部务，所以从议会的观点来看，我和目前的安置并无不同。此外——并在我大为感动之下——他告诉我，他打算建议把我派到枢密院。在这个时候，这是给予一个低级大臣一种不寻常的殊荣。

我向大家一一辞别，最后在1942年2月5日离开了供应部。

---

<sup>①</sup> 斯科特和休斯，前引书，第432页。

这样就结束了自 1940 年 5 月丘吉尔政府最初组成以来持续至今的一段试验性的、吃力的、挑衅性的工作。

但是天啊，困难并没有解决。在此后两个星期中，比弗布鲁克几次要见我。

曾经商定，暂时仍由我继续担任工业能力委员会主席的工作，所以有些事情我不能不征询他的意见。他已经搬到唐宁街十二号，占用了一向由保守党督导员使用的那个大房间。他的面容使我既难过而又愕然。他平素的热情和精力似乎已经把他的心血耗尽。在这些日子里他是一个茕茕孑立、殊可怜悯的人。关于战时运输部他没有任何困难，因为大臣莱瑟斯勋爵欢迎有机会在他的全面监督下工作。但关于劳工问题的斗争却不顺手。贝文拒不听命，而贝文在内阁、在下院以及在政界的势力都是比弗布鲁克望尘莫及的。他在工党中是一个比它的正式领袖艾德礼更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弗布鲁克告诉我说，他要末就同意某种协议，让贝文继续主持独立劳工部，要末就丢在他手里。尽管为把劳工分配的管理权置诸生产大臣之下，我曾以合乎逻辑的论证麻烦了他几个月，但是我极力劝他不要把他的要求坚持到走极端的地步。

144

有些历史学家把这件事看作是一件单纯的政治权力之争，丘吉尔即使想要争取他的朋友比弗布鲁克的继续合作，但也不能公然反对拥有大批追随者的贝文。<sup>①</sup>在另一方面，丘吉尔把比弗布鲁克在担任了仅仅两个星期之后就终于辞去他的新职看作是他的身体完全垮台的结果。他不认为他能应付他所承担的新的重任了。

按照我对比弗布鲁克在这段兢兢业业期间的举止容貌的记忆，我深信丘吉尔对他所以显然心神不安、游移不决的解释是真的。比弗布鲁克已历经了二十个艰难月份的极度紧张生活。他在

---

<sup>①</sup> 泰勒：《英国史，1914—1945年》（English History, 1914—1945）（牛津，1965年版），第 543 页。

飞机生产部的勤奋工作几乎是难以想像的。他最近在战时旅行艰苦条件下的几次华盛顿和莫斯科之行，已经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他的气喘病日益加剧。他的身体已经太虚弱，支持不住他精神的火焰。我敢说，如果他身体健康，一则由于他对丘吉尔的忠诚，一则出于他的责任感，我原会勉为其难的。事实上，他在2月10日已经接受了和贝文就劳工问题所商订的一项折衷方案。但是他觉得需要安静和休息。九天之后他辞职了。就我来说，我们的正式合作本来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告一结束，但是在公布比弗布鲁克辞职的时候，我还是不胜其忧伤。

我知道比弗布鲁克离开政府会是他的敌人所欢迎，他的朋友所惋惜，而为一般公众所误解的。在这些月份中我已渐渐对这位奇人有所了解。虽则他是一个类乎莫名其妙的人物，但他却一贯是令人振奋的。虽则他的性格有令人不快的一面，但也有令人倾倒的其他方面。在我为他效劳的时候并且直到他临终，我所得之于他的唯有友情而已，而且不求以任何形式给以任何报答。或许我是幸运的，但这是我的经验。

## 第六章 新盟国

146

在 1941 年这一年之中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除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影响外，还给现代世界的结构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烙印。其中的第一件就是希特勒决定在 6 月 22 日对俄国发动全面进攻，即“巴尔巴罗萨军事行动”，既没有提出警告，甚至也没有通常的借口。德国在辽阔战线上对俄国的入侵引起了一系列战术和战略方面的发展，这非但决定了战争本身的性质和结果，而且决定着此后欧洲生活的形式。同样，12 月 7 日日本对美国驻珍珠港舰队奸狡的袭击，使美国勉强而又无可避免地不仅参加了对日战争，而且参加了对德战争。这时，美国开始并且从此再没有放弃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

到 1941 年年底，已经可以肯定，德国尽管有庞大的军事和经济资源，它迟早必会屈服于英帝国、俄国和美国的联合力量之下。日本的战败也必将相继而来。然而，在能够赢得最后胜利之前，还须饱尝忧患和损失以及战事起伏之苦三年以上。但是在我们先同俄国，继而同美国结盟之后，我们对于最后的结局已不再有丝毫怀疑。正如丘吉尔正确地认为，尽管我们过去的道路漫长而艰苦，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尽管在我们的前面还有许许多多劫难，还有不可估量的损失和困苦，但是对于结局，已不再有任何怀疑了。”<sup>①</sup>

然而，我们虽得释重负，可堪庆幸，但是我们却无法摆脱不可避免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开始时我们欢欣鼓舞，所想到的只是补

<sup>①</sup> 丘吉尔：《伟大的同盟》，第 540 页。



147 充我们的军队。随着岁月的推移，我们才开始理解世界新力量平衡的全部含义。我曾经描述过的本世纪开始阶段的革命性变化<sup>①</sup>，现在要加速地发展下去了。

同俄国的结盟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直接问题。虽然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府所犯的错误，比之战前的西欧各国政府，有过之无不及，但是英国人民由于意识到他们自己的过失，却轻而易举地忘记了过去。因为斯大林象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家一样，也曾经听任德国把那些对本国国防有唇齿关系的国家一一蚕食尽净。诚然，他曾经从两年前所缔结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秘密条款中得到了不少好处。他曾经尽量利用这个机会来改进俄国在一些敏感地区的战略地位。他曾经参加了对波兰的第四次瓜分，也曾控制了波罗的海各国，并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以人力和物力而尤其是以威望方面的重大损失为代价，从芬兰方面取得了扼列宁格勒要冲的芬兰湾北岸的大片土地，实质上扩大了其防卫地位。然而在整个这段期间，俄国一直是以愈益增加的规模供应德国以物资和军需品的。象很多自己不太有所顾虑的人们那样，斯大林对于别人所踌躇顾虑的，竟然不可思议地轻信不疑。他似乎直到最后片刻还相信希特勒会遵守条约。当时并不乏前车之鉴，而且是来自多方面的。但是，象张伯伦一样，斯大林坚持自己的姑息政策；也象张伯伦一样，一旦明白自己一直为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所蒙骗，就不禁勃然大怒。

甚至在德国正移师东指，大军压境的时候，来自远东的快车还在赶运供应德国的橡胶，直到发动进攻的前夕。<sup>②</sup>（这些供应随即不得不由英国以资源的极大牺牲为代价予以弥补。）斯大林生怕开罪他的德国朋友，证据是够多的。在1941年5月间，比利时、挪威

① 见本书第一卷《风云变幻》。

② 德国陆军部托马斯将军的说法，转引于丘吉尔的《伟大的同盟》，第326页。

以至南斯拉夫的使节都被一一逐出俄国首都。伊拉克亲德的拉希德·阿里政府却得到承认。德国军队在俄国边境上的大规模部署，这原是逃不过侦查的，然而迟至6月14日还发表了那条著名的塔斯社电讯，否认了英国和外国报纸上盛传的关于苏、德之间战争迫在眉睫的谣言。声明补充说，“尽管这些谣言显得荒谬无稽，莫斯科负责方面仍认为有必要指明这些都不外是一种笨拙的宣传伎俩。”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斯大林认真打算把他和希特勒的协定变成为一个甚至更加牢固的同盟，是难以估计的。如果说来自乌克兰和俄国其他地方的大批供献品对于维持德国的经济已成为必不可少，那么几乎没有什么疑问，只要德国用和平的方法，加上剑拔弩张的威胁，这些都未始不可稳拿到手。俄国将是有求必应的。俄国人俯首贴耳到了怎样的程度，莫洛托夫对于德国宣战所发的如怨如诉的不平之鸣，乃是一个重要的揭示。他向德国大使说，“你认为这是我们应得的报偿吗？”这是真正姑息求安的言词。

但是斯大林听任俄国军队为敌人优势兵力所击溃、听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几乎为敌军所侵占的错失，却被认定因辅助战线的巴尔干方面局势的意外转变而被冲淡。这甚至也许是“巴巴罗萨军事行动”所以从5月15日推迟到6月22日的原因。无怪1941年3月南斯拉夫的武装政变使得希特勒勃然大怒，因为这样一来，他就不能不把原定用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部队调去应付贝尔格莱德的局势了。无怪他不停地抱怨他的意大利盟友的无能，迫使他不得不分兵希腊去援救他们。实则英国决定调派军队去担任援助希腊这一几无成功之望的任务，也许起了作用。

希特勒也许认为，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英国有些部队要让他们友好地紧握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的血手，可能会踌躇不前。果真如此，那么低估了对事关生死存亡的切身利益问题那种在我国具

149

有传统性的实事求是态度的，希特勒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英国举国上下响应丘吉尔的倡导是毫不踌躇的。自然，极左的共产主义者或半共产主义者对于这种新形势的反应更是迅速的。中左派由于1917年沙皇制度的崩溃而赢得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制度，他们也为一种同情心所支配。至于保守党人，不管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实践的厌恶如何之深，但是要认为他们愚蠢到对于德国因为同他们昨日的盟国进行殊死战而大约要有一百二十个师被牵制住这一前景不表示欢迎，那就未免太低估了他们的智慧。当一个凶手扼住你的咽喉时，不管是谁，他参与解救，你总不会想再去议论他的道德品质。我们在这个时候自然不理睬这些新的集团的种种复杂情况。把俄国人作为我们的同盟是否全然合乎我们的胃口，不是问题所在。在我们孤立无援之中，这显然是天赐之幸。英国人民所抱的唯一疑虑，以及消息灵通的军方也抱的同一疑虑，就是俄国军队能否抵挡住德国的猛攻。由于他们在芬兰的冬季战争中表现得很差，以致对于他们的真正价值有所低估。何况，一般的看法是，三十年代斯大林的清党已使俄国军事系统陷入混乱。这也许正是俄国人所以认为姑息政策是不无理由的。正如慕尼黑的支持者以争取到了另一年重整军备的时间为词进行辩解一样，类似的辩护之词后来也在共产党人中间加以发挥，用来解释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希特勒也可能是错估了清党影响，并认为芬兰战争显然失败。

在那关键的几个月中，我们所主要担心的不是关于我们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合作的一些长期纠葛，而是俄国能否倖存。在12月的前两个星期，对莫斯科的进攻已开始停滞下来，而且俄国人甚至也能发动几次反攻。在这期间我们是尽了极大的努力给以一切可能的援助，以致我们眼前的实力显然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因为美国在它本身需要以外所能生产的一切军需品原来都是许给我们



的，所以当时美国供应俄国的一切都是我们所期待的东西。当然，从长期看我们还是大有所获，但是在短期内我们却是冒着新危险，要凭着我们将缩减了的力量去进行我们即将面临的重要战役。

我们眼前的负担是繁重的。撇开大量供应品——大炮、坦克、军火和各种库存——不谈，还负有遭受惨重损失的艰险的护航责任。可这并没有得到俄国人方面多少显见的感激的表示。甚至1942年夏季PQ. 17号护航队的惨遭不幸，从冰岛开出的三十六艘船只中竟有二十三艘沉没，全部船员葬身冰海，对此莫斯科方面都没有给予多大的同情。因为时值仲夏，北路航线只有白昼而没有黑夜，危险太大，所以护航队不得不推迟到9月。但这一次仍未能免于新的损失，PQ. 18号护航队的三十七艘船只中，损失了十艘。

但是英国人民，即使在看清了我们的盟友对我们为了供应他们而作出的这些巨大努力所抱的这种以怨报德的态度，不管他们是由于对于所涉及的海军问题的无知，还是由于随便什么原因，他们仍然对于希特勒的另一个敌人对我们所作的贡献采取现实看法。有些人也许曾经寄望，支配俄国政策的那个根本目的将由于这一新的联盟关系而有所软化，但是在胜利之后苏联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仍同样成为在亚洲和欧洲扩张的双刃武器。

苏联政府由于对本身以外的所有其他民族缺乏了解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所以马上就提出了开辟“第二战线”的要求。在他们看来似乎第二战线并没有在1940年夏季随着法国的崩溃而告消失——他们曾经目睹这种事态的发展而并无任何明显的不安或沮丧情绪，虽然毫无疑问他们未始不会宁愿看到西欧各国长期陷入相互毁灭的斗争之中而不能自拔。激烈的反英宣传一直继续到差不多德国发动进攻的那一天都不曾稍有减轻。然而他们却开始大



喊大叫，要求立即袭击法国沿岸，或者，以调派二十五个师去阿尔汉格尔斯克这样一个办不到的、轻率的计划作为代替！他们在英国的朋友立即随声附和，给政府造成日益加甚的困难。我们的左翼政治家，包括共产党人，当他们自己的国家孤立无援、险象环生的时候，很不情愿尽一臂之力，一旦苏俄受到希特勒的袭击，态度却幡然两样。直到那时为止，他们一直是中立的，即使不是亲德的；然而一声令下，他们就来了一个漂漂亮亮的“向后转”。他们不但变成为反希特勒战争的志同道合者，而且要求立即采取救助俄国人的军事行动，而对于其中的困难却完全心中无数。正如斯大林和他的部长们对于以大军横跨波涛汹涌的海洋、面临固若金汤的海岸进行登陆的问题始终毫不理解一样，这些鼓动家也同样不理解对于时机毫未成熟而就想向西欧发动进攻将遭到的无可避免的损失。幸而丘吉尔既有勇气也有决心顶住这些压力，无论是来自他的俄国新盟友的，还是来自英国这些幡然改变主张者流的。

但更加困难的是随即发生的一些政治问题。第一个，也是最微妙的一个，就是波兰问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导火线的，毕竟是我们对波兰的保证，纵非根本原因，那么我们怎样接受波兰的第四次瓜分和解体，怎样接受数十万波兰人的放逐和加诸波兰一切生活传统的损害呢？流亡的波兰人，随着压力开始增加，自然是满腹狐疑。虽然英国，以及后来美国，抵制了苏联所提出的立即承认新形势的要求，但是结果我们却无力在波兰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战争结束时，波兰的悲剧将是胜利的美丽面庞上的一个污斑。

152 俄国坚持要求彼得大帝的边疆寸步不让，这立刻导致了波罗的海各国的一并消失。在这方面，丘吉尔和罗斯福，不顾巨大压力，再度在原则上屹立不动。但也正是在这方面，前此独立的那些民族的被吞并和布尔什维克化，在实际上不得不予以接受。

最后，芬兰问题。我们简直不知道芬兰所受的压力是如何沉重，甚至在莫斯科和约之后也并不稍减。这个小小的芬兰民族对俄罗斯巨人所进行的英勇抗击，使英美两国人心为之激动。但是在胜利之后，苏联政府因不满足于条约条款，始终不减轻他们的敌视态度或他们的要求。他们否决了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的组织（顺便提一句，这未始不会证明，后来对他们是有利的）。1940年8月间他们正式兼并了波罗的海各国，这使芬兰人大为惊慌。6月间他们要求得到原不包括在条约以内的芬兰人从汉科撤走的装置。他们开始击沉芬兰商船。他们要求归还从卡累利阿搬走的芬兰国家财产。他们坚持把一个叫作韦诺·坦内的精明强干的有魄力的社会民主党人驱逐出政府。

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1940年这一年之中，因此芬兰人屈从于德国方面坚持假道芬兰进入被占领的挪威的权利要求，即1940年9月缔结的所谓过境协定，也就不是什么出于意料的事情了。1941年初，俄国人切断了对芬兰人的一切供应，这样就迫使他们不得不为经济生存而完全依赖德国。所以芬兰政府感到面临一种苦痛的进退维谷的局面。他们竭力保持中立，并且以此通知德、俄双方。然而，战事爆发了。芬兰人拒绝参加对列宁格勒的袭击和围攻，但为谋求一条更好的防线，想推进到东卡累利阿境内。如果他们至少接受1939年的边境，那倒未始不是明智的。丘吉尔再一次尽了他的最大努力。他给曼纳黑姆元帅一封私函，试图说服他守在旧防线上，而不要为乘机取得东卡累利阿的试图所诱惑，尽管芬兰人所具的雄心是有充分根据的。英国政府，虽然深具同情，但最后还是决定服从看上去是更大利益的目标——打败希特勒。 153

这样，1941年12月使我极为苦恼的事——英国对芬兰宣战的事情发生了。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宣战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它的唯一的目的是安抚俄国人。但这种姿态是必要的吗？美

国政府并没有撤出他们的外交代表,并且在战争过程中,尽力帮助芬兰摆脱战争。最后,在1944年7月,高潮迫临了。当德国人开始退却时,芬兰人几乎被丢在那里无人过问。俄国人对他们发动了新的大举进攻,但是象在1940年冬季一样,他们以同样的英雄气概予以击退。这时,被劝而相信有脱离接触必要的曼纳黑姆元帅竟能创造一种军事形势,终于凭以商订了一项虽则令人怀恨而伤心,但还不是丢脸的和约。<sup>①</sup>结果是1944年9月的停火。条约尽管苛刻,所要求的赔款尽管负担沉重,芬兰总算清偿了它的债务,并成功地维持住它的独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来的所有毗邻各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都被一一吸回俄国的庞然大物之中。波兰已为共产主义制度所支配,尽管有近年来意义深远的发展,依然不失为俄国的一个卫星国。在所有这些国家之中还只有芬兰保持住了它的自由。

在开头几年中,尽管俄国人作为盟友很难相处,尽管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依然是胸襟狭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瞒过了英国公众。政府为了务其当务之急,也不能加以指责。任何形式的西方文明的幸存都取决于能否打败希特勒,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几乎什么都不得不牺牲。然而纠纷的种子已经播下。前途的危险在我们领导人的心里也无时或忘。在1942年6月间俄国人的领土野心如何使他万分焦虑,以及随着战争的继续,压力又如何与日俱增,丘吉尔都一一笔之于书。<sup>②</sup>美国人民,由于他们易于冲动的特性,变成了热心的亲俄主义者,同情的浪潮遍及全国。对于俄国军队英勇顽强所怀的敬佩,在美国部队中特别强烈。虽然国务院提出了芬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问题,但是总统自己却开始产生政治家所

---

<sup>①</sup> 曼纳黑姆元帅:《回忆录》(Memoirs),莱文豪普伯爵译(伦敦,1953年版),第491页及以下。

<sup>②</sup> 另参看本书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第14页。



常有的一种幻想，认为凭他自己的某些特殊才干，也许能“驯服俄国熊”。他在1942年3月18日致首相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

在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谅已得到关于我和李维诺夫会谈情况的通知，我希望不久会得到斯大林的答复。由我亲自来对付斯大林会比您的外交部和我的国务院要好些，我这样毫不客气地向您坦率直陈，我知道您不会介意。斯大林憎恨您的所有高级人员的那副心肠。他认为他比较欢喜我一些，我希望他能这样长此下去。<sup>①</sup>

他越来越沉迷于这种幻想，而这在战争的结束阶段，将要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

纵使希特勒对俄国的进攻及其失败标志着战争的转折点，但无论如何，英美两国承认俄国为一正式盟国却“决定了今后多少年世界的命运”。<sup>②</sup>

尽管在1941年夏秋两季日美关系已日趋恶化，但是象对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这类的事情，却是任何人——尤其是美国三军首脑——作梦也是想不到的。对他们来说，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晴天霹雳。但对我们来说，则无异是天赐之福。

美国曾经同日本在华盛顿举行过旷时费日的谈判，并且一度像是可以达成某种临时性协定。日本人自然希望自己能不冒太大的风险而将欧洲的战事加以利用。他们早已夺取了法属印度支那，并且急于想使他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胜利结束。支配日本政策的种种处于微妙平衡的势力，久已悬于一发。1941年7月间美国政府实际上禁止一切对日正常贸易的决定，早已为英国政府和荷兰流亡政府忠实奉行了。然而自从这项禁令适用到石油供应以

---

<sup>①</sup>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命运的关键》（伦敦，1951年版），第117页。

<sup>②</sup> 泰勒：《英国史，1914—1945年》第529页。



及其他大多数原料，日本就面临有逐渐被扼杀之虞的局面。最能促使一般认为持稳健政策的日本海军同意采取冒险手段的，乃是石油的禁运。

历经夏末和整个秋季，英国政府的忧虑与时俱增。俄国可能被打败，希特勒可能又回过头来放心发动对英国的最后猛攻。我们远东的属地受到日本方面可怕的威胁。然而我们除追随美国的政策以外，别无任何选择。我们为了在欧洲方面继续把仗打下去，毕竟大部分要仰赖于美国的积极援助。我们知道总统和他的左右是对我们表同情的。因为罗斯福察觉希特勒及其种种梦想的危险性已有多多年。他曾经极其高明地对因袭传统的孤立主义的国会和人民谆谆善诱。他曾经一步步地说服他们对中立法作有利于英国的修改或容许他为了照顾英国而予以漠视。他曾经实现了以西印度群岛的基地交换五十艘驱逐舰的办法——船只虽已陈旧，但对我们的需要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他曾经守卫半个大西洋，严防德国潜艇。他曾经以租借法案解决了我们迫切的财政问题。然而他决不是全能的。国会仍然疑虑重重。在通过或恢复强迫兵役制方面曾经遇到了最大困难。所以丘吉尔不能不小心翼翼。他决不能显出是图谋把美国人骗进战争；因为对于一个美国政治家所能提出的最难堪的指责，莫过于说他受了狡猾的“英国佬”的阴谋诡计的诱骗。

所以在美国舆论因日本侵犯中国领土而大为激动的时候，我们要想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是有困难的。未始不可这样论证说，  
156 在日本政府不知不觉陷入的那种局势中，7月的禁运几乎迫使他们不能不在某一方面冲破这道紧箍咒，除非他们准备接受美国的条件——也就是撤出中国大陆。<sup>①</sup>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在欧洲

---

① 泰勒，前引书，第531页。

和中东既然那样深深陷于存亡攸关的战斗之中，那么在远东方面稍存姑息对我们不见得会有什么害处。然而我们不敢提出任何势必招致美国政府和人民道义上谴责的办法。但是假若日本要对荷兰或英国的领土发动突击，那么美国政府将会怎样呢？丘吉尔一定认为他了解他的朋友罗斯福总统打算怎么办的。但是（美国国会）又会容许他怎么办呢？丘吉尔在伦敦市政厅大会堂的演讲中（11月11日）声明，如果美国无法确保太平洋的和平而卷入对日战争，英国将紧跟着在“一小时以内”宣战。不错，但是如果美国不卷入，那怎么办呢？如果日本足够明智，只以其本土已沦入希特勒掌握的荷兰以及当时看上去前途茫茫的英国为牺牲而寻找自己的出路，那又怎么办呢？美国人无论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都没有作过任何表示。没有提出类似丘吉尔声明的任何声明作为保证，无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

这些可怕的焦虑因珍珠港事件而涣然冰释。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被炸毁的确是可悲的，并且对于美国生产所提出的弥补损失的要求也相应地产生影响。但是无论如何日本的袭击决定了和与战的问题。全体美国人民因在他们看来甚至连正式宣战这个过场都没有走的一种卑鄙的、背信弃义的突然动手的举动而义愤填膺。丘吉尔自然毫不迟疑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在内阁的正式同意下声明英国立即对日宣战。

但是还有我们大家担心的另一个危险。现在德国将会怎么办？希特勒决不会特别欢喜日本人，因为他们尽管对德意两国承担着一般的义务，但是自从俄德战争开始以来，日本人一直按兵不动，袖手旁观。现在我们了解俄国人对于日本人的最后决定是如何忐忑不安。当他们确实获悉日本政府尽管有来自极端分子方面的压力，但是仍决定保持中立，或者——如果他们决定发动战争的话——宁选择太平洋而不选择西伯利亚时，这被认为是他们特工

人员的最大胜利之一。<sup>①</sup>所以德国对于它的盟友在夏季时的踌躇不决一定是心怀不满,因为如果当时日本对俄国采取牵制性进攻,哪怕规模有限,也未始不会产生决定性后果。由于这种种缘故,对于希特勒到底打算怎样办,就拿不准了。虽然如此,我们的一切疑虑都一扫而空了。美国是不可能——即使它曾经想——坐视日本人进攻马来亚或印度尼西亚的。我们幸运的是,美国本身成为日本最野蛮侵略的受害者。而德国不管华盛顿的态度如何,就决定以对美宣战来支持日本。一位近代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希特勒的宣战是一个无实际意义的空洞姿态…〔它〕对英国的贡献却仅次于珍珠港事件。”<sup>②</sup>罗斯福以及和他抱同样想法的那些人的踌躇观望就这样一扫而光了。他们清楚了解他们的同胞以美国孤立主义旧传统为依据的中立思想的力量;他们也知道无端对德宣战将要遭到的强烈反对。现在,日本和德国却都主动先对美宣战。面对这种事实,美国人民,一旦事成定局,就将以他们历史上每遇重大危机所一贯表现的那种激昂和顽强精神,团结起来。

比他大多数同胞都更有远见的罗斯福总统,久已认清,由于现代世界情况的演变,美国外交政策的旧有概念已渐渐陈腐过时了。虽然还有很多人死抱住这样一个传统不放,即认为新大陆应尽可能避免牵连进旧大陆,而比较开明的思想家却已经开始认识到,自  
158 从拓荒者时代以来,世界已经缩小了。在过去,乘帆船甚或汽轮横渡三千英里海洋的长途航程,就是一个实际上的壁垒和一道强有力的防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部分由于德国政策的愚蠢和潜艇战肆无忌惮的扩大而不顾及中立国的感情,致使美国在战争快要结束的阶段介入战争。但是美国人纵使起了作用,却也起了

---

① 迪金和斯托里:《理查德·索尔格案》(The Case of Richard Sorge)(伦敦,1966年版),第218页及以下。

② 泰勒,前引书,第532页,注①。



很大的反作用。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谈中以领袖自居的企图是不得人心的。由于顽固不化和爱好虚荣,这两者可悲的结合,使他未能得到参议院对条约的批准,或同意美国参加他所大力提倡的国际联盟。这样,孤立主义的传统,连同适合于一个殖民地和发达国家过时观念——高关税、保护主义、重商主义——重又得到确立。罗斯福曾目睹美国经济的崩溃,而要把美国经济同欧洲和世界繁荣的一般形势分割开来,那是不可能的。孤立、与世隔绝和分离主义——这一切都开始失势。虽然如此,美国人民是那样不情愿再一次卷入欧洲的斗争,而那位或许是当代最重要政治家的罗斯福,只是靠了最巧妙的筹谋划策,方能一步步假患难中的英国人民以援手。如果没有日本方面的袭击及其种种后果,他是否能使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参加第二次对德战争,是殊可怀疑的。对于远东方面的危险,美国人却比较敏感。他们对其未设防的西海岸的脆弱也许是提心吊胆的,但是现在,由于德国的行动,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却被不由自主地拖入欧洲战争了。

英国受惠于罗斯福的确实不少。丘吉尔自战争开始之日起就竭力争取总统的信任。他同他的书信往来开始于1939年战争爆发之后。他,作为海军首席大臣,对于罗斯福决不隐瞒自己的任何思想和我们所面临的任何问题。在他担任首相以后,这类联系就更为加深,更形密切了。然而罗斯福的反应却决不象丘吉尔所想像的那样热烈,那样豪爽。在他的灵魂深处确存有使他对英国政策抱怀疑态度的偏见。尽管有他表面上的所有那些诚恳和魅力,在友谊的外貌背后却存在着对这个古老的伟大帝国往事的一种仇视的——甚或嫉忌的——思想感情。英帝国在他看来是一个吓人的怪物。他没有任何确切的了解,就订下了关于印度和殖民地事务的清规戒律;而清算英帝国,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却是他的目的之一。这样的一个事例可从对我们不断施加的



压力中看到，他一再要求我们结束优惠制度和削弱帝国凭以团结一致的一切关系，不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感情方面的。

我常常注意到，在美国，尤其是在新英格兰最老的家族当中，对“殖民主义”的那种固有的反感是最明显的。对英国抱怀疑态度也许是由于一种不自觉的、几乎是追溯往事来赞赏历史的结果。例如，我有几位波士顿的朋友似乎永远不能忘记关于那些箱茶叶的不幸事故。不管怎样，总统对于英帝国不是友好的。看来他并不了解那样一个明显地阶段分明并稳步地循序渐进的程序，根据那个程序，我们久已计划定要以渐进的方法先给我们负有责任的那些种族以政治教育，然后再给以政治独立。在几乎每一项有关政策的联合声明中，内阁都审慎并尽可能取消某些危险性的词句。这种往往带来不幸后果的成见扩展到了很多国家的君主体制。

在同盟的初期，这种情况大部分是隐伏未现的。同总统和首相之间的愉快合作相配合的幸而有一套机构协调一致运行，那套机构是他们为处理军事行动或供应方面的同盟事宜而筹设的。为制定全球战争的军事和经济方针，在英美参谋长联合会和联合委员会中成立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以两个民族从未有过的谅解和效率发挥其作用。

所以，英俄同盟给我们带来了受人欢迎的牵制性进攻，而英美  
160 同盟则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几乎兄弟般的合作。对我来说，因为有美国的血统，那是极其令人兴奋的。但愿我的母亲能依然健在，亲眼看到她寄籍民族和她原籍民族的希望和抱负合而为一，并以此自豪。

随着战事的进展，随着美国武装部队在力量和武器上的逐渐增强，直至成为我们联盟中的一个驾凌一切的因素，美国的政治影响自然也相应地增长起来。英国，尽管尽了努力，但毕竟是一个小

国。它经受了比历史上任何战争中都严峻得多的考验，并且消耗了它所固有的财富和力量的大部分。它的国外资产已荡然无存，它的帝国的大部分已被夺去并惨遭蹂躏。纵使一一夺回，也不能重树昔日的声威了。虽然如此，它与美国的联盟却是胜利所必须凭以建立的牢固基础，而不管道路是怎样艰难，怎样阻长。我们暂时只能顾及目前而不遑高瞻远瞩。但是主要由于罗斯福的领导，并且通过他国内周围的各党各派和各式各样传统的那一大批人的影响，显而易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决不会再走回头路了。那时美国将一定不仅仅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享有最高度发展的工业化体系，以及各种原料的巨大储备，而且既经步入世界舞台，就不会象阿基里斯<sup>①</sup>一样地再退到他的帐篷里去。可能随时会有建议或“令人苦痛的重新估价”的威胁，但这些都会是一时的情绪。年富力强的美国人民将接过火炬并把它高举起来。他们将会挺身而出，作为西方文明和传统的保卫者。他们将无负于他们的天命。

---

<sup>①</sup> 希腊神话故事，阿基里斯出生后被其母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浑身刀枪不入。——译者

## 第七章 战时的殖民帝国

从比弗布鲁克勋爵领导下的谢尔—梅克斯大厦熙熙攘攘、门庭若市的生活，换成唐宁街古老的殖民事务部那种冷清庄严的生活，确是一种奇特的经历。这的确象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二十一个月来我一直在沉重的压力下日以继夜地孜孜不辍，几无片刻之闲。工作时间极长，气氛紧张热烈，无时无刻不充满着紧急迫切之感。我们所生活于其间的办公室是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种建筑式样的一个早期样板。由外墙围起的必要的一块楼面，按照预计使用人的等级和地位分开，加以适当的间隔，但仅如此而已。这里既没有特色，也没有传统的气息。低矮的天花板和布置单调的门窗，千篇一律。从那里走进构成白厅中心的一大片建筑群——外交部、印度事务部、殖民事务部——维多利亚的环境中，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转变，这里的每一个建筑物都各有其轩敞的客厅、富丽堂皇的楼梯、镶成棋盘花纹的走廊、巨大的壁炉和华丽的大理石炉面、桃花心木的大办公桌和古色古香的靠背椅。早到班、晚下班，我已经形成习惯。可是这种惯行办法和我的新环境却有一点不相称。幸而我把我在供应部的私人秘书约翰·温德姆一起带了过来。他既有工作效率，又富有幽默感，由于他的这种兼长，我开始时所感到的某些偏见方得以渐渐消失。当时有人问我应该怎样最恰当地描绘我的经历。我记得说过，颇有离开疯人院而进入坟墓之感。这种说法实际上两者都是不公平的。

162 在供应部，我在二十一个月之中曾经先后在三位大臣手下工作。在殖民事务部，我在十个月之中也以同样的身份先后为三位

大臣办事。他们都是亲切友好，富有同情心的，虽然他们作风各异。最后我开始切盼独当一面了。

在莫因勋爵以沃尔特·吉内斯的身份多年担任下院议员的期间，我已经和他相识，虽则不是莫逆之交。他证明是一个颇得人心的精明强干的大臣。在财政大臣一职在政府日常工作中具有突出重要性的一段期间，他是我所能记得的最优秀的财政大臣之一。这位财政大臣，总是谦恭有礼、见闻广博、具有一种说不出的多少有点难以捉摸的动人风采，他博得了人们的敬爱。不幸我和他一起工作仅仅三个星期，政治局势就要求另一次职务的调动了。比弗布鲁克去职，克里普斯不得不入阁。结果，莫因的职位变动了——他忠诚地接受了这一决定。甚至在这短短的时间，我就看出了他的品德了。后来他去开罗，担任国务大臣凯西<sup>①</sup>的副手，继而接任该职。我记得在1943年从阿尔及尔往访开罗时受到了他的款待，并对于他业务的精通和所受到的重视，无任钦佩。他租了一幢宽敞房子，总是高朋满座，备极殷勤。天啊，岂料悲惨的命运却正在等待他。1944年11月间，当从轿车下来正走向大门的时候，竟被那个伤风败俗的坚毅团——一个巴勒斯坦无政府主义者集团——的成员用手枪枪击毙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功勋卓著的沃尔特·莫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这样像一个士兵那样地死去。他深为人们所哀悼。

2月22日，克兰伯恩勋爵继莫因任殖民事务部大臣，但是因为克兰伯恩已奉命进入上院，所以我在下院作为我部唯一代表的地位并未受影响。可惜我同莫因的关系未能臻于同僚之谊。克兰伯恩却是我中学和大学时代的最老朋友之一。我们又由于联姻而有了双重关系，在这一年夏季我的儿子和他的一个侄女结婚。我

---

<sup>①</sup> 已故凯西勋爵；相继任中东国务大臣，孟买省长，澳大利亚外务部长，澳大利亚总督。



163 们的伙伴关系一直持续到11月22日，整整九个月。再也没有比他更讨人欢喜、更加宽厚的上司了。我们同抱一样的观点，共忧虑，共享工作中的谐谑，也是一件乐事。

不幸，我对殖民地的知识非常有限。作为一个无官职的议员，我的兴趣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在这次浩劫的前几年中则集中于外交政策。我对于殖民事务毫无研究，对于殖民帝国的结构或据以进行统治的方法也缺乏了解。有待于学习的很多，虽则条件不大许可。在殖民事务部大厦的那些轩敞的厅堂里，难得射入几缕阳光，在走廊里回响着幽魂似的脚步声，正如在一个大教堂的通道里一样。且不谈这幢建筑，那个机构就使我不知其所以然地感到多少有点陈腐过时。

殖民事务部的工作班子是一批忠实的公务员，在同外交事务部合并以前是按照外交部的同一方针录用的。正如参加外交部工作的青年一样，除偶乘假期之便，出国一游，毕生坐镇伦敦没有出国机会，殖民事务部的职员也是除罕见的例外之外，很少有机会访问或服务于任何殖民地的。这是一个人数不多、编制很严格的部，而所配备的官员却无不精明谨慎。如果没有我近来所养成的那种泼辣的作风，我现在才认识到，像我们在战时生产部曾凭以工作几个月或几年的那种步子，在白厅是坚持不下去的。无论如何，我不能不对我所得到的厚意和同情表示赞赏。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我试图对工作激发更大的能动精神是欢迎不暇的。

直到我在殖民事务部任职的最后一个星期，英国经历着一个日益加甚的忧虑时期。在政治战线上，无论在议会还是在全国，都有一股不满的潜在势力。生产部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改组，加剧了普遍的变化莫测之感。在1941年12月10日“威尔士亲王号”和“却敌号”这两艘主力舰遭空袭而沉没之后，接着就是日本人在马来亚的大规模登陆。1942年2月15日，当我在新单位

开始工作不多几天之后，新加坡陷落，珀西瓦尔将军和英军八万五千人投降，这是对英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威望的沉重打击。我们的失地这时计有香港、海峡殖民地、马来亚各邦、北婆罗洲和沙撈越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缅甸不久也相继沦陷，只是靠了亚历山大将军巧妙的掩护撤退才挽救了一次军事灾难。所有这些不幸，连同荷兰领地的弃守和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危在旦夕，我们在殖民事务部面临了一新的危急形势。锡兰很可能是下一个目标。不但英王的一个大领地将落入敌手，而且——在物质方面——自然橡胶的一个最后主要来源也可能丧失。

接下来的一个灾难是6月21日托布鲁克的陷落，连同三万三千人的投降。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完全出乎意料的打击。自从各党联合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把正式的不信任投票列在下院的议事日程之上。诚然，丘吉尔曾经要求他的批评者采取公开态度，因为他急于要得到一个坚定的决定。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这一次关键性的辩论。奥金莱克在沙漠中的一仗打得很糟，我们攻克的地方一举而丧失尽净。英军在遭到人员和装备方面惨重损失之后，退守开罗的原阵地，而当我们正在辩论之际，埃及战役实际上正在进行中。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首先开始，作了他那种照例夸大但相当有力的发言。动议表明了对“战争的中央集权指挥缺乏信任”。有人曾经以一次发言而声名大著；但一言而毁掉自己声名的却有约翰爵士。他反对首相兼掌国防部职能的决定，对此反复论证，头头是道。他要求把两者分开，而指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担任总参谋长。但是当他进而建议任命格劳斯特公爵为英国陆军总司令时，他的发言就完全失败了。他失去了下院的同情，他的动议遭到否决却是英国之幸。如果他的动议得以通过，那只能意味着撤换丘吉尔。但是复议人罗杰斯·凯斯爵士极  
165  
其明确的表明，这样一种结果是他最不愿意的。他所想要撤换的

是首相的顾问——尤其是他的海军顾问。除了丘吉尔没有一人经得起这场风暴。在导致张伯伦政府垮台的那次著名的辩论中，那位英武的海军上将曾经征询我的意见，并且把他所打算说的以及怎样说法都告诉我。<sup>①</sup>这一次没有一个友好的领航人，他象历来一样地猛冲猛闯，但似乎是沿着一条漫无航向的航程前进。

所有通常持批评态度的人都参加了辩论，包括温特顿、霍尔—贝利沙、克莱姆·戴维斯和西德尼·西尔弗曼在内。正是这一次，安奈林·比万对丘吉尔发动了一场特别恶毒的猛攻，他使用了这样尖刻的句子：“首相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辩论，却打输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但是沃德洛—米尔恩的奇怪错误，以及他和他的复议人之间的矛盾，一上来就削弱了这场攻势的锋芒。甚至在整个两天之后，批评者还是不能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我听了7月1、2两日所举行的辩论的大部分，其中包括丘吉尔保留到最后的两小时的答辩。他以一席大胆的、驳辩严密的发言把下院带回到现实世界。这是他最辉煌的努力之一。我们都知道他肩负的千斤重担和遭受的失望之苦。我有机会在下院外面同他讲了几句话，意识到了他所作出的决定的果断坚决。他愿意作一个完全名副其实的、承担全责的首相。如果这一点被拒绝，他就挂冠而去。他毫不含糊地这样对下院说。他不想被贬到1916年阿斯奎斯所拒绝接受的那种地位，把战争的实际指挥权交给某位未指名的超人，而使首相成为一种政府发言人。丘吉尔再一次，甚至在我们倒霉的时候，左右了下院，并获得了压倒多数的信任。表决的数字是四百七十六票对二十五票。

166 然而在整个春、夏两季，一次灾难紧跟着另一次灾难而来。议会和全国的士气都不高。1940年的危险并没有动摇英国人民及其代表。但是在1941年冬季和1942年春、夏两季接连不断的

<sup>①</sup> 参看本卷原书66页。



幸却难以承当。虽然到7月初奥金莱克已经设法使战线稳定下来，但是直到10月底他的继任人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才发动反攻，并于六天的苦战中赢得了阿拉曼的大捷。这时的确看到了形势的转变。

但是，在非常时期，能日不暇给倒是一个很大的快慰。我在新单位要作的事情很多。起初，我发现工作涉及的方面十分繁杂，以致多少有点茫无头绪。我们所要照管的领地遍及全球，共计五十五处之多，包括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居民六千万人。其中包括迅速发展到接近自治阶段的与英国有三百年关系的西印度群岛，和现代文明尚处于早期阶段的象尼日利亚这样新近占有的土地，以及现在变成为军事基地的象亚丁那样的纯粹加煤站和象锡兰那样占有大片土地、具有古代文化的伟大历史民族，等等。无论从行政管理、政治进步、社会发展或战时生产的观点来看，撇开我们责任的大小不谈，其间的差异就是令人茫然的。

殖民事务部和殖民地政府的当前任务可以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为了战争而动员殖民帝国人力物力的一切潜在资源。我们已经丧失了世界锡生产的百分之六十和橡胶生产的百分之九十，以及钨、锰、铅和其他矿产的大部分。此外，我们已经被夺去了食品，尤其是糖、茶、米和油籽的重要来源，还有损失其他之虞。所以我们必须为了战争而大规模地增加殖民地的生产。我们必须发展矿产。我们必须提高肉类、牛皮、棕榈油、花生等等的生产。我们必须使用前两年在国内鼓励我们的那种方法，并以那种精神加以谆谆善诱。我们需要来自肯尼亚的西沙尔麻，以及象菊麻这类更优质的作物。所要求于非洲其他各地的，主要是花生、棕榈仁、棕榈油以及——在不那么大的程度上——橡胶和锡。我们所指望于锡兰的，则是橡胶和茶。为了刺激出口，我们需要一个适当的计划。



这是我们的主要顾主粮食部、供应部以及我们的美国盟友一致同意的。

克兰伯恩要我负责经济和贸易问题，而不论其为进口或出口，因此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这方面，并同供应部和生产部的老朋友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为了在伦敦建立必要的机构，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经济科扩大成为一个小小的供应司。我们幸而在多弗大厦找到了办公处所。事实上，工程部曾试图用霍斯费里街上一幢要倒塌的房子哄骗我们。但是约翰·温德姆发现苏格兰事务部已“暂时”迁往爱丁堡，因而他以我的名义抢到了那幢漂亮的房子——梅尔本勋爵的住宅。我们已经从比弗布鲁克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杰拉尔德·克里西任该司司长，并很恰当地由杰拉尔德·克劳森（曾经在伊顿和我同学）和西德尼·凯恩<sup>①</sup>予以襄助。

在海外，以包括肯尼亚、乌干达、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以及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各地的东非总督会议领导东非战时供应委员会和民需供应委员会的事务。同样也有一个西非会议，并因有一位驻节西非的阁员斯温顿爵士的出席而得到了加强。斯温顿爵士以他的广博知识和丰富经验，孜孜工作，成绩斐然。这个机构在拉各斯也有它的供应中心和地区船舶管理中心。旧有的可可管制委员会扩大成为西非物产管制委员会，所辖范围更加广泛了。它为西非制订了一项稳定的、一贯的采购和价格政策。除可可外，它还处理油籽、花生和其他商品。它给生产者和作为顾主的粮食部订定价格。

168 至于橡胶，由于采取种种措施，锡兰橡胶产量得以提高。我们以互利来谋取马来亚种植园主和专家的帮助。在东非和西非，被忽视了的种植园均重加整顿，已放弃了的地方，主要在坦噶尼喀，也予以恢复。大规模采集野生橡胶，并按足以吸引最大限度生产

<sup>①</sup> 后来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

的标准制订价格。我们希望在美国合成橡胶的大量生产最终能有助于同盟国的共同战时需要以前，以这些有力的措施来弥补这个差距。这些做法证明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的所有指标都一一完成。

一般说来，矿产方面的顾主是供应部和飞机生产部。它们需要铁矾土、钨、锡、石墨、铜、锌、云母、锰、铬、铁矿石和工业用钻石。这些东西的产地遍于黄金海岸、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北罗得西亚、锡兰、英属圭亚那和塞浦路斯各地。主要问题往往不是生产，而是境内外的运输。火车头的珍贵、稀少，在当时几乎和砧石不相上下。

日本征服马来亚，对锡的供应有着严重的影响。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提高尼日利亚各矿的产量，已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在这方面有着双重的困难。根据现行税制，利润的增长并不给公司带来任何好处。正如所有采掘工业一样，生产过多反而会使他们的资产受到损害。第二，必须有一位委以管辖权的供应部代表和殖民事务部官员互通声气在现场工作。从武装部队复员人员中汲取熟练工人，征募非熟练工人，协同增建新厂，便利交通运输，以及采取其他许多方法，增加生产的门路还是很多的。

为求解决这两个问题中的至少第二个问题，我大大得力于我同供应部的关系，尤其得到了该部次官威廉·帕尔默爵士以及担任会计长并与某大锡公司有私人关系的伊凡·斯彭斯爵士的大力协助。尽管缺乏财务上的刺激，各公司还是豪爽地踊跃以赴。在1942年8月4日的辩论中，对于“为私人利益”而强制劳动的罪恶问题，有人大放厥词。我试图回答，甚至试图讥讽这种鸚鵡学舌的叫嚣说：

这些公司的人要不是出于爱国，他们是极不愿意把锡从矿里开采出来的，但是他们在作什么呢？他们在以百分之一百二十的速率开采矿

山,把矿山变成废墟。我们要他们开采最好的矿层,把矿石采出来。<sup>①</sup>  
这个协定完全是对国家有利的,虽则可能对有关公司的股东有欠公平。

根据我们所缔结的协定,不管开采出多少锡,对于他们的利润几无丝毫影响,因为协定规定:供应部除付给他们开采的成本费外,并加上1939年的利润或1939年前三年的平均利润。所给付的利润是固定的,所以事实上他们无异是政府的代理人。<sup>②</sup>

因此,无论从英国纳税人或尼日利亚职工的观点来看,“事实上他们是因战争而为政府工作的”。<sup>③</sup>

对非洲舆论的影响问题,当时有一些虚伪的论点,对此我答复说:

我来追忆一下人们谈论当时情况的一次对话。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他非到一个政府的煤矿去工作不可,因为那个矿已经社会主义化了,他欢喜这个概念。另一个人说……他非到统一锡矿去工作不可;第一个人就说,他不欢喜那个矿,因为锡矿是为私人利润的一个企业。另一个人说,“但是有百分之百的超额利润税”,而第一个人回答说,其中有百分之二十的回扣,等等。但是我不能认为这反映了任何真实情况。<sup>④</sup>

强制劳动的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而它却不断发生。英国举国上下已经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征兵制以及为重要战时生产实行近似工业服役制的办法。但是据论证,对于还没有政治权利的民族来说,情况却有所不同。当然,在殖民地格外慎加保护是有必要的。然而,要拒绝地方政府方面事涉战时紧要工作的这种要求,似乎是不可能的。为保护居民的利益,已经当心备至了。

在1942年6月的一次辩论中,我指出了我们对殖民地人力的巨大需求:

我们有作战单位、劳动队、国民军和非正规部队、民防队等等。姑就

---

①②③④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2年8月4日。

作战单位略谈一些情况。女王的非洲步枪队、皇家西非边防军、北罗得西亚团，它们在摧毁意大利帝国的东非战役中，战绩辉煌，昭昭在人耳目，不需我再赞一词。它们不是辅助性质的，而是那些战役的主要参加者。这些军团，象英国军队一样，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兵力已经增加了许多倍。马耳他团和英王自己的马耳他炮兵与帝国驻防军，共享有这次青史垂名的围攻战的殊荣。<sup>①</sup>

我对马耳他人民以及防守部队表示敬意之后，又对这项光荣名册作了补充说明：

锡兰国防军、毛里求斯国民军、塞浦路斯志愿军、以及圣赫勒拿、福克兰群岛、斐济和汤加群岛的类似部队，无不以他们的战绩引为自豪，而且都是不无充分理由的。西印度群岛曾经以大量生力军输送给皇家空军以及陆军的各个技术兵种。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无论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都在步兵第三团和皇家炮兵的巴勒斯坦连以及皇家空军和其他许多单位中为英王陛下的武装部队服务。劳动队从西非和东非以及其他殖民地招募了大量人员，而且这些人员正在作出辉煌的功绩。国民军和非正规军在我们的很多殖民地都正在组织起来。<sup>②</sup>

我继续为对欧洲人和当地居民实行征募制进行辩护。我们必须在殖民地象在英国一样采取与我们通常行政所不同的措施：

我毫不踌躇地为之辩护的唯一理由就是：战争需求是压倒一切的，171  
必须最大限度予以满足。<sup>③</sup>

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整个殖民帝国人民的耿耿忠心和自发的支持了——愿为国效力而不求任何代价，是令人感动的。在不少颇富想像力的建议中，一位酋长建议用降落伞把他和他的三个儿子降落在柏林，以使用弓矢将希特勒射死——“一个其志可嘉、但可惜无法做到的计划”。

在这期间，为了保证出口的增长，对殖民地的进口必须有所增加。进口采取的两种主要形式是：第一，消费品的进口，因为殖民

---

①②③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2年6月24日。



地人民所需要的是货物而不是货币。“英国人必须少买几件衬衫以便西非人可以多得到一点棉织品。”但是我们还必须为普遍需要改进的公路、铁路和内部运输工具而输出资本货物<sup>①</sup>。火车头和车厢的短缺是人尽皆知的。英国这类大工厂的生产能力这时大部分都分配到其他用途上了。但是我们总要想方设法把它们弄到手：

我们无论如何非……采用多种方式增加生产不可，并通过式样的简化、改装和型号的标准化这类方法，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一切。<sup>②</sup>

我确信我们可以成功。我们也不可忽视那种比较简陋的运输形式——脚踏车。凡是了解殖民地的人，都知道脚踏车在人民生活和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我在从前的工作岗位上，对于争夺物资的优先权和分配额，早已有了一些经验。但是我很高兴地说，我们正从贸易部脚踏车的限额中得到了合理的份额。

船舶的作用对于殖民地显得特别重要。我们正在努力增加这方面的生产。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船舶运输出口货，并把充分的进口货分送殖民地各地以支持和鼓励它们的居民呢？潜艇的袭击日益咄咄逼人。尚未采取有系统护航办法的美国人，损失惨重。1942年上半年英国和盟国的损失超过所造新船三百万吨。然而在那段时期所需要的船舶却越来越多。幸而到1942年5月间，美国的损失和新船的建造已不相上下，至于盟国的损失和所建新船，到8月间也达到了相同的地步。虽然如此，直到这一年年底，形势依然严重。援俄物资的护航又使损失有所增加。结果，1942年英国总进口计划不得不将订货缩减到二千五百万吨左右，而上年度我们曾设法争取到三千万吨以上。船舶的短缺导致了另一个问题。除不断增加我们最为需要的生产这一负担外，我们还

① 指生产工业品所需的生产资料。——译者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2年6月24日。

不得不为居民生活上的需要而收购对我们既无关紧要又无法装运的消费品——例如巴勒斯坦的柑橘、西非的可可以及西印度群岛某些地方的香蕉等等。

在西印度群岛,因为常年所收香蕉无法装运出去或处理,所以一些小所有主,其中大部分是种植二、三百亩地的农场主,自然被吸引去改种甘蔗,而不是改为生产供当地消费的粮食作物。政府曾经允诺按照公布的固定价格收购全部作物,但是制糖厂却无法处理多于正常的收获量。因此制订了一项计划,部分是以直接补贴的办法,诱致这一阶层的香蕉生产者在香蕉无法出售时,改种其他种类的食物。这种困难乃是一个古怪的事例,可以说明潜艇战对这些偏远岛屿的生活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不能不作出一切努力来减少无关重要物资的进口。我们建立了进口管制制度,以各个地区航运计划的编制和配合来代替进口许可证的旧有制度。这事实上意味着为政府大量收购有关物资,保证它们能享有申请舱位的优先权,而只利用进口许可证制度去管制私人需要的无数小宗货物的进口。

173

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增加当地食品的生产。在战前,为了改善居民的饮食以及保护和保全土壤这两项主要目的,就曾加以鼓励。战争的需要以及大量军队的维持,自然又大大地扩大了我们的需求。在西非,我们集中力量于稻谷、蔬菜和乳制品的增产。在既有白人种植园主又有当地小农经济的东非,我们的主要需要,除供出口的重要作物外,就是增加小麦、玉米、裸麦和包括大米在内的其他粮食作物的生产。西印度群岛单单依赖食糖这一主要出口作物已有好几代了。在通常情况下,人民对于小麦、面粉和肉类的需要,是由进口予以满足。这时为节省船舶,农业多样化无论对大地主所有者或小量土地所有者都是必要的。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已经作到了这一步,在锡兰、毛里求斯和巴勒斯坦也采取了同样的

措施。甚至在亚丁岩石嶙峋的不毛之地，蔬菜、水果和其他作物的种植，农业官员也为了那个极其重要的前哨要地的驻军和人民的利益而大规模予以奖励。在殖民地多生产一吨食品，就可节省一艘装运食品的船只；从邻近的一个殖民地多运一吨食品到另一殖民地也可多节省些航运。在东非多生产一吨食物，把它运给中东部队，就可多省去绕道好望角的长途运输。我在下院的一次发言中用了一句后来报纸所引用的话：“农场主是最出色的造船商。”

殖民地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帮忙效力。我们大力促进并切实提高各种地方制造业和修理业，特别是轻机械工程学方面的生产能力。铁路工场和其他机械工程工场迅速增加。我不得不面对我们在英国所遇到并克服了的同样困难。但是我相信，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予以解决。

为了领地货物的输入和输出，非改良港口和增加起重机不可。174 一个港口需设法在一天之内运进通常一个月所通过的吨数。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海军部和战时运输部的全面合作。

当时我们的主要焦虑之一，是一个直接影响到国内营养标准的问题，即油脂缺乏。所以，棕榈油、花生之类的生产是粮食部头等重要的问题。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可以利用原有的可可管制委员会，该委员会现已改名为西非物产管制委员会。但是所作安排必须同自由法国和比利时流亡政府相互协调，因为它们分别负责比利时非洲帝国和已归附于戴高乐的法属赤道非洲的各大产区。其中最为重要的也许是我们必须就出售给美国人的商品数量和价格商得一共同态度。对于一项简单但令人迷惑难解的经济问题，斗争了整整夏、秋两季。

我们的粮食部，特别是主管官贾斯珀·奈特——联合非洲公司的前经理——所采取的方针是：“以提高价格取得最大限度的生产是人类的共同经验。”他们也坚持应将售价的全部所得转给生产



者。尼日利亚的总督伯纳德·鲍迪伦爵士，我们最有经验的行政长官之一，却赞成一个相反的看法，并得到了联合非洲公司当地代表和伦敦经理塞缪尔先生的支持。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因为目前没有给非洲增加无论消费品或“耐用消费品”（如脚踏车）配额的希望，所以提高价格的无可避免的结果将加剧现有的通货膨胀。这些殖民地已经货币充斥，而可用货币购买的货物却没有相应的增加。在买主盼望增加生产的情况下，提高价格将产生恰恰相反的结果。我们早已有了可可方面的经验，当时我们曾设法利用非常之高的世界价格而把委员会所收到和所支付给生产者之间的差额保留作为一个供将来之用的“留窝蛋”<sup>①</sup>。我们想根据经济上和实际上的理由把这种程序推行于其他商品。象在英国那样施行一种至少可收遏制通货膨胀之效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办法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计划，就某种意义来讲，是以国内通称为“战后信贷”的办法为基础的。在我们国家，从现行工资中扣发之数将在战后付还给各个工资收入者。在西非，全价和我们所付给生产者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将构成一种为全民福利的集体战后信贷。到战争结束时，总数已达到若干亿，就成为战后非洲资本大幅度扩张的基础。

由于我们必须同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共同解决，这就使这一问题的争论更加复杂化，争辩极为激烈。这就使得我和自由法国组织中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勒内·普利文有了密切接触。我一同他相识，就发现他是一个风采动人和性格坚强的人，并且是不难相处的。他为人爽直，凡他所同意的，绝不背信食言。

我同普利文的商谈使我第一次得以同戴高乐将军接触。他邀请我到他设在卡尔顿大厦平台的总部去访问他，并在一次简短但相当正式的谈话中，他对我们以同情的态度共同探讨飘扬自由法

<sup>①</sup> 用来引诱母鸡继续把蛋生在窝里的办法。——译者



国旗帜的非洲领土问题，表示感谢。他对我们同他的殖民部长普利文进行的谈判了如指掌，我殊为诧异。此后不久，我又参加外交部派驻自由法国运动的代表查尔斯·皮克在旅行家俱乐部举行的一次小型宴会。在这两个场合，将军都是非常谦和。但不久我就看到他性格的严峻的一面。

这是当时动员殖民帝国人力和物力潜在资源的内情。

战争，尽管有它的恐怖和损失，倒也不是一无所获。殖民帝国以一种新的形式取得的许多物质进步，正是由于这些生死关头的年代所给予的刺激。战争需求的迫切，并没有完全冲淡我们对殖民帝国前途的责任感，这点正是 1942 年 6 月间在下院进行辩论的主题。最大的需要就是在资本扩充方面，而这势必大部分依赖于有资本积累可供利用的英国和西方列强。我们设立了以黑利勋爵为主席的殖民地研究委员会，以便对一年五十万镑的经费提供意见，这笔经费当时可依据 1940 年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案加以利用。当然，我们期望战后可能有一个远为广泛、远为宏伟的计划，而在当时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开端。

资本扩充问题，我向下院这样解释说，其数额之大不是单单私人投资力所能办到的。我们在公共需要方面非有大规模的公共投资不可——这是不能希望在开头几年甚至开头几代有利可图的一种投资。我们正在制订计划，以便可以保证在战后求多于供的资本市场上，为殖民地制订的这些计划在恢复和发展工作中争取到它们公平的一份。

殖民地是贫穷的。它们为什么贫穷？是因为资本主义剥削还是因为资本不足？是因为被管得太多还是因为被管得太少？是因为我们干涉太多还是因为太少？是因为白种人种植园主和移民太多还是因为太少？是因为欧洲贸易商太多还是因为不够多？都不是。它们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它们刚刚开始经营。它们落后了四、五百年。我们的任务是

推动它们，促使它们尽快越过这道时间的鸿沟。<sup>①</sup>

这道鸿沟非越过不可。

旧日的帝国已经死亡，因为它们不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它们是僵硬的。它们墨守一种固定的模式。相比之下，我们的帝国已经有了很大的适应性。它正是靠了这种适应性而存在下去。<sup>②</sup>

我根据这种精神接下去说：

所以，殖民帝国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在它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伙伴关系的原则。从伙伴关系之中产生谅解和友谊。殖民地的前途正在于英联邦的结构之内。<sup>③</sup>

紧跟着黑利勋爵之后，我有意地抛弃了当时流行的“托管关系”一词。在我看来，这表达了一个高贵的观念，含义恰当，但这个词汇是陈腐的，至少是渐趋陈腐的。必须用其他的字眼来表示英国同殖民地人民发展中的关系。伙伴关系或许会是描述下一个阶段的最恰当的字眼。有些议员欢迎这种关系的来临，有些则将信将疑，另一些却不信会有其事。有一家报纸注意到，伙伴关系“含有每一个殖民地都要逐渐上升到类似于自治领地位的意思”。<sup>④</sup> 这项评论无疑表达了非凡的先见之明。

在胜利以后，各殖民地的政治发展将是如何迅速，我不能说我当时就已经预见到，我想能预见到的也很少。然而，在这些年月中，我对于战后将出现怎样的问题，却已略窥端倪。甚至当时，我已看清象肯尼亚这样一个殖民地的大胆而可贵的拓荒者的地位迟早会陷入危险之境。我提出了一个方案，主张由当地政府买下大农场的终身所有权，而将土地所有主保留作为经理人员或佃户，也购买小农场，目的是转手卖给非洲人，因为土地荒已经显现出来。关于这些办法的一个计划草案，我现在仍然保存在手里。我承认

<sup>①②③</sup>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2年6月24日。

<sup>④</sup> 《伯明翰邮报》(Birmingham Post)，1942年6月25日。

这会是所费不贻的，但是我怀疑是否比以后所证明的情况会更加所费不贻。象几乎其他每一个人一样，我也认为走向自治的发展过程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有一段受教育的时间，这将最后证明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这种演变的出现，作为战争的结果，要比没有这场巨大的剧变要快得多。后来我的职责就是要在一个殖民帝国转变成为一个自由大英联邦的各个不同阶段上起一定的作用。但是甚至在那个时候，对那种无法避免的变化，我也不能不略有所见。这些变化既然现在差不多功程圆满，它们已经构成——好也罢，坏也罢——我所经历的这个时代也许最具戏剧性的革命之一。

在战争的紧张状态中，要集中注意力于这些主要是战后的问题，是有困难的。然而关于起草大西洋宪章，这个牵涉世界“所有民族选择各自据以生活的政府形式”的问题，却已经引起大量的麻烦。罗斯福总统，象威尔逊总统一样，欢喜概括泛论。英国的传统却比较实事求是，我们早已在根据各个不同地区的历史和背景，考虑着它们向自治方面演进的积极步骤。

当然，美国的参战给我们带来了至可宝贵的安慰和胜利的保证，但是也带来了许多不那么严重的忧虑和不便。在政治方面，罗斯福总统开始对于殖民地问题发生个人兴趣，特别是在加勒比海地区。他显然既不了解哈勒姆也不了解迪普·索斯的情况，却对于西印度群岛很多地方的低生活标准表示很关心。我们在这个地区的产糖殖民地的困难之一，曾经是，并且将依然是美国的极端保护关税政策。在美国市场上，古巴糖享有几乎达到垄断程度的保护。而同时，在科德尔·赫尔这位美国的科布登领导下的国务院，却一贯抗议帝国优惠税和我们对殖民地糖的大量采购。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是他们专门注意我们的小小缺点，而不觉得其本身的大缺点的另一个事例。但是，不管其动机如何，紧握其伸给我们的手



却显然是正确的。在陶西格博士领导下的一个美国机构奉派处理这些地区的问题。弗兰克·斯托克代尔爵士那位非常可佩、经验丰富的专家，早已代表我们进行工作。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合作的基础。因此，根据弗兰克爵士的忠告，我们接受了组织“英美加勒比海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为便利委员会的工作起见，殖民事务部指派了一个常驻华盛顿的代表。我们必须当心，不要侵害我们在尤金·梅尔维尔那位功绩卓著的官员领导下已经和联合委员会一起工作得非常谐调的原有的“殖民地物资供应联络代表团”的职能。虽然如此，这个问题总算得到了友好的解决，而且这使我受到了第一个教训：要想取得适合于我们共同目的的结果，就需要有一套手法去让美国人带头——这个教训不久就要应用到一个更广的范围了。

就这一点来说，把1942年7月间殖民事务部大臣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一段谈话记录下来是值得的：

我昨天和一位卓越的美国人杜勒斯先生晤谈，他久已对殖民地问题发生兴趣。……[这]关系到美国舆论对英殖民帝国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认识到，深深隐伏在大多数美国人心里的是他们对所谓“英帝国主义”的根本厌恶。他并没有企图为他们的观点辩护。相反，他欲抑先扬地说，在他看没有一个国家比英国自滑铁卢之役以来为落后民族所作的贡献更加伟大了。他说，这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不是以任何知识或道理为依据的。这是十分明显的和客观存在的。……所以他认为我们要试图在美国对关于我们的殖民地政府的情况进行宣传，是绝对无益的。这种宣传无论如何只能触动极少数人，而不会普遍为人所相信。我们消除这种根深蒂固成见的唯一方法，就是将来在战后邀请美国在开发我们殖民地方面进行合作。……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这些地方土著人民的福利和物质资源的开发。……如果将来的世界和平与繁荣需要英美之间的合作，在单纯的感情基础上是作不到的，因为这种感情绝不会持久。合作只有在工作的基础上方能作到。没有比帮助落后民族进步对美国人民更有号召力的方法了。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能够在这样



180 一项工作中通力合作，特别是在非洲方面，那就不难为未来的合作奠定一个牢固的基础。

后来在杜勒斯担任国务卿的年月里，我常常讨论这些想法。到那个时候，事情已经沿着一条不同的途径发展了。但是没有能试图顺着那个路子作出一点积极贡献，我现在深深以此自责。

我同克兰伯恩的伙伴关系这时已近结束，不久我就要面临一个困难的抉择。使我在这些错综复杂关系中有了一点点不重要纠缠的是那位出自无心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克里普斯的确是一个怪人。当战前他在律师界大享盛名、业务兴隆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地一步一步陷入左翼，直至最后从议会工党中被驱逐出来。他信仰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要不是多少把他的革命见解和深厚的基督教信仰结合在一起，他无疑早会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了。他的工党同僚简直不知道究应怎样看待他。他实际上是想把他同僚口头原则上同意的一些危险教条付诸实施。这使他们深为震惊。何况，在他的雅各宾主义之外，还要加上使他们火冒三丈的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很多保守党人也同样厌恶他，甚至惧怕他，因为他欢喜侮辱他们所最珍惜的信念。可是一旦同他熟识，象我后来那样，他倒不失为一个可爱的伙伴，看来他只不过是英国许许多多奇人之中的又一个而已。同时，也不能不承认，克里普斯是一个有点令人厌烦的人。正如赫伯特·莫里森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

殊为可惜的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没有既能不去打搅首相而又能和性格坚强、人品互异的同事相处这种兼而有之的特长。

他完全公正地补充说：

181 丘吉尔无疑是钦佩克里普斯的才智的，可他厌恶他缺乏幽默感和他常常难以掩饰的才华外露和盛气凌人的态度。<sup>①</sup>

---

① 莫里森：《自传》(Autobiography)，第 215 页。

克里普斯从他曾任英国大使的俄国一回国,就声名雀起,大得人望。这正是在1941—1942年冬季政府威望低落的时候。他在战前以极其激烈的言词表达的极左意见,被人置诸脑后了。俄国人现在是英雄;而克里普斯被十分荒谬地认为是对苏联政府有着特殊影响的人。自然,凡是了解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主社会主义”如何轻蔑的人,都清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克里普斯充其量只能说是接近于孟什维克的思想意识。虽然如此,这时他却成为人们对于我们新盟国一片激情的受益人。因此,丘吉尔邀请他担任供应部,意思是要他在新设生产部大臣主持下的群英之中为国效劳。克里普斯拒绝这个职务,他想在战时内阁中占一席之地。他一定知道这点是丘吉尔所不能迁就的,因为新计划的整个目的就是要保证单独由一位战时内阁成员对一切战时生产负责。但是在比弗布鲁克辞职之后,必须迅即作出新的安排。以国务大臣身份驻开罗办事的奥利弗·利特尔顿于是奉调回国,受命接掌比弗布鲁克的职务。利特尔顿证明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而又讲求实效的大臣。克里普斯得到了他垂涎的战时内阁中的席位,奉派为掌玺大臣兼下院领袖。他担任这个职务大约有九个月的时间,直到甚至战时的下院也起来造他那种官老爷态度的反为止。

人们原以为他的各项职务理应聚精会神、全力以赴的,但是习惯于琐细事务并纠缠于具体问题不放的克里普斯,似乎缺乏大刀阔斧的能力。一个普通人也许应该有一种安分守己的气质经得起一个非行政性职位的诱惑;一个积极和勤奋的人却容易被引诱去批评和干涉他的同僚或拟具大而无当的计划。克里普斯正是这样一个 182  
人。在1942年9月间他开始以一个改组战争指导系统的绝对行不通的计划使丘吉尔大伤脑筋。他曾要求指派三个才干所差无几的人担任三军参谋长,作为联合计划处的上级领导。他也希望每一个战场有一个统辖海、陆、空三军的总司令,分别对作战计

划指导委员会负责。丘吉尔曾经把这叫做闭门造车者的梦想。<sup>①</sup> 实这在是一个闭门造车者的恶梦。这个计划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英美两国政府早已决定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将支配两国的一切努力，不但在军事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这就是和联合委员会并立的英美参谋长联合会。何况两国已经同意了在即将发动的北非战役中任命一位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

所有这一切不安本分的举动，正是克里普斯摆脱不掉细节工作以及热衷于行政问题的一个迹象。同样他也是一个不高明的下院领袖。他事事不肯放手。如果一个下院领袖和他的督导员能够确保足够可靠的议员出席，使政府的议案获得通过，他们原应该是高兴的；如果工作结束得早，他们应该欢欢喜喜同自己的朋友一起到俱乐部去吃上一顿。但是，除非看到人人都在工作，否则克里普斯是不会高兴的，他既没有俱乐部，也没有几个朋友。所以，议员出席的人数一减少，他就惶惶不可终日，而简直记不得在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已经参军或是已经参加某种战事工作了。他因为他们不出席辩论而大加训斥，他们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sup>②</sup> 要让这些生活安适、养尊处优、大部分有相当资产的中产阶级，屈从于这位家财万贯的贵族革命家的那种莫可名状的盛气凌人态度，他们是忍受不了的。

183 1942年9月底，克里普斯在一种普遍不满的情绪中提出辞职。我从克兰伯恩那里听到一些风声，但是没有重视这件事及其可能的后果。我自然不赞赏他作为下院领袖所欢喜用的那副教训人的腔调，认为他的辞职不会是一个严重的损失。第八军正在埃及准备展开最重要一次沙漠战役，英美舰队即将驶往北非。值此否极泰来之际，一场政治危机将实在是不幸的。克里普斯以国事

<sup>①</sup> 丘吉尔：《命运的关键》，第498页。

<sup>②</sup> 莫里森，前引书，第215页。



为重,同意暂缓辞职,至少再等三、两个星期再说。

在11月这一个月中,丘吉尔得以说服克里普斯继续留在政府里面,并且不胜明智地邀请他担任一个能充分发挥其行政才能和组织能力的职务。显然在华盛顿需要有一个阁员级的大臣主持英国各式各样有关财政和供应等方面的代表团的五花八门的 活动。为此,他作了一项令人钦佩的抉择——在战时生产方面我曾与之合作无间的一个老友卢埃林上校膺选主持其事。这就空出飞机生产大臣一缺可供安排了,因为在几个月以前,卢埃林已经继穆尔一布拉巴松担任了这个职务。这样在下余的战争年月中就 把克里普斯稳稳地安置在这个人地相宜的职位上。但是正如后来我自己组织或改组政府时所了解的那样,在一届政府的微妙筹组中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上自阁员,下至最卑微的小卒,无不受到牵动。

调赫伯特·莫里森补战时内阁中克里普斯的遗缺,既不需职位的调动,而且非常合乎莫里森的口味。对我不幸的是,克兰伯恩一则因为近几个月来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一则因为他担任的上院领袖角色任务繁重,同意接受以前由克里普斯担任的掌玺大臣的遗缺。结果则非为殖民事务大臣一职作出任命不可。膺选的是奥利弗·斯坦利。斯坦利,他自1940年5月间张伯伦政府倒台以来一直没有担任职务。在过去我们同任议员的历届议会中,他一直是我的朋友,实则是莫逆之交。他曾经同人合写了那本在1927年出版的《工业与国家》小册子。<sup>①</sup>何况正如中学生常常说的那样,“我们彼此象是一家人”。我们在彼此家里留宿,一道猎野雉,并有很多共同的 朋友。他在鲍德温和麦克唐纳政府中的步步高升,青云直上,我毫无不快之意。我们在议会中有时有些小冲突,但决不是恶意的,或有伤交情的。<sup>②</sup>在张伯伦政府中,因政见分歧而私人感情开

① 见本书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第173页。

② 同上书,原书第298—301页。



始受到影响时，我们的关系曾经有过一定的紧张。在艾登辞职时，正如内阁中其他比较年轻的阁员一样，他显然深感不安，但是他却没有采取行动。年轻阁员提出抗议之说甚嚣尘上，但也未见诸事实。同样，在慕尼黑之后，我认为他和另外几个人肯定会步达夫·库珀的后尘，却又只是密云而无雨。这不是由于斯坦利缺乏魄力，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经表明是富有这种品质的，而是由于他自我怀疑或缺乏自信。因为他在张伯伦政府中曾身居高位，所以注定丘吉尔在1940年5月是不会延揽他的。过去两年半他一直以上校衔工作于联合计划处。丘吉尔之所以决定重新起用他，无疑一则是由于他对于我曾经有幸相识的这位最投合人意、最有才智的人表示的个人关注，一则是出于想要争取斯坦利派那个保守党内的强大集团的愿望，一则是基于对奥利弗的天赋和资历的重视。

我在任何工作或任何职务中，和奥利弗·斯坦利原都相处很愉快的，唯独目前从事的这项工作，展望前途，却不禁有点惴惴不安。就克兰伯恩来说，作为一位上司，也许彼此会有意见分歧，但是可以毫无拘束地进行讨论，争论点也都是明确的。一旦作出决定，接着就可以采取行动。同时他也情愿把相当大的权限交到我手里，并在很大的活动范围内给我以充分支持。因此我有着与一般政务次官不大相同的地位。我在克兰伯恩的完全同意之下，自行兼任经济司司长。我可以解决该司职权范围内的一切问题，并在国内外展开工作。此外，我还是殖民事务部在下院的唯一代表。现在我要失去所有这一切的有利条件了。过去十八个月，我的主管大臣，先是比弗布鲁克，后来是莫因和克兰伯恩，都身居上院；有了这番经验之后，现在我感到自己不但地位降低而且权限也缩小了。过去议而决，决而行，有时甚至大刀阔斧，在新的安排下却不大可能了。彼此的关系也许是令人神往的和愉快的，生活也是既有风

趣而又轻松的,但总觉得事情不太对劲。而且,因为斯坦利是一位卓越的议会雄辩家,所以我发觉下院并不需要自己,在部内也同样渐渐变得无所作为。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充满了沮丧情绪。

有些报纸认为殖民事务部应该在上院有一位代表,上院对整个帝国有着丰富的经验和贡献,它曾对殖民事务部的大臣有过这一要求。议会采访员风传,为了应付这种局面,要封我一个爵位。这时我幸而得以避免了这种命运,我希望,如果天假以年,能够始终不受封典。几天之后,这种想法为另一些人所反对,他们认为我“在下院还会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这是一个回想起来颇为有趣的插曲,因为我还有二十年以上的一段长路要走。

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坦率地同丘吉尔谈一谈我的前途问题。但是我还不失为聪明地先同布雷肯讨论了一下。这几个星期,北非的形势发展不很顺利。尽管登陆成功,达尔朗的事故却给政府造成了许多麻烦,无论对英国公众而言,还是就我们的美国盟友而言。丘吉尔忙得无片刻之暇,布伦丹不认为在这个时候去利用我在丘吉尔那里积累的友谊是明智的,我把我已经拟妥的一封辞职信拿给他看,这封信我一直保存至今。布伦丹力劝我少安毋躁。

布伦丹·布雷肯被很多人看作是英国生活中一个多少有点神秘的人物。在三十年代他同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公司那家重要的印刷出版公司发生关系时,我和他初次相逢。他后来进入了实业界的上层。满头红发,一张白脸,而且知识异乎寻常之广,广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是教师和主教问题的手屈一指的专家),他是伦敦中心商业区和下院的一个奇怪的新生儿。他在丘吉尔韬光养晦最不幸的日子,同他结成莫逆之交,在丘吉尔最失意的时候给以最忠实的支持。有些人惧怕布伦丹,认为他是一个冒险家。事实上,他性格温良,为人可亲可近。他本性仁慈,并能于不动声色、毫不勉强之中施仁行惠。但是他在这个阶段上的重要性是他同丘

吉尔的亲密友谊，对于丘吉尔，他可以直言不讳，毫无顾忌。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认为布伦丹的劝告是既客观而又明智的。当时我不曾提出辞呈而决定压下我的自尊心，耐心等待，结果无疑是对我有利的。一生的命运就取决于这类小问题。斯坦利在 11 月 22 日奉命履新。结果表明，我只不过才等了一个月的时间。

## **第二篇 地中海战役**

**(1943年1月—1945年5月)**





地中海战役是英美两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合作；肩负保卫埃及的重担艰苦备尝达两年之久，并互有胜负的沙漠战争则是英国独力担当的。诚然，美国给予了慷慨的武器供应，特别是在危急时刻调派谢尔曼坦克，对最后成功已经证明是一重大贡献，但是在盟军登陆北非<sup>①</sup>之前两个星期所取得的阿拉曼战役的决定性胜利<sup>②</sup>，却是靠了在英国将领指挥下的英军和英帝国的部队。到12月中旬，第八军追击德军和意军已深入利比亚，并于1943年1月23日占领的黎波里。这支英国部队在他们所向披靡的大捷之后，随即置于一个统一的盟军总部的指挥之下，此后在这个辽阔的地区直到战争结束一直继续进行的战斗，就由英美两国共同承担了。

虽然原来的中东指挥部——范围和重要性此时已经大大缩小——仍完全由英国负责，但是此后约有两年半的时间，整个地中海地区的重要决策，却是经由英美参谋长联合会议核准并在美英两国政府的最后监督下，由盟军最高统帅作出的。整个战役的指挥系统始终是根据伦敦和华盛顿共同商定的以“火炬”——盟军在法属北非登陆——为代号。这是为了给1944年横渡英伦海峡的那次天字第一号的袭击——著名的“霸王军事行动”<sup>③</sup>——树立楷模。

---

① 1942年11月8日。

② 1942年10月23日。

③ “霸王军事行动”是英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代号。——译者

这样的合作是史无前例盖世无双的。

盟国的军队过去也常常并肩作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是这样。各国的部队有时——虽然并不常见——也置于一个司令官的指挥之下。但是盟军总部<sup>①</sup>这个组织是独一无二的，其中设有完全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参谋部，英国和美国的军官在这个参谋部里不是作为他们本国的代表，而是作为本单位的成员参加工作的。这个试行办法的成功大部分——纵使不是全部——是由于第一任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所建立起来的信心。从他身上焕发出象马尔巴勒和威灵顿这类历史上伟大的指挥官同样的公正和果断。然而，尽管这个体制在长期战役中，自1942年秋季登陆时起至1945年5月德国最后投降时止，一直原封不动地保持了下来，但是两个盟国之间还是有一些明显的、而且有时是尖锐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有时是从伦敦和华盛顿向下面反映出来的；有时则是由当地所造成的情况而向上面发展出来的。

这些问题的军事方面，除非有涉及政治问题的地方，姑且不论。但是，关于美国和英国在战争概念上的基本分歧，还是不能不略赘数语。概括地说，美国人认为应当选定一个有利的地方同当前敌人的主力军作战，他们把一场会战看成多少有点象一场体育比赛的性质，对于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却不太关心。英国人则倾向于采取更加深谋远虑的看法；战争是政策的继续，而政策与目的是可以变动、可以更改的。这个分歧就是总统同首相长期争执的根本原因。总统希望先在法国境内，然后再在德国西部击败德军，首相则希望不仅以解放法国本土，而且以长驱直下意大利北部和奥地利全境的迅速进军来夺得胜利，从而使西方盟国在可能造成的形势中，以有利得多的地位结束这场战争。

---

<sup>①</sup> 盟军总部——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部的称呼，继续为艾森豪威尔在这个地区的继任者威尔逊将军和亚历山大将军的指挥所。

自然，这种矛盾的观点直到最后打败德国人并把他们赶出非洲以后才暴露出来。但是，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却是当时尖锐而紧迫的问题。美国人担心进一步承担义务将会有损在法国境内的作战行动；英国人则醉心于所谓“软腹部”<sup>①</sup>的论点以及因意大利的失败和投降而会在中欧和东欧出现的那种可能性。除开这些军事和战略争论之外，我还必须坦白承认，英美之间的合作，有时由于我们在一些迫切问题上的许多政治观点不合而要受到十分严峻的考验。然而，历经所有这些压力，合作还是保持下来了。要不是我的美国同僚罗伯特·墨菲的胸襟开阔，要不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豪迈豁达，我们也许一上来就陷入严重困境之中。但是墨菲和我决心引为己任的是，非但决不让我们上司的意见分歧扩大，而且力求把分歧缩小到最低限度，或者至少能在不发生太多磨擦的情况下就地找出解决办法。1944年夏季墨菲离职，我深感痛惜。他的继任者虽是一些富有魅力和令人钦佩的人物，但是他们在华盛顿却不那么受到重视。

在北非，美国人在登陆之前已经同敌军有过初步接触，他们为了使工作顺利并且把所冒的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曾经在许多方面许下诺言，因而多少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但是对于如何处理更广泛的法国问题，在最高决策人之间没有取得真正的一致意见。自然，这反映了华盛顿对维希的长期求爱和伦敦对戴高乐的支持。同海军上将达尔朗所作的安排，虽然从军事角度来看，显然不无理由，但是在英美两国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达尔朗被刺后，美国方面支持吉罗。英国则继续左袒戴高乐。至于这场冲突如何解决，以及这一切对于法国前途产生了什么后果，将在适当的时候再加

---

<sup>①</sup> 丘吉尔在1942年10月后期的“火炬”战役之前，把欧洲绘成一张形似鳄鱼的地图，鳄鱼口部是布列塔尼半岛，“软腹部”是意大利，即谓意大利是易于进攻和取胜的地方。——译者



192 以叙述。在那几个月中，我初次得到了这类外交的经验教训。虽则我们终于能如愿以偿而让我们喜爱的人获得胜利，但这部分是因为美国人理所当然地不肯去干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蠢事。他们一旦认识到吉罗的确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就弃之如敝屣了。

同样的分歧——虽然其所表现的形式也许是不那么普遍为外界所知悉——贯穿在我们占领意大利的整个期间。美国人急欲废黜国王。他们出于某种无法理解的理由，确信共和制比君主制好。我却认为大谬不然，因而竭力维持君主制原则，并给以公平机会。我现在还认为，如果当时做到了这一点，如果美国方面的压力不是那么猛烈，意大利的公民投票很可能会赞成君主制的。我相信，这会有利于意大利人民。无疑，在这个问题上又是另一个磨擦的根源。

虽则盟国在处理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问题上有分歧，然而这些分歧却还没有严重到在英美两国舆论中引起任何严重不安的程度。就我们为之结盟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消灭独裁和恢复全世界自由这一目的而言，这些分歧，相形之下毕竟是无关重要的。何况，在艾森豪威尔及其历届继任者领导下的盟军总部和所属各指挥部又都充满团结精神，主要由于这一点，也就没有造成任何真正的损害，分歧没有夸大或恶化。反之，却尽可能地缩小到最低限度，并加以弥补。对于希腊问题，要想完全避免公开而不受到一点损害，就不可能了。

希腊事件是盟军战役中最离奇的插曲之一。随着德军溃退，英国人就以一小支兵力偕同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有两三个星期，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当共产党人掀起公开革命的时候，这支英国部队和希腊政府就发现被围困在雅典了。受到《泰晤士报》和议会一些左翼舆论支持（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大义凛然、忠贞不二的欧内斯特·贝文的支持）的美国人，拒绝给他们的英国盟友以任何援

193

助,甚至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也照样作壁上观。他们勉强同意了增调英国和印度部队,这些部队终于恢复了秩序,打败了共产党人并使希腊局面得以稍稍稳定下来的“瓦尔基查协定”<sup>①</sup>有了谈判的可能。这支远征军——总数约三个师——的给养则是由一个英美联合总部予以接济。但是不论在盟军总部还是在希腊,无论是在作战计划方面还是在执行方面,都不许美国军官参与其事。因此,美国人是中立的,有时候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中立。持续了几个月之久的这整个事态,没有产生任何深刻的分裂,也没有损害在意大利联合战役中的全面合作而渡过来了,这应归功于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在这种窘境中的手腕,也应归功于那些对于自己所处地位颇为遗憾的美国军官的真诚同志感。这个事件对于我和对于我致力于英美团结的热诚,是又一个考验。

当我们转向南斯拉夫的时候,说来奇怪,美国人支持右翼抵抗运动集团,而我们却支持左翼。这不是由于我们这方面任何理论上或主观上的好恶,而是基于这样一种见解:铁托是共产党人也罢,不是也罢,总归在我们的支援下勇敢地、继续不断地、有效地袭击了德国人。另一方面,我们认为美国人的宠儿米哈依洛维奇似乎已经失去了当地的任何真正支持,已无所作为,或者只能从事于同其他南斯拉夫人的自相杀伐。无疑,在英美两国特工人员之间是存在有某些对立情绪的,从而在国务院和外交部中也反映了出来。但是在这个场合下,也有点象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的情况那样,美国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一次根据早已影响了我们的同样实际理由接受了我们的观点。其间几经出现紧张和困难的时刻,但大都为处理比这严重得多的问题的总部的协作精神予以克服了。结果,当我们在战争结束时,由于铁托元帅占领威尼西亚·朱利亚和

---

<sup>①</sup> 希腊人民解放军于1945年2月12日同英、美反动派在雅典附近签订“瓦尔基查协定”,同意解除武装,交出武器。——译者

194 卡林西亚以及在的里雅斯特的危险局势所造成的困难而大为狼狈之际，美国人以十分得意的心情，给我们以全力支持，虽然其热忱有时令人难堪。

这三十个月是多事之秋，时而严重，时而轻松。所发生的事件构成了一项惊人的记录，其中包括共同的和各别的努力和决心，连同在我们所努力的各领域内的一系列令人为难的问题。这段经过是我们两国有权引以自豪的历史。我不胜光荣地能对那些英雄日子里的成败得失分忧患、共欢乐；能与杰出的军事统帅共事并供其差遣；能与许多了不起的人物密切交往；能结识欧洲许多国家的第一流政治家；尤其是在险象环生、存亡所系的时刻，能以窥测到主宰我们命运、公认为我们十字军主将的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位伟大人物的活动，的确是一桩幸事。

## 第八章 法国的分裂

195

自从法国军队在德国猛攻之下突然地、出乎意料地土崩瓦解并给法国人民造成惨痛后果以来,时间已经超过一代人了。因此,提醒读者回忆一下盟军在北非登陆给法国带来新危机之前的两年半期间连续发生的大事,也许是合适的。

德国的攻势开始于1940年5月10日。不到三个星期的工夫,敦刻尔克的撤退就来了。6月10日,豺狼成性、贪图不费力气而轻易分享一杯羹的墨索里尼,以为英国会立即被迫投降,于是宣战。随着德国人的进逼,法国政府被迫撤离巴黎,首相保罗·雷诺发出了一封向罗斯福总统呼吁紧急援助的临危绝望的文书。雷诺宣称,如果希特勒占领了法国,法国就会“不复存在”。完全忠实于英法条约的英国政府,此时已把所有能够集结起来的军队开回法国,以支援最后的保卫战。但是一切全属徒劳。6月13日,法国政府要求正式解除3月28日缔结的两国都不单独议和的协定。这个要求被拒绝了;丘吉尔和他的同僚们力劝法国继续战斗。6月14日,德国人进入巴黎,法国政府一迁再迁,先迁至图尔,后又搬到波尔多。接替正在崩溃的法国军队总司令甘默林职位的魏刚元帅,拒绝谈判停战条约,如果政府本身不发出必要命令的话。换言之,他要求政治上的投降,而不单是军事上的投降。这就给那些绝对忠诚的法国政府官员造成了无法克服的困难,他们希望仿效比利时政府的先已流亡而让军人去签订投降条件的先例。既有伟大的法兰西帝国在他们控制之下,又有英法联合舰队的不可抵抗的实力予以保护,法国政府很可以迁到北非,在那里继续把仗打下

196



去。但是当权的衮衮诸公却没有什胃口进行这种或其他任何战斗了。6月16日，法国政府重新向它的盟国提出要求。他们力争至少要让他们去问一问停战的条件。我们起初打算同意，如果法国舰队不交由德国控制，并以有关谈判条件征询我们意见的话。这样一项密电已经准备就绪，但最后因为采用了另一个概念重要得多、慷慨得多的函电而将它扣发了。

6月15日，我参加了“革新俱乐部”的宴会。席间我意想不到地发现自己处于形形色色的来宾之中。如果我记得不错，来宾中有法国大使，查尔斯·科尔宾，哈利法克斯勋爵，利奥·艾默里，罗伯特·范西塔特，阿瑟·索尔特和克朗·戴维斯。还有一些人我记不起了，因为这是一次规模相当大的聚会。利奥·艾默里事先拟妥并散发了一份文件。文件在这个险恶万状的紧急关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革命性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可以把剩下的法国精神和物质力量集结起来进行坚决抵抗。它的内容无非是法英的全面联合。<sup>①</sup>在场的某些人无疑是事先有过商量的。即使如此，这样一个庞大的、新奇的建议能得到全体一致的支持，似乎也是很寻常的。

第二天，内阁考虑了这个建议，讨论的结果是起草了一份正式文件，这就是著名的“伦敦宣言”：

……两国政府声明，法国和大不列颠将不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法英联邦。

197

盟邦宪法将规定成立国防、外交、财政和经济政策的联合机构。

凡属法国公民均将立即享有大不列颠的公民权；凡属英国臣民均将成为法国公民……

这个宣言——现在几乎无人记起了——得到了战时内阁和所有三个政党领袖的认可。为了显示团结，丘吉尔邀请艾德礼和辛

---

<sup>①</sup> 这份历史性文件至今还保留在我的记录中，日期是6月14日。

克莱同他一起与雷诺会面，讨论宣言并促使法方予以接受。

我们希望这个不以最近的将来为限而旨在垂诸万世的惊人提案，将会使法国政府重整旗鼓并保住雷诺的地位。我们也希望法国的大量军队能撤到英国境内或北非，在法国政府当局的领导下，凭借法国舰队的支援，继续战斗下去。唉！竟然事与愿违。这个原会使法国境内外的战事必然延续下去的建议，竟未能引起失败主义者和大多数一蹶不振的法国部长们的重视。雷诺辞职了；贝当元帅奉法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的授权，组成了新政府。

随之而来的那一段令人兴奋的时日，是常为人所乐道的。丘吉尔向贝当及其阁僚发出了一个动人的呼吁，力劝他们不要交出舰队。在回答中得到的各式各样保证多少是令人满意的。海军上将达尔朗这位法国海军首领起初说，他将把舰队开往安全地带，但是当他进入新政府，担任了部长之后，他就屈从于老师<sup>①</sup>及其周围的失败主义者了。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法国是先内腐而后外侮生。”停战协定的谈判于6月22日结束，结果是法国军队投降，将全国分成了被占领的法国和未被占领的法国两个部分。有些议员和部长在前一天已动身去北非，希望在帝国的基地上建立起一个继续战斗的法国政府。但是摩洛哥总督诺盖将军把他们全部逮捕，送回法国。在这些勇敢的人们之中后来判处死刑的至少有一人，198其余则下狱监禁。为了挽救他们国家的荣誉，他们是鞠躬尽瘁了。

关于舰队问题，德国人想出了一个特别阴险的计划。要船舰集中在特定港口，然后再在德国或意大利的监督下复员并解除武装。法国政府认为——或者自我解嘲地认为——根据这些条件，他们已经履行了对他们英国盟友的承诺。但是这些船舰是否能一直保持解除武装状态，却没有任何一种保证。事情是清清楚楚的，德国人所以不去真正要求舰队投降，是为了避免对方下达凿沉船

<sup>①</sup> 按指贝当。——译者

舰的命令。实际上他们早已定下了一条妙计，要把舰队稳拿到手。舰队迟早是要由德国或意大利水兵来接管的。

然而，不让这支庞大舰队成为德国人手中的一个有效力量，这对于我们是事关重大的。我们的前途，以至我们的生存，就取决于是否能使这支舰队无法调动或予以毁坏。斯堪的纳维亚战役，尽管是失败的，令人沮丧的，但有一点是重大成功的，那就是使德国舰队不能发挥任何作用，至少暂时如此。而法国的海军既庞大又现代化，其中还有一些最优良和最新式的船舰。我们必须尽我们力所能及努力争取。这在某些场合，我们并没有因被迫而演成袭击一个老朋友和盟国的悲剧。停泊英国各港的法国船舰轻而易举地就夺取过来了；亚历山大里亚港和马提尼克岛的船舰经过谈判后也停止动员了；在卡萨布兰卡港，一艘非常重要的战舰“让·巴尔”号尚未竣工。但是在奥兰，除逃往土伦的战列巡洋舰“斯特拉斯堡”号外，其余的船舰英国却不得不以一次突袭予以摧毁。这是7月3日的事情。接着是法国对直布罗陀的一次空袭。“里舍利厄”号在一次最令人沮丧的战斗中在达喀尔被击伤，失去了战斗力。停泊在阿尔及尔的船舰逃往土伦，加入了法国的主力舰队，它们在那里，除后来一支分遣队抵达达喀尔外，直到1942年11月，一直是争夺的对象和威胁。

199 这些不幸事件在法国海军之中自然造成了痛苦，对于因自己所遭到的厄运而茫然不知所措的法国人民，无疑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这些无情的决定却是正确的，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当时孤军作战的英国，其生死存亡乃取决于制海权，对于我们岛国的入侵看上去正迫在眉睫。甚至在1940年8、9月的英国战役之后，这种危险还继续存在了一、两年。要是法国舰队成了德国人手中的有效工具，我们原已朝不保夕的生存机会，的确就会更加危如累卵了。

1940年7月1日，法国政府从波尔多迁到维希，几天之后同英国断绝了正式外交关系。保守中立的美国承认了法国新政府，并派遣行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海军上将莱希为大使。后来，我们能以通过11月间到达维希的加拿大代办皮埃尔·迪皮伊，恢复了同法国的某些非官方接触。必要时还能由英国和维希驻马德里的大使进行非正式的会谈。在此期间，第三共和国的那位和蔼可亲但庸碌无能的最后一个合法总统勒布伦，终于在7月11日退出了舞台。贝当元帅成了四肢不全、颜面丢尽的法国正式元首。至少虚有其表的政权已落入这位年迈而仍受人尊敬的人物的软弱无力的颤抖的手中。

决不放弃对法国的希望的丘吉尔，力图“在维希政府中策动一个里应外合的密谋，以便使某些议员……能潜逃北非地中海沿岸诸国”。<sup>①</sup>但是，这种希望是微乎其微的。海军部担心维希甚至可能会不惜和我们兵戎相见，据认为海军上将达尔朗和皮埃尔·赖伐尔都在对贝当元帅以此相逼。这种担心因10月24日贝当和希特勒在蒙图瓦尔的会谈而加重了，当时两个地位绝不相称的对手曾就对英战争中的“合作”原则达成协议。几天以后，声名狼藉的右翼失败主义分子保罗·鲍德温的外交部长一职，由一个甚至更加可悲的人物赖伐尔继任了。

这时法国官方对英国的态度是既恼怒而又失望。维希原料 200 定，可以借英国的早日败绩和投降来安慰自己的良心，并结束战争。然而，那些生性愚蠢的顽强岛民却依然坚持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有害于法国的那种毫无希望的抵抗。他们甚至鼓动由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低级军官领导几个法国叛逆向贝当元帅的合法当局进行挑战，并求助于伟大的法国军队和人民的悠久传统，以激起共鸣。同时，英国的封锁正在造成种种不必要的困难。维希向华盛顿

<sup>①</sup> 丘吉尔：《最光辉的时刻》，第450页。



求援，后者有意对伦敦施加压力，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维希)对进口的需要是如此过分，而且这是受德国人的唆使又如此明显，从而使伦敦得以因循延宕，并且终于拒绝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因为维希既不在法国本土、也不在法帝国内提供任何东西作为对这些要求的酬答。

12月中旬，赖伐尔的解职和被捕似乎激励了一些人，因为他的继任者皮埃尔·弗朗丹是一个风格比较好的人。何况，赖伐尔虽由于德国人的干涉而被释放，但并未立即复职。他还必须再等十八个月才有机会使他极尽不忠不义之能事，发展到恶贯满盈的地步。

1940年慢慢地临近了年终。不列颠之战一直在空中进行，并已获得胜利。广大平民虽惨遭轰炸之苦，但是历经轰炸却依然能生存下来。预料中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入侵虽仍咄咄逼人，但是尚未实现。在整个这段时期法国是束手无策，希望毫无。法国的部长们除开撒谎骗人之外，别无本事。贝当元帅的政府已经成为条顿族和意大利独裁制的脆弱的仿制品。所有公共建筑物上足以令人自豪的革命口号都被撕毁殆尽。自由、平等、博爱不再是法国人民的鼓舞力量了。然而失败主义者和卖国贼只不过是少数，尽管是一个活跃的少数。法国国内外有着无数的男男女女无声地哀悼他们祖国的含垢忍辱。

但是，已经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其他一些人立即团结在他的周围。1940年6月17日，戴高乐将军在雷诺辞职和贝当就任后，立即动身前往英国。他曾经在雷诺政府中任国防部次官。他曾经以  
201 新型战争观点的代表者而知名。尽管军衔不高——在五星上将的群雄中只是一个二星将军——但他在法国军界却享有盛名。6月18日，他从伦敦发出广播，呼吁全体法国人民继续战斗。五天后，他所组成的“临时法国民族委员会”被英国政府承认为“代表坚决

进行战斗的独立法国的基本力量”。这个格局因8月7日英国政府和伦敦委员会<sup>①</sup>签订的协定而得到了加强。物资援助须给予那个后来人们称为的“自由法国”，为法国部队或个人效劳的期限和条件——包括戴高乐接受英国的全面指挥——都一一解决。虽然英国政府不能在这样一个文件中绝对保证战后的法国和法帝国的完整，但是他们承诺尽力而为。我们过去对遭受德、意蹂躏的其他所有盟国所持的这种态度，似乎曾在戴高乐思想里撒下了猜疑的阴暗种子，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现在一切都已一帆风顺。

戴高乐接着开始了一个团结法帝国的大胆的、富于理想的尝试。一些较小的殖民地，如法属大洋洲和法国在印度的小块领地，立即宣布了它们的效忠，新喀里多尼亚踵随其后。在印度支那，卡特鲁总督同情戴高乐，但是没有能把当地政府一起带领过来，它竟被一个亲维希的巡抚取而代之了。然而就在1940到1941年这段期间，印度支那渐渐为日本侵略者所并吞。在8月间，勒克莱尔和布瓦朗贝尔奉派为密使前往法属赤道非洲，到了月底，乍得、加蓬、中央刚果、喀麦隆和乌班吉沙里都相继宣布它们拥护自由法国。在乍得一利比亚边境上，反抗意大利人的一些小规模军事活动实际上已经开始，这种活动在两年半以后，当勒克莱尔及其部队前来与英国第八军取得联系时，达到了最高潮。

这些地方虽有价值，却不是最大或最重要的殖民地。北非和 202 西非依然是重大的危险所在和争夺的目标。1940年9月底，英国—自由法国对达喀尔的袭击是一次彻底的失败。自由法国的军队遭到了维希民政当局和武装部队的极端仇视。显而易见，法国人之间的一场内战已经开始，并将同以往一样残酷地进行下去。法国当局和整个法帝国的人民期待从德国统治下解救出来，如大旱之望云霓，然而却成了镜花泡影。看来他们最痛恨的是那些法

<sup>①</sup> 临时法国民族委员会当时设立在伦敦，故简称为伦敦委员会。——译者

国背叛者们来“解放”他们。战争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不让他们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呢？戴高乐所能马上做的是给他所领导的运动以必要的形式。设有委员九人的帝国国防委员会得以成立，委员之中有几个是功勋卓著、经验丰富的人。11月发表的一项宣言明确了自由法国对宪法和第三共和国的态度。戴高乐的论点是，维希政府的行动已经超越权限而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根据。他和他的国防委员会认为自己是临时权力机构，可以在法国人民能够自由选举的时候对他们所选出的代表大会负责。

这样，到了1940年年底，两大壁垒已厘然划清。戴高乐领导下的自由法国否认停战条约的合法性，认为维希政权没有宪法上的或法律上的权力；自由法国代表法国的荣誉和法帝国的整体，准备尽其所能，尊重同盟国签订的协定，维护法国人民的光荣传统，直到继黑暗和痛苦的长夜之后迟早必将出现的黎明。另一方面则是法国本土已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由德国军政府占领，另一部分则是在依靠德国势力存在的一个政府领导之下，而这个政府只是软弱无力地试图依靠把纳粹和法西斯制度中最恶劣的成分引进法国生活才得以苟存下去。

在1941和1942年整个这段期间，维希政府已经堕落到对他们的德国主子越来越卑躬屈膝、越来越俯首听命的状态；贝当元  
203 帅对任何同停战条款的正确解释背离之处，都是坚决抵制的。可是，达尔朗于1942年2月出任副总统和外交部长则是贝当元帅地位日益削弱的一个标志。那年春季，德国人想要利用叙利亚，以便支持伊拉克的拉希德·阿里的反英运动，达尔朗对此欣然从命。因此在5月间，德国和意大利的飞机开始大量飞抵叙利亚——当时法国的一个托管地。为了重建军事地位并保卫这个危险的侧翼，我们除了发动进攻之外，别无选择。这次袭击再一次采取了自由法国和英国部队联合行动的方式。象在达喀尔一样，维希的军队



再一次表明对他们法国同胞的敌视几乎更甚于对英国人。经过一场短暂的战斗之后，局势明朗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这次背信弃义的责任自然应归诸达尔朗，这决不是到了第二年就能淡忘的。

1942年4月间赖伐尔东山再起，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又受到了新危险的威胁，所担心的是日本人有攻夺迪戈苏瓦雷斯的重要港口之虞。因此决定占领这个非常宝贵的基地，如果可能，就占领全岛。鉴于过去的经验，这样的一次远征就完全由英国承担了。

1942年5月发动的这次军事行动，成功地达到了它的第一个目标，它使维希派驻的总督得到一个归附于盟国事业的机会。但是效忠的传统再一次证明是非常强有力的。直到11月初，该地总督才被迫接受我们的条件，而把岛上的民政权留在法国人的手中。有些人认为，随着战争的进展和最后胜利因美国的参战而十拿九稳，法国的民政和军事当局未始不会洗面革心，弃暗投明，可是这一事件却再一次给这些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艾登根本不期望情况有任何改善。他成功地拒绝了美国劝诱我们不顾封锁而容许大量进口货输入法国的各式各样的努力。但是，当这类谈判在进行的时候，就连华盛顿对于维希所表现的一连串阴谋诡计也惊愕不置。在同海军上将莱希的交谈中，赖伐尔力言同德国达成导致持久和平的谅解是可能的，而说俄国和英国的胜利，将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风靡于欧洲。 204

专心致志于远征北非的丘吉尔，仍然是抱着希望的。由于特性豁达，他不能相信法国人已经堕落到他们的言行所表现的那种程度。他差不多是在想方设法为他们开脱。毕竟，法国人以他们的积弱之势，除了对他们的德国主子实行妥协政策以避免德国人对法国全部占领外，还能作些什么呢。“他们已经忍受了奥兰、达



喀尔、叙利亚和马达加斯加之败以及英国的封锁和英国的空袭而尽可能忍气吞声……对于‘一个自己的政府要靠敌人的宽容而苟延残喘的战败国中普遍存在的反常情况’，是应该曲加体谅的。”<sup>①</sup>

丘吉尔就是这样依然抱着侥幸于万一之想，希望法国舰队能开往非洲，维希或它的地方官员会公开或暗中欢迎英美军队的到达。但是艾登坚持己见。诚然，不论是在法国占领区还是非占领区，绝大多数法国人都盼望盟国的胜利。可是他们却是无能为力的。

尽管见仁见智，议论纷纭，戴高乐将军的声誉，在英国公众的心目中，却有了稳步的提高。他的偶尔大动肝火和遇事掣肘，只是为政府最上层所熟知。他的运动似乎正在富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他在1940年10月间建立了帝国国防委员会，一年之后又把他原来的这个委员会改组成为一种内阁。他的许多支持者都是卓越不群、精明强干的人士，新的依附者络绎于途。希特勒进攻俄国的后果之一是加强了他的地位。维希和莫斯科之间的外交关系破裂了。俄国驻维希的大使鲍戈莫洛夫被调往伦敦作为同法国民族委员会联系的俄国代表。在法国国内，共产党人停止反对抵抗运动，并开始同它合作。尽管美国方面抱敌视态度，既不信任戴高乐的办法，也不信任他们所认为的戴高乐的政治目标，但是在1941年11月，租借法案还是把自由法国包括在内。虽然在同年12月间自由法国的军队无视美国人的愿望，在纽芬兰南海岸外的圣皮埃尔岛和米克隆岛重新驻扎下来，但是这段插曲在华盛顿所造成的不满很快就消失了。何况，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也希望能取得利用法属大洋洲基地的便利。因此，在1942年3月间，美国政府承认法国民族委员会对法属太平洋的有效控制，并允许他们的

<sup>①</sup> 卢埃林·伍德沃德爵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伦敦，1962年版），第113页。

代表参加盟国的太平洋作战委员会。4月间，美国同样承认了自由法国对法属赤道非洲的管辖权。在整个1942年，戴高乐在法国国内抵抗运动中的地位提高了。分散的集团开始合并，并把在伦敦的委员会视为它们的最高当局。由1942年空降法国的让·穆兰所组成的国民抵抗委员会渐渐建立起来。最初称之为“自由法国”的戴高乐运动现在正式改名为“战斗法国”，作为希望在他们祖国的最后解放事业中能担负全部责任的一个象征。

戴高乐在英美登陆北非时的地位可以简略予以扼述。除北非和西非、印度支那和加勒比海之外，他有效地控制着整个法帝国。马达加斯加岛即将置于他的管辖之下。他在两年的奋斗中所获得的威望和权力，的确比他在1940年6月的那个关键性时期作为一个亡命者和放逐者而来到英国的时候，看来可能得到的要大得多。

那末丘吉尔又为什么接受了这样一个决定：不仅仅不让自由法国的军队参加英美对北非的进占，而且凡是有关远征的情报也都不让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委员会知道呢？丘吉尔明知“故意把戴高乐排除在一切计划之外的这种作法所给他的侮辱的严重性”。<sup>①</sup>另一方面，丘吉尔也知道只是由于他的说服力，才使美国人放弃了在法国登陆那项时机未成熟的试图而赞成了在北非的冒险行动。为了把他们拉过来，他承认了美国方面的指挥权以及美国人在远征中的主角地位，尽管事实上不论从海上、陆上或空中所供应的大部分兵力，都是来自英国的。同时英国人也必须承认，他们在达喀尔和叙利亚的经验加强了这样一个论点：如果把自由法国的军队排除在外，盟军可能会更受到欢迎，而美国人不许戴高乐参加的决心又那么坚定。

如果不用自由法国的军队，那就产生了怎样和何时通知戴高乐这第二个问题。安全是成败所系。白厅普遍相信，作战秘密以

<sup>①</sup> 丘吉尔：《命运的关键》，第542页。

往曾经被自由法国方面泄露出去过。无论这是真是假，冒不必要的风险总是没有道理。所以，丘吉尔就承担了在登陆前夕通知戴高乐的任务，他竭力安慰他，使他确信，所以没有把他们包括在内，是因为“火炬”战役主要是美国的作战计划，而不能不尽可能秘密进行，决不是因为英国对法国民族委员会缺乏善意。为了让这一剂苦药易于吞服，他又补充说，拟于当年年底以前把马达加斯加岛最后转交给自由法国政府，并将随即任命戴高乐派的勒让蒂约姆将军充任总督。

在美国参加对德战争以前，即1941年12月以前的那段时期，国务院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同维希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以便得知德国方面的一切新要求以及维希方面的一切新让与，的确是符合普遍利益的。他们为达到他们目的所选择的工具却无疑是不理想的。有那么一些人，尽管不能用明白易懂的法语同任何法国人交谈，但却自以为是法国人心理状态的无与伦比的知心人，海军上将莱希就是其中之一。甚至就在海军上将的工作班子中，对他期望最殷的人，也怀疑他是否人地相宜。他发送的报告是无济于事的，他的态度始终对英国政府不利。但是美国政府还误以为他们在法国特别受欢迎，美国人民多少也是这样。英国人由于几世纪的对抗和战争是被憎恨的；法国人则由于拉斐特和十八世纪战争的缘故，却是美国传统的朋友。此外，许多美国旅行家长久以来所表现的对巴黎比其他任何城市的喜爱，也被认为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巴黎是美国游客精神上的故乡，一般认为，每个善良的美国人都希望能死在巴黎。

所有这一切对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都起了有力的影响，再加上他对自由和民主平等的真诚热爱，更有助于使他深深怀疑戴高乐的被人们所认为的独裁倾向。因此，国务院在总统为了不同的理由所给予的支持下，常常切望同维希进行某种合作。他们疑心



戴高乐想利用这次战争和他与英美盟国的关系，在法国解放后硬把自己强加于法国，他们不相信他反复重申的有关法国民族委员会的临时性质的宣言以及委员会要把它的权力移交给自由选出的法国议会的决定。

美国政府根据他们那些已经在北非活动了几个月的谍报人员的报告，相信法国政府中的一些领导人以及许多重要的陆、海军首脑，都欢迎以在美国指挥下发动的登陆作为解放法国本土的一个步骤。计划中包括有这样一点，就是要把一位杰出的人物——亨利·吉罗——送进来领导这个运动，此人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曾经被捕入狱，后来逃出，躲在法国南方。很大的希望是都寄托在他的个人威望之上的。

戴高乐的处境是非常微妙的。但是，如果远征按照所希望的 208 那样进行，如果吉罗的权力在阿尔及尔和北非其他地区得到承认，也许就不会造成任何严重的危害了。吉罗毕竟没有同戴高乐争吵过。他没有机会这样做，因为他刚从德国集中营里逃出来。他对维希政府的停战条约或任何罪恶都不负任何责任。不论人们对他的能力有什么看法，对他的品德却无可非议。他的履历是清白的，无瑕可击的。而且，他在北非治军用兵，是成功的、卓越的。

不幸，盟军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的登陆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猛烈反抗，而且当吉罗到达阿尔及尔指望接管最高指挥权时，第一个反应就令人沮丧。对他的接待非但冷淡而且怀有敌意。法国的司令官没有一个承认他的威权或接受他的领导。因此，艾森豪威尔的副司令官马克·克拉克将军不得不于11月10日向直布罗陀总部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报告说，吉罗已被证明是一个不可靠的人了。要想使战斗停止下来并把伤亡减少到最低限度，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尽快同海军上将达尔朗达成协议，此人也许是适逢其会，也许是早有筹谋，碰巧在英美进攻的时刻来到北



非。他在11月5日到达,表面上是为了看望他躺在阿尔及尔一家医院里病重的儿子。达尔朗在法国政府中的资历和地位保证了维希方面的法国人士对他的完全忠诚。要是他不在阿尔及尔,吉罗也许还有一点希望;但是由于达尔朗的到来,全体——或者说几乎全体——海军上将、陆军上将、总督和他们的僚属就都指望他作为他们的长官来负领导之责了。艾森豪威尔来不及去同华盛顿或伦敦商量。达尔朗自己踌躇不决;但是在克拉克将军大力催促之下,他终于同意下达整个北非全面停火的命令。“他‘以(贝当)元帅的名义’总揽整个法属北非领地的全权,并命令全体官员各守岗位。”<sup>①</sup>他的命令得到了贯彻,并由于那个后来通称为达尔朗—克拉克协定的安排,盟军才未遭抵抗而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大部分地区站住了脚。此外,布瓦松将军也同意把法属西非拉过来。

这个协定是在1942年11月22日以完整的形式签订的。它建立了管理整个地区的临时机构,颁布了盟军总司令的权利和权力的细节。虽然这个协定后来通过协商作了修改,但仍然长期是调整和确定盟军地位的法律基础。

法国本土接连发生了一些大事。登陆是在11月8日进行的。9日,德国人在维希的认可下开始把军队派进突尼斯,驻守那里的法国总督海军上将埃斯特瓦接受了维希的命令。11月11日,德国人违背停战条约,占领了整个法国,达尔朗立即被贝当解职。他命令法国舰队离开土伦,加入盟军,但未予照办。11月27日,靠了少数军官的勇气,阻止了德国人正要夺取的法国船舰。象盲目反对英国、拒绝接受达尔朗的命令或听从其呼吁的海军上将德拉博德那样的英勇水兵们,虽然心乱如麻,还是以凿沉整个舰队的计划挫败了德国人。在沉没于港口的法国强大海军的七十三艘舰艇

<sup>①</sup> 丘吉尔:《命运的关键》,第558页。

中,计有主力舰一艘,战斗巡洋舰两艘,巡洋舰七艘,驱逐舰和鱼雷艇二十九艘,潜水艇十六艘。<sup>①</sup>

戴高乐对达尔朗—克拉克协定的反应是迅速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给他的负责行政官和司令官的传阅文件中,他明白表示,清除那些曾经接受维希命令的“罪人”,是他同北非任何法国当局合作的主要条件。

英国公众和英国政府中的大部分人都心烦意乱、怒火中烧。他们对于把法国糟蹋到如此地步的那些人——无论是在战前或战后,无论是维希政府的成员或非成员——都是非常鄙视的。他们看不起那些因害怕左派力量日益增长会使他们失去财产,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失败主义或亲德道路的右派男男女女。我们的舆论也同样认识到,共产党在英国的人数和影响都还薄弱,在法国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也已经背叛了法国。只要俄国保守中立,这场战争就是违反人道的罪行。只是在俄国受到攻击的时候,共产党人才团结到抵抗运动的阵营中去。虽然如此,在指责这两种极端的同时,我们却对法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怀有深厚的同情。我们钦佩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法国军人以及一些偏远的殖民地当局和人民在停战条约刚刚签订之后的沉着坚定。但是,我们看到有那么多法国人对戴高乐明白表示敌意,老实说是惴惴不安、惊愕不置的。我们不懂为什么自由法国不论到什么地方,即如在达喀尔或叙利亚,所受到的不是欢呼喝采而是枪弹炮火。为什么会把戴高乐看作卖国贼而不是救星?我们不理解要求对顶头上司绝对服从的纪律的真谛奥义。然而对于身受政权一再更迭之苦而忠节也经常随之转变的一个民族来说,这种纪律正是一个天然的、或可理解的避难所。

公众勉强接受了丘吉尔所坚持的——有人认为是屈从的——

<sup>①</sup> 丘吉尔:《命运的关键》,第 563 页。

由罗斯福总统来领导登陆计划的拟订和执行。但是同达尔朗所签订的协定一公开发表，则群情哗然。艾登在给华盛顿的一封信件中，英国人民感到一桩辉煌的军事行动已经黯然无光了。斯特兰勋爵甚至进而声称总统已逐渐丧失其在欧洲道义上的领导。<sup>①</sup>但是，和英国对所发生的一切同样深感失望的丘吉尔，以他惯有的宽宏大度，坚决维护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决定，而不准备牺牲他对总统和美国参谋部长期追求的成果。他所注意的，不只是阿尔及尔当前的政治形势，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意大利，注视着希腊和土耳其，注视着中欧和东欧的解放。牺牲未来确实是愚蠢的，而未来的一切则有赖于总统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论战如火如荼。甚至丘吉尔也不得不承认“舆论的怒潮”包围了他。随着时光的流逝，群情的激动似乎令人想起了有关慕尼黑的激昂论战。报纸领先，议会和公众也不甘后人。12月11日——登陆后的一个月——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进行了决定性的辩论。丘吉尔忠实地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辩护。他根据纯军事理由进行辩解，并且靠了他极其有分量、有权威的论证，成功地改变了下院的意见。尽管批评开始平息，然而失望和忧虑的暗流却遍及于全国。

在这期间，美国人民和报纸对这项协定几乎抱同样的敌视态度。他们一般对戴高乐还不是全无好感。他们对维希却无友谊可言，不喜欢达尔朗、赖伐尔以至于贝当。虽然戴高乐的某些行为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奇怪的、难以理解的，但总的说来，具有强烈个人主义的美国人喜欢见到一个坚持己见、挺身奋斗的人。虽则戴高乐攫取法属圣皮埃尔岛和米克隆岛引起了国务院的关切，并使年迈的科德尔·赫尔心烦意乱，然而在美国人民看来却无关宏旨。

美国政府，自总统以下，都是受许多复杂和矛盾的动机支配

---

<sup>①</sup> 斯特兰勋爵：《国内和国外》（伦敦，1956年版），第73页。

的。总统相信（实际上证明是错误的），如果把远征作为一个美国的大胆行动，它可能只遇到很小或者根本不会遇到抵抗。他还抱有这样一种看法：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打败德国人，只要有助于达 212 到这个目的，几乎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他象美国将军们一样不重视政治后果。支持贪污腐败、卑鄙无耻的维希一伙可能在欧洲产生的最终结果，在他看来，就象后来对莫斯科让步所得的结果一样无关重要。他处理政治、军事问题，通常是从战术上而不是从战略上考虑的。

1942年圣诞节前夕，达尔朗在阿尔及尔夏宫他的办公室门口遭到枪击，不到一小时一命呜呼。杀人的动机是什么，谁是两天之后经过审讯、判决死刑的凶犯的主使人，都成了随后多次争辩的问题。但是这次暗杀事件至少使一部分争论就此告一结束。

行刺达尔朗，虽然是犯罪行为，但却解除了盟军同他一起工作的烦恼，并把他在盟军登陆的紧要时刻所能给予的一切便利都留给了他们。<sup>①</sup>

不幸，继任人选问题又把法国引向了新的分裂。面对这个刻不容缓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将军是根据一个看上去他唯一可行的办法行事的。他召集了法国的主要名流，保证吉罗当选来填补空缺。这样，吉罗将军就以军民统监的头衔成了法属北非和西非的高级专员。

圣诞节那天——谋杀事件的后一天——戴高乐建议在北非召开一次讨论会。吉罗借词推诿了。他声明时机还不成熟，他没有同戴高乐运动发生任何关系就开始行使他的新职权了。戴高乐受到了严重损害。他认为吉罗的任命是在盟军压力下作出，并由所谓“帝国委员会”予以认可的，而“帝国委员会”实际上是维希行政长官们的议会，这批人最初在不同程度上勉强接受了海军上将达

<sup>①</sup> 丘吉尔：《命运的关键》，第 578 页。



尔朗的命令，并因此受到了同艾森豪威尔将军所签订的军事协定的约束。戴高乐认为这些行动是有损于法国的。

213 在短短七个星期之内，令人震惊的事件纷至沓来，其结果是使法国变得甚至比以前更加分裂了。这时出现了三个各事其主、各效其忠的集团。

在法国本土，有一些生活在德国统治之下并至少在名义上忠于贝当元帅有名无实的政府的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着围绕元帅名声所产生的那种不可思议的传统势力的影响。元帅所享有的这种“神秘”，对于非法国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第二个集团是由在北非的行政长官和陆、海、空军人员构成的。他们过去一直忠于贝当，但此时认为有权利先承认达尔朗后来又承认吉罗的威权。撇开使他们受约束的事态所造成的压力不谈，他们引以自慰的想法是，(德国)占领整个法国是违反停战条约的，因而事实上已经损害了元帅的行动自由。证明对于减轻良心上的不安颇为合用的“le Maréchal Empêché”〔元帅受制说〕，就是这样引伸出来的。这些人对于他们过去的失败主义决无后悔之意。他们改变了服装，却并不一定改变主意。北非的法国人是以百感交集的心情迎接英、美的进占的。许多“殖民者”——特别是富有的农场主和工业家——一直过着比较悠闲舒适的生活，看到了把战争带到这个地方来的前景，不禁心惊胆战。他们同法国南方的贸易将被切断。他们的财产将被征用。他们及其家园将成为敌人轰炸的目标。自然，也有一些人是热情而真诚欢迎的。迄当时为止，他们一直是以一种听天由命的信念信赖元帅。但是他们不妨在不太忤逆元帅的情况下，先追随达尔朗，后又追随吉罗。

最后，第三个集团是团结在戴高乐周围的人们，其中有些是在流亡之中投奔他的，有些是带着法帝国大片领地过来的，另一些则是在法国本土进行抵抗的。在北非本身就有许多热诚的戴高乐

派,其中有士兵,也有平民。美国谍报人员正在指望他们的领袖能 214  
搞一次政变,把阿尔及尔交到盟军手中。这些人这时不料竟被罢黜,并且在很多场合下,不是被捕入狱,就是躲避起来。达尔朗—克拉克协定使这些勇敢的人受到了痛苦和残酷的打击。他们怀疑戴高乐的某些行动是否明智,但另一面承认他是抵抗运动的杰出领袖和法国荣誉的真正拥护者。

当我在达尔朗被刺后到达阿尔及尔时,盟军总部的形势可以扼述如下:艾森豪威尔将军根据纯军事理由承认达尔朗是一个能履行条约的人。在这一点上达尔朗得到了盟国海军首脑海军上将坎宁安的大力支持。达尔朗可能是一个象英国人所说的恶棍,或象贝当当时所说的卖国贼,或象戴高乐派所说对法国罪行累累。但有一点是对他有利的,即他曾制止对登陆的反抗,从而拯救了许多生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句对诚实一词所下的著名的、虽则令人啼笑皆非的定义的信然不诬,有些人可亲身作证,他也正是这类人其中的一个。达尔朗的被刺,对盟军总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是吉罗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实际上是唯一的——候补人。尽管如此,他们心里明白,要想避免麻烦,迟早必须订出一个计划,俾使法国国内外的一切武装力量为准备与盟军共同作战、夺取最后胜利而团结起来。然而在这个当口,事关紧要的与其说是阿尔及尔的政治,还不如说是突尼斯的那场困难重重、屡遭挫败的战役。

## 第九章 盟军总部

1942年12月22日傍晚，首相派人来找我。他问我对北非登陆以来的情况了解到怎样程度。我回答说，在这方面只是靠阅读报纸等等，有一些肤浅的认识。但是，从我与戴高乐将军机构的接触中，得知盟军同海军上将达尔朗的协议已经弄得群情愤慨，人言啧啧。不幸，我却未能参加首相就此事所作决定而进行解释和辩护的那次秘密会议。后来丘吉尔开始阐述军事和政治形势。尽管军事方面是令人鼓舞的，但政治方面却危难重重，颇感棘手。下院对他为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行动所作辩护已表示满意，至少暂时是如此。但是公众和报纸却为之哗然。没有人能理解，何以为从事于保卫自由和光荣而斗争的西方民主国家，竟然同海军上将达尔朗这样一个背叛他们事业的卖国贼携手言欢。然而，正如丘吉尔对下院所说，远征是由美国人指挥和由美国人担负主要责任的。这次登陆，如果遇到顽强持久的抵抗，不付出重大伤亡是得不到成功的。达尔朗至少使这场战斗没有持续。把他看做一个没有节操的人，这种解释未免过于浅薄。象经历过长期革命和政体更迭的许多法国人一样，他也沉迷于对他当时的顶头上司贝当元帅的效忠感而不能自拔。这是一桩不能忽视的事实，对此，我们已经有过一些不幸的经验。德国人新近违反停战协定，占领了法国南方，这无疑将使达尔朗以外许多其他法国文武官员从他们所幻想的义务中解脱出来。

216 我津津有味地聆听关于这时已臭名昭著的达尔朗—克拉克协定的这番叙述。丘吉尔继续解释说，德国人在这些政治事件所造

成的延误鼓舞下，得以占领了比塞大，并正派出大量增援部队；但是在此后两三个星期之内，我方还是有一个乘虚猛进的大好机会，所以安德森将军所部的英国第一军可能在蒙哥马利所部的第八军占领的黎波里的同时，进抵比塞大和突尼斯。总之，军事考虑是至高无上的，因为夺取的目标非常重要，关系到能否将整个北非从德国和意大利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虽然完全承认远征北非的指挥权由美国人掌握，但是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发表我们的意见，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在艾森豪威尔的幕僚中，已经有了一个外交部的官员，而且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官员。但是他的级别或影响都不够。内阁决定目前应在艾森豪威尔的总部里设一大臣级的阁员充作代表。

我自然立即就理解到这一番开场白的用意所在了。其目的不仅是要邀我参与丘吉尔的政治和战略计划的设计，而且是想要邀我在这场正待展开的戏剧中至少担任一个角色。当首相渐渐谈到正题的时候，我竭力抑制自己的急躁心情。设立在阿尔及尔的盟军总部在这时应该有一位大臣。他应该是阁员级的，即使不是战时内阁的成员。他应有权直接向首相汇报。他的地位应大致相当于驻节开罗的国务大臣。但是有一项重要的区别，中东纯粹是英国自己的事情，一切行政权都掌握在英国军事和民政当局手中；在北非，指挥权却属于美国人，总部是由同等数目的英美两国军官配备起来的，但是由美国将军承担最后责任，只受华盛顿英美参谋长联合会的节制。因此，驻节那里的国务大臣，尽管他的级别同当时在开罗的凯西或在英属西非的斯温顿勋爵一样，但不能不取决于他对盟军最高统帅所能施加的影响力。虽然下院的那场辩论对 217 于消除议会的意见大有裨益，下院院内外的批评也暂时平息下来，但还是有一股敌对和沮丧情绪的潜流。何况，尽管指挥权属于美国人，然而众所周知，参与其事的陆、海、空军，英国却占更大的部



分。根本之点是英国议会和人民认为他们对未来的发展应有更大的发言权。这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在重要性的职位。它将把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带进世界大事的中心。尽管膺选的大臣不能不暂时离开下院,但他仍然可以保留他的席位。这是一桩极其冒险的事。对于这个职位的取舍由我自己决定。该由我作出决定了。我立刻回答说没有犹豫的必要——我愿立即欣然接受。虽然首相坚持要我仔细考虑几小时,第二天再给予正式答复,但是我们的谈话却是按假定问题已经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

丘吉尔随即给了我一份他在秘密辩论中的演说全文,文稿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我对这个事件的背景是毫无所知。他问我什么时候动身去阿尔及尔。我回答说:“明天,或者更恰当地说后天。”看来他似乎满意。我是否穿军服去呢?他知道我在战争开始时就希望回到部队中去,现在可以如愿以偿了,我就要真的奔赴战场了。我沉思片刻后回答说:“不,阁下,我认为我决不应穿军服去。”“为什么不?”他气冲冲地大声说。“你以为穿军服可耻吗?”“不,首相,但是我觉得在所有那些陆军上将、海军上将和空军中将中间,一个前预备役的步兵上尉,即使是近卫步兵第一团的,也不会为人所重视。”丘吉尔静了一下,然后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了,”他这样说,“你是说在官杖和礼帽之间就没有第三者了。”

事情就这样安排定了。喊来了一位私人秘书,告诉他说事情已经决定。但是首相被提醒说,他还没有同美国人讲清楚,而且必要的措施还正在进行之中,非等到罗斯福总统获悉并同意后不能公布。然而,我认为毫无疑义,首相一定是想把他的意见坚持到底的。

23日上午,我派人把我正式接受任命的决定送到唐宁街,在得知需要耽搁数日才能公布之后,我就到苏塞克斯的农庄去度圣诞节,并把这件极好的消息告诉了我的妻子。在告诉我妻子之前,

我已经通知了约翰·温德姆，并请他和我同去阿尔及尔。他立刻应允了。在圣诞节前夕的下午，我们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达尔朗被刺的消息。一股失望的浪潮迎面扑来。我打电话给伦敦的约翰，要他了解一下对此事的议论，问他是否能从唐宁街十号私人办公室里得到任何消息。尽管他和我实际上都不会——象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那样——分派去当第一号和第二号凶手的角色，但是我担心达尔朗既被除掉，法国的局势可能变得简单化而无需派去一个新大臣了。稍加沉思之后，我决定最明智的办法是一动不如一静，而同时作最乐观的展望。我当时对于这种正在展开的美妙前景极其振奋。我可以就此摆脱国内一个似乎没有什么前途的次级大臣和议员的席位，而得到了一个完全独当一面的位置。而尤其使我兴奋的是纵非身临前线，无论如何也是临近前线了。虽然无论是我还是首相对于我去作什么，的确完全心中无数，但是我对此将会勤勉奋发，不屈不挠，尽力而为的。毫无疑问，不能仅仅由于一个年轻人杀害了海军上将达尔朗，就在这最后关头把酒杯从我唇边夺走。甚至在这个领袖人物被刺之后，也一定还有许多其他需要解决的困难和混乱。事实上的确是这样的。

首相同总统在12月27和28两日又有进一步的电报往还。结果，于12月30日下午从唐宁街十号发表了任命我为西北非洲盟军总部驻节大臣的公告，所有报纸在31日都刊登了。报纸对这个新设职位和人选表示的热烈欢迎，是令人鼓舞的。在这同一天，我承蒙英王乔治六世召见。虽然我早已与国王有些相识，但是我作为一位大臣被接见，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之前的一、两天，我曾经竭力从阿尔及尔局势中看看有些什么问题。我有幸能和外交部次官奥姆·萨金特爵士畅谈了一小时之久，又阅读了大量存档电报。但是当我同国王谈话的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到，我国王位的历代继承人是怎样非凡的勤勉认真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把研究他们有

责任精通种种问题的一切详情细节，引为己任。

12月31日傍晚，在约翰·温德姆和坎贝尔小姐（我在殖民事务部时一位得力的秘书）以及由约翰物色来的年轻的威廉斯小姐的陪同下，我们衔命乘坐一架只能载运少数旅客和小量必备行装的A-29型轰炸机启程。应布伦丹·布雷肯的请求，我们同意美国记者弗吉尼亚·考尔斯小姐搭机同行<sup>①</sup>。我们在康沃尔的一个机场着陆，然后于1942年最后几小时的午夜前再起飞前往直布罗陀。法国已经全部为德国人占领，我们的路线是在大西洋上空绕一个大圈再飞回。在这种令人热血沸腾、尽心效力的新天地兴高采烈的情绪中，我们把旅程中的辛苦和严寒全然视若等闲了。我记得，印象中觉得非洲总是长年炎热的坎贝尔小姐，戴着一顶象征性的小圆草帽。我们从殖民事务部偷偷弄来了两部打字机，这确实不失为聪明的一着，如果没有这两部打字机，我们真会束手无策，打字机在盟军总部里就象黄金一样的被小心翼翼地守护着。

我每隔一定时期给妻子写家信的习惯，这时就已经开始，一直继续到战争结束为止。这些信件通常都是经过机密邮包送出的，这简直是我在整个两年半中非洲作战的日记。

我们在星期五（1月1日）正午前后到达直布罗陀。一路平安，沿途非常顺利、舒适。但是清晨很早动身，而且前一夜在一所木建的临时营房里睡得很不舒服，并且寒冷异常。

姑娘们和约翰都颇能忍受旅途的劳顿。坎贝尔小姐是一个有经验的旅行家，会想种种窍门——满口袋口香糖和葡萄干；威廉斯小姐则比较靛靛，非常可爱，需要什么，可立刻得到任何士兵和飞机师的帮助。

我们在直布罗陀过宿。梅森—麦克法兰（总督）非常亲切。在直布罗陀一件最妙的事，会客室里总备有一桶雪利酒（请注意，是一桶），供随时饮用。

---

<sup>①</sup> 现在是艾丹·克劳利夫人。



戈特勋爵休假回家路过此地。在一次半具总督排场——在英国我们对这一切都已忘怀了——的非常愉快的宴会上，搞了五、六道菜，还有雪利酒、红白葡萄酒、白兰地酒，等等。<sup>①</sup>

翌晨，我们继续飞向阿尔及尔，外交部里的哈尔·麦克<sup>②</sup>到机场来接我，他从“火炬”战役计划的最初时日起就是艾森豪威尔的幕僚。他陪我去吃午饭，并尽可能简单扼要地向我讲述了当地形势的一般梗概。显然，由于达尔朗被刺，人人都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他还提醒我在那天下午4时去会见艾森豪威尔将军，但由于华盛顿和伦敦都没有把我的任命通知他（他只是碰巧在无线电里听到的），因此这第一次见面也许会十分尴尬的。然而，这也沒有办法。我被按时带到盟军总部，总部设在阿尔及尔主要公路山顶上的圣乔治饭店里。这个饭店是一座模仿摩尔民族形式装饰起来的现代建筑物。哨兵守卫森严，并有严密的通行制度。这是我同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次会面。尽管这是一个不利的开端，但是我们的关系注定要发展成为亲密的同志和朋友情谊的，并经战争与和平岁月而历久不衰。

将军并不打算隐瞒他的感情。“很高兴见到你，”他说，“但不知阁下来此有何公干？”我力图说明我认为我的任命已由总统和首相商定。“但是我全无所闻。你是一位大臣，但你是哪一种大臣呢？”“啊，将军，”我说，“我不是一个外交大臣，我还够不上。”“不存在什么够不上的问题，”他回答说。“或许你会认为一个政治家更令人厌烦，”我这样说。“啊，我没有领教过。也许是这样的。但是你究竟打算干什么呢？”“我只是想尽心效力。我可以得知首相和他的同僚对所发生的任何情况的想法，并将此转告阁下。”“唔，”他说，“可是我已经有了哈尔·麦克这样一位优秀的人在作这项工作

① 1943年1月7日。

② 亨利·麦克爵士。



了。”“麦克先生也许将另有任用，你恐怕不能不依靠我了。我可以说我至少比你们大家有一个方便的地方。我对这里的政治问题一点不了解。我需要学习。”“啊，”他说，“确有许多需要学习的。”但是，将军对于给我这样颇不严肃的任命甚为生气，自然也就不想给我多大帮助了。谈话开始冷场了。突然，我想起了我的家世，我问他是否知道我母亲家乡的情况。“你的母亲，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会知道？”我说，“我的母亲出生于印第安纳州一个叫作斯潘塞的小镇里。因此我是一个印第安纳州人。”这样一说显然使他很高兴，此后也就渐渐谈得投机了。

我很快就看出将军是一位心情易变的人。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生性坦率、豁达。他开始心平气和了，向我详细说明了所有政治事务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达一个多小时。他显然由于英美两国的舆论对于达尔朗以及随后的政治安排所作的敌意批评而感到不快。“我不能理解，”他大声说，“为什么这些留着长头发、瞪亮了眼睛的家伙总是盯牢着我不放。我决不是什么反动派。皇天在上，我是一个绝对理想主义者。现在达尔朗已经被害，”他继续说，“我们才找到这个吉罗，此人履历是无瑕可击的。我们已经使吉罗成为首脑。我们当然还要有所变化。我们将要为阿尔及尔找一个新总督。那是一个名叫‘皮一鲁一顿’的家伙。据说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但是，盟国军队无论如何必须依靠这些法国人，而他们大多数人内心里都是贝当主义者。使这个国家保持稳定，使港口与前线之间数百哩艰险交通保持通畅无阻，乃是当务之急。这是将军的“首要”职责，是他预定要完成的任务。许多事都有赖于阿拉伯人保持平静。一定要有一些通晓阿拉伯问题的法国行政官员，并能在战役中对这一方面予以协助。必须控制住全部居民，我们的工作是要在攻占突尼斯和比塞大并把德国人赶出北非之前，竭力制止政争。然后将军谈到法国军队和其效忠的问题。这一切在我

听来都很通情达理，并且都是以成语和字字有力的词句表达出来的。将军向我介绍了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他可以随时接见我，我今后主要是同他打交道。此外，他本人也表示，如果我要见他，任何时候都可以。

因此，这次会见的结局比我预料的要顺利。但是，正如我后来所了解的那样，我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犯了一个严重错误。“皮一鲁一顿”这个家伙原来就是马塞尔·佩鲁东，他已经束装就道了，但是他的任命在英国报纸上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抗议，戴高乐派鸣鼓而助攻。虽然他有同赖伐尔激烈争吵的功绩，但他是一个履历可疑的典型维希派政客。我相信麦克早已将这个弄得满城风雨的计划预先通知了外交部，但是我没有收到要改变这个决定的指示。何况，我必须承认，甚至在我发觉了这位膺选总督的真名实姓的时候，我还是毫未予以重视。这是一桩严重的错误，它造成了许多麻烦。在下一阶段，当我们对所有政治问题进行推心置腹的协商作了妥善的安排后，这样的一种错误就没有再发生了。

我离去时至少有一件事是令人鼓舞的。我清楚地认识到，以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我们的领袖(他已经以“艾克”闻名于世)，我们的确很幸运。甚至在第一次会见时，我就意识到他那种天生的善良和坚定的性格，即使有时急躁，却总是公正无私的。我认为，他对一位可能给他造成种种麻烦的英国内阁级大臣的意见的理所当然的厌恶，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我以光明正大的态度相待，他也会以同样态度待我。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艾克的了解也愈深，并开始对他感到真正的爱慕和尊敬。在这期间，我们曾经面临并且越过了第一道难关。“比德”（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对我殷勤备至，他立刻表示，他愿意开诚相待，如果我愿意这样待他的话。我同这两人日益亲密地相处了许多个月。比德尔·史密斯过早的逝世使英国在这个多事的地方失去了一个忠实的朋友。幸而“艾克”

依然健在。

第二天，我正式拜会吉罗将军。他已经在夏宫——总督官邸——就职，警卫森严，副官和政治助手云集，大多数是军人。他郑重其事地接待了我，起初多少有点局促。就他的性格来说倒决不是不正常的，无论如何就一次会见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然而，一旦他发觉我的法语知识，不仅在说的方面而更重要是在听的方面颇能胜任时，他的态度马上变得比较热诚了。我早已获悉他的经历：在两次大战中立下的战功；如何冒险逃出虎口；如何厌恶任何形式的政治；又如何决心为了作战将所有这类不足道的考虑一概置诸度外。他的蓝眼珠，雄伟的身躯，流利而近乎古典式的法语，坦率真挚——这一切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但是，甚至在这第一次会面的时候，凡此种种也掩盖不住他不适合于他所承担的这种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无疑他是一个英勇的骑兵将领，一位称职的师长。但作为整个法属北非的民政和军事首脑，他显然力有未逮。他有着动人和可爱的品格，这也是尽人皆知的。

这些次会见都正式作了纪录送往伦敦。但是，这些次会见似乎并没有使我所获更多。

麦克三、两天之内不得不回国一行，在奉派担任我的顾问的罗杰·梅金斯<sup>①</sup>到达之前，先由鲍勃·狄克逊<sup>②</sup>协助我一个短时期。在这期间，我承认我多少有点不知如何下手。象在所有这种处境中一样，首要的是物质上的问题。怎样生活和工作呢？一离开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办公室，哈尔·麦克就陪我去见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政治顾问兼总统私人代表鲍勃·墨菲。这是我再一次同一个在争取法国同意或默许盟军登陆事的尝试中起过显著作用的人物的

---

① 现在的谢尔菲尔德勋爵。1953—1956年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1956—1959年财政部常务次官。

② 皮尔逊·狄克逊爵士，后来任英国驻巴黎大使。



第一次会见。当时，我除了极为笼统的轮廓外，对于细节当然一概茫然，但是我了解墨菲在“火炬”战役前几个月从事的秘密工作中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而，他的希望却在很大的程度上落空了。他的朋友，诸如贝图阿尔将军和马斯特将军，以及其他许多支持盟军、伺机加入反维希力量的人，和那些对戴高乐与戴高乐运动抱友好态度的人，都遭到摒弃。千方百计使吉罗逃出法国，又安排潜水艇先将他送到直布罗陀，再送到阿尔及尔，而他却原来毫无威权可言。因此，墨菲不得不劝请，或至少默许，同达尔朗签订协定，并将整个法国领地原来贝当派的所有行政机构，一并保存下来。

虽然我已经意识到伦敦许多人中对墨菲都抱有敌意，但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认为能得到他的信任，彼此合作无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一个办公地点，我决定要在我的美国同僚的邻近搞到一间办公室。不出几天的工夫，我们在墨菲办公室所在的同一幢大楼（在居尔蒂埃教授街）里找到了两个房间。墨菲热烈地欢迎我。虽则我们初次相处有些尴尬，但很快彼此就互相熟悉，互相了解了。我们成了朋友，并一直保持着牢固的友谊。

在此期间，约翰和我在靠近港湾那边的阿莱蒂饭店找到了几个房间，于是开始安排我们的生活。天气严寒，而且多雨：

只有上午7时30分至8时30分供应热水。床板坚硬，床垫潮湿，只有一床没有罩单的粗毛毯。没有火炉或任何取暖设备。

一批海军军官们同情我们，我们同他们一起进午餐和晚餐。晚餐后没有地方起坐，只能披着身边最厚的大衣坐在餐桌旁边或楼上某人的房间里！<sup>①</sup>

尽管如此，不到几天的工夫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225

这里没有纸张，没有钢笔、铅笔、打字机、公文夹——当然，更没有公

---

① 1943年1月7日。



文钢厨或铁柜等等。因此，不论我们到哪里去，都必须把一切文件随身带上汽车，这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特别是饭店相去甚远……

然而，我们有〔两部〕打字机……我们有警卫员保卫，我们有一辆汽车——一辆漂亮的别克牌——由一名警卫员驾驶，前面还有一名骑摩托车的警卫员开路。今天他们制了一面英国国旗挂在汽车上。为了自豪也就不顾安全了。<sup>①</sup>

其次一个问题是要设法从饭店搬到住宅之类的房子里去。这是相当困难的。在这期间，电报蜂涌而至，压力渐渐来了，我必须有所作为而证明我的存在。在那最初的日子里，我确实幸运能有象哈尔·麦克那样聪明的一位顾问。他是一个随遇而安的爱尔兰人，心平气和，能力很强，他的资历之深已足以表明他根本不受外交部的约束。他同英美两国某些重要官员住在同一幢别墅里，和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承他的雅意，介绍我到这样一些军官们居住的各式各样别墅去，我很快就成了一位为他们大家所欢迎的客人。酒，特别是杜松子酒，几乎予取予求，而且价格低廉，墨菲的所谓北非之役的熬煎以此放量豪饮得到了最好的减轻。麦克衷心地同意我必须抵制这种不正当行为的引诱。尽管在我们第一次会面以后他们的心情表面上有所转变，但是我知道艾森豪威尔将军、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实则所有美国军官，对于我的任命都满怀疑虑，对于任何想要过早影响他们决策的企图，都会引起不满。墨菲原本也并不是真正欢迎我的到来的。他们所有的人都一直由于我们对达尔朗—克拉克协定所作的敌意反应和对他们面临的实际情况缺乏理解而感到愤愤不平、心烦意乱。达尔朗的被刺，致功败垂成，使他们甚至更加激动了。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sup>②</sup>（他是众所周知的“百事通”）在我到达不久之后就对我表示同情，并惠

① 1943年1月7日。

② 舰队司令海因德霍普的坎宁安勋爵。

承见教。随后每遇困难，他总证明是一位绝对忠实的朋友。但是我可以看出，他对于我究能有何裨益也抱怀疑态度，并且对于英国批评家们只看政治的逆境，而无视海、陆军显著的战绩，也颇为不满。他是艾森豪威尔在同达尔朗谈判的整个过程中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他实际上是亚伦之于摩西<sup>①</sup>。何况，正如我后来所知道的那样，由于达尔朗毕竟是一位海军上将，更由于有着使所有海军上将团结起来的那样一种休戚相关的同行之谊，以致“百事通”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一位至少已经履行了协定的海军上将。

于是，我决心在随后两、三个星期内，除社交活动外尽可能少作任何活动，把时间用于多听、多学；参加惠蒙邀请的一切午餐和晚宴；不去打扰艾森豪威尔将军，而只利用参谋长偶尔来访以及一天快完时去看望他一下。如果一旦我能克服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政治家的那种猜疑，获得他们的信任，我才可能有一些用处。我还必须赢得墨菲的信任，让他把我看作是一个同僚而不是一个敌手。要作到这一切，莫过于采取一种巧妙的一动不如一静的办法。这时鲍勃·狄克逊已经来到我这里，他也同意这个办法。整个看来，结果证明这是正确的。伴随而来的却有一个重大损失，就是听任佩鲁东任命的发表而没有提出抗议。

在这期间，我们生活上的种种物质困难很快就由温德姆予以解决了：

约翰曾竭尽全力为我们物色一所住宅。我们希望得到一幢别墅。我们去看过精致的一、两幢。但是，怎样才能到手？要登记。如何去登记呢？通过美国军事当局。什么，要他们为一个英国文职大臣去登记！好，那么就请英国军事当局办吧。什么，要他们为一个文官去登记！那就通过法国当局吧。啊！这倒是好一些，但是县长先生不在——他生病了。县衙门每天只办公一小时——可是又总是在“警报”期间。在“警

<sup>①</sup> 亚伦(《圣经》中人物)是摩西之兄，而摩西是犹太教的第一祭司长。——译者

报”期间的炸弹和枪炮齐鸣之下又怎能办公呢？

然而，约翰已经——或者自以为已经——克服了所有这些困难，为我们弄到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了。<sup>①</sup>

此外，屋主本人还要保留几个房间，并且要提供一名女仆和一名厨师。房子问题算是很好地解决了，但是，还存在着安全方面的风险，因而又给我们调派了宪兵之类的保安人员；负责我们一切行政事务的英国将军盖尔，确实是一位杰出的同僚，他甚至派给我们一名勤务兵。但仍然有其他的一些需要有待解决。

“厨房用的铜质用器”是有的。但是在北非，没有炒菜的小锅以及茶壶、水壶、厨房用刀或所有这方面的用具。我们的被单、毛巾、擦布、桌布、毛毯、枕套、玻璃杯、银用具等等，又从哪里来呢？这些问题约翰都解决了。他是从舰队或商船上弄来的。从一艘〔沉没〕的大英轮船公司的邮船上打捞出大批物品，都放在码头上（但愿上帝保佑，不要把它炸掉），等待最后交涉就运往别墅。<sup>②</sup>

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食品问题。

除了在黑市，弄不到一点食物。据一种自我克制的命令（非常合理的）规定：英美人员不得同当地居民争购仅有的少量食物。这样我们就非实行配给不可了。可是说来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便当。根据陆军配给量还是根据海军配给量呢？由谁来发给？又由谁来作出这个决定？议会议员会向国家审计委员会提出质询吗？所有这些问题一概由约翰去应付。他去见海军上将和舰队司令，向他们说明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除吃饭的时候就简直见不到他，我们在政治问题上正在逐步取得进展，他则独立肩负着我们使团更加重要得多的生活方面的工作。<sup>③</sup>

最后，在海军上将坎宁安的建议下，我们根据海军级别领取海军的配给和杜松子酒。

就是在这些日子里我们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我同墨菲交谈过

---

①②③ 1943年1月7日。

多次,他慷慨地把他对当地一切背景的长期经验和知识介绍给我。 228

尽管他自然而然地为他自己的政策辩护,但我认为他非常客观、公正。甚至在我们还没有相互了解之前的那个颇为艰难的时刻,他也是热心助人,有求必应。我同参谋长谈过一、两次,曾奉命递交给他来自外交部的一份冗长而不能说明问题的备忘录。我没有打算再去拜访艾森豪威尔将军。只是有一次我们四人应他之邀在一起聚会。那次会见的结果导致了一件不知如何是好、多少有点棘手的任务。

在紧接着达尔朗被刺后的几个星期中,阿尔及尔这个城市的政治局势有了严重的恶化,治安情况令人可虑。何况,来自其他各省的报告也不让人心安。在阿尔及尔,法国人的许多不同敌对团体,由于内部斗争和分裂所造成的一切深仇大恨,致使彼此怒目相视。尽管行刺达尔朗的凶手在两天之内就已正法(名义上是根据吉罗的命令,而实际上则是根据达尔朗的参谋长贝尔热雷将军的决定),而处决之速本身就又成了种种猜疑的一个新根源。据说,同11月8日在这个城市进行颠覆活动的一项未遂阴谋早已有牵连的亨利·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仍在进行活动。亨利和他的弟弟弗朗索瓦·达斯蒂埃—德拉维热里,都是戴高乐派的领导人,后者在12月19日以调查为名,来此访问。盛传原有一项图谋,想迫使达尔朗放弃他的职位,而要他或者参加或者帮助组织一个复辟的君主制之下的代议制政府。甚至有人断言,正是由于达尔朗拒绝照办,博尼埃·德·夏佩尔才将他刺杀,夏佩尔自信他的行动将得到君主制派和教权主义者势力集团的赞同,并会被看成是民族英雄。贝尔热雷将军在吉罗的权势庇护下所作的迅速反应,阻止了这一阴谋的发展。至少当时在阿尔及尔是这样风传的。要求登上法国国王宝座的孔德·德·巴黎公爵,已经从他在丹吉尔蜗居的农庄去到拉巴特,目前据说正在阿尔及尔。盟军总部情



报局认为，为拥护他而进行颠覆活动的可能性确实存在，并且是  
229 一个即将爆发的冒险行动。与此同时，共和派和戴高乐派的成员  
也在骚动之中。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隐匿或关进监狱，但是  
这些失意的、吉罗将军可能愿意镇压但维希政府的行政官员欲杀  
不能的爱国志士可能揭竿而起。所有这一切不仅仅可能使军事形  
势（猛攻突尼斯之役这时正临紧要关头）遇到困难，而且也可能  
在英美两国掀起一场新的怒潮。

向艾森豪威尔将军大力提出并在他的情报人员支持之下的一项  
意见，至少是会消除一个祸根。因此，决定通知吉罗将军：盟军  
最高司令根据他同海军上将达尔朗签订协议中规定的权利，有必要  
要求法国高级专员（即吉罗）保证把巴黎公爵逐出法属北非领  
地。由于看来这是一项棘手而又不愉快的任务，因而将它交付给  
那些颇有雄心并引以为荣的文官代表去办了。递送这份通知的任  
务于是落到墨菲和我头上。我欢迎这项任务的原因有二：这是第  
一次正式承认了我的身份，不光是一个旁观者之类的人物，至少部  
分地给以我一种准行政官的职能。第二，这使我能够同我的美国  
同僚墨菲以伙伴关系执行职务。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清楚表明，  
我们能在任何场合下共事，并且不要让我们自己成为法国任何  
党派的各种阴谋的牺牲者。

因此我们必须一同去夏宫，无视全副武装以杀人为乐的成排  
警卫，而要求正式会见当时整个法属北非的实际“政府首脑”吉罗  
将军。这次会见历时甚短，实在是个悲剧。墨菲和我竟然到一位  
法国将军那里要求把欧洲世系最长的国王的一个后裔从法国领土  
上驱逐出去，这是何等不可思议，而又是何等轻率啊。

我们煞费苦心拟出了我们的小小计划；尽可能简洁扼要，仅仅  
举出人心不稳的危险一点作为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要求的理由。  
230 我的同僚首先根据我们一致同意的原稿发言。我简单地接着谈下

去。吉罗将军神气十足地作复。他答称，“关于殿下目前的行踪，不是应该由我来奉告的。但是你们可请艾森豪威尔将军放心，由你们所转达的他的这个愿望将会如愿以偿。”

这时我们那个小小的工作班子就要开始工作了。我已经有鲍勃·狄克逊代替麦克的位置而和我在一起，在坎贝尔小姐和威廉斯小姐之外，我们又有了两位译电员；一位“档案保管人”——掌管文件的人员的正式头衔——正在途中。不管情况如何，我们对下一步的工作抱泰然自若的态度。

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讨论都多少有点杂乱无章，但是不久就要有一个戏剧性的结束了。我们到下决心的时候了，只要有可能就向我们的长官提出集体建议，因为已经得到消息说，将在摩洛哥举行一次重大的会议，总统和首相（代号为海军上将Q和空军准将弗兰克兰）将率一批适当的随从人员——阁僚、参谋长和其他显要在那里会谈。一定会根据这些巨头的意见作出一些决定的。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精力以便能够为我们的首长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一致同意的嘉谟良策。带来这个令人兴奋消息的电报于1月12日到达我们这里。1月15日——恰好我到达之后的两个星期——我又要朝着另一方向作七百英里左右的远行了。所有这一切，看来的确要比在国内白厅的那种令人难忘但却枯燥无味的环境有趣得多。我过去所抱的容忍态度是对的，这次酬劳远远超过我所梦想的。

## 第十章 卡萨布兰卡会议

在我们动身去摩洛哥之前,我决定在阿尔及尔举行一次英、美记者招待会。由于缺乏来自前线的任何消息,加之总部和战场又距离遥远,所以新闻界代表把注意力越来越转向政治渠道。但在上年12月已经建立了一种政治新闻的严格检查制度,这时依然有效。这是盟军总部未征询墨菲的意见而设置的,表面上是为了防止北非的法国官员参加一次公开的争论。但是由于其结果使得英、美公众对于达尔朗遇刺前后的事态全无所闻,这就必然加深原来正在滋长的敌视和怀疑。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坦率地说,对政治新闻实行这种检查制度,为时虽仅仅六个星期,但的确是一个错误。<sup>①</sup>说来奇怪,很少新闻记者就这件事对我进行过抨击。因为我初到不久,我的地位又多少有点特殊,所以无论如何,事情很难要我负责。在招待会结束时,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我答应尽力而为。纯粹是由于机缘凑巧,两个星期之后,检查制度取消了,我的身价自然而然地有了提高。

举行这次记者招待会是否明智,我曾再三考虑,但却证明是既幸运而又及时的。我的主要目的是要公开声明我支持艾森豪威尔将军关于执行和确认达尔朗—克拉克协定的原决定。毫无疑问,如果不曾说服达尔朗下达必要的停火令,那么,在登陆期间和以后原会发生一场伤亡惨重的恶战。法国军队,虽然装备很差,也决不可等闲视之。它约有十二万五千人。陆、海军都忠于他们的长官,

---

<sup>①</sup>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欧洲的十字军》(Crusade in Europe)(纽约,1948年版),第131页。

抵抗将是坚决而持久的。

不管事情是非如何,重要的是该记住,对北非的远征无疑将是我们在欧洲未来事态发展的序幕。我们必须从所发生的意外事件中吸取教训。我进而声称,不管我们犯过什么错误,而且无疑确实是犯过的,但致命的错误只有一个,那就是容许英、美部队中的士兵之间以及长官之间任其产生不和和分裂,无论是在北非这里还是在北非以外的地方。我曾决定不容许自己成为这种目的的工具。我甚至在几天之内就深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统率的英、美官兵之间亲自建立的同志和合作关系所感动。我还说,我认为同达尔朗的协议,根据纯粹军事的理由是完全正当的。利用达尔朗自然令人反感,但是那个阶段已成过去,而且吉罗将军的性格和背景是迥然不同的。虽然如此,在阿尔及尔以及整个北非却有很多情况需要纠正——反犹太人法律的存在,以及很多著名盟国支持者遭受监禁或被免职,其中上自贝图阿尔这类的著名将军,下至旧维希集中营八千名政治犯中的最卑微者,都曾尽他们力之所及帮助过盟军登陆。

何况,设法使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迅速达成协议,乃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令人满意的安排能愈快达成,就愈会使英、美人民感到欣慰。我亟望这时能成立一个法国事实上的政府,来肃清一些错误的行为,并消除一个不正当政权的残余。在这期间,我曾表示希望两位将军之间尽快进行合作——但正如事实所证明,这未免过于乐观了。

在军事行动暂时沉寂的这一期间,这次记者招待会在英、美 233  
报界引起了很大兴趣。我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由于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进行大力辩护,我认为这大大有助于赢得他和他的参谋长的信任。由于我拒绝自己成为制造麻烦的工具,由于我表明我将和我的同僚墨菲密切合作,所以我已根据我国政府规定必须执行



的政策采取了第一个步骤。由于坦率承认吉罗政府不是由于居心叵测而是由于颠预无能和缺乏经验而作的许多错事，所以我便不断地催促艾森豪威尔将军进行改革。最后，由于我在最初几个星期看上去那样的无所作为，这些公开声明，可以说使这位英国驻节大臣成为“重要人物”了，而不是虚有其名的。这是一种风险，但是安然渡过了，并证明对于我们不久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所面临的困难不失为有用的一着。

我从和墨菲的谈话中知道，他为诱使法国领导机关脱离贝当连续几个月所作的持续而紧张的努力，事实上已告失败。在1940—1941年冬季，墨菲（当时任美国驻维希大使馆参赞）曾经同奉派为“法国政府驻北非总代表”这一新设职位的魏刚将军商谈一项协定。虽然墨菲—魏刚“协定”在1941年2月间已在原则上达成协议，但是直到6月间才最终生效。根据该协定的条款，美方将以大量的各种物资——煤油、棉货、茶、糖——供应法属北非。作为交换条件的是，容许若干美国观察员以“监督官”的身份监视这些货物如何由法国人转交给阿拉伯消费者而确保不落到德国人手中。这项协定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是不得人心的。这是对维希政府的“姑息”。它实际上是对封锁政策——当时英国对轴心国作战的主要手段——的破坏。但是它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监督官实际上可以不仅仅只是物资流通的观察员，在后来的一个阶段，他们事实上无异是情报人员，负责争取或颠覆法国当局，建立抵抗运动，并预为盟军登陆进行准备而组织第五纵队。墨菲是由总统委以这一切任务的。在登陆前的若干个月，他是这个运动的一个有勇有谋的领导。这一运动，尽管有着种种缺陷和问题，但对法国的混乱和盟军的成功作出了切实的贡献。

为设法完成这项艰险的任务，墨菲和他的代理人员曾在这整个地区进行无数次的接触。他们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影响据说

是反德的爱国的文武官员；一方面设法招募非官方的个人和组织，为“有朝一日”作好行动准备。

在第一类人中，最重要的是军人和行政官员。在阿尔及尔统率第十九军团的马斯特将军和在斯堪的纳维亚战役中颇负盛名而这时在卡萨布兰卡统率一师兵力的贝图阿尔将军，都是优秀的军官。墨菲在和这类军官的谈话中，确信他可以创造一种局面，使盟军登陆时，即使不是所有部队也能受到法国和殖民地的大部分部队的友好欢迎。他相信朱安将军将参加这个运动。他在好几个月以前在维希同达尔朗海军上将的接触，使他相信达尔朗驻阿尔及尔的海军代表费纳尔海军上将是会抱同情态度的。只要诺盖倒过来，摩洛哥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因为在摩洛哥，诺盖的影响和威权是至高无上的。他向来以不大有确定的宗旨著称。他确实是法国军队中一个见风使舵的人，必要时他是“铁面无私的”。但是他会一马当先吗？这些人以及居于各种不同官职的其他一些人，形成了墨菲计划所倚赖的第一类。

第二类人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了。自然，正如这类运动一贯的情形那样，这些人人品不齐，类型各异，有些是高贵的，爱国的，象戴高乐派在阿尔及尔的领袖人物勒内·加比唐就是。其中 235 也包括有象拥有三万人的“青年工场”的领袖瓦埃克上校和犹太人集团的领袖阿布克博士。其他的人则有着比较可疑的经历和动机，部分是为从中渔利的欲望所吸引，部分是由于乐于不安分守己——一些天生的冒险家。

计划的第一部分完全失败了。11月最初几天达尔朗出现在阿尔及尔这一事实，不管是巧合还是有计划的，使那些信守或打算信守诺言的当权人物——就象阿尔及尔的马斯特和摩洛哥的贝图阿尔——的一切努力都告失败。例如，朱安听到达尔朗在场，引人注目地叫道，“达尔朗的官阶比我高”，因而他只好敬谨受命。诺盖

甚至成功地将贝图阿尔拘捕起来。因此，盟军在所有登陆地点都遭到了严重的抵抗。

非官方的抵抗运动开始是充满希望的。阿尔及尔城内的关键性地方都依照计划一一攻占。电话局被戴高乐分子占领，其他重要设备都夺取过来。但是当军队和“国民志愿军”站在地方当局一边时，这些英勇的青年就保不住自己的阵地了。正如墨菲向我说明的那样，在11月8日那个戏剧性的夜间某一时刻，他自己也有过这样一番莫明其妙的经历：刚刚通知法国的重要将领说，他们已成为他朋友们的囊中物，转眼却发现自己成为阶下囚了。

这个计划——无论是依靠法国重要司令官们的倒戈还是依靠第五纵队的成功——的完全失败确是极其令人失望的。但这也证明了同达尔朗的和解是完全有道理的。只有他能够履行诺言，而且他也确实履行了诺言。阿尔及尔立刻步他的后尘。如果盟军部队前进的速度够快的话，整个突尼斯未始不会照样行事。诺盖率同整个摩洛哥倒过来了。除达尔朗以外，坚强的布瓦松是不会屈从任何人的——而这却意味着法属西非和垂涎已久的达喀尔将何去何从。当然，重要的政治后果是有的，然而变其不利的影响为有利，却是我们当前的责任。

236 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我已经能对墨菲的品格，同时也对他的困难作出了一定的估价。当然，我知道外交部方面对他是抱有相当大的怀疑态度的，哈尔·麦克的电报虽然公正客观，也未能消除这个怀疑。在英国报纸上，特别是在美国报纸上，他受到了猛烈攻击。说来奇怪，正如他的一个同僚所记载的那样，他最受批评的事情却与事实毫不相干。走极端的美国评论员把他描绘成为一个深于世故的“老滑头”——是一个反动派，差不多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其实他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他的发迹一直是靠自己的功绩而不是靠后台。“非但决不是亲纳粹的，而且，撇开任何意识形态

方面的厌恶不谈，他有憎恨纳粹的个人方面的充分理由。当他驻节德国时，他的妻子曾经受到妄自尊大的纳粹分子的粗暴对待，事情因此引起纠纷，德国政府曾要求将他召回国去。”<sup>①</sup>在英国，很多人认为，因为他是出身于爱尔兰移民的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家庭，所以理所当然一定是反英的。事情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却在和他长期交往中没有看到一点蛛丝马迹。

尽管我后来同他成为莫逆之交，但我对于他的一位美国同僚对他的外貌和人品所作的描绘，却无二致：

他身材细长，体格健壮，但四肢松弛。此人年龄这时总在五十上下，但是看上去不到这个年纪。脸刮得干干净净，皮肤呈特殊的爱尔兰白色，在亮晶晶的天蓝色眼睛之上有一头蓬松金发。在人品方面，他决不是报纸上所描述的那种“神气十足、自命不凡者流”。他性情快活，并能给人以快感，这是一种善与人交的了不起的天赋，是一种几乎过分随和而热心待人的情感。他希望，并且倾向于相信人人都是最好的人。<sup>②</sup>

他决不是深沉含蓄，而是豪爽豁达、乐于助人。他为人宽厚，也许到了一切毫无所谓的地步。他心地公正，看问题总是要看它的两方面，这就有时使他对于两造各执一词的困难问题，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但是这种缺点决不只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才有的。这对 237 于一切外事部门来说，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司空见惯的。

战争各个不同方面的许多军政要人都写出了自己的经历，鲍勃·墨菲也不例外。我不知道有任何一本象他自己的回忆录那样公正不阿、那样豁达大度和一般说来那样确切无误的。<sup>③</sup>这反映出他那种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品格。自然，在我们开始共事时，我是有

---

① 肯尼思·彭达尔：《外交方面的冒险》(Adventure in Diplomacy) (伦敦，1966年版)，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③ 罗伯特·墨菲：《军中外交官》(Diplomat among Warriors) (伦敦，1964年版)。



点提心吊胆的,他也是这样。但是不久我决心唯一要作的,就是对他完全开诚布公,而他在自己的记录中,对我的开诚相见也颇有赞词。他一贯承认我处境的微妙,但是他正确地把我们的关系总结为这样一句话:“我们相处极好”。<sup>①</sup> 我的顾问人员有的认为我全无防人之心。但是我可以深信不疑地说,他从没有以我的坦直为可乘之机。我常常把我来往的电报拿给他看,因为美国国务院使他们的驻外代表适当地通晓内情的制度绝不象英国办法那样完备,所以我常常能给他很有价值的情报。我可以看得出,他有时因为总统就某一具体问题给他的训令而陷于困境。但这并不是由于任何有意欺瞒;相反,甚至在他被迫缄默不语时,他也不掩饰他的窘困。而且我承认他的职位和我自己全然不同。我是一个政务大臣,我可以坦率地、自由地向包括首相在内的整个内阁表示我的意见。实际上我同丘吉尔的争论主要是通过电报和人在两地进行的,所以我比在伦敦的同僚们有一层便利,不致那么畏首畏尾。作为最后的手段,我可以辞职。而墨菲仅是一个国务院的官员,如果他有两大之间难为妇的苦处,那主要是因为他担任“总统的私人助理”,而总统又很容易不谘商或通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而发号施令。我在漫长的一生中曾经共过事的同僚很多,没有一个人在这样经常是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和我相处得如此愉快,也没有一个人的品格使我在这样短的期间内既欣赏而又钦佩。

但是在他的职位上有一个致命的不幸。这不能归罪于他,而是他的上司的过错。如果在1943年1月初成功地发动了对北非的进军,而且由于达尔朗的被刺使吉罗自然而然继长大权的话,那么,墨菲就可抽身出来,这对他就会好得多了。显而易见,一方面在盎格鲁撒克逊盟国之间的关系上,另一方面在法国和法国各种不同的集团之间的关系上,一种新的局面即将开始。墨菲主要是

<sup>①</sup> 罗伯特·墨菲:《军中外交官》,第206页。

在一个大规模的野心勃勃的第五纵队活动中被用来作为主角的。过去,进行他所能进行的一切“接触”,体面的也好,不体面的也好,并参加一整套五花八门的阴谋诡计,以促进一次需冒重大军事风险的行动,原是他的职责所在,他确也以非凡的手腕和魄力尽了他的职责。在他执行职务期间,他非但不能不同象马斯特将军和贝图阿尔将军这些非常正直的人相往来,而且还不能不同象诺盖、布瓦松、夏泰尔而尤其象达尔朗这类比较可疑或首鼠两端的人物打交道。加之,在他的地下工作部分,他不能不接触很多不可靠的、声名狼藉者流,同时又不能不接触一些热心但有时过分热忱的爱国志士。这种经历在下一个阶段中必然会成为他和他的工作的一个巨大障碍。他对很多官方和非官方的人都负有义务。除了因这异常繁重的两年而弄得心身交瘁之外,他一直处于一种险象环生的局面之中。我和我的能干助手罗杰斯·梅金斯没有承诺任何义务,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我们只需面对当前的麻烦。墨菲却怎么也逃不出现在人人都想忘掉的过去那种困境。他所热衷和鼓励的行动,不管在我们和美国人以及在那些希望盟国胜利的人们看来是如何可钦可敬,但是在许多具有严守纪律习惯的法国人看来,一定是不可饶恕的。要他负责处理我们现在要应付的新的和至少在外表上看来比较正常的政治局势原是不应该的。美国总统和国务院要是以一个象我自己这样没有承诺义务的人代替他,未始不是 239 更为明智。然而我很高兴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不然的话,在这段令人焦虑的期间我就会被夺去他给我的令人感激不尽的帮助和我非常珍视的同他的友谊。

在我们动身去会见这时齐集在摩洛哥的大人物之前,我们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建议共同采取了一个有益的步骤。虽然会议无疑主要是为了讨论战略和军事计划而召开的,但是迫切的政治和外交问题显然要提出来。在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就是怎样找到一

个方法,把所有愿意并能够进行对德作战的法国组织,合并在一个令人满意的统一体中。所以墨菲和我共同拟具了一项经艾森豪威尔同意的方案。我们力促把戴高乐和吉罗的政治领导权联合起来,把吉罗的北非政府和戴高乐的伦敦委员会的成员合而为一。如果可能的话,它们应该改组成一个以阿尔及尔为中心的扩大组织。由于知道戴高乐谈到吉罗时常常有尊敬之意,又知道一次会面的机会这时即将出现,所以我们对于成功的前景抱有一定信心。我们所拟办法的原则在适当时候予以采纳了。就法国各种不同集团的重新统一和至少一个法国临时政权的建立而言,这证明是一个事关成败的阶段。但是为完成这个目的所花费的时间却比我们预料的要长,并且不免要引起许许多多的纠葛、危机、惊慌和枝节。但是在这个早期阶段,艾森豪威尔将军能授予我们为这项计划努力的全权,其聪明睿智,殊可钦佩。而墨菲欣然建议和支持这一计划,其遇事客观也同样可佩。因为他一定知道,这无论在国务院或在白宫,都不会是一个全然受欢迎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使他大为狼狈的是,他不久就发现总统竟默许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谋划。

1月15日星期五,我及时启程前往卡萨布兰卡。怎样去到那里却成了一个问题。在那个时候皇家空军对于搭载文职官员在那一带地方飞行,是不特别热心帮忙的。说句公平话,他们也没有很多适合于这类飞行的飞机。美国有著名的DC.3s式班机,沿北非海岸一站一站地运载部队、援军、信使等等,后来我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以利用。但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好意邀我搭乘他的空中堡垒。这看上去象是一种比较满意的旅行方法,然而原来它却是多少有点危险的。我们平安无事地飞到乌季达,在那里停下来,以便艾森豪威尔将军同克拉克将军作十五分钟的谈话。在从乌季达飞往卡萨布兰卡的途中,我正在静悄悄打瞌睡的时候注意到旅客和机务人员当中有相当的骚动。有人告诉我说“第四号发动机失灵,



出槽了，但是不致于掉下来”。这并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我看到发动机里的油流满了飞机翅膀，看来是坏事了。不过，既然还有另外三个引擎，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惊慌失措。但是机长似乎认为飞机会突然起火，命令我们都背上跳伞装备，站在适当的太平门旁边。不久之后，另一个发动机“出毛病了”，这引起了格外的惊慌。结果总算安全地滑翔进入机场。我事后听说，原来是螺旋桨的转轴断了，幸而飞机没有完全散掉。这是我在此次战役中所遇这类不愉快经历的第一次。我随即就要由于一次更加严重得多的事故而大遭其殃。后来我懂得了战时飞行恰恰是人们所必须习以为常的那些职业性冒险之一。但是甚至在两年之后，每当我们临近目的地，看到救火车和救护车开出来作准备时，我从飞机中望见还是心有余悸的。

为西方民主大国两位伟大领袖会晤所选择的地点，从舒适和美观的观点看，是叹为观止的。但是他们的顾问人员却忧心忡忡。因为总统和首相要在新闻中完全不露面达两个多星期之久，这就提出了一个安全问题。因为两位要光临的摩洛哥这个地点，直到三、两个星期以前还处于德国人的控制之下，到处都是德国特工人员，又在德国的空袭范围之内，这就有着更加严重的危险。最初的想法是在马拉喀什会晤，为随行的工作人员征用著名的马莫尼饭店，而将两巨头安置在著名的泰勒别墅。这个地方对丘吉尔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致在会议结束之后他还劝请罗斯福去那里小住几日。但是马拉喀什有很大不利之处，它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大城市，警戒极其不易。轴心国的各种间谍到处都是，人身保护问题是令人棘手的。最后决定会议在卡萨布兰卡新城城外的一个小小郊区安法举行，极富讽刺意义的是，这个地方曾先后是意大利和德国的裁减军备委员会的总部。这个居留区是一个富人的乐园，以一个三层楼的旅馆为中心，旅馆备有五十至一百张床位和适当的餐厅



和休息室。餐厅在最上层，一面俯临大西洋的奇观异景，一面眺望摩洛哥的峻岭群山。美国军事当局马上从居民手里接管了十八幢别墅。围绕着别墅和旅馆围起了一道极其牢固的铁丝网，这就构成了方圆一英里的一种罗马式的营地。

总算虎口余生，幸免于难，安抵机场，遂驱车前往戒备森严的营地。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多的以这么吓人武器武装起来的哨兵。在这里步枪几乎早已忘怀了。这里有的是机关枪，冲锋枪，短管散弹枪以及类似的各式各样武器。你每次进出这个圈子，随时都有遭到射击的危险。另一方面，他们一旦认清你的身份，就立即予以放行，向你举枪敬礼。要想弄明白究竟是开枪射击还是举枪敬礼，那却并不容易。①

为我们的舒适方面所作的安排是再好没有了。别墅分配给头  
242 面人物——总统、首相和有幸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其他一、两个人。主要的幕僚人员安置在旅馆住宿。在这两组人之间自然要产生某种嫉妒情绪。

衣冠楚楚的人物在别墅进餐，比较普通的人则在旅馆进餐。整个情况有点象在“诺曼第号”或“玛丽皇后号”邮船上。但各种约会都是安排得很好的。一切东西都是免费供应，包括精美的食品和大量的饮料。甚至香烟、雪茄烟、口香糖、美国人非常欢喜的糖果以及肥皂、刮脸用的肥皂和剃刀——所有这些都是免费分配的……②

午餐时，我发现大多数要人已经齐集——包括英、美两国的参谋长在内。后来，象艾森豪威尔将军一样，亚历山大将军、坎宁安海军上将和特德空军中将都到达了。伊斯梅将军精神抖擞，率同他手下的一批计划人员。英国人比美国人多一层便利。我们搞了一艘通讯船，就停泊在海湾，可以看到，船上不但有大型的通讯设备，而且有一个大的情报资料库供我们的参谋长查核情报。

---

①② 1943年1月26日。

整个营地充满一种气氛，人们知道有两个人物很少公开露面，但始终在幕后活动。这两位官方称之为空军准将弗兰克兰和海军上将 Q 的，前者住在第三号别墅，后者住在第二号别墅。在整个这段期间普遍使用的这两个头衔，当然，现在已经透露出来，是指首相和美国总统……我给这两个人取的绰号是东方皇帝和西方皇帝，这的确象是罗马帝国后期的一次会议。

这两位皇帝通常在深夜进行会谈和娱乐，并同各自的将领和彼此的将领讨论问题。而在这种……极其有趣的环境中有一种又像度假又像办事的奇异气氛。<sup>①</sup>

为保卫这两位伟人所作的安排，还是有所差异的：

243

东方皇帝的别墅〔即首相的别墅〕由一支海军陆战队的警卫队警卫，但在其他方面都相当简单。他白昼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床上，夜间则通宵不寐，那种古怪的习惯，使得他的幕僚人员苦不堪言。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样精神饱满了。他在那段时期一直是饱餐痛饮，解决大问题，整小时地玩弹子和纸牌，一般总是兴高采烈的。唯一在场的另一个政府成员就是莱瑟斯〔勋爵〕<sup>②</sup>，除秘书等等外，首相身边别无他人。

西方皇帝的别墅〔总统的别墅〕是难越雷池一步的。如果你在夜间走近它，马上探照灯就照射在你身上，一大群我相信是所谓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都拔出左轮，对准你的胸膛。能获准出入是十分困难的，一旦获准一切就可以随便了。宫廷宠臣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哈里·霍普金斯随侍左右，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一面当助手，一面看来很可悲，差不多把他们当作这位非常人物的男护士。对我来说，总统显得特别有魅力。他谈笑风生、谐语横生……。纸牌兴尽，姜汁威士忌苏打一杯接一杯，整小时的长谈，总的气氛是异常亲切的。<sup>③</sup>

后来我变得比较习惯于这类集会了；但这些始终只是使日常生活丰富多采极好而有趣的插曲。

① 1943年1月26日。

② 战时运输部大臣。

③ 1943年1月26日。

持续将近两星期的整个公务，是一次巡游，是一个暑期学校，又是一次会议。布告牌上揭示出各式各样幕僚人员开会的时间，有点象课程表，当他们五点钟左右放学之后，就会看到陆军元帅和海军上将会到海滩上去，用上一小时的工夫，玩石子，堆泥沙城堡。然后在夜间则有皇帝和幕僚的会议以及大……讨论、大辩论。我认为首相以完美无缺的技巧掌握了形势。我因为夜晚大部分时间不是在首相的房子里，就是在总统的房子里，所以必须在白天埋头自己的工作，其精疲力尽是不难想象的。<sup>①</sup>

有一点殊令人失望，斯大林因为公务羁身，不能前来，虽然他对这次邀请作了很客气的回答。

这次会议唯一糟糕透顶的事情就是俄国人不能参加。如果我们再有了这位红色皇帝，那就尽善尽美了。大概下一次在冰岛或这类地方举行的会议上也许我们能够看到他们一起在场。<sup>②</sup>

会议的一般原则是，军事人员在上、下午办公，夜晚则向两国首脑汇报。这就给两位巨头留下大量时间去处理各自的公务，研究国内拍给他们的电报，把问题想深想透，而不致妨碍海军上将、陆军将领、空军中将及其幕僚的井井有条地进行工作。

我在刚刚到达的那个下午（1月15日），就应召去丘吉尔的别墅，一到那里就受到了温文尔雅的秘书们的欢迎，他们对我的帮助，一如既往。首相精神抖擞，非常亲切地接待我。当我们讨论到我们的迫切问题时，我们当然把注意力集中于安排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之间一次会晤的必要性上。丘吉尔告诉我说，总统和他正考虑邀请他们两人到安法来，以便他们彼此会谈，并同时和英、美两国首脑会晤。我对这个计划表示疑虑，最后一致同意这个问题应该在当夜晚些时候在总统别墅提出讨论。

傍晚时分，我接到罗斯福总统一位副官的通知，问我能否在六

---

<sup>①②</sup> 1943年1月26日。

点钟去见总统。他建议由他领我穿过危险的通道。在我到达那里时，我发现总统躺在楼下的一张床上。他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杰出的头脑和精力充沛的身躯；下面被子盖着的则是两条干瘪的腿和脚。没有一个病人曾经对身体上的残疾取得过这样惊人的成功。丘吉尔坐在床头，我们的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象古罗马百人队长一样地以立正姿势站在另一边。我一进门，总统就招手致意。“喂，哈罗德，”他叫道，“能看到你很高兴——很高兴。”不久墨菲参加进来，接着就是关于北非情况的一番简短讨论。当我离开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我一道出来。他似乎有点出乎意料之外。他说，“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是总统的朋友。”“啊，”我回答说，“我不认为我是他什么特殊的朋友，只不过在美国见过几次，我们几位共同的朋友。”“你们英国人多么奇怪，”将军这样指出，“如果你是美国人，你早会告诉我你和美国总统有直呼教名的交情了。”我回答说，“啊，我不敢说我是——不是相互的；这正是他对人亲切的一贯作风。”将军似乎更加茫然不解。但是，说来奇怪，这桩小小的意外事件对我和他相处却大有裨益。

饭后，我又应邀去参加一次会议，会上空军准将弗兰克兰、海军上将Q、墨菲和我讨论了邀请两位将军的问题。我再一次表明我生怕他们当中的一位或两位会对于邀请他们在法国领土上盟国营地彼此会面，感到不快。毕竟他们早已彼此发出文件，提出他们自己举行会谈的建议。虽然迄今还没有作出任何安排，但会不会对我们插手其事感到不满呢？因为吉罗是一位单纯的军人，我认为他倒的确可能会欣赏参加盟国领袖和三军首长的一次会议的好处。我自然希望戴高乐也抱同样看法；但我认为未必。虽然如此，还是决定发出请笺。艾森豪威尔将军即将返回阿尔及尔，可以把请笺亲自送交吉罗将军，同时空军准将致电艾登，要他亲自带信给戴高乐将军，电文如下：



因为我可以促成您和吉罗将军在完全保密的条件下，举行一次具有最乐观的展望的刻不容缓的会谈，如果您愿意搭乘我们所能尽先提供的飞机来此相聚，实不胜欣幸。最好偕同卡特鲁前来，因为吉罗将军拟带来的人，可能是贝尔热雷。

当夜外交大臣复电说，他将于第二天去看戴高乐，并询问他是否可以告诉他说海军上将Q也在安法。他认为如果这个消息从官方以外的任何来源传到他那里，他都难免怏怏不悦。

正如我所逆料，事情证明并不象两位巨头预料的那样轻而易举。吉罗将军立即接受并且第二天就到来，但是在戴高乐被说服之前，尚须大费周折。起初艾登不得不报告说他的争辩理由已证明无效。戴高乐不愿意应英、美政治家的邀请在完全由英、美部队占据的一个武装营地里讨论法国的前途。那会是一种惹人反感的局面。艾登的电报在17日夜间拍来，第二天清晨8点钟丘吉尔派人来找我。他认为戴高乐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失之交臂，愚不可及，为此他怒形于色。各式各样可采取的办法都一一加以讨论，但是显而易见，应该作的却是再接再励去试图说服这位自由法国的领袖心回意转。其他任何办法都会在美国人面前置我们于多少有点丢脸的地位，而且会对法国的抵抗运动和英国的舆论产生最不利的影响。常常听说，丘吉尔在盛怒之下，已准备考虑“免去”戴高乐将军在法国委员会的领袖职务，而要求以卡特鲁将军或另一位不那么难以相处的人取而代之。我确信这是没有经过认真考虑的。丘吉尔的办法往往是，至少在口头讨论时，把每一种可能的计划都摆出来，以便澄清他自己和他的顾问们的想法。但是他的最后判断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经过反复辩论之后，我们决定致电艾登，力促他就戴高乐可以在保密而不受盟国压力的情况下同吉罗将军进行会谈一节再向他提出保证。要他进一步向戴高乐着重指出失去和有关各方达成良

好协议这样一个有利时机的不智。在这期间，接到了艾登的另一电报。戴高乐依然心坚如铁，毫无商量余地。

在午餐时以及在整个下午，空军准将弗兰克兰、海军上将 Q、墨菲和我都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戴高乐从民族尊严的观点出发，也许会宁愿由吉罗将军直接发出邀请。毕竟戴高乐曾建议过要举行会谈，而吉罗迄今还没有对这件事作出任何推动。然而我的建议未被接受，又给外交大臣发出一批电报，连同一些提交戴高乐的补充论点。

在这期间，我认为不妨设法缓和一下很多对我们开会环境感到担心的法国人的紧张情绪，他们认为那种环境似乎对于战胜军比对盟军更为适合。因为我们事先未打招呼就已经到达了那位总督的辖境，所以我建议丘吉尔邀请当时仍任摩洛哥总督的诺盖将军来访问他。我想这会是他和法国官方所欣赏的一种礼貌。“他是一个好人吗？”丘吉尔问道。“不很好，”我说，“他的确是一个靠不住的人。我们称他为‘唯唯诺诺先生’。”“那么，我为什么要见他呢？”“啊，直到他免职时为止（我但愿能尽早实现），他是负责这个地方的法国官员。他终归是摩洛哥总督。邀请他是一种礼节。”

因而就这样作了安排。邀请他于 12 点 30 分同丘吉尔共进午餐。将军准时到达，但首相尚未起床穿好衣服。片刻之后，我便把他带进丘吉尔所坐的那个房间，把他介绍给丘吉尔。这一重大会议的消息迄当时为止还不曾公布于世。无疑诺盖将军一定已听到了一些风声，但是没有任何确实或官方的消息。丘吉尔一上来就开门见山。“Vous ne téléphonerez pas à Vichy que nous sommes ici〔你不要打电话给维希方面说我们在这里〕，好吗？”诺盖一个劲地表白。“Monsieur le Président, je vous assure de mes sentiments〔总统先生<sup>①</sup>，我向您保证我的情感〕。……”丘吉尔 248

① 应该是“首相先生”。——译者

不为所动。“Parce que maintenant clair de la lune et très bon pour bombarder〔因为现在月明皎洁，太适合于轰炸了〕。”接着就是那套让人不知如何是好的推论，并挥舞其长雪茄以加重语气说，“et si on bombardait nous, on bombardait aussi vous〔要是有人轰炸我们，也会有人轰炸你们〕。”

把可怜的诺盖将军弄得狼狈不堪。事实上，德国人会不会对安法进行袭击，我们一直在担心，因为安法完全处于有效轰炸距离以内。至于拉巴特和维希之间早已有函电往还一节，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多大怀疑。但是经过初步交谈之后，午餐是在很有礼貌情况下结束的。

在等待伦敦方面答复的这段期间，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戴高乐认为原不需一个英国或一个美国的居间人把两个法国人撮合到一起讨论法国事务，对于这种看法，我曾抱有一定同情。自然美国人是经不起看我们笑话的诱惑的。这里是我们的大英雄，是在我们马槽里饲养和训练的争头奖的马；可是到了大赛马的日子，它根本拒绝出场。拿空军准将弗兰克兰开了不少的玩笑，这是不大合他的脾胃的。所以当1月20日午夜我们收到外交大臣的电讯，说戴高乐将在当天傍晚离开英国时，这才使我们大家大大松了一口气。由于天气不好，他不得不推迟起飞，直到22日早晨他才终于到达。不论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故意，这件事自然使戴高乐成为风头人物。人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凭借他的灵敏的戏剧感，他已经清楚表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这个时刻需要他的合作正不亚于他们需要他们的合作”。<sup>①</sup>

随后几天对英国方面来说是令人苦恼的。就我们实事求是来看，戴高乐所采取的立场确实令人难以理解。我们已经困于一场对德的殊死战达两年半之久，虽然美国的参战看上去是最后胜利

<sup>①</sup> 墨菲，前引书，第216页。



的保证，但是仍有很多困难有待克服，很多危险有待对付，很多惨重的损失有待承担。自然，英国政治家，象他们的美国伙伴一样，<sup>249</sup>打算专心致志于对希特勒兴师问罪的迫切问题。虽然盟军刚刚成功地占领了北非的一部分，虽然我们英国军队在沙漠中已经赢得了一次轰动远近的胜利，但是甚至就在这一地区，目睹德国空军和地面部队正愈益加速地注入维希控制下的东突尼斯境内，我们眼前也还要有一场恶战。所以，英国，尤其是美国领导人，对于戴高乐不断提出的、不外由于他所视为原则性问题的那种单纯不妥协态度而引起的种种理论上的难题，颇不耐烦。这对于我们这些同情戴高乐及其运动的人员来说，更是特别可恼的。

在两位将军之间，在以墨菲和我为一方、以两位将军中的一位或另一位为一方之间，以及在包括这位空军准将和这位海军上将在内的我们大家之间，现在开始了认真的讨论。因为这是我参加高级外交活动的初次经历，所以我自然不屈不挠地希望至少能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我不断地试图说服丘吉尔和罗斯福给戴高乐另一个机会，而戴高乐却似乎总是不愿意抓住它，因而使我自己陷入了尴尬地位。由墨菲和我自己所拟具的草案，一份又一份地提出来，希望能找到两位将军所能同意的一个方案。毫无政治感或对大问题毫不感兴趣的吉罗，对于这些草案一声不吭地依次一一予以接受；而具有高度政治目的且遇事多疑的戴高乐，却是一个接一个地予以拒绝。

经过这些无片刻之暇的日日夜夜之后，墨菲和我从一个帝王别墅赶到另一个帝王别墅去征求我们首脑对一项新建议的同意，然后再把它送到法国领导人那里而并不能抱达成一项令人满意安排的多大希望。一个基本的困难不久就清楚了。戴高乐承认吉罗是由衷反德的。但是他并不反维希。他不会反对维希的走卒，而所有这些家伙都是为戴高乐所痛恨的。他不会同意以诺盖、布瓦



250 松和佩鲁东的立即撤职作为合作的前提条件 (“préalable”)。1月22日下午戴高乐在第一次同吉罗将军会晤时，曾声色俱厉地把达尔朗及其继任人痛骂一通，可怜的吉罗所得到的印象是，把他们的一切错误都归罪在他身上。在这些天里，戴高乐既会见了罗斯福也会见了丘吉尔，关于两个法国集团合并的计划也拟定了不少。英、美两国所提以吉罗和戴高乐为两主席的“指导委员会”的建议，是含有一些终将证明是有用的东西的根苗的，但是戴高乐反对，认为我们似乎是只就一个管理帝国和协助作战的“行政委员会”着想，而不是就一个到时候就可以发展成为法国政府的“政治委员会”来考虑的。英国方面的确同情戴高乐的这样一种观点：应于不久的将来逐渐出现一个法国临时政府。但是这在罗斯福和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却是要不得的，他们满足于这样一种主张：就目前来说，“法国已不复存在”，而且在法国本土未解放以前就产生任何法国政权，不会不危及将来。他们深信戴高乐主义会带来一种新的独裁制。

一开头，戴高乐就希望有一个可与在伦敦进行活动的那些流亡政府相比拟的临时政府。虽然它不能象它们一样以法律上的正统自命，但是事实上的权力却非它们所能望其项背，因为整个法兰西帝国这时都可以置于一个单一的管辖权之下。位于阿尔及尔的这样一个“战时政府”迟早会变成共和国的政府，吉罗会是解放军的司令，而戴高乐会是政治领袖。到这时，戴高乐在军事方面已渐渐失去兴趣。他已经变成并且一直是一个政治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至少要找出一个折衷方案。

卡萨布兰卡会议开门不利的这一部分不知道怎样就踉踉跄跄地走上了一个摇摇欲坠的结局。局势并未因罗斯福在戴高乐到达安法营地的当天为摩洛哥苏丹设宴而有所助益。客人当中有诺盖  
251 将军、丘吉尔、马歇尔将军(美国参谋长)、墨菲和我。这是一个莫

名其妙的、殊为失策的筹划，墨菲正确地记录了丘吉尔自始至终所表现出来的满面愠色。虽然这部分是因为没有备酒相待，但我确信他把总统的行动看作是“故意的挑衅”。<sup>①</sup>总统大谈其殖民地向往独立的愿望以及“帝国主义”的日暮途穷。这一席话对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说都是同样令人难堪的。他滔滔不绝地详谈战后美国和摩洛哥之间可能的经济合作。尽管诺盖和戴高乐彼此敌对，无疑后者随即得知总统宴会的情况以及他向法国保护下的一位统治者所提的建议。这一切都无异是火上加油。

这时诺盖的地位依然稳如泰山。他完全以智慧取胜了贝图阿尔将军那位法国爱国志士。贝图阿尔将军曾试图将卡萨布兰卡交给美国人而这时却呻吟狱中了。在这期间，诺盖将军已经将美国驻这一地区的司令官佩顿将军完全置于他的手掌之中。这位偏执而顽固的军人证明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墨菲和我自己的一个祸根。佩顿将军竟会这样容易为诺盖给他安排的赏心游猎和豪华宴会所打动，竟会对于诺盖对待英、美友人的方法这样漠不关心，在我看来真是一件天大的怪事。虽然如此，甚至诺盖也一定会因为总统肆言无惮而大为吃惊。

在我第一次和戴高乐认真会谈时，他已经明白表示，除非作出决定，将若干同维希政权有联系的重要人物撤职，否则他不会和吉罗达成协议。他在那天夜里同丘吉尔以及同总统磋商时，他都坚持这一立场。过去不曾和戴高乐会过面的罗斯福，事实上对他有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但是他的担心并未因此而消除；实则更有甚于前了。戴高乐每每只是进行讨论，而讨论的结果由他建议给他的伦敦委员会，以此为词而避免积极地承担任何义务，总统对于这样的设词推诿也很不耐烦。同时，戴高乐也并不隐瞒他的观点，在他看，促成拟议的联合唯一明智有效的方法，就是要吉罗和他的军

<sup>①</sup> 墨菲，前引书，第 217 页。

队归附到战斗的法国方面来。仍由吉罗掌握军权，而以戴高乐为文职首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扮演克莱蒙梭的角色而吉罗扮演福煦的角色。吉罗虽则天真憨直，也不能接受这种办法，主要因为他是五星上将，而戴高乐只不过是一个二星将军。无论如何，这不是美国人所能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在1月23日傍晚，戴高乐就吉罗派归附战斗法国这一点作了让步。他这时准备考虑成立一个“战争委员会”，将他的组织和吉罗的组织合并起来，以两位将军为共同首脑，轮流担任主席。但是他一定坚持要把维希的那些人排除在外，并须发表一项与贝当断绝一切联系的声明。如果他得不到这样的合并，那么对两个组织来说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下述基础上听其原封不动：一面建立一种联系，一面就不再互相进行攻击性宣传达成谅解。虽然戴高乐自称他对于第一项解决办法的成功不寄予多大希望，但是我深深感到这却是他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丘吉尔照我的建议，同意支持戴高乐“战争委员会”的方案，虽则他不能支持任何“无理的条件”。

在整个那一晚间（1月23——24日）我们一直在总统的别墅进行争论。墨菲开始争辩说，继续同戴高乐谈判下去是无益的，总统也倾向于他的这种看法。我认为应该进一步试求找出一个方案，并且得到了丘吉尔和——出乎意外地——总统的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的支持。所以墨菲和我就起草了由我们首长批准的另一个方案，并为试图说服戴高乐同意而花费了第二天（1月24日）早晨的大部分时间。这个方案所依据的原则是以最终合并为目的的一项联合声明。虽然吉罗照例是通情达理的，但是在戴高乐方面却仍有麻烦。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所以反对这项宣言草案是因为其中有暗示他“满足”于一个管理法兰西帝国的委员会的意见。尽管在他的眼睛里区别是这样重要，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



些问题似乎都只不过是法律上的钻牛角尖，论证越复杂越拘泥，海军上将和空军准将就越是怒不可遏。

最后，在 24 日正午，当取得任何结果似乎都已无望、会议行将破裂的时候，我去看戴高乐，他在当时和后来对我都是非常客气的。我邀他同我一起到总统的别墅里去看总统。在那里戴高乐又重申了他殊为抱歉地不愿接受所拟宣言的本意。这时，已经向吉罗说过再见的空军准将弗兰克兰也来到海军上将 Q 的房间。既经得知戴高乐已经拒绝接受吉罗的草案，海军上将 Q 就建议把吉罗找回来，看看是否能够至少使两位法国将军同意一项可以向世界发表的联合声明。于是墨菲和我分头赶办。我钉牢戴高乐不放，他却缠住吉罗。经过简短讨论之后，据同意，两位将军将于海军上将和空军准将离去后的傍晚拟具一项新方案。但是为批准这项谅解，还不能不作些工作。我们已经遭到这样多的失望，这样多的顿挫，我认为只有某种公开行动才能防止对这项口头“同意的协议”再有任何“倒退”。机会正在眼前。业经奉命在总统别墅外面的花园中举行一次大型的英、美新闻记者招待会。因为这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会谈的第一批新闻，因为开会两周之后现正结束的这次会议的全部戏剧性大事出乎意料之外地突然向他们发表，所以报界代表自然是怀着望眼欲穿的兴奋心情的。房间里装有几扇折门，当把门打开让罗斯福和丘吉尔去到庭园里就座时，墨菲和我几乎硬把两位将军推出去，让他们在罗斯福和丘吉尔身旁露面。赶忙另外准备下两张椅子，于是记者招待会开始。总统和首相各自发表了声明，然后看到两位将军，在传遍全世界的一张照片中，带着做作出来的笑容握着手。 254

紧跟着这段插曲之后，空军准将弗兰克兰和海军上将 Q 离开了安法营地。我们留在后面试图引导我们的两位法国头面人物拟定一项适当的宣言，并焦急地等待他们贯彻他们所达成的谅解。在



下午很迟的时候，宣言的文本交给我了。这项联合宣言叙明两位将军曾经会晤、商谈并且就必须以敌人的完全失败来实现法国的解放和人类自由的胜利一节，达成全面协议。据以实现这项目的手段乃是实行所有和他们盟国并肩作战的法国人的大联合。

盟国舆论对这种颇有独到见解的和解形式所含真正谅解作出的解释，超过了脾气性格相去天壤的这样两个人之间所可能存在的谅解。在英国和美国，报纸的宣传和物议都暂时平息下来。不幸，总统自信他已经把戴高乐争取过来，并且能够继续“驾驭他”。墨菲和我都明白，这是一种幻觉。<sup>①</sup> 因为真正的斗争现在才算开始。我从政治方面将结果扼述如下：

255 我的工作中包括有两位将军之间极其复杂和很不成功的谈判。起初决定，一旦有可能就安排一次婚礼。总统马上说这必须是一次婚礼，即使是一次草率的婚礼，而由墨菲和我负责作出新娘和新郎之间的必要安排。新娘（戴高乐将军）非常腼腆，直到结束的前两天，还不能请到营地里来。我决没有想到我们能把他们带进教堂，并且正如我向两位皇帝提出警告的那样，要想搞出点什么名堂，需要的嫁妆会很是可观的。但是，正如你也许会在电影或照片中看到的那样，我们终于把他们带到那里，连哄带压，软硬兼施，迫使他们在所有摄影机的前面握手。我希望结果会有些益处。撇开善意的开玩笑不谈，这会是法国各种不同〔集团〕之间非常复杂的局势松动下来的一个开端，虽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sup>②</sup>

纵使罗斯福误以为戴高乐倾倒于他，丘吉尔却是带着对法国问题的某种幻灭感离开会议的，他对戴高乐的态度感到失望，部分是因为他不了解他的基本立场。从战争很早的一个时刻起，无疑从美国干涉的时候起，戴高乐对于这种的军事行动就表示不感多大

---

① 墨菲，前引书，第220页。

② 1943年1月26日。

兴趣。法国只能扮演一个次要盟国的角色。没有一位法国将军在策划或进行未来的战役中能担任一个主要角色。固然，由美国重新装备的法国殖民地军队无论在突尼斯或后来在意大利的战役中都能够并且的确起过辉煌的作用，但他们的作用是从属性质的；他们不是主角。戴高乐无疑已下定决心，要最后打败德国人。所以，在战争的其余期间，他的整个目的将会是维持法兰西精神和保持法兰西帝国的完整。他不接受“法国已不存在”的断言，甚至暂时的也罢。停战条件无效；维希政府是不法组织，只有通过拒绝停战的运动方能恢复真正的法兰西精神。他把那个即将发展的、先在他自己和吉罗共同执政之下，继而在他单独领导之下的新委员会，看作是应直接继承已经解放和行将解放的那些领土的政府的一个组织，包括法国本土在内。到时候，这个临时政府将交出它的权力。但是直到那时为止，它应该是唯一被承认的法国主权。所以，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地方长官的委员会，相反，将军和地方长官应该隶属于它的威权之下；而且法国的军事指挥必须对这个文官政权负责，虽然他们目前是正在暂时配合、甚至隶属于英、美最高司令官的。换句话说，吉罗和他的朋友所考虑的充其量只是一个由归附于盟军或为盟军解放的那些领土的真正长官组成的特殊机构，而戴高乐所设想的却是这样一个威权，虽则是暂时和临时的，但在今后几年内应在一切问题上赋有保护法国利益的权利和责任。法国人尤其应该保证，无论如何不让 1940 年的战败和城下之盟危及象 1939 年 9 月原来那样的法国和法兰西帝国的恢复和继续。总之，吉罗是一个善良的、健全的有价值的人，殊可尊敬地渴望以一个军人的身份助盟军一臂之力。但是戴高乐已经成为一个墨守法国悠久传统的政治家。象感激和友谊这类的情绪也许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上会起一点不大重要的作用，但是一切都必须从属于他的主要目的——法国的力量和光荣，法国的复兴。

安法谈判对于盟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奇怪的后果，我们在阿尔及尔的私人圈子内通称之为“安法之谜”。

在我送交外交大臣关于北非形势的报告中，就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作了详尽的描述。我指出，我们所能取得的成果就是两位将军之间的一种公开休战，连同以双方同意的代表彼此建立联系的一项私人谅解。我补充说，据了解，海军上将Q曾经私下向吉罗提出一些建议，其要旨迄今尚不得知。这是根据墨菲就总统和吉罗进行的磋商所给我的暗示，关于这项磋商他还不能随意告诉我。鉴于我们过去所建立的合作，对此我殊感意外，但是我清楚了解他是根据严格的训令行事的。

在1月27日我回到阿尔及尔之后，他给了我两项文件的抄本，两者都是由总统批准的：

257 第一项文件——称作与吉罗将军达成原则上协议的要点——有关北非法国部队的重新装备事宜，另据叙明，总统和首相同意，为促使一切对德作战的法国人在一个单一威权之下的联合，应给予吉罗将军一切便利。第二项文件承认吉罗将军在法国人民在“选定他们的正式政府”以前，拥有“保卫法国一切利益的权利和义务”。这项文件也订明，“法国和暂时占领法国领土的列强之间的关系形式”已经“在登陆以前由领事墨菲先生以罗斯福总统的名义和吉罗将军交换的一封信中予以规定”。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墨菲先生应按照在华盛顿与吉罗将军的代表业经举行的会谈以及在卡萨布兰卡由总统、丘吉尔先生和吉罗将军所作的决议，拟订细节。<sup>①</sup>

我立刻将这两项文件的抄本转寄伦敦，这自然引起了激动以至愤怒。不幸，照我们后来所知，总统不但曾经签署了内中涉及重整军备问题、食品月度配额和五十法郎对一美元的新汇率的那些文件，而且曾经接受了一些令人误解和无法辩解的词句。

---

<sup>①</sup> 卢埃林·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第218页。

根据政治计划，兹经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吉罗将军一致同意，所有对德作战的法国人重新统一于一个威权之下，乃是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并经同意，为使这项重新统一的事业得以实现，应给吉罗将军以一切便利。<sup>①</sup>

我陈述了我下述的看法：总统一直到会议结束时才看到这些文件，而且由于公务繁忙没有弄清它们的真正意义。在我看来他似乎不可能真正打算同意备忘录中所包含的内容——以吉罗为唯一的信托人。外交大臣督促我向墨菲提出强硬抗议，并坦率告诉他，在英国政府有充分机会予以考虑并将它的观点宣布以前，这些文件应予保留以待决定。我们不能接受给吉罗以特殊地位的这种概念。我们也不能允许“由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墨菲”根据我们毫不知情的华盛顿商谈和我们无案可查的卡萨布兰卡决议“拟具进一步的细节”。法国和美国以外的外国关系，要以这类的一项协议加以规定，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sup>②</sup> 墨菲同情我的愤慨，并欣然同意将英国的情绪传达华盛顿。

丘吉尔从马拉喀什直接去阿达纳同土耳其总统伊诺努及其同僚举行会议。当他在2月5日回到阿尔及尔时，他亲自同墨菲来处理这个问题。我过去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他同总统有过任何接洽。他默默地以一种完美无缺的手腕解决了这个问题。结果，墨菲和吉罗都接受了草案中的一些重要修订。在经过将近四个月终于得到华盛顿的同意时<sup>③</sup>，问题就算迎刃而解了。最重要的一项变动影响到吉罗部队的重新装备。它原来几乎是一项没有底的

---

① 阿瑟·莱顿·芬克：“‘安法备忘录’：卡萨布兰卡会议的一件意外事件”（The “Anfa Memorandum”: An Incident of the Casablanca Conference），选自《现代史杂志》（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26卷，第3号（芝加哥，1954年9月），第250页，重印供内部参考。

② 伍德沃德，前引书，散见各页。

③ 正式备忘录直到5月28日实际上才由墨菲和我自己送给吉罗将军。



义务承担，现在却要“按照参谋长联合会议的决定”行事了。更加重要的是，吉罗作为法国利益信托人的威权只以法属北非和西非为限。最后，清楚表明，为法国统一提供的便利，不但应给予吉罗，而且应给予“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民族委员会”。换句话说，为实现所有对德作战的法国人在一个单一威权之下的再联合，将给予一切支援。<sup>①</sup>

这段莫明其妙的插曲的全部原委已经详加追述了。<sup>②</sup>这个麻烦的根由是源远流长的。在墨菲为便利登陆所进行的初期谈判中，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吉罗，保证盟军决不会干涉法国的威权和主权。但是当吉罗不能履行他那方面的条件时，这些诺言自然就要失效。达尔朗—克拉克协定取而代之，并且详细规定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凌驾一切的权利。在达尔朗被刺之后，吉罗的一些顾问试图恢复原有的地位，这与其说是出于不满，毋宁说是出于野心。其中为首的是雅克·勒梅格尔—迪布勒伊。此人是家财万贯的菜油制造商，墨菲对他相当信任。他因为在战前是诸如卡古拉尔社<sup>③</sup>这类的一些右翼压力集团的一个同伙，所以深为戴高乐派所憎恶。但是他为协助墨菲的登陆前计划无疑曾冒了相当大的风险。他这时已肩负军事使命去华盛顿，并于达尔朗被刺前后到达。在吉罗继任北非高级专员这一事实的鼓舞下，勒梅格尔—迪布勒伊试图将吉罗恢复到墨菲过去在迥然不同的情况所许给的地位。经过同他曾给以良好印象的赫尔国务卿商谈之后，他被说服回到卡萨布兰卡看看有什么办法可想。在他的怂恿下，这项惹人反感的文件由吉罗提出，总统最后签署。墨菲仅仅是被通知了一下。罗斯福怎么会这样作，过去是，现在依然是

---

① 伍德沃德，前引书，第 219 页。

② 芬克，前引书。

③ 法国的一个秘密法西斯组织。——译者

安法之谜的核心。这种简单的解释或许是正确的。在会议期间，总统一直抱着一种非常愉快的度假心情。他经常放声大笑，兴致勃勃，在他身边都是些非正式顾问，未经适当考虑，就采取了非但同法国人而且在英、美两国之间未始不会导致永久困难的一项办法。

这件事戴高乐一定已有所闻，因此我此后几个月的努力确实 260 受到了妨害。这无疑可以对许多接踵而来的困难作出解释。这对罗斯福来说的确是一个既应非难而又愚蠢的行动，而利用丘吉尔的名义则更不可饶恕。不过从我的观点看，倒有一个有益的结果。墨菲对于丘吉尔处理这种险恶的局面，获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首相一回到阿尔及尔就显出了他最善长之处：沉着坚定，谦恭有礼，既不互相责难，也决不允许自己在总统一个属员面前提出批评，而是不动声色地、小心翼翼地审阅原文，并坚持必要的修正，以便把它从一个危险的文件变成为一个无害的文件。由于他能说服墨菲和吉罗同意新草案，而且因为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史汀生部长对于所承担的军事义务的担心，正不亚于国务院某些顾问人员这时开始对于政治牵连所感到的担心，所以作出变更和强迫吉罗接受，并没有多大困难。墨菲对于总统多少有点大而化之的办事方法，总是担心的。因为直到这时为止，他以往所看到的主要是丘吉尔如何进行一般的和有时有点无拘无束的交谈，却没有了解他对于细节的非凡理解力和一旦抓住问题要点就非找出解决办法不可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不能责怪墨菲在我们从卡萨布兰卡回来以前一直对我们秘而不宣，因为他对他的上司和他所奉到的命令有至高无上的忠诚。但是他在整个这次事件中，一直是心神不安，郁郁寡欢的，直到事件结束方才感到宽慰。

自然，卡萨布兰卡会议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在政治方面。然而，丘吉尔也常常把他全神贯注的有关军事磋商进展的情况告诉我。

对那些军事问题，他和英国三军参谋长总是以非凡的才能予以处理。人人都同意有把德国人尽快赶出北非的必要。不幸，向比塞大和突尼斯的突击竟告失败。安德森将军所部，作战虽极其英勇，但兵力过于单薄，距离基地又太远，以致未能做到人们所指望的  
261 “出奇制胜”。英国方面原建议把重点放在更东面的“火炬”攻势上，但是美国人因为担心西班牙方面可能的反应，所以反对这一方案。他们极力强调保证摩洛哥和西非安全的重要性。所以，显而易见，作出巧妙而坚决的努力以结束北非战役，乃是当前急务。丘吉尔不胜明智地偕同当时担任中东总司令的亚历山大将军参加会议。亚历山大将军的沉着自信使总统获有极深刻的印象。地中海的形势因沙漠部队的胜利前进而幡然改观。亚历山大清楚表明他希望不久可以攻占的黎波里，并于3月中旬在马雷特边境一线布署六个师的兵力。所以，连同第一军中安德森所部的四个师，英国将有十个师可供对敌方阵地发动最后猛攻之用。既然到初春时美国方面在突尼斯将只不过有两师兵力，既然法国的几师殖民地部队，士气虽佳，但装备窳劣，所以，英国显然应该有权利，也有义务以主力自居。<sup>①</sup> 由于所有各方的友好合作和丘吉尔协商得法，结果产生了一支非常强有力的队伍来负责这一部分战役的最后各阶段。

来自东方和西方的部队统统置于艾森豪威尔的最高指挥之下。但是亚历山大将军，由于奉派为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副总司令，实际上成为全区英、美、法所有地面部队的战术司令。根据同样的安排，坎宁安海军上将指挥盟国的所有舰队，特德空军中将指挥盟国的所有空军。艾森豪威尔将军不但没有一句怨言而且满怀热情地接受了这种安排，我一贯认为这正是他眼光远大、豁达大度兼而有之的一个了不起的特征。用商务上的用语来说，艾森豪威尔现

<sup>①</sup> 丘吉尔：《命运的关键》，第606—607页。



在担任了一个拥有庞大动力和资源的公司的董事长。在他下面有三个可供调配的精明强干的行政人员作为各组成公司的执行董事<sup>262</sup>。对于这三个人无一不是英国人一节，他毫无异议。他所考虑的只是委托给他照管的这个组织的成败。不是伟大人物是作不到这一点的。

但是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赶出北非之后下一步怎么样呢？美国海军参谋长金海军上将自然认为应以一切资源调往远东。为早日发动一次对法国本土的进攻，即当时以“围捕”作为代号的军事行动而组织必要的力量，却是马歇尔将军的雄心壮志。但是这种作法当然是要以牺牲地中海方面的任何进一步的进展为代价的。这也会延缓打败意大利的任何希望，并会在德国实力没有严重减损的当前形势下，证明是——在我们的顾问看来——风险极大的一次冒险举动。

英国方面寄望于非洲胜利之后即在意大利或希腊方面开辟战场。丘吉尔不胜明智地不打算过于坚持他的论点。如果美国方面硬是认为，地中海方面的任何行动都属于牵制性的，英国方面并不坚持主张，应该把这视为对看来有利形势更为明智的利用。在非洲肃清之后，应首先对意大利发动进攻。这一点一旦得到一致的同意，那么辩论就会开始转向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之间究竟如何取舍这个一直各执一词的争论上。结果选定了西西里岛。虽然如此，还有一些不利的形势，美国人在斯大林的催促和英国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支持下，希望尽速开辟“第二战场”。为了在法国成功的登陆（“霸王号军事行动”）付诸实行——终于在1944年6月实现——是需要大量的物资和极其复杂的布局的，凡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时机不成熟的尝试只能导致灾难。要将大量军队和给养在海滩上登陆，但在这个海滩除了使用大量劳力用人工建造起来的那些港口——桑林港——之外，没有任何其



他港口，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举动。甚至在德国人经过在俄国和意大利两年的迎头痛击而已经削弱之后，这项任务也证明决非易事。无疑丘吉尔对于作为一决雌雄的最后一击的横跨海峡的登陆决无畏缩之意，但是为了战术、战略和政治上的考虑，他也急于想获得中欧和南欧的解放。美国人却始终拒绝这一策略，而由于这种意见相左，宝贵的机会竟失之交臂，他们如果能热心遵照这个策略行事，则未始不可抓住这个时机早已取得对我们都有裨益的战略胜利了。当然，两大盟国之间战略和战术概念的某种分歧原是自然的，难免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显著特征，却是在全球各地许多岁月的持续斗争中保持和激发了英、美两国的那种高度互谅互让和为共同的目的而奋斗的精神。

卡萨布兰卡会议还有另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当1月24日总统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我全副精力主要都用在两位将军的身上而不遑他顾。罗斯福突然声明我们将强迫我们的所有敌人接受“无条件投降”，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项声明是后来聚讼纷纭的一个主题。多年来一直认为这没有征求过英国内阁的意见，而且这一点的确也曾由丘吉尔于无意中予以证实。但这并不是真情实况。从1月20日丘吉尔致战时内阁的电报中可以清楚看出，他曾经向他们提到过这个词令。<sup>①</sup>这个词令的使用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大错。甚至说它延长了战斗，从而使欧洲的恢复更加困难。其实倒未必尽然。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对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以及相继而来的种种牵连，包括德国方面所称他们是被骗签订停战条约的这一说法在内，至今记忆犹新，因此认为我们最好不要为取得胜利而以任何义务把自己束缚起来，否则有很多义务会证明是不胜繁重的和混淆不清的。拟具能使我们满意的条件的一切企图还一直证明是不可能的。正如丘吉尔所说，“它们事实上只是为

<sup>①</sup> 丘吉尔：《命运的关键》，第612—613页。

撤回原案而写出来的”。<sup>①</sup>“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强加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人民以苛刻或不公平的条件。它意味着我们不准备同他们当前的政府讲价还价；在这些政府被剥夺一切抵抗力量以前，我们不准备面对和平问题： 264

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战胜国可以自由行动，但不意味它们有权以野蛮的方式行事，也不意味它们想把德国从欧洲国家中消灭掉。如果说我们受约束的话，那我们是受我们自己对文明无愧的良心的约束；我们不是由于讲定条件而受德国人的约束。这就是“无条件投降”的意义。<sup>②</sup>

卡萨布兰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两位皇帝动身去马拉喀什作一番游览，然后各自飞返任所；战地司令各自返回原防；参谋长分别回到伦敦和华盛顿各自的办公桌前。我们这些不足挂齿的人们则回到阿尔及尔去同我们自己较小的但颇有兴味的问题去搏斗。对我来说，这是一番独特的经历。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种高层政治军事场合或与闻这样大量惊心动魄的问题。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受命担任新职的头三个星期之内。

---

① 丘吉尔：《命运的关键》，第 617 页。

② 丘吉尔的发言，《英国议会议事录》，1944 年 2 月 22 日。

## 第十一章 X 舰队

于法国崩溃时,在使英国政府惶惶不安的种种忧虑之中,最令人焦灼的莫过于对法国舰队未来命运的担心。为了至少确保这些舰队不致落入敌人手中,在世界很多地方采取了行动,有时以悲剧告终,有时则是比较幸运的结果。在东地中海,法国的海军力量在法国崩溃时集结在亚历山大港,其中包括主力舰一艘、巡洋舰四艘和较小的船舰若干艘。经过法国舰队司令戈弗鲁瓦海军上将和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坎宁安海军上将为时很久的谈判之后,双方达成了一项谅解,旨在使法国舰队在该地区海军均势变动的重要时刻不能调动。这是一种典型的英国式折衷办法。法国舰队司令答应卸下舰艇的燃料用油,拆除大炮机械装置的某些重要部件,并遣散一部分船员。英国舰队司令则承允由英国支付法国海军官兵的军饷。既然发给留在亚历山大港那部分法国人员眷属的正常津贴仍将由法国继续支付,那么维希政府也就等于默认了这种安排。与此同时,戈弗鲁瓦司令对于他与之保持无线电联系的贝当元帅依然效忠如故。为了表明他的中立,他蛰居船上,拒绝上岸,过着遁世者的生活。但是,船上的官兵则更为实际,他们象其他盟国水手一样地在亚历山大港度假。所以,尽管这位司令一直保持超然态度,处于一种缄默的、修道院式的孤寂之中,法英两国的各级海军人员却有着大量的接触。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协议中是有一些瑕疵的,据说给了法国人以可乘之机。我们不得不付给有关法国舰艇上的官员同他们官阶相当的薪金。一般认为,这些法国官兵以自行升级或劝请法国海军部予以提升的办法对这项规定大加利用,

相应地改善了他们自己的享受，从而使英国财政部大为愤慨。不过，对于这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我却无法予以证实。不管怎样，两年多来这种局面对双方都算可以接受。“X”舰队（这支舰队的密码代号）的官兵一直处于一种虽不光采、但却并非令人不愉快的闲荡之中。

然而，当西地中海的事态开始有了进展；当一处又一处的法国领地开始团结在吉罗或戴高乐的周围；当亚历山大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的大捷开始唤起把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统统赶出非洲的希望的时候，这些舰队和舰队人员的地位也就开始显得越来越不同往常了。

丘吉尔当然没有忘记它们。在1942年秋季发动“火炬”攻势以前，他曾向海军首席大臣建议，加强以亚历山大港为基地的英国舰队，以便使法国人感到和盟国站在一起是有利的。他声称：“优势兵力就是一种强大的说服力。”但是，无论优势兵力还是其他任何策划，都没有能打动戈弗鲁瓦。11月间，达尔朗对于先恢复这些法国船舰的有效技术状态，然后再把它们带到盟国方面来，似乎抱有信心。但是戈弗鲁瓦固执地拒绝和达尔朗接触。他辩称，至少在盟国征服突尼斯以前，他们不能说解放法国是他们力所能及的。虽然戈弗鲁瓦司令对英国人所怀的感情和激起土伦德拉博德舰队司令的那种情绪迥然不同，但是他也同样不愿服从可能来自达尔朗海军上将的任何命令。我国海军部于是训令驻守亚历山大港的英国舰队司令，即当时的哈伍德海军上将以采取激烈行动相威胁。但是这类威胁无异是一把双刃刀。虽然在陆上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然而这些船舰要想摆脱这种胁迫所能使用的主要威胁手段就是自沉于港口或公海。在年度更始时，这类事件已在土伦发生过。但是那次我们虽然为失去一支良好的舰队而深为惋惜，却并没有因港口的堵塞而感到不便。而在亚历山大港，尽管对



于船只的部署作出了安排，凿沉一支舰队显然会是一件多少有点头痛的事情。

到1942年底，戈弗鲁瓦司令看来多少改变了他的立场。德国人占领了当时尚未被侵占的法国领土，从而破坏了协定。难道这样还不足以说明贝当元帅已再无自由可言而处于德国方面的箝制之下吗？在那种情况下，效忠的誓言就不再具有约束力了——或如丘吉尔所说，“所有赌注都输光了”。如果贝当已不能自由行动，那就让职位仅次于他的达尔朗来承继衣钵吧。所以，戈弗鲁瓦司令在把他的舰队带过来之前，必须确信英美两国政府这时已承认达尔朗海军上将为法国最高权威。同时，由于他听到罗斯福总统在舆论的压力下隐约表示，盟国的承认可能仅仅是暂时的，那他就更需确知达尔朗的地位是否将在“整个战争期间”得到确认。达尔朗的被杀结束了一场不然将会成为无休止的争论。但是，这却使“合法”的问题更趋复杂化了，而这个问题看来正是戈弗鲁瓦心目中的主要症结所在。

我们从卡萨布兰卡回来之后不久，在法国问题中，X舰队的前途问题尤其引起我们的深切关注。电报开始通过外交部和海军部的渠道从伦敦和开罗纷至沓来。

2月5日，丘吉尔来到阿尔及尔，逗留了两、三天，主要是为了和墨菲大使就解决“安法之谜”问题进行谈判。但他始终念念不忘这支法国舰队，在离去之前还明确指示我：不管用计谋还是用武力，总要有所作为。既然我们已经开始深深卷入更广泛的法国问题，因此我认为，特别是在伦敦方面不断发出呼吁加以督促的时候，要把戈弗鲁瓦舰队问题置诸高阁，已经是不可能了。

这时罗杰·梅金斯前来参加我这方面的工作，接替了鲍勃·狄克逊；此外再加上一些低级幕僚的到来，我们这个小小的一摊也就粗具规模了。这样，如有必要，我就可以在公出时让梅金斯在盟军

总部负责留守。到2月中旬,伦敦、阿尔及尔和开罗之间各种建议和提案的来往到了这样复杂的地步,似乎只有由我亲赴开罗,去弄清楚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首相和海军部都坚决认为吉罗这时已经“继承了达尔朗的地位”,戈弗鲁瓦舰队司令理应接受他的命令。开罗也持同一观点。就我所知,这样一套论据能否对戈弗鲁瓦奏效,我颇怀疑。同时这一观点还会对更广泛的法国局势产生一些微妙影响:

我一贯极力反对为此目的而过分依靠吉罗的这种倾向。如果我们要利用他……命令或呼吁戈弗鲁瓦舰队司令把他的舰队团结到我们的事业方面来,那么我们分明是要求吉罗将军以国家元首的名义这样作。我的意思是说,只是作为一个将军,他是无权向戈弗鲁瓦发布命令的。但是要作为一个国家元首,那又是哪个国家的元首呢?我们和美国仅仅承认吉罗将军是法属北非临时政府的首脑,那就是说,只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地区的首脑。那么,他以什么威权向驻泊亚历山大港的一支舰队发布命令呢?那当然只有(连这也是非常微妙的)凭靠对整个法国利益更为广泛的威权,美国似乎倒倾向于给予他这种威权(尤其自从看到戴高乐在安法的举止言行之后),但英王陛下政府却坚决予以拒绝。<sup>①</sup>

最后,吉罗决定发出一项“呼吁”,而不是一道“命令”,我们则静待结果。“呼吁”如石沉大海,效果毫无。于是我们决定打出第二张牌:

我一直希望能争取米歇利埃海军上将那位不在法国德占区的法国高级海军军官参与此事。这自然并非易事,因为刚在去年11月间这位 269 米歇利埃海军上将还抗击盟军在卡萨布兰卡的登陆。

在这期间,他已渐渐转变…先是给予英国海军一种有节制的支持,而现在照我看是给予真正热情的合作了。他的这种心理变化大部分要归功于很善于驾驭他的坎宁安海军上将。

不管怎样,经过一再迟疑,米歇利埃同吉罗联合起来,但不完全按

---

<sup>①</sup> 1943年2月22日。

照他的命令办事]已经[被说服]采取步骤,派遣他的参谋长米索菲海军上将去亚历山大港,带信给戈弗鲁瓦,指示他把驻泊亚历山大港的舰队带过来。

这项训令是他作为一个上级下达给戈弗鲁瓦的。①

于是商定由我们邀同米索菲海军上将一起动身去开罗。我打算亲自会见戈弗鲁瓦,但我们想以米索菲海军上将作为主要谈判者。2月21日,星期日,午夜刚过,约翰·温德姆和我就偕同米索菲海军上将和他的上尉参谋乘坐一架颇费一番周折才由皇家空军提供的小型“赫德森”飞机离开了阿尔及尔。这竟成了一次灾难性的冒险活动。

我不知为什么,一上来就觉得一切都让人信不过。这架飞机原不宜于搭载乘客——上面没有座位——不过这倒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有地毯,有飞行服,还是挺舒服席地而坐的。可是这里非但没有地毯,甚至连给人以起码舒适的任何安排都没有,机场上连接待我的官员也没有。……

当飞机起飞时,要我们走到机舱的前部去,等它飞入高空之后再退回来。因此我这个体重最大的人就一直跑进驾驶舱……站在驾驶员身边。领航员就在我们下面的机首。

我们象通常一样地滑行,一直滑到跑道的尽头。然后在滑行中发动了引擎,随着油门开足,飞机带着通常的吼声加快了速度。

270 使我大为吃惊的是,这个时候,在飞机已离开地面几米之后,驾驶员突然开始关闭油门,让飞机减速从新着陆,并且关闭了制动器。但是飞机已沿着跑道飞得太远,他这样作当然无济于事。我正坐在他旁边,能确切看到所发生的一切;在这几秒钟内,我产生了两个相当清晰的印象。……

第一,我意识到我们正以极大的速度在地面上行驶。……你知道一个人乘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对速度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但是当我们沿着地面(或离地面仅一、二米之高)疾驶时,我是清楚觉察出这种惊人速度的。

---

① 1943年2月22日。

我在那一瞬间所产生的第二个感觉是，这次事故幸而发生得早。我十分强烈地感到要出事，但我也感到事故会很快过去。……

当然，驾驶员要把飞机停止在那段限定的空地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他紧紧关闭制动器，飞机还是越出跑道，冲进了一块田地，或灌木丛，或墙壁或其他什么东西；机身摇晃了一下，象醉汉似地突然歪倒，一阵振裂声，就象儿童的玩具摩托车一样地停下来了。……

撞击并不很剧烈，我们在驾驶舱里的三个人，谁也没有震昏。但是霎那间，当人们刚刚意识到自己在飞机坠毁后还活着，飞机就起火了。

驾驶员打开他左手的太平门，从门里跳出去。那个领航员在出事过程中已经从机首跑出来，蹲在驾驶员身边，也跟着跳了出去。很清楚这时不是进行“卡萨布兰卡”事务的时候，而显然是我设法采取所谓“避祸行动”的时刻了。

可是，对那些既怕有伤尊严，又因穿着宽大的绿色长大衣而受累的身躯高大的中年出版商来说，要想从一个高达他们头顶的小洞口跳出去，而且还要先爬过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轴轮、操纵杆以及其他一些锯齿状的、碍手碍脚的机械装置才能到达这个洞口——要想在这样一番动作中获得成功，就非有一种强有力的、压倒一切的动力不可。象竞选议员，象在政治上遭到失败和挫折的年月进行斗争这类花气力不那么大的事情，不用太大的动力也就行了。抱负、爱国心、自豪感——所有这些就足够推动一个人并终于把他送进枢密院和内阁这样的圣地了。

但是，要作出象我在上星期一凌晨所作出的努力，世界上只有一种动力才顶用——那就是恐惧感（而不是好名心）的刺激。<sup>①</sup>

271

当飞机越来越向一边倾倒的时候，要逃出这洞口就越发困难了。但是我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让自己侧着身子能从洞口伸出去，以便从机翼的顶上落下去。火焰逼人，我猛一抬身，成功了，虽被烧伤，总算留下一条活命。同时，在机舱后部的米索菲海军上将，他的上尉参谋和约翰·温德姆倒轻而易举地跳出了机舱。只有我一人是

---

<sup>①</sup> 1943年2月23日。



困在驾驶舱中。一滑到地面，我便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争取尽可能离开机身远点。等到别人来帮我的时候，我们已

怀着且忧且喜的心情看着我们的飞机在熊熊燃烧，在黑夜中火焰四射，当火焰接触到大油箱，随即“轰”然一声巨响，飞机炸毁了。我所以说“且忧且喜”——忧的是因为我们要飞抵开罗的希望和在那儿的一切期望都在烧成灰烬；喜的是这架飞机如果注定要烧毁，至少我们没有在里面。<sup>①</sup>

这时有人拿来一副担架，把我放在上面，抬到一个包扎站。我两腿受了一点轻伤，无疑是被金属零件擦伤的。面部严重烧伤。当我躺在地上的时候，

我感到面部痛如针刺。但我知道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脸上仍然戴着眼镜（它保护了我的眼睛），而一个人（至少在我这样的年龄）在他脸部最重要的毕竟只是眼睛。<sup>②</sup>

那位海军上将虽然没有受伤，却特别懊丧不置。原来是他的帽子掉落或遗失在飞机上了，这种同样的海军上将帽子除非在法国本土是买不到的。他踱来踱去，一面用力攥着自己的双手，一面放声大叫：“我的帽子；我的帽子！我的帽子丢了。”对他的这种哀叹，我回答（或被认成是回答）说，“谁管你什么帽子。我丢的是鲜血淋淋的脸。”这一回敬之词在盟军总部立刻传遍了，据认为深得英国传统之妙。

那天凌晨，我被送到离机场不远的梅森—卡利陆军医院，在那儿住了几天。起初我陷入严重休克状态，好象觉得自己又回到差不多三十年前松姆战役时曾在阿贝维尔住过的医院。<sup>③</sup>但是恢复很快，到第二、三天就不觉得怎么痛了。

①② 1943年2月23日。

③ 本书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第90页。

他们给我头上用绷带和石膏包裹着，我想里面还有一层包扎。除眼睛和嘴唇留有缝隙外，我的头部整个包起来了，就象三K党的党徒一样。……唯一不舒服的是有一点气闷，但是这个非常巧妙设计的面罩使我可以通过鼻孔呼吸。嘴唇多少有点麻烦，因为肿得非常厉害，吃饭喝水都十分困难。不过我想今天已经有点消肿了。我的眼睛也在流分泌物，很不舒服，但我想总会好转的。至于其他方面，则感觉良好。①

不久就准许我会见一些客人了。吉罗将军派他的副官博弗尔司令带来了他的慰问。随后米歇利埃海军上将和米索菲海军上将也来了。

我对米歇利埃说，不久整个阿尔及尔就会传遍我是个“卡古拉尔分子”，这逗得他大笑不止。（所谓卡古拉尔分子就是法国的右翼分子……据说他们“正在策划”一场右翼革命。……“卡古拉尔”一词，意思是“包着头的”，这里人人都被控或控告别人曾经是卡古拉尔分子。）②

但是，大为轰动的当然还是安德鲁·坎宁安爵士的莅临。

人人都大为振奋。对于一个年老体弱的文职大臣，谁也不多去关心；但是对于一个头戴白色军帽、从袖口到肘一片金色、满身绣金“菖蒲”的舰队司令则就大不相同了；啊，你不难想象我的身价得到了多么的提高。

海军上将顺便给我带来了一些此间战场上的极好消息，使我深感欣慰。273 他是一位声名赫赫的人物，一位确属第一流的、极有风趣而随和的伙伴。当然，他对皇家空军的飞机不能把任何人安全地送出一节，并不惊奇。“至于我自己，”他这样说，“经常是坐的美国飞机。”自然，这只是一句俏皮话，笑话一下空军上将和别几位罢了。③

到周末，我头部虽仍裹着纱布，但是已能回到我们的别墅，甚至能做一点工作了。

今天空军中将沃尔什来看望我。他表示万分抱歉。机尾有一个装置，让空气通过并使速度计运行，机械师忘记把它的盖子打开了，显然毛病就出在这里。

①②③ 1943年2月23日。

[驾驶员]本来很可以让领航员在空中搞好。他却偏不这样，硬要重新着陆，停下来再搞。

我要是去开罗——我仍然希望去——我将乘坐一架解放者式飞机去，并且我已经告诉他们必须为我把那架飞机安排得又舒适又安全。我想这样说过之后，他们总会尽力而为。<sup>①</sup>

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随即来访。

他是一个非常有风度的杰出人物，我很欢喜他。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你可知道，在美国军队里一个人负了伤，他将得到（不是伤员臂章，而是）一种叫作紫心章的勋章？你可曾听到过这样荒谬的事吗？比德尔说他想给我请发一颗紫心章。我想那可真是太别致了。<sup>②</sup>

另一天，空军中将特德来谈。自从他接掌英、美两国整个空军指挥权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有幸同他进行一次严肃认真的讨论。我将我当时的印象笔录如下：

274 特德确实是个非常有趣的人。他赋有罕见的伟大素质（但这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幽默感、丰富的常识以及专心致志于一、两个简单目标的本领。但他的品质还不只限于这几方面——有些人一走进房门，你就立刻会产生那么一种感觉，而特德正是会使你有那么一种感觉的一个人。<sup>③</sup>

我决定设法到开罗去处理 X 舰队的问题。除开丘吉尔和其他大臣接连不断的慰问电之外，我还阅读了即将颁给开罗的凯西和亚历山大港的哈伍德的几份指令。使我大为吃惊的是，这件事可能不要我过问了，而且可能会采取轻率的、为时过早的行动。法属北非的政治形势现在可能有两、三个星期的停滞状态。在卡萨布兰卡所商定的戴高乐派的代表团正在开始集合；但是卡特鲁将军则要到 3 月初才能从叙利亚回来。所以，如果我能迅速出发，就

<sup>①</sup> 1943 年 2 月 25 日。

<sup>②③</sup> 1943 年 2 月 26 日。

可望在阿尔及尔事态有所发展以前赶回来。因而，我不顾医生们的一再劝阻，于2月28日动身去开罗，这恰恰在我们那次倒霉事故的一星期以后。

这一次我们搭乘了一架解放者式飞机。……机上备有座位——而在那架赫德森式飞机上是没有的。

我借到了一件十分称心的飞行服——由于天气很冷，机上又没有暖气，这种飞行服就非常必要了。……我身着皮里革面衣裤，上衣还附有帽兜。这个帽兜太好了，正好包住我仍缠着绷带的头部。我还穿了一双令人喜爱的皮飞行靴。

这些都是空军中将沃尔什送来给我的——我想是作为一种谢罪的礼物吧。我倒很想留下这些，作为自己衣物损失的一部分补偿。<sup>①</sup>

事实上我是把这些保留下来了，而且至今仍在。

当晚7点30分左右，我们飞抵开罗。汽车把我接到一座漂亮的别墅。这座别墅原属于切斯特·贝蒂先生，目前暂由1942年3月继奥利弗·利特尔顿任国务大臣的凯西占用。他和他的夫人殷勤异常，对我的奇形怪状似乎一点也不在意。这是我们悠久的亲 275  
密友谊的开始。同时，住在这样一座华丽的房子里，受到如此无微不至的照料，真是一番不寻常的经历。第二天，我去开罗的苏格兰医院，终于把绷带和面罩取下。经过十天的束缚，这倒的确是如释重负。

我的头发烧掉了许多，并且变成了象麦片粥一样的古怪颜色。胡须差不多有一寸长（几乎都白了），由医院的理发师以不寻常的技巧剃光。额头呈粉红色——象婴儿可爱的新皮肤一样。面额上斑斑点点——有一、两处还没有痊愈。总而言之，我的外表是怪模怪样的。

我感觉尚好，只是我想我有点轻微脑震荡的后遗症——也就是说，每夜都感到头痛，早晨有点头晕。无疑这种症状会渐渐消失的。<sup>②</sup>

① 1943年2月28日。

② 1943年3月3日。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工作了。此后几天一直忙于在开罗举行冗长的会议，并讨论许许多多的电报。不幸的是，我却遭到后来发作的脑震荡的折磨，而不得不在床上消磨很多时间。不过，能与莫因勋爵重聚倒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他在殖民部曾有过一个短时期是我的上司；他现在是副国务大臣，其令人倾倒和神秘莫测，仍不减当年。

到3月6日，我认为我可以着手执行我的任务了。我在一份电报中曾经对丘吉尔说：我要是不能说服戈弗鲁瓦迟早让他的舰队投靠过来，我就吞掉我的帽子。好在这一誓言已不再适用，因为我的帽子，连同身上大部分衣着，早已随着那架飞机化为灰烬了。

我在那位格拉夫·比斯战役的英雄、现任东地中海海军司令的哈伍德海军上将陪同下，乘火车从开罗前往亚历山大港。他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人，但是我发现他在法国舰队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因不断收到互相矛盾的建议而弄得不知所措。下午5时，戈弗鲁瓦舰队司令来到海军本部大楼。哈伍德海军上将在作了必要的介绍之后，就离开了我。这个怪癖而执拗的人难得上岸，只是经过一定压力之后方始首肯的。会谈自始至终是用法语进行。经商定，我们的第一次会谈应在哈伍德海军上将的住宅举行。然后，在当天晚上我们和一位名叫菲马罗利的人共进晚餐。此人是一个住在亚历山大港的侨民，由于某种原因已经成为戈弗鲁瓦舰队司令的莫逆之交。

戈弗鲁瓦对于凯西和他的部下根据丘吉尔的训令对他施加压力，显然忿忿不平。他一上来就针对他所受到的待遇发表了一通情绪激昂的长篇大论。凯西曾试图对他加以盘诘，就好象他曾经是一个不诚实的证人一样。有关会谈的报道与事实颇有出入，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不得不以书面否认硬说是他发表的那些声明。凯西的助手看来象个情报人员，他因此更加感到诧异。

首相的来电是侮辱性的，不合情理的。至于他和纳赫斯帕夏的会谈，则无异是给他上了一堂有关埃及法律的课。无疑这位埃及首相上这一堂课还是够格的，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博而不专的鼓吹者。但是，戈弗鲁瓦对于这个问题却充分知道，应该认清这项有关法律地位的说明已错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清楚了解大不列颠根据英埃条约在亚历山大港所享有的地位。他不会为这种幼稚的方法所吓倒。经过这番初步会谈之后，这位海军上将变得比较通情达理了。既经发泄了胸中积愤，他不再陈述己见而开始提问题了。

看来他主要关心的是法属北非的吉罗将军政府的确切地位。他带了一些取自英、美无线电广播新闻中的摘录，意在表明法属北非实际上是一个被占领的区域。在他那种遇事多疑、惯于牵强附会的想法中，他甚至把为北非经济委员会<sup>①</sup>组织进口货所作的公告都曲解成为美、英两国实施经济暴政的另一证据。

我尽力客观地向他描述了自登陆之日起直至目前的形势发展。我向他解释了占领的原来意思——登陆既然起初遭到了法国当局的反抗，所以不得不有一度的占领——由于达尔朗海军上将和克拉克将军达成的协议而已经有了改变。我试图向他详细说明，这种关系已稳步发展成为盟军总部和法国政府之间的一种工作安排，而这种安排正渐渐具备了战场上盟军之间正常协定的形式。我强调了对法国主权所表示的尊重。吉罗将军以战争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率同他的幕僚和卫队一起居住在夏宫。他的战时内阁是由包括摩洛哥的诺盖将军、阿尔及利亚的马塞尔·佩鲁东等各省首脑在内的人员所组成。为处理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许多实际问题，成立这种松散的联合据说是必要的。我还给他举了一些

---

<sup>①</sup> 北非经济委员会是盟军总部与法国方面商定建立、旨在组织或毋宁说恢复法属北非的经济生活。

由盟军总部和法国政府之间自由商订的各式各样协议中的一些例证——例如，以代表英、美的北非经济委员会为一方和以代表法国的法国财政部为另一方的联合经济委员会。我也告诉他法属北非诸如磷酸盐、铁矿石等这类出口物资的价格在联合委员会自由商订所达成的种种协议。这也同样适用于对象铁路运输之类的劳务所应付的报酬。所有这些都是按美元和英镑折成法郎，以伦敦和华盛顿所给法属北非的信贷来结算的。食品、衣服等进口物资也同样是交由法国政府，通过正常的法国渠道（在当时是“Groupements Economiques”〔经济小组〕）实行分配。美、英两国所实行的唯一控制，只是在每一分配阶段上的价格差。这种控制同应用于美、英两国之间的根据“租借法案”分配物资的手续并无二致。英王陛下政府已经接受了这种控制，而这并不含有损害主权之意。

我还给他举出了一些其他的例证：邮电检查协定、电台管理协定、278 集中营联合视察委员会协定。所有这些都是由墨菲先生和我代表美国和英国政府同吉罗将军及其同僚通过正常途径商订的。

这一切引起舰队司令的兴趣，也使他放心。当我明确地告诉他，“盟国”一词，其含意是在抗德战争中自由团结在一起的英、美、法三国人民时，他似乎颇为感动。实则我的那张 Cercle Interallié d'Alger（阿尔及尔联合俱乐部）的会员证使他大为兴奋，这个俱乐部是最近在巴尔多博物馆组织起来的。

于是他问我，如果吉罗去世，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如何能组织一个合法政府呢？我回答说，依我之见，战争委员会就赋有事实上的权力，能够采取必要的行动。不过，如果等到整个法兰西帝国能统一起来并组织一个统辖所有领域的临时政府，那么局势当然会相应地改善和正规化。

这一席话导致舰队司令对于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发表了一通多少有点语无伦次的议论。他似乎持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他非常



憎恶戴高乐运动，他说那是夹杂着过激主义和流氓行径的一种运动。他也认为卡特鲁将军绝不能挽回他在叙利亚的行径所留下的恶名。（这当然是指驱逐德国人和维希方面的法国人而言。）另一方面，他似乎认为，在戴高乐和吉罗联合起来之前，这个法国政府的基础还不能广泛到足以使他这位舰队司令戈弗鲁瓦予以承认的地步。我冒昧向他婉转指出他的自相矛盾之处。

戈弗鲁瓦舰队司令于是说他应该直言无隐。总之，他认为他的部下大部分都希望团结在吉罗周围，但是关于采取这个行动的时机，他们信任自己的司令官。他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机会。他已经奉到他自己政府的命令。他只能在局势非常明朗的情况下方能不顾这些命令去冒所涉及的风险。他曾认为土伦事件是一个机会。他对这个问题曾苦思焦虑了一整夜，并已决心采取行动。但是他发现他的舰长们不会给他以支持。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他怀疑以土伦事件作为契机是否错了，因为他感到破坏停战协定的也许毕竟不是德国人，而是北非法国人对德重启战端。这种说法简直令人困惑不解，因为它破坏了我们主题的理论根据。虽然如此，我却不去理它，而是问他可能有什么机会出现。我建议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时机，对此，他并无异议。第一个是代表法国或法兰西帝国所有未沦陷的地区组成一个法国政府；第二个是结束突尼斯战役。这位司令又补充了两个：由于德国的行动已清楚表明法国的贝当元帅政府不能再视为合法的政府；或者贝当元帅逝世或辞职。我冒昧补充说，德国人对包括维希政权在内的整个法国所施加的臭名昭著的压力，无疑不应置诸度外。

然后他谈到米索菲海军上将的来访。他对于能会见他并能派加隆舰长去法属北非，感到非常高兴。他认为米歇利埃是一个老好人，米歇利埃一度是他的部下，他对他印象不错。他准备作些初步安排，把他的舰艇部署好，但是他决不会把这些舰艇开到除法国



港口以外的任何地方去。他似乎非常急于想知道我对攻取突尼斯的看法。谈到这个地方,我们的第一次会谈就结束了。

下午7点30分,我们在菲马罗利先生住宅共进晚餐。进餐的时间持续很久。饭后,夫人们按照英国惯例离开了餐厅。

我的谈话主要是回顾往事,谈论上次大战的种种掌故,并且把英、美、法同盟在法属北非参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形式进行全盘改组说成是事实。我们还以打鸬鹚为话题谈了相当时间。舰队司令告诉我,他的岳父曾经在英国买下或租赁过一个著名的猎场。在那些事情都由有教养的人管理的年月,政治还没有落到流氓手里。戈弗鲁瓦真正是一个腐朽透顶的假绅士!然后我们谈到1914—1918年,谈到那个时期的世界大事,谈到失望和胜利的时刻,因而谈到法属北非的问题和重建同盟的问题。我着重谈了有关法国军队280 的规模和重新武装的计划,也强调了米歇利埃舰队协同坎宁安海军上将所作出的优异成绩。我们还谈到共同的朋友,谈到卡萨布兰卡的港口和其他本地风光等话题。

我问这位舰队司令,他是否有意同法属北非保持接触。他说他有此打算。他需要卡萨布兰卡海军部的帮助,尤其是在人员方面。我说,如果在邮电或空中客运方面需要我们什么帮助的话,希望他通知我,并希望不久能在阿尔及尔见到这位舰队司令,和他在俱乐部里一起打桥牌。我们没有明确提及拟议中的接受法属北非驻亚历山大港的代表所作的安排,但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我尽力利用舰队司令的怀念乡土和故旧之情。我告诉他有大量军民源源不断地离开法国,重新参加了法属北非方面的运动。这一切看来他都闻所未闻,我想他相当感动。

下午9点45分,汽车来接我。我把舰队司令送到码头,多次相互亲切致意而别。

我将这次会谈纪要,连同我的结论,一并寄送伦敦。结论的内

容如下：

1. 我不认为你们能吓唬住戈弗鲁瓦舰队司令。他看不起这种作法，尤其是首相所作的种种。他非常自信……决不会屈从于胁迫。……

2. 他接受维希方面的命令，直到他认为显然一旦有词可以自解，否则他将不愿违抗。

3. 他现在（自从法属北非重新开战以来）正期待着这样一个机会，一旦机会到来，或许会加以利用。这个机会，在我看来，将在德国人被逐出北非，而戈弗鲁瓦能率领他的舰队通过地中海开到一个法国港口的时刻。

回到开罗，除等候首相的回音外，简直没有什么事情可作，而回音却不象是会令人鼓舞的。由于上次不幸事故的后遗症仍未消除，我认为去马耳他作一次短程旅行是相宜的，一则去看看那里的发展情况，一则也为了变换一下环境。结果倒真是一番令人神往的经历。尽管轰炸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整个气氛却是轻松愉快的。人们虽然以迫切的心情注视着突尼斯战役的进展，但是大家都感到马耳他苦难的日子是不会太长了。 281

尽管有点不太连贯、反反复复，但是把 X 舰队的经过情况了结一下，似乎是合适的。我确信要使这个古怪的人得出在某种意义上他自己也想要得出的结论，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向他的官兵施加财政压力，并向他们指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最终将被逐出北非。我向首相解释的这个政策的第一部分是基于“钱可通神”这一原则。第二部分则是局势已接近于胜利的顶峰。

到 1943 年 4 月底，我成功地说服了吉罗派一名军官去负责 X 舰队的供应问题。这时候他确信达成最后解决已为期不远了。同时我们设法通知戈弗鲁瓦舰队司令，要他知道，现在必须指望从吉罗的组织那里领取军饷了。英国财政部将根据原来的协议，继续提供资金，但是将不会直接拨付，而只是通过吉罗转发。虽然，丘

吉尔仍不断提出更加激烈的办法，我还是顶住了这种压力，这主要是靠了自始至终全力支持我的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帮助。5月15日，戈弗鲁瓦终于让步。他仍试图提出一些枝节的政治问题，但是吉罗向他明确表示，除非他立即同意把亚历山大港的X舰队重新归附法属北非海军，否则他就停发军饷。

这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就这样终于得到了解决。丘吉尔始终不大原谅我，或至少是装着不原谅我。到5月底，我们在直布罗陀的政府大厦会面了。

282           他立即就X舰队问题对我提出责难……指责我违背了他的指示。我以无论如何他总得到了这支舰队为词进行反驳。“一点都不感激你！”他说道。“我不明白，”我这样说，“要是把事情搞糟，你尽可责备我，既然办妥，那你就不能不信任我了。”他一直在咕哝不休，总怪我没有执行他给我的指示。<sup>①</sup>

要安排好这些船舰出海，当然还要有一些耽搁，直到8月间，戈弗鲁瓦才把一艘主力舰、四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和一艘潜水艇经由红海和好望角开到北非。

这段插曲是说明那些仍然忠于维希方面的人们头脑的顽固，以及同那些并非纯粹叛徒即观望派的人们打交道的特殊困难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实例。戈弗鲁瓦显然是一个具备最高道德标准的人。但他太迂腐，是个假绅士，正如他的谈话清楚表明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他这种以绅士自命是建立在旧式观念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他所认为作为一个绅士所应具备的道德品质之上。他实在无法理解象我们首相那样的人怎么能期待他，甚至要求他违背自己的忠诚誓言。他憎恨德国人，而对英国人怀有深厚的感情。实际上他有一半是英国血统。但是，就象詹姆士二世逃亡后的那些没有宣誓效忠的人一样，不管他因为他毫不信任历届法国政府而遭

<sup>①</sup> 1943年6月4日。

受多大痛苦——他对贝当元帅的许多行为甚至也不赞成——他却  
被自己的誓言束缚住了。

在我国，由于长时期以来关于我们自己效忠的问题不曾有任何  
疑问，所以要我们为戈弗鲁瓦设身处地着想是有困难的。溯自  
1688 年以来，这个效忠问题对于我国同胞简直不形成什么困难。  
要找一个能够同戈弗鲁瓦舰队司令媲美的事例，那就需要看看象  
桑克罗夫特大主教以及住在主教公馆或教区长、教区牧师简陋住  
宅中的其他许许多多那样圣徒般的人物，他们除了向他们认为合  
法的国王詹姆士二世以外，不向任何人宣誓效忠。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国生活中，没有什么显要人物比 1688 年夏由于詹姆士  
二世的非法行为而把那七名主教送赴审讯所蒙受之害更为痛苦  
了。实则对他们的审讯和释放也许正是詹姆士企图摧毁英国国教 283  
恢复天主教权威的转折点。他们被释之后使他们成为众所崇拜的  
英雄。然而，革命以后，这七位显贵中有五位又变为不宣誓者。尽  
管他们遭到那样的待遇，还是不肯违背对他们尊为神明的国王的  
宣誓。

当我想到这一切，我就往往回忆起我们的这一段历史。要是  
我们试图以武力夺取这支舰队，戈弗鲁瓦舰队司令未始不会下令  
凿沉舰只，而且这项命令也未始不会为他的部下所遵从。对他的  
批评并没有触动他，对于无论丘吉尔的呼吁还是他的责难，他都无  
动于衷。最后，还是财政压力，再加上在我看来远为重要的盟军在  
北非的大捷，才使他疑虑重重地、很不情愿地、几乎是违心地采取  
了这最后一步。



## 第十二章 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

对 X 舰队的追求，连同它所有那些惊人的事件，只不过是我們所面临的主要困难中的一个插曲而已。那些在法国形形色色反德集团之间关系上显然难解之谜应如何解决呢？两位将军已经在安法会晤。硬撮合成的婚礼已经正式举行。但是迄今还没有任何度蜜月的迹象。我们所能得到的充其量就是表明共同目的的一纸不冷不热的宣言，和在他们之间设法保持联系的一项谅解。

我在肩负着第一次不幸的使命去开罗之前，在我那个人数不多但办事效率极高的工作班子协助下，审度了整个形势。有鉴于法国统一政权的实现会有无可避免的延宕，那么要应付国内外对盟国处理这件事所作的批评，就非让他们对种种困难情形有更清楚的了解不可，这一点我认为是重要的。

由于突尼斯战役陷于胶着状态，我们的很多报纸似乎已经忘记了我們远征的主要目的。提醒他们想一想现实，正是我们的任务。

法属北非必须就它在战略上的作用予以考虑。这是对德作战的一个方便的地方；我们军队的目的就是要将德国人从这个地方驱逐出去；而能否利用法属北非作为进攻大陆陆地上的敌人的一个方便跳板，则是我们的利害所在。

盟军并不是为了去休养，或为了在阳光照耀、气候温暖之中消磨一个宜人的冬季而在法属北非登陆的。这不是一次观光游览。这是一个战争行动。<sup>①</sup>

---

<sup>①</sup> 这一段和以下各段录自当时我拟具的备忘录。

尽我们力所能及帮助总司令实现他的最高军事目标，显然是那些 285  
在政治或民政事务上为总司令出谋划策的人们责无旁贷的。

必须保持或务使法国军队忠于这个事业。必须劝说或命令法国政府提供一切便利。必须尽可能让法国和当地人民镇静和满意。必须保护交通线免遭破坏。必须诱使工人高高兴兴地始终如一地修建码头、道路、机场等等。不可有任何可能扰乱军事行动的骚乱或不满。必须肃清一切间谍。必须对无线电广播、报纸、电报、信件等实行检查，以防走漏军事消息。

全境平静如常。铁路、码头和公用事业都在顺利运行。交通不曾受到干扰。诚然，从纯理论上说，法国当局所处的地位是异乎常规的。在所占领的敌国领土上进行统治的一个陆军司令官，别无任何选择，至少在最初阶段上。他必须宣布他自己为最高军事总督，而立即成立一个管理民政的军管当局。但是就是这样，正如我们不久就在意大利看到的那种情形，也有很大的不便之处。要为被侵占国的部分或全部地区的行政承担直接责任，就不能不有一大批既不了解背景又对地方问题茫无所知的官员。某种间接形式的管理几乎立即就有了必要。无论如何，艾森豪威尔已经决定反对这项计划，因为，为了明显的理由，这对于我们希望完全恢复其反轴心国同盟地位的一个民族是不适用的。另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原会从一开始就把法国人看作是一个同盟，并按照 1914—1918 年公认的方针调整我们和法国当局的关系。

在那个场合下，盟国的地位和上次大战在法国领土内作战时英国方面对于法国政府所处的地位将不会不同。这当然会是法国当局所希望 286  
达到的地位。在我看，要承认这种地位将是非常错误的。只有象在 1914 年那样，我们是应法国政府之请而登陆，这样作才会是正当的。目前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只有等到相当晚的阶段才能予以承认，而且也还有很多先决条件要提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条件摆在眼前。

实际上，我们在奉行的是中庸之道，这也许是不合逻辑的，而

且是难于下定义的,但决不是不成功的。无论如何就目前来说,我们希望维持这种折衷办法;但是必须极其审慎、极其巧妙地予以掌握。总司令的最后威权必须象宗主权那样备而不用。但是凡我们想要得自法国当局的一切,如果可能的话,必须以外交谈判而不是以武力赢得。只要能获得效果就应该保全面子。这在纯军事领域自然要比在政治和准政治领域内简单得多。在我们为军事目的而向法国方面提出要求时,则比较容易得到满足。

但是在凡属缺乏明显的正当理由而开始侵犯法国的主权时——正如在内政、在押人犯以及广播和各种宣传领域内那样——困难就发生了。我们只能凭靠以长远利益为依据的论点进行辩解。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应该在政治上保持冷静的一个军事问题。我们不能不说如果美、英政府要在生产和军事领域内取得两国舆论的热情支持,就必须使两国舆论得到满足。

实则这是我们督促政治改革的最有力的武器。

所以,显而易见,无论如何就目前来说,不应采取任何从军事角度来看干扰正在运行顺利的事情的行动。但是我们还有另一个问题,幸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给我们造成不可克服的危险。对这些辽阔领土不能不进行治理,而它们在性质上却又彼此迥异。

从法律上讲,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所属的一部分,但是当然又非真正法国本土。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等欧洲人,共约一百万。阿拉伯人约在六百万以上。此外大约还有十万犹太人。然而,在阿尔及利亚,由于法国人多,而就有一个真正的法国舆论。

在仍以苏丹为名义上统治者的摩洛哥,情况和早年印度的一个大土邦没有什么两样。欧洲人口二十万人有奇,穆斯林近六百万,犹太人十六万。撇开因诺盖将军的性格所引起的错综复杂情况不谈,欧洲通常的政治考虑在这里无一适用。

大约在这个时候,诺盖将军对我作了一次莫名其妙的访问,一

则表示敬意，一则为首相在安法营地所起的重要作用向我致谢。他所讲的话并没有使我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正如斯伦德谈到安·佩奇时所说的那样，“起初我们之间没有厚爱，而进一步的结识，则要减少友爱，方顺乎天意。”我到达阿尔及尔后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要设法把我的办公地点安排在墨菲所占用的同一大楼内。实际上，墨菲的办公室就在楼下一层。诺盖将军一坐下来，就讲了许多恭维的话来表示他对古今中外最伟大的领袖丘吉尔的崇高敬意。他说他和他遇到的所有英国官兵（在摩洛哥为数很少）相处如何融洽，英国人在各个阶层上处身律己如何可钦可敬，以及他们对于政治的微妙和殖民帝国的问题经验如何丰富。我洗耳恭听，未作任何评论，静候他这番高谈阔论之后必然的下文。他接下去谈论说，美国人在各方面都是和我们恰恰相反。他看不起美国总统；美国军队所到之处总是制造麻烦；他对他们的司令官殊无信心；美国人对于非洲所遇到的困难简直没有或完全没有经验；总之，他们是一个祸害。在他说完之后，我对他说，“将军，我想你现在要去看美国政治代表墨菲先生了。”他承认他就要去。我说，“将军，我可以帮你些忙。我愿意把你所谈关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一切话加以口述而让人记录下来。只是，在前一部分，凡你所作的赞誉之词，我要把其中‘英国人’这个字换成‘美国人’。而在后一部分，凡你所作的批评之处，我要把其中‘美国人’换成‘英国人’。然后我送一份给墨菲先生，这会省你很多唇舌。”诺盖多少有点狼狈，于是匆匆离去。这个故事立即传遍了盟军总部，这在未来忧心忡忡的日子里，并不是没有它的价值的。虽然只能天公地道地说，摩洛哥在诺盖统辖之下一直平静如常，但是这个地区确把我们卷入了种种麻烦之中，尤其是从供应的观点来看。

在战事仍在进行中的突尼斯，人口计有：阿拉伯人二百二十五万以上，犹太人约六万，欧洲人二十一万三千。



在仍旧掌握在德国人手中的突尼斯那部分地区，穆斯林人口是具有重要性的。这本身就形成为一不可轻视的问题。德国人在阿拉伯人之中正进行着非常积极的宣传。他们已经夺取了大量各式各样的货物，可供分配给本地人之用。并且他们正在（据我想）耶路撒冷回教大经师的积极合作下，以一切可能的方法，煽动他们来反对我们。我已竭尽全力从速在心理作战部成立一个适当的阿拉伯科。在这方面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

要评价在阿尔及尔的法国人的真正情感，是非常困难的。这里有很多忠心耿耿的法国节烈之士，多半是从法国流亡出来的，他们宁愿定居于北非而不肯接受德国人对他们热爱的珍视的故乡的占领。这些人是在 1870 年战争之后从阿尔萨斯和洛林移来的。他们以一种既令人感动又给人以鼓舞的方式保存了他们的风俗、服装和传统。这些人是法国人口中的优秀分子。但甚至他们也受到各式各样政治情绪的影响。他们支持吉罗，不久也将支持戴高乐。然而，曾经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却正因为他们的这种友谊而备受折磨、致使我们既羞愧而又苦恼的，也正是其中热心的戴高乐分子。

289 至于其他“殖民地的移民”，无论大大小小的产业主，象大多数农业家一样，更加关心的是他们自己产品的价格，在这种场合下，主要是酒类的出口。截至 1942 年年底为止，酒一直是向法国自由出口的，并且他们一直得到他们所迫切需要的进口，这主要是美国在登陆前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这时，经过与法国本土将近三个月期间的隔绝之后，他们在看法上颇为混乱。酒的出口已经被切断。（后来，盟国设法大量收购。）他们深为愚蠢的、不公平的汇率所苦。大量英、美部队的出现自然造成通货膨胀的后果。因而盟军总部的供应和民政活动就至关重要了，而北非经济管理委员会却是这种活动的工具。我奉派和墨菲担任这个单位的两主席，这是多少有点破格的职位。但是委员会实际上是由将军汉弗莱·盖

尔爵士管理的，盖尔爵士是我认识的最精明强干的官员之一。（在很多年之后当我敦请他担任巴西尔敦新市开发协会主席时，其精明强干依旧不减当年。）

美、英两国官员现在已渐渐成为相处很好的和相当有效的工作小组。……他们（果断地、坚忍地，但依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处理他们的重要任务。我对于我们英国小组——在非常不利的物质条件下——取得的高标准的成绩，获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伦敦的政府机关中，凭靠它的信差、卷宗、保险箱、电话、秘书等等全套配备来处理大量工作是一码事；十个人或十二个人只用一具电话（操作效率既低而且障碍横生，令人恼火），而打字机、纸张、钢笔以至墨水，全不具备，并且只有一张椅子和一个用货箱的一块木板勉强架在洗碗槽上作成的书桌，要凭靠这种条件作出同样的工作，则全然是另一码事。

这些经济方面的困难，尽管障碍重重，还是能逐渐予以克服。但是内务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如何作到我国舆论理应要求的“清理家务”的工作呢？

就目前而论，吉罗将军占上风。他的性格单纯得可爱。有时 290 在我看来他简直象是《爱丽丝漫游记》中的白骑士，因为他似乎只生活在云层里。他举止文雅，一口纯正而简明易懂的法语，但是他却很能惹人恼怒。佩鲁东，不管在政治上有什么弱点，却十分机智，有一次他对我说：“军人的手腕永远可以从他们的胡子辨认出来。吉罗的胡子太具有象征性了，象基钦纳勋爵一样。”<sup>①</sup>他对任何形式的政治都一窍不通，的确和基钦纳勋爵如出一辙。他也是旧殖民地派的一位将军。

他的经历是一个坐牢和失败的经历。但是这些令人不快的意外决没有使他对于自己的军事知识失去信心。我们那些在安法同他会晤并交谈过的高级将领，对于他在军事方面见解的价值，自然会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我确信他们会一致认为，他的见解象很多老一辈的法国军

<sup>①</sup> 1943年4月13日。

人那样，大部分是陈腐的。他那些见解之与现代战略和战术，正如德、奥将领的思想之与拿破仑的天才一样。

我听说他对于现在称作后勤学的这门科学全不介意。他似乎不了解现代军队是无法“靠本国活下去”的。他看上去象斯大林一样，视海洋为一无足轻重的障碍，以为部队和装备可以轻而易举运过海洋，仿佛象渡过一条小溪一样。

自然不仅是吉罗一个人，而且高级指挥部的绝大多数法国将领莫不如此。因为法国陆军自全盛时代以来的确已经蜕化变质了。战前，提升之慢，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营长起码得是四十五岁的人。两星或五星将军都要在六十岁以上，元帅的所需供职资历之长，非但著名，而且骇人听闻。虽然如此，法国军人仍然妄自尊大，自以为举世无双。尽管在1870和1940年有过不可收拾的溃败，在1914—1918年又有过一次极其严重的震撼，他们仍自恃为<sup>291</sup>军界出类拔萃的人物。英国人只不过是业余的票友而已。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体育运动的情况那样，任何运动项目也没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二流水平的专业运动员。而法国军人实在就是这流人物。

对于法国军队的这种看法虽仅经过短期体验而形成，但其根据却是强有力的。在大约几个月之后戴高乐将军向我表示几乎同样的感想时，我极感兴趣。他认为必须建立一支新军，就象1789年之后踊跃从戎的革命军那样。

至于北非方面法军的士气，却难以断定。正如在殖民地军队中一贯的情形那样，有着一些君主主义的倾向。但危险得多的却是对维希方面的眷恋，而且说来奇怪的是，这种眷恋之情竟然夹杂着对那些政客们的蔑视，照大多军人看来，这帮人是应对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负责的。

他们对于究应以何种制度取而代之，虽然胸无成竹，但是他们却不

愿恢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间实行的那种法国议会制。何况他们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而真正惊慌失措。有些非常可敬、非常正派的军官曾经在我家里对我说：“俄国人一帆风顺——太顺利了。”这种情绪当时大为敌国的宣传所利用。

但是，吉罗将军，不管有怎样的过错，却没有受到这类失败主义观念的影响。他是真正要同他誓不两立的德国人战斗的。诚然，在问到任何政治或经济问题的看法时，他会报以使人无法再深问下去的微笑，以一双澄澈的碧眼盯住发问人说，“我的朋友，我在战斗呀。”

在政治上，吉罗将军假装不感兴趣。但是他却一直由于一系列凑巧或不巧的机缘而发现自己居于一个政府首脑的地位。他认为政治是屈从于战争需要的。但是在这一点上（正如所有对极右翼表同情的政治家一样），他确乎有欠诚实。甚至在战时，政治也不能同战争行为完全割裂开来。撇开他完全外行的那些专门经济问题不谈，还有一些广泛的互相牵涉的问题，即如人力问题（正如我们的经验所表明）就不能单单由陆、海军将领予以解决，而必须由各式各样专家组成的一个单位加以审查并由国家主持大政的机关以一个独立的观点作出决定。说“我在作战”只是一句简单的话。在军事之外，政治领域中所作的或有待作的许多事，无不在战争努力中起着作用。何况在这种思想感情的笼罩下，虽然名义上在战斗，他也许无意识地，而他左右很多人却是有意识地，正不期而然地为媾和进行堂而皇之的部署。 292

但是可怜的吉罗所受的最大伤害，也许就是最近当他在北非登陆时，因集结支援部队的彻底失败而给他的自尊心的打击。他已经把他自己置于达尔朗的指挥之下，从而他托庇于维希并接受了衣钵相传的原则。他的副官博弗尔司令曾经对我说，他之所以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一次说来荒唐可笑的阴错阳差。他是着便服登陆的。他的上将制服装箱先行送出，但不幸遗失。

戴着礼帽如何能发动武装政变呢？真是一个问题！非弄到一身五



星上将的新制服不可，然而千载难逢的机缘竟失之交臂。无论如何，吉罗将军在盟军登陆后那几个事关成败的夜晚一直担心害怕。故有此一哭。于是畏首畏尾、摇摆不定，于是有了对维希泥菩萨的礼拜、有了政府中的右翼政治气息、呼吁“维持秩序”的哀鸣（弱者总是以此为庇护所），以及自达尔朗的擢升和被刺以来直至于今的那种举棋不定、踌躇不决、口是心非的政策，所有这一切都由此而产生了。

所以我认为吉罗决不会采取一种强硬路线。他会大言不惭，但是他会屈从于事态发展。而事实也证明其如此。

293 贝尔热雷将军是副高级专员兼秘书长——也就是吉罗的副司令官。乍一见面让人感到他风度非凡，给人的印象是诚实可靠，然而他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反动派。诺盖将军则以盛宴和游猎使森林地带的美国将领乐而忘返，同时对盟军之友却实行迫害。所谓“帝国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则是布瓦松——品行端正，但在达喀尔时颇怀敌意——和已经在阿尔及利亚取代夏泰尔的佩鲁东。佩鲁东是一个精明强干的行政人员，并且现在已确信盟军正走向胜利。但是让这项任命得以通过，我是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因为他不是一个复兴的法国所需要的那种人物。

勒梅格尔—杜布勒伊是阿尔及尔事务中的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虽然在登陆前为帮助墨菲所作工作无疑大有助于恢复他的声望，却常被人怀疑是一个反动派，甚至是一个“卡古拉尔分子”。他现在已经成为盟军事务部次官。在战前，我们这些不恭的年轻保守党员曾经奉送给一批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实业家一个“四十大盗”这样侮辱性的绰号，这批人通常为了保全席位而坐在下院保守党一方。勒梅格尔—杜布勒伊倒未始不会在这一批人中名列前茅。

我并不认为吉罗真正欢喜所有这些他相与结伙的人们，因为他是一个具有高尚的、可敬的理想和行为的人。但是他吓破胆了。

他忘不了那可怕的日子。

伟大的吉罗将军亲自（多半使用第三人称是他每涉及自己惯常的事）出场了，可是军队不为所动，所以他以他所谓的“鸚鵡政治”来聊以自慰。他要慢慢地来。他将“取渐进的”作法。（事实上，除非在墨菲和我的极大压力下，他一无所为。）

那末，在这三、两个星期中我们作了些什么呢？我们每逢看到吉罗，也会象鸚鵡一样地重复我们那句老生常谈的话题。英、美两国舆论都深为焦灼不安。我们打仗是为了给欧洲带来自由，而不是带来暴政。吉罗和他的朋友倒很可以说他们也是非常渴望同戴高乐派达成一项谅解的，可是戴高乐却非要求一些明显的条件不可。

第一——而且是对合并提出的一项根本性的先决条件——必须同维希和维希传统断然决裂。第二，某些高级官吏必须撤职，虽然其人数不多，但无论就其本身和作为采取行动的象征都是重要的。第三，在所有各级行政机构都必须吸收更多的文职人员。第四，政治犯和在押人员必须释放。这是迫不容缓的。吉罗将军也和我一样了解，有八千人分别拘押在散布于沙漠各处的俘虏营中，条件往往极其恶劣，其中固然有重犯和刑事犯，却也有无辜的犹太人或热诚的盟军同情者。关于这一点，在三、两个星期之后，我就将得到证实，而且令人毛骨悚然。在一次午宴上，有一位大概是被释放出来的戴高乐派的法国军官告诉我，有一个和他同关在监狱里的西班牙人，曾经招认枪杀了一个人并吃掉了他的两臂。我忍不住将他（那位法国军官）双手插在口袋里的那副神气指给另一位客人看。看来这使他很感兴趣。但是，尽管有些夸大其词，俘虏营确是臭名远扬，不能不加以处理的。第五，完全由维希方面制定的反犹太人的法律，必须废除。这种法律违犯了正当行为的每一条准则，是纳粹政权带进欧洲最恶劣的使人恐怖的东西。最后，维希

方面和“法西斯主义”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必须肃清。

所以这个时期最初三、两个星期的总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虽然事关成败的头等需要——为作战打下一个牢固的、平稳的基础——已经有了保障，虽然经济问题尽管严重，也不是不可克服的；但是在政治战线上，直到当时为止，还殊无成绩可言。从上到下整个气氛依然沾染有维希主义色彩。虽然对于释放个别政治犯，我们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其他问题上，也一直是徒多空谈而殊少行动。而且没有一天没有骚乱事件发生。

例如，就拿勋章——光荣战争十字勋章——颁给法国英勇战士来说吧。为什么颁发勋章？为抵抗登陆。而又是怎样抵抗的呢？是由于他们对英、美士兵作战吗？甚至连这样都不是——这样做（从某一观点来说）倒还不失为士兵个人方面英勇的、值得表扬的行为。可是不是。是为了击毙两名帮同引导我们部队的戴高乐派或亲盟军的游击战士。

295 甚至还有更加恶劣的丑闻。

拉斐特空军中队在隆重的仪式中予以重新装备。法、美乐队大奏军乐；法、美将领分别讲话；然后——新组成的两个中队登上他们的飞机，起飞而去。飞往哪里？去突尼斯？去轰炸西西里岛？去袭击萨丁尼亚？不是。它们风驰电掣地飞往马赛，到那里去同元帅，同他们的妻子，也许是同他们的情人团聚了。不难想象，这样一桩人们想不到的事件势必满城风雨。但是直到现在，除开拖拉了三个多星期的一项“调查”之外，别无举动。著名的——也就是臭名远扬的——芒迪戈尔将军照旧统率法国空军。美国人是一个温和而宽宏大量的民族。我但愿这两个坏蛋是搭乘吉罗将军用甜言蜜语从首相那里（在我的帮助下，我坦白招认）骗去的喷火式飞机中的两架飞逃的，那我深信唐宁街方面一定不免要作一番连篇累牍、大张旗鼓的声讨。

第一批戴高乐派密使的到来无疑激起了一线希望。然而我生怕这种如释重负之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万一这种联系没有结

果,甚至关系破裂,那么一种非常严重的局面势必随之而来。政治的动荡可能以一种危险的形式出现。英国的威望会特别受到严重影响。然而,尽管有这一切“势必使元气斫丧,势必使马克·塔普利小队灰心丧气的”挫折、阴谋、反阴谋和幻灭之感,我认为还是取得了小小的进展。

罗斯福总统曾常常表示他对法国前途焦虑不安,首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官方的公式是:“法国人民在解放后必须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但是我认为这种公式总有一天要从根据理论变成为根据实际。

古往今来的历史表明,政府和政府的形式都不是凭空选择的。只有西埃神父才会抱这样一种幻想。在战争的后期,所完成的和有待完成的每一件事都显然会有其后果。如果一支庞大的、胜利的、装备精良的法国军队重新开进法国本土,谁统率这样一支军队,谁就显然会居于举足轻重296的地位。此人在某些人看来会是救世主,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法国人民的潜在暴君。如果他率领一支大部分是下流无赖的军队前来,对于他的军队的政治观点将不必操心。如果他为一批右翼人士所包围,而这批人也许出于真正的爱国动机,坚决不想再把战前时期使法国那样贬损国威的脆弱议会制度重新搬回来,而建立一种无论在君主制或共和制之下的独裁政权,那么在西班牙引起的那样灾难的局面就会重演于法国。

在法国本土的左翼或中间力量就会以越来越转向共产主义作为唯一的回答。戴高乐所依赖和指望团结的力量会越来越趋于极“左”。由于右翼的武装政变和可能从而挑起的内战所将产生的后果,对于整个欧洲,而特别对于英国,是同样有害的。我国人民将因我们在西班牙事件中已经领略过的那种同样严重的倾轧而陷入分裂。

所以从长远来看,现在戴高乐和吉罗的真正联合,不独是法国的利益,而且是英国的利益所在。

在同一份备忘录中,我继续写道:



事关成败的是，这样一种联合必须建立在一个广泛而集中的政治基础之上；必须试图重建对于自由和民主理想的信心；必须坦白承认战前对民主的背叛（我们也许能够由于公开地、谦逊地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咎而得到好处）；虽然如此，必须恢复过去曾经鼓舞过自由人民的那种锐气；法帝国任何临时政府的权威都必须靠此才能得以提高；必须靠这个根源来维持生存。

只有这样，我才看到法国能以拯救它本身并拯救欧洲免于灾难的可能性。

在这期间，盟军总部已经发生了一些有利于我的意向的变革。在盟军总部成立了一个行政委员会，以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主席，出席人员有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墨菲和我本人，连同我的助手 297 罗杰·梅金斯和前来襄助墨菲的一位极可钦敬、心胸极为开阔的官员萨姆·雷伯。这个委员会每星期开会两、三次，必要时可增加。它在协同制订英、美共同政策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艾森豪威尔本人发挥了主导的、建设性的作用。

此外，到2月底不但戴高乐派的使团的先遣人员已开始露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2月26日，让·莫内也从华盛顿到达。他名义上是商讨法国的重新武装，但是他注定要在法国政治形势的演进中发挥主导作用。莫内在华盛顿和伦敦政府的上层早已是一个知名人物。1940年夏，法国陷落时在承接法国合同一事中我曾和他有过接触。他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曾参加戴高乐主义运动。但是他强烈反对维希，是一个诚心实意的爱国志士；而且以享有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的信任著称。他是工作点设在华盛顿的英国供应委员会的一个事实上的成员。很多有势力的美国人，包括亨利·霍普金斯在内，都对他非常器重。劝请莫内去阿尔及尔的正是美国总统（也许获得也许没有得到国务院的同意），他在法国两派方面的威信立即开始增长起来。他受到吉罗的信任，同时戴高乐也认

识到莫内的主要目的是为法国的团结而尽力的。

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在法国生活中一直不动声色地、虚怀若谷地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我和他在阿尔及尔亲密无间地共事很多个月。我对他予以信任，也承蒙他对我推心置腹。在这个危机四伏的夏季之末，我的某一些美国朋友认为莫内就某种意义来说欺骗了他们。因为他是美国政府派出来的，所以他们中间很多人认为他应该继续支持美国的主张，那就是不应允许有任何法国中央政权产生，而承认这个政权具有中央政府资格，能和美、英两国政府平起平坐。

莫内的主要努力是以两个重大目标为依归。第一，不管产生什么样的“政权”或“政府”，都不应以个人统治，而应以内阁责任制为基础。第二，他力主在法国本土解放之后，必须使用一种合乎宪法程序的方法组织政府，决不可强制执行一种独裁制。 298

同时，地方议会(“Conseils-Généraux”)的残存议员得据以组成一种国民会议的1872年“特雷夫纳克法”，依然有效。在包括莫内在内的许多人看来，适用这项法律似乎是正当办法。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显而易见，墨守这样一种方法将会证明是行不通的——主要是由于有关人士多不知去向——莫内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承认有采取某种程序的必要。

法国受惠于让·莫内的非浅。他在阿尔及尔的工作对任何解决方案都是绝对重要的。他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集团之间的润滑剂，甚或催化剂。战后他在法国的工作证明是法国现已取得的繁荣昌盛的基础。但是他对英、美两国政府和人民是同样友好的。他始终抱着无论在战时或战后美欧之间必须有密切合作这一观念，而从未偏离。在他为欧洲运动所作的旷日持久、劳苦功高的努力中，他从来没有偏执过无论是从法国在西欧的地位出发，或者是从英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的地位出发的那样一种狭隘的或排他性的

观点。理应表示对他敬佩之词,已经不一而足。就我来说,在阿尔及尔那些热火朝天的年月中,我和他渐渐结成莫逆之交,我对他的聪明才智和道德品质方面所作的评价,从来没有动摇过。

同样令人鼓舞的是军事形势方面的改进。在2月中旬当墨菲和我为了政治犯和受迫害的犹太人这两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会见吉罗将军时,正值艰难之际。我们选择了德方反攻得手、暂时突破了美国防线的这一不幸时刻。塔拉受到了猛攻,特贝萨岌岌可危,因而吉罗将军向我们解释说——一条分缕析地并且津津有味地——在他看,盟军在西突尼斯的交通网以及在阿尔及利亚以东高原上南自比斯克拉北至特雷格马一系列的飞机场都处于危险之中。吉罗将军对于这种形势所送到他手里的策略上的机会,有掩饰不住的高兴。虽然他答应对于政治犯和集中营要加以处理,但是对于犹太人的问题却轻蔑地不予理睬。据他说,我们两国政府主要是关心犹太人的命运,因为我们两国有那么多的报纸都是犹太人出资经办的。关于政府中的改革和维希分子的撤职问题,他不想满足我们的要求。他就盟国未能对于显然将担任纯防御任务的法国军队以武装,大肆指责,并以此结束了这次会见。

诚然,关于这最后一个问题,由于在安法所作的而现仍有待设法解决的不幸诺言,吉罗是有理由指责的。何况在民用供应品方面也曾经有一定的困难。食品的情况日益恶化,我们不能不大量吸取美国的,甚至更大量吸取英国的供应。这里自然有大量的粮食贮存,尤其是在摩洛哥。诚然,据说有一队美国炮兵在沙漠中进行实弹演习,当他们发现飞弹爆炸时粮食弥漫满天,不禁大为惊愕。他们不幸击中了很多贮藏室之一,其中有一些可远溯自罗马时代,甚至罗马时代以前。

没有一个时候比2月19日这次不幸的会见以后使我感到更加沮丧了。然而不到四个星期的工夫,后来称之为“新政”的,就变



成了一个既成事实。

在同一天，亚历山大将军来访。他正要动身去前线，接掌在2月20日正式承担的指挥权。我清楚记得，他沉着而满怀信心地向我解释了前线看来已发生的情况。盟军总部虽然没有陷于张皇失措，但真正的惊慌情绪却是存在的。不到几天的工夫，亚历山大改组了战斗的序列。美国第2军团在卡萨林隘口遭到惨败，但是在亚历山大不动声色的有效控制下，到2月底，战线已全部收复。为把敌人逐出北非的最后战役制订计划，费些时日无疑是难免的。但是在这期间，英国的声威大振，部分是由于我们第1军所表现的卓越的战斗素质，部分是由于亚历山大用以应付艰难局面的令人钦佩的方法，而更加是由于他处理问题时不伤害我们盟国情感的那种宽宏大量和富有外交手腕的品质。所有这一切对于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位最为宽宏大量的人有着巨大的反响，并且在政治方面也给了我一定程度的帮助。由于从阿尔及尔搭乘前往总部的那架飞机没有带足汽油，以致他在接管指挥权的当天不得不危险地迫降着陆，这或许正是亚历山大冒险生涯具有代表性的一件。

在这期间，对我们来说，是否因为战局的顺利已经使吉罗对于盟国的力量重新建立了信心；是否因为他感到未能发送武器是由于英、美两国舆论的影响；是否因为总司令授予墨菲和我以全权而不断加给他以压力；是否因为正在阿尔及尔进行访问的美国陆军部副部长约翰·麦克洛伊所给我们观点的支持；是否因为夏宫源源不断地收到的有关北非民情趋向的报告；是否因为庞大的戴高乐派使团已开始表现出和特洛伊木马酷似的作法；是否因为政府中的不同集团现在迫使吉罗进行变革，并从而在他的心中开始有了一个总的想法；或者是否主要归功于莫内连同他那一个接一个的明确合理、百折不挠的建议；不管怎样，在墨菲和我同吉罗进行了遭到全盘否定的商谈之后不到四个星期的工夫，局势发生出乎



意外的、戏剧性的变化。

在3月6日下午,正式地、非常客气地通知墨菲和我说,已建议将歧视犹太人的立法完全废除。3月10日,我们听说有一些更加影响深远的措施现已取得一致意见,即将于3月14日吉罗将军发表的讲话中予以正式公布。3月16日,贝尔热雷将军和让·里戈辞职,第二天对我们的几乎所有的要求给以满足,并给新政从立法上加以肯定的八道法令正式公布。自从奇迹时代以来,从来没有一次转变如此迅速,如此彻底和如此显然莫名其妙。

所有这一切都是吉罗一手包办的。他并没有征询各省总督——阿尔及尔的佩鲁东、西非的布瓦松或摩洛哥的诺盖——的意见,而是以一种既成事实提交给他们的。佩鲁东非常聪明,深知不宜改变立场太快,而以一种神气十足、矫揉造作的姿态出现,宣布他现在是一个“适可而止的新政人员”。诺盖毫不为难地默认了。干练、严谨而又诚实的布瓦松则明白表示他一点不欢喜这套办法。

至关重要的是吉罗将军的演讲,而演讲稿,也征求过我们的意见。

星期六下午5时,我们收到了一份原稿。对这份原稿一直斟酌到星期日凌晨。星期日下午6时发表。

场面是相当动人的。大厅里座无虚席(大约有五、六百人),听众中还有洛林州和阿尔萨斯州人。下午5时墨菲和我一起到达,被安置在台上的前排两个空位子的下手——空位子是留给吉罗和贝尔热雷的(放有卡片)。乐队一直奏到5点45分左右吉罗在仅仅一位副官陪同下莅临时为止。为贝尔热雷准备的椅子匆匆撤去——这样,我自然明白他已经提出辞呈了。佩鲁东和布瓦松都在台上。诺盖则早已返回摩洛哥。

吉罗的演讲是以一种简洁的、军人的方式发表的(在儿童献花束、献饼干和亲吻这一套开幕式之后),而并不试图取得以言语动人的效果。从开始到结束不到半小时,非常为听众所欢迎。

会后,街上有戴高乐派的示威游行。我生怕吉罗因此而多少有点心

烦意乱(或担心在第二天我拜访他时,他要这样对我说)。①

讲演后,接着公布了那些最为人所厌恶的部长辞职的消息,这在世界新闻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3月16日,星期二,把由卡特鲁送致戴高乐的正式邀请的消息交给报纸发表。把请柬送到现已到达阿尔及尔的戴高乐派使团首脑卡特鲁将军是适当的。实际上,吉罗的演讲已包含着呼吁法国人团结一致的号召和向戴高乐提出一项含蓄的建议。

变化不大,而只具有象征性的政府改组以及对新命令的公布,这就完成了此项工作。由于工作稳扎稳打,所以效果非常之好。在四天之内,走向法国全民团结共同抗击轴心国家的一切障碍已经完全扫除。

一向从容不迫的卡特鲁将军,在阿尔及尔作了短期访问之后,已动身前往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所以非等他回来无法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

虽然如此,为吉罗派和戴高乐派之间的谈判奠定基础的,却是新政及其所主张的一切。要是不经过多次危急和焦灼的时刻就得不到一个结果,那是毫不稀奇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已开始走上了联合之路。

在法国问题的下一阶段开始之前,我有幸得短期地变换一下环境。亚历山大将军邀请我到他的总部小作勾留。这的确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可以摆脱一下我们在阿尔及尔周围的那种充满阴谋和紊乱的气氛。3月20日下午,梅金斯和我乘飞机启程,平安到达亚历山大总部。

第二天凌晨,亚历山大和我就驱车到前线的各个部分,在各个军团的总部停下车来。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玩味的经历。首先我看到了很多进行战斗的地方,并对这一带地势有了一个真正的概念——人们想像不到的绵亘不断

① 1943年3月19日。

的高山峻岭，和通往广大平原的隘口。

303 其次，使我有机会同亚历山大对于此次和未来战役的很多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很多复杂问题，作了一次不受干扰和有价值的长谈。

最后，这使我得以从这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的品格中学到一点东西。他具有特别迷人的魅力。简单朴素已成了他的生活习惯。兵营里的整个气氛为他的品格所控制——慎重、沉着、充满信心。他在这次战争中的经历是非同小可的。他曾奉命承担撤出英国在敦刻尔克残余部队的任务，他是最后离开海滩的一个人。后来他去缅甸。他接掌了两个师，一个缅甸师，一个英国师。两个师都为敌人所包围——缅甸师投降了，但是他设法救出了英国师，并组成了一条稳定的战线。在英国勾留了一个星期，又奉派前往中东去接替奥金莱克。他发现在离开罗七十英里的那支部队，是一支与其说是准备迎战毋宁说是准备通过三角洲撤退的士气低落的部队。他把他的总部从开罗迁到沙漠中的帐篷里。他接任十天之后，德国人发动进攻。攻势被抵挡住了。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他改组了军队，把第八军投入了一鼓作气推进到马雷思线的战役中。继而他奉派接掌这里的指挥权——指挥第一军、美国第二军团和第八军——换句话说，他已经奉命负责这条战线上的一切积极军事行动。在他接任的前一天，德国人对美方发动猛攻，形势非常严重。他立刻负起责任，一举而把战局扭转过来。<sup>①</sup>

我对亚历山大的方法具有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停歇在第二军团指挥官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的总部，总部设在一个叫作费里阿纳地方的火车站里。他在地图上把战役的进展情形指给我们看，上面有一些我可以看出全然没有得到亚历山大将军同意的军队部署和调动。靠了一番出色的外交手腕，他把满可以由他自己作出的调动作为建议提给他手下的这位指挥官。他没有发布命令。他把这个意见提交给美国将军，让他自己独立进行考虑。亚历山大始终不渝地奉行的这套办法使他特别适合于统率一支盟军

304

<sup>①</sup> 1943年3月21日。

部队。后来，当他知道自己在意大利战役中统辖着很多国家的部队时，他就把这种方法发展成为一种了不起的技术。如果说蒙哥马利是这次战争的威灵顿的话，那么亚历山大无疑就是这次战争的马尔巴勒。

星期日——或更确切的说，星期六夜间——开始了现正如火如荼的大战——胜败变化无常。这一战关系成败至巨。但是我必须说，我对于亚历山大必操左券具有十足的信心，如果有人能够的话。星期日，我们驱车遍游四野，会见了几位军官，参观了一些……罗马古迹（在突尼斯是极多的）。他既没有要求也没有收到任何情报或消息。当我们迟暮返回时，他没有显出焦虑或不安。<sup>①</sup>

晚餐时，送来了一件电报，其中是蒙哥马利对马雷思线的第一次进攻的报告。他直到饭后才拆阅。又到了三、两封电报，他不动声色地发出了三、两道命令。这一晚的下余时间，在听过丘吉尔的广播演讲之后，我们就漫谈政治、文娱、建筑、罗马史等等。

空军中将科宁安（他和亚历山大并肩地生活在一起）也给我以非常好的印象。他们看上去一起工作得十分和谐。他们……把他们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这完全是一种令人精神振奋、心情舒畅的经历。<sup>②</sup>

22日我们又回到阿尔及尔去应付那构成我们生活内容的电报、会议、午餐、晚餐和谣言。此后几天则是混日子。

昨天（25日，星期四）在大教堂里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巴里尔上校死于一次飞机失事。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和富有魅力的人，我和他友谊颇深。他的死亡对法国和对我们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西迪费鲁希（阿尔及尔附近）以及在卜利达的登陆所以实际上未遭到抵抗，（大部分）是他的功劳，并且他本来会是戴高乐和吉罗谈判中一个有用的桥梁，因为他获得双方的尊重和厚爱。

葬礼是一种宗教兼世俗的动人仪式——演讲、部队的分列式等等无

<sup>①②</sup> 1943年3月21日。



不俱备。英国分遣队(爱尔兰警卫队)使每一个人都为之瞠目,他们一举一动竟是那样气概堂堂。①

我们仍在等待卡特鲁将军从叙利亚的来临。

无疑会有一些令人为难和焦急的时刻,但是我确信我们会终于取得圆满的结果。我想双方已渐渐认识到,在法国处于水深火热之际,如果他们继续争吵不休,法国人民是决不会宽恕他们的。②

在这期间,来自前方的消息依然很好。

马雷思之战一直非常激烈,但是我对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抱有充分信心,而且我想空中支援定是大规模的。一旦天气放晴,机场干透,我们就可充分利用空中优势了。

如果我们能够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一次真正使人们震惊的败绩结束这一战役,在这里精神方面的影响将是极大的。因为这里仍然有很多迟疑观望的法国人,被失败感弄得意气消沉,几乎为德国的力量吓呆了。

在这期间,这里的事态每天都有一些改善——某一个坏蛋被解职而代之以一个正人君子。③

新政已开始发生作用了。

---

①② 1943年3月26日。

③ 1943年3月31日。

## 第十三章 走向联合之路

306

虽然吉罗将军在立法和行政方面所实行的新政正在不断地、确实颇堪赞赏地迅速进展，但是在武装部队指挥部和省政府最高层却没有采取类似步骤促进必要的改革。整个政府仍然软弱，而且过分以吉罗的个人威权为中心。虽然如此，也还是作出了一定的改进。任命朱尔·阿巴迪博士接替里戈担任内政部长是可喜的。阿巴迪博士是一位具有公正见解的出色外科医生，据说他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在他所主管的那个政府部门中实行必要的外科手术。两天之后，在3月25日，以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接替贝尔热雷任秘书长。德姆维尔从西班牙一到，就准备在吉罗将军手下供职，正是他胸襟开阔之处。英国财政部通知我说，他们对他的聪明才智、操守廉正有极高评价。他在戴高乐手下从政多年，成绩卓著。当时我同他结交为友，我们的友谊持续了许多年。勒内·梅耶担任了交通部长。这项任命有两点是非比寻常的。第一，他是一个犹太人；第二，他对受任负责的事务具有专长。米斯卡利，在登陆时，曾经是我们的支持者之一，在达尔朗被刺之后撤去了警察局长职务，并监禁了一段时期。3月27日，他取代了坦普尔的阿尔及尔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因为坦普尔是早在赖伐尔时代任命的，所以这项更换具有相当重要意义。在同一天，勒梅格尔—迪布勒伊和他的整个班子递上辞呈，当即予以接受，这多少有点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以致懊恼不置。但是勒梅格尔—迪布勒伊的活动绝未因此而罢休，虽则暂时从政治方面转到了社会方面。

所有这一切对于政府的加强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阿尔及

303

利亚、摩洛哥和西非各地的总督也同时加以调动,那么舆论未始不会感到满意,戴高乐的怨言和猜疑也未始不会完全消弭。然而,吉罗照例总是行动太慢,太迟。

在这期间,虽然伦敦方面对戴高乐施加很大压力,要求他同吉罗迅速达成和解,但是戴高乐坚持非等待他在2月23日送致吉罗的一项重要备忘录得到具体答复不可。这项在3月12日公布的文件开列了他的条件。停战协定必须予以否认;在所有法国领土内,旧有的基本自由必须恢复,当然,以服从军事需要为条件;必须具备思想自由、职工会集会自由和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不应监禁而监禁的人必须从速释放;法国在纳粹占领影响下通过的一切法律应视为无效。最后,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在战争期间代表法国人民的任何权力机关在法国解放后必须接受根据普选进行选举的原则。戴高乐又建议,在临时中央权力机关之外,另外设立一谘询委员会将是有益的,该委员会应吸收抗敌团体、前议员以至大学和职工会的代表参加。<sup>①</sup>所以,戴高乐以要求对他的备忘录作出具体答复作为对吉罗新政演讲的反应并非不合理。

在整个这段期间,戴高乐代表团越来越多的人以及其他法国人都纷纷来到阿尔及尔。或许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胸前挂了一排金光闪闪的奖章而只有一只膀臂的佩奇科夫上校。据说这位军官是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私生子。我记得自己当时在这样想:果真如此,他的母亲一定是奥依达,因为如果我们可以设想这两种文学风格的混合体表现成为人形的话,那无疑最能体现在这位英武上校身上。这些新来到的人当中有很多是对戴高乐心怀不满或同他有过争吵的。其中有米塞利埃海军上将及其部下,连同象康篷和科梅特这类颇爱吹毛求疵的人。但是我们大家都在等待卡特鲁将军

<sup>①</sup> 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统一,1942—1944年》(Mémoires de Guerre: L'Unité, 1942—1944)(巴黎,1956年版),第92,446页。

的归来，他在阿尔及尔作了短期访问后已首途叙利亚。

因为我仍然苦于那次飞机失事所造成的迟发的脑震荡，所以我想我不如在3月29日卡特鲁预定到达的日期以前再作一次短程旅行。这时我患头痛和失眠症。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这些症状已渐渐消失。在这期间，我们有两天过得很开心，也许值得回忆一下。

约翰和我动身作两天的短程旅行。天气宜人，既不太热，而且风和日丽。我们的目的地是相去二百英里左右的萨蒂夫，一路穿行于令人真正叫绝的山区。……

越过所谓卡比尔区的一部分。朱尔米拉山的宏伟山脉横亘其间，山高七、八千英尺。先沿坡而上……穿过伊塞尔峡谷，岩石壁立，狭处仅二、三百英尺。再往前，通过两道被称作铁门的奇异卓绝的隘口。……两侧峭壁耸立，犹如鬼斧神工。一次又一次地走过卡比尔的村落。这些村庄，象托斯克镇或翁布里亚镇一样，都建在小山顶上。房屋石建，以红瓦为顶。这些卡比尔人<sup>①</sup>非常有趣。他们真正是原始居民的残遗——早于罗马人或阿拉伯人，当然更早于法国人。据说他们是在朱古萨败于罗马人之后矢志忠于朱古萨的那些部族。他们按种族说是柏柏尔人——许多人皮肤白皙，头发金黄色，与欧洲人简直没有两样。妇女用不着带面纱出门。他们逃到这个山岳地带，正如古代不列颠人逃到威尔士一样；也正如不列颠人先后反抗罗马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以及其他的人侵一样，卡比利亚的柏柏尔居民历经罗马人和阿拉伯人的入侵而残存下来，栖身于山村之中。他们只是经过长期斗争之后方为法国人征服的。

这个地区，风景是分外迷人而秀丽的，但它呈现的许多经济问题却也暴露得一清二楚。

在和平时期，有很大一部分男子……通常移往法国，或长期定居或短时勾留，而且因为他们都很聪明伶俐，特别容易训练成为机械工，所以他们工资很高，工资所得的大部分都寄转回家。由于战争——而尤其是

<sup>①</sup> 卡比尔人是柏柏尔族的一个支系。——译者



自从我们到达北非，切断了同法国的一切联系之后——再接不到汇款了。这正仿佛是旅居美国和英国的爱尔兰人已停止汇款回家，而同时爱尔兰人又无法在收获等季节去英国挣钱的情形那样。

因此，当地居民穷困异常，他们的衣食问题使我们大为烦恼。所以我特别渴望去看看这个地方及其人民，为了他们的事情我曾出席过多少次会议。

我们正试图帮助他们——在下一次收获季节到来之前是一段严重时期——一方面给他们发放食品和衣着，一方面招募他们到工程连和军工筑路队等去作工。……

这个地方有一件事很奇怪，就是山区的概念与平常全然不同。……我以为通常山谷总是富饶的良田，而一登上山峡和隘口，就可望看到寸草不生、毫无用处的山峰。但是这里恰恰相反，我们所攀山而过的山峡和隘口(象杰克和宾斯塔尔克那样)却是一条通往上面土壤肥沃、精耕细作的建有古代和现代城市的高原平地的道路。从一个叫作曼苏拉的地方(一个卡比尔人的村庄)，攀登上去三、两英里，通过一个隘口就有一片叫作欧茨高地的辽阔平原豁然出现，海拔三千五百英尺左右。春麦不是刚刚抽苗就是(在某些地方)正要播种。整个高地是一个平坦的小麦和谷物种植区，大部分是由拥有大农场的法国移民或“垦荒者”经营的，他们雇用阿拉伯工人耕作。

四点钟我们到达塞蒂夫(距离曼苏拉约七、八十英里)。……

310 塞蒂夫是一商业市镇，具有相当规模，也有一些不错的现代建筑物。这里并引不起人们多大兴趣。但是离塞蒂夫四十英里左右，有一个真正引人注目的地方，叫作杰米拉的那个魁库尔古城。

在塞蒂夫稍事休憩之后，我们就出去观光这个地方。车子驶过的乡野有趣极了——山腰寸草不生(因为所有的树木都被砍伐殆尽)，但小小的山谷却土壤肥沃。日照美妙绝伦——适夕阳西下，一种奇异的斜辉普照大地。继而，停车之后，在宽阔的山谷里，座落在一个小山上的这座城市的断壁残垣突然展现于眼前，崇山峻岭远远在望。……

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城市。第一个，在一长形小山的最低处，建于

特拉詹时代。一个公共会场依然保存完好，一端有一个小巧玲珑的维纳斯女神庙，石柱林立其间。也有一些店铺，柜台（均系石砌）和挂秤的地方都还在，上面还放有秤量各种东西——谷物、橄榄油等等的石秤盘。很多石柱都是一种华丽的蓝灰色大理石的，从一百五十多英里以外的菲利普谷开采出来，通过一道道隘口运到这里。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有几处美丽的喷泉、一幢保存完好的私人住宅和一些完好如初的公共浴室，里面有常见的那种夹墙暖气系统。

第二个城市〔可远溯自〕塞普蒂默斯·塞弗勒斯时代。城里有另一个也很不错的公共会场，和屹立于会场上方高处的一个宏伟的主神庙；一些壮丽的石柱和一个精美的门洞至今犹存。有很多柱廊和一个华丽的卡拉卡拉式拱门。还有一个宏伟的剧院，其中座位实际上完整无缺，舞台和舞台的附属建筑物也保存完好。这个剧院可容纳三千人。地址好极了——一眼望去，可以隔山谷而远眺群山。

这两座罗马古城中房屋和庙宇里面的大多数镶嵌艺术品都已取去，放在附近的博物馆中。年代久远的镶嵌艺术品极其精美，而以一间浴室的地板（镶嵌成很多牲畜）和一间客厅里镶嵌酒神故事的地板，尤令人叹为观止。……

再上山不远就是五世纪的那座基督教城市。这里有两座华美的“长方形教堂”和一座玲珑妩媚的圆形洗礼教堂。有一个供成年人洗礼之用的大浴缸和一个供婴儿洗礼之用的洗礼盆。

我们驱车回塞蒂夫，回到那里……已日落西山，大约7点30分了。311  
我同一位朋友某将军共进晚餐，饭后去参加部队在当地剧院中为部队举办的音乐会。

这是漫长但兴味盎然的一天。我们在塞蒂夫过宿，大家随身带了被卷和毛毯。①

我们第二天回到阿尔及尔，精神大为一振。

卡特鲁将军终于回来了，3月30日来访。这位了不起的法国人在这个多事之秋扮演了一个独特的角色。他沉着、冷静、涵养工

① 1943年3月27日。

夫极深，的确是我们大家可以信赖的一个朋友。他有一段超群出众的经历作为背景，主要是在法兰西殖民帝国方面。他是一位五星上将。因此，他能以平等地位同吉罗谈判。他虽深为戴高乐所爱慕，但对于他的错误决不是置若罔闻的。如果戴高乐作得太过分或者太无商量余地，卡特鲁会是坚定不移的，而且有说服人的本领。戴高乐了解要逼迫卡特鲁超过一定的程度，他就大有拂袖而去的危险——这一结果当时对戴高乐和他的运动都会是成败攸关的。卡特鲁不相信进展能够很快。但是他似乎有信心，相信靠了他和吉罗的悠久友谊，能逐渐说服他采取一合情合理的立场。

我们当中很多人急于求成，也许全然不理解法国民族委员会的立场和吉罗及其朋友的立场之间的根本差异。正如在这个时候戴高乐自己严肃地表明的那样，不管在战争期间发生政治问题是多么令人遗憾，然而事情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法国在作战的同时……进行着一次实质上的革命，那不是我们的过错。”<sup>①</sup>他决心要在解放到来时看到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政府的存在。他甚至认为没有这样一个政府，法国的解放只会意味着以德国的占领换成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占领。<sup>②</sup>

312 吉罗却看不到问题这一方面的重要性。他所认为必要的就是一个由总督或由双方提名的其他人等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权。虽然他随即同意他只需要与另一位或几位(如果总共有三个的话)主席同样的权力，但是他仍然要求一个真正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在这一点上，卡特鲁无法劝说他放弃他所提出的担任两主席之一并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样一个角色。假定得到这两个兼职，他也不会反对戴高乐担任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但是戴高乐认为这个计划所给吉罗的权力太多了。这时他提出了亲赴阿尔及尔当面磋

① 戴高乐，前引书，第452页。

② 同上书，第95页。

商的建议。这样，就无异是投在盟军总部的一枚炸弹。甚至莫内也认为，如果戴高乐在谈判的现阶段上亲自到来，则势必会出现一种最令人棘手的局面。

当我们在政治经济委员会进行讨论时，美国方面极力反对让戴高乐在这个阶段前来阿尔及尔。突尼斯之战就要到紧要关头，人们都希望在取得胜利以前不要在阿尔及尔出现群众示威。卡特鲁自己对于不能容许他继续静悄悄地进行会谈，颇为愤慨。他甚至以撒手不管相威胁。同时，我对于盟军最高统帅采取实际上禁止戴高乐前来的任何措施是否明智，殊为怀疑。我认为这是出于美国方面原有的不信任，甚至是一种恶意。所以，在4月3日我们经过反复讨论之后，送去一项咨文，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名义，以一个军人对另一个军人的名义，要求在当前军事行动迅速发展到最高峰告一结束以前，不要使局势复杂化。我们并且讨论了卡特鲁将军可能的辞职问题。照我看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劝请卡特鲁返回伦敦，去同戴高乐商量一下；但在这个时候他不愿意这样作。4月6日，我发现总部的情况是一片愤慨。戴高乐发表了一项公告，言外之意是说，艾森豪威尔将军阻止他前来北非解决法国人的联合问题。因此在美国以及英国新闻界引起了对艾森豪威尔非常抱有敌意的批评。参谋长认为我们使艾森豪威尔大丢面子，而且是以强烈的独特的惯用语表达他的看法的。因此当夜我就去看卡特鲁。他一再表明他对戴高乐将军看来将要奉行的那种“政策”不愿过问。他不愿让自己同戴高乐的访问有什么瓜葛，戴高乐此行的目的似乎是要煽动政治敌视，举行公共集会，鼓励示威游行等等。我告诉他说，艾森豪威尔将军和英、美两国政府把避免让他和戴高乐发生决裂引为己任，因此他不能不发挥他的作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卡特鲁同意去伦敦是他应该做的。因而他于4月8日离阿尔及尔。在随后几天中，美国陆军司令部的情绪也冷



静下来了。

卡特鲁携往伦敦的吉罗的新建议，并不是立刻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些建议表明了一个进步。戴高乐拒不同意，仍然要求在法国本土包括所有已解放和待解放的领土组织一个权力机关，而且法国一切武装部队也应该对它负责。他重申，所有将军、总督、甚至总司令本人，均应听命于这个权力机关。换言之，这个新制度必须以正规的民主方法发挥其职能；文、武官员必须服从各部部长的指示。最后，他又重申他所提出的开除他所谓的维希“投降分子和法奸”的要求。

所以在4月18日卡特鲁返回时，简直没有什么进展的迹象，只是艾森豪威尔收到了戴高乐对正在进行中的战役致贺和致以良好祝愿的一封和好——虽则多少有点神气十足——的电报。在这期间卡特鲁依然保持镇静，但是4月21日，艾森豪威尔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地通知我，他对卡特鲁建议说，就他而论，戴高乐可以听便在任何时候前来北非。在这一天，吉罗象在危机时期的一贯情形那样，动身去前线，要到4月25日复活节前一天才回来。翌日，复活节，星期一，他邀我去夏宫。他表现得顽固、自负，甚至目中无人。他自北至南遍历前线一周，历时三天。他发现所有他提出的关于指挥作战的想法都已为亚历山大将军及其他将领所接受，这使他感到满意。他还对他们详细地解释了他对下一步军事行动的看法，我们称那一次军事行动为“爱斯基摩人”行动，他们毫不客气地以有关国名相称。他的一切计划都为英国指挥员欣然接受，从而使他大为高兴。我想他是误解了亚历山大将军的礼貌以及对于年龄和资历所表示的敬意。

于是，他进而对于戴高乐要求的应将停战协定视为无效一节，大发议论。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他承认停战协定是事实。虽然他对这个协定不负责任，但是他承认它。然而在1942年11月间

吉罗将军声明它作废时，协定就已经失效。他得意扬扬地大声说，“当我命令部队向突尼斯的德国人开火时，我就视为无效了。”我指出，戴高乐三年前已经作过同样的事情。但是这一点一提就过去了。虽然如此，真正的分歧这时还没有出现。戴高乐希望有一个象战前内阁一样的政府；吉罗却希望最后的威权仍保留在总司令手里。他必须控制对进行战事具有影响的经济和财政大权。他进而谈到我们的首相丘吉尔就是总司令。我对此表示异议。“噢，是的，就我所知，是这样的。他在安法曾把他的所有地图拿给我看。”我回答说丘吉尔是国防大臣，如果那就是吉罗所谓的总司令，那么没有任何理由象这样的一位大臣不应该在内阁中占有席位。他是以那种身份将内阁的命令下达给有关军事指挥官，甚至在某些场合下下达给民团指挥官的。但是吉罗把所有这一切看作是对他的权威的一种真正攻击。至于法国解放后的情形应该如何，他也不同意戴高乐的看法。他认为在国民大会召开会议之后应该有一个军政府。最后，他不能放弃象布瓦松、甚或佩鲁东那样的高级官员，他并不认为他们是卖国贼。我说我认为这是在组织新政府的时机到来时可以磋商的问题。我们于是讨论了吉罗希望看到的能组织象我们战时内阁那样的一个核心委员会的问题。如果他要担任总司令的话，那么他总该把委员会主席一职让给戴高乐吧。“不，不，”他说，“那是不可能的。戴高乐年轻十五岁，而且只是一个二级将军。”我回答说，庇特担任英国首相时，年仅二十四岁。

他大模大样地以关于法国军队的一席长篇大论结束了他的谈话。军队尽管力量薄弱，但打仗却是出色的。他有四十五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法国人。他怎么能说服他们接受戴高乐呢？他们对戴高乐的所作所为毫不同情。我指出军队中年轻的士兵或平民决不是这样。但吉罗坚称他了解军队，军队都拥护他。至于平民，他们的意见在战时是无关重要的。他曾经守住突尼斯的防线。当美

军在德国反攻下溃不成军的时候，他守住了。他显然认为自己对目前军事行动的战术和战略承担责任。他不想要一个文官政府，白白在部长们身上和部长的公文夹上浪费金钱。他为什么要向毕竟只有一万二千人的戴高乐让步呢？总之，那天晚上，吉罗是慷慨激昂、毫无商量余地的。这是他访问前线常有的结果。幸而，他虽然受到这些情绪的支配，但很快就有改变。我开诚布公地对他说，如果他要求身兼委员会主席和总司令两职，也就是实际上的“军民总监”，那他就会得不到舆论的支持，在英国肯定得不到。“为什么在英国我们都是那样一些戴高乐派呢？”他这样问道。我回答说，当我们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朋友的时候，戴高乐支持我们。他曾守住法属赤道非洲。如果布瓦松照样行事，我们一年前就已经会在北非了。

我最后声称，我国人民并不是健忘的，也不愿抛弃在危难之际支持过我们的那些朋友。谈到这里，他有所感动；因为他是一个讲义气的人，虽然不是很聪明的人。他理解了我的情感，并且尊重这种情感。但是他也有要履行的责任；危险的是共产主义，他不会屈从于共产主义。

316 在这间隔期间，墨菲和我担任了俘虏营问题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两主席。收拾这个局面的工作大非易易，但是我们渐渐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我们甚至设法使墨西哥政府接受被拘留的三千名西班牙共和派人士。属于盟国的俘虏一律释放，或者是遣返（如果他们的国家不是在轴心国掌握中的话），或者是准许参加各该国在英国领土上的军队。因此，尽管困难重重，人数总算减少下来了；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到这次活动结束时，确属罪犯而拘禁在监狱里的只有一、二百人，其余都已设法予以处理。这个问题在解放以前颇引起英国和议会中的愤激。抱怨的根源一旦消除，照例谁也不再多为此而烦心了，因而我们也没有受到任何特别的感激。



除开极少数例外，英国报纸和公众都把吉罗和戴高乐的冲突看作是一种纯粹个人野心的问题。能认清其中有一个严重的原则性矛盾的人寥寥无几。虽然如此，个人问题却也起了重要作用。吉罗在星期一复活节和我进行的那次毫无希望的、没有结果的会谈之后，突然改变主张，于27日送交卡特鲁一件新的备忘录，连同一份请笺，邀请戴高乐在比斯克拉或在马拉喀什同他会面，进行悄悄的商谈。所有这一切同他向我打的那套官腔，都迥然不同。显然不是由于我的辩解，就是由于莫内的压力，吉罗才再一次改变了他的立场。备忘录本身还是显得相当进步的，虽则，不出我所料，戴高乐对于被邀到“见不得人的地方”去举行会谈提出了异议。<sup>①</sup>

随后几天则花费在电报往返上，这些电报采取了我们在那次阿尔及尔危机中所已惯用过的方式。然而，照例

经过一段发疯似的活动之后，继之便是一段比较平静的时期。看来，在这次特别赛马中，起跑发号员的任务是很艰难的。戴高乐将军是这样一种 317  
马：要末干脆抗拒不到起跑门去，要末硬要在枪声发出之前就顺着跑道飞奔，要末突然向非赛马总会干事指定的那条跑道跑去。忽而拒绝前来北非的邀请，忽而坚持要来作个不速之客，出尔反尔，类似儿戏。欲求法国联合的大功圆满，似乎非靠某种愉快的机缘不可，既邀他赴宴，而他也情愿光临，并且会见的气氛也是亲切的。

尽管有耽延，我仍抱有相当信心，因为吉罗的备忘录毕竟不但提出了相当可钦佩的原则，而且明白表示了他现已准备将不久就要成立的总委员会——或称为战时内阁——的两主席之一让给戴高乐。

5月2日，戴高乐在一封长信中声明他愿意举行会谈，如果能在阿尔及尔举行的话。但是当我正要利用我的影响力争取到这项

---

<sup>①</sup> 戴高乐，前引书，第467—469页。



让步的时候，不料两天之后，5月4日戴高乐发表的一席演讲又一次使气氛暗淡下来。这一席演讲以刻薄挖苦的词句对吉罗大肆攻击，极尽侮辱之能事。在墨菲和我同吉罗、卡特鲁和莫内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讨论这篇演讲的时候，局势看上去是一片漆黑。但是在第二天吉罗和我一起进餐时，他似乎完全平静下来。前一晚冷冰冰的否定态度轻而易举地融化于我所小心翼翼地邀请的这两位法国公主的暖洋洋的气氛中。

当他离开这幢房子时，他指天说，“要冷静，我的亲爱的朋友，要有勇气——尤其要冷静。”

我们现在必须准备对戴高乐的最后封电报作出答复，因为球现在可说是在吉罗的场子里。无论有关这项文件的其他各点怎样明确，却可以看得出来，吉罗是不会被允许把它写出来的。他的任务就是要把它饮忍下去。记得我曾经在这次会议上指出，不管他们对戴高乐演讲的调子觉得怎么样，他们不能单单以一位政治家对另一位政治家发表了攻击性演讲为理由而中断一次谈判。我告诉他们，在我国这几乎是作为组织联合政府序幕的一种公认程序。虽然对墨菲来说这看上去多少有点是一个晴天霹雳，但却使莫内为之捧腹。我还对他们说，要是有一个大国要组织一个全国政府，只因无人决定谈判究竟应该在伦敦还是应该在布赖顿举行就继续分裂下去，那似乎是荒谬的。

要是你对戴高乐有所顾虑，而想把整个这件事一笔勾销，那也应该在一个原则性问题上决裂。要他接受你的原则——尤其是你认为成败攸关的那两项，即：

1. 内阁政府而不是个人政府。
2. 除非根据共和国法律的适当宪法程序，否则不得有组织战后法国政府的任何企图。

如果他接受这两点，就让他来阿尔及尔；如果他不接受，就根本不要

让他来。①

这时战事消息开始具有决定性影响。5月7日，美国第2军团攻入比塞大，同一天英国第1军占领突尼斯。在后方的阿尔及尔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吉罗在卡特鲁的支持下接受了艾森豪威尔赠给法军的大量新式装备。在9日，星期日，圣让·亚克节的清晨，举行了交接新战争物资的隆重仪式，虽则我们已经失去了让·亚克的精神遗产。

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人人都心情异常激动，只有卡特鲁依然保持那种特有的冷静。最后，部分由于莫内和我同去蒂帕沙恬静的海滨胜地，畅游罗马古城，享受妙不可言的海水浴，而长期避不见面，那项必需的文件结果才撰写出来。我们切盼这一最后在5月17日一致同意的复文是简单明确的，甚至是一件尽可能生动有力的政治文件，它必须经得起公开发表。

如果要英、美人民对它能够理解，那也必须要为吉罗将军所理解。处于这个进退维谷的境地，似乎只须要求戴高乐答复两点。这是一发千钧之际。吉罗将军被戴高乐的活动弄得如此惴惴不安，以致事实上拟具了一项无异是中断谈判的文件。然而到17日傍晚，吉罗将军正式送交给墨菲和我自己一项最后复文。 319

因而，在17日将吉罗的复文作为急件发出。这是莫内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我自己的功劳。吉罗送出这项复文是勉强的，毫无热情可言的。这并不真正符合将军的心意，却也能够使他满足了。吉罗建议的实际内容如下：

应尽快在阿尔及尔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来管理现由伦敦法国民族委员会和阿尔及尔军民总监所处理的一切事宜。至于其他机构，还应组织一个全国咨询委员会和一个抵抗委员会，设置两主席，实行集体负责制。抵抗委员会的职能至临时政府在法国成立

① 1943年5月5日。

即告结束。“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法国的政府。”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桩使我们大家对吉罗重又深表同情的事件。他刚刚听说德国人把他已婚的女儿和她的孩子都一起带走了。她住在突尼斯,她的丈夫是北非联队的一个军官。他得不到她的任何消息,际此紧急关头,这确是一个可怕的、悲惨的打击。德国人看来真是卑鄙无耻、残酷狠毒,为所欲为了。

在我们把这项最后的建议送出之后,显而易见,卡特鲁必须亲往伦敦去解释一切。19日,我决心和他同行。我们决不应再修改吉罗的建议——一个集体负责并以戴高乐为首揆之一的内阁。卡特鲁无疑对戴高乐比其他任何人都能发挥更大的影响。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英国政府也非施加最大的压力不可。毕竟我们一直都支给戴高乐以巨额津贴,所以我们有权力,也有义务影响戴高乐的决定。艾登同意我的建议,因而于5月21日我肩负着这项和平使命与卡特鲁一同出发。但是在这之前,欣逢真正难忘的一天,那一天胜利的阳光把阿尔及尔的所有乱云残雾一举而驱散了。因为在5月13日,突尼斯战役以大捷告终。

自从我访问亚历山大将军的总部以来,他从4月24日第八军进攻的结果中已经看出,昂菲达维尔的阵地固若金汤,是非付出重大牺牲不能攻克的。因此,他从第八军调了三个师拨归第1军指挥。5月6日,在盟军空军以一日出击二千五百架次的全力支持下,发动了雷霆万钧的猛攻。<sup>①</sup>与此同时,全面的海、陆封锁已经完成。

5月8日,完成了包围,来自东、西两面的部队已经会师。战役的胜利结束只是时间问题了。5月13日,亚历山大将军向首相报告说,突尼斯战役已成过去,敌人的抵抗已全部停止。年初的失望和阻滞现在已光荣威武地一举而洗刷了。顽固成性的希特勒,

<sup>①</sup> 丘吉尔:《命运的关键》,第692页。

一直把部队投入仍掌握在他手里的日益缩小的地盘中。所以，最后结果非但轴心国失去在非洲的最后据点是在所不免，而且德国陆、空军中一些最精锐部队遭到严重打击也成势所必然。结束非洲战争的胜利规模之宏伟，在丘吉尔本人对美国国会的讲话中作了确切不过的总结。

两个独裁者的非洲之行，使他们国家付出了伤亡和被俘士兵九十五万人的代价。此外，沉没的船只约二百四十万吨，被毁的飞机约八千架，这两个数字都不包括受伤的船舶和飞机的庞大数目在内。敌人还损失了大炮六千二百门，坦克二千五百五十辆，卡车七万辆。……战争达到了这个里程碑，我们可以说，“一个大洲已经收复了”。……①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许没有一个时候英国的威望和权势有如此之高了。英国军队已经将背信弃义的意大利人清除出东非，解放了阿比西尼亚。英国军队经过两年的起伏不定、时胜时败，经过了悲惨的和几乎绝望的时刻，已经在阿拉曼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向东推进的部队中，英国部队仍居于主导地位。当然，美国空军曾经给皇家空军以莫大支援。但是在这里又是在英国的领导下战胜了德军。是在一位英国指挥官指挥之下，盟国海军完成了他们的包围和封锁任务。由于希特勒战略上的错误，我们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大批的战利品。冯·阿尔尼姆将军被俘。据说俘虏人数达二十五万之多，其中十五万是德国人。掳获了成千上万的大炮、车辆和其他武器。我们自己的很多被俘人员令人高兴地获得释放。

由于亚历山大将军和英国其他军官——特德和坎宁安——的谦虚和美德，美国人毫无妒忌之意，倒是在彼此致敬，互相祝贺之中表达兄弟般的情意，共享胜利的欢乐。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功绩，也决不能低估，因为正是在他的权威下，并通过他

① 丘吉尔：《命运的关键》，第714页。



的领导，整个盟军部队才能结成亘古以来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同志般的关系。

所有这些人及其设计人员的精神心力，虽然都已经又转移到征服西西里这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上去，但还是认为应该为这次辉煌的胜利举行一次适当的庆祝。因而组织了一次证明是绝非寻常的、令人难忘的阅兵典礼。这是一次最愉快的阅兵式，因为凡是未派有任务的部队都在观众之列；平民则更是万人空巷，欧洲人和阿拉伯人都倾城而出。一些文职官员——梅金斯和我，墨菲、雷伯和让·莫内也应邀参加。墨菲和我站在受礼台的后排。艾森豪威尔将军出于真正的礼貌关系把吉罗安置在他的身边，坎宁安、亚历山大和特德则紧站他们身后。受礼台的每一面有一辆丘吉尔式坦克守护。

我们大家在清晨7点钟离开阿尔及尔，大约10点钟到达突尼斯。我们的车队从飞机场到受礼台一路由盟国海、陆、空军的显要人物作为先导。但是由于他们都坐在门窗紧闭的轿车里，所以人们认不大出。在这一字长蛇阵的末尾是文职人员的代表——墨菲和我，而公认这天的这部分光荣竟让我们占去了。

在这门窗紧闭的车辆和看不见里面将领的一字长蛇阵的末尾是一辆敞篷的“司令车”（一种高级吉普车），坐在这部象罗马凯旋车一样的车辆上的是墨菲和我。紧放在我们前面的是我们各自国家的国旗——星条旗和英国旗——（因为我们有国旗为先导，又是实际上可以看见的仅有两个人）我可以告诉你们说，我们驶过突尼斯通衢大道的车队就象在投票日驱车穿行斯托克顿城一样。<sup>①</sup>

墨菲虽然是一位职业外交家，对于普选的艺术没有经验，现在却开始欣赏这种万众轰动的场面了。

每一条街都人山人海；每一幢房子的每一个窗口都挤得水泄不通；

---

<sup>①</sup> 1943年5月20日。

每一个屋顶都挤满了人。人们一看到我们的国旗，就欢呼、招手，投掷鲜花。我们欢呼、招手并向站在屋顶、窗口和街上的妇女飞吻。这是一个宏伟壮观的行列。部队举枪致敬，人民欢呼喝彩。议论纷纷。如果有一天我被迫退出英国公共生活，我一定要竞选突尼斯市长。<sup>①</sup>

参加游行的队伍约三万人，持续达两小时以上。气氛是极其欢欣的，象兴高采烈的足球观众一样。首先过来的是法国部队——有轻步兵、狙击兵、摩洛哥部队、阿尔及利亚土著部队和外国军团。

这个行列以一队阿尔及利亚骑兵为先导，一色白马、红斗篷、红革鞍，手持短刀，十分英武。当他们经过受礼台时，都从马鞍上抬起身来。<sup>②</sup>

人人雄纠纠、气昂昂，但武器和服装却极其窳劣——陈旧的来福枪，破烂的斗篷，脚下穿拖鞋或赤足，而打仗非常出色、非常勇猛的摩洛哥兵受到了我们部队的热烈欢迎。人人都体会到他们在这些 323 艰难岁月中，以那样简陋的装备和物资，表现何等英勇。

继法国部队之后是代表美国第二军团的美国联队，以一个出色的军乐队为先导。

同法国部队比，相形之下，美国的装备和服装几乎是过分突出的奢华。每一个兵都穿一双漂亮的带橡皮跟的黄皮鞋。（顺便提一句，带橡皮跟，无法正步走——我是从表演或检阅的观点来看。）人各一双在英国要卖五英镑的皮手套；人各一件非常漂亮的打高尔夫球穿的短上衣，一顶光灿的钢盔，一堆堆新玩意儿挂满全身，完全是一个奢侈浪费的家伙，耗费国库不少。<sup>③</sup>

美国兵精神抖擞，步伐整齐，受到热烈的欢呼，人人看上去都兴高采烈。

到这个时候，一个多小时已经过去了，我想我们再有一小支英国分遣队，然后也就整个结束了。但是这一次英国决定要特别作出使人人大吃一惊的真正戏剧性表演。在美国部队过去之后，稍

①②③ 1943年5月20日。

有间歇，然后隐约的管乐声从远方传来。有人把第1军和第8军所有可利用的风笛都集拢在一起了。苏格兰警卫队、爱尔兰警卫队和所有苏格兰高原联队都有代表参加。当他们走近受礼台时，改为慢步。然后又向后转走——每一行都调头走过去——所有队列最精湛的一种。不久就改成快步，愈走愈远，笛声也随之渐渐消失。又有另一次间歇，时间刚刚长到足以使我们怀疑是否发生了什么障碍，这时英国陆军开过来了，共计一万四千人，每一师、每一旅都以它的将军及其幕僚为先导，每一营则以它的上校为先导。

他们鱼贯而来，一个队形接着一个队形，一个联队接着一个联队，一个单位接着一个单位。

324

不同于法军和美军，英国部队是排成操练队形而不是战斗队形的——短裤、长袜和皮靴，战时军装上衣或短袖衬衫——不戴钢盔（而戴步兵便帽或圆扁帽）。一个兵戴上钢盔看上去象机器人。……戴步兵便帽或圆扁帽，可以看到他的面庞——他那种非常朴实、久经风霜、眉开眼笑的面庞——现在心情舒畅了，不象战场上的人看上去那样憔悴和狼狈——并充满信心和自豪感。所有这些褐色的面庞，这些裸露的褐色臂膀和膝盖，这些轻捷地迈出大步的人们——都威武雄壮阔步前进。<sup>①</sup>

正在受礼台的前面（检阅的很古老的手法）安置一队军乐队，这就当然使得所有士兵在到达敬礼地点之前都要以最优美的姿势行进。

我不禁回想到基钦纳的部队和索姆之役。我一贯认为那是英国历来队形最美的部队。但是现在我不能不承认，第1军和第8军也毫无逊色。看上去这些士兵在那一天是世界的主人，是未来的接班人。

在步兵之后，由德比郡的义勇骑兵为先导，是大炮、装甲车和坦克。……大炮和坦克光洁闪亮；大炮的拖车，辎重车，卡车——一个雄伟

---

<sup>①</sup> 1943年5月20日。

壮观的罗马式队列。同我们部队在一起的自由法国勒克莱尔上校所率的联队（来自乍得湖）拒绝与法国部队同行而宁愿同英国部队在一起行进。（顺便提一句，戴高乐派和吉罗派的两支法国部队，现在不需同德国人作战了，但他们之间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除非我去伦敦的使命能取得成功。）<sup>①</sup>

最后阅兵式结束，我们大家动身去法国总督官邸参加一次豪华的午宴。

所有法国人和美国人谈话的唯一主题（这几乎令人有点忸怩不安）就是受检阅的英国队伍。

我不能不说，他们都是非常豁达大度的。吉罗说，当他在斯法克斯看到第8军时，他以为他们一定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他看到了第1军，知道它也毫无逊色。他说他一生之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部队。老艾克（艾森豪威尔）所能作到的就是欣喜若狂地对我和其他一些人（而且第二天又说了一遍），他从来没有梦想到能有指挥象这样的军队的这种光荣。这真正是一个伟大的日子。<sup>②</sup>

这一天以对突尼斯的新州长（最近的那位州长已被免职）的礼节性拜会作为结束。在这里，所有的军事显要都接受了功勋程度不同的勋章。在我所领到的那一批当中有一些带异国情调标帜的勋章。它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几种颜色都和马里勒博恩板球俱乐部的一模一样。这注定要给我不少麻烦，因为我不了解政务大臣领受外国勋章的有关章程，而把它带回家去，放在我们现在占用的小屋那间幼儿室的碗柜里。我认为把它供作一种猜字游戏之用倒很合适。接着外交部的一个官员寄给我一封长函，命令我将勋章送回。我只能建议他向我妻子去要。几个月之后，这位怒气冲冲的官员又写信告诉我说，他没有能从她那里得到任何回音。我建议他或者打电报或者打电话去；但这种作法一定是违反了某种外交礼节，后来关于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下文了。

<sup>①②</sup> 1943年5月20日。



承蒙艾森豪威尔在他返回阿尔及尔的飞机上给我留了一个位子。当我们途经比塞大时，看到自从1941年以来试图通过地中海航道的第一支护航队渐渐驶近。它在几天之前离开直布罗陀海峡，即将平安到达亚历山大港。俯视这支伟大的无畏舰队无异就是看到了最后所取得的成就。我转身对艾森豪威尔说，“将军，这就是你的胜利的果实。”他因深受感动，含泪微笑着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的胜利，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我们大家共同赢得的胜利。”

第二天，5月21日，经过同坎宁安、墨菲和莫内一番商谈并匆匆拜访过吉罗之后，中午我去看艾森豪威尔。他是照例非常友好的。他派给我一架空中堡垒，送卡特鲁和我去英国，并送我们回来：“尽早回来，我不愿意没有你在身旁。”艾森豪威尔完全同意目前政治局势必须尽快告一结束。看来荒谬而实则大有可能的是，由于胜利，戴高乐和吉罗两派部队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性反而增加了，因而更加有迅速解决的必要。

共同敌人没有了，法国两个集团的武装力量开始离心离德。来自中东的德拉米纳所部战斗法国师，据说以高薪、高军衔和其他种种诱惑在突尼斯积极招兵买马。根据我们的情报，无论如何法国部队绝大多数是戴高乐派的。

在我离开阿尔及尔的第二天（5月22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纠纷。戴高乐收到了法国中央抵抗委员会的一件不合时宜的咨文，承认他为法国抵抗运动的唯一领袖。这个消息在阿尔及尔的报纸上大肆宣传。然而，不知怎样墨菲和莫内竟设法把这一点掩饰过去了，吉罗稍感宽慰。但是当24日墨菲访问他，要求他将盟国空军非常怀疑的一个积极的贝当分子芒迪加尔将军免职时，他却坚决不同意。吉罗虽然对组织问题从来不充分了解，但是对于人的问题却总是非常敏感。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立即说服戴

高乐接受吉罗的建议，不要另生枝节。任何迟疑都无疑会造成最后的破裂。

虽然我得到了作为外交大臣的艾登的帮助和同情，丘吉尔的远在华盛顿却是一个相当大的障碍。他是为了就战略问题进行至关重要的商榷而去的。他的目的是要在即将占领西西里之际说服不甘心情愿的美国人尽速利用地中海的局势，乘胜追击。为达到这个目的，他竭尽全力，进行辩解。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

华盛顿方面对戴高乐的厌恶心情与日俱增。总统没有一天不对我提到这个问题。虽然是出之以一种非常友好的、往往开玩笑的态度，但我已看出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非常强硬。<sup>①</sup>

丘吉尔自己也抱有类似的危惧之感，但他的主要困难是生怕继续支持戴高乐会引起英、美两国政府之间的隔阂。他把这些看法以有力的词句转达给他在战时内阁中的同僚。艾登对我说，我们一致认为，这时候同戴高乐决裂将会是成败攸关的。在首相缺席期间，人人都敢作敢为。<sup>②</sup>他们还根据我自己的意见指出，法国联合的希望现正日益增长，如果在这个关键性时刻坐失良机，那就会铸成大错。丘吉尔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准备等待结果。

卡特鲁在有我在场的一次会谈中以他惯常的鲜明态度，提出了种种论据，主张立即接受吉罗的建议。后来戴高乐单独接见我，于是我鼓起三寸不烂之舌，竭诚劝导。戴高乐镇静自若，甚至悲天悯人。实则他也没有任何可能的理由予以拒绝，因为他已经显然争取到了他那样长久以来不屈不挠为之斗争的主要之点。所以，在5月24日他送致吉罗一项咨文，接受了他的条件。作为交换条件的是，据商定，在吉罗本人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同意下，戴高乐应

<sup>①</sup> 丘吉尔：《命运的关键》，第716页。

<sup>②</sup> 阿翁伯爵：《艾登回忆录：清算》（The Eden Memoirs: The Reckoning）（伦敦，1965年版），第386页。

立即前来阿尔及尔。日期订为5月30日。

在回程中，我再度在直布罗陀降落，恰好丘吉尔及其全体幕僚，连同马歇尔将军都在那里。他于前一夜从华盛顿飞抵此间。我进去见首相，他已经卧在床上了。经过对X舰队问题稍稍争论之后，<sup>①</sup>他进而告诉我他在华盛顿所遭到的一切困难，每日，几乎每小时，总统和其他美国人都有对戴高乐的抨击。但是我认为他对于我们已经越过第一道关口而可以继续前进，似乎感到放心。我陪同卡特鲁进去见他，他对这位将军礼貌有加。我们大家——丘吉尔、马歇尔将军和其他一些显要一同前往阿尔及尔。象以前一样，丘吉尔下榻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别墅，在这种恳切的气氛中倾听为将来的军事行动所拟具的令人惊心动魄的计划，而不是我们那种纠缠不清的政治纷争，使人心情为之一畅。第二天艾登在阿尔及尔同我们会合。虽然这些大人物共商大计，我能参与末议，是令人高兴的，但是这对于此后几天的风波却不能给我多大助益。幸而丘吉尔和马歇尔的会谈进行得非常顺利，所以他和艾登心情舒畅，把他们此行看作有点象是度假。在另一方面，又刚刚把乔治将军从法国接来。旧法国军队的这位年迈宿将是丘吉尔的朋友，是应特别邀请前来襄助吉罗而被迎接出来的。艾登恰当地总括为一句话，说他是“一个反动的旧失败主义者”。<sup>②</sup>他无疑要在今后几个月中给我造成不少的麻烦。

戴高乐的到达是一帆风顺的。他具有特征性地搭乘一架法国飞机在法国控制下的一个小小降落站着陆。他携勒内·马西格利和安德烈·菲利普同行，这两个人就是他要推荐给这时有待成立的那个委员会的。皮埃尔·比约特和加斯东·帕莱夫斯基则作为他的私人幕僚偕同前来。他受到吉罗的迎接，这两位将军同车驰

---

① 阿翁伯爵，前引书，第282页。

② 同上书，第388页。



往夏宫。直到第二天我才从莫内那里听到戴高乐到达后的一切情形。在5月30日,星期日晚,莫内曾经和他有过一次长谈,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照他说,戴高乐的心情从比较冷静变得异常激动。他显然对美国人非常敌视,对英国人多少好一些。在谈话过程中他指出,盎格鲁-撒克逊的称霸欧洲是一个愈益加剧的威胁;又说,如果长此下去,战后法国势必要倾向于德国和俄国。

翌晨,吉罗、戴高乐、乔治、莫内、马西格利和菲利普一同开会。乔治和莫内是吉罗推荐的人;戴高乐则带来了马西格利和菲利普。新的执行委员会就应该由他们组成。卡特鲁经一致同意也出席了。既没有商定议事日程,也没有设置秘书,一开始就没有安排妥当。吉罗一开场就问是不是有什么人有什么话要谈。这就给了戴高乐一个发表长篇大论、对整个北非事务的管理大肆抨击的机会。他对人事方面的抨击尤其偏激。他声称,“我们必须尽快摧枯拉朽。”以布瓦松、佩鲁东、诺盖、芒迪加将军和普里乌将军以及米歇利埃海军上将的免职作为一个不可少的条件。接着乔治似乎作了一个杂乱无章的、文不对题的答复。显而易见,戴高乐发现他的对立面是一个曾经反对法国军队现代化、从而导致不可收拾后果的年迈将军而不禁勃然大怒。乔治对于他曾经证明是错误的那个青年上校的态度也同样怒不可遏。这种对立正是此后几天踵随而来的大部分麻烦的根源。吉罗的发言以息事宁人为主,但是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莫内明智地指出,首要之务是组织委员会。他补充说,只要对于事情有所帮助,他表示,对他来说,一旦委员会成立,平心静气考虑人事安排问题时,他本人会是赞成根本变革的。他愿意接受戴高乐的大部分要求,纵非全部要求。卡特鲁自然试图搭桥。在进一步磋商之后,戴高乐声称,问题此刻不能再讨论下去,他将于下午3点钟个别会见吉罗。另一次七人会谈原订于下午5点召开,但随后又取消了。



恐怕我不能不对莫内说，他没有促请大家注意在委员会成立以前不要有任何动议，殊为不智。他本应该提议由出席的七个人组成一个负责法国利益的执行委员会，并要求由一人附议，那么至少会取得一定的进展。事实上，照他那样去作，看来只会有害而无益。莫内后悔不及地同意我的看法，并以不曾采取这种办法引以为憾。虽然如此，那天晚上我也无能为力了。我们只能等到第二天早晨再着手料理。因而在6月1日上午8点30分我去见吉罗。他一上来就热烈祝贺我奉派为印度总督，因为关于此事，报纸上曾有风  
330 传。无疑，近五个月来我在北非的“穆斯林问题”上所能取得的经验对我是很有益处的。我没有想到我会得到这样崇高的荣誉。又谈了一些不相干的话题之后，他言归正传，转到了真正的要点。他一一列述了前一天会议的经过，同莫内已经告诉过我的完全吻合。在3点钟他和戴高乐会谈时，后者重申他的声明，除非将他所提出的人先行免职，他不能参加委员会工作。他还告诉吉罗说，他不打算拜访艾森豪威尔，因为他不认识这位将军。不久他就要向英、美双方表明他们的真正立场。我自然向吉罗提出了我所给莫内的同样忠告——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一项动议，看看能否通过。我不认为戴高乐和他的朋友会投票反对组织委员会的动议。这样会置他于难堪的地位。我警告吉罗说，委员会一旦成立，某些该反对的人物，纵非全体，必须去职。

在同一天中午，墨菲和我一同拜访戴高乐。这是一次截然不同的会见。戴高乐得意非凡，我的同僚获有深刻印象。他以一种强有力的、甚至高贵的方式表达出他内心深处的情感。自然有一些刺耳的言语。但是我们两个人都清楚认识到这是一位在法国内、外比任何法国人都更有权力的人物。

戴高乐一上来先就他对于一个法国政权的性质发表了他的看法。它纵使在名义上不是一个政府，但实际上应该尽可能接近于

一个政府。中央委员会必须设有必要数目的部长或委员来执行公务。因此，应设主席二人、财政部长一人、殖民地事务部长一人、运输部长一人、供应部长一人、陆军部长一人、海军部长一人、空军部长一人和外交部长一人。还应该设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在委员会里有一个代表穆斯林人利益的部长也许是可取的。这就应该 331 共总有十或十一名部长，但是要办事，这就是不可少的。

在我和墨菲问到执行委员会是否已经成立时，他说尚未作到。他表示他对于前一天讨论中所取的态度感到失望。他所说的和我先前听到的说法多少有点出入，因为他说菲利普、马西格利以至卡特鲁都和他一样地同感失望。关于拟议中的委员会组成问题，他对于英国方面为了把乔治将军安置在这个委员会里而把他从法国接出来，表示大为诧异。乔治是一个老派绅士，对于当前所需要起的作用颇不胜任，更何况同法国的战败还不无牵连。莫内是一个善良的人，但与其说是一个法国人不如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在国际事务方面会是颇为有用的。在谈话过程中，他说明他曾以下列人员的辞职为条件：佩鲁东、布瓦松、诺盖、芒迪加将军、普里乌将军和米歇利埃海军上将。他要求立刻照办。我们说这只能在委员会成立以后才能办到。但是他重申他担心不论在吉罗和乔治建议的这个委员会成立以前或以后，这些人都会拒不屈职。他承认其他的人并不抱这种看法。

戴高乐说，很多法国人和别国人似乎都没有认清法国正在历经一个革命时期。在战败和当前这段时期之间有一道鸿沟。正如1789年以后保皇军队在彼此冲突和各效其忠的分裂状态中分崩离析一样，现在法国军队也已经如此。非革命精神不能使其更生；非以年轻的新手担任军官不可。所有这些老朽的将领应一律革除。

同时，在追问之下，戴高乐似乎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安排，

实则某种商谈这时正在进行中。他并没有表现出要中断谈判和回返伦敦的任何迹象。但是，显而易见，他不认为自己承担了义务。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独自的势力，他的别墅的确象是一个国王的行宫。他进而要求墨菲为他作出访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安排。他对于先没有进行访问表示歉意，但是他没有联络官来安排这类的约会。他也要求我为他安排访问亚历山大将军和特德空军上将的事宜。

戴高乐谈到设置法国政府的适当地点问题。中央政权必须摆脱殖民地政治的气氛。所以他希望能物色一个他们可以去的城市——卜利达、卡斯蒂利奥内、或康斯坦丁。在那种气氛中，生活会比较简单，可以多作一些工作。

戴高乐反复申明，他所以要清除他提到的那五、六个文武官员，并不是存心报复，而是法国指望新人来处理放在它前面的新工作。一个和战败有牵连的旧人员的政府是不会得到谅解的。他无意让自己禁锢在一个执行委员会中。他自始至终非常安详，或毋宁说相当愉快。他的论据对于墨菲显然有相当影响。在告辞时，他拉着墨菲的手臂说，“你们为什么不理解我？你们为什么总是事事掣肘？你们的政治家为什么要反对我。这个错误是法国所不能理解的。我代表未来的法国，如果你们支持我，那对我们大家都好。”<sup>①</sup>

傍晚，卡特鲁来看我。他已经尽了他的最大力量劝请戴高乐不要坚持以那些人的辞职作为成立委员会的先决条件；因为委员会一旦成立，他就会有多数人站在他一边。为了消除他的疑虑，他已经得到了莫内支持他的积极声明。在这一天之中他已经看过戴高乐几次，但是他似乎不愿意作出一明确的结论。尽管前途变化莫测，卡特鲁仍然希望得到一成功的结果。所以，这一天是以有限

<sup>①</sup> 1943年6月4日。



度的乐观情绪结束的。但是，第二天却是悲剧、高级喜剧和甚至滑稽剧大会演的一天。结果，局势变得如此稀奇古怪，以致产生了反乎常识的情况。

一度大有成为成败所系之势的新争端，是以佩鲁东这个有问题的人物为中心的。在6月1日下午9点钟左右，佩鲁东送给戴高乐一封信，向他辞去阿尔及利亚总督职务，并请求委派他在法国部队中担任一名上尉。戴高乐没有征求吉罗的意见，立刻接受了他的辞呈，指派秘书长(戈农)暂时代管阿尔及利亚政府事宜，并答应给佩鲁东在地中海东岸法国部队中安排一个位置。在11点钟，戴高乐的新闻官写信通知了报界。将军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吉罗，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他。这封信在第二天午前1点左右递交到夏宫的门口。在这期间，在下午11点以后，佩鲁东又写了措词大致相同的第二封信，这次是写给吉罗的。写这封信的时间，其说不一，但无疑是直到第二天凌晨才递交到吉罗手里的。吉罗也接受了辞呈，并答应在军队中委派佩鲁东一个职务。在午前3点钟，以这种函件往来的消息发交报界。这时，吉罗已经收到了戴高乐的信。于是他写了两封信给戴高乐。在第一封信里，他对于戴高乐处理佩鲁东辞职问题的方法表示诧异，并建议在第二天10点钟会见。第二封显然是一种自作主张的努力，并且出之以最荒唐的言语。他谴责戴高乐设法把一个取法于纳粹型的政治制度引入法国。他要求在举行进一步商谈之前先公开否定他的主张。

到这时吉罗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确信戴高乐打算组织一次“政变”推翻他的政权。因而他指派米歇利埃海军上将作为他的内阁成员，来维持阿尔及尔的秩序，并且调来了若干殖民地部队。据说德拉米纳将军的部队，为支持戴高乐的武装政变，请假逗留在阿尔及尔的人多达三千之数，对于这种说法，吉罗也深信不疑。

在6月2日这一上午，我们听到了这件事的种种添枝加叶的



说法,于是和平缔造者们立即开始活动。墨菲和我首先拜访吉罗,他把这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的确切说法告诉了我们。我们竭力使他冷静下来,并且力劝他应以正确的方法处理这个问题。理应作的事情是召开一次会议,推选出一个委员会。这毕竟是在戴高乐来到阿尔及尔之前他本人和戴高乐交换的信件中所一致同意的。他应该依照自己的建议行事,使委员会成立起来。在离开夏宫时,我们在门外遇到一些领导人物,其中包括乔治将军。我和他略谈数语,但是他显然不是要助成其事。这使墨菲对于乔治来到阿尔及尔深以为憾。我们接着看到了戈农,他告诉我们他相信佩鲁东已经屈从于来自戴高乐派方面的极大压力。他也许得到了这样的暗示:要是他能静悄悄地辞职,他会得到照顾,但如果他从中作梗,那就谁也不能对后果负责。

当我回到我的别墅时,我发现戴高乐曾经要求见我,会晤定在当天下午4时。他一上来就说他不能理解包围着他的那种异乎寻常的气氛:动员阿尔及尔民兵,指派米歇利埃负责治安以及其他等等措施,仿佛就要发生一场内战。他对整个这一套作法一笑置之,说这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我对他说,我认为双方猜疑的气氛是令人遗憾的,甚至是荒谬的。但是我坦率地对他说,他只谈到了吉罗派所谈关于他的种种。

于是戴高乐谈论起佩鲁东事件。我说我认为佩鲁东既然知道委员会还没有成立,既然他又是吉罗手下的人,他把辞呈送给戴高乐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戴高乐接受辞呈也有欠妥当。他说他所以接受辞呈,因为他是法国民族委员会的首脑,并且他认为佩鲁东既然写信给他,就是承认他的威权。我说这未免有点说之不成理;如果一个人为他服务了五个月,然后把辞呈送给另一集团或派系的首脑,他对此人作何想法。戴高乐回答说,“也就是佩鲁东这类人!我一直对你说他是一个流氓。”

但是,他对我说,尽管有此种种,他还是要作另一次尝试,将于那天下午7点30分举行一次七人会议,看看是否能以成立这个委员会作为结束。我说我很高兴听到这段话。这给了我一个机会来呼吁他不要把他自己前途以及法国生活上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失之交臂。我问他是否我可以坦率直陈,是否可以让我讲英语而不介意,因为这样会方便些。他说他不介意,他能听懂。 335

我对他说,我象我的其他很多同胞一样,曾经在上一次大战中效命沙场;我曾经在法国领土上三次受伤;在那次战争中,我曾失去了我很多最知己、最亲密的朋友。我们对法国发生了一种从来没有破裂过的感情。在我国,我已担任议员有十六年之久,并曾坚决反对我们党的领袖鲍德温和张伯伦所奉行的政策。自从1937年以来,我就同他们一刀两断,而同丘吉尔等人联合起来要求重整军备。我还对他说,我认为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或许和我非常相似。在英国,我们认为在社会立法方面能够而且也应该作出长足迈进。在我国,正如在他的国家中一样,有些老派人,宁回顾过去而不展望将来。我们需要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在我这一行当中已经有很多人清楚认识到,我国的前途在战后会全然不同。豪门巨富将成为明日黄花;财产为了全民的利益将被看作是一种信托。我们希望看到不经过革命和动乱而从一种社会转变到另一种社会,而这在我国,一如在他的国家一样,端赖于是否有进步思想的人们能共同努力,鼓励必要的变革。我对他说我抱着同情和钦佩的心情来理解他的一切思想和行动;我认识到他发现旧人物和旧思想仍在统治一切,因而深深以此为虑;我了解我的国家和他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因为我们不曾受到加在法国身上的那种可怕的压力,我们不曾苦于一次大败仗以及踵随战败而来的那种含垢忍辱之感。虽然如此,我恳求他不要错过和吉罗一起体面地参加这个全国政府的机会。我确信,随着日月的推移;他不必滥用法律或违反宪法就可

336 为他自己以及和他在一起的人们取得实际的权力。他可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战争机器，而这部机器也可以供作和平时期法国复兴之用，但是如果他失去这个机会，他将只能是宣判，法国现在进一步分裂，将来进行一场内战。我不是作为一个外交家，因为我不是一个外交家，而是作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冒昧提出这项呼吁的；我们都属于同一时代并有着某些相同的思想。

将军耐心地听完了这一篇长谈阔论，于是说（在他问我可否以法文回答之后）他将对我所说的话予以充分注意。他始终认为我了解他，他答应在听任其决裂之前，非常慎重地权衡这一切。他发现自己陷于这样一种陈腐观点的包围之中，感到万分失望。我说，失望要加以忍耐，困难要加以克服，我有充分的信心，他会以一种可敬的方式扮演他的角色。谈到这里，他满脸都流露出好感和友情。

在同一天晚些时候，墨菲和我一同去看卡特鲁。我们发现他坐在花园里，冷静风雅一如往昔。墨菲恭维他有涵养，说他是世界上最具有耐性的人。对此，卡特鲁回答说，他当不起这样的称誉，因为这一天早些时候，他已经大动肝火了。虽然如此，他看上去已经完全恢复平静，显然，尽管有种种困难，他会想方设法务使委员会组织成立，因为他认清这意味着法国统一的实现。他证实了戈农所说驱使佩鲁东所以那样作的动机。但是当他收到了戴高乐的正式函件之后，他又动笔给吉罗写了另一封信。正如卡特鲁所指出，被戴高乐派的极端分子谴责为卖国贼的佩鲁东竟得到了在地中海东岸戴高乐派部队中委以一官半职的建议，这不是没有喜剧成分的。我问卡特鲁，谁可以接替佩鲁东任阿尔及利亚总督，对此，他回答说，他认为也许非由他担任这个职务并在委员会里兼任一个席位不可。我提醒他说，重要的是在起草章程时，必须订定得使这种作法成为可能。最后，卡特鲁说，“那好，我愿意再接再厉，但这

337



是颇费一番气力的。”

整个这一天，满城风雨，人心异常浮动。吉罗派“起事”和戴高乐派“起事”之说，甚嚣尘上。但是一旦作出了把那些荒唐举动一并丢在脑后而于翌晨召开委员会会议以期达成一项结论这一明确决定之后，所有这一切胡言乱语也就随之而烟消雾散了。墨菲和我一致认为我们为之出力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弹出一支乐观主义和满怀信心的调子。所以，在下午7点钟我们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不管对于世界报刊的影响如何，我们确信我们的行动会是有助于对法国所有离心力量施加压力的。在记者招待会之后，我去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别墅同首相共进晚餐。当然，他已经听到了关于争吵的消息，但是我设法让他安心了。他看出我已经精疲力竭，所以抱着他特有的那种体谅的态度而没有再催促我。他说，“无论如何，你已竭尽其力，仁至义尽了。”

第二天，

我们都被最近的事态弄得有点精疲力尽了；办了一上午的公之后，我邀同〔艾登〕到蒂帕萨饭店我们沐浴和午餐的地方去。正在我们进餐之际，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法国七星已经聚拢，并且自行组成一个确定的星座。<sup>①</sup>

傍晚马西格利来看我，留给我一份即将分发给报界的新委员会声明。他告诉我说，正式照会将由战斗法国和吉罗派代表团分别在伦敦和华盛顿一同呈递，声明新中央权力机关的成立并要求予以承认。他也告诉我已委派卡特鲁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和即将按照大体上使戴高乐满意的方式作出其他各式各样的变动。两将军在会议结束时互相拥抱，这就按照典型模式结束了法国的一次政治危机。我当然感到如释重负。不管前面会有怎样的狂风暴雨，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旅程中的一个确定之点。马西格利顺 338

<sup>①</sup> 1943年6月4日。



便告诉我说，戴高乐深为我前一天对他讲的一席话所感动，并对于我所表示的同情和谅解不胜快慰。

那天晚上我为外交大臣设宴，邀有一些英、美官员作陪。

饭后，我们应召去“10号”，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特德空军上将、坎宁安海军上将和蒙哥马利将军。我们度过了非常有趣、非常高兴的一晚，谈话一直持续到翌日凌晨。首相看上去对于法国事态的转机很高兴，我想他就其他问题也同美国方面达成了十分圆满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解决办法就是在占领西西里之后随即进攻意大利大陆。这正是丘吉尔所指望的一项计划。

我告诉海军上将说，他所建议的午宴，请笺现在应该发出了；午餐按期于第二天举行。出席的有首相、外交大臣、帝国参谋总长（布鲁克将军）和我自己，以及吉罗、戴高乐、卡特鲁、乔治、莫内、马西格利和菲利普。

宴会看上去一直非常顺利。饭后，首相就坐在位子上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他本人颇为激动，在座诸位也莫不皆然。他提到三十年前他参加德拉克鲁瓦将军指挥下的军事演习时对法国军队和法国人民获得的初次了解。从那时起，他就同法国的很多军政人员结下了友谊。他对法国、法国人民及其所缔造的文明的友好和钦慕之忱，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在政治方面的支持也一直是坚定不移的，甚至在艰难的日子里，当他本国的某些同胞似乎要翻脸的时候，他还一直是忠于同法国的关系。他曾经以最沉痛的心情看到法国在一个野蛮敌人铁蹄之下所度过的艰难岁月，但是他已经抱着同样的钦慕之忱看到了它重整旗鼓、再振国威。他相信在这个全体法国人民再一次团结起来，准备在同他们的盟国忠诚合作之下进行对敌斗争的历史时日，我们即使处于忧伤不幸之中也是大可由衷高兴的。他保证自己继续给予他曾经给予的充分的

忠实支持；他也为他的政府以及英国和英帝国人民作出同样的保证。然后他要求我们全体起立，为“最美好的法兰西，为胜利的法兰西”而干杯。

吉罗作了简短而非常得体的答辞，提到了北非的登陆和那场战役的胜利结束在所有法国人心中所引起的振奋。

继而戴高乐发表了一席措词极妙而且真正动人的短短讲话，主要是谈及首相的个人品德。他提到了他亲眼目睹英国人民如何历经患难的那三个年头。从如何应付艰难岁月比从一帆风顺时的举止言行更能判断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在春风得意之际，是容易交到朋友的，但是在危难之秋才能看出个人和国家的真正价值。他永远不会忘记英国人民所给他的鼓舞。

艾登接着作了短短的讲话，谈及英、法两国战后有必要团结起来重建他们彼此所信仰的观念——自由、宽容和人民安居乐业的权利。

乔治以寥寥数语作为答辞，其中顺便提到了让亚克，从而引起了一些欢笑，首相高呼道，应负其责的是勃艮第人而不是我们。

所有谈话都是用法语，首相用他从自己所擅长的法、英语词汇中广泛吸取的生动方言，高谈阔论。外交大臣以非常出色、非常流利的法语交谈。法国人当然以他们惯常的优美的声调和清晰的吐字讲他们本国的语言。饭后，全体一起拍照，最后又给首相同吉罗和戴高乐合拍了一幅。所有这一切——无论宴会还是照像——都 340 带有的确比那幅著名的安法照片更欢乐的色彩。在四个月之中已经作出了一点成绩。

英国报界对于这次法国的联合情绪是热烈的，虽则有人弹出了报警的调子。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承蒙慷慨予以承认；有一家报纸说我是得力“于对法国人的充分理解和几乎不可能干扰的镇定”。或许这就是很多年后对我很有用的那种“遇事不慌、镇定自

若”的传说的根据。但是在极短的几天之内我的确是需要有这种品质的。

## 第十四章 走向承认之路

341

新建立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一经成立，就马上申请英、美两国予以正式承认。不幸，委员会一开场就不是光彩夺目的。6月8日，对法国武装部队的指挥权、组织和管理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是遗留下来的一个未解决的重要问题。火气马上就开始按捺不住了。戴高乐要求由他担任国防委员（即部长），并仿效英国，以三军参谋长置于他的领导之下。吉罗，看出对他这位总司令的权限的威胁，据说勃然大怒，情绪激动，并扬言要挂冠而去。但是，在阿尔及尔照例怪事多，辞职的却是戴高乐。

6月10日，吉罗召见我。他把戴高乐的一封信拿给我看，信中抱怨委员会显然因对他本人的猜疑而受毒害，正遵循着维希思想走回头路，并且正试图以一种“起事”的气氛包围他。他的理想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因为连最简单的提案，在未决议之前，也似乎都非有一番无休无止的争辩不可。鉴于他对法国所负的天职，他在这样一个机构里是无法承担责任的。因此他已提出辞呈，一并辞去两主席之一和委员的职务。

6月5日，丘吉尔已返回英国，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已去山区欢度周末。我们对新危机虽有了思想准备，但不料它来得如此之速。正在我和吉罗谈话的时候，乔治将军走进来了。他开始对于戴高乐在委员会上的言行怨气冲天，称之为“蛮不讲理和有失体统”。连最不相干的事情似乎都激起了他的狂怒。例如，每逢提到贝当元帅的名字，正如经常那样，他都发现总要引起戴高乐极其强烈的反应，对此他简直不能理解。在这个当口，吉罗坐在他的书桌前面，



正亲笔作答，准备接受戴高乐的辞职。两位将军对于事态发展的情况似乎都极为高兴。他们问我对于这种形势有何想法。我说，我怕自己的脑筋没有法国人那样敏捷，我希望有时间考虑一下。我恳求他们不要不经过慎重考虑就采取断然行动。

我认为戴高乐辞职的结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他们却嗤之以鼻。但是我说，“喏，等三、四个月之后”，帝国已经在新委员会之下紧紧地结合起来，与英国的一切协定得到了解决，“那时也许就不那么严重了”。马达加斯加和法属赤道非洲的总督会倾向于谁呢？拉米纳和勒克莱尔会接受谁的命令呢？自由法国的舰队和空军的行动又将如何？要指望他们忠实地接受新委员会，还怕为时太早。如果戴高乐的辞职是在三个月，或最好六个月之后，那么一切也许已成定局，但是我认为这项辞职将引起极其严重的问题，并有使法帝国分崩离析的危险。联合，在八天之内就失败了，比根本没有联合还糟。所有这席话似乎打动了这两位将军，他们认为他们将三思而后行。<sup>①</sup>

继而莫内走进房间，他支持我的主张。接着卡特鲁也来了，这时候，我认为我最好退场，留下四个法国人在一起。我这时只有一张牌可打了——一张宫廷的牌。英王乔治即将访问北非。但这是严格保密的。他旅行时所用的电报代号是莱昂将军；这次访问则通称为“装货人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自己不妨先通知吉罗，再通知戴高乐。我以此作为我当天下午拜访后者的理由，我对他说，承蒙他接受邀请的下星期日的午宴，主人不是我，而是莱昂将军。

戴高乐烦言啧啧，有一些却是不无道理的。由于美国司令部的过失，他的朋友迟迟未从伦敦到来，使他大伤脑筋。他怀疑他们的动机，这并非是不自然的。他对丘吉尔在下院关于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地位以及依然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吉罗的重要性的那一

<sup>①</sup> 1943年6月10日。

席讲话,也颇有烦言。我解释说,这只不过是一般的评论,而不是对委员会要求承认的正式外交答复。我们讨论了其它一、两个问题,然后他指出,这固然非常有趣,但是他这种兴趣不会持续很久。他不能取得进展。他被一群思想陈腐的老朽团团包围起来。他想组织一支现代化军队,但是吉罗却要保留那支被敌人击败过的军队。没有一个问题他不受到掣肘。我恳求他耐心。委员会才刚刚成立了一个星期,安定下来是需要时间的。他说这的确是“embêtant”〔令人厌烦的〕。我说他一贯认为英国人是“embêtant”。他现在已经认识到许多法国人具有同样的特性。无论如何,我总是愿意随时听他的吩咐,如果他要见我的话,晚上、白天都可以。他向我道谢,并且微笑着说:

“如果我不再在政府里,莱昂将军是否还愿意邀请我呢?”我回答说,我确信莱昂将军对于当英国处于危难的时候曾经为它作出那样多贡献并且当我们孤军作战的时候支持过我们的那位法国人,一定是高兴会见的。这似乎使他很开心。……他陪我下楼,并且送我上车。①

把这些新风波分别报告伦敦和华盛顿,这自然是有必要的。虽然受到罗斯福强烈的鼓动,丘吉尔的反应却还是比较温和的。6月11日,我收到的电文如下:

在我们知道我们所必须承认的是什么之前,谈不上我们予以承认的问题。请参看《马太福音》,第7章,第16节:“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 344 认出它们来。从荆棘上岂能摘到葡萄,从蒺藜里岂能摘到无花果?”确实,全章都是有教育意义的。

你争取时间,让戴高乐尽量有机会恢复理性,认清他周围的力量,这是很对的。只要他堂堂正正地对待我们,堂堂正正地对待法国,我们就堂堂正正地对待他。

我们接到这份电报,已是深夜。我们打算以同样的办法作复。

---

① 1943年6月10日。

经过再三搜索,在《启示录》的几节比较隐晦但文字贴切的段落中找到了引证。因此我们拍回一份电报,感谢首相的指教,但是加上了一句“请参看《启示录》,第2章,第2—4节”。引文有如下述:

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你也能忍耐,曾为我而劳苦,并不乏倦。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

最后一句是如此恰当,以致切中要害。丘吉尔的私人助理德斯蒙德·莫顿后来告诉我说,电报到达时,恰巧他和他在一起。叫人把《圣经》拿来,查出那一节之后,他一语不发,生了半天气。虽然如此,他还是宽宏大量,并已满足于这一教训,这种引用《圣经》往来通信的方式,现在必须停止下来。

尽管喋喋不休,吵吵嚷嚷,尽管我的同僚和我自己接到了首相和总统大量严加批评的电文,但是英王的来访现在却开始支配此间的政治舞台。他在6月12日到达,保密工作一直作得很好。他带同空军部大臣阿尔奇·辛克莱和陆军部大臣格里格。第一晚,英王虽然非常劳顿,晚宴还是照常举行了,席间有艾森豪威尔在座。宴会进行得非常满意。

345 英王沐浴、小睡之后,精神焕发。他对艾森豪威尔很好,艾森豪威尔潇洒大方,有兴会,有风趣,既不太腼腆、也不太随便,事实上,正是他素来的那种真正自然朴实而风流儒雅气派。

饭后,在别墅的主要起坐间里举行了艾森豪威尔以真正非常高兴的心情期待着的那个小小的仪式。英王凑近将军……颁给他一枚巴斯大十字勋章,并讲了几句摘精取华的话。<sup>①</sup>

英王问我,请法国人午宴的事该怎么办。首相曾经劝请他除非他们循规蹈矩,就不举行。他们循规蹈矩了吗?没有,陛下。有些人

---

<sup>①</sup> 1943年6月12日。

已经辞职；另一些人正要辞职。我不能说他们是循规蹈矩的。英王问道，那么我们怎么办呢？“陛下，”我冒昧回答道，“我想劝请您照旧举行。这样会有好处，而决不会有坏处。”他听了这句话之后大笑，事实上，那次宴会是非常成功的。客人有吉罗、戴高乐、卡特鲁、墨菲和我自己。

饭后，戴高乐问我下午打算作什么。我说我或许会驱车到蒂帕萨饭店去洗澡。他问我是否他可以同我一起去。

坐了三个半小时的车子之后，我就同这个奇人，这个富有魅力然而令人吃不消的人物，漫步于断垣残壁之间，不断地谈古论今。我们谈论每一个想谈的题目，政治、宗教、哲学、古典文学、古今历史，无所不谈。所有这些都是和他的满腹心思多少有些关联的。<sup>①</sup>

我依然引以为快地记得这一不可思议的插曲。我在这个罗马古城远处的一端赤身沐浴，戴高乐则头戴军帽、身着军装、腰系皮带，神气十足地坐在一块岩石上。然后我们同那位受宠若惊的古城守护神在这个饭店里吃了一顿很可口的简单晚餐。

要懂得如何掌握他，却大非易事。我尽力而为，我知道他欢喜我，而且以有人能让他信得过并和他随便交谈而感到欣慰。我想我已经说服 346 他目前暂留在委员会里，让大局有一个转机。（我总是怕他会难以共事的。）他生性是一个独裁者。正象路易十四或拿破仑一样。他从心里认为他应该发号施令，别人都应该服从他。不一定是“法西斯主义者”（一个使用得太滥的字眼），而是一个集权主义者。<sup>②</sup>

在这期间，法国危机已进入冬眠状态。6月15日晚，戴高乐和马西格利一起过来看我。这倒是一次关于法国军事改组的有益谈话。我是完全同情戴高乐的，因为，显而易见，一种负有适当内阁责任的适当内阁制度必须建立。困难的是要给总司令以合适的职能。

---

①② 1943年6月14日。



对于法国委员会的成立始终不欢迎并极愿看到它垮台的罗斯福总统，正式指令艾森豪威尔防止戴高乐在北非和西非握有军政大权，因为这会严重地危及盟国部队和盟国军事行动的安全。

英、美两国政府（总统倡导于前，首相附和于后）反对戴高乐这时握有军政大权，因为他们对于他将怎样行事，毫无信心。<sup>①</sup>

这时开始出现一种新局面，结果证明是对我非常有利的。尽管对戴高乐抱有成见，艾森豪威尔或比德尔·史密斯对于这种看法并不真正具有同感。他们两个人以及墨菲开始认为吉罗实际上是根本无用的。他既昏聩糊涂，而又优柔寡断，总是“宁以骑墙观望自苦，而视毅然作出决定为畏途”。因为美国人深以赔了夫人又折兵为恨，所以准备放弃他。他们对总统关于法帝国土崩瓦解迫在眉睫的看法也不抱任何同情。“殖民主义”无疑是一件坏事，但只应在战后予以改变。然而，把他们当前的的问题作为一个纯军事问题来看，他们渐渐走向他们在8月间所达到的那个立场，他们力主接受戴高乐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并承认这个机构作为事实上的法国临时政府。向这一最后结局的进展是缓慢的，但却是稳步前进的。我只能听任其发展。

在这期间，我处境狼狈，因为戴高乐和马西格利都向我提出了一些尴尬的问题。在任何盟国政府和吉罗将军之间关于法国部队的重整军备问题有没有什么个人协议呢？这项协议的执行是否取决于法国中央政权所可能采取的某种形式和结构呢？吉罗将军是否有理由声称，正如他所声称的那样，他握有盟国开给他的一张空白支票，让他可以保持看来对他最适当的地位呢？这些问题是不容易回答的，除非笼统的说，因为这里有安法之谜那一隐晦的角落。<sup>②</sup>艾森豪威尔将军在那段时期不断接到措词强硬的总统电

<sup>①</sup> 1943年6月15日。

<sup>②</sup> 参看本卷原书第256页及以下。

报,我也接到了首相一系列类似的电报。他把他的电报拿给我看,我也把我的电报拿给他看。这像是幼儿园的游戏。我常常说丘吉尔给罗斯福的电文都是“急就章”。

艾森豪威尔将军于是说,“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办?”我说,正如他从我的电报中所看到的那样,我所奉到的指令是,在执行总统指令方面,要给以绝对支持。他说,“噢,不错。但是作为一个朋友,你想劝我怎样办呢?”我说,那就是一个迥然不同的问题了,我认为我们可以照我们自己的看法来解释这些指令。最后,他拍给总统一封回电,是当着我的面口授的。他要我提些补充意见,我提了几项。

所以,据决定,应由艾森豪威尔本人试行坦率地、不动声色地解决这个问题。他邀两位将军在他的别墅同他会谈(我认为比在盟军总部策略些)。会谈订于6月19日上午举行。除参谋长之外,别无一人入座。

马西格利、墨菲和我坐在别墅的另一个房间里,以备有事应召。这 348  
项计划是为了强调干涉的纯军事性质。有鉴于华盛顿在伦敦方面支持之下的态度,要根本避免任何干涉既不可能,所以我切盼干涉能仅以军事性质以至短期性质的为限,俾使法国人比较可以接受。盟军的真正要求可扼述如下:

- (甲) 必须有一位法国部队的总司令。
- (乙) 这位总司令必须握有统制部队的实权。
- (丙) 任何改组的制度不得夺去总司令的实权。
- (丁) 总司令必须能贯彻执行现有的军事协议,并能给我们以铁路、码头、港口设备等的使用权。
- (戊) 就目前而论,吉罗应是总司令。

所有这一切——表面上都是对法国主权的干涉——我们是以在这方面的巨大军事义务和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作为理由的。<sup>①</sup>

会见自然是既冷淡而又不友好的。然而主要的结果之一却是

<sup>①</sup> 1943年6月19日。

艾森豪威尔将军对戴高乐的伟大人格似乎获有深刻印象，他以前从没有看到过戴高乐如何行事。仅就盟军需要对武装部队的有效统制而言，即便是在改组期间，他们的要求也许还是合理的。有关铁路、码头和港口设备等等使用权的军事协议，是应该执行的。但方式方法，对法国方面却几乎是凌辱性的，而只能以根本不信任来解释。然而，因为北非的每一个港口对于本身就无异是冒险行动的意大利远征却事关成败，所涉风险至巨，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盟军确乎进退两难。戴高乐态度坚强，但令人捉摸不定；吉罗虽可信赖，但为人柔弱。在两位将军离开别墅之后，我们明智地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必须把艾森豪威尔的要求以书面备忘录的形式送致  
349 两位将军，并分送法国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这至少会避免夸大其词或误解。但是，这显然要引起轩然大波。

在这次风波爆发之前，我却得以获得一次令人振奋、永志难忘的经历。因为我曾应英王之邀，陪同他去访问马耳他岛。

关于英王究应搭乘飞机还是走海路，曾经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空军的论据条条有力，而海军也同样坚决。结果，英王要走海路的意愿占了上风。但是这肯定要冒一次较大的风险。6月19日下午10点左右，我们从特里波利乘巡洋舰《曙光号》在驱逐舰的护航下启碇出发。

海军上将[坎宁安]一直打趣我说，这次短航之所以成行，正是根据我的劝告，因为根据宪法，国王只能采纳大臣的劝告。我一直对他说，这正是我所以来的原因，以便我们同生死，共患难！

实际上，我想一往（星期六夜）一返（星期日夜）任何海军官员都根本不曾合眼。我确信当巡洋舰于星期一凌晨返抵特里波利时，他们大家都深感如释重负。<sup>①</sup>

三一节清晨7点钟之后不久我就走上舰桥。这是一个阳光灿

---

① 1943年6月19—21日。

烂的黎明；轻风徐来，镇日不停。我们不久就驶过扫雷艇，这些扫雷艇为了保证绝对安全而一直在辛勤工作。

8点15分，英王登上舰桥；为他建造了一个特殊的小月台，（像是一个旧式的三层圣坛，或者像在某些独立教会教堂中的那样）从舰桥上稍稍突出一点，也稍稍高出一点。他身着白色海军制服，独自站在那里。我们一驶入大港，就缓慢前进，持续了至少三刻钟，所有峭壁和堡垒上都站满了陆军、海军、空军和平民，欢呼雷动。这是一派真正极其动人的景象。在古老的圣安吉罗城廓上是一排排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在所有其它占地利的地点都是步兵，炮手，飞行人员，男、女童子军和拥挤一起、殷切盼望的平民。每有可能，就安排一班合唱队或一班乐队。我们缓慢地驶进了内港，发现了我们的停泊所——依然是欢呼、摇旗、盈眶的热泪和激动的情感。<sup>①</sup>

因为我们文职人员不参加国王的仪仗队，所以我只看到了一个开头。但是在瓦利塔港万众欢呼、人山人海的大广场上，却是一派令人难忘的景象。在上午，英王驱车从一个城镇到又一个城镇为时达两小时之久，在黄昏时访问了飞机场和岛上其他各处。

我们在去维达拉宫（在那里举行午宴）的途中以及下午在各个不同地点上都曾驶进了皇家巡行行列。鲜花、旗帜和采纸——所有的人大都由牧师带领，手执宗教旗帜和标志，站立在每一个教堂外面和簇拥在每一个广场上。<sup>②</sup>

英王访问的消息是在当天早晨各个不同教堂作弥撒的时候方才公布的。仍旧是万人空巷、倾城而出。

当夜我们驶往特里波利，于翌日凌晨到达。事过之后，我们很高兴我们不顾潜艇、水雷和空袭的危险而作出走海路的决定。墨索里尼曾经称地中海为“Mare Nostrum”（“我们的海”）。在上苍的保佑下，靠了他的所有武装部队的力量，已经为我们的国王肃清了地中海。

<sup>①②</sup> 1943年6月20日。



我们回到阿尔及尔之后,果不出我所料,面临着一种相当复杂的局势。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曾在那天(6月21日)上午开会,考虑艾森豪威尔的书面要求。讨论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找出了一种方式,虽不令人根本满意,却应付了目前的难局。委员会中的稳健分子,在我们的全力支持下,劝说两位将军同意了折衷方案,成立一个包括两位将军在内的常设军事委员会,“负责统一、组织和训练武装部队事宜。民族委员会则负责法国作战的总方针,并节制法国的所有武装部队;吉罗将军将是北非和西非的总司令,戴高乐将军则是法帝国其他部分的总司令。”<sup>①</sup>我认为如果这个非常微妙的结构能持续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那就会一切如意了。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法国统一的观念逐渐牢固到颠扑不破的程度。

在第二天下午,我听说戴高乐这时已下定决心要强迫布瓦松接受这个决定。这位官员的处境是很特殊的。

在戴高乐派看来,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在英国人看来,由于对1940年的记忆犹新,认为他是生来有点讨厌的;但是美国人却对他钦慕之至。

不幸,总统……决心要让布瓦松留任原职不动,因此有充分理由认为一次新争吵已在所不免。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道难关,那也许是此后几个星期的最后一次了。无论如何,我答应在第二天一早去拜访马西格利,看看是否能够商量出一个折衷办法。(我相当为难,因为我个人认为总统的要求是荒谬绝伦的,但是我却奉命予以支持。幸而,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我抱同样看法,正力图从白宫取得一项折衷方案。)<sup>②</sup>

勒内·马西格利从这时起会同卡特鲁发挥极其有价值的作  
用。我在同他会面之后的几个星期之内就早已对他的聪明才智不

---

① 卢埃林·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第221页。

② 1943年6月23日。

胜钦佩了。我不久对于他的真知灼见也获有同样的印象。无可否认,他无论讲法语还是讲英语,往往都很难听懂,尤其是在他有点激动的时候。但是他的乐观精神,他对任何问题,不论如何困难,都要设法予以解决的决心,以及他对同盟的根本忠实,使他这时成为关键性的人物。我同他结成的友谊将与同阿尔及尔的法国人的一切关系相始终,并将经历若干年的积极合作。我们的交情久而弥坚。

6月24日晨,为向英王表示敬意,举行了法国部队的阅兵典礼。不久之后艾森豪威尔打电话告诉我,吉罗通知他说布瓦松已发出呈请辞职的电报。吉罗没有征询戴高乐或委员会的任何委员的意见,就立即电复照准。这似乎是一件怪事,因为他这时恰恰犯了他以前指责戴高乐在佩鲁东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当我看到吉罗时,交谈是遵循往常的方针的。 352

这位老小伙子精神焕发。他说局势的发展不很顺利,但是一切都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告诉我,布瓦松曾经呈辞,但是他(吉罗)拒未批准。我颇为出乎意外,因为我以为他已经照准了。“噢,是的,”他说,“但那是不重要的。现在我已经拒绝了。”(我发现我自己象爱丽丝一样反复对自己说:重要,不重要,拒绝,照准,照准,拒绝,不重要,重要。)

显而易见,〔吉罗〕是从阅兵典礼回来同艾森豪威尔略谈数语之后,立即拍给布瓦松另一份电报拒不同意辞职的。<sup>①</sup>

当我去见艾森豪威尔告诉他这种情况时,他象以往一样的有礼貌和聪明颖悟。我们都认为如果我们能越过这一道关口,我们就会终于跑到终点了。也许这是一种乐观的看法,但是在阿尔及尔非保留一点乐观看法不可,否则是要发疯的。

在此后几小时之内,布瓦松危机突然告一结束。谁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实际上主要应归功于艾森豪威尔,因为他非常

<sup>①</sup> 1943年6月24日。

坚决地向华盛顿表示了他自己的意见。总统对法国统率权的问题大发了一顿脾气并发出了一批蛮不讲理的电报之后，这时开始兴趣索然了。他给将军的最初指示是要求布瓦松留任原职。他甚至以美国派遣部队和战舰至达喀尔相威胁，如果将布瓦松解职的话。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布瓦松辞职以前的事。墨菲非常明智地建议他的政府说，如果布瓦松真的坚持辞职，硬要让他留任，那是非常失策的。当白宫急躁万分时，委员会却保持冷静而十分理智。353 他们正式通知我们说，布瓦松已经辞职，但是在未物色到继任人选之前，仍要求他暂时留任。于是美国人又坚持必须以他们所欢迎的人继任。委员会小心翼翼地只提出来一个人，他就是那位背景清白、卓有政声的法国驻喀麦隆总督皮埃尔·库尔纳里。这项提名经墨菲报告总统，总统未作答复。因此，在7月1日委员会就批准了这项提名。几天之后，总统拍来一个电报，表示同意，但是提醒委员会不要忘记盟军在达喀尔的利益，并保留他的权利。这事实上是自己下台阶了。这次由美国人制造的又一难关就这样成功地越过了。

这一小小插曲不仅仅说明了吉罗的政治脆弱性，而且说明了总统不明智地宁把他的对法政策放在支持个人而不放在原则性上。

在布瓦松风波之后，有过一个可喜的风平浪静时期。除了曾有人建议变换米歇利埃海军上将的职位这一小麻烦外，没有发生别的什么事。坎宁安海军上将很关心米歇利埃，因为他已经牢牢地掌握了他。但是他却为美国人所厌恶，因为他曾经反对他们在卡萨布兰卡登陆，何况，他又是维希分子和贝当分子的人。他的确签署过停战协定，但是，当然，他是海军将领俱乐部中的一员。

7月2日，吉罗启程赴美，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愚蠢的举动，因为这正好给戴高乐以活动的时机。然而当我到飞机场去给他送行

的时候，他精神抖擞，“象动身前去度假的学童一样”。<sup>①</sup>我自己也同样感到一身轻快。

这时溽暑逼人，每个人都头昏脑胀。但是墨菲和我则主要是被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大量互相矛盾和有时愚不可及的电报搞得焦头烂额。

但愿美国和英王陛下政府给委员会以正式承认。我似乎无法让本国了解真情实况——或者更确切的说，我想他们并非不了解，而是不愿敦促华盛顿。这里的美国人（艾森豪威尔、比德尔·史密斯和墨菲）现在完全是通达事理的。……我所应该作的就是追随他们之后，恭而敬之地附和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的思想转变却尚未为华盛顿所了解！<sup>②</sup> 354

罗杰·梅金斯曾经去伦敦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于7月8日返任。

他的访问对我是非常有价值的，使我的心思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澄清。似乎我的大多数同僚都相信我不会太刻板地遵从首相的指示，也相信我能够抓住机会解决问题。我真的有点看不起他们。他们原可以鼓足勇气不时在内阁中讲老实话。<sup>③</sup>

在纷繁、有时令人心乱如麻的问题中，一次令人振奋的新的军事行动的日期临近了。进袭西西里——“爱斯基摩人军事行动”——订于7月10日开始。在前一天我去看戴高乐，告诉他将于翌日凌晨发动进攻。我没有奉命这样做，我认为还是不要等待任何指示或征询任何人的意见才做更聪明些。在我看来，要让将军先从无线电广播或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是很不礼貌的。对于我把这项军事行动告诉他看来他是真正重视的，并且对于我就这次行动的规模和极终目的所能供给他的任何详情细节，都深感兴

---

① 1943年7月2日。

② 1943年7月5日。

③ 1943年7月8日。



趣。戴高乐精神振奋,因为他去突尼斯的访问非常成功,受到了盛大欢迎。他认为内部形势在逐渐改善,委员会已安下心来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工作。谈到这里,我的话使他回想起他在几个星期以前的沮丧情绪。当然,他对于外部形势是啧有烦言的。他不理解为什么他一直受到美、英两国报纸的抨击;美国人对待他尤其恶劣。例如,他们拒不同意他所提名的亨利·奥普诺担任马提尼克岛总督。当时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据说他们曾把吉罗留在波多黎各岛上两天,希望他去接管那个岛,但是由于他非常担心不受欢迎,这才放弃了这个计划。我不禁大笑,说他又犯疑心病了;对此,戴高乐回答说,“当一个人周围都是麻烦时,就不能不满腹狐疑。”虽然如此,这次会见他始终是友好的,满怀信心的。所谈的每一件事都围绕着承认的问题;由于英、美两国政府迟迟不予承认使他深以为憾。

到7月14日法国国庆节,吉罗还没有归来。阿尔及尔全境举行大规模军事游行,用美国军服和物资新装备起来的法国队伍,给公众以良好的印象。这至少表明同盟的某些存在。墨菲和我同僚“未得到承认的”委员会的成员一起站在观礼台上。戴高乐在吉罗的代表朱安将军陪同下,接受敬礼。检阅完毕,我去看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在听了他的意见之后,我决定拍一个电报给伦敦,重新扼述赞成承认的一切论据。如果还是不肯正式承认,事实上是非常荒谬的,既愚蠢而又没有礼貌。何况,这将削弱一个集体负责制的立宪委员会的观念,而我们的全部目的正是希求实现这样一个观念。

如果你们对戴高乐抱最坏的看法(象白宫和国务院那样),那么还有什么比试图故意冷落他更能在法国人眼中提高他的地位,又有什么比邀请他去华盛顿更能削弱吉罗呢?古往今来的历史给了我们同样一个教训。法国人是一个象英国人那样思想狭隘而又有自尊心的民族,我们宁

要一位愚钝的荷兰籍国王和两位不会讲英语的汉诺威籍国王，而不取所有斯图亚特王朝的风骚和魅力——这又为了什么呢？因为斯图亚特仰仗法国的金钱、武器和政治支持。可是美国人不读历史，或至少不理解历史。<sup>①</sup>

在同一天上午稍晚一些时候，在广场上有一次盛大集会，戴高乐发表了一篇很漂亮的演讲，娓娓动听，声调铿锵，亦庄亦谐，夹有不少警句，结束语极其感人，万众欢欣若狂。但是吉罗仍远在华盛顿。

在这几个星期中，由于西西里和意大利的事态有重大发展，我在突尼斯消磨了很多时间。这意味着从突尼斯到阿尔及尔飞来飞去；同我下一个主要的紧急任务保持接触，看来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喜的是，这个计划使我有某种游山玩水之机会——可以游览一下克鲁昂和罗马的道加古城。当我在突尼斯时，我就留下梅金斯在阿尔及尔坐镇，当然一切重要的电报都要照样转达给我。电话通讯，虽不安全，但情况却出乎意外之好。

法国事务就这样拖下去了。无论如何，我感到我这时已逐渐得到首相的同情和帮助。

总统仍然拒不承认法国民族委员会，但是首相拍发了一个实在令人惊叹的电报，他促请总统予以承认。我听鲁克尔（他在这个星期出任法国事务方面的顾问）说，他在电报拍出之前曾经七易其稿。电文妙语如珠，令人折服，辩才洋溢，大义凛然——十分周到。我认为它一定会有一个结果。西西里战役的一举成功，也将有助于提高首相的威望。因为一直主张重视地中海，而且尽管有技术方面尤其是海军方面的强大阻力而一步步把美国拉到他这方面来的，正是他一人之功。

我也接到了他拍来的一份非常亲切的私人电报，说明他的处境和困难，并同意我的措施。我听墨菲说，国务院已开始动摇。艾森豪威尔和墨菲仍就这个问题反复以电报说项（我促请艾克从突尼斯发出了另一份

<sup>①</sup> 1943年7月14日。

电报), 我认为持续不断的努力将会逐渐打破总统和科德尔·赫尔的成见。<sup>①</sup>

7月27日傍晚, 我往访吉罗, 他已在四天前从美国回来, 途中在伦敦作了短暂停留。

357 我生怕他对华盛顿和伦敦的访问对他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的那种天生的、虽则天真的自高自大, 已变本加厉。他认为(或许有一定的道理) 美国人已许给他个人以物资援助。然而, 他对于总统和科德尔·赫尔的那套手法颇有误解。他是如此的狂妄, 以致他真正认为他们是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一位将军而对他发生兴趣的。其实, 他们只是把他作为: (1) 损害戴高乐和(2) 破坏法国统一的一个方便工具而对他发生兴趣罢了。<sup>②</sup>

同一天, 对伦敦作了短暂访问的马西格利来看我。他兴高采烈, 对他所受到的慷慨而友好的接待, 获有深刻印象, 甚至颇为感动。虽则他对迟迟未予承认自然引以为憾, 但他是理解我们本身的困难的。

白宫和国务院所玩弄的那套把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希望以迟迟不予承认来激起委员会本身的焦急和减弱他们的信心。然后他们希望吉罗会(由于在华盛顿对他作出的许诺或半许诺) 在军事问题上采取这样一种僵硬方针, 以致引起委员会的瓦解。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对委员会的不承认, 就会成为他们自抬身价的口实, 于是他们就可以转回来支援吉罗作为法属北非的首领和美国政府的一个俯首贴耳的工具。如果总统得知这里的美军是如何厌弃、甚至蔑视这个政策, 我想他会大吃一惊。<sup>③</sup>

意大利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紧急, 但是我仍然决心力图就我在阿尔及尔的工作得出一最后结果。7月29日,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再一次用了整整一天的工夫讨论军事改组问题, 但是没有取

---

① 1943年7月21日。

②③ 1943年7月27日。

得任何进展。

吉罗昨天提出了一个计划,根据该计划,将由他担任:

(甲) 两首揆之一;

(乙) 北非和其他各地所有陆、海、空军的总司令(也就是把戴高乐的部队一体归并在内)。

根本没有戴高乐的位置了(除开关于一个“设计委员会”有名无实的审议权)。他似乎曾经告诉委员会说,在华盛顿他曾经作为个人,而不是 358 作为委员会的主席得到了给以装备的诺言。这个计划遭到委员会一致的否决。

为求达成协议,戴高乐提出三项建议,但每一项都为吉罗所拒绝:

(1) 吉罗任总司令。戴高乐任国防部长,各兼两主席之一。由一个小型战时内阁来裁断任何争议。

(2) 吉罗任总司令(兼两主席之一),由一名文官任国防部长。

(3) 吉罗任国防部长,兼总司令,但辞去两主席之一。……

吉罗这时以辞去委员会职务相威胁,显然是要仰仗美国人把他当作独裁者之类的人物来支持。<sup>①</sup>

我并不把这一切看得太可悲,因为我已经经历了多次这类的危机,而我们总是有办法至少达成一个暂时的解决。墨菲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目前不应插手。

到这个时候,我的那个工作班子以及我的责任都在与日俱增。我们原有的老班底依然如故——约翰·温德姆和我自己,连同非常可宝贵的坎贝尔小姐和威廉斯小姐。作为我主要顾问的罗杰·梅金斯这时偕同哈罗德·卡奇亚一起照料意大利事务,约翰·鲁克尔则照料法国方面事务。汤姆·杜普里前来担任新闻参赞。我另外又增加了两个青年人,约翰·艾惕思和埃里克·邓肯农。<sup>②</sup>伊登小姐也已经到职,担任梅金斯的秘书,萨舍特·布朗担任档案

<sup>①</sup> 1943年7月29日。

<sup>②</sup> 邓肯农勋爵,即后来的贝斯巴勒勋爵。



保管员,两个班长担任司机,其中最重要的是司库哈尼特先生,由他设法供备款项,支付我们日益增大的开支。

同时,阿尔及尔的社交生活这时变得越来越活跃了。起初不相往来的戴高乐派和吉罗派的二、三流人物这时渐渐聚拢在一起了。而这种特点与其说是政治性的,毋宁说是社交性的。很多漂亮年轻妇女来到这儿排解我们的忧闷,一些贵族老夫人来款待我们。唯一的困难是,对于英、美文武官员以及对于法国军官、政客及其夫人来说,这实际上意味着朝朝酒饌,暮暮华筵。这是令人相当劳神的,尤其是在天气越来越酷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举行了一次由埃里克·邓肯农组织的晚宴,他的一些有风趣的青年朋友应邀参加。其中有一位我称她为“柯达女郎”<sup>①</sup>——说不尽的聪明俏丽。这是一次宾客满堂的宴会,现任司法部长阿巴迪博士那位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座,对他来说,文艺俱乐部的高官显贵比我们别墅的三教九流要更般配些。所以宴会进行得相当吃力。但是,傍晚由于一位美国上校突然对阿巴迪小姐讲了下述一段话而轻松起来:“你是一个拉皮条的女人吗?我想请一位年轻的女士教课。”阿巴迪小姐看上去有点吃惊,但是非常镇静地回答说,“噢,不是。你未免热昏过度了。”显然,这位英武的上校是想学法语!<sup>②</sup>

在7月的最后一天,一个新折衷方案达成了,戴高乐聪明地予以接受,因为这对他大为有利。他将是法国民族委员会唯一的主席,换句话说,唯一的首揆。但是一切的命令都要由他和吉罗会签。军事委员会将由国防委员会来代替,最近的二元指挥权将予放弃。吉罗将仍然是总司令,但基于这样一项谅解:如果当他指挥

---

<sup>①</sup> 柯达是一种照像机的商标。“柯达女郎”意思就是照片上的女郎,也就是漂亮女郎。——译者

<sup>②</sup> 1943年7月30日。

任何一次积极的军事行动的时候，他就不再成为政府中成员之一了。

每个人都同意今天宣布的这个折衷方案（或计划）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案，戴高乐所采取的决定是聪明的。从长期来看，他是占便宜的，因为吉罗将越来越注意军事问题，而把政治问题留在戴高乐手中。终于，他开始学习一点忍耐功夫了。

我看不出总统现在怎样能够坚持下去。<sup>①</sup>

这时我们大家都为承认作好了安排，虽则事实上承认将一直拖延到8月26日。自然有一、两次疾风暴雨，但是我认为完全是可以应付的。

8月8日，在艾森豪威尔的同意下，我前往伦敦，部分是为了讨论拖延不决的承认问题，但也要讨论一些迫切的意大利问题。<sup>360</sup>由于我的工作班子扩大，我现在确信在我离职期间，任何新的风波都能应付裕如了。就我有关法国方面的使命而言，正如我向戴高乐和马西格利详加说明的那样，球已经不再在我们的场子里了。据了解，承认的问题最后将在总统和首相即将举行的魁北克会议上予以讨论。丘吉尔自然不打算为戴高乐问题而同我们的美国朋友争吵；他也不愿意让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争执破坏他同总统的亲密关系。但是艾登采取了不同的看法。他们在7、8两个月中一直以措词猛烈的备忘录为这个问题进行争辩。外交部认为总统和首相似乎把今后在法国的有害后果都置诸度外，如果承认问题仍不予解决的话。同时，丘吉尔也开始受到了我就艾森豪威尔和墨菲这时表示的看法所作报告的影响，这两个人都劝请对委员会的要求立即予以接受。在7月份，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往来电报并没有使问题有多少进展。一切都必须留待魁北克会议解决。我所能告诉法国方面的是，丘吉尔将试图同总统决定一个令人满意

<sup>①</sup> 1943年7月31日。

的承认方式。问题暂时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上。在魁北克，艾登就这个问题同赫尔极力争辩，但是没有能说服他。然而，他清楚表明，如果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则两国政府不能不各自采取自己的方式。罗斯福希望给委员会以“有限的接受”，并避免“承认”字样。但是这在我们是不大能接受的。最后采取了两个稍稍不同的方式。因而，在8月26日，墨菲和我携带我们的两种文本拜访戴高乐。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对于措词毫无怨言，而对于我们一切努力的可喜结果，看上去真正感到高兴。我们于是去见吉罗，他对这个问题只抱一种谦恭有礼和超然的态度，但是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他早日征服南欧的战略的细节，以及登陆舰艇或后勤支援不足的情况。在发表这番谈话的时候，他比往常更像白骑士了。

361 在作为长期斗争结束之标志的这个戏剧性日子的傍晚，墨菲和我在马西格利的协助下为英、美、法新闻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由新闻部长博内先生担任主席。马西格利处理得很巧妙，使我非常高兴的是，他竟然处于为英、美文本辩护的地位，把其间的差异都搪塞过去，把弱点也一笔带过——这一切都是以答复补充问题的一位下院熟练辩论家的最高明方式进行的。他的确应付得非常妥当，墨菲和我简直没有什么话可说了，除开在结束时走进来稍作补充而已。

我讲了一个效果良好的笑话，并提出了一项似乎颇为收效的热情呼吁，并且我认为就这里所发表的一切而言，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sup>①</sup>

英国的“方式”是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统治凡承认其权威的那些法国海外领地并已执行前法国民族委员会有关地中海东岸领地的一切职能’。文件‘以同情的态度’注意到委员会希望被看作是有资格执行并保卫所有法国利益的机构的意愿。英国政府拟

---

<sup>①</sup> 1943年8月26日。

‘尽可能将这项要求付诸实施,但在发生的具体问题上保留在同委员会商量下考虑这项原则实际应用的权力’。”<sup>①</sup>美国的方式在形式上不那么现成合用,但也证明是足够的。

另一个里程碑就这样安全越过了。戴高乐这时感到自己是一个事实上法国临时政府的首揆了。

---

<sup>①</sup> 伍德沃德,前引书,第 224 页。



## 第十五章 意大利的投降

为了把法国政局的演进，至少把临时政府的承认问题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先交代一下前此所发生的各事，是很有必要的。正当我们专心致志于那些次要、却使我们无法分神他顾的阿尔及尔问题的时候，在世界上许多不同地区正发生着大规模的军事斗争。

当卡萨布兰卡会议在摩洛哥开会时，斯大林格勒可歌可泣的战斗正在展开之中。1942年1月间，德国第6军被围，在1、2两月份被歼灭。希特勒这第一次惨重的败绩之为东线形势的转折点，一如阿拉曼战役和“火炬军事行动”之于西线，而8月间美国对瓜达卡纳耳岛的征服已经成为远东方面开始反攻的标志。紧接着突尼斯战役结束、德军和意军溃败之后，就是德国对俄军的一次野心勃勃的进攻。在7月间开始，鏖战达三个月之久。面对着德国拼死欲一举击溃红军的努力，为在西线分散和牵制最大数量的德国兵力作出尽可能的贡献，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要了。

甚至认为打击希特勒的核心阵地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在法国登陆这种看法的最忠实支持者，也不能不承认在1944年春季或夏季以前这是不可能的。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尔都曾经向我说明他是如何热切希望尽速利用突尼斯方面意料中的胜利。虽然美国人对于这样深深地卷入地中海是否会耽延他们视为具有决定意义的在法国的进攻，疑虑重重，但是马歇尔将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大力支持下，至少就最近的将来而言，接受了丘吉尔的建议。历史或许将会记载下来这一点，即：由于美国

领导人对英国想设法避开在诺曼底直接登陆而希望通过地中海各国的“软腹部”以打击德国的意见，坚持抱怀疑态度，以致对突尼斯的胜利不能以原可期待的速度善加利用。我们的部队无疑缺少飞机，而尤其缺少登陆艇。加之，有五个师早已指定从11月1日开始调回英国。如果有登陆工具在意大利大陆各个不同地点可供迅速利用，无疑，我们原可省去从一个山区阵地至另一个山区阵地逐一进行的那种令人厌烦的代价很大的战役。英、美两国报纸在征服突尼斯之后都将表现出一定的不耐烦。我记得比德尔·史密斯曾向我抱怨说，他们似乎认为美国和英国的士兵有创造奇迹的本领。“耶稣基督也许能在水面上行走，我想我们的弟兄只能望洋兴叹。”

7月间，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到达阿尔及尔。他在同艾森豪威尔的讨论中清楚表明，虽然美国人曾经屈从英国，同意了非洲的远征，再度在卡萨布兰卡同意了进攻西西里的计划，而现在准备再一次同意对南意大利进行有限度的进占，以夺取有价值的飞机场为主要目的，但是他不认为应该再容许英国方面的任何地中海计划了。情况也没有因8月间的第一次魁北克会议而有所改变。总统下定决心要让英国人信守协议，不得以指定用于进占法国的任何部队转用于地中海。丘吉尔尽管力图为亚历山大取得一些额外的支援，但是对于这项义务的承担，却恪遵无违。亚历山大在军事上的声誉必须根据这种种困难情形而予以评定才是。整体战略观念，无论从军事角度还是从更广泛的政治角度来看，究竟是否正确，大概是无法作出定论的。但是它却使得许许多多的失望和挫折在所难免。原来满怀信心地期待于1943年秋季攻占罗马，就这样一直拖延到1944年6月间才得以实现。 365

虽然直到6月中旬我奉命在意大利事务方面象我过去在法国事务方面那样充任总司令的同一顾问性质角色时为止，没有给过

我任何正式指示,但是从2月初起,我就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卷入其中了。很多个月以来,意大利问题和法国问题所占用我的时间几乎是相等的,随着一个个星期的流逝,新形势变得越来越令人无暇他顾。这也使我和亚历山大将军有了更密切的接触,亚历山大将军在艾森豪威尔的最高权威领导下,担任了所有盟军部队,即最初通称为第15军团而在稍晚的一个阶段上通称为意大利战区盟军的得力的指挥官。

虽然对西西里岛的进攻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经得到批准,可是谁也不真正知道下一步该怎样走。虽然如此,从这一种或那一种形式看来,似乎我们应该进攻意大利本土;要么通过攻夺撒丁岛或意大利趾端,要么,更大胆些,在那不勒斯湾,甚至在罗马以北登陆。因此,从我的观点来看,参加目前正在伦敦和华盛顿为此所进行的民政方面的大规模准备工作不久就变得有必要了。

我欢迎所有这一切,因为我希望法国的风波一旦得到最后解决,我自己就可以转到新领域去。天呀,我对所需时间的估计是完全不正确的。直到1943年底我才能把我在法国事务的责任移交给首任驻法国临时政府大使达夫·库珀。甚至在移交之后,法国政府和地中海指挥部之间的很多问题,我还是不得脱身。

在这期间,在突尼斯战役结束之前已经着手的进占西西里的计划,不久就要加紧进行。当6月间陆军大臣格里格前来访问我们时,我们常常去亚历山大将军的营地。营地是设在离阿尔及尔大约三十英里的一座濒海的森林里。在这个引人入胜的地点,他的计划工作人员在辛勤地工作。

366 将军之讨人欢喜和富有风趣,一如往昔。他真正是一个第一流的人物。我越常看见他,就越欢喜他。我非常得意,因为我被选作为他的工作班子的一个成员,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整个战役中,我都可以随意到他

那里一同就餐,或生活在一起。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①

尽管我们专心致志于法国事务而不遑他顾,但是在整个6月中我还是一直不断地同他和他的幕僚商谈和会议。我常常去他的营地或者他来我们的别墅同我们一起进餐。这种经历后来证明是最为可贵的。

虽然我对陆、海军事务的详细情节不大了然,但我也认识到对西西里的进占是一个不可轻视的计划。撇开后来证明是巨大障碍的埃特纳火山周围高地上的坚强阵地不谈,这次军事行动也是具有头等规模的。在北非曾经取得了一些登陆的经验。同样,在“爱斯基摩人军事行动”中所学到的经验也证明对来年夏季“霸王军事行动”的设计是具有莫大价值的。

在开始进攻时,有将近三千艘船舰和登陆艇参加,分别载运官兵十六万人、车辆一万四千辆、坦克六百辆、大炮一千八百门。这些部队必须调集、训练、装备,以及最后从广为分散于地中海、大不列颠和美国的基地上,连同水陆两栖作战的庞大辎重一并登船起运。②

包括美国第7军和英国第8军(英国第1军已经并入第8军)的第15军团是在亚历山大的指挥之下。特德,象以前一样,指挥盟军的全部空军,坎宁安海军上将指挥盟国的所有海军。虽然“火炬军事行动”基本上是美国的事情,但是在“爱斯基摩人军事行动”中,正如在突尼斯战役中一样,英、美却保持着平等的伙伴关系。

在7月间可供利用的军队的比例是:英国,八个师;美国,六个师。空军:美国,55%;英国,45%。海军,英国80%。在所有这些之外,在中东和包括利比亚在内的地中海东部还驻有大量英国陆军,这是由梅特兰·威尔逊将军从开罗的英国总部独立指挥的。③

幸而指挥权问题并没有引起任何困难。所有英国指挥官,能在作

① 1943年6月14日。

② 丘吉尔:《紧缩包围圈》(《Closing the Ring》),第24页。

③ 丘吉尔,同上书,第25页。



为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将军领导之下服务,都不胜愉快;艾森豪威尔将军已经得到了亚历山大、坎宁安和特德如此之深厚的爱戴和信任,所以他对这个指挥结构不仅仅接受而且欢迎。

在进攻西西里的前几天,这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忧心忡忡的时刻,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文官来说,除默祝这次历史上空前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的胜利成功外,简直无能为力。

“登陆”——我们期待和担心已有几个星期之久的那一天,我无法安眠,我发现我们当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安然入睡,因为我们都在想着船舰的云集及其所运载的宝贵生命。……因为这支无畏舰队是从东面的亚历山大港和西面的英国各港口出发的,所以这的确是一桩了不起的行动。

气候条件不大妙。波涛滚滚,西北风时速二十五至四十英里。这对东南海岸的登陆麻烦虽不太大,但是对南海岸和西南海岸方面却令人头痛之至。在头几天包括登陆在内的这一切行动中,我想只损失了三艘商船、一艘医疗船(是在全船灯火明亮情况之下被炸毁的——这纯粹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一艘美国驱逐舰和少数几艘登陆艇。<sup>①</sup>

我早已决定把自己安置在突尼斯的一个前沿阵地上,在那里,我既可靠近军事行动的指挥官们,而且艾森豪威尔又在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别墅。我们非常幸运,在城外不远的拉马尔萨地方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地点。我先已派约翰·温德姆偕同萨金特·布朗去找一个居住和设办公室的地方。他以往常那样的效率办妥这件事。因而,我在7月10日晨就偕同哈罗德·卡奇亚动身去突尼斯。

我们住在旧“领事住宅”的一部分房屋里。我们占用了楼的一翼——其中包括一个带有华丽圆顶的轩敞的起坐间,一个我们目前用作为大厅的大餐室,三、四间卧房,几间供办事员、司机等等居住的仆役室和一个办公室。

---

<sup>①</sup> 1943年7月10日。

这一翼是自成格局的，并自有其进出口。这幢房屋的正中是一个中央大厅——大约六十英尺，高二十英尺上下。这是一个真正漂亮的房间，有精美的大理石地板，瓷砖墙和华丽彩绘的天花板。外面是一个带顶篷的大凉台——面积约八十英尺乘三十英尺——另一翼则通到大厅外面。在这一翼中有三个精致的客厅。凉台的屋顶非常华丽——多少有点褪色了——但具有优美的阿拉伯风格。我想我占用的这一翼可能是这幢房屋最古老的部分，或许是阿拉伯人时代的内宅。餐室墙壁上的瓷砖非常美丽。这间餐室也有一个圆拱的天花板，装有令人喜爱的阿拉伯风调的窗饰。<sup>①</sup>

“领事住宅”是英国势力在突尼斯占支配地位时期突尼斯统治者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礼物。它一直由英国领事使用，除开在德国占领期间，被德国人用作一个师的总部；我不胜高兴地发现了一批非常合用的、没有动用过的英文书籍，其中包括迪斯雷利的小说。

约翰乘坐小轿车来了，一切都准备妥齐，骗来或偷来了一些家具。我们得到了几块地毯，这是两位犹太头面人物（亨利·斯马格达先生和莱维·德帕先生）认为我从来到北非之后，替犹太人作了一些事，为了酬谢我而赠送的！<sup>②</sup>

另一翼供作军官们的休息室之用，那是一个宽敞的大厅。凉台成为散步和谈天的一个舒适场所。亚历山大将军的总部设在住宅的后面，占用着宽广的花园和设有帐篷和篷车的几处牧场。

这个前哨站是我们迄当时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地点，我由于职务关系和法国问题的要求而不得不有违本愿地常常回到阿尔及尔。在这里沐浴妙不可言，当亚历山大将军在的时候，他和我经常每天早晨7点钟去沐浴。这里也是游览胜地，因为迦太基的遗迹相去不过两、三英里，还有罗马的剧院、斗技场合残破的导水管可供凭吊。 369

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早已作出辉煌成绩的北非经济委员

<sup>①②</sup> 1943年7月10日。

会，在突尼斯以同样的效率发挥其职能。但是有很多问题有待决定，并且在等待进一步的消息时，我发现有很多事情要做。

高级指挥官及其幕僚开始在突尼斯聚齐。西西里战役，虽然艰巨，却一帆风顺。自然，在一开始迅速挺进之后，在埃特纳火山周围的高地上，胶着状态势将难免。但是在7月17日来自马耳他的亚历山大似乎感到满意。

他真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纯朴、谦虚和坚定构成一个极其具有魅力和感动人心的整体。象很多身负他那种重任的人一样，他端赖倚靠他那对胜利的坚定信心<sup>1</sup>和上苍护佑的单纯而完全的信念。他告诉我一件有关登陆的趣事。当他们——艾森豪威尔、坎宁安、特德和他——全都在马耳他从星期五夜一直等待到星期六凌晨的时候，他们大家对于大出意外的（就这个季节来说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暴风现象都惴惴不安。风速从每小时二十五英里增为四十英里，他们为可能对于登陆产生的意料中的影响万分着急。事实上，这却证明是一个双重有利时机。第一，敌方认定在这样一个夜晚不可能试图登陆。被俘的意大利将领之一把它说成是一个“睡衣之夜”，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完全是可以高枕无忧的一夜。第二，海水在巨风推波助澜之下把登陆船艇平安送过沙滩，否则因为有很多表面上看不出的暗礁，就未始不会成为严重障碍。<sup>①</sup>

不幸，暴风雨严重地影响了空运部队的登陆。英国第1空运师大部分将搭乘美国飞机所载的滑翔机登陆，但是由于风力太大，这些计划进行得极不顺利。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370 突尼斯的生活是极其令人愉快的。

这里很象是一个宽广的乡村住宅。人们可以来进餐，也可以来办自己的事。这里有许多恬静赏心之处可供享受——游览风景、沐浴、或同其他来此作客的人促膝长谈。万里无云的长空、深碧令人倾心的海洋、徐徐拂面的轻风、真正八月的天气、凉爽宜人的秋夜。没有庸人自扰，没有愁闷烦心——有的只是伟大战役的进展！从来不提到这一点，但是都

<sup>①</sup> 1943年7月17日。

了解是在顺利进行中。谈吐是高雅的（而且有些是非常高雅的）英国人的寻常格调——谈点历史、谈点政治、谈点笑话、谈点哲学——都是蜻蜓点水，一掠而过。……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令人神往的经历。非常偶然地有一位军官走进来，带给“老总”一封电报。出于礼貌，等着正在进行中的谈话告一结束——或谈论贝利萨里厄斯<sup>①</sup>的战役，或谈论古典式建筑优于歌德式建筑之处，或谈论如何在平野追逐野雉使之展翅开屏方是正确办法等等——停下了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亚历山大将军向我们打过了招呼，便开阅电报，阅毕再放进口袋，就原来的话题再继续略谈几分钟，然后，如果这封电报要求采取什么行动的话，他便很客气地向客人告辞；这正象一位绅士在夫人、小姐们离开客厅去就寝之后，拿起烟斗之类的东西，离开他的吸烟室或书房，对他的管家打一个招呼一样。

我从来没有如此多地欣赏过英国式的客套和涵养。<sup>②</sup>

离开那个酷热的阿尔及尔城的确是一件最令人快慰的事。在那里，港口终日熙熙攘攘，大公寓、别墅和贫民窟都挤在一起，有着过分打扮或不事修饰的妇女、政客、新闻记者、商人等形形色色的人，这是一个半时髦的社会，是一个仿造式的都市。在突尼斯，虽则是一个几乎完全男性的社会，然而，对于工作来说，却是恬静的，尽管炎热，也不失为惬意。我住的那幢房屋的各个房间建造得妙不可言，虽无现代化设备，依然比较凉爽。我们常常同朋友一起进餐。统率美国第5军的克拉克将军有一幢很漂亮的别墅，并且设法找了几位女伴来款待我们。“埃尔朗热”别墅是由盟军空军副司令“图 371 伊”·斯帕茨将军占用，他由于这幢非常舒适的、多少带点异国情调的住宅博得的赞美而大出风头。有一天，我们自己以极大的勇气举行了一次宴会，主要是招待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的英国居民。其中也有一些是我们拉来的马耳他人。领事馆的几位年轻职员前来协助我们，虽然有从南方吹来的非洲热风，但这次宴会还

① 东罗马帝国的大将，生于505年—565年。——译者

② 1943年7月18日。



公认是很成功的。亚历山大顺便进来转了一下，这给人以无限快慰。在另一天晚上，由大部分是西西里人和那不勒斯人的意大利战俘在音乐会上给我们唱了几支令人极其心悅神怡的歌曲。

他们拉手风琴，并唱了一些二重唱、三重唱、合唱等等，有抒情歌曲，有喜剧歌曲。他们看上去很快乐，很安心。<sup>①</sup>

亚历山大邀我参加他在作战室举行的晨会，这一例行办法就是在突尼斯开始的。作战室备有各种各样的地图可供利用，并由他手下的一位军官报告战事的最近消息。直到这次战役结束时为止，只要我住在总部或附近，就给我以这种特殊荣幸。

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这时因亚历山大班子里英国军官所占比例太大而感到有点不安。在他看这似乎“不够一体化”。我答应就这个问题同亚历山大一谈，但是非常坦率地对比德尔·史密斯说，如果他们认真其事的话，那么他应该提出几位比较更优秀的美国军官。结果，他派给亚历山大一位杰出的美国军官作为副手，此人后来身跻高位，并且卓著功勋。这个人就是兰姆尼兹将军。初见之下，我们大家就都欢喜这位“兰姆”。

在7月25日，星期日晚，我同我们11月登陆的老友、现任突尼斯总督的马斯特将军共进晚餐。我曾经成功地劝请国务大臣为这位官员请得一枚服务成绩优异的勋章作为奖励，他对于他的劳绩所得到的这种褒奖非常高兴。晚餐后刚刚回到家里，我正在阅读，接到在情报处服务的马特利海军中校的电话，告诉我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我去到饭厅，但是除比利·斯科特<sup>②</sup>之外没有一个人。无线电通话发生巨大的故障，但是我们终于听到了午夜的新闻（无疑是英国广播电台的海外广播），证实了墨索里尼不是辞职

① 1943年7月19日。

② 海军上校威廉·斯科特勋爵，1935—1950年罗克斯巴勒郡和塞耳扣克郡下议员。

就是解职的消息,但是没有报告详细情节。

我不知道是否值得去惊动亚历山大将军好让他高兴,最后还决定不去了。我认为这在他们那班人里会是不礼貌的,因为……那里不允许以战争消息来干扰谈话和社交上的礼仪。所以我就痛快就寝了。……<sup>①</sup>

这是星期日的夜间。第二天早晨7点钟,我照例和亚历山大将军一起沐浴。“我告诉他关于墨索里尼的消息——他看上去很高兴!”<sup>②</sup>

上午8点,艾森豪威尔将军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刻到他的别墅去。他心情相当振备,满腹计划和想法,以期利用墨索里尼垮台所造成的局势。迄当时为止,除墨索里尼已经垮台外,我们对罗马所发生的情况并没有很清楚的了解。现在对于墨索里尼倒台的经过以及错综复杂的阴谋和反阴谋则已深知其详了。似乎是有两个阴谋,第一个出于法西斯运动内部,第二个发自宫廷。格朗迪伯爵坚持召集的法西斯代表大会正式会议,以要求恢复国王先前让与墨索里尼的武装部队的统辖权这一丢脸的表决而告终。说来奇怪,看起来,墨索里尼并没有因这种成为不详之兆的、拖延不绝的辩论而过分心烦意乱。当他在第二天去王宫时,国王对他容忍了那么多年的这个独裁者的罢黜和逮捕工作早已经作好了仔细的准备,并且正在巴多利奥元帅和他的王宫大臣达夸罗内公爵的辅助下进行着另一个殊途而同归的阴谋。这个独裁者相当天真地落网了,并且已经——至少暂时是——退出舞台。自然,所有这一切都是随着各式各样和平使者的开始到达而泄露给我们的。

在这期间,局势仍然不清。巴多利奥就职后所发表的声明,只 373  
说:就意大利而言,战争将继续下去。这时他既经国王任命为政府首脑,于是便呼吁意大利武装部队和人民服从新政府的命令。但

① 1943年7月25日。

② 1943年7月26日。

措辞都是官样文章,并无动人之处;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对墨索里尼的去职作简单的解释是正确的。意大利人民要求和平。他们的问题,实即他们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如何得到和平的问题。天呀,意大利是没有方便的出路的。三分之二的意大利军队派驻在王国境外,或在巴尔干或在法国南部。在意大利本土只有大约十二个意大利师。甚至在7月底,德国的兵力就已经达到八个师之多。它不久就要得到决定性的增援。而且,在意大利中央机构中窃据要津的德国代理人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据我们不久就与之发生接触的一位意大利和平使者的说法,这个数字已高达一万之多。据料其中大多数是在罗马。巴多利奥政府也没有多大权威。巴多利奥无疑是一个有相当声望和名誉的人,但是已经老夫髦矣——一个“意大利的贝当”罢了。在他选拔到他身边服务的人们当中,似乎没有一个是年轻有为的。

盟军的形势又如何呢?据亚历山大估计,在8月中旬以前,西西里未必能完全征服。此后有待于尽先付诸实施的进攻那不勒斯地区的计划,业经制订。但由于调集登陆舰艇和空中掩护方面的种种困难,在9月上半月以前发动这次新的远征是无法指望的。甚至在9月上半月,那也会是一个成败莫测的、冒险的军事行动。我们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和这个背景下讨论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这次戏剧性事件——两个大独裁者之一的垮台——来促进我们的军事计划的。提出了两项建议。第一项是,应该由艾森豪威尔向意大利人民发表一次广播,着重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要强加以侮辱性的条件。第二,最最迫切的问题显然是,艾森豪威尔必须掌握一些可以代表盟国政府提出的具体条件,如果要进行接头的话。在这个阶段上,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盟军总部既未被授权又未奉到指示。固然,伦敦的盟国委员会久已在拟具一项约有四十款的庞杂草案,并已送请美国政府考虑同意。但

是迄今未作出决定。而且这项文件中的致命缺陷是，它假定，一个愿意投降的意大利政府，因为意大利地理上有着天然的优点，可以这样作而无须顾及德国。

我应命就这两点草拟致英、美两国政府的电文。关于对意大利人民的声明的第一份电报已于第二天发出。关于第二点的电报则是拍给参谋长联合会议的，于次日发出，提出十项简单条件，这是为了在真正进占大陆以前，如果意大利新政府提出任何停战要求时，好迫使他们屈从。这些条件终于成为著名的“简单条款”的基础。

正如人们可以想象的，关于这两点都有大量的电报往来。最后，虽然罗斯福和丘吉尔这两位首脑有着不欢喜由艾森豪威尔将军发表广播声明的想法，但是他所拟的声明文稿还是得到了同意，而且在7月29日这项声明也及时播发了。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成功地争取到对停战条款的同意，以备万一之需。

在这些“简单条款”中最具有决定性的要点之一，就是我们应该要求意大利政府怎样对付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国军队的问题。事实上既然是那样的势均力敌，那么在任何盟军能登上大陆之前，就要求意大利政府使在意大利领土上的德国部队不得调动，并且把它们交出来，这显然是作不到的。经过多次往返磋商，遂决定，我们所能适当要求的，就是意大利政府必须“尽最大努力拒绝给予德国提供便利抵抗联合作战的国家”。

“简单条款”是纯军事性的条款。但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奉命，<sup>375</sup>如果有人前来接头的话，一定要清楚说明，凡涉及政治、经济和财政问题的那些更详尽、更全面的要求，将于以后提出。“详细条款”——是设计人员的美梦，而是将军的恶梦——却仍然是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之间一个需要磋商的问题。

自然，在居于现场的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精心推敲出来的办



法都是大大脱离实际的。然而，在巴多利奥元帅政府成立后的最初三个星期中，并没有进行任何直接的接头。他竭力树立他的权威，清除某些最坏的法西斯分子。他反反复复声称意大利不可能接受“无条件投降”，以尽其所能来约制意大利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然而，正如1917年俄国人民那样渴望和平，这时意大利人也简直不管什么法西斯主义、国王，还是巴多利奥，只想得到和平了。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和平。不幸的人民！他们还要在战争的水深火热之中差不多再忍耐两年。

我陪同艾森豪威尔回到阿尔及尔，我们望眼欲穿地等待我们政治首长的回音。在这些令人坐卧不安的日子里，很多新的、棘手的问题又开始以愈益加剧的速度来折磨我们。在7月28日，我记载如下：

这是度日如年的一天。我在办公室从早8点一直耽到晚8点。电报如雪片飞进飞出。我们现在正试图把两只球——法国和意大利——保持在空中。每一只都居于关键性的地位。<sup>①</sup>

第二天，同样紧张，但结果并不是不令人满意的。

我从9点到12点都消磨在往返于我的办公室和盟军总部之间的途中，以及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和比德尔·史密斯的会谈上。……可怜的艾森豪威尔已弄得越来越狼狈不堪。电报（私人的、亲收的和最紧急的）从下述各方面纷至沓来：

- (i) 参谋长联合会议（华盛顿），他的高级主管人员。
- (ii) 马歇尔将军，美国陆军首脑，他的顶头上司。
- (iii) 总统。
- (iv) 国务卿。
- (v) 我们的首相（直接的）。
- (vi) 我们的首相（通过我转交的）。

---

<sup>①</sup> 1943年7月28日。

(vii) 外交大臣(通过我转交的)。

所有这些指令自然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所以,比德尔和我要在会客室里耍一套把戏,把它们分类,然后分别作复,说明我们认为应该怎么办。由于我们的想法同(i)、(ii)、(iii)、(iv)、(v)、(vi)或(vii)所拟具的办法极少相符之处,所以很多有趣的事随即发生。但是这却弄得人有点心力交瘁,尤其是在炎热的天气中。①

中午我们同宣传专家举行了一次会议,试图把有关意大利的政策确定下来。

幸而,在这方面我们有两个可钦佩的人员——才华出众、兴致勃勃而又忠诚可靠。他们是[查尔斯]杰克逊(美国人)和迪克·克罗斯曼(英国人)。②

在这期间,亚历山大已经离开突尼斯前往西西里岛。他邀我到他的营地去,但是由于在法国战线和意大利战线上事情很多,我不能不留在艾森豪威尔身边。

仅就意大利而言,我们的计划是简单的。我们暂缓轰炸意大利人。我们由总部发出一份相当“温和的”电报。我们说:“干得好,国王。干得好,人民。你们已经驱除了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这是了不起的事。是时候了,干你们所需要干的事情吧。”

如果(照我想很可能)巴多利奥试图拖延,而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直接或间接求和的表示,那么我们的话(在稍稍等待之后)就要不客气了——我们就要说,“好,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国王你在干什么呢?巴多利奥你又干什么呢?不前进就滚开。你们一直无所作为,那么我们只好忙碌起来。我们将要轰炸热那亚、那不勒斯、博洛尼亚、米兰、都灵、罗马。那将不是我们的过错。那将是你国王和你巴多利奥的过错。”③

这一做法使我们在国内遭到很大的麻烦。首相常常为之大发雷霆。在这期间,我们仍然等待西西里最后一战的结果。正如我当

①② 1943年7月29日。

③ 1943年7月30日。

时记载的那样，“宣传可以作为一种对胜利善加利用的极好方法，但是宣传必须踵随胜利之后，而不能走在胜利之前。”<sup>①</sup>

377 第二天，8月4日，我们仍然没有得到有关战事的新消息，但是同伦敦和华盛顿的电报战却不间断地继续着。

在总部、伦敦和华盛顿之间仍然有大量不必要的电报往还，我同统帅和参谋长一起捱过了决不轻松的若干小时。艾克因为在每一个可以想象的问题上不断受到电报告诫的压力而弄得心烦意乱。非洲的热风又继续不停，我们大家都渐渐……临近边缘，因而对一点不重要的小事故就会被夸大其辞——小题大作。<sup>②</sup>

在西西里方面，8月5日攻下卡塔尼亚，战事看上去已临近尾声。即使如此，内部麻烦还是不少，虽不重要，却令人恼火。

……英国广播电台曾经犯了使美国人大为狼狈的可怕“失言”。有一天他们说第7军“在西西里除了吃西瓜喝酒鬼混之外，无所作为”。这引起了一次极大的“骚动”。<sup>③</sup>

在同一天：

……在就意大利和未来的若干相当棘手问题作了一番长谈之后，艾克对我说，“我希望你能让首相了解我的观点——否则，至少我希望我能清楚了解他想要的是什么。”

不幸，曾经有很多小事故致使双方大动肝火（这是非常自然的）。首相认为艾克太欢喜“宣传”，发表了太多的“声明”和“告意大利人民书”。在另一方面，我们这里有庞大的宣传机构，并且还有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广播装置，不去利用似乎是可惜的。<sup>④</sup>

在所有这些困难和变化莫测之中，艾森豪威尔将军力促我回返伦敦，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因而，交通工具一安排好，我马上就从阿尔及尔动身，于8月8日，星期日凌晨抵达普雷斯特韦

① 1943年8月4日。

②③ 1943年8月6日。

④ 1943年8月6日。

克。在国内度过的几天使我得以对我伦敦同僚的焦虑和希望有了清楚得多的了解，并把我们在哪里所遇到的当地的困难也给他们作了一番说明。

停战“简单条款”终于获得解决，虽则关于“详细条款”的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中，但是如果素有信誉的意大利人士出面接洽，艾森豪威尔将军这时有权同他们交涉，这是毫无疑问了。我也能够稍尽绵薄向伦敦的大臣们解释艾森豪威尔将军是如何焦急和为难的，并可力主应给以更大的回旋余地。

因为丘吉尔已从海路前往参加魁北克会议，所以我没有见到；但是我同艾登曾作了几次长谈，他照例抱同情态度并且多所帮助。我向他解释说，如果魁北克会议能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导致对法国委员会的正式承认，那么历史上的一个肯定的阶段就算过去了。虽然我无疑会担任第一任驻委员会的代表，但是我宁愿尽快移交给一位大使。没有受到最近几个月倾轧的牵掣的一个新手会方便得多。而且这样才好让我集中精力于意大利事务。艾登在原则上同意了这项建议，虽则实际上还要再过几个月才能予以实行。

首相曾经从魁北克给艾森豪威尔将军拍发一封豁达大度、劝慰有加的电报。结果，当我在周末返抵阿尔及尔见到将军时，他的心情比较舒畅了。

在这期间，事态进展很快。意大利投降的悲喜剧是通过若干的剧幕和场景而展开的。首先是一些“试探者”。这是在巴多利奥上台几个星期之后开始的。在这个阶段上，意大利公使馆的新任参事戴耶塔侯爵曾经在8月3日同英国驻里斯本大使有过一次试探性的商谈。6日，意大利外交部参事贝里奥先生同英国驻丹吉尔总领事以同样的言词进行了一次商谈。这两次探询人的主要不同之点是，前者没有提及和平条件，而后者自称被授权同丹吉尔的任何英国官员或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代表进行谈判。还有其他各



式各样的人等卷入了这一幕。我们从希腊方面得知，驻伯尔尼的教皇使节曾经进行过接头。此外，有一位布塞蒂先生拜访过我国驻巴塞罗那总领事，自称是左翼各不同政治派系的正式联络员。因为丹吉尔方面的接触看上去最有希望，所以我国驻丹吉尔总领事（乔·盖斯科因）奉命在8月13日提出下述答复：“巴多利奥元帅必须了解，我们不能谈判，而只能要求无条件投降，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说，意大利政府将自己置于盟国政府支配之下，然后由他们宣布他们的条件。这些条件将给予体面的投降。”他还奉命提醒贝里奥先生，“首相和总统已经声明我们愿望意大利不久就应在重建和平后的新欧洲占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并且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曾声明，如果在意大利人手中的全部盟国战俘获得释放，那么，在突尼斯和西西里俘获的意大利战俘也将予以释放。”贝里奥先生看上去对于这个答复颇为失望，但是他说，他将转陈罗马。所有这些多少带点试探性的探索，不久就将被比较实质性的谈判所取代。第一个或第一对和平鸽就要展翅飞翔了。

8月15日，安布罗西奥将军的参谋长卡斯泰兰诺将军和意大利外交部的蒙塔纳里先生拜访当时任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卡斯泰兰诺是一个职业军人，在墨索里尼夺取政权以前就已经在陆军中供职。所以他象巴多利奥一样，是属于老卫士派的。他在去里斯本的途中是以陪同智利外交官和领事等一行人的一个意大利代表团为掩护的，这些外交官和领事将于里斯本与一批意大利官员进行互换，这批意大利官员是在智利同它断绝外交关系后离开智利的。他们备有为这个目的的一个集体签证。卡斯泰兰诺将军随身携带有令人满意的证明文件。因为他携有我国驻  
380 罗马教廷公使达西·奥斯本爵士签名的一封介绍函，担保他是意大利政府的代表。达西爵士更以一份电报予以证实，电报中叙明他本人手里有着巴多利奥授权卡斯泰兰诺代表他发言的一张签名

的声明书。所以，他无疑享有意大利政府本身所赋有的权限。

艾森豪威尔、墨菲和我以愈益焦躁的心情等待我们的指令。8月18日晨，参谋长联合会议的指令及时到达。从盟军总部派来两位官员将立即前往里斯本去同卡斯泰兰诺将军进行接触。艾森豪威尔决定派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和一位英国军官，当时任情报组组长的斯特朗陆军准将前往。斯特朗为人精明强干，一直是春风得意，官运亨通的。他们将在当天下午2时乘飞机启程。于是这个炎热上午的下余时间就消磨在闲聊逗趣中了。他们必须搭乘一架英国民用飞机。平民证件必须准备齐妥。他们必须身着便服。因为如果他们公开抵达里斯本，那么国际新闻界和德国特务机关马上就会把他们看穿。幸而这两位军官的姓氏都是一般常见的。把教名和照片变了一下戏法，各种混得过去的证件在午饭前就都制备妥当了。即使如此，参谋长还是有一些想不到的问题。墨菲认为参谋长最好使用前几次旅行曾经发给他的美国外交护照。在我看，这是一个很不高明的主意，因为把他叫作“比德尔·史密斯”，而把他的最近亲族说成是华盛顿陆军部的高级副官——对于一个英国商业推销员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亲戚。但是，当他们到达直布罗陀时，总督给他准备好一张令人满意的英国平民护照，并且不费吹灰之力就为他和斯特朗安排了葡萄牙的签证。我对于英国人在这套把戏上证明是行家这一事实抱着一种爱国主义的愉快心情，而我们在这方面却常常被看作是外行。艾森豪威尔于是请我在阿尔及尔和罗马之间的交通渠道方面予以协助。这项重要联系的建立和此后几个星期保持不垮，又一次是靠了英国的手段。为这两位官员准备的服装没有出现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但是还是有令人好笑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比德尔穿着他设法在阿尔及尔买到的那件骇人的诺福克式上衣和那条很不合身的灰色法兰绒长裤。他弄到一顶上面插有一根羽毛的怪里怪气的礼

381

帽；但是我劝他把那根羽毛去掉，告诉他没有任何一类的英国旅行家会戴着这种不伦不类的装饰品漫游的。肯尼思·斯特朗没有找到使他中意的阿尔及尔做便服的裁缝，并且照样以一种简直不会有人穿着的服装穿戴起来。然而，他们闯过来了，并且平安归来。

当他们同意大利密使会晤时，他们发现形势和他们所预料的多少有点不同。比德尔·史密斯一上来就说，他了解卡斯泰兰诺将军前来是表示意大利政府要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并进而给他以军事停战条款，即我们所谓的“简单条款”。但这无论如何不是意大利方面的本意。他们与其说是关心停战条款，不如说是关心新同盟的条件。卡斯泰兰诺清楚表示，他们正在设想意大利政策的改弦异辙：他们愿意放弃他们和德国的同盟，而参加到英、美方面来。这会是一种新的“结合”，并且他相信是一种非常可庆幸的结合。幸而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得到一些暗示，参谋长已成竹在胸，准备了一套话来应付。他所用的处方是，既不许给意大利人以任何诺言，而又同时指出：他们表现得越好，就越能牵制德国人，将来就越有他们的功劳。这实际上是后来变成“将功赎罪”那句公认的成语和最后成为“参战友国”的开端。在意大利人那一方面，他们希望所有这一切将在最终签订和约时把他们置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这点我们是了解的。在我们这方面，则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特别是争取到兵不血刃的登陆，并在我们面临的非常艰巨的军事行动中破坏和阻滞德国的交通运输；这点他们猜到了。尽管有这些顺心的事情，然而我们的代表却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实际上可能考虑任何改善条件的问题之前，意大利人必须接受军事条款。因为智利和意大利外交人员的交换不能在三、四天之内完成，所以一定的耽延是难以避免的。卡斯泰兰诺没有特殊签证不能单独旅行，从而引起对他本人的注意。所以，最早他也不能指望在8月25日以前或许更迟些到达罗马。因而在8月30—31日以前



准许他通过即将在罗马和盟军总部之间安设的特殊无线电装置传递他的答复。意大利政府会接受停战的军事条款吗？这是一切取决于其答复的一个紧要问题。

我常常想，我们容许他们以较长的时间——十天——去打定主意，或许会给意大利方面以这样的印象，认为我们在大陆登陆的日期还相当遥远。这也许影响了他们后来的判断和行动。但这却是无可避免的。

既然在这出闹剧下一幕揭开以前这时看上去还有一段间隔，所以我就欣然应亚历山大之邀去访问锡拉丘兹了<sup>①</sup>。西西里之战这时已经告捷。在三十八天之内攻占了全岛。防守这个岛的有十三个师以上的兵力——共总四十万人，其中德国人有十万左右。曾以十三个师进攻该岛，然而鉴于海岸线长，再加上碉堡和铁丝网的防御工事以及这带地方的深谷、峭壁和隘口等防守方面所占地利这种种困难，胜利如此之速，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盟军的伤亡计死、伤和失踪共三万一千人。敌方的伤亡据说是十七万人。

哈罗德·卡奇亚和我于8月21日凌晨启程：

途经班泰雷利亚岛和兰佩杜札岛，跨海而来在欧洲登陆，确是一件趣事。自从我们被赶出希腊以来，一直没有任何英国军队在欧洲作战……现在登上欧洲土地，实令人心潮澎湃，不胜激动之至。<sup>②</sup>

我们在中午到达锡拉库扎附近卡西比莱地方的将军总部。他的幕僚照例是住在帐篷里，这一次是支设在一系列有围墙的果木园中。“亚历山大本人住在他习以为常的两个篷车里——一个作为他的办公室，另一个作为他个人起居之所。”<sup>③</sup>我一到就马上将形势的发展向他作了说明。在应邀共进午餐之后，我对他幕僚中的重要人员就形势发展作了概括报告。

<sup>①</sup> 原文 Syracuse〔锡拉丘兹〕，疑系 Siracusa〔锡拉库扎〕之误。——译者

<sup>②③</sup> 1943年8月21日。



哈罗德·卡奇亚和我住在叫作“白宫”的宾馆里。这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农舍，亚历山大初到西西里时，曾接收下来自用。但作为总部太小……所以留作招待上宾之用。另有一个叫作“良田”的营地，招待不那么受尊重或不那么受欢迎的客人。

这个农场有两间很不错的起坐间和一间大厨房。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粉刷过等等)，成为一个非常小巧可爱的地方。房屋后面是一个葡萄园，周围有一个可爱的菜园；这块地产栽有橘树、橄榄树、杏树——蕃茄、谷类等等则杂植于树木之间。

在农场外面，有一些通常的附属建筑物……一株参天的老橄榄树，可以在下面歇凉(也有一些大无花果树)，这就构成了全貌。每天早晚，一头毛驴带动一条杆子不停地转着。这是一种车水的操作，把水从深井提到一个小小的蓄水池或水塘里面，然后从中流进一个挖有小沟小渠的精心设计的灌溉系统，这种灌溉系统就是塞奥克里图斯<sup>①</sup>和维尔伊尔<sup>②</sup>所描述而无疑可以追溯到极其久远的时代的。这是一种令人快慰的声音——一种随着潺潺水声之后的机器卡搭声。<sup>③</sup>

我们用自己随身带来的行军床和睡袋睡在农场后面橄榄树下的帐篷里。下午，将军陪同我们乘吉普车去锡拉库扎游览。先去一座大教堂，环绕着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庙宇建成的一座七世纪的教堂，里面全是应用于基督教建筑的古希腊多里克式的大圆柱。继而去一座希腊剧院，这是残存下来的最美丽的剧院之一，据说埃斯克勒斯<sup>④</sup>曾经在这里演出过《波斯》一剧；然后又去到囚禁可怜的雅典战俘(不幸的西西里远征的劫遗)所在的采石场。

384 8月23日，我们飞回阿尔及尔。到这个时候，在第一只和平鸽得以回返触礁的方舟意大利政府以前，另两只和平鸽已经放出来了。

① 希腊田园诗人，生于三世纪。——译者

② 罗马诗人，生于公元前70—19年。——译者

③ 1943年8月21日。

④ 希腊悲剧作家，生于公元前525—456年。——译者

8月24日，意大利政府对于卡斯泰兰诺将军迟迟不归无疑感到焦急，于是派出第二个使团，还是去里斯本。当时我们称之为“第二批和平鸽”的这个使团，包括有罗阿塔将军的主要助手扎努西将军和一位叫兰扎·迪特拉比亚的先生。为证实他们的诚意，他们带了一位英国战俘卡尔东·德维亚尔将军同往。丘吉尔曾经详细叙述过有关德维亚尔于扎努西使命失败之后，要求重返战俘营而被拒绝这一侠风义举。<sup>①</sup>顺便提一句，把象这位英国将军这样知名的一个人送到里斯本，似乎是一种奇特的想法，因为撇开他的名声不谈，他遍体伤痕这种可怕的特征，使人一望就可以认得出来是谁。扎努西奉命，如有可能，即前往伦敦。但是，英国大使不愿协助扎努西，因为他认为这会使早已同卡斯泰兰诺准备妥的谈判复杂化。但是，扎努西躲在这个班子的一个人的住所里，被关照要暂且留在那里。

在这期间，伦敦和华盛顿对于投降文件的全部四十二款已经终于获得一致同意。这是一个洋洋巨著，包括政治、经济和财政各方面的详细条款，几乎把意大利事务的每一方面都无限期地置诸盟国手中。8月27日晨，英国大使根据所奉训令把这些严厉的条件送致扎努西。扎努西草草阅读原件之后，一方面表示除将这些要求送呈本国政府之外别无其他抉择，而自己对于决定强加意大利以这样公开、这样凌辱性的投降是多么难受。“简单条款”他们可以轻易接受，因为那实质上是一个军事停战协定；但是这时交给他们的“详细条款”文件却要引起大得多的困难。所以他力请把史密斯将军和卡斯泰兰诺将军之间商定的时间表推迟，以便给他的政府多一点考虑时间。他还警告大使，德国在意大利的兵力正在加 385 强，一种严重的——或许无法控制的——形势正在发展中。

在阿尔及尔，我们也从专门的来源得到了德国兵力日益增加

<sup>①</sup> 丘吉尔：《紧缩包围圈》，第96—97页。

的消息。英、美两国的所有有关的指挥官都一致认为：所拟议的在那不勒斯地区的登陆，由于涉及的军事困难太大，所以在发动攻击之前缔结停战协定，其价值几乎是怎么说都不为过分的。所以大家都是属于“简单条款”派。

因而，我把这种意见力陈于伦敦。如果提出“详细条款”，如我所担心的那样，将造成象妨碍停战协定签字那样的困难，那么，我们就应该满足于已经通知卡斯泰兰诺的那个“简单条款”。由于丘吉尔仍在国外，我收到了代表战时内阁的艾德礼的一封不得要领的复电。他和他的顾问们殷殷寄望于“详细条款”，那是几个月来熟审慎筹的结果。如果由于军事方面的急需，那我们不妨签订“简单条款”，但是根据明显的情况，我们必须把这看作是一个军事协定，因而须尽快以综合的、全面的投降条款予以取代。艾森豪威尔特称之为“不正当的交易”。至于我，则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决定相机行事。无论如何，西西里距离白厅是相当遥远的。

政府中我的同僚要我们不顾军事情况，不惜任何代价勒取这些近乎野蛮的条件，这种态度，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在一艘船上经过了三、四天的夜航（而且有一半时间恶心晕船），然后从这艘船上往一个设有防御工事并埋有地雷的海滩上登陆，我倒希望他们当中能有几位来尝试一下！<sup>①</sup>

第二个紧要之点就是要保证对卡斯泰兰诺的答复的计划坚持下去。他所关切的自然只是军事停战协定。与此同时还有如何打发扎努西和他的朋友的问题。不同于卡斯泰兰诺，他们未携有英国或意大利当局的任何介绍函，也未携有任何证明文件。最后决定把他们带到阿尔及尔，安置在多兹·帕克上校统辖的秘密作战处的一个营地里。希望这样可以使整个事件保守机密。所有这些都是激动人心的，尽管事情纷如乱丝——任何侦探小说都望尘莫

<sup>①</sup> 1943年9月5日。

及。阴谋、反阴谋和交叉斗智与日俱增。在这种神秘的气氛中，越来越难以给我们可钦可敬的宣传组下指示了。我想，迪克·克罗斯曼对于正在发生的情况已略有觉察。

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小伙子，工作出色。美国人（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之外）欢喜他，虽则……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者常常使他们吓得魂飞魄散）。①

但是我们对意大利人民采取什么方针呢——硬呢，软呢，还是软硬兼施呢？

因为这段时期是和有关正式承认法国委员会的最后安排相始终的，所以相当紧张。虽然如此，我还是挤出时间到多兹·帕克的营地去看扎努西和迪特拉比亚一趟。他们实际上是一对相当讨人欢喜的人。晚饭前我们同他们一起去沐浴，并且和他们一起消磨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虽然他们没有任何正式文件，但是他们力称自己是诚实可靠的，而且他们似乎认为我们应该以他们开诚公布、推心置腹的态度作为这一点的证明。他们顺便对墨索里尼的垮台向我们作了他们自己的一番叙述。扎努西接着往下解释说，“这象是一幕你们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先有一个阴谋，既而阴谋之内又有另一个阴谋。先有格朗迪的阴谋——继而又有国王的阴谋。可怜的格朗迪伯爵！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然而可悲的是他受骗了。他策划了第一个阴谋。他认为一切都已成定局。他将继墨索里尼而上台。但是当他前来‘接手’的时候，他发现国王和巴多利奥策划了另一个阴谋。你瞧，每个人都在欺骗别人。当然，我们是绝对诚实的，决不会欺骗你们；但这仍然是不可思议的。人们原会认为格朗迪是一个聪明人。”我们对这种表明他们的目的和方法试图表白自己完全诚实无瑕，感到好笑。然而，扎努西并不是没有用处的，他就要送一件紧急通知给卡斯泰兰诺了。

① 1943年8月25日。



这一天是8月29日,事关成败的日期渐渐临近了。扎努西听受规劝,写了一封信给卡斯泰兰诺,催促他前往西西里,根据他所拿到的一份“简单条款”副本去完成投降的安排。扎努西的信将于第二天由迪拉比亚带往罗马。我们把扎努西本人留在阿尔及尔。他在那里会比较安全。同时,在里斯本交给扎努西将军的全面条款这时从他手里取回。我们不愿意把这些条款被用来作为拖延的借口。

我们的首脑又把一种新的麻烦硬加在我们头上。尽管在这个时刻保密具有无上的重要性,8月28日傍晚我却奉到指示,嘱以全面投降条款的摘要通知法国方面,而且还要邀请他们出席签字仪式。同样的通知显然将送达一些其他政府,包括英联邦政府在内。我们反对,但是无效。因而,在8月29日中午,墨菲和我怀着可以受人体谅的不安的心情给马西格利发出联合照会。我们很内疚地硬把整个这件事说成是“假设的”。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问题在当时都尚未透露,非最大限度地严守秘密不可。然而,这件事却是伦敦方面普遍缺乏任何现实感的一个朕兆。

8月30日是一个悬虑不安的日子。在午夜时分,对卡斯泰兰诺的限期届满。应该怎么办?艾森豪威尔将军正确地认为,对于比德尔·史密斯、墨菲和我自己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去西西里,并且携同扎努西前往。同时,尽速作出让卡斯泰兰诺去西西里的安排。如果,照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他在31日到达,我们至少会在那里在亚历山大身边作出关键性的决定。所以我们在8月30日出发。我们照例在亚历山大的营地受到了殷勤款待。饭后,他为我们说明军事问题的要点。伦敦方面似乎认为这一仗会是轻而易举取胜的。但是事实怎么样呢?

他这样对我们说,这次军事行动是一场冒险的赌博,因为分配给他的盟军兵力是那样单薄。德国人已经在意大利驻有十九个师,自从墨索

里尼被推翻以来的几个月中已逐步增强。意大利有十六个师，可以为敌，可以为友。但是亚历山大说，在我们登陆之初，他将只有三至五个英美师的兵力可资利用，在随后两个星期中，最多也只可以增至八个师。所以同意大利的合作非立即设法争取到不可。<sup>①</sup>

不管罗斯福、丘吉尔、艾德礼或其他任何人有什么命令，显然要作的事情是把“详细条款”姑置度外，而安排军事“简单条款”的立即签字。我们应该作的还不止于此。我们应该接受和欢迎意大利的合作。在险恶万状的形势下，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我深为亚历山大的这种并非张惶失措而是镇静的、合乎逻辑的准确性的看法所感动。我下定决心不让伦敦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电报妨碍取得他所想要而力所能及的一切。在紧急时刻敢作敢为的墨菲同志给了我忠实的支持。

卡斯泰兰诺在蒙塔纳里的陪同下及时达到。一次长时间的谈判随即举行，墨菲和我都没有出席。亚历山大本人也没有参加。认为把参谋长主持下的谈判保持在纯军事基础上，是比较明智的。在谈判结束时，经决定为卡斯泰兰诺以外的所有意大利人作出返回罗马的安排，由他们负责劝说他们的政府接受停战的军事条款。

参谋长在墨菲和我的全力支持下，决定无论如何暂时把连篇累牍的、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的文件压下来不谈。但越来越清楚的是，对意大利人关系重大的是盟军和德国之间的力量对比。这比言语和文件都更加重要。在同一天下午，在亚历山大将军篷车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建议艾森豪威尔调派一个空运师在罗马附近 389 着陆，以鼓舞附近一带意大利各师的士气。这个计划，如获同意，应以我们所建立起来的通讯方法通知意大利人：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复电照准。

关于派空运师这段经过实在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当几天

<sup>①</sup> 墨菲，前引书，第 236—237 页。

之后意大利人接受了停战协定回到罗马时，他们确信这一师人将会到达，帮同他们攻取并据守该城。指挥官李奇微将军和他的副手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都是有胆有识而又果断的人。但是，他们对于这次冒险却疑虑重重。何况那不勒斯方面还需要空运部队。但是墨菲和我争辩说：

不能贯彻执行这次军事行动，就会破坏意大利有组织的军事合作的任何机会，尤其是他们已经答应的那六个师的合作。这也会显得像是我们这方面不守信义。最后李奇微咆哮说，除非有两个双料该死的政治顾问先去罗马着陆，他才会同意。麦克米伦和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这项建议猛然看上去是完全正确的。“那就一言为定，”我们对李奇微这样说。<sup>①</sup>

不久之后，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大多数幕僚支持这项冒险，泰勒接到了要他亲自去罗马观察一下的这一危险任务。墨菲将这段经过的其余部分阐述如下：

计划一旦得到明确的核准，麦克米伦和我就立刻告诉艾森豪威尔说，经与李奇微商定，政治顾问应搭乘在一架带头的飞机上面。将军回答说，“那好，就在你们的属员当中选派两个真正精通此道的人去吧。”麦克米伦解释说，我们不打算派任何人，我们打算亲自去。艾森豪威尔凝视我们片刻，然后冷冷地说，“噢，对的。一切规章都没有规定外交官不能牺牲。”<sup>②</sup>

撇开动人心弦的冒险不谈，我的同事和我都深信会赢得巨大的政治利益。不幸，在我们大家正要出发的最后片刻，接到马克斯韦尔·泰勒的通知说，由于德国武装部队已开进罗马地区，意大利人撤销了他们的支持。意大利人这时对于他们能否控制飞机场殊无把握。这项情报究竟准确到怎样程度，将永远无法得知。不管有几分正确，几分错误，但是未能冒险调派空运师，乃证明对我们

<sup>①</sup> 墨菲，前引书，第242页

<sup>②</sup> 墨菲，前引书，第242—243页。

及早攻占罗马的希望是一个致命的障碍，而且给从意大利半岛一端到另一端的征战，增加莫大的困难。

在我们等待期间，我们在我们景色宜人的果木园中终日懒散，力图至少保持表面上的镇静。在这期间，我的属员之一汤姆·杜普里在进行着一次他自己的小小冒险。扎努西将军路过里斯本时，曾将两个包裹存放在意大利大使馆，其中有很多关于德国方面的有用情报，包括他们的战斗序列。意大利驻里斯本公使普鲁纳斯是一个可靠的人，是意大利和盟国缔和的热心赞助者。在我的办公室再一次组织了颇为不少的工作。以不太保险的密码发出了若干电讯，根据这些电讯，看来我们的新闻参赞为情报部的紧急业务必须去里斯本一行。汤姆自己有一个更好的主意，为掩饰他的踪迹而作出各式各样的预防措施之后，他决定冒充西班牙人。9月1日8点钟，他在这样乔装打扮之下去到意大利大使馆。他从普鲁纳斯先生颤抖的双手中取得了这两个包裹，第二天就安全地交到盟军总部。

9月2日晨，意大利代表团重新露面。但是他们现在说他们无权签署停战条款。他们只希望讨论空运师着陆的计划，并继续进行军事谈判。谈判自然是掌握在艾森豪威尔的代表比德尔·史密斯手中；但亚历山大是在意大利领土上的高级军官，因此在我看来，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不能不采取行动。所以我送了一封信到他的营地——距离我的营地不太远——提醒他，表现坚定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热切地体察出真意的所在。

过了一会，他的扈从偕同若干军官到来，军官们全都排列成 391 行。警卫出动，举枪敬礼。他自己穿着一件笔挺的平常军服，一条精工剪裁的马裤，一双带金马刺的雪亮皮靴和一顶金边帽。他派人把意大利人找来，而待之以一种既极有分寸而又冷峻庄严的态度，同意大利人和艾森豪威尔的代表之间这时已建立的那种过分



随便的关系显成对照。没有握手，没有寒暄。他对意大利代表团的举动表示诧异。他们究竟是谈判人员还是间谍？让他们自己去决定吧——而且是刻不容缓。把他们送回去以便取得签字的必要授权。他们不能空手而回，那会是背信行为，他们和他们的朋友肯定会为此而遭殃。他极其沉着地演出了这一幕短剧，然后重新登车，他和他的仪仗队在一定的仪式下引退，警卫第二次出动。但是将军想听到结果的迫切心情正不亚于我们所有其余的人们。意大利人退到他们的帐篷里去商量。我们的帐篷就在它的后面。但是将军要在既不让意大利人看见，又保持他假装愤怒的情况下经唯一的路抵达我们这里，就是——在离开果木园最远的一端之后——顺着墙外面爬到可以翻过墙头来同我们会合的地方。他是以一种小学生的愉快心情这样作的。但是要绕很大一个圈子，天气非常炎热，而他的皮靴虽然很漂亮，却太紧了。他终于到了我们这里，我们都急切地等待他告诉结果。意大利人滔滔不绝、陈词热烈地讨论他们的问题。最后，他们要求同参谋长再举行一次会议。他们正式声明他们决定立即要求授权签字，并满足亚历山大将军的一切要求。因而通过我们的无线电联系发回一份电报。必须授权，批准书交由达西·奥斯本爵士保管，同时奥斯本爵士一收到此项批准书须立即电告。

392 在我们引领企待回音之际，不断收到国内的电报，询问为自治领和英联邦其他各国政府代表出席正式仪式正作何安排。我不断发回电报，不同意这种不智之举。我们对于“简单条款”还没有把握——实则我担心大陆上的意大利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我们在军事上的虚弱和大军登陆的困难。取得“详细条款”，根本无望。但是我的反对无效，我只能希望我这时已学会称之为所谓“后勤”方面的<sup>①</sup>

---

<sup>①</sup> 我一到阿尔及尔，就问“后勤”是什么意思。我的一位属员给了我下述的注释：“后勤是一个美国用语。它是兵站部的简称，像电梯是升降机的简称一样。”

原因，使这些大使无法到达。事实上，南非的西伦将军已经到来，但是他马上了解到这种形势，而且行事非常通情达理。他是一个受欢迎的和投合人意的客人，他欣然同意自己根本不曾在场的那套程式。

第二天，9月3日，是起伏不定的一天。致罗马的那份事关成败的电报已经以一种断章取义的形式拍了出去，但是最后复电直到4点钟左右我们才收到。电文如下：“意大利政府授权卡斯泰兰诺将军签字接受停战条件。你要求的声明〔也就是英王陛下驻梵蒂冈公使的声明〕将于今日发出。”其余的手续迅即完成。唯一剩下要讨论的是怎样宣布停战的问题。最后同意，应于登陆前一日，即后来所谓的X日，下午6点30分，由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巴多利奥将军予以宣布。我们自然不愿意把进占的确切日期告诉他们，因为那样做风险太大了。但是如果他们能每天收听英国广播电台的广播，那么在那个紧要的早晨将会有关于纳粹在阿根廷的宣传的两次广播谈话。这将是一个暗号；停战协定必须在那天下午公布。同时，在我们分手以前，互换艾森豪威尔和巴多利奥讲话的文稿将是方便的。（这是肯尼思·斯特朗的主意，后来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

蒙哥马利的部队这时正开始横渡墨西拿海峡，而没有遭到德国方面非常顽强的抵抗。但是对萨勒诺的进攻和攻占那不勒斯的尝试却是一件严重得多的事了。发动这一攻势最早的日期是9月8—9日的夜间。4日，我同墨菲、比德尔·史密斯等官员一起回到 393 阿尔及尔。在这短短的间隔期间，罗马的形势已经恶化，德国的控制开始加紧。9月8日上午11点，参谋长打电话通知我，他通过我们的来源得到消息说，意大利人现在想要把谈妥的一切一笔勾销！空运师的计划已经取消，德军控制了罗马地区。根据巴多利奥的说法，停战协定的公布已不复可能。他也不能再保证任何飞机场。

已经去到罗马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证实了关于军事形势的这种悲观说法。他报告说，德军在台伯河区域有一万二千人，装甲师已经由分遣队增至二万四千人。对意大利部队的汽油和军需品的一切供应均已停止。所以他们实际上已经不能动用。这个新“结合”遭到了重大的挫折。

艾森豪威尔正在比塞大，但是鉴于这种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我们决定分别拍电给他和参谋长联合会议，说明我们所认为的我们必须按照已同意的计划行事，这样至少会制造最大限度的混乱，以掩护我们的军事行动。艾森豪威尔完全接受这个意见，因此发出一项强硬的通牒，要求意大利方面必须遵守他们签署的保证。另据同意，墨菲和我应该去拜访马西格利和戴高乐，告诉他们这种形势。到5点钟，我们收到总统和首相令人鼓舞的电报，因而墨菲和我访问马西格利，告诉他停战军事协定的消息。正如我所预料，这使他感到不胜惊慌。意大利投降是好事，但是法国委员会一直没有得到通知。为了在他烦恼之际给以帮助，我将这个不可思议的、盘根错节的全部经过的大致情况告诉了他，一方面表明，要是在每一个阶段都得去同他商量，这将是多么困难，另一方面着重指出，从军事观点来看，保密是重要的。并趁此补充说，我们甚至未能使英联邦各政府得知其详，这也有好处。我也很坦白地告诉了他当时正在发生的情况，以及甚至这时意大利人还有废除停战协定的可能性。在6点钟，我带着同样的消息去见戴高乐。他冷嘲热讽地祝贺我们两国同意大利之间的战争已告一结束。法国自然同意大利还处于战争状态，因为他的政府并不是停战协定的一方。对于这一点，我没有太认真其事，而冒昧指出，他作为一个军人，自然会了解保密的必要。对此，戴高乐回答说，“我不是一个军人。”我总想知道，那为什么他穿着非迫于军事必要肯定没有人要穿的那身特殊的、多少有点陈旧的服装。



千钧一发的时刻这时已渐渐临近。6点30分，我去到“心理战工作人员”办公室。我们以先作好录音的艾森豪威尔广播开始，然后屏息无声地、怀着激动的心情静待。罗马的广播将要播送出什么呢？经过几分钟沉默并同墨菲作了简短商量之后，遂发出命令。宣读了巴多利奥元帅的声明。我从来没有为任何人祝福比为肯尼思·斯特朗更加诚心诚意了。正是他的先见之明挽救了局势。巴多利奥元帅的谈话清晰地传播出来，至少从阿尔及尔听来十分清楚。我们对于这种未见其履行诺言的情况感到有点不快，但是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我们满怀期望地等待。7点45分，罗马广播电台一字不差地依照同意了的词句播送停战协定的公告和巴多利奥的声明，真是如释重负。这样，意大利人信守了他们的诺言。延迟，是由于罗马的混乱和危险，而不是背信弃义。实际上，国王和巴多利奥已被迫仓皇逃亡，以免落入德国人手中。在这个可怕的夜晚，他们乘坐轿车穿过德国防线去到亚得里亚海岸的佩斯卡拉，在那里登上一艘意大利的巡洋舰，再驶往布林迪西。他们只偕同一小批官员和宫廷人员动身，没有带任何行李或随身衣物，德国人立即合围，将罗马地区的全部意大利部队缴械，并开始把军队调往首都以南。虽然有了停战协定，但是并没有和平。

在亚历山大所作说明的警告下，墨菲和我对于真正的军事形势有了充分了解，所焦虑的只是怕国内人民以为停战协定意味着意大利已掌握在我们手中。当然，这只能意味着我们在意大利的战役开始处于一种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对于意大利人所处的极其为难的苦境，我们早已感到遗憾。他们的确对他们长期屈服于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停战协定对盟国的利益是重大的，但是我们眼前这项事业的 395  
危险依然很大。那不勒斯之战激烈异常，德国人一度险些把我们的部队赶下海去。由于登陆舰艇缺乏，我们只有一支薄弱的兵力



来承担这样重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但是停战协定的利益的确是显而易见的。意大利舰队忠实履约接受投降，是一个真正的收获，在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的登陆因而有了可能，德国人随即在那一地区仓皇撤退。一个盟国的背叛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后果看来并不是严重的。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斗争仍然等待着我们，德国人这时仍在进行一场垂死挣扎、持久的后卫战，正如在非洲一样。无论如何，意大利的战事正形成第二战线的一部分，并相应地给俄国人以实际上的援救。

在这些忧心忡忡的日子里，战事正如火如荼。我们的兵力增补很慢，我们的增援比敌人困难得多。同时第8军正从意大利的趾端赶速北上，去同遭到猛攻的第5军会合。由于一举惊人地攻克塔兰托，于是这个良港落在我们手中了。这是皇家海军的功绩。我们的船舰运载六千名英国空运师驶入港口，并加以攻占。没有遭到任何反抗或抗议。海军在萨勒诺和那不勒斯地区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为了这个目的，只要海军的轰击能助一臂之力，海军上将坎宁安从不犹豫以自己的主力舰去冒险的。到9月19日，原来岌岌可危、甚至千钧一发的局势，开始有了好转。德国的反攻终于被击退，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军队连同他们的供应品起运上岸。到10月初，那不勒斯港口和福贾机场已经稳稳地在我们掌握中。这些是令人鼓舞的巨大收获。

在这当口，德国伞兵以一次猝不及防的惊人行动营救出墨索里尼。从这时起便出现了一个敌对的意大利政府，其控制范围和威权虽然随着战事的进展而逐渐缩小，但它仍制造了某种麻烦。然而，结果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如果墨索里尼活着落在我们手里，倒真是给了我们一个大难题。

墨菲和我在对空运师问题失望之余，这时认为我们应该设法去到意大利大陆了。总留在阿尔及尔置身事外似乎是一桩憾事。

幸而我们得以说服艾森豪威尔，承认让我们前去看一看正在发生的情况将是有好处的。料想国王和巴多利奥一定都在布林迪西。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大利政府呢？我们应该同它保持怎样的关系呢？它将干些什么呢？而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具有任何现实意义的组织吗？它能否最善意地执行它已经接受的停战条款吗？所有这些都是迫切的问题。关于代表团的性质有过不少的讨论。最后决定把它作为一个“军务”或“军事”代表团，以墨菲和我作为政治顾问。

我认为这是最明智的办法，因为关于英王陛下政府或美国政府对于意大利政府所应采取的方针，我根本没有接到任何指示。我们缔结了一个“军事停战协定”，所以最好……有一个名义上的“军事代表团”。<sup>①</sup>

经提议以马森·麦克法兰将军为代表团团长。为他的暂时离职而需要拍给殖民事务部、国防部和英王的电报，我已分别发出。他在第二天到达。他这些年来对所有路过直布罗陀的人都表示友好并热情接待。艾森豪威尔对他很器重。但是他将证明是一个不幸的人选。后来增派了风采动人、颇有才能而且对意大利人有一定了解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海军中将鲍威尔（在塔兰托指挥作战）被通知负责进行任何可能的初步接触。

[9月12日]上午9点，我们从[突尼斯]埃尔奥伊纳飞机场出发——我们四个人和（我觉察到）将要变成代表团真正团长的炮兵炮手凯西（马森·麦克法兰的传令兵）同行。

空中堡垒的驾驶员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说要末去布林迪西，要末去塔兰托。他说，“这两地方不都是在意大利吗？”我们说，“是的。”他说，“我想德国人已经占领了那里的飞机场。”我们说，“不。我们在星期六（也许星期五）派了一旅人进入塔兰托。”他说，“不错——但是飞机场在离塔兰托大约二十公里的一个叫作格罗塔列的地方，你怎么知道谁占

<sup>①</sup> 1943年9月13日。

了这个地方呢？”我们说，“好吧，我们不妨去看一看。”①

我们飞过西西里，让墨西拿和墨西拿海湾保持在我们左手边，正午刚过我们就看到了塔兰托，我们看到了几艘意大利的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我们的驾驶员认为绕道避开是比较明智的，以防他们没有听到停战协定而决定把我们击落。为怕敌人察觉，我们被关照不要使用无线电。所以我们飞得很低，环绕机场盘旋数匝。那里似乎有若干未损坏的意大利战斗机以及一些损坏了的意大利和德国飞机。最后我们着陆。机务人员把守我们空中堡垒的炮位，我们多少有点胆怯地、不自然地走出飞机，不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情况。

一大批意大利空军跑上来，跟着是情绪激昂的交谈。我们感到有点象新大陆的发现者——土著们一边打手势，一边用奇异的方言急促攀谈。

泰勒将军曾经学过“意大利文二十课”，并且学得满好。②

墨菲和我面带笑容，一再伸出欢迎的臂膀，“和平！停战！停战！和平！”凯西让大家都能最清楚地明白他的意思，并且

就我所能听懂的，他要求交出飞机场，这一点似乎得到欣然同意。③  
我们这时处在充满有利和左右逢源的境地。

398 ……我们发现我们有了一个极好的飞机场，和几所破坏了的建筑物，受到了包括那个佩带紫绶带的传令官在内的很多意大利空军让人过意不去的殷勤款待，但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架设地面电话线也很困难。（我们也拿不准要给谁打电话。打电话给各个城市的电话局，说“对不起——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这个城究竟在盟军还是在德军手中？”这样似乎也不大合适。）我们也（由于美国人方面非常罕见的一次错误）没有任何食物或饮料。虽然如此，经过多少次谈话并打了多少次电话之后，总算找到了一位上校，他有一部小轿车又还有一些汽油。凯西和机务人员留下来照管飞机。我们四个人挤在一部很小的菲亚特轿车里，驶往塔兰托，

---

①②③ 1943年9月13日。

于下午 5 点到达。①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们早已有了充分的经验，懂得遇有任何困难，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海军本部。这果然是稳当可靠的，因为我们找到了

一位海军上将、一位海军上校、几位海军中校和低级军官、一个交通系统、一个军官食堂、一个征用的旅馆（连同卧室和真正的床铺）以及一幅清楚的当前形势图。②

德军已经在两天前撤退，据认为是退到相去约十五英里左右的地方。我们原已调来了一个空运旅，这时已另有一个旅着陆。他们已经挺进，控制了全城。据说在通往布林迪西的道路上已将德军肃清，至少鲍威尔海军中将已经乘汽车启程，还没有返回。（这种论证在我看来两种可能都存在，但是我未置一辞。）巴里的情况不明。意大利舰队已遵照他们奉到的命令行事，就海军而言，情况看上去是非常良好的。

我们决定等待鲍威尔海军中将……〔他〕在 6 点 30 分左右到来。他向我们叙述了他同巴多利奥和……海军大臣联系的经过。他没有看到其他任何大臣。他相信国王在那里，但是并没有询问。他判断不出，这个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在起作用或能否起作用。③

我们决定留在塔兰托殷勤好客的东道主这里过宿，第二天一早出发去寻找遗留下来的意大利政府人员。

我们发现他们住在布林迪西一座精致的中世纪城堡中，这座城堡后来屡经大加扩建并围以护城河。一面俯眺海港，口岸全景 399 尽收眼帘。这是一个重要的海军设施。水兵看来很整洁，扫数出动，敬礼如仪。一支衣冠楚楚的卫队调来欢迎我们。

我们是由阿姆布罗西奥将军接见的，据我了解他是海、陆、空军的联合参谋总长。此人看上去敏捷而精干，但不能给人以深刻

①②③ 1943 年 9 月 13 日。



印象。在梅森·麦克法兰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之后，就领我们去见巴多利奥将军。他七十二岁，兹将我当时的印象扼述如下：

态度诚实，心胸开阔，颇富幽默感。我断定他出身于农民，具有骑兵的一般常识和农民天生的泼辣劲，是他的国王和国家的忠仆，毫无野心。他用寥寥几句话把事情讲得清清楚楚。他有一点象乔治将军，但是更加严谨，更加端庄。他是一个军人，显然没有多少政治判断力，自认为他当时获得民众的支持，因此可以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而不顾及政治方面。在这一点上，他又有一点象吉罗，但是比吉罗谦虚，不那么夜郎自大。

这次我们看到的仅有的其他两位官员，就是来自阿尔及尔和西西里的那位老友扎努西将军和陆军参谋长罗阿塔将军。我所写的关于后者的报告，或许是说得刺耳，但并不太失其真：

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一位见闻广博、多才多艺、善于应酬的人物，有点令人讨厌，但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军事参赞。我可以说他脑力发达和所起的作用超过了他的魄力。

此外，我们看到了王室大臣达卡罗纳侯爵。他似乎兼王室出纳官和私人主任秘书于一身。他给我的印象是完全忠于国王和王室的。

我们同这些显贵的第一次接触多少有点是敷衍性质的，因为  
400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为形势造成一种印象。在和大臣们会谈之后，我们同国王和他的小朝廷共进午餐。使我遗憾的是，梅森·麦克法兰对国王颇抱敌意，对于一个英国军官来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或许正是依仗着这个君主政体，我们才可以建立起某种性质的政府。下午，墨菲和我再一次和巴多利奥会谈，这一次是私下进行的。我们开诚布公地向他说明了他的政府所面临的困难。我们告诉他英、美报界对国王屈从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以及他长期支持那个倒霉的政权是不能原谅的。而且我们的报界正在揭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种种暴行的老底。要我们帮助这个政府会是有

困难的；但是如果他们能正当地对待我们，我们也保证能正当地对待他们。和我们后来遇到的一些法国军官有一点相象，他很坦白地说，“因为国王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我也就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一旦国王要我组织一个反法西斯主义的政府时，我就遵命照办。我是遵照国王的吩咐办事的。”

墨菲和我也设法单独会见了国王，抱成见的梅森·麦克法兰将军没有在座。他看上去似乎神经紧张和——很可能是——精疲力尽。他向我们解释说他们是如何仓皇离开罗马以免遭德国人俘获的。他指出，甚至这时还有一艘意大利船在港口准备起航待发，准备随时把他送走，如果德国人要重新占领布林迪西的话。我们试图使他安心。墨菲问他是否有什么需要我们给以个人帮助的。他有什么需要呢？

踌躇片刻之后，他说：“王后一直得不到一点新鲜鸡蛋。我们可不可以弄到一打鸡蛋呢？”这就是他所要求于我们的，因此我们用一打鸡蛋就同这个有千年历史的萨伏依王室取得协调一致了。<sup>①</sup>

我们也设法拜访了翁贝尔托亲王。我们发现他很投合人意，并且能绷着脸讲笑话。

他说，他纯粹是碰巧拟定在停战协定〔的〕那一天来到罗马的……里克托芬元帅在公布停战协定大约前一小时来看他，这不是一次轻松的谈话！<sup>②</sup> 401

我已经想到过国王退位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不能让亲王对他父亲在过去二十年中的决定或优柔寡断负责。或许他能扮演一个有用的角色。

意大利人对于他们的政府和国家之与盟国所处的地位，自然是忧心忡忡。他们对于经济和财政问题也非常担心，一度找来了

① 墨菲，前引书，第247页。

② 1943年9月15日。

一位叫作因诺琴蒂的专家。

元帅自称对于这类问题一无所知；但因诺琴蒂无疑是举非其人。我认为他很狡黠。<sup>①</sup>

这时墨菲和我认为我们最好要撰写我们的第一份报告。至少我们已经解决了一件事。巴多利奥元帅同意向塔兰托各银行发布必要的指令，接受盟军发行的里拉纸币。但是因为我们

没有打字员，没有交通工具（除去我们从一个意大利上校那里搞来的一部小轿车，而那部轿车的司机——我们称他为威尔弗雷德——倒是对我们忠心耿耿，看上去是不会离开我们的），只有一点点食品，得不到任何帮助。<sup>②</sup>

看来最好是返回基地——基地仍然在阿尔及尔。

此后几天在阿尔及尔异常紧张。以9月20日来说，我的记载是不解自明的：

意大利，法国，法国，意大利——一连串的问题以及电报从伦敦和华盛顿纷至沓来。在法国各次会议上的宣传；在意大利各次会议上的宣传；法国关于科西嘉岛的争论；关于法国认为我们过于同情意大利人一事的争论；戴高乐和吉罗曾经争吵；他们已经言归于好；他们要来看我；我拒绝会见他们，说我忙于重要的问题，在三、两小时之内又要动身等等。来自首相的一封令人满意的电报，表示完全赞同我们的办法，史密斯将军极为高兴。华盛顿没有任何电报，这使他很生气。真正够呛的一天。<sup>③</sup>

402 因为我们看来要不断地在突尼斯或比塞大和阿尔及尔之间穿梭飞行，并偶尔访问意大利，所以我们时时保持警惕。

英、美报界疑心有另一个达尔朗—克拉克协定。所有艾森豪威尔惯常称之为“留着长头发、富于幻想的小伙子们”又要上战场了。但是在9月23日夜间收到了一封使我们大喜的“最急件”。

斯大林非常通情达理。他完全支持意大利国王（如有必要，也完全

---

①② 1943年9月15日。

③ 1943年9月20日。

支持教皇)，只要他们协同对德作战。他比我们的《新政治家》周刊和《纪事日报》等等要现实主义得多。<sup>①</sup>

下一个难题是如何使意大利国王作一次广播。

他年纪太大，不能让他直接在麦克风前讲话，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番演讲。我们现在已设法带一部录音机到布林迪西去，录音带必须在今、明天空运回来。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一次很大的“纠纷”。意大利驻马德里和里斯本的大使没有国王的广播是不肯对驻泊西班牙和葡萄牙各港口的意大利海军船舰和商船采取行动的。我们已经接到……飞递马德里和里斯本的巴多利奥的函件。<sup>②</sup>

我们在布林迪西财政方面的行动却得到了一个可悲的结局：

关于在巴里的广播中把意大利国王称作为阿尔巴尼亚国王和埃塞俄比亚皇帝一事，收到了首相的一份情绪激动的电报！！（自然，这原来只是一项关于通货和汇率的声明，原稿是我们的使团写的，但忘记看标题。所以我想这是印刷工出于习惯，把原有的称呼加上去的。）<sup>③</sup>

毕竟英国国王在失去最后一块法国领土之后很多世纪还自称为法国国王。但这或许是另一码事。

在这期间，法国的一次新危机正在酝酿中，这将留待下文叙述。它无疑增加了我们当前的烦恼。9月27日凌晨1时，处理了403一个晚上互相矛盾的工作之后，我给首相拍了这样一封电报：

……一方面要照料布林迪西所有那些大大小小的事，以履行我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突尼斯前沿总部的职责，同时又要处理在阿尔及尔发生的法国危机，我觉得是相当困难的。但我尽力而为。<sup>④</sup>

丘吉尔明察善辨，所以宽恕了我这一申诉而未加非议。

这时总统和首相的心思正顺着比较建设性的途径发展下去。至于是否我们对待意大利要像德国人对待法国那样，也就是说作

① 1943年9月23日。

② 1943年9月24日。

③ 1943年9月26日。

④ 1943年9月27日。



为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来对待，或者是否我们要朝着准同盟的方向前进，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决定。正是在这个时候，“参战友国地位”一词首次见诸使用了。9月21日，丘吉尔拍给罗斯福的电报有如下述：

给巴多利奥政府以盟国地位的问题并未列入我们当前的计划之内。参战友国地位一词已是很够的了。我们应该基于这个立场尽力把意大利逐渐变成一支反对德国的有效民族力量，但是，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它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来争取。<sup>①</sup>

他接下去声称，原则必须是“论功行赏”。罗斯福打算同意，并拟指示艾森豪威尔在事态开始演进以前暂不提出详细停战协定条款。

我从布林迪西一回来，就送出了一份详细的形势报告，指出：由于意大利方面除根据传闻，对于详细停战协定条款尚无所闻，所以我们可以撤回，或加以修改。可惜，修改并非易易，因为为自己的大作而自豪的国务院和外交部的官僚早已把它们通知联合作战诸国了。总统由于顾及未来的大选和大量意大利人的选票，已开始要撤回该项条款；丘吉尔无疑将步其后尘。除了在最后片刻往往可加以控制的我们自己的官员外，还有斯大林。他未必会让我们从自投的网罗中脱身出来。我在道义上有责任提出报告，叙明我相信巴多利奥在压力下可能会签署详细停战协定条款。可能要附以一新的前言和谅解文字——不完全合理，但在这种情况下是有用的——即承认9月3日的旧停战协定将继续有效。所以这项讨厌的工作势在必行。主要的困难，果不出我所料，就在于“无条件投降”一词。在“详细条款”中占首要地位的这些字眼在“简单条款”中曾有意地加以避免。

9月29日，墨菲和我动身前往布林迪西去同巴多利奥讨论这个问题。

<sup>①</sup> 丘吉尔：《紧缩包围圈》，第168页。

自从一、两个星期以前墨菲和我“拿下”布林迪西以来，该城现已大为改观。当时既没有步兵，也没有水兵（除意大利人外）。饭店仍然由它的老板经营，然而可供消费的东西却很少（除极好的葡萄酒之外）。现在港口和码头都充满了盟军的船舶，卸下大量的士兵和军需品，街上到处都是我们的军队。国际饭店已经由军事代表团接管（带着盟军的配给品），交由一个人数很少的工作班子经营管理。这一切完成之速，确是令人惊叹的。<sup>①</sup>

这同上一次我们在布林迪西的情况的确有明显的不同，那时城里只有四个非意大利人，并且由于造成印刷工人在关于通货问题上的那次不幸的过失，我们曾遭到了丢脸的训斥。

“详细条款”和艾德礼代表战时内阁发出的电报，我一直安全地锁在卡西比莱我的公事箱里，现在终于不得不拿出来给巴多利奥和国王看了。意大利政府已应邀出席 29 日在马耳他举行的会议。现在是 27 日。详细讨论一下议事日程将是有益的。为此目的，我们的代表团由梅森·麦克法兰、比德尔·史密斯、墨菲和我本人组成。巴多利奥将军则由阿姆布罗西奥将军和达卡罗内侯爵陪同出席。我们为求缓和我们所提新要求的冲击，解释说：军事停战协 405 定的第十二款已经提到这些要求，所以接受应是顺理成章的。主要的理由，我们说，第一是为满足同盟国舆论的要求——论据殊不充分，因为这些条款在战争期间并未公布——第二是为避免以后在细节问题上有所误解。但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有权在执行时作出他认为适当的修正。实则，事情已经清清楚楚，事态的转变以及总统和首相的声明的精神早已使其中的某些条款成为明日黄花了。

在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上，巴多利奥只同意和国王商量这个问题。接着就是关于议事日程上其他各点的长时间讨论，特别是关于意大利对德国宣战的问题。比德尔·史密斯着重指出这一点的

<sup>①</sup> 1943 年 9 月 27 日。

军事重要性。因为没有宣战，德方俘获的意大利陆、海、空军人员就会在一定合法性的外衣下视为战时义勇军而不视为战俘。在政治方面，宣战将给舆论以深刻印象，有助于我们逐步实行对意大利日益增多的让与，包括逐渐缩小盟国军政府的权限，以及把西西里及其他各省归还意大利统治在内。这个问题——宣战问题——也必须呈请国王决定。

至于是同盟或是准同盟的问题，元帅本人看上去已充分准备接受“参战友国地位”一词。正式同盟并不是军队参战的一个必要条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和美国并没有同盟关系，事实上，它们就是参战友国。比德尔·史密斯想出了这个论据，并且为此非常得意，多次反复重申。

总起来说，巴多利奥表示，盟国政府所要求满足的种种——宣战、同盟问题、尤其是政府基础的扩大——都只能在国王和政府回到罗马之后才能定夺。哎呀，当时我们也认为罗马不久就会落到我们手中，由于强大的军事压力，德国人可能把他们的战线缩短到他们最终可能被赶出意大利的小范围。但是希特勒不欢喜退却。他认识到罗马的政治重要性。像在非洲一样，他命令他的部队尽可能地慢慢撤退，为此而不断地予以增援，直至最后一刻。然而这时，早日进入罗马的愿望支配了我们的很多计划。

在“详细条款”中还有使这位老军人大为担心的另一词句。文件中提到战后意大利人民有选择他们自己政府制度的权利。这是什么意思——自由选举？如果这样，这是可接受的。但是否还意味着君主制本身将陷入危机之中？无论如何，所有这些问题怎样能在布林迪西作出决定呢？罗马是首都。

第二天，9月28日，我们再一次会谈，巴多利奥告诉我们说，他这时可以凭国王的授权发言了。而且，他指出，有必要把这四十二款再详细讨论一遍。我该怎样咒骂那些外交部的专家啊。这些

条件中有很多是不能适用的。其中很多是意大利政府无力执行的。所以我们承允这个一般性问题将包括在统帅的一封函件中，函件将在签字后递交给他。巴多利奥再一次强烈抗议“投降文件”这个标题，以及在第一条甲项的规定，即：驻扎任何地方的意大利陆、海、空军因此全部无条件投降。正如我向伦敦报告的那样，他说他的反对与其说是理论性的，毋宁说是实际性的。国王和他为了接受耻辱的条款，早已在遭到抨击，尤其是遭到墨索里尼党羽的抨击。“无条件投降”一词并没有载在简单停战协定条款中。在意大利方面已经竭尽全力忠实地执行了停战协定将近四个星期之后，现在要提出这些条款，不独会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我们说我们试图以某种方式来满足这一点，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由艾森豪威尔将军代表他对之负责的各国政府出具一封公函，承认自从9月3日以来意大利政府地位的有效改变，从而意大利政府已经成为联合作战国的一个合作者。元帅一离开我们，我们立刻草拟了这样一封信。事实上，未经修改就予以签字，并在第二天交给 407 元帅了。我们最后的任务是要求国王允许在他广播中特别提到苏联。这一点得到了同意。

我们大家都彻头彻尾厌恶这整套程序，尤以艾森豪威尔为最。但是我们不能不贯彻执行。我们在破晓时从意大利动身飞往马耳他。9月29日上午11时，会议在英国军舰“纳尔逊号”上举行。艾森豪威尔将军偕同三位英国司令官以及梅森·麦克法兰将军、墨菲和我一起出席。其他高级官员也都到场了。意大利方面出席的有巴多利奥元帅，连同阿姆布罗西奥将军、罗阿塔将军和其他一、两位将军。巴多利奥本人搭乘意大利巡洋舰“非洲拓荒者号”前来。其他意大利人是搭乘飞机来的。在正式会议之前有长时间的讨论。在关于他所要求更改条款一节将转陈盟国政府以及要递交他一封他最为重视的艾森豪威尔的函件一节取得谅解的情



况下,巴多利奥最后接受了劝告而签了字。

还涉及到了其他许多问题,包括对德国宣战在内,这一点,国王希望保留到我们到达罗马时履行,而这在当时看来不像会有多久耽延的。事实上,这要在10月13日才公布。延揽新人参加政府的问题作了详细讨论。看上去国王因为格朗迪背叛墨索里尼想要给他以酬答。美国人——或毋宁说总统——则力主延揽具有长期一贯反对法西斯主义纪录的斯福尔扎伯爵。为大家所一致热烈同意的一点是对新闻界一概闭口不谈。

意大利投降就这样告一结束。墨索尼里的垮台和法西斯主义所代表的一切的土崩瓦解,正是自由和民主力量的辉煌胜利。但是一个处于土崩瓦解之中而要一反整整一代以来的政策的国家所引起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很多年以后,当旧有的嫌怨和仇恨已经淡忘的时候,也许看上去未免有夸大困难之嫌。但是我国人民遭受意大利残暴野蛮和背信弃义之苦太深太久了。我  
408 国舆论对于支持或宽恕豺狼成性的墨索里尼及其政策的人们特别深恶痛绝。从一个战败的敌国变成一个盟国或友邦之类的事物,必然是需要时间的。首先看到这种必要性的,正应归功于军事指挥官们。所谓舆论的领袖,尤其是新闻界方面,简直要责难我们又搞了一次不名誉的交易了,就像一年前发生于北非的情形那样。对战败了的敌国的宽厚慷慨以及去帮助和支持受苦受难人民的那种基督教的愿望,往往是距离战场愈近则愈强。没有任何司令官或士兵感到任何特殊的愤慨。整个说来,他们倒是欢喜“意大利人”的。幸而,报纸的情绪有了很快的改变,几乎天天都有所不同。而且“详细条款”那时还没有公布。<sup>①</sup>这些条款在盟国政府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的发展上并没有起任何作用。它们根本用不着写成书

---

<sup>①</sup> 1943年11月,意大利投降简单条款和详细条款全文,连同其他文件一并刊载于白皮书(敕书第6693号)。

面，为求条款能得到签字而引起的一切担心焦虑纯属多余。齐集于威名赫赫的英国兵舰上的那些人都了解了这是实情。所以，目前的仪式没有让任何有关人士有一点高兴，尤其是已经掌握了安然停泊在瓦莱塔港意大利舰队的海军上将坎宁安。但是仪式随即过去了，跟着就是美酒佳肴、一席丰盛的午餐。然后我们各返任所。<sup>①</sup>

---

<sup>①</sup> 1943年9月29日上午11点各高级官员在英国军舰“纳尔逊号”上的谈话笔录，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同一天致巴多利奥元帅函，见附录2。

## 第十六章 出使法国：最后阶段

随着一个真正法国政府的诞生，并得到盟国和中立国的正式承认，墨菲和我都感到我们在这方面的用处已成过去。我们都认为，我们同早先多少有点无政府状态那段时期的关系过分密切，所以不宜在新的环境下担任大使。我们希望这个新组织能象一个正规的负责政府那样起作用，而不象过去那样老是动荡不定。在这方面我们有点太乐观了。虽然如此，希望人事更动无疑是正确的。不久就获得同意，认为应予照办。一位亲密的老友达夫·库珀被指派为第一任英国大使。但是由于种种困难，他迟迟未能履新，直到1944年1月1日我方得以卸去我的双重职责。埃德·威尔逊在11月间取代了墨菲。

在这最后几个月中，那种看上去在阿尔及尔的动荡气氛中很容易刮起来的骤然而至的狂风暴雨，也还是照常屡见不鲜。我在1943年1月2日到达时所看到的那种不正常的政权，无疑已经为一种新的制度所取代，这种制度纵非建立在任何牢固的宪法基础上，但至少是有意遵循正常的民主和议会程序的。马西格利以他那种惯常的温和态度，力图掩饰英、美两国承认方式之间的差异，对苏联所使用的更加慷慨的言词，也没有过分重视。虽然如此，长期的耽延是法国人普遍引以为憾的。正如约翰森博士在他  
410 致切斯特菲尔德勋爵那封著名的函件中所说，“如果赞助及时，那原会是不胜欢迎的”。所以，一种自卑感依然存在，而这在象法国那样一个具有光辉灿烂历史的国家，尤其是悲剧性的。我们在西西里的成功得到了我们所有法国朋友们的赞佩。同时，因为法国

部队未能分担其事却抱有一定的觊望。同样，意大利停战协定没有通知法国人就签字，虽则可根据事实上的理由予以解释，然而对于他们的自尊心自是另一个打击。

1943年9月，成立了一个地中海委员会。法国将有代表参加的消息，是受到热烈欢迎的。但是委员会证明寿命不长，由于10月间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议，事情起了根本的变化，刚成立的地中海委员会告吹了，而法国并没有包括在新欧洲委员会之内。幸而后来来了一个意大利顾问委员会，尽管是低一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我们总算为法国人争取到了平等代表权。当然，法国人的极端敏感是自然的——虽则有点令人不胜其烦。多次的似乎不可思议的小题大作和失去感情上控制，其原因正在于此。

在这一年年底，因斯马茨陆军元帅的一次著名的讲话而引起了法国方面的愤激。他在那次讲话中声称，法国现在已不成其为大国了。我力图提醒评论者说，只要仔细读一读陆军元帅的声明，就可以看出，在他看，英国在战后也不能不接受一个威望和权势相对降低的地位。我力图论证说，随着东方和西方两巨人的成长，西欧各国更密切的团结起来，彼此互助，难道不更明智些？

9月25日刚刚从突尼斯回到阿尔及尔，我就意识到麻烦正在酝酿中。第二天早晨正在同墨菲和比德尔·史密斯商谈，

接到了首相的一份电报，要我通知戴高乐说：“两主席（戴高乐和吉罗）制度的任何变更都会推翻法国委员会赖以得到承认的基础，并会有最严重的后果。”他还要我把“这一套话告诉委员会中凡是和我有私交的成员们”。<sup>①</sup>

这自然使我非常为难。

如果我传递这个讯息，那么，〔戴高乐〕对于另一次“干涉法国事务的行动”自然会大为愤慨，解决问题的机会必将大大减少。不然就是：我们

<sup>①</sup> 1943年9月26日。



将置身于一个非常荒谬的地位，除撤回承认和把九个月的成绩付诸东流而外，别无任何真正的补救办法。

然而，如果我不执行首相的指示，把电报扣压下来，那么出了差错，就必会责备我说，这都是我不服从命令的过失，要是进行“干预”，则未始不能挽救局势。<sup>①</sup>

我应戴高乐之邀，准时于11点钟去看他。我们泛论战局、意大利的形势和其他问题。他看上去兴致勃勃，但多少有点不怀好意的样子。随即清楚看出，他正在希望以盟国的干预作为和他的同僚击起爱国主义之鼓的一个借口。因此，我不顾所奉指令，而只是对他说，照我个人的看法，委员会因吉罗的辞职而瓦解将是令人惋惜的。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些错综复杂和具有高度技术性的法令上。戴高乐认为，从法律的观点来说，新法令并没有废除两主席，虽则从实际观点来说，两主席自然是不复存在了。换句话说，他将依然是首揆，而吉罗则将成为对一个文职首揆负责的总司令。当我在第二天会见马西格利时，他解释说，新危机的整个经过是简单的。真正成为争执之点的是我们将称作为国防部的这个机构的设立。新制度将逐渐夺去吉罗的重要性，但不能说这是正式违反三执政官时期的那种制度。

412 有两桩事情，吉罗处理的方法遭到了批评。第一和最重要的一件是他处理科西嘉岛事件的方法。9月11日夜间，消息传来，说“爱国主义者”已经控制了阿雅克肖。吉罗立即谋求并且取得了联军总部的许可，派遣“空想号”和“惊人号”这两艘法国驱逐舰运载法国部队前往援助抵抗运动。但是第二天他胆怯了，取消了他的计划。次晨他又恢复了勇气，派出了这支远征军。他还派遣了一位由他自己任命的将军去在戒严的状态下管理该岛的行政工

---

<sup>①</sup> 1943年9月26日。

作。同时他将夏尔·吕兹（说来莫名其妙，是一位激烈的戴高乐派）作为已任命而尚未就职的阿雅克肖行政长官一并派去。但是他并不认为应该把他所采取的行动通知委员会，甚或通知作为两主席之一的戴高乐。结果是9月18日委员会讨论有关民政和军政权力之间的原则问题时成为一次急风暴雨般的会议。但是对外最后还是以一个团结一致的法西斯阵线出现。以委员会的名义广播了一项声明，祝贺科西嘉爱国主义者的成功，并含蓄地提出了委员会对解放了的科西嘉岛的权力主张。同时，委员会还宣布了以吕兹为阿雅克肖行政长官的任命，而没有提及他以那个身份履行职责已达一个星期之久。

关于布罗塞一师军队的问题是另一个甚至更加无聊的插曲。这个师，即以前著名的拉米纳师，曾经同英国第8军从阿拉曼一路转战。它是由英国装备起来的。人人都知道它是法国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师之一。但是尽管一再要求，吉罗还是拒绝以这时可供利用的美国武器予以重新装备。所以在要求他指定派往意大利的第三个师而他选定了布罗塞师的时候，亚历山大将军不得不指出，根据技术上的理由，要让这个英国装备的师和已经投入战斗的两个美国装备的法国师并肩作战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吉罗指定了一个塞内加尔师以为代替。这是一件蠢事，极其有损于法国士气的。这看上去象是对于戴高乐的久经沙场的部队的一种幼稚的、乖张的打击。这又一次引起人们对于这种反常现象的注意，仿佛法国军队的重新装备仍然是美国和吉罗私人安排的一个问题。由于这一事件，整顿制度的谈判于是开始。但是吉罗在稳健和爱国的法国人眼中却受到了损害。

我向伦敦方面汇报了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并断定最好的办法就是返回意大利，把罗杰·梅金斯留下来负责其事，希望这一场病能按照它的阿尔及尔先例的过程去发展。9月28日，我正在布林

迪西时,接到了他的一封电报说:

阿尔及尔危机看上去(毕竟)象是在按照它的通常过程发展。每个人都争吵过,每个人都辞职过,而在星期一这一天每个人又都言归于好了。吉罗自称胜利;戴高乐已获得成功。唯一关系重大的就是在华盛顿方面美国人不要为此而激动。在此地我倒不难让他们保持冷静。①

事实上已经任命了一位国防部长。根据各有关方面的协议,人选落在勒让蒂约姆将军身上。勒让蒂约姆是一位优秀的军人,对英国方面非常友善,但不是一个富有行政管理经验或政治阅历的人。

考虑到我这时所主要关心的意大利问题,我决定去英国进行几天磋商。我搭乘了陆军元帅斯马茨的一架便机,在伦敦从10月4日勾留到9日。我刚刚回到阿尔及尔就发现艾登已先我而至。他是去莫斯科出席外长会议路过此地的。不幸我感到身体非常不适——已经有几天感到不舒服了——试一下温度,发现已超过102°。或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外交大臣偕同大批随从人员以及伊斯梅将军率同大批幕僚的莅临,感到有点吃不消。

在这种大乱之下,他们都在制订一个个无法实现的计划。他们将在这里停留;他们将立即动身去突尼斯;艾森豪威尔将军可能在突尼斯,不,他还在意大利;是的,但是他正要返回突尼斯;那好,他们将去开罗并于途中在的黎波里停留,等等。……随即发生了下述的问题(在负责官员得到说话的机会时):

1. “约克号”的轮胎需要修理;
2. 由于天气的关系,在突尼斯周围没有任何飞行;
3. 由于天气的关系,将不可能在的黎波里着陆;
4. 恶劣的天气正往东移,如果他们想要对开罗有把握,最好一大早动身,以便在坏天气之前赶到。②

① 1943年9月29日。

② 1943年10月10日。

此后几天我病得很厉害，看来高烧无法退下去，难以摆脱病魔。幸而理查森上校来看我，在他的治疗下慢慢康复起来。这是我同这位出色的医生初次相识，他后来成为我忠实的朋友，并且此后一直给我看病。理查森认为我处于接近虚脱的衰竭状态。然而我还是能在床上作一定的工作并接见一些客人。主要令人兴奋的事是俄国派驻法国委员会的新任大使鲍戈莫洛夫的来到。

他已经偕同二十五名助手到达，但是象其他每一个人一样，只在阿勒蒂饭店找到了一个房间，并在美国军人食堂进餐。因为他的生活水平相当高，所以他对这一切似乎很恼火。

他还没有车子，所以我派约翰乘我们的车子把他接到这里。他问约翰是否在伊顿读过书。约翰回答说，是。啊！鲍戈莫洛夫说，一个出色的学校——一个优良的传统——一个出色的学校。从饭店到别墅一路不断地这样咕哝着。<sup>①</sup>

鲍戈莫洛夫，四肢粗壮，衣服宽大，双手白皙，面庞白胖，前来造访，坐谈良久。

他非常彬彬有礼——甚至有点端庄严肃。他谈了几句关于我的胃口之类的话以后，就大谈其自己的胃口，他非经常当心不可，需要吃煮得极嫩的肉。这在美军食堂或阿勒蒂饭店都办不到，弄得他非常狼狈。<sup>②</sup>我并未试图谈任何公事，但是我告诉了他刚刚发生的意大利的 415 宣战。

关于这件事他只问了一个问题。“大元帅知道吗？”我把斯大林签字的三国宣言拿给他看，于是万事大吉。<sup>③</sup>

在这个时期关于解放后的法国问题有大量电报和文件源源而来。虽然这个“计划”用心极好，但是在我看来非常不现实。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外交大臣，提出了我的观点。我确信法国人会以他们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他们自己这个问题。为管理法国本土的

---

①②③ 1943年10月13日。



“民政”而正在进行准备工作,其所根据的全部设想,在我看来,都是非常危险的。无疑,由事实上成为法国临时政府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尽早接管,才是正确的办法。他们,而不是英、美官员,是管理法国本土行政工作和为它的政府负完全责任的理所当然的人。我向这时也途经阿尔及尔前往莫斯科的科德尔·赫尔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艾森豪威尔将军要我去看他,我这时虽然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卧病在床,我还是勉强去了。赫尔国务卿是乘巡洋舰到卡萨布兰卡的,然后再从那里改乘飞机。美国人旅行无疑是排场十足,甚至在那个时候也是如此。陪同他的艾夫里尔·哈里曼也有两架 C.54 飞机,国务卿还另有两架。

我不懂美国的政治家为什么年纪都是这样大。路过这里的史汀生部长(陆军部长)已年逾八十;赫尔是七十四岁。他同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所有美国人的画像一模一样——一位漂亮的南部绅士。他对内政的观点是反动的,关于对外政策的观点则是基于带有个人偏见的一种“八十年代”的模糊不清的自由主义。虽然如此,他显然不失为一位〔具有〕敏锐思想和惊人外貌的“人物”。……<sup>①</sup>

当我被接见的时候,鲍勃·墨菲来回忙着,象是教廷中的一位  
416 大主教。有几位医生在那儿照料,其中有一位矮矮胖胖的人,看上去象是麻醉师。赫尔坐在一个半明半暗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他大声说,他对于我是久仰了。他对于墨菲和我之间的合作一向是引以为慰的,但是法国人自然是顽固分子。我说正因为这样,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的事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国务卿对这项建议是否明智似乎有一点怀疑。但是谈到俄国人,赫尔国务卿是感情激动的。他认为外长会议将具有划时代的效果。在国会发表的一席演讲中,他曾经声称:

势力范围、结盟、均势或各国在不幸的过去凭以力图保卫各自安全

---

<sup>①</sup> 1943年10月15日。

或促进各自利益的其他任何特殊安排,今后都不再有必要了。①

赫尔所代表的意见后来在极其重要的雅尔达会议上达到充分的和悲剧性的发展。此后几年左右美国政策的正是这种意见。这个意见并没有使我们的任务轻松些。

在这时候,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离开了我们去接替达德利·庞德爵士担任首席海军大臣。我和他交情极深,他事事给我以同情和支持。他因为对法国海军官员所具有的、并从而对相当重要的政治家所发挥的那种影响而对我特别有用。人人都爱戴他,固然也有很多人惧怕他。10月17日,星期日,他在盛大的欢送仪式中离去,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爵士前来接替。因为他以前曾经负责过有关地中海东岸诸国事宜,所以不久就证明对我特别有帮助。

我依然不能摆脱我的沮丧情绪。唯一使我得到安慰的是我的长孙诞生的消息。②

在这个风平浪静,几乎是升平岁月期间,戴高乐来同我单独共进午餐。他的态度非常友好。因盟国对待他而所发的怨言比平常少些,但是他仍然认为他应该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和支持。要防止在法国发生纠葛以至内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要以他本人 417  
为首的民族解放委员会随着德国人的撤退立即接管政府。任何迟延都会是危险的,那会给共产党以夺取政权的机会。他确信他能掌握局势,直至适当地选出国民议会和制订新宪法时为止。如果能够渡过这段危险的间歇时期,那么大局就定了。他是在法国唯一有足够权威控制局势的人。象往常一样,我钦佩他的对使命的观念和具有坚强的信心。

第二天鲍戈莫洛夫又来过访,他对法国人的印象殊为不佳。

① 墨菲:《军中外交官》,第259页。

② 议员莫里斯·麦克米伦的长子亚历山大生于1943年10月10日。

他认为他们的行政管理水平很低，组织力差。他们早已试图使我们彼此相争来制造麻烦，但是我们必须以联合阵线出现。英、美和苏联——只有这三个国家是举足重轻的。我开始怀疑他是否也在伊顿读过书。

我康复之后，不能不把很多时间消磨在突尼斯和意大利，而留梅金斯在阿尔及尔负责。但是为了在11月3日下午举行的协商会议，我重又折回。这次会议旨在给政府组成以一定的民主基础，并便于舆论。

因为当然不能举行真正选举，所以委员(大约七十名)部分是由这里的市、县参议会选出，部分是以前从法国逃出的前众议员和前参议员，部分是由法国本土各式各样抵抗运动提名的。还有最后一批委员迄今尚未到达……他们逃出并非易易，而有赖于我们和法国人对此进行种种地下工作。

这次协商会议是在阿尔及利亚参议会的会址举行的。议席布置成半圆形，象法国议会一样，主席象法官一样坐在一架高的讲台上。

418 设有外宾席，我同鲍戈莫洛夫和墨菲以及所有其他外交代表，都在那儿。<sup>①</sup>

我认为这是一种动人的和富于想象力的设想，对于那些嘲笑或缩小这个机构的价值的人殊无法忍耐。然而，这却要导致新的麻烦。随着一个类乎正常政府的机构和一个尽环境所许可的那样具有代表性的协商会议的组成，这样一种情绪就开始广泛地表达出来：委员会里将军太多了，几乎成了一个“军人会议”。何况，吉罗的“兼职”已不再是可以容忍的，他必须就两主席之一和总司令这二者任择其一。压力日益增加，在得知总统和首相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之后，我认识到盟国的干涉势难避免。11月10日晨，乔治将军过访。他给我作了一番出乎意料之外的客观描述，因为他也开始对

---

<sup>①</sup> 1943年11月3日。

吉罗忍耐不下去了，尽管他对戴高乐非常不信任。

这就是他的故事。11月6日弗朗索瓦兹·德芒东在协商会议上发言时，力主改组委员会，少延揽几位将军和专家而多吸收几位政治家，并对吉罗加以猛烈抨击。在委员会开会时，将军在一席使大多数委员深受感动的演讲中十分严肃地予以答复。他亮出了他的经历。在上一次大战中，他曾经效命沙场，身受重伤，并曾被俘。这次大战中，他身预戎行，并曾经从德国逃出继续作战。自从在北非登陆以来的一年中，他为国事竭尽其力，鞠躬尽瘁。他曾经被维希判处死刑。他的妻子呻吟于里昂的监狱中。他的孩子已经在几个星期以前解往德国监禁。他知道有其他很多人受到同样苦难，但是在那些一直以战斗法国的追随者而自豪的人们当中，不曾作出任何相称的个人牺牲的，或许还大有人在。乔治接下去说，如果在那个时刻进行表决，委员会未始不会投吉罗的赞成票。但是辩论继续进行，爰经议决：改组委员会是对的。乔治将军提出了辞呈，其他委员也都一一提出。因为根据现行法令，委员会是唯一有权接受辞呈或增补新员的机构，所以要他们全体十五人从事于组阁工作是显然不可能的。因此，普遍认为应该设置一个为此目的的小组委员会，并将这项任务委托给了戴高乐将军、勒内·普利文、阿德里安·蒂克西埃和勒内·梅耶。结果制订了一项法令，实际上规定总司令必须隶属于政府。吉罗自以为其用意是让他仍留任两主席之一，直到他动身去接掌地面部队的指挥权时为止。但这显然不是法令的法律上的含义，而吉罗在没有澄清这一重要问题之前是绝不应贸然同意的。

这时除设法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之外，别无他法。在同一天我和卡特鲁共进午餐，他给我作了一番大致相同的叙述。但是也有一些不同之点。他说在委员会开会时通过了两项动议：(1) 所有委员，包括吉罗以至戴高乐在内，应将辞呈递交组阁小组委员



会；(2)“军权”应该和“民政权”明确分开。吉罗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两项动议。

不幸，吉罗并没有告诉委员会说他希望在几个星期之内接掌他的指挥权，从而根据 10 月 2 日的法令自动放弃两主席之一。然而，在收到吉罗辞职信之后，经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看他。事实上这一点办到了。当墨菲和我在下午会见乔治将军时，他告诉我们，在他看，危机已成过去。以卡特鲁为首并包括有蒂克西埃、普利文、梅耶和其他人等的一个代表团曾经向吉罗保证说，他们决没有想攻击他的地位的意思，其中显然有误会，他们认为将军是充分认识到那两项建议的后果而予以同意的。关于吉罗作为总司令的地位作出了若干让步，并经商定由委员会全体成员递交给他一封信，  
420 要求他留任该职。乔治把这一切看得比前几次轻松得多，并且在他离去的时候说：“这样就结束了我们每月一次的危机。唯一不同之点是这一次提早十天发生；它们照例是发生于每月 20 日以后的那个星期中的。”他说他自己倒很想挂冠而去。

饭后我会见戴高乐。他显然把这件事看作是无关宏旨的。无论如何，给阿尔及尔的重视太过，而给法国的重视却不足。事实上，法国危机已开始于 1789 年，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时为止，朝令夕改，向无定制，并无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他的职责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程度的民族团结，俾使法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一方面不致造成紊乱，另一方面也不致采取极端政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于共产党的地位以及如何最妥善地加以掌握，才那样焦虑不安。戴高乐眼光之远大确非他的所有同僚能望其项背，我是再一次怀着这样一种感觉而结束了这一天的。在这期间，他显然是短期的权力之争中的优胜者。吉罗虽然暂时留任总司令，但是离开了委员会。同时乔治已辞职或被逐出。

第二天我动身去意大利，在 11 月 13 日回到阿尔及尔时我发

现了一个新的、危险得多的问题。这一次是英国政府不能不严重卷入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关系到黎巴嫩的一次重大危机。整个事件似乎是突然爆发的。

法国同意实行这样一种政策，废除委任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黎巴嫩政府，而根据条约只为他们自己保留象我们在伊拉克或埃及的那样一种相似的地位。在1936年同黎巴嫩方面商订了这样一件条约，但是法国政府倒台，始终未获批准。在1941年我们征服叙利亚和黎巴嫩并逐出维希部队时，自由法国部队和我们并肩作战，并且我们〔建立了〕自由法国政府。同时，卡特鲁发表了极其庄严的声明，并确实开始（非常缓慢而慎重地）予以贯彻执行。自从他离开叙利亚，我认为他的后任一直在 421 极尽“拖延”之能事。然而，选举……事实上举行了。这造成了很大的磨擦，因为埃勒（卡特鲁的后任）强烈谴责斯皮尔斯插手选举，以图争取亲英反法候选人的胜利。对此，斯皮尔斯予以同样有力的否认……

法国候选人惨败，由对法国人非常抱敌视态度的部长组成了一个政府，保证尽速争取黎巴嫩的独立。

埃勒返回阿尔及尔请示，我则奉命尽可能给法国委员会施加压力，以确保他带回去一项宽大的政策。<sup>①</sup>

由于大家都带着典型的书生之见，问题的实质，便因为对有关法国委员在法律上的地位问题展开法律上的辩论而大加复杂化。临时政府是法国——包括委任统治权在内——的权利义务的合法继承人吗？他们既然不是法国的合法政府，那么他们能够商订和批准条约吗？在国际联盟处于停顿状态时，能使委任统治告一结束吗？

无论如何，埃勒回去了。在开罗时，他听说黎巴嫩国会正在开会，并准备一项修改宪法立场和宣布完全独立的议案。他很自然地呼吁他们在他能够到达贝鲁特、说明在阿尔及尔业经商订的政策并进行商谈以前，暂停辩论。政府极其无礼地予以拒绝。辩论举行了，修正案也在所有各个阶段中通过了。

---

<sup>①</sup> 1943年11月13日。

埃勒于凌晨以逮捕〔总统和〕各部部长并封闭国会作为报复。

因此而发生了各式各样的意外——骚动、枪击事件、塞内加尔部队的越轨行动，法国人把〔这一切〕都毫不知羞地加以缩小，斯皮尔斯却在给外交部源源不断的电报中予以强调，外交部则转电告我。<sup>①</sup>

422 我没有奉到很明确的指示，但是一得到这项消息，我就立刻同马西格利进行了一次简短的商谈。商谈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消息既混乱而又暧昧。但是我对于马西格利的真知灼见和公正无私仍照旧抱有信心。

11月15日，星期一，我突然奉命去直布罗陀。约翰和我一起动身，于下午到达。由于在英国和直布罗陀之间不利于飞行的天气而造成相当的紊乱，若干指望到达的飞机未到。但是电报迅即相继而来，下午6点30分通知我立即乘汽艇离开直布罗陀。我们就这样动身了。在港口外几英里远近，把我们送到“声望号”船上，我们受到了在去开罗会议途中的首相的欢迎。

这一行人中，有首相、他的女儿玛丽、伦道夫、坎宁安爵士（我的老友——现任海军首席大臣）、莫兰勋爵、“帕格”·伊斯梅将军、莫顿少校和其他人等。陆军参谋长和空军参谋长以及其他显要，都不在这一行人之中，而是乘飞机前往。

首相精神抖擞，就法国的形势多所垂询。……象往常一样，只要你论据有力，他就愿意倾听。<sup>②</sup>

翌晨9点钟左右，丘吉尔派人来找我。他正在床上进早餐。他使我聚精会神达三个半小时之久。

这真正是一个令人倾倒的表演。大部分是他要在军事会议上所讲的一席话的预习；他对于这次会议非常担心，非常激动。他自然认为对地中海的形势未能大力地、灵活地加以利用。

这……是由于参谋长联合会议制度的僵化以及总的来说由于我们

---

① 1943年11月13日。

② 1943年11月15日。

美国盟友的刚愎自用所造成的。对于温斯顿来说，这当然是令人恼火的，他感到在整个战争期间就象一个人双手被捆在背后进行奋斗一样。而除开他之外再没有一个人（只是靠了那样非凡的忍耐和手腕）能够让美 423 国人参加欧洲的战斗。

我觉得他把〔在开罗〕行将举行的会议看作是真正的转折点和他所遇到的最困难的工作。<sup>①</sup>

经过这番对我来说是大量表述其对广泛的战略问题的评论之后，他向我问到法国和黎巴嫩的情形。他对于吉罗在政治领域内的消声匿迹自然感到烦恼，但是他心里当然明白两主席制只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他对乔治将军很生气。我力图解释我对正在兴起的新力量的看法——新力量并不都在戴高乐的手里，有一些是向他的威权挑衅的。他继而把话题转到黎巴嫩。

我对他说，我把这个问题倒看作是一个试验性的事件。如果我们圆通而有力地加以掌握，我就会得到

1. 卡特鲁；
2. 马西格利；
3. 足有委员会半数的、纵非三分之二的支持，而且我们可以把戴高乐置于三、四人的少数地位。

但是这就必需避免递送最后通牒，除非有绝对必要。我担心，我还这样认为，只要斯皮尔斯在贝鲁特，我们和法国人就难免有公开而激烈的斗争。首相不太欢喜这种说法。<sup>②</sup>

斯皮尔斯是我的老友。在慕尼黑时代我们曾经在一起共事，我始终认为他非但见多识广、具有独立见解，而且是法国的一个忠实朋友。不幸，关于地中海东岸诸国问题，他同戴高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我只好这样认为，他对当前戴高乐所负责的形势多少抱有偏见。无论如何，法国方面对于他们欢喜称之为“斯皮尔斯将军的个人政治”的东西，疑虑重重。然而，在我们没有听到卡特鲁的汇报

<sup>①②</sup> 1943年11月16日。



之前，无事可作——因为唯一有帮助的事就是卡特鲁已经被派前往贝鲁特去就地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声望号”船上的那席午餐。我们和首相坐  
424 在那儿，一大批显要团团围在左右，其中还有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我坐在相隔几个位子的下方一点，但是正好在首相的“火力射程”以内。他对我说，他想一到阿尔及尔就要把乔治将军找来。他这样作是为了表示他对事态转变的不快。

他问我是否同意。“现在坦率地提出你的意见吧。我知道你向来如此，但是我很不以为然！”于是我说，我认为就他来讲，那是一个极其可悲的错误。“那很好，我决定这么办。我要在下午6点钟见他。”我并不认为那真正有多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他无疑已经作出决定，但我认为我要保持自己的立场。<sup>①</sup>

在进餐时有一段时间以及随后的长时间座谈中，首相一直有点顾虑重重。当然，我知道他是在思考早晨他曾透露一点给我的那些远大的战略问题。

有人贸然地说，这次战争中三军的配合比在上一次战争中要好。参谋长联合会议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一点也不好，”温斯顿说。“一点也不好。它导致软弱无力和胸无成竹的决议——或简直议而不决。唔，你不妨把最英武的海军、最勇猛的空军或最胆大的陆军找来，让他们坐到一起来——你能得到什么呢？他们的担心和顾虑。”（这句话是以可怕的啾啾声加重讲出的。）<sup>②</sup>

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并不是唯一受他抨击的人。但是我了解，正如大家都了解的那样，加在他身上的担子是何等沉重，而他又是何等不遗余力地决心追求他的目的。

我们在当天下午抵达阿尔及尔。首相明智地决定继续走海路。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我知道摆在他前面的是一个何等令人

---

<sup>①②</sup> 1943年11月16日。

精疲力尽的时间表：开罗，德黑兰，再重返开罗。船搁延的时间以接见完乔治将军为限。我不太欢喜这种作法，但是由于有现在围绕着黎巴嫩所掀起的大风暴，所以任何一阵小小的暴风雨也就无所谓了。

傍晚，我同鲍戈莫洛夫和墨菲一起去拜访马西格利，交给他一份正式请笺，请法国委员会指派一位出席新设立的意大利事务盟国顾问委员会的代表。这至少是现在所要下的苦药的一层薄薄的糖衣。 425

梅金斯把我公出期间关于黎巴嫩所发生一切情形告诉了我。卡特鲁将军已到开罗，曾经同凯西两次晤谈，凯西不但要求召回埃勒，释放黎巴嫩各部部长，而且要求让他们一律官复原职。第二天首相在船上给凯西拍去一份电报，略称英国政府不能无限期等待被捕的政府人员的释放。那天下午，戴高乐将军在新成立的协商会议特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项关于时局的声明，措词相当温和。我想他对于几位委员所表达的公正的意见获有深刻印象；无论如何，他所采取的方针是：这个事件正在解决过程中。

11月17日，外交部指示凯西：如果我们的要求在18日晚得不到满足，他应于19日去贝鲁特，以21日，星期日上午10时限期届满的一项最后通牒通知卡特鲁将军。英国军队将负起法律和秩序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能在保卫整个中东的这样一个重要战略地点听任危险局势发展下去。同时，我接到外交部的一份电报，列举了局势各种可能的发展，但是其中有一项明确的声明：“我们并不坚持立即恢复旧政府”。第二天整整一天，电报从伦敦、贝鲁特和开罗不断送来。我确信，只要给我以机会，我是可以从法国方面争取到英国政府所提的合理要求的。但是我想以一种保全而不是摧毁在阿尔及尔将近一年的工作并能说服所有是我们朋友的那些温和法国人的方法，来争取到手。我不愿意有一次法舒达事件，然而

我不能不认为确有一些这样的人。

我还对卡特鲁抱有很大信心，因为我对于他的机智和外交手腕<sup>426</sup>领教已久了。当然，卡特鲁曾经抗议对各部部长立即官复原职，但是总的说来是抱和好态度的。这时确乎有一个和解的机会。

11月19日，法国委员会开了整整一上午的会。戴高乐将军建议拍给卡特鲁一份不妥协的电报，力劝他不作任何让步。但是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经商定听由卡特鲁根据他自行提出的方针来谋求解决。他的方针是：应立即将总统和各部部长释放，应督促总统组织另一个在一位新总理领导下的政府，以便立即与该总理开始谈判来解决更大的问题。他们也希望，为顾全面子，暂缓将埃勒解职，至少暂缓三、五天。在同一天下午，凯西向卡特鲁递交了备忘录，其中包括有将于22日，星期一上午10时限期届满的一项最后通牒。我至少已经将满限的日期推迟到星期一，所根据的理由是在贝鲁特和阿尔及尔之间交通困难，尤其是对法国人来说。这项以书面提出的文件中包括有这样一项要求：总统和各部部长应“恢复他们在最近一次危机以前的地位”。我奉命以一份副本立即送交马西格利。

由于局势在我看来对我们和法国关系的前途十分严重和具有威胁性，所以当我在20日上午9时拿文本给他看时，我同意在委员会开会以后再正式递送给他。这样可以使他根据是非曲直对问题进行辩论。因为前两夜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收阅来自各方面的“最急”电，所以这真是令人焦灼不安、精疲力尽的一天。在中午时，新协商会议的共产党委员的一个代表团提出了一个比较轻松的调子。“他们祝愿英国事事顺利，特别祝愿战局好转。一个无奇不有的世界！”<sup>①</sup>

使我大为安心的是，马西格利于下午4点来访，告诉我他已经

<sup>①</sup> 1943年11月20日。

使召回埃勒和释放各部部长之议获得委员会的通过，只有戴高乐<sup>427</sup>和另外两人表示反对。但是同时他提出紧急呼吁，要求延展时限，以便得以对所涉及的其他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我在分别致外交部和首相的电报中都大力予以支持。但这时外交部又回到它以前的看法。我收到一份电报，略称：凯西11月19日的备忘录业经战时内阁正式批准，他们不能同意黎巴嫩各部部长刚刚获得释放就另组新政府。我不得不据以通知马西格利。在20—21日夜间我还收到了一份电报，坚持时限必须定于22日上午10时。我再无能为力了。但是马西格利以非凡的手腕处理了这件事。下午他送给我一份法国委员会将于当日5时发出的公告文本。他还将送给我一份对他们所受待遇的正式抗议书。我对第一份要比第二份重视得多。

法国的决定颇不失为明智。它把这件事作成象是由他们自己或者根据卡特鲁的建议作出的。它召还埃勒；它释放黎巴嫩共和国总统并恢复他的职权；它只是释放各部部长（而关于他们的地位问题则含糊其词）。但是他的确至少看上去象是一项出诸自愿的决定，并的确保全了一点面子。

我将这一切（以及正式函件的原文）电告各方。我了解关于各部部长复职的问题还会有进一步的麻烦，但是能作到这个地步已大非易易。<sup>①</sup>

英国政府一收到这项公告也作了让步的姿态。既然这个争端现在已经缩小到各部部长复职的问题，所以时限将展期到24日，星期三，上午10时。在我看来为这样一件小事而用什么最后通牒似乎是荒谬的，所以我继续向外交部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总统和各部部长都已经释放了，埃勒已经送回阿尔及尔，无疑我们应该给卡特鲁一点回旋余地。幸而有另一层糖衣可供利用。下午七点<sup>428</sup>

<sup>①</sup> 1943年11月21日。



钟，墨菲和我往访马西格利，递交他一份备忘录，略称英、美两国政府现在承认达尔朗—克拉克协定已时过境迁，因此准备同法国委员会就我们在北非的军事需要，商谈一项更符合于法国临时政府当前所持政治立场的新协定。这使马西格利很高兴，我们立刻对一项有待发表的公开声明取得了一致同意。当晚晚一些时候，我认为我该去拜访我的朋友。我发现他有点沮丧。关于目前未解决的一点——各部部长的自动复职问题——真会坚持时限吗？然而，在谈话过程中，他偷偷告诉我说，他已经接到卡特鲁的一份电报，力请照办，实则打算自行负责照这个办法去作，除非委员会竟然明令禁止。

他问我我们的最后通牒是否适用于这一点。我说……是否最好让我尽可能迟一些给他答复？所以我同他商定，将来再给他写一封信，等明天内阁会议召开给他送去。

如果他能通过辩论说服他的同僚采纳卡特鲁的建议，恢复各部部长的原职，他就这么办。如果问到英国是否有关于这一点的最后通牒，他可以说他不知道（我的信尚未送到）。<sup>①</sup>

翌晨，23日，我们按计划进行。

按照商定的时间，我给马西格利的信于11时30分左右给他送去。英王陛下政府的决定当然非告诉他们不可，但是我很愿意看到马西格利能如愿以偿而不提及这封信。这对我们和他将来都好。<sup>②</sup>

这个小小的谋划进行得很圆满。午餐后

429 马西格利打电话来说，他已经说服了委员会，使黎巴嫩各部部长复职的命令将立即发出。我是否一定要立即发出必要的电报，以避免明早有发生某种误会的危险呢？我推断他不曾利用我的备忘录而是根据卡特鲁的电报通过的。<sup>③</sup>

下午晚些时候，我到马西格利的办公室去拜访他。在协商会上有

① 1943年11月22日。

②③ 1943年11月23日。

过一次关于外事的辩论，这次辩论大体上是有帮助的。而且在会议上一切都很顺利。只有戴高乐、普利文和迪泰尔姆曾经反对他。我们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会议刚刚开始（上午10时），戴高乐就说，“我想，英国又有最后通牒。”“我毫无所闻，”马西格利说，“我们就要讨论卡特鲁的一份电报”（他于是把电报拿出来）。

马西格利是既疲劳而又焦急，但是却真有点洋洋得意。<sup>①</sup>

第二天凌晨，我从阿尔及尔动身去开罗。黎巴嫩危机是最令人精疲力尽的一次，因为与前几次不同，大部分是我无法控制的。

然而，我们很成功地渡过来了……因为我们没有让法国委员会太为难就得到了我们想要得到的一切。我对马西格利一直是真正钦佩之至，而看到内阁新成员的崭露头角也确是令人鼓舞的。<sup>②</sup>

在这期间，任命达夫·库珀作为我的后任一事，已经得到了一致同意。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由于黎巴嫩的风波，可能使达夫的任命和他的美国同僚的公布推迟下来。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明智的。这使法国方面对于我向他们讲的话——也就是，我们决无意使他们忍屈受辱——更加相信些。我们只不过为了他们的利益也为我们本身的利益，希望有关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政治问题有一个适当的解决而已。<sup>③</sup>

我已动身去开罗，于傍晚到达。在阿尔及尔的这些日子德斯蒙德·莫顿一直和我形影不离。他不但是一位非常好相处的客人，<sup>430</sup>而且是大有用处的，因为他是丘吉尔的莫逆之交，关于应采取何种对策最为妥善，也多所见教。他同我们一起来到开罗。我们从机场驱车到我过去曾经同凯西一起住过的切斯特·贝蒂别墅。这里已经暂时成为首相行辕。我们受到了随从人员的现已熟悉的面孔的欢迎。我立刻被召见。丘吉尔，象往常一样，坐在四周都是红箱子

<sup>①</sup> 1943年11月23日。

<sup>②③</sup> 1943年11月24日。

的床上，吸着必不可少的雪茄。他看上去精神比在“声望号”船上要好些。

他以不平常的耐性倾听我——从我们在阿尔及尔的立场出发——谈论黎巴嫩危机的原委。他似乎对我下述的论据获有深刻印象：戴高乐自己的人曾经制止他走极端，这种办法比英、美两国施加压力要有效得多……施加压力的办法只能授戴高乐以把柄，使他得以成功地借此唤起法国人的自尊心和感情。<sup>①</sup>

傍晚我去英国大使馆同亚历克·卡多根<sup>②</sup>商谈这一切风波。他象往常一样的沉着镇静、见闻广博和聪慧明达。

原来一直希望安排一次斯大林可以出席的会议，至于可能的地点则莫衷一是。最后，斯大林不同意去比德黑兰更远的地方，于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举行预备会之后就到那里同他会合。但是，中国方面则富有魅力地以大批随从人员辅助下的蒋介石将军和夫人为代表。

由于有一家报纸泄露了消息，以致安全方面的安排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不经过两、三道关卡和出示数不清的通行证就寸步难行。首相住在梅纳大厦。总统下榻所谓的柯克别墅（柯克大使的住宅）。其他显要则分配在别墅或饭店，或住开罗。会议本身则在  
431 梅纳大厦饭店举行，饭店恰恰位于沙漠的边缘上，临近金字塔。天气很好，干爽而温暖，和我们在阿尔及尔所遇到的坏天气相比，大不一样。

正象在卡萨布兰卡一样，摄影师忙得不可开交。

照像是分组进行的。首先是巨头，也就是  
总统，  
首相，

---

① 1943年11月24日。

②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外交部常务次官。

蒋委员长和夫人。

其次是幕僚人员。

这里的场面实非笔墨所能形容——所有听到过名字的美、英官员都在场。……当我们站在别墅花园里等待的时候，真像是拍制《艾丽斯漫游记》新闻片中的一种如痴如狂的游园会。当然，在场的有三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金海军上将、布鲁克将军、波特尔空军中将、坎宁安海军上将——连同置身其间的迪尔元帅、萨默维尔将军(美国)等等。继而是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特德、威尔逊将军(东中总司令)(亚历山大不在)。……继而突然在散步场上出现了路易·蒙巴顿勋爵、史迪威将军(美国)和卡尔东·德维亚尔将军——都是来自印度战场的。此外，都是军衔较低的知名人物：帕格·伊斯梅、李海海军上将(总统的侍从武官)等等。

在“巨头”(总统、首相等)〔和〕他们的陆、海军幕僚人员〔照过像〕之后，就是文职人员了。在这张像片中有哈里·霍普金斯(总统的私人顾问)、艾夫里尔·哈里曼(美国驻苏联大使)、怀南特大使、墨菲、柯克(美国驻埃及公使)等。还有安东尼·艾登、亚历克·卡多根爵士、莱瑟斯勋爵、基勒恩勋爵(过去的兰普森——英国驻埃及大使)、凯西勋爵(国务大臣)和我自己。

这真正是一个极其不寻常的举动，(我认为)也是一个有益的举动。<sup>①</sup>

接着就是在凯西别墅中举行的盛大宴会，席间以丘吉尔和艾登为主要人物。谈了很多关于中东法国人的问题，并且有一些激烈的争论。我想丘吉尔是疲乏了，他也原该疲乏了，所以有点啰嗦。 432

事实上，如果有人大胆同他争辩，我想他是不会引以为憾的。看着他如何在一、两天之后取别人的一个论点作为他自己的论点而加以重述，倒是令人快慰的。虽然他看上去总不像是在留心听，但是没有听到的却很少。<sup>②</sup>

午餐后(一直持续到3点30分钟左右)，我回返开罗。除了关于地

①② 1943年11月25日。



中海东岸诸国问题的预备性会谈，我没有任何真正工作可做。我认为斯皮尔斯曾经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他很巧妙地为他的立场辩解。但是对法国人持坚定态度而不引起他们这样深的反感，无疑还是可能的。

第二天我们作进一步的讨论，对法国和对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政策最后确定下来，并向所有有关方面发出了必要的指令。我曾经作了一点斗争，但艾登(对我)帮助很大。

我们必须一方面向法国人，一方面向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清楚表明，我们决不想看到法国在地中海东岸国家的利益遭到破坏。我们既不想排斥法国人，或(更不想)取而代之。我们希望在1941年为地中海东岸各国的独立所作的十分明确的保证能得到贯彻执行，这对法国方面来说将意味着和在伊拉克或埃及的我们享有一种类似的地位。这两个国家现在都是完全独立的。我们不再在那里设置高级专员而是派驻大使了。但是我们有自由商定的特殊条约保证我们特殊的权利，根据那些条约证明我们过去和现在在这些国家享有的权利是正当的。

至于争取独立的现实方法，叙利亚人和(尤其是)黎巴嫩人都必须有所退让。必须告诉他们，他们不能依靠我们的帮助把法国人驱逐出去，而只能得到主要提到的那种公正的安排。同样，也必须告诉法国人说，他们只能采取这种宽大和进步的政策，他们不能不采取这种办法，否则他们在近东的利益必然最终丧失。

所以，我们一致同意要让法国人同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进行商谈。我们不想插手，除非双方要求我们参加作为仲裁人。<sup>①</sup>

433 尽管有这种种困难，我无疑认为，戴高乐对于英国政策真正受到启发、阿尔及尔政界广泛认定的那些公正的目标，获有深刻印象。仅仅几天之后，他在康斯坦丁就法属北非穆斯林人的愿望和法国的进步意向，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

这时和我初次相逢的“大象”威尔逊将军，给我的印象是敏捷、

---

<sup>①</sup> 1943年11月26日。

聪明而宽厚。他对于形势采取一种稳健得多的看法，认为斯皮尔斯的说明有夸大其词之处。除了这些关于法国的谈论，我清楚看出，地中海指挥权的前途仍在未定之天。这自然牵涉到我自己的地位。在这期间，我返回阿尔及尔，又从那里前往直意大利，只是在12月4日我回到开罗时，这个问题才得到最后解决。

5日，星期一，大约晚11点钟，我在莫因勋爵家里刚刚要就寝，却奉召去柯克别墅。我已经在两天之前离开布林迪西，之后，似乎曾经有电报给我，要我安排苏联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维辛斯基在总统和首相从德黑兰返回时到开罗和他们会面。艾登郁郁地问我怎样同他商定的。显然他们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安排妥当。我根本没有收到过电报，而且无论如何维辛斯基已先从巴里乘汽车去那不勒斯。我们所以力图找他来的原因，一则是为了表示敬意，因为他是俄国资历最深的部长之一；一则无疑是为了帮同对土耳其人施加一定的压力。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来作出安排。当我被带进客厅，看到总统和丘吉尔同坐在一张沙发上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以后了。这里进行着和我在安法听到过的同样路子的一种非常莫名其妙的谈话。罗斯福似乎认为法国不可能重振国威，印度支那不应再归还法国管辖；西非的达喀尔应置诸美国的保护之下等等。这种反殖民主义是罗斯福的性格的一个强有力部分，至于如何方能在这些大殖民帝国逐步实现其独立而又不致引起紊乱，并能最具有成功之望，他的想法似乎是很不成熟的。

434

丘吉尔和我在凌晨二时左右离开总统的行辕，我同他回到他自己的别墅，

在那里我们谈论了法国（他在争论中依然反对我的看法，但是实际上却大部分接受了）、英国政治、俄国、<sup>①</sup>下届大选、地中海战事等等。他大谈其莫斯利辩论。他曾以电报询问是否有任何大臣曾经弃权或投反对票。

<sup>①</sup> 参看本书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第14页。

结果使他颇为失望。“我曾清楚表示，至于现政府，所有辞呈都将欣然接受！”

“这是否意味着，”伦道夫说，“凡是想要参加的都可以参加呢？”“不是，”首相冷笑着回答说，“但是你可以参加排队。”<sup>①</sup>

这一次我们也讨论了地中海指挥部的前途。如果要由一位将领总揽大权，那么这位将领应该是艾森豪威尔呢，亚历山大呢，还是威尔逊呢？是要除掉凯西还是除掉麦克米伦呢？我继而听说丘吉尔试图让凯西接受孟加拉总督的职位。第二天我同英国驻希腊流亡政府大使雷克斯·利珀和内定驻南斯拉夫的拉尔夫·史蒂文森作了商谈，关于法国人和黎巴嫩的问题也有进一步的讨论，但一切进行顺利。

12月7日下午7时，我被首相叫去。

他虽疲乏，但得意洋洋，因为在最后时刻，他的政策——他的战略政策——获得胜利。远东的冒险推迟，一切力量将(尽可能)集中于地中海和北欧战役。如果再能有相当的物资供地中海战役之用，我们甚至在冬季就可取得一定的进展。

这尤其涉及到北非和中东司令部合并的问题，所以地中海(意大利、达耳马提亚、巴尔干、希腊、爱琴群岛和土耳其)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战略问题。

435 首相向我解释了所有这些概念。指挥权的统一问题解决了。<sup>②</sup>人选还没有确定，但无论如何将是一个英国军官。艾森豪威尔将去英国接受〔“霸王军事行动”的〕最高指挥权……比德尔·史密斯也许(甲)和艾克同去，这自然是艾森豪威尔所希望的，(乙)留在这里担任副总司令。

首相问我对这一切的想法以及对于司令部的组成有什么意见。我问到政治方面，他告诉我凯西要离去，他的遗缺还没有补。所以我猜想我照管的地区将会扩展到整个地中海了。<sup>③</sup>

---

① 1943年12月6日。

② 负责统一指挥权的司令官通称为地中海盟军最高司令官。

③ 1943年12月7日。

现在清楚的是，不久将有一位英国将军接替艾森豪威尔。人选将不是威尔逊将军就是落在亚历山大将军的身上。帝国参谋总长布鲁克将军赞成前者。首相要我提出我的意见，但是事先要同布鲁克将军一谈。我认为亚历山大好些，因为他比较年轻，而且我很了解他。但威尔逊显然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军官。我简单地、多少带点试探性地同布鲁克将军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显然不欢喜我在这项决定中起任何作用。第二天傍晚，丘吉尔又派人来找我。他要我把我对地中海司令部的看法写成书面意见。因而我呈给他一份备忘录，其款目如下：

首相

兹遵嘱与帝国参谋总长商谈后，将附件拟就呈上。

亚历山大将军是否具备最适合于担任这样一个机构中的总司令职责的军事品质，我当然不了解。但是我深深认为下述各点应予权衡：

1. 亚历山大将军指挥英、美地面部队，卓有成绩。他把部队从突尼斯的绝境中挽救出来，他在两国部队中声誉卓著。

2. 他已经学会了驾驭美国人的这种难能可贵的艺术；军民两界都对他极有好感。

3. 就我过去同他的谈话所能作出的判断，他具有使问题简化而不是使它们更为复杂的本领。

4. 他生性纯朴，专心致志于战争目的而别无外务，这是一个军事领袖所必需具备的性格，也是部队所瞩目的。

所以，如果您唯一的耽心不是在专业方面，而是怕他会为政治问题多费精力或多所分心，那么我希望您相信——如果您能把这项工作委托给我的话——我将可以在我所能指望的墨菲的支持下，除比较重要的决定外，多为他分劳，从而有助于使他的工作轻松一些。

哈罗德·麦克米伦

结果，选中了威尔逊将军，然而我对在意大利战役的现状下，能把军事行动的战术指挥交在亚历山大手里是明智的这一点，还是深



信不疑的。我将要和威尔逊将军有九个月的共事，这是非常愉快的九个月，因为他才智兼备、聪明谨慎。在1944年11月间，迪尔元帅去世，威尔逊随即调往华盛顿，亚历山大奉派继任。在目前这段期间我将同威尔逊将军亲密无间地共事于意大利。

继而我们又回到阿尔及尔新的困难上去。我的主要目的是要在达夫·库珀到职以前把一切料理就绪。我认为法国危机已经使我不胜其烦了。丘吉尔曾经打算在回国之前来阿尔及尔小作勾留。但是在12月13日星期一我接到突尼斯方面的电话说，他因为重感冒而卧病在床了。

我是否要商同盟军总部把一台手提式X光机立即送去，以便诊断肺部的情况呢？他们担心是肺炎。我和德斯蒙德·莫顿可否尽速亲自去一趟呢？

忙于拍电报、打电话、查明这种讨厌的天气是否可以飞行，忙了整整一上午之后，我们发现突尼斯一家医院里有一台非常合用的X光机。①

437 德斯蒙德·莫顿一直和我形影不离，我们取道海路，总算顺利地飞往突尼斯，于傍晚到达。丘吉尔坚持要当晚接见我，但是他看上去身体虚弱，昏昏欲睡。我尽快溜出来，因为我确信他见的人太多了。第二天就要证明是最令人苦恼、最令人焦虑的一天。

首相病情显然恶化，他已经染上肺炎，他们还担心肋膜炎。威尔逊将军到达。他无疑要担负起地中海的指挥权。……

首相要我同这位将军商量一下司令部的组织问题，并写一份报告给他。

尽管发烧(101°)，他在晚间还是处理了这个问题，并就这个问题拟就给内阁一份很长的电报。

非常沉闷的静候消息的一天。莫兰看上去忧心忡忡。他正向各地发电报，延请专家。②

① 1943年12月13日。

② 1943年12月14日。

第二天首相病况无疑是更坏了。

他的脉搏很不规则。贝德福德准将（一位心脏病专家）终于从开罗到来。他看上去是有判断力的，这使我们感到宽慰。他正在用强心剂试图镇定心脏。……

终于一位巴特尔上校——伟大的心脏病专家——从意大利到达。他对于用药具有专长。他看上去聪明而果断——正是我们需要的那种人。我同他作了一次长谈，并请求他务必要坚决，禁止首相批阅电报或会客。

下午6点，首相的心脏病发了一次——所谓“原纤维性病变”。不很严重，但是已使他们大家惶恐万状。正在使用更多的强心剂。……

莫兰勋爵对我说，他原认为首相昨夜要与世长辞。他认为他肺炎稍稍好一些，但是他的心脏可虑。<sup>①</sup>

这是他的危险病症最严重的时刻。对于那些不仅敬重他而且爱戴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将来怎样办——英国、英 438 帝国和大联盟怎样办呢？没有了我国历史上的这位最伟大的领袖，我们怎么能对付仍然等待着我们的这些严重的考验？

但是第二天他无疑好转了——他的脉搏稳定些，他的肺开始清朗。专家似乎认为他已经渡过了危机。

因为在突尼斯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作，我决定返回阿尔及尔，那儿的工作正日益山积。我行前去看望丘吉尔。他兴致勃勃，虽则非常虚弱。在随后几天，关于他的消息依然良好，到12月21日，显然他已告痊愈。在这种情不自禁的如释重负和谢天谢地的心情下，则感到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在话下了。

在此后几天中我遇到一、两件不太重要的法国纠纷。关于法国部队的使用问题有一些毫无价值的争论——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受盟军总部的指挥，又在何种程度上听命于法国委员会。我们在黎巴嫩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马西格利和卡特鲁都证明是像往

<sup>①</sup> 1943年12月15日。

常一样地有帮助的。但是最后一次争吵这时正在酝酿中。这一次是关于“清洗”或“刷新”的问题的。

为处理这个问题，很多方面正在对法国委员会施加很大的压力。戴高乐派决心要对法属西非前总督布瓦松和曾经在比塞大同德国并肩作战的埃斯特瓦海军上将的副司令德里安海军上将之流予以法办。抵抗运动的其他成员也同样决心要抨击维希前阁员皮舍和弗朗丹之流。其他人等无疑不久也将会依法处理。

在我来到的时候，曾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的夏泰尔和任摩洛哥总督的诺盖将军已经深谋远虑地逃往葡萄牙。至于曾经在亚历山大港生气生了那样久的戈德弗鲁瓦和在卡萨布兰卡反对我们而后来又步达尔朗后尘的米歇利埃这两位海军上将，已经用把他们列入退役名单这一简单办法予以处理了。除不准他们住在诸如比塞大或卡萨布兰卡这类的码头城镇——这似乎不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禁令——外，不曾或不会对他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所以，我们还剩下五个重要的案件：皮舍、德里安、布瓦松、佩鲁东和弗朗丹——或许还有贝尔热雷。

皮埃尔·皮舍曾经是在巴黎把成千成万的法国人递解给德国人的直接罪魁祸首；德里安海军上将也很可以认作是积极的叛国犯。我觉得不大像是要过为已甚，也许除了这两个案件——当然，除非我们干预其事，我们自然是进行了干预。

首相正在很快地复元——简直太快了——正在我为汉密尔顿·吉布教授那位著名的阿拉伯学者举行午宴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首相非常兴奋，在电话上像一只受了挑逗的公牛一样的嚎叫——在这条线的不同段上有很多英、美接线员和所有法国职业“监听人员”都偶尔听到了。他无疑有了惊人的恢复。<sup>①</sup>

---

<sup>①</sup> 1943年12月21日。

埃德·威尔逊(新任命的美驻法委员会大使)和我无论如何要在这天(21日)下午去拜访马西格利,以便从他那里领取一份取代达尔朗-克拉克协定的法国草案。在这方面,一切进行得很令人满意,建议看上去非常合理。我们乘机同他谈到逮捕问题,并表示希望这不意味着广泛整肃的开始。他显然很烦恼,认为要制止已经采取的行动来不及了。麻烦是集中发生在逮捕和监禁佩鲁东、布瓦松和弗朗丹的问题上。对于佩鲁东,美国人负有直接责任,因为他们曾经说服他离开南美的庇护而在年初把他送到阿尔及尔。总统对布瓦松非常重视;弗朗丹则在战前曾经是丘吉尔的朋友,由于他向以忠义待人,所以他希望在他跌倒时假以援手。在1936年重新武装莱茵兰的危急时期,他曾经在伦敦款待过弗朗丹。<sup>①</sup>

第二天,首相几乎每小时都有电话打来,询问关于即将进行的 440  
逮捕。

我确信这样对他很不好。他今天在电话上这样发脾气,我真怕他会中风。<sup>②</sup>

12月22日下午6时,当威尔逊和我去拜访马西格利时,他对我们说,在把我们前一天的非正式谈话报告委员会之后,他奉命说:贝尔热雷、皮舍和德里安的逮捕是业经宣布的政策的结果。委员会在几个月以前就已宣布了它的意旨:维希政府的部长以及对迫害爱国志士和对抵抗盟军的军事行动负有个人责任的其他人等,应依法惩办。根据法国的诉讼程序,应有一次由预审法官进行的预审。虽然委员会不能干涉司法程序,但是他们确信事实上法官会认为,不论开释或审判都没有充分的证据。所以,事实上预审将延期到法国解放以后。这将适用于所有或差不多所有这些案

<sup>①</sup> 本书第一卷《风云变幻》,原书第466页。

<sup>②</sup> 1943年12月22日。



件。对此，我们回答说，既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日子会在哪一天，那么要把这些人一律监禁或给以粗暴对待，似乎是很难忍受的。像“管制”这类宽大得多的办法也许会是合适的。马西格利对我们说，实则这是委员会的事情而不是法官的事情，他希望以这类方针为依据的某种办法会是可能的。

第二天，局势恶化起来。

收到了总统致艾森豪威尔的一份最不寻常的电报。电文如下：

“你应指示法国民众委员会立即释放佩鲁东、布瓦松和弗朗丹，并撤销诉讼。”

这封（致艾森豪威尔而不是致美国大使的）电报真是岂有此理。埃德·威尔逊怒不可遏；艾森豪威尔正在意大利。<sup>①</sup>

441 当天上午，在同威尔逊商量之后，一致同意由他在下午打电话给国务院表示

(1) 他不能接受只有艾森豪威尔奉到命令而他本人（威尔逊）未获通知的这样一种处境。

(2) 他反对显然意在造成最后决裂的这种处理事情的方法。<sup>②</sup>

在这期间，我曾经拍给艾登一份电报，并照原电拍给丘吉尔一份，提醒他说，我曾经根据他的指示，在10月23日就1940年6月至1942年11月英国臣民在法属西非受到的残酷待遇，致马西格利一份确凿有据的抗议。我曾经正式敦请委员会，作为法国荣誉受托者，惩罚有罪，赔偿受害人。我们的商船海员所受的酷刑是罄竹难书的。布瓦松曾试图否认所述种种，但是后来不得不承认都是事实。英国海员之一总结了海员们的观点，在他们的报告末尾对法国当局说道：“不要忘记，总有一天要同你们算帐。我敢向你保证，几百名英国商船海员将以无限的兴趣注视这项新闻。”我认为

---

<sup>①②</sup> 1943年12月23日。

这样提醒一下是适时的。

威尔逊和我在同一天下午会见比德尔·史密斯。他对局势非常悲观。他看不出他或艾森豪威尔将军如何能拒绝总统的直接命令。但是在压力之下，他同意迟两、三天再采取行动。

我已经同首相通过另一次电话，他似乎对于他所挑起的这种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大为吃惊。我不认为他曾指望总统会反应得如此之猛、如此之快。

总统痛恨戴高乐和法国委员会。他要抓住任何借口来推翻他们，以便使吉罗东山再起。

首相的情绪比较复杂。他对戴高乐的心情就象一个同自己儿子争吵过的人一样。他要取消他的继承权。但是他(心里)却深盼浪子回头。①

丘吉尔这时就总统所建议通牒的条件及其递交的办法致电总统。442  
比德尔·史密斯(象我所能告诉外交大臣的那样)同意我的看法：照字面执行总统的命令，必将促使非常严重的局面出现。毫无疑问，委员会将拒绝服从。我们的虚张声势吓不了人。但是我们经不起人家无视我们的虚张声势。所以我们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来强制执行我们的要求。为此，必须作出有效的军事部署。所以，英、美部队必须作相应的调动。我确信丘吉尔的轻率行动是由于他生病。

电报(天呀！还有电话)日夜源源不断。(当天下午我正在参谋长房间里的时侯，首相甚至打电话给他说，“让哈罗德不要走歪路。他太亲法了。他不愿贯彻我的政策或我的希望。我就指望你了！)②

我爱戴温斯顿既那样深厚，不免感到有点不快，的确有点吃惊。迄当时为止，我给艾登的报告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我对于我任内的最后几天，几乎最后几小时所发生的这一切风波，感到特别痛心。这个婴儿应该早已牢牢地放在达夫·库珀的膝盖上了。他的工作

①② 1943年12月23日。

班子中虽然有些人已经到达,但是不幸,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能给他和黛安娜弄到一幢可以住的合适的房子。在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之前,他还无法使我一卸重肩。

虽然在我们这样长久以来习惯于按步就班的、遵守宪政方法的英国人看来,这些半革命事件自然令人震惊,但是我们必须了解法国人的观点。我们已经娇养坏了。我国 1688 年的革命把一位德高望重、具有魄力的王子放在王位上;但是威廉三世的最大优点或许就是他对英国政治全然不感兴趣。他唯一关心的就是对路易十四的战争。在阿尔及尔的法国人适得其反。他们了解他们只能对战争作出不重要的贡献。法国的解放会是由英、美部队来进行。  
443 他们抱着侥幸于万一的奢想,指望着它的到来。但是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既然是几乎无能为力,这就更加重了苦痛和羞愧之感。他们当下可以作的唯一事情,就是开始一系列的政治犯审问。除少数例外,这些审问都是多亏了戴高乐才耽搁、拖延下来。这种情绪部分是报仇雪恨,部分是雄心壮志,部分是对未来政治立场的表态。

我对于不同的人感觉也大不相同。对于布瓦松,几乎没有什么话可说。他是一个蛮不讲理、暴戾恣睢的人。贝尔热雷无疑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虽是反动的,但是所持的观点却是出于真心诚意。然而当他任吉罗副手的时候,他一直欢喜把别人投入监狱,所以我不认为他现在对于请君入瓮有很大牢骚。无论如何,据我所知,对他的指控不会涉及他在北非作为高级专员的副手的所作所为,而是针对据说他在叙利亚出卖法国利益的行为。至于两位海军上将,他们已经予以合情合理的处理。佩鲁东的情况比较麻烦,因为就某种意义来讲,他是对总统的信赖的受害者。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只要我们能掌握这个问题而不同戴高乐发生头等的冲突,事实上不会发生任何立即判决的问题,除开皮舍可能是一个

例外。

在这期间，除了我们同马西格利小心谨慎的商谈而外，一直平安无事。总统的电报暂行搁置，我将在第二天去见丘吉尔。因为这时他邀我飞往突尼斯去度圣诞节，于次晨返回。

我们抱着这种多少有点焦急、虽则并非绝望的心情，为我们全体班子和像经济委员会这类其他机构的同仁举行了圣诞晚会和舞会。第二天早晨，在8点钟部队拥挤在教堂里举行圣餐式之后，我动身去突尼斯。一到就驱车去首相别墅。

发现他们都刚刚就席，开始丰盛的圣诞午宴——有汤，有火鸡，有葡萄干布丁，还有香槟<sup>①</sup>

这位在几天之前差一点一命呜呼的令人吃惊的人，这整个上午在卧室里主持了两小时的军事会议。他穿了一件饰以蓝、金两色盘龙的中国式丝绸棉睡衣出现于午宴上。丘吉尔夫人、伦道夫和萨拉代表家庭，约翰·马丁、约翰·科尔维尔和汤米·汤普森代表他的工作班子。在坐的还有莫兰勋爵、贝德福德医生和其他医生；“大象”威尔逊将军、内定为地中海总司令的亚历山大将军和盖尔将军；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爵士、空军上将特德和其他几个人。艾森豪威尔和比德尔·史密斯也参加了会议，但在午餐前已飞返任所。

首相以最优美的俄国方式（而且穿着他那套古怪的服装，看上去活像一个俄国巴蕾舞团中的角色）一一敬酒，每敬一次酒都讲短短几句话。

……他以颂扬备至的词句同我干杯。<sup>②</sup>

他有点不开心地看着我，但是我与其说是恼怒，毋宁说是引以为憾。大约4点钟才散席，饭后，我设法同亚历山大将军溜出去作一次短短的散步。

5点30分左右，首相在即将就寝之前，派人来找我。他显然非常疲

---

①② 1943年12月25日。



倦，因为他午餐后一直在工作，口授上午所作军事决议的概要以及包含这些内容的一份拍给他的阁僚和总统的电文。

他只留了我几分钟。他非常睏乏，所以我就告辞出来，因而也博得了丘吉尔夫人的好评，她竭尽全力想让他爱惜一点精力。<sup>①</sup>

我从私人秘书方面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对丘吉尔的兴奋曾经感到吃惊，他们把这归因于他的心脏和一般健康状况。但是他看上去好一些。下午8点左右，举行了一次立食晚餐，为丘吉尔提供警卫工作的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所有军官，连同包括马斯特将军和夫人在内的一些其他的人物，都应邀出席。丘吉尔自己在床上进餐，但后来精神抖擞地出场了。

445 在大约下午11点钟，他回到卧室……派人来找我。他显然很尴尬，真正尴尬到了令人感动的程度。事实上他问我的看法，并给我十分钟让我尽量说明据我所见的当前法国局势。继而他说，“那好——或许你是对的。但是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也许我要会见戴高乐。不过，无论如何，你办得很好。”

然后他非常慈祥地把我的手握在他手里说，“在我离开非洲以前再来看我，我们商量商量。”<sup>②</sup>

我深为感动，我对他的爱慕之忧，重又恢复如初。他的惊人的恢复力，以及他对工作和职责的忠诚，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他把军事会议和一切决议的情形告诉我，包括为安齐奥登陆所作的部署。这时我认识到这些时候一直使他烦心的正是这个艰巨的军事行动。我们的事情是可以让他宣泄一下心中郁积的。说来奇怪，我想他相信我保证不会造成任何不可救药的后果。

在第二天我回到阿尔及尔时，发现整个局势已经戏剧性地翻然一变。总统来了一份电报，他完全打退堂鼓了。再不会有什么最后通牒，再不会有什么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干涉；政治审问问题

---

<sup>①②</sup> 1943年12月25日。

将交由外交人员尽他们力所能及予以处理。

第二天在戴高乐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比德尔·史密斯、威尔逊和我都出席了；在座的还有吉罗和马西格利。会议是很成功的，至少导致了法国军队地位问题的一个临时解决办法。我们随即对于我们所关心的政治犯问题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戴高乐已经给了我们一项正式保证：

(一)在预审期间，他们将拘留在一个适当的别墅内，给以一般的享受和锻炼身体机会；

(二)真正的审问将推迟到法国解放以后，也就是直到一个依法的立宪政府取代委员会时为止。

艾森豪威尔将军致电总统，极力促请他接受这些保证。威尔逊致赫尔 446 以同样的电报。我则建议艾登和丘吉尔，主张现在应该将这个问题丢开。我担心首相会有一些反应，但是如果总统接受了这些条款，首相要是（在对我怒气冲冲地咆哮几次之后）不这么办，那倒会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所以，事情就是那样的。紧跟着这样多次的感情激动之后，又感到通常的那种单调无聊了。<sup>①</sup>

我认为满意的是，戴高乐和政府中较老的成员都渴望把清洗限制到最小限度，事实原来也是这样的。在来年3月份对于皮舍的审问势将发生新的困难。但是不存在任何不守信用的问题，因为他不包括在首相和总统为之说项的那些人的名单之中。在我到达阿尔及利亚差不多一周年时，1943年的多次阿尔及利亚危机中的最后一次就这样告一结束。

新年时，丘吉尔已经能够到马拉喀什去休养。泰勒别墅立刻就成了车水马龙、辐辏之所，大量各种各类的事务都在那里进行。他随即发现他可以很方便地从那里给阿尔及尔打电话，而竟把一切安全规定都置诸度外了。一时想起，他就任其所好，搞一套离奇

<sup>①</sup> 1943年12月31日。

的、令人莫名其妙的提防办法。举例来说，因为弄不懂他要把“菜农”尽快送到他那里是什么意思而使我大伤脑筋。邀集我的小工作班子共同讨论，也不能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自然是正在阿尔及尔进行访问的捷克流亡政府首脑贝涅斯总统。我们多么愚蠢；“豆类”是明显的答案。<sup>①</sup>

丘吉尔决不记恨，这是他最吸引人的特性之一。因而1944年元旦，在出席戴高乐为以我为首席代表的外交团举行的招待会之后，我遵嘱给首相打电话。丘吉尔把最近的争吵忘得干干净净，决定采纳我的意见，会见戴高乐，同他作一次坦率的商谈，希望取得永久谅解的某种基础。但是依旧是那种火爆性子，他坚持要戴高乐必须在接到通知后二十四小时之内前来。尚未收到的一份电报已经在当天早晨作急件发出，要我进行必要的安排。我是接到这个电话才得知其事的。

第二天上午8点钟，首相宏亮的声音就开始从七百英里外响起来了。问道，对于他的邀请为什么没有回音？问我在干什么？在10点15分我去见戴高乐，把首相的紧急邀请转达给他。

果不出我所料，他对这个邀请没有多大显见的热情；并且补充说，他非常繁忙，自然不能这样就马上改变他的计划。而且首相近来一直故意给他钉子碰，反对他。当然，我对戴高乐说，这一切都与本题无关；现在有一个把事情安置在较好的基础上的极好机会，所以他不能不接受。他最后说他要考虑一下。<sup>②</sup>

贝涅斯比较好讲话，将于一、两天内动身去马拉喀什；但是我担心着戴高乐的最后决定，所以我在午餐时同马西格利讲了一下，请他尽力设法。

---

① Benès〔贝涅斯〕与 Beans〔豆类〕形和音都近似，而豆类又包括在蔬菜中，所以用“菜农”喻贝涅斯。——译者

② 1944年1月2日。

第二天，达夫·库珀终于到达了，虽然他们的别墅尚未布置就绪。他们能够搬进去了，但是他们工作班子的大多数人还住在我们这里。

温斯顿整天在给我打电话，心情非常焦急和激动。他要我撤销对戴高乐的邀请，因为他不能总在恭候大驾。这是太不庄重了；我不大敢激怒法国人等等。

当然，我对温斯顿说，我打算去见戴高乐，尽速取消邀请，但是会面的确切时间我作不得主。我无论如何今天要会见他。<sup>①</sup>

英、法双方为贝涅斯举行的所有那些招待会，弄得很难安排出一个时间。

自然，首相并不真想取消这次访问。他只是想维持他的尊严，在电话上发泄一下他的愤激之情罢了（当然，法国人一天到晚聚精会神地监听电话）。当我同意取消邀请时，他表示失望，并且在每一次电话终了 448（今天晚饭前打来了三次）总是以随我去办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sup>②</sup>

在薄暮时分我会见戴高乐时，出我意料之外并使我大为安心的是他情绪极佳。我还来不及讲什么话，他就对我说，他很高兴地接受了丘吉尔的邀请；只剩确定一个对他们两个人都适合的日期了。我答应把这个口讯立刻转达，但是他耽搁了我一个小时，大谈其法国、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欧洲的前途——都是以一种胸襟开阔、非常友好的口气谈论的。

我打电话给温斯顿，把戴高乐的口讯告诉他。他听到这个讯息，且惊且慰，但对于讨价还价有点厌恶。我不等他再多说什么就把电话挂掉了。<sup>③</sup>

访问安排就绪，并且总的说来是成功的。

在1944年1月4日，我同达夫·库珀正式办了移交，然后去向马西格利告辞。

---

①②③ 1944年1月3日。



他是真正富有魅力的，对我为他们作的事情，恭维备至，使我愧不敢当。然而，听来令人非常快慰！<sup>①</sup>

我同海军部长路易·雅基诺那位老好人共进午餐。他邀有一大批海军上将、舰长和司令，并就我为法国所作的贡献发表了一席非常亲切的讲话。

这时候我的身体不佳，我手上的皮肤因感染病毒，疼痛难忍（无疑是烧伤的结果）。理查森上校希望我有一个月的假期，但是在新地中海司令部正要组织成立的时候，是很难安排假期的。

艾森豪威尔已动身去华盛顿，并从那里逡赴伦敦，所以在阿尔及尔没有正式钱行。他在动身前夕来向我辞行，并力劝我跟他去参加“霸王军事行动”。但是这时我已为意大利事务缠身，期待着范围日益扩大的责任。3月间，当我在伦敦休假时，过去在北非在  
449 他手下服务的海、陆、空军的重要指挥官总算能为他举行一次筵席，赠送给他一个银盘。我应邀参加，并且应允在敬酒时讲几句话。正如艾森豪威尔在答辞中所指出，这幸而是乔治二世的银盘，要是乔治三世的，他就不能把它带回美国了。我想，他颇为我们对他的深情厚意所感动；但这是他分所应得的。在这一年期间，我一直努力领会和钦慕他的真正高贵的品德。我同他结成了永恒的友谊。当然，在这个时候，我并没有预见到他会被“拖进”政治，因为他对政治一向嗤之以鼻。不论他作为军人或作为政治家的盖棺定论是什么，对于他作为人们的领袖的品质却不容有丝毫怀疑。他对盟国事业的贡献是不可衡量的。一个英、美军官并肩供职的完全一体化的工作班子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试验。只有艾克能使它成功。威尔逊完全绍继盟总的传统。艾森豪威尔根据同一方针设立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并终于把这个传统树立在北大西洋公

---

<sup>①</sup> 1944年1月4日。

约组织之中。在必须采取重大决定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决不畏缩。在彼此矛盾的消息会使一个小人物踌躇不决的时候，在北非进行了登陆，在全然意想不到的风暴似乎要置整个军事行动于危险之中的时候，对西西里发动了进攻，最后在进占法国本土的时刻，遇到了可怕的天气。在所有这些成败攸关之际，可怕的决定都有赖于他——在推迟或乱成一团、在重大伤亡或失败的前景下，他照计划而行。艾森豪威尔在所有军事或政治的危机时刻，无不表现出超人的魄力。

从初到阿尔及尔时起，我就已注视到像法国负责政府这类事物在那种混乱局势中成长壮大的情况，这番经验是毕生难忘的。虽然我同法国委员将不再有任何正式交往，但是在1944年7月以前盟军总部既不能迁入意大利，这却使我同法国事务的发展依旧保持着密切接触。在我经历中最最令人神往的就是我同戴高乐将军的关系。我毫不怀疑他的伟大或摆在他前面的重任。在我看来同样清楚的是，不管罗斯福和美国国务院怎样，什么也阻止不了他成为解放后法国至少第一个阶段的领袖。因为戴高乐，尽管有很多缺点，却赋有真正的才华。由衷地热爱法国、凡是涉及法国利益之处立即显得铁面无私的那位褊狭、半革命半反动的戴高乐，显然现在要成为法国出类拔萃的一位政治家，这种伟大前程，当时已露出苗头了。

## 第十七章 意大利：敌乎？友乎？

对于由于盟军进占意大利领土而引起的种种问题，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插手其中，为时达两年以上。在这段期间，盟军组织，在结构和任务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也许在研究这段时期的学者看来，在设计和执行本来比较简单的计划上却花费了很多不必要的力量。但是为了了解种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我们不能不回忆一下在心理方面以及在客观形势方面的背景。

在我们所面临纷如乱丝的困难之中，有很多各不相干而又往往矛盾的因素。首先就是军事行动的范围。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计划范围既逐渐扩大，新的负担也就不断加在“民政事宜”设计人员的头上了——所谓“民政事宜”即对占领区的行政管理以及同意大利一切残存机构的关系。而且，同战争及其一切成败利钝分不开的变化莫测，由于1943—1944年冬季在加里利亚诺河和桑格罗河出现的类似于僵持的局面而变得特别棘手。所以，事先的计划必须作不断的调整。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意大利人民。作为朋友还是作为仇敌呢？作为敌国还是作为等同于盟国的一个国家呢？在停战协定之后，意大利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怀疑，并且不能理解我们何以对于一种根本改变了的局势迟迟不能领悟。他们同希特勒和纳粹党人结成亲密的同盟已有十年以上，但是希特勒没有把事情做得很好，实际上他已经几乎把他们委之于毁灭和溃败之境。因此，结成一个新“联盟”并正式参加到盟国方面来确乎是明智的。他们曾经先后在里斯本、阿尔及尔和西西里试图向我们表白这一点。不

幸，碍于脑力迟钝和指令颇严，致使我们似乎无法抓住事态的根本变化，仍然抱着老皇历咕囔“无条件投降”这类词句。实则，就某种意义来讲，是意大利人对我们愤愤不平，而不是我们对他们有所不满。他们原来不大会进行这样戏剧性的一种背叛的，除非他们认为可以行之有效。原来打算用来保卫罗马的空运师的撤销，凭靠在东、西两岸一系列登陆来解放至少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计划的落空，通过大陆缓慢而顽强的寸土必争的战斗的发展情形，所有这一切正产生着可悲的后果。意大利非但未能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倒向另一方面来避免战祸，反而变成长期的、毁灭性的持久战的战场。

因此，我们势必促使意大利使它只成为一个地理名词的那几个世纪的分裂局面。首先那里有着一片德国占领区，恰恰从那不勒斯以北直到阿尔卑斯山，其中包括人口稠密的和工农业生产丰盛的地区。其次是盟国占领下的意大利，自那不勒斯至布林迪西，包括西西里和不久之后的撒丁岛在内。但取得进展的迟缓是具有破坏性的。甚至盟军在意大利的占领区本身也随即分成为军事当局管理的部分和重新移交到意大利政府管辖下的部分。在直接统治下的前沿地带，有一套庞大机构，原是为迅速和继续前进而设计的，但现在却阻塞了地方生活的命脉。这个机构的名称就是“占领区盟军政府”，它将来可能是声名昭著的，也或许会是臭名远扬的。它不久又重新改名为“盟国军政府”，并辅之以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名义上在意大利管理下来统辖这一地区。两者都全部以英、美官员为班底。虽然这两个机构名义上是各自独立的，但是为了港口、公路和依然可以运转或可以修复的铁路的有效运用，为了包括食品在内的最低限度民用品的供应，并为了数不清的其他目的，它们不能不密切合作或者必须进行密切合作。在这两个机构——盟 453 国军政府和盟国管委会——的背后，则有随着帕金森式的繁殖而



日益增加的盟军总部中相应的各个小组。最后则是若隐若现的参谋长联合会议的权威，它正象有时是仁慈的、相当恬静的，有时又不是电闪雷鸣就是派他们神圣的和半神圣的信使来给我们训示的奥林巴斯山的众神一样，发布词意模棱两可、玄妙莫测的指示，甚至让人认为他们自己也害怕他们的创造者——总统和首相那两位老神必要时的干涉。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和占领必然有很多困难和责任偕以俱来。过去，比较原始的国家以规避责任来解决困难。征服往往意味着将老者屠杀，将身体健壮的男女大规模送去受奴役。至于其余的人，则可以听其忍饥挨饿。德国人一本野蛮时代的这些骇人听闻的先例，尤其是在东欧。但是保卫高尚原则的文明军队，找不到这样方便的出路。他们以征服者开始，但是不久就以托管人自居了。英国军队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但主要是在北非和东非的经验。随着各式各样的领土进入我们的管辖之下，为了照顾他们，为了维持居民实际可以作到的那样高的物质福利条件，设立民政组织已经认为是有必要的。因而产生了一个通称为敌国占领区政府(敌国境内占领区政府)的机构，从中为意大利事业吸收了很多优秀的官员。但是他们过去多半是同人数不多的、分散的和比较原始的民族打交道，现在我们却要面临管理一个拥有欧洲人口的高度发展的国家这样一个困难得多的任务。而且西西里虽可指望或多或少的自给自足，但是意大利南部却非常贫瘠。在整个战争区域，猛烈的空袭和轰炸无疑会在广大地区造成没有运输，没有交通，没有任何有效地方行政的后果。

最后，在做法上盟国之间还存有分歧，这在早期阶段上就已经  
454 很明显，在意大利投降以后则变得更加尖锐。早在1943年2月，这种争论就已经开始，在“爱斯基摩人军事行动”以前的整个这段时期，一直未曾停过。2月8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致电马歇尔将

军请示。他说英、美两国政策事先不能不取得一致，并且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对占领区居民的态度该是如何的？（这当然是在根本没有发生停战问题以前。）第二，行政管理的性质该是怎样？第三，将由什么机构来拟具必要的计划？这些问题当然都照转伦敦。虽然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不太困难，至少在字面上——“应在与军事目标不相抵触的范围内以仁慈态度对待居民”——对其他问题的答复则不免使英、美两国政府发生了一次长期的、不必要的争论。起初，华盛顿好象主张：既然“爱斯基摩人军事行动”是“火炬军事行动”的继续，那么美国方面应继续负主要责任，伦敦方面则以维护相反的原则，作为回答。应该以英国为主，一则因为我们提供了大部分兵力，一则因为我们这时正进入地中海那个传统的英国势力范围。

在这时候，我在这件事情的地位还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长并未因此而不常常征求我的意见，并把他们的所有电报拿给我看。我也收到大量从伦敦发来的指示和探询消息的要求。我个人认为这种争论是很幼稚的。我反对为主为次这一整套观念。我们应该象我们在艾森豪威尔领导下已经作到的那样，大家都是在一个一体化的平等基础上的同志。真正重要的是要准备一套卓著成效的、切合实际的行动计划。抱着这种看法，所以我在3月12日建议由亚历山大将军担任军事总督；他应该有一个既可与敌国占领区政府相比拟，又适合于应付一个欧洲国家情况的机构附隶于他；这个机构应该以英国人为主管，以美国人为副主管，干部则以英、美两国人充任。为保持亚历山大将军和最高统帅之间的必要联系，应设立一个小组，由两位官员负责其事，以美国人为正，以英国人为副。艾森豪威尔将军依然是在参谋长联合会议同意之下的最后裁决人。 455

这里还剩下一个为司令官们“在政治方面进言献策”的问题。

华盛顿认为应该为这个目的设置一个美籍的副参谋长，这个副参谋长当然会总揽一切大权。英国政府知道总司令在这个机构将不设任何英国顾问。于是我建议由我以驻节大臣的身份充作他的顾问，从而给这位新副参谋长和他的机构以一定的制约。这里遇到了双重困难。第一，由于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习惯，盟总虽愿意和我打交道，但是他们很怕在任何组织计划中给我安排一个位置，因为他们对于要把一位美国政治家，特别是纽约市长拉瓜迪亚硬派给他们，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了。

经过三个月的争论之后，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将不设“政治副参谋长”。墨菲和我受权继续作我们几个月来日常所作的一切，而更加勤勉了。我们的概括方案已蒙接受。亚历山大将军将担任军事总督。由伦内尔勋爵以少将衔担任他的副职。在盟军总部设立一个联络组，以一名美国人朱利叶斯·霍姆斯上校主其事，以马克斯韦尔将军作为他的英籍副手。国务院继续受到两种矛盾情绪的影响——一个是避免再进一步卷入欧洲事务的意愿，另一个是认为西西里居民对美国人比对英国人更有好感。

在停战协定签字，国王和巴多利奥逃亡之后，匆匆设计了另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将命名为“盟国管制委员会”。它起源于9月间派驻意大利政府的一个军事代表团的任命，当时决定：在我们打算移交给意大利政府残存机构管辖的后方地区中工作的盟国军政府官员，应对代表团团长马森—麦克法兰将军负责，而在这些地区实行的管制则只以涉及停战条款者为限。在10月初，我已经派遣哈罗德·卡奇亚作为我在军事代表团（已经发展成为盟管会）的代表，美国方面居于对等地位的则是雷伯。盟管会注定要在规模上和重要性上有惊人的发展。随着盟国军政府开始收缩，盟管会将扩大起来。但暂时它还只是在布林迪西一家小旅馆的几个房间里面工作，然而大批英、美官员正在广泛地调集起来，在提齐乌祖（阿



尔及利亚一个山区游览胜地) 为他们仍不确知的任务接受训练。在这个已经多少有点臃肿的机构上面, 不久还要加上了另一个机构, 这是莫斯科外长会议的产物, 将命名为“意大利顾问委员会”。起初, 它是由美、英、俄、法代表组成的, 后来希腊和南斯拉夫也增加进来。我们的确不能抱怨对我们的努力缺乏兴趣, 或缺少自愿参加者。

但是严重的政策问题随即发生。美国政府, 而尤其是美国总统, 因为美国大选日益临近, 开始对于作为在美国居住并有选举权的人数众多、组织完善的意大利人的亲戚朋友大感兴趣。但是他们曾经受过“火炬军事行动”开始时的那番经验的严重震撼, 对达尔朗协定的抨击在美国报纸上比在英国报纸上甚至更加激烈。对于同声名狼籍的军人政客打交道所受的谴责, 伤害了秉性敏感的赫尔国务卿。美国政府不愿意再遭一次这样的风波。华盛顿在给艾森豪威尔将军问题的答复中, 指示应善待意大利居民一节, 就是和他们国内政治需要的一方面相呼应的。但是小心翼翼地加上了一条但书, 要求“对积极的或暴戾的法西斯分子或公然亲德的分子加以逮捕和清除”。这无疑是为了将来发表之用。事实上, 象大多数指示一样, 不过徒费笔墨而已。

首要的法西斯分子已经消失, 不是流亡, 就是和墨索里尼一起投奔他在意大利北部的残余政府。但是军民机构的其余人员怎么办呢? 我们该怎么对待海、陆军将领和所有其他现役人员呢? 铁路站长和其他人员怎么办呢? 下水道和水电系统的有效运行赖其合作的那些干部又怎么办呢? 我立刻就发现这些指示为保护执笔人比为指示收文单位要有用得多。 457

在西西里登陆以前几个星期, 我把这些分歧总结如下:

在军事前途这样没有把握的时候, 要为政治和行政方面进行计划是非常困难的。而且, 正如在法国问题上一样, 在美国人和我们自己之间



显然存在有政策上的分歧。

概括说来,分歧是这样的:美国人赞成设立一个意大利盟国军政府,即使在该国全境或大部分地区落在我们手中之后;我们则比较现实,宁愿从不妨称之为直接统治的局面(盟军政府)尽实际上所能作到的那样迅速地改变为间接管制——正如我们在这里〔在北非〕实行的那样。……在早期各阶段——尤其是在军事行动依然继续的时候——不能不有直接统治。但是,在我看,一旦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落在我们手中,我们就应该试图物色某种形式的意大利中央政府,虽则我们可加以指导和控制,然而,至于各个地区的直接行政管理这种几乎不可能的工作,却要让我们得卸仔肩。因为单单从人事的观点来看,我就不相信能够根据所需要的规模招募到一批得力的干部。①

停战协定无疑是有利于英国观点的。

对于我们计划工作的第一次考验,出现于西西里。盟国军政府官员没有发现任何同敌对居民打交道的意料中的困难。没有要从作战部队中分出兵力来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必要。虽然有一定程度难免的紊乱,而且盟国军政府第一批只能有比较少数的官员登陆,

458 但是,尽管有盟军轰炸所造成的大量灾难,可是到处表现的欢迎盟军的那种真正友谊,在很多自认为是以敌人身份到达的人看来,却不禁为之瞠目。②

在争取官方或非官方任何残余民政人员的合作方面,是毫无困难的。依靠现有警察力量,主要依靠受过军事训练的警察来维持治安的计划,完全证明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在这次短短的西西里战役过程中,已经先尝到了今后很多个月我们所要面临的种种困难的苦头。杰拉尔德·韦尔斯利勋爵指出:盟国军政府的主要任务就

---

① 1943年8月16日。

② 哈里斯:《意大利盟国军政府,1943—1945年》(Allied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of Italy,1943—1945)(伦敦,1957年版),第37页。

是“掩埋死者，贍养生者”。第一项任务在西西里夏季的酷热天气中尤为迫切。但是由于大规模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遍地瓦砾，这却未必是轻而易举的。第二项是直到西西里战役结束要经常萦回在我们脑际的一个问题。

在西西里这个通常原是一个物产富庶的地方，在进占前几个星期所进行的配给，足可提供每日大约四分之一磅至七盎司的面包，再加上每星期往往少至二盎司的面团。岛上储备有限；农场主还不曾将一次歉收的庄稼送进公仓。已缴进的大部分毁于军事行动。何况，德国人已经把所能带走的都席卷而去。大部分民用运输工具已为撤退的军队夺走，剩下来的为进占军所使用。甚至可供利用的粮食都不容易送去磨粉，因为面粉厂主要是靠电力作动力，而在早期，电力几乎到处都被切断。向来猖獗的黑市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自来水、下水道、防疫等等都发生了同样的困难。城市居民曾经在猛烈的轰炸下川流不息地迁往山间，现在他们却随着进占军过境而去又蜂涌归来。虽然营养不良的现象无疑是有的，但是却没有真正的饥馑。水果、坚果和蔬菜幸而甚丰。一般说来，部队当局在支持民政官员所采取的行动方面是迅速而有效的。没有任何传染病。仅有的严重疾病就是多少有点成为地方性流行病的伤寒和疟疾。如果说并非事事完全按照计划进行，那么临机应变 459 倒也并非不成功。在所有的战争史上，还没有任何入侵者为减少所波及到的居民的无可避免的痛苦比英、美军在对欧洲轴心国的第一次进攻中作出过更大或更多的真正努力了。

在9月间登陆以后的那不勒斯，局势是比较严重的。这是一个拥有将近一百万居民的城市，而且从第一批报告中可以看出，人民已处于饥饿的边缘，霍乱和斑疹伤寒已经猖獗。伦纳勋爵在亚历山大将军的全力支持下迅即采取行动，一般必需品以及食品迅速地得以充分的供应。疾病的传说多少有一点夸张，但总的情况是

严重的。

食品非常短缺，但是最严重的麻烦是几乎完全断水。在一个拥有一百万居民而半数以上仍住在市区的一个城市中，这的确预示着严重的麻烦。除了盟军轰炸所造成的某些损失外，供应城市的总水管已经遭到德国人的故意破坏，主要桥梁已被炸毁，遭破坏的地方不下七处之多，除一个小水池之外的所有的蓄水池，都已全被抽干。<sup>①</sup>

的确，在第5军工程师及时挽救他们的可怕局面以前，人民真正是无水可吃的。很快从海湾蒸馏海水，把仍然可以利用的第二条水管立即控制起来。不到两个星期的工夫，所有各区水的供应都有了改善。但是下水道的毁坏以及电力总线路和污水抽吸机的破坏，却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卫生问题。而且，肥皂的缺乏意味着虱子传染的斑疹伤寒的危险，此外还有大量人口开始过着最原始的穴居生活。至于电力，则凡是盟军不曾炸毁的，德国都已加以破坏。然而，到这个月月底，根据先后缓急的严格分配，已有了小量电的供应了。

在紊乱之下，原计划的粮食进口没有到达，原因是阿尔及尔方面的负责部门未能注意及时发送。12月到达的美国货运，也没有充分地照顾到民用。但是有大约一万吨存粮已经指定拨给罗马，由于军事进展迟缓，现在这一批粮食可供利用了。英国在中东的一些组织奉命从旁协助。尽管我们在紧跟着登陆后的三个月中尽了一切努力，然而，“那不勒斯湾和萨勒诺湾周围的人食粮还是非常短缺，已经到了严重营养不良的程度”。<sup>②</sup>运输困难是如此之大，以致在意大利中部和东部可供利用的存粮，都无法运到那不勒斯。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有赖于盟国的航运。但是，到了圣诞节，否极泰来了。

---

① 哈里斯，前引书，第85页。

② 同上书，第88页。

在1944年1月初我访问那不勒斯时的亲身观察,证实了官方的记录:

那不勒斯仍处于可怕的状态中。房屋遭到严重的破坏,很多人无家可归和住得十分拥挤。只有最低限度苟延性命的食品配给(一百二十五克面包一天)。当然,只有面包和蔬菜——还有水果。但是,物价的飞涨自然踵随占领而来,蔬菜和水果穷人都是买不起的。德国人消灭了或夺去了全部牛、羊的百分之九十二和家禽的百分之八十六。“黑”市猖獗——一部分是纯投机性质的,一部分则是由于无工可作和无家可归的人步行二十英里到乡村,买下尽其所能携带的马铃薯等等,然后再步行二十英里回来,当然要按照包括他们辛勤努力在内的价格转手出售。衣着的情况很糟——没有靴,没有鞋,没有衬衣。肥皂很少。由于这一切,斑疹伤寒自然就蔓延起来,但第一次的突发还不是像所担心的那样严重。<sup>①</sup>

由于无疑存在着某些紊乱,在这一年年底,盟国军政府和盟军管制委员会之间的明确关系仍在努力解决中。照例作了特殊安排,布赖恩·罗伯逊将军这位自从马尔巴勒的卡多根以来最干练的“兵站”官员奉派主管其事。他想方设法弥合这个差距。要是盟国终于失败的话,那倒不是由于机构太少而可能是由于机构太多。 461

早在1944年秋季我接受行政权以前的很多个月来,我就留心观察我们行政机构的发展,并尽力予以协助。我在一连串舒适和速度不同的飞机旅程中,在阿尔及尔和布林迪西、那不勒斯和巴里之间来往。组织机构简直是乱糟糟的,甚至近乎滑稽可笑。在10月底,盟国军政府的辖境分成前方和后方两区,后方地区与盟管会合并,从而直接归由盟军总部而不是军事总督,换句话说,也就是归由艾森豪威尔将军而不是亚历山大将军管辖。在来年2月收回了成命,非常明智地将这两个机构的整个管辖权一并交到亚历山大将军手里,一些特殊问题需向盟总请示者除外。梅森—麦克法

<sup>①</sup> 哈里斯,前引书,第88页。



兰将军根据业经同意的原则，即委员会的首脑必须和盟军最高统帅属于同一国籍这一原则，现已回返直布罗陀。他由一位令人欢喜但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叫作乔伊斯将军的美国军官接替。我将我和他初次见面但久经相处而未改变的印象记载如下：

年龄较大，彬彬有礼，戴一付老一辈美国人所喜爱的特殊无边夹鼻眼镜（在牛角边式样流行以前）。……看上去对他所承担的任务既没有什么特殊才能，也没有什么大不合格。我不认为他是很难驾驭的。

在1944年1月“大象”威尔逊将军接掌最高指挥权时，根据同一议定书，乔伊斯去职，梅森—麦克法兰重又回任。

462 在这期间，我们已经深深陷入意大利政治之中。无论在阿尔及尔或者在意大利，我都自然而然同意大利各式各样人物发生了联系。在1943年9月底，声称代表五个反法西斯政党的联合战线的帕齐先生和达尼约尼先生同我们会晤。这些政党，后来又在第六个政党的参加下，组成了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国王和巴多利奥逃出后在伊万诺埃·博诺米领导下在罗马秘密成立的。博诺米象许多地中海政治家一样，已年近八十或在八十以上。他所据以要求重视的理由是他曾经是一代以前被墨索里尼推翻的首相。但是在10月17日，意大利对德宣战的四天之后，来了一位比较更为重要的人物。丘吉尔曾经对他同斯福尔扎伯爵在伦敦的会晤作过详尽描述。此人在法西斯革命以前曾任意大利外交部长和驻巴黎大使。在整个墨索里尼政权期间，他一直流亡在外，他在旅居美国的意大利人当中无疑是一个著名人物。他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并且正如丘吉尔所指出，他左右着一定的美籍意大利人的选票。虽然他一开始宣称他愿意同巴多利奥合作，但是，显而易见，他的野心越来越大。然而，据他和丘吉尔所达成的协议（或者丘吉尔这样认为），他愿诚心实意地同国王和巴多利奥一起共事，至少直到攻占罗马、得以组织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时为止。

墨菲和我一同去看斯福尔扎。经过短时间的精神恍惚之后，伯爵不顾喉咙痛和重感冒，开始长篇大论，滔滔不绝。除了有一次墨菲设法插嘴问了一个问题之外，我们的客人一刻不停地谈了一个半小时。（同丘吉尔的会晤会是怎样的情况呢？）他希望有一个意大利政府，因为盟国在试图办理应该由意大利人自己办的事情。对此，我在一定程度上是表同情的。他描述了他同国王、巴多利奥和达夸罗尼侯爵的谈话，他们曾经把来自英王乔治六世和美国总统的私人函件拿给他看，他认为这些信是很不妥当的。

达夸罗尼甚至试图求助于在这样一个时候本应把他们结成为同志关系的同为贵族出身和阶级感情。斯福尔扎根本不愿理会这一套，虽则我并不怀疑他并没有因为公爵对于这位伯爵据说暗自认为他的姓氏所隐喻的高贵世系的承认而感到不高兴。 463

但是他的主要要求是要国王让位给“萨伏依王室这唯一无辜的成员”那不勒斯亲王，因为他是一个儿童。由于意大利宪法的缘故，这是有困难的，但是困难必须加以克服。皮埃德蒙特亲王不行，因为他接受了法西斯主义，而且他既懦弱又不可靠。但是斯福尔扎的计划当然不久就清清楚楚了。他想通过让巴多利奥担任摄政的办法予以排除，而由他自己来担任首相。他不是反对君主制者，君主制应该维持，摄政制会是适用的。我们问退位会对武装力量有什么影响，在这一点上，斯福尔扎表示了相当迟疑。但是他最后说，要是维持君主制，他不认为会有什么麻烦。

丘吉尔坚持在我们到达罗马以前不应该进行组阁工作，这在当时似乎是正确的方针。但是随着时日的推移，这就越来越难以坚持了。虽然如此，在我们现在所能当家作主的那一小部分意大利领土上，要物色适当人选来扩大巴多利奥政府的基础，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我去访问亚历山大将军在巴里的

总部。在访问过程中我将所获印象记载如下：

政治局势似乎相当复杂，但是我认为他们全都过分忧虑。自从〔1943年〕1月2日我到达盟总以来，局势一直是复杂的。但是用不着忧虑。我们还是应该放声大笑。

464

困难来自于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比较自由和基础比较广泛的意大利政府，然而我们在这个阶段所能物色到的政党领袖都不是很卓越的。比较知名的人物都在罗马、都灵或米兰。而且其中有一些拒绝在巴多利奥领导下服务，另一些则拒绝在国王领导下服务。有一些人要求一位平民首相；另一些人纵使不要求共和制，至少也要求国王退位，要求皮埃德蒙特亲王放弃他的权利，由年轻的那不勒斯亲王（六岁或八岁，而且在瑞士）继位，另设摄政王。

更加复杂的是，根据意大利宪法，摄政王应该是法律上血统最近的亲族。这意味着是新阿奥斯塔公爵，而此人被认为不大可能。

斯福尔扎阴谋强迫国王退位，让巴多利奥充当摄政王（不顾严格的法律规定），而自任首相。巴多利奥，作为一个军人，太忠于国王本人，而不会在这样一个计划中起带头作用。但是我想要是其他什么人造成危机，他会接受这个方案的，但是我不确知他在怎样程度上正为此目的而同斯福尔扎谋求“合伙”。<sup>①</sup>

这时开始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担心：如果德国人撤出罗马，在盟军未到达之前有一个类似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政府成立起来怎么办。为了防患于未然，巴多利奥想通过我们的秘密渠道递送一个消息给罗马的政治家，要请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但是为了加强他的论据，他要求梅森—麦克法兰授权他向他们作出保证：盟国给巴多利奥和国王以全面支持，并坚持将来由他们继续主政。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将军竟然给了他这种保证，而且是书面的。换句话说，这同丘吉尔—罗斯福协议完全相反，盟国将不仅仅支持国王和巴多利奥直至返回罗马，而且在攻占首都之后将继续给以支持。我

<sup>①</sup> 1943年10月26日。

一想到这项文件一旦公布对美、英报界的影响就不寒而慄。这是一个超级的达尔朗协定，不能不预为之计。墨菲正和我一起住在亚历山大的总部，第二天我们动身去布林迪西。

10点30分，墨菲和我同巴多利奥举行会晤。我们发现他殊为可悲地年老力衰了。他对于停战条款和他希望得自于盟军的修正条件非常不快。这里的局势非常复杂混乱，因为将军们（决不应听任其插手外交事务）又一次把事情搞糟。他们实际上已经给了老巴多利奥一项书面声明，表示盟国将给以他在马耳他所要求的修正条款。事实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然而，这却是将来一桩头痛的事情，现在我们还能够把这个球扔回去。

后来，在谈话过程中，我们总算把巴多利奥引到谈论罗马集团和国内政局上去。墨菲说他了解麦克法兰给了他一种备忘录之类的文件，我们倒想看一看，以便予以研究。我们想方设法拿到了这项文件，没有把东西还给他就离开了这个房间。现在已经付之一炬，化为灰烬了。<sup>①</sup>

我们两人都非常惭愧，但是巴多利奥为人忠厚，始终没有责备我们。这无疑省去了无穷的后患。

一、两天之后，我们在索伦托拜访贝内德托·克罗切。他是由于我们的先头部队的到达而免遭德国人逮捕的，所以相当感激。我从未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会过面，虽然我的出版公司出版过他的一些著作的英译本。这位身材矮小的老人在他漂亮别墅的书斋里以一阵没有牙齿的嘻嘻笑声来迎接我们。他的意见，不同于他的哲学，是非常明确的。他始终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但是国王是毫无希望对他以信任的。谁也不能对曾经“在墨索尼里的父亲，说得最好是一个酒鬼的坟墓上”献过花圈的这样一个人寄以任何信任。在一个哲学家看来，他简直似乎是一个不根据前提而推理的人。克罗切完全醉心于斯福尔扎计划。巴多利奥应该担任摄政王，由斯福尔扎担任首相。在能够作到这一点以前，应该有一个意

<sup>①</sup> 1943年10月27日。



大利高级专员在那不勒斯地区代表意大利。克罗切不大担心共产主义。他认为与其说它是一种力量,不如说它是一种时髦。

466 他继而开始探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是他同他的女婿克拉韦里常常争论的一个问题。他自己的看法是,政治概念——即如自由——是一个全然凌驾于经济问题之上的概念,经济问题是可以日常行政予以处理的。他补充说,虽然他的女婿抱着特别缺乏逻辑性的态度,对于作为一般命题的这个观点进行辩驳,但是对于具体问题所应采取的措施,他们的看法却往往一致。

作为巴多利奥对于政治一窍不通的一个证明,克罗切坚持说,巴多利奥甚至连对他早些年所写的关于意大利史的一篇简单的文章,都看不懂。我想巴多利奥也许是有一定可以让人原谅的理由的。

可能为了尊重我的同事或不管为了什么理由,克罗切博士没有提到他反牧师的极端见解。但是他并不掩盖他对于他列入哲学思想较低类别中的那些经济问题的看法。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属于极端资本主义派的。他也是……富有家财的。

在这之后不久,巴多利奥有那不勒斯之行,去试图争取反法西斯主义者参加他的政府,但是全然失败。这造成了一种困难局面。国王现在要求准许他亲身去那不勒斯,看看他能否有所作为。我们决定听任他自行其是,但是告诉梅森—麦克法兰不要自己去,而另派一个官员前往,作为一种礼节上的举动。

我不希望盟国政府在这个阶段上同这个争论联系起来,不论是支持国王还是反对国王。顺便提一句,我也没有从伦敦方面得到任何关于英王陛下政府对退位或其他任何事情的指示。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于华盛顿方面的意见也全不了解。……墨菲……希望我们插手,将国王去掉,但是在这个阶段上这是十分错误的。如果他们没有我们的直接干预而解决了自己的问题,那对我们和对他们,无论是就现在或就将来说,都要好

得多。<sup>①</sup>

美国人不久就力迫国王退位，但是我不赞成这样作。诚然，国王扩大政府的努力已告失败，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阶段上进行干涉。我设法说服了我的同僚，同意我们所应该作的是把局势明晰而客观地作一描述分送伦敦和华盛顿，让它们就这些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我不理解为什么重要的改朝换代——好也罢，坏也罢——应该由 467  
三、两个政治经验有限的英、美将军来进行。这种看法终于得到了同意，并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起草了一份送致华盛顿参谋长联合会议叙明局势的电报。墨菲得畅所欲言地将他的评述电陈总统，我也得畅所欲言地电致首相。<sup>②</sup>

我将局势扼述如下：

问题可以由意大利人自己解决——而不需我们干预其事。一方面，参加一个举国一致政府的各式各样政治领袖可能撇开朝代问题不谈，至少暂时如此。另一方面，国王和亲王可能让位给六岁的儿童——那不勒斯亲王。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没有什么要我们来决定的。

但我认为更可能的是，政治家们会坚持拒不担任职务，而国王也会不肯退位。他会呼吁作为王室忠仆的巴多利奥照目前的情况继续下去——而没有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巴多利奥可能扬言，只有不管他能否为他的政府争取到我们所欢喜的那种新生力量盟国都照样支持他，他方能照办。<sup>③</sup>

论证似乎是旗鼓相当的。从我们公布的战争目的以及国内和美国方面的舆论的观点来看，去掉国王也许会更好一些。毕竟他曾经支持过墨索里尼。在另一方面，

军事形势只是在缓慢地发展，我们前面还有漫长的艰苦战斗。意大利海军在海上、岸上以及船坞和工场都合作得很好，颇有成效。陆军，虽不是

---

① 1943年11月2日。

②③ 1943年11月3日。

在作战，却在为我们工作。实际上，所有驻外大使馆都团结在国王周围。商船上的海员亦复如此。一种非出于自愿而是被迫的退位，对于所有人会有什么影响，殊不确定。<sup>①</sup>

这时兴趣开始集中到了我被正式奉派以联合王国高级专员名义参加的意大利顾问委员会方面。我同时还保留了其他职务，直到达夫·库珀接任时止，兼任驻法国政府大使和盟军最高统帅地中海地区的政治顾问。从开罗会议归来之后，我们的迫切任务就是遵照在莫斯科作出的决议成立顾问委员会。显而易见，俄国是在提高这个新机构的重要性。这可以由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俄国政府最强有力人物之一维辛斯基的任命表明出来。他刚刚到达阿尔及尔，我们都急于要了解他作为同事是怎样一个人物。同墨菲商量之后，我们认为就程序而论，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午餐开始，然后再继之以非正式的商谈。作了适当的安排之后，决定于11月29日在墨菲的别墅中举行。马西格利和盖兰（他的副部长）代表法国方面，罗杰·梅金斯则和我偕往。我们在这个阶段上并没有多大困难，虽则在一、两个问题上俄国人多少有点拘执。我测探出这里有一种试图把委员会从顾问性质扩展到行政性质的倾向。但是在初步商谈中没有任何真正棘手的问题。

维辛斯基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外表和蔼可亲，通红的团团面庞，满头白发，一副保守党市长或选区主席的形象。但眼睛是蓝色的，带有一副眼镜，看上去冷酷无情。在和蔼可亲坦率诚恳的背后，我想（纵使一个不了解他的历史的人）也可以窥探出一些凶残暴戾的性格。……但仍难以想像他就是俄国恐怖的残酷迫害者——犯人的魔王、证人的拷问者、六、七年前我们所知道的幸灾乐祸、冷酷无情、残暴不仁的人物。

饭后的谈话拖得很长，但是闲话轶事趣闻所占的时间不少于郑重其事的讨论。经一致同意组织委员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订于明日下午举行。对于各种程序问题——轮流担任主席、公共秘书处和候补委员等等，

---

<sup>①</sup> 1943年11月3日。

以及一项供报纸上发表的通告的文本——也取得了一致意见。<sup>①</sup>

翌日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又是在午宴后举行，这一次午宴是在俄国 469  
国派驻法国解放委员会的大使鲍戈莫洛夫在他新近搞到的富丽堂皇的别墅中。

鲍戈莫洛夫同他……所敬畏的维辛斯基相比，显然是一个无名之辈。

这次午餐在阿尔及尔是一个奇迹。鱼子酱、燻鲑鱼、俄式咸肉、金枪鱼、鲟鱼……为量极丰。伏特卡像水一样地从酒瓶中倒出来。每隔两分钟维辛斯基就会站起来，“为法国和戴高乐——温斯顿·丘吉尔——罗斯福——民主自由(原文如此)”等等而干杯。

然后我们也都竞相敬酒。每次敬酒就意味着更多的伏特卡。更多的伏特卡就意味着更多的鱼子酱和燻鲑鱼等等。

到两点左右才上正菜，大约三点半我们才终于蹒跚而出，精疲力竭，但饱尝了苏联的热情。<sup>②</sup>

第一次正式会议在4点30分举行，作为对法国的一种礼貌，我们推选马西格利为主席。参谋长代表艾森豪威尔将军向委员会致欢迎词，盟总的霍姆斯将军就盟国军政府的结构和管制委员会的新概念作了简短的报告。提出了三、两个问题。没有造成任何困难。表决了几项正式议决案，如此而已。

12月2日，委员会同仁前往直利视察。墨菲、维辛斯基和我一起动身。马西格利则于第二天来同我们会合。我们在迟暮时分到达布林迪西，受到了盟国管制委员会现任副主席哈罗德·卡奇亚和雷珀的欢迎。我们已经感到整个这一套已经有头重脚轻之势了。

军人的思想是多么离奇古怪！他们在华盛顿的陆军部和伦敦的陆军部中建造了这个精密到荒谬程度的头重脚轻的机器，设有参谋长、科、室

① 1943年11月29日。

② 1943年11月30日。



和小组委员会，至于人员的配备，则不是〔退役的〕职业军人——年龄太〔大〕，以致不能作任何有效的使用——就是硬要他们穿上准将、上校等等制服的十足文职人员，财政、航运、煤炭等方面的专家。然后以这整套人马在严格军事组织的基础上来统治寥寥几平方英里的地方和目前不满一千二百万的人口，报表重叠，两个混淆到无可救药程度的陆军部的内部结构令人难以相信地复杂和腐败！<sup>①</sup>

在这段时期，美国乔伊斯将军正安享他为期短暂的权势，以一种神气十足但温文尔雅的方式接待我们。我们听说第二天上午9点就要开始办公。为斯坦斯盖特勋爵（过去的威廉·韦奇伍德·本）现已参加的这个工作班子安排住处的问题，造成着很大的困难。幸而，我们设法将他们大多数人迁到巴勒莫，这才使亚历山大将军如释重负。翌晨委员会开会，在乔伊斯将军致开会辞之后，各科主管人员就将来的组织和各科的职掌作了报告。总的来说，一切都顺利，办理妥当。主管政治科的哈罗德·卡奇亚担负起最困难的任务。因为显而易见，俄国人对政治比对财政或食品供应更为关心。

维辛斯基想要知道有多少法西斯分子已经审判，又有多少已经枪决。哈罗德所能尽力而为的就是小声说大约有一千五百人在监禁——但是维辛斯基显然认为这是三个月工作的一个非常不令人满意的成绩。<sup>②</sup>

马西格利现在已经和我们会齐，午饭后举行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会上讨论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俄国人根据在马耳他签字以前业经给他们看过并经他们同意的详细条款停战协定第37条的规定，要求指派俄国人担任管制委员会委员的权利，他们提出了若干官员作为第一批的任命。对此，法国方面当然立即作出反应，并提出同等的要求。

---

① 1943年12月2日。

② 1943年12月3日。

经过无休无止的商谈,我们同意了一项安排,即由我们(委员会的成员)联合将问题报告艾森豪威尔将军,并由我们各自分别报告我们的政府,要求尽速答复。 471

我自己认为法国人和俄国人会认识到,如果一个执行机构完全成为一个人多嘴杂的组织,那它就简直无法发挥其效能。因此我认为他们会(并且法国人肯定会)满足于各占三、四个位置(在一千个位置之中),主要作为一个威望问题来看待。无论如何,我已建议陛下政府根据这种方针接受一项折衷办法。<sup>①</sup>

第二个问题是艾森豪威尔提出的。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根据通常的战争规则,或据我们所了解,照海牙国际公约的规定,进占军只有两个途径可循。

要末暂停被进占国的主权和统治权,要末允许当地政府继续下去。

在第一种情况下,进占军的指挥官以对他负责的官员直接管理这个国家,当地政府的职权和主权暂行停止,一切权力都出自总司令。我们一向所谓的占领区盟国军政府纯粹是一个变相的英、美共同统治。我们一直以这种方法管理西西里和不在德国人手中的大陆上其余领土。但是我们已经作出了一个例外。在(停战协定之后)国王和巴多利奥逃往布林迪西时,我们认为我们不能不有一种在王室主权之下的“飞地”,以便意大利人能够有一个使意大利国家依法继续存在的小小王国(不管如何之小)。这片“飞地”包括巴里、莱切、塔兰托和布林迪西四省。

这里我们当然派有占领区盟国军政府的官员加以监督。但是在这片领土上,他们并不以亚历山大将军(作为军事总督)的名义发号施令,他只间接地监督(并通过要求意大利人照办来清除一切不受欢迎的分子)当地意大利官员。

管制委员会正准备推广这种制度,我们的计划一直是,拟将包括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在内的意大利全部领土(除开将依然由占领区盟国军政府管辖的紧邻部队后方的一个狭窄地带)归还意大利政府,而由委员会从旁劝告和监督。 472

<sup>①</sup> 1943年12月3日。

换句话说，我们将实行间接管理（姑不论如何严格）而不是直接管理。<sup>①</sup>

这种办法已经被批评为向反动的意大利人投降，要是这样作下去，我们会遭到更加激烈的抨击。所以我们认为明智的办法是，要求新设立的顾问委员会及其法、俄委员同意将更多领土归还给国王和巴多利奥，以便使我们自己无懈可击。我认为如果我们能作到这一点，我们国内的左翼批评者就会大上其当，因为我会发现我不再是墨菲的狐朋狗党而是维辛斯基的高尚同志。经过反复辩论之后，这项建议终于为维辛斯基和马西格利并当然为美国人和我们自己所同意。他们只坚持两项移交的条件。第一，只能任用非法西斯的、亲盟国的官员；第二，我们不应对国王和巴多利奥无限期地承担义务，而只能到攻占罗马时为止。因为这两项条件正是我所希望的，所以我立即接受。

但是如果认为问题已经解决，那我就错了。维辛斯基说他必须向莫斯科请示，马西格利也说要请示阿尔及尔。（当然，我未始不了解，维辛斯基不请示莫斯科是决不会允同任何事情的。有两个国家政治保安部的家伙一直监视着他，我想他不能不步步留心。）但是两个人都说他们将力请作出赞同移交的决定。……<sup>②</sup>

在进餐时，维辛斯基兴致勃勃，我们就政治问题进行了许多辩论。维辛斯基对于最近从监狱中释放莫斯利一事感到非常不安，他认为这是一件不祥的事情，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没有把他枪决。

他还提出两句名言：

473

“民主像酒，适可而止就是好事。”

“言论自由只要不妨害政府的政策就是好事。”<sup>③</sup>

据我们了解，无论维辛斯基还是其他任何俄国人都未曾到过

---

①②③ 1943年12月3日。

国外，所以我们认为最好是在下一次会议之前安排一次周游意大利南部的旅行。在第一次会议上和我们有利害关系的两个问题不到几个星期的工夫就圆满解决了。12月17日，俄国人同意将意大利南部移交给意大利政府，并于24日我们的一次会议上，同意俄国和法国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享有一象征性的代表权。在同一次会议上，经一致同意，在顾问委员会中增加希腊和南斯拉夫的代表。

12月30日，顾问委员会成员出发作另一次旅行。我必须在阿尔及尔等待，以便处理法国的最后一次危机并同达夫·库珀办理移交，而几天之后我在巴勒莫同他们会齐。维辛斯基偕同他的九个“助手”和他那口袋里被左轮手枪和手榴弹胀得鼓鼓的、令人却步和似人非人的列特人密探热情洋溢地欢迎我。他们在撒丁岛曾经过得很愉快。我曾经派我工作班子中的一个新手奥布里·哈尔福德去招待他们，哈尔福德是一个才智出众的青年，并有能讲一口流利意大利语和俄语的优点。

巴勒莫是由波莱蒂上校那位美籍意大利人、纽约州副州长“统治”的。此人倒是人地相宜，似乎也热爱这个地方。西西里人似乎也热爱这个地方。我想他们能有一个同胞在美国功成名就，并奉派送来美好的东西——食品、衣着和药物——而且对每个人都和蔼可亲，逢人就讲笑话，一定颇感自豪。

把西西里从直接管理改为间接管理，虽经同意，但是由于许许多多的法律手续，却仍然迟未实行，一则是耽搁在盟总方面，但主要是耽搁在华盛顿和伦敦方面。陆军部是主犯之一，像腊肠切断机一样地制造出一个个章程、备忘录和计划。盟国管制委员会也渐渐成了脱缰之马，以一千四百名军官和四千个人来管理意大利这一小块地方。我对我无权处理的这种紊乱情况的烦恼（我只能 474 向盟军最高统帅和我国政府建议），因傍晚和维辛斯基令人神往的



一席谈话而得到了补偿。在同这位外貌滑稽的人谈话时，很难看出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和他对几十万——有人甚至于说几百万——不幸人民在斯大林大清洗中丧命要负的骇人听闻的责任。

他认为，在他迄今所看到的一切之中，简直没有可凭以奠定意大利任何强有力的政府的基础……我们必须等待某种情况的出现，也许在这期间可以举行地方和市政选举，并开始以这种方法在自治方面给人民以再教育。（这一切是多少有点好笑的。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选举自由——对其余的每一个人来说。）<sup>①</sup>

在第二天我们到那不勒斯的时候，俄国人的行动方法如何就清清楚楚了。维辛斯基有一大群秘书、“联络员”、翻译等等。我们一到，其中大多数都不见了，无疑是找意大利共产党员去了，只是到离去的时候才重又露面。

整个那一天（1944年1月9日），我们听取聚集在所谓民族解放委员会下面的六个党派的代表的意见。他们自右至极左都有，包括共产党在内。由于来回翻译，讨论是令人不胜其烦、令人精疲力尽的。正轮到我担任主席，我发现这个工作可真正不好干。

意大利人谈话大都激昂慷慨，带有一种恼人的那不勒斯鼻音和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那不勒斯手势，对我来说很多是新奇的。（最引人兴会的手势之一是把手合在咽喉下面，然后像游泳者一样突然将膀臂伸开。）<sup>②</sup>

475 同俄国朋友一起旅行的主要好处之一，是几乎无处不有大量伏特加和鱼子酱的供应。总的说来，除开有一次飞机不能发动维辛斯基大发一顿脾气外，这次旅行是一次绝对的成功。我清楚觉察到，俄国人正在玩味他们新的经历。

在主要的组织问题上，无论法国人或俄国人都不感多大兴趣。

---

① 1944年1月7日。

② 1944年1月9日。

在我们结束这次特殊的旅行之前就听说乔伊斯将军的前任梅森—麦克法兰将军不久将官复原职。我想这也许会使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感到担心,但他们是那样习惯于各种官员走马灯般地你来我往,看上去象是对他们毫不相干。在我们的一次会议上,有幸听到了巴多利奥对委员会的讲话。他讲的还算好,但似乎有点泄气。然而,几天之后维辛斯基对我说,他认为斯福尔扎和巴多利奥是仅有的两个有点才干的人。在另一次会议上,我听到了盟国军政府几位与那不勒斯地区有关官员的详细报告。这是我安排的,因为六个政党的代表所作的各种报告很多是有成见的,有些肯定是不真实的。我认为委员会应该兼听两面之词。

维辛斯基自然抓住这个机会使盟国官员受到一次脾气虽好但却冷酷无情的盘诘。人们第一次看到这位检查官炯炯的目光取代了慈祥的神态。在他盘诘之后,我重新询问,维辛斯基非常欣赏这种角斗。军官们对我非常感激,这倒真正是这一天非常饶有兴趣和令人兴奋的一个收场。<sup>①</sup>

维辛斯基一直向我保证说,虽然他认为国王终久是要退位的,但不能操之过急。

我在力图保持顾问委员会趣味横生和兴高采烈的同时,趁机讨论了有关组织问题的一些问题。为让他们高兴,我们把俄国人和法国人送出去作七小时的汽车远征,往访斯福尔扎和克罗切。这样就给了我们一整天的工夫来作一般性的讨论,盟国军政府和盟管会两方面的代表都要求我主持其事。会上达成了一些有益的协议。 476

一回到阿尔及尔,我就发现伦敦和华盛顿方面的法律家们所拟具的有关必要保留的盟国权利的方式是如此苛刻,使我不愿将文件提交意大利人。威尔逊将军同意这种看法,正如梅森—麦克

<sup>①</sup> 1944年1月10日。

法兰一样。即将为“霸王军事行动”而动身去英国的比德尔·史密斯也同样担心。所以，我起草了一份表示异议的电报稿，拟分别由威尔逊将军拍致参谋长联合会议和由我亲致外交大臣。我还得到了与首相讨论这件事的机会，因为我已经奉命去他养病的所在地马拉喀什“进餐和过宿”。在别墅里，我看到丘吉尔、丘吉尔夫人、萨拉、比弗布鲁克和达夫·库珀及黛安娜·库珀。

首相兴致勃勃。戴高乐的访问是在前一天进行的，经过情形令人满意。今天上午曾经举行军事检阅，戴高乐和首相接受敬礼。温斯顿因他受到热情的接待而大为感动。<sup>①</sup>

他接下去谈到维克多·埃曼努埃尔和巴多利奥。他完全赞成目前维持他们不动：“当我要拿起一壶热咖啡的时候，我总是要去抓住壶柄的。”他还交给我一份内阁就我的新地位和职权所写的冗长备忘录，并询问我的意见。我了解他讨厌繁文褥节，准备了一份简化得多的表式。他问我究竟要留在地中海还是欢喜在国内任职。我当然希望留下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独特的、再好不过的经历，我无时无刻不欣赏它。他表示同意，接下去说：“喏，尽管我们有过一些小争执，但相处甚得。你一直干得很好，的确很好。”在我的备忘录中，唯一的一点被他注意到的就是，我希望在执行职务时能得到某种更有条理的安排。搭乘普通“信使”飞机旅行是令人极其疲劳的。我认为应该给我提供更好的条件。例如，在我到达马拉喀什的那天晚上，我单单由于难以弄到票位就耽搁了五小时。他在这方面是很体贴人的，答应给航空部下令。这样，以后我就将有好得多的待遇了。丘吉尔在各方面都是非常令人倾倒、非常令人感激的，使我不但由于职务的关系而且在情感上也要比以往为他更竭尽绵薄。

我刚刚回到阿尔及尔，维辛斯基就来同我共进午餐。在我把

---

<sup>①</sup> 1944年1月13日。

丘吉尔关于壶柄和咖啡壶的这一席话讲给他听时，他乐了。

因为必须征得亚历山大关于改组的同意——他将因此对盟国军政府和盟管会承担全部责任，所以我在1月18日从阿尔及尔动身去那不勒斯，梅森—麦克法兰来这里同我会齐。我们驱车去卡塞塔，到达后，发现将军刚刚搬进那里一座宏伟宫殿的一部分房屋中。这是我第一次造访这座巨大的建筑物，7月间盟总将一劳永逸地迁入这个大厦，并将作为我们总部直到战事结束时为止。

一切都杂乱无章，他似乎（照例）总是被人用最差的房子蒙骗过去。（在盟总一侧为我保留了一个卧室和一个起居室——或办公室，房间都布置得非常舒服。）

亚历山大将军有一张桌子和两把红色长毛绒椅子。①

我们仔细讨论了这个计划。

他问了几个突出的问题；向我提了一、两个恰当的建议。他是非常敏于抓住要点的。②

对这位将军来说，这一定是一个度日如年的时刻。因为安齐奥登陆即将进行。这次军事行动开始是充满了希望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的指挥官们没有以足够的速度和精力予以推行。结果，德国人竟能发动一次强有力的反攻，形势一度看上去岌岌可危。亚历山大亲往指挥，恢复了原阵地。但是曾经寄予这次军事行动的厚望，注定至少要暂时幻灭。桥头堡守住了，“集结兵力”在继续进行 478 中。但是“突破”证明是不可能了。然而，安齐奥的这支兵力在罗马的最后争夺战中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在这期间，安齐奥的受挫连同卡西诺前线的僵持状态，将使这一年开头几个月成为亚历山大及其部队的一个失败的经历。在这段期间我在频繁的访问中常常见到他。他的那种镇静自若、充满信心的态度始终未变。不论消息是好是坏，他似乎都能保持非凡的自制力。他欢迎我到

①② 1944年1月18日。



盟总来，因为我知道他认为有一个年龄和自己相仿的人谈一谈军事以外的事情是一种乐事。每当我有事他往，他总是催我早回去。

虽然军事形势暂呈静止状态，政治形势却在发展中。1月24日，在阿尔及尔由维辛斯基主持的顾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马西格利提出了一份正式文件，要求意大利国王立即逊位，并将意大利军舰、商船和其他物资分配给法国人作为对1940年意大利进攻法国的补偿。我为此很生气，维辛斯基也怒不可遏。显而易见，马西格利为他奉命提出的荒谬绝伦的要求是感到羞愧的。

维辛斯基建议在“再下一次的会议上”——我们希望在攻占罗马以后——讨论意大利国王的问题。<sup>①</sup>

哎，这个希望是要落空的，但是维辛斯基的计划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喘息的期间；同时从伦敦和华盛顿方面来了较好的消息。

盟国政府完全接受了我们关于“移交”文件的看法，所以我希望这个文件可以贯彻执行了。他们在伦敦和华盛顿所写的那一切连篇梦话之后，这是一个很大的“降级”。但是他们始终不面对现实。真正的问题是要有一个意大利政府在象事实上那样食品、运输、燃料和衣着都仰赖于我们的当前条件下，承担甚至试图统治意大利南部的责任。如果巴多利奥所受压力太大，他会插手进来，这将使我们大为狼狈。<sup>②</sup>

我现在不能不再去意大利一趟，取得作为军事总督的亚历山大将军对必要文件的签字。在公事完毕后，他告诉了我一些有关安齐奥形势的消息。

亚历山大精疲力竭，但兴致勃勃。近来天气一直不很好。风很大，这使得所需要的必需品等等不容易运上岸。他们需要的是“从岸上往外吹的”风。如果风从海上吹来，它就会在船只随着货物的起岸而减轻重量的时候，迫使船只前进，因而有“横转倾覆”的危险——也就是搁浅在沙滩上，从而造成损失。他们所设法办到的事情真正令人惊叹不置。在安齐奥只有一个再小不过的港口（幸而没有遭到破坏）；所有其余的

---

①② 1944年1月24日。

物资都要运过海滩，不但要从正规登陆艇上甚至要从万吨商轮上起运。<sup>①</sup>

在这期间，关于拟在巴里举行的由那不勒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安排的代表大会出现了一个新危机。12月间拟在那不勒斯举行会议的一个类似计划，业经军事当局根据我们的建议予以禁止；但是建议在1月底巴里举行时，似乎就没有什么理由进行干涉。（墨菲这时已请假返美，在4月以前回不来。他殊可赞佩地以雷伯和莱因哈特作为代表。）<sup>②</sup>然而，这件事竟以一个突然的、出乎意外的收场而告终。

伦敦方面由于驻塔兰托的麦格里戈海军上将给地中海总司令的那封不幸转呈海军部的电报而大为惊慌。

驻塔兰托的这位武勇的海军将领认为代表大会可能导致海军：

(1) 哗变；

(2) 凿沉船只。

是否他们会采取这种办法并不太清楚，因为：

(1) 他们是君主主义者，希望抗议在代表大会上〔可能〕表达的那 480 种看法；

(2) 他们是共和主义者，希望表示他们对上述看法的同情。

无论如何，麦格里戈海军上将的电报引起了伦敦方面的烦恼和导致我的同僚拍给我的一封糊涂万分的电报。<sup>③</sup>

这时撤回似乎无疑是不智的。

这将是一次“发表政见”的会议，我毫不怀疑会是异常沉闷的。克罗切将致开会词，至少一个半小时……我不相信会有任何严重的骚动。<sup>④</sup>我去看现任地中海总司令的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爵士，同他商量这个问题。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经验丰富的人，颇具幽默感。我

① 1944年1月25日。

② 最近已参加墨菲工作班子的弗雷德里克·莱因哈特。

③④ 1944年1月27日。

冒昧对他说，

虽然我很同意意大利舰队可能哗变的这种看法，但是我不相信这是由于在巴里举行代表大会的结果，而毋宁是由于所有舰队要哗变的必然趋势。这种说法似乎使他认为满意。<sup>①</sup>

虽然代表大会无疑很不受国王或巴多利奥的欢迎，但这只不过是传闻而已。来自左翼方面的任何激烈行动都为右翼所粉碎。代表大会只以声明国王退位是复兴的根本条件为限。代表大会本身虽然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君主制问题却不是太太平平的。国务院突然拍给我们在阿尔及尔的人一份强硬电报，支持马西格利所提立即退位的要求。

国务院突然发疯，向代理墨菲的莱因哈特下达一个极不寻常的指令。幸而他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忠实而又通情达理的人。……国务院……曾经要莱因哈特……(甲)告诉马西格利，他们同意法国的照会，认为应该立刻将国王“除掉”，并成立一个新政府(显然是在纯粹革命基础上而不要任何法律上的批准)，以及(乙)把同样的话告诉斯福尔扎。

481

很难想象出能有任何外交行动比这次的更加轻率、更加无益的了。法国方面会立刻公布这一步骤……当然要强化他们同华盛顿的一致和在这个问题上同伦敦的针锋相对。斯福尔扎——我们试图争取他对某种折衷方案的同意——会马上自吹自擂起来以抬高身价。

幸而我能以说服莱因哈特[不]……商得雷伯同意，不执行这两项指令的任何一项。<sup>②</sup>在这期间，我不能不电告外交部，并请首相同总统直接商量办理，更改所给莱因哈特的指令。<sup>③</sup>

威尔逊将军起初赞成对国王采取强硬行动，但是我说服了他改变主张，把问题留交总统和首相商量解决。2月22日，丘吉尔在下院讲话，主张延缓。他指出，意大利的陆、海军，连同空军人员，正

① 1944年1月27日。

② 雷伯在意大利，任职于盟国管制委员会政治组。

③ 1944年2月7日。

站在我们这一边作战。他不相信能够立即组成其他任何能使下面同样听其话的政府；在罗马的争夺战过去之后，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讨论整个政治局势了。

我这时健康情况不佳。我的私人医生理查森上校因患重病返回英国。我感到非请假不可了。我的手给我很大折磨，身上的其他部分则为湿疹所苦。我不能不回国。因而，在请示伦敦之后，于2月12日离开阿尔及尔，直到3月9日才返任。这四个星期给了我很大的好处，虽则并非完全休息。我同各部大臣和外交部官员以及首相进行了多次商谈。

我回来后发现局势依然混乱如故。正如我在开罗警告丘吉尔的那样，指挥权的变更对我们很不利。

……从而产生了两种情况。……第一，威尔逊将军虽然是一个精明强干、富有幽默感、并且点子很多的人，也无法使自己像艾森豪威尔将军能博得英国人的同情和支持的那样，受到这里美国人的欢喜。第二，以一位英国将军而不是美国将军负责指挥这个事实本身，就适得其反地削弱而不是加强我们的政治地位。当艾森豪威尔在这里的时候，只要我能说服他将……英王陛下政府所希望的办法建议给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合会议，我知道事情就能办通了。国务院不会冒昧对一位美国将军的建议横加梗阻，否则，要是他们这样干的话，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就会万箭齐发，同国务院周旋到底。现在这一切都变了。国务院反对我们在意大利的政策正如反对我们在其他地方的政策一样，而陆军部自然不会挺身而出为一个英国将军进行辩护。<sup>①</sup>

在我休假期间，梅森—麦克法兰曾不断地报告斯福尔扎等人对国王日益加剧的反对和盟国出面干涉的必要。但是梅森以特有的手腕掌握着局势，说服了包括威尔逊的美籍副手德弗斯将军在内的军事指挥官们反对在目前进行政治干涉。

最后，总统由于他本人和丘吉尔的函电往还，严令国务院不得

<sup>①</sup> 1944年3月9日。



采取造成意大利政府任何变革的进一步措施，在军事形势许可冒政治风险以前，将这类变革一律暂行搁置。

然而，我们马上就要面临一个新的、有趣的转变。这是来自我们俄国朋友方面的。

维辛斯基已经回到俄国，迄未返任；但是在3月8日，在委员会里替代他的鲍戈莫洛夫通知巴多利奥元帅说，苏联政府愿意同意大利政府进行重建外交的准备工作，互换享有大使一切特权和权利的代表。<sup>①</sup>我在到达阿尔及尔的当天听到了这一情况，立即报告伦敦。晚间，我单独和鲍戈莫洛夫进餐，但是我从他那里了解不到任何情况。我几次挑逗他，但是他毫无反应。我们还没有接到伦敦或华盛顿方面的任何指示。

第二天上午威尔逊将军召集了一次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时我们听说俄国人在他们的外交行动之外还想在巴里得到一个航空基地，以便利他们派往铁托的代表团成员飞进飞出作为借口。两天之后，有关俄国行动的电报开始纷至沓来。在3月13日上午，鲍戈莫洛夫前来，正式以俄国的决定相告。我表示既痛心而又惊讶，但是当然说我不相信莫斯科是在独立行动，无疑一切都是同伦敦和华盛顿商妥的，或许他们忘记告诉我们一声。鲍戈莫洛夫（像往常一样总是把目光下垂或者斜视）说他毫无所闻。

我问鲍戈莫洛夫是否将在报纸上发表任何声明，他不愿给我任何保证。当然，他们向来是非常聪明的，软欺硬骗，已经让意大利方面先行声明，可晚一天再公布他们自己的照会。<sup>②</sup>

第二天单独同马西格利共进午餐时，我发现他非常关心。

法国人自然是极其反意大利的，因而对于任何影响到意大利政府地位的事情都抱怀疑态度。<sup>③</sup>

---

① 哈里斯，前引书，第141页。

② 1944年3月13日。

③ 1944年3月14日。

正轮到我担任主席，所以我坚持在3月15日召开顾问委员会会议。莱因哈特和我都奉有严格指示，并有一些招致麻烦的问题要询问鲍戈莫洛夫。我们施加压力达一个半小时之久，至少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起初他说他没有接到任何指示，不能讨论俄国同意意大利的外交安排。继而，在压力之下，他向我提出他自己的看法。他妄称（绝对不真实）484 创议是来自意大利方面的。继而他说，这是很小的事情（像使女的私生子一样——虽然非法，但是小事一桩），而且不会有特命全权大使或公使的互换，只不过是代表而已。<sup>①</sup>

意味颇为深长的是，鲍戈莫洛夫只身到会。俄国人一般是带六、七名随员和翻译的。他要求对他所说的话不要作纪录。

我想他是害怕因违反显然不准吐露片言只字的命令而遭枪决。莱因哈特和我愤愤然说，我们必须坚持有话必录。关于他讲话的记录稿，他照例有更正的权利。为了就我们所讲的话给他以更深的印象，我们答应在当天下午给他以书面备忘录，以便他可以电告莫斯科。

在这一切之后，我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午餐。<sup>②</sup>

英国报纸上对此表现出很大的关注，但是依然莫测底蕴，而鲍戈莫洛夫在同我班子中的人谈话时试图把整个这件事说成是无关宏旨的。然而我们得到消息说，普鲁纳斯（现任外交部副大臣）已明白地认为这是俄国人进一步行动的开端。葫芦里可能还有别的药，意大利人无疑在期待着另一个行动。

威尔逊将军根据我们的建议向参谋长联合会议指出，他在制止意大利行动的“投降条款”中找不到这一条，但是外交部依然坚持他们有拒绝同意的权力。国务院也力辩我们有权控制意大利政府同任何外国作出安排，不论其为盟国或中立国。盟军最高统帅的同意是必要的，并且应通过盟国管制委员会取得这项同意。

<sup>①②</sup> 1944年3月15日。

之后笔墨官司打了两个星期之久。最后，在3月26日，我再  
一次会见鲍戈莫洛夫，他告诉我说他的政府已经分别向伦敦和华盛顿  
485 递送了一份处理这一事件的备忘录。他很高兴地说，备忘录  
重申了他在委员会会议上曾经非正式给我的保证，也就是使这一  
事件和所可料到的结果尽量大事化小。他再一次坚称这并不构成  
为通常的外交承认。他这时对我说，苏联的代表将是参赞级的科  
斯图列夫，莫斯科将接待同样级别的意大利代表。科斯图列夫将  
听命于维辛斯基，希望依然由他担任顾问委员会的苏方委员。无  
论如何，苏联政府是打算在各方面支持顾问委员会的。

我不能不放下谈判，动身去开罗，商量有关地中海司令部和巴尔干各国所负责任的问题。尽管巴多利奥一再郑重声明，但在我们看来，事情清清楚楚，他已经中了苏联的诡计。结果我们所能作的只有接受苏联干涉这一既成事实而已。同时，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对于随着战事临近结束所要面临的苏联方面的作法，有了一个前车之鉴。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种富有刺激性的自然界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3月18日夜间，在同亚历山大将军在卡塞塔他的专用列车上进餐后，约翰和我在11点30分左右回到那不勒斯。我走到我们别墅的阳台上，使我们不胜惊奇地看到维苏威山不是冠以照例像雪茄烟头一样的小小红光而是显然在全面喷发。我们隔着海湾看到了火山的壮丽景象。

……大股火焰不断喷射出来，炽热的熔岩分成两股热流沿山腰奔腾而下。这显然是一次……火山大爆发，我通宵未寐，眼巴巴地凝视着它。整个海域在火山顶喷出的熔岩和火焰的反射中发出一片红光。……<sup>①</sup>

第二天，火山喷出岩石、石块和灰沙。喷射量是如此之大，以致看上去像一个沙漏。浓烟、烈焰和灰沙看上去几乎像山本身一样的

<sup>①</sup> 1944年3月18日。

高耸天际。火山爆发继续了几个星期，造成了严重损失。

在3月25日从阿尔及尔飞回那不勒斯时，我有过一次奇特的经历。<sup>486</sup>

最后一百英里的飞行是非常奇特的。我们从七千英尺陡降到一百英尺左右，恰恰处于从维苏威火山吹到海上的一层浓烟之下的水面上。在最后一百英里几乎完全被这莫大的烟幕弄成一片矇矓——一种非常稀奇的现象。事实上，火山的活动已经多少减弱了一点，也就是说不再有那样多的火焰或岩石喷向天空，但是还象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工厂烟囱一样地喷出大量含有浓厚油质的烟雾。烟雾实际上使得整个那不勒斯湾成为一片迷矓。事实上，风一直强劲地从那不勒斯吹出，以致灰沙不是落在火山以南就是落在远至索伦托的乡村上。风一旦转到西面，一些灰沙就吹到远至亚得里亚海岸上亚宁山脉对面的巴里了。<sup>①</sup>

美国军队给当地居民以持续不懈的支援，协同料理伤亡，修缮被灰沙压垮的房屋。

几个星期之后，有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收场。在最初占领那不勒斯时，由于某种错误，有几名轻率的军官夺占了半山腰上一位著名意大利教授及其友人拥有的气象台。他们把它占据作为一个舒适的宿舍。发现了这件事之后，在火山爆发已经过去的时候，又将教授迁回。亚历山大将军想上山去给他道歉。他是非别人所能做到的那种感人至深的态度去赔礼道歉的。我忘记不了他以极其流利的法语所讲的那句话：“教授先生，我为你们的火山爆发向你们致贺。它实在壮观。”教授鞠躬致谢，看上去对这番恭维之词颇为高兴。将军的谦恭有礼充分地补偿了他早先所受到的惊扰。

苏联政府的单独外交行动，连同要求在意大利为他们的空军提供便利的压力，是和当地共产党领袖人物日益加剧的活动相结合的，这种活动不久就要因帕尔米罗·托利阿蒂那位受过充分训

<sup>①</sup> 1944年3月25日。



487 练、非常能干的共产党员的回国而得到鼓舞。俄国出席管制委员会的代表索洛多夫尼克将军同他所能影响的一切地方组织和领袖都有密切联系。而且，俄国人开始非常巧妙地利用英、美两国政策和意见的明显分歧。对于盟国自从艾森豪威尔离职之后甚至在我们本身范围内渐渐疏远的程度，我提醒外交部。外交部建议派出一位大使级的外交部官员，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建议，如果他是代替我担任顾问委员会委员的话；因为至关重要的是，他和他的美国对等官员，一旦派定，就可以不仅把自己看作是派驻意大利影子政府的使节，而且更可看作是彼此之间以及与盟国军事指挥官之间进行忠诚合作的表示。这应该是他们的主要职责，如果他们同梅森—麦克法兰将军的通力合作，能象墨菲和我长久以来同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威尔逊将军共事的情形那样，那一切都好了。前驻巴西大使诺埃尔·查尔斯爵士膺选担任这个职务；但我坚持在美国同样派出之前，暂不公布。最后，诺埃尔和调自美国驻开罗大使馆的亚历山大·柯克都接到了任命。我发现他们都是很容易共事的。查尔斯是一个极其随和、讨人欢喜的人，他接受了所给他的从属地位。当他到达罗马时，柯克大使已安居于巴尔贝里尼大厦的豪华公寓中，并在那里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而在这同时，查尔斯却不得不满足于那不勒斯所能提供给他比较朴素的设备。

但压力正在增加，战局仍在未定之天。安齐奥的牵制行动已暂告失败。卡西诺前线出现了僵持局面。我从同亚历山大的密切接触中得知在5月初以前不能开始新攻势。要把一种完全静止的政治政策保持这样久是否可能呢？首相继续为他所持“在到达罗马以前不作任何更张”的论点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在美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一致催促下，在我看来某种表面的进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有两个问题：国王的问题以及使六个政党参加巴多利奥领导下的政府的问题。但是这六个政党愿意在老元帅

488

的领导下服务吗？在这一点上，无疑遵照俄国人的意图行事的陶里亚蒂势必要力主组织一个六党政府而不要求调换首相。

3月23日，当我在开罗同威尔逊将军讨论巴尔干事务时，我听说由于梅森—麦克法兰的软弱（这主要是身体接近于崩溃和鲍戈莫洛夫的阴谋诡计所致），大局正处于沸腾之中。艾登要我尽快回到意大利。

使我大为高兴的是，自1943年年底以来一直留在美国的墨菲，出乎意外地回来了。他曾被委以国务院和白宫之间的联络官之类的职务，他聪明地设法摆脱了。

他的第一个理由是，他很识相地不愿看来像是在哈里·霍普金斯离开的时候抢去他的工作（因为试图安排总统办公厅和国务院之间的事宜这样一种工作倒是哈里的专长）。他的第二个理由是，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家，他自然不愿意同一个执政并不太长的政府那样密切地牵连在一起。<sup>①</sup>

他将继续同我们一起共事，直到他去艾森豪威尔那里担任“霸王军事行动”的政治顾问（对他非常适合的一个职位）时为止。我从墨菲的言谈中推断，冬季的开罗和德黑兰之行已使总统感到心力交瘁。他回国时疲惫已极，身体欠佳。

不幸，总统非常倚重的哈里·霍普金斯一直重病在身，经过两次危险的内科手术，就是还能康复的话，也要很有一段时期不能工作。<sup>②</sup>

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因为我一向把哈里视为知己好友和排忧解难的重要帮手。墨菲告诉我说，总统对于戴高乐仍然反感很深，但是事实上当然会屈从任何局势的现实情况。在意大利，他非常渴望在大选以前在政治方面能有所表现。罗斯福曾经同意过丘吉尔等待攻占罗马的方案，但是非常勉强。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在意大利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那会有助于两国的关系。我们事实上也不

<sup>①②</sup> 1944年4月7日。

能抵制多久了。同诺埃尔·查尔斯商量之后，我把我的建议电呈首相。六个政党现在正朝着参加政府的这种想法迅速前进。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加干预，对于这个君主国的政局也不抱偏见就能组成政府的话，那我们就大可利用一下他们的情绪。我因而致电首相，力称机不可失。所关系到我们的只是确保新政府信守前政府所承担的一切义务而已。第二，他们必须同意将君主制问题推迟到可以自由地向全体意大利人民征询意见时，也就是战争结束以后再议。如果我们能得到这两个条件，依我看来，在较广泛的基础上组织一新政府是有积极意义的。我还答应我将竭尽全力把斯福尔扎排斥在外，至少不让他担任外交部长一职。

首相立即电复，同意我所建议的行动方针：

……只要让乌姆贝尔托为代理元首，巴多利奥留任政府首脑，那么国王究竟是现在引退还是等到攻占罗马以后，我并不太在意。

凭靠这种支持，我向顾问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后来获得一致同意的必要议决案，巴多利奥则只是把他的批准保留到他能够得到莫斯科方面的消息时为止。

局势很使人发生兴趣，因为这时我们已听到了共产党人所得到的指示了。

490 ……整个局势因共产党的举动而大为改观。根据莫斯科的命令，他们已经公布他们愿意参加政府而不提出国王和君主制的问题。……但是共产党的这个立场使得自由主义的温和政党颇为不安。一方面，他们渴望参加政府，而同时又不愿看到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盘据要津，总揽大权；另一方面，他们曾经发表过那样多的演讲，讲出过那样的豪言壮语，如果他们追随大家之后投奔巴多利奥，那就势必是自食其言了。所以，在我看来，为了让其他各政党立即参加联合政府而不太丢“面子”，由国王作出有足够分量的姿态——无论是退位，还是实行摄政制，或是许诺实行摄政制——是有必要的。

这……应该(我认为)看作是中心[问题]。对英、美舆论的影响虽然

重要，但究在其次。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国王采取一温和的步骤而得到一个“基础广泛的民主政府”，我们就不能仅仅为了讨好美国选民而采取激烈行动。<sup>①</sup>

如果“国王地位”问题能够解决，政府就肯定会组织起来。这时大局的演变有一日千里之势。事实上有两个计划。第一个是国王的计划，是一个名叫德尼科拉的人向他提出的，这个计划在政界中多少是人所共知的，但不曾公开提出。

根据这个计划，将由国王声明他打算现在委任乌姆贝尔托亲王为“监国”，或在攻占罗马之后为摄政王。

甚至根据这个计划也还存在问题。例如，在上次大战中国王曾经指派了一个监国（当时他是在前线）。所以必须明白表示，这项任命是最后的，不能收回成命的。如果罗马久久不能攻占则又将如何等等。<sup>②</sup>

但是还有第二个计划，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第一个计划的变种。如果国王愿意现在就作出任命而不等待将来，那么，除所谓的自由党人外，各政党领袖都会更加高兴。另一些人要求不给亲王以实权，而只给以一个名誉职位，而把一切权力委托给另一机构。我没有接到确切指示，但是我同意给第二个计划以支持，如果国王同意491的话。作为酬答的是，墨菲答应在4月8日顾问委员会举行的延期会议上力主不在细枝末节上纠缠，而只指出国王的计划或该计划的某种变体是可取的。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当然还有其他的重要问题。必要的是，任何政府上台都必须接受现政府对盟国所承担的一切义务，以及，如果可能的话，由巴多利奥留任首相。我因为同意支持要求国王立即交出权力的计划，自然在墨菲的眼里赢得了很大信任，尤其是因为他了解我并未真正被授权这样作的。我也了解，只要指派乌姆贝尔托亲王为摄政王，丘吉尔就会把国王现在退位或在攻占罗马以后退位一节看作是次要问题。所

---

<sup>①②</sup> 1944年4月8日。



以，我是立于不败之地的。

因而在4月10日，星期一，上午11时，墨菲和我在拉韦洛别墅拜访了国王。我们由诺埃尔·查尔斯和梅森—麦克法兰陪同前往。我趁机介绍了作为我继任人的诺埃尔爵士。这位君主并未因年迈而失去他的谈判的精明和才思的敏捷。他迎头就以是否有什么战事方面的消息和何时我们可望拿下罗马并把德国人逐出意大利之类问题相询问。根据商定的办法，应由墨菲开始谈判。他气势磅礴而熟练地展开了他的话题。

他将美国舆论对于国王本人及其近年来领导意大利事务的看法，坦率地告诉了国王。他说因为在美国人心目中国王同法西斯主义纠缠在一起达二十年之久，又同对他的老朋友宣战的罪状密相牵连，所以国王如果宣布自己有立即逊位或至少立即引退而指派亲王为监国意思，那么，对保全君主制也许是比较有利的。

依照商定的办法，我以我所认为适当的言词用三、两句话支持这项建议。对一位老前辈不得不说些使他难堪的话，这种处境绝不是愉快的。对于一个在君主制原则教育下成长的人来说，要对一位行使王权达四十年之久的人说这种话，则更加令人难堪。

国王佯作大出意料之外。他认为我们是来作一次礼节性的拜访。他表示大惊，并相当愤怒。他以照我看是三分真情、七分矫作的语无伦次的态度，同我们谈到我们轰炸罗马对他臣民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我们继而听说他对于我们造访的目的早已深知其详，只不过是试图争取时间而已。他说他必须就这样一个问题征询他的大臣们的意见。

墨菲和我继而退到我们居住的钦布罗内别墅——格里姆索普勋爵的一幢漂亮房屋，现在用作军官宿舍。在午餐前后我们得到通知说，国王须要有四十八小时的考虑时间，以便作出决定。因为议会——由六个政党的代表所组成的——要在12日，星期三开

会，所以我们说四十八小时太久。他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作出决定。

在这期间，梅森—麦克法兰将军曾经去萨勒诺——意大利政府这时主要集中在这个可爱的城市里——拜会巴多利奥，现在我们得到通知说，元帅在接到达瓜罗内的电话时，曾经向他保证，如果问到他的意见，他将力请意王陛下接受英、美的意见。巴多利奥还说，共产党和社会党已决定参加政府，但是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却等着看一看国王采取什么措施。如果巴多利奥能争取到四个政党，那么政府就会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了，因为行动党和劳动民主党的党员寥寥无几。

第二天（4月11日）中午，达瓜罗内公爵来访，他说国王曾经就我们对他所讲一切详加考虑，他现在准备负责立即发表一项宣言。虽然他曾经向一些政治家提出过他的计划，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一定要受它的束缚，因为它既未为那些政治家，也未为盟国政府所接受。虽然如此，他现在愿意发表一项确切声明，并提出一份文本，其内容如下：“我已经决定指派我的儿子皮埃德蒙特亲王为<sup>493</sup>监国。权力的正式移交将于盟军进入罗马之日实行。”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程式，国王将于下午4点在巴多利奥元帅陪同下接见我们，并正式保证信守这项声明。

这倒是国王的一个巧妙的建议，事实上是两个计划的一个折衷案。墨菲强烈抗议，要求立即移交权力。我满足于只给予我所答应墨菲的那样程度的支持为度，而不过分卷入。下午3点30分，巴多利奥到达，他极力为国王原来的计划辩护。他说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保全君主制，国王所考虑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朝代。一举而作出所有的让步，在政治上是一个失着，尤其是在同意大利人打交道的时候。一切都马上就被忘记了而不会赢得任何谢意。至于是否君主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全下来，他自己认为大可怀

疑。但是根据国王的计划,现在是可以作出一点事情的,巴多利奥认为政治家们会接受这个计划。我们一旦到达罗马,亲王实际上将会接掌大权。这会提供一个召集新政府的机会,新兴趣和新情绪会因以产生。这里还有另一张牌可打:国王可以明确地让位给他的儿子。作为最后手段,乌姆贝尔托亲王可自行让位给年青的亲王。所以,巴多利奥赞成一点一滴地作出小小让步的办法。对于这一点,我不禁暗笑,这让我全然想起了吉罗的“鸚鵡政治”。

然后,墨菲和我回去商量,我劝他共同采取下述方针:我们要巴多利奥去对国王说,我们仍然认为采取断然手段是对王国有利的,但我们作为盟国的代表对他不施加任何压力。我们在这里是进忠言,而不是强迫他。我们不是普鲁士人。我们不是作为征服者的代表运用我们的权力。我们是在给他在我们看来最好的忠告。如果他拒不接受,政府不能组成,那他就要不能不作进一步的让步,从而被夺去自愿姿态的好处。他必须作出决定。巴多利奥把这个信带给国王,一直和国王在一起的普鲁纳斯于6点钟带着决定回来。据他说,国王已经听取了我们的论证,现在提出了另一个建议:至于是否能够根据目前的计划组成政府,不妨作一次探测,如果在两、三天之内发现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会重新考虑这种局面。

我们自然说这是一切建议中最要不得的一个,我们不能接受。这会有拖延之弊;国王将什么也不管了,他甚至要规避他已经作出的让步,而且他将不保证任何决定。我们不能不要求他对自己的地位作进一步的考虑。普鲁纳斯说他会照转国王无误。作为答复,我们坚持他必须在午后10点钟携带拟在无线电台宣读和发交报界的宣言原文回来。普鲁纳斯依限带着草案回来了。我认为这是不够有力的。我不愿更动那些多少有点行不通的章节,但坚持加进一些比较明确的词句。国王必须说:“我已经决定退出公

务”；并且必须加进这样一句话：“这项决定是最后的和不可更改的。”在我动身乘汽车回到那不勒斯以前，我听说这几句话已经获得同意。最关重要的段落如下：

为把我曾经向盟国当局和我的政府所提建议付诸实施，我已决定退出公务，而指派我的儿子皮埃德蒙特亲王为监国。

这项任命将于盟军进入罗马之日通过权力移交而生效。

我坚信将促进举国团结的这项决定是最后的和不可更改的。

虽然这不是墨菲为了应付美国公众和即将到来的选举所需要的东西，但实际上是很不错了。无论如何，他是绝对忠实地信守这项办法的，在第二天我们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大胆地辩称，这项安排无异是一个真正进步的标志，应该看作是美国舆论所可接受的。他深信这将导致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的成立。 495

收场是有趣的。在4月13日下午6时，鲍戈莫洛夫要求来看我。我原来倒料想他会去了解墨菲和我在复活节假期干些什么，并会对我们的片面行动表示抗议。但是他装出一副老实样子。他只是来告诉我说，他已经将4月8日我们的决议交还给他的政府，现已获批准。他希望我能不久再同他共进午餐。上星期我曾经应邀赴宴，当时的几道菜点是：鱼子酱，小吃（伏特加），汤，通心粉，鱼，鸡，羔肉，分色冰淇淋和糕饼，干酪，水果，各色葡萄酒，咖啡，烈性酒。鉴于那不勒斯人民正生活在饥饿线上，我心中实感不安。但是，这已不必由我提出任何异议。我现在看到俄国人把我们的所作所为作善意解释，这才如释重负。在这王室插曲顺利结束之际，丘吉尔和艾登都给我发来贺电。

巴多利奥留任首相兼外交大臣的六党政府所包括的成员如下：陆、海、空三部大臣没有变动——德科乌尔海军上将（海军）、桑达利将军（空军）和奥尔兰多将军（陆军）。五个最著名的政治领袖担任不管部大臣。他们是克罗切、斯福尔扎、罗迪诺、陶里亚蒂和



曼奇尼。其他职务则由六党平分，大臣和次官都彼此均衡。这个政府第一步就是以书面提出对盟国的要求的保证。这两项保证是，第一，承认前政府所缔订对盟国的义务；第二，“在全体意大利人能自由表达他们的意见以前”，不再讨论宪法（也就是，君主制）问题。直到缔和为止，意大利各届政府都要履行这两项保证。<sup>①</sup>丘吉尔满意于我们的成绩，主要因为巴多利奥留任首相兼外交大臣，而斯福尔扎仅仅是五个不管部大臣之一。更加重要的是，内务部交给了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人而不是一个共产党人。

诺埃尔·查尔斯这时已经继我而担任顾问委员会的职务，柯克大使不久也要接任墨菲的职务。亚历山大劝我同他一起去意大利，在他那里勾留几天。我们住在卡塞塔外面他的专用列车上。上午我出席作战室例行的局势讨论会。日间的大部分时间我们用于分访前线的各个部分。

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同亚历山大联袂外出。我们乘坐一辆敞篷车。……去到前线的南翼——去到加里利阿诺河。我们分访各个部队和司令部，包括法国的在内。朱安将军不在他的司令部，但是他的参谋长夏庞蒂埃将军在那里，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官员。……<sup>②</sup>

第二天，

亚历山大和我在大约10点30分出发。我们去第8军军部，在那里看到奥利弗·利斯和一些军长、师长，包括老友迪克·麦克里里在内。我们同第8军共进午餐，驱车兜了一些地方，在下午5点左右回到我们的总部——非常愉快的一天。<sup>③</sup>

4月24日，

在上午10点左右和亚历山大将军一同出发。下午7点30分返回。狂风大作，在高地上真正吃不消。将军坚持用他的没有挡风玻璃的敞篷

---

① 哈里斯，前引书，第143—144页。

② 1944年4月22日。

③ 1944年4月23日。

车。尘沙弥漫，路上当然拥挤不堪。我们穿过一些风景如画的山野。这个半岛越看越不宜于进行现代军事行动。当我们考虑到防守阵地据有的非凡天险，则我们所取得的战绩是如何之大，实不禁令人惊叹。<sup>①</sup>

我们同统率波兰军团的安德斯将军共进午餐。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遇到这位杰出的军人。我可以看出，虽然他和他的部下忠实执行他们对盟军所负的义务，但是对波兰过去的怀念，对波兰未来的担心，以及对俄国人和德国人不分轩轻的憎恨，始终萦回脑际而不忘。当我们在这天上午到达他的司令部时，有一桩事使我极为感动。

号手吹出一种奇怪的、如怨如诉的号声——在乐句未终就戛然而止。我们听说，在中午总是吹出这种号声。它是纪念一个号召克拉科人民集合起来抗击鞑靼人的号手的。当这个号手正在吹奏的时候，一只箭射穿了他的咽喉。自此而后……中午就总吹奏这种号声，以纪念波兰人反对野蛮行为的长期斗争，并鞭策他们为这同一事业而斗争。它总是在这打断的音节上戛然而止。<sup>②</sup>

这个军团的历史真正了不起。大部分募自东波兰的这个军团，在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夫协定和波兰败于德国之后曾被囚禁在俄国集中营里。在德国进攻俄国时，他们终于获得释放，他们（像泽纳芬<sup>③</sup>所著《希腊远征波兰记》中的希腊人一样）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到达巴勒斯坦。这时他们已经在意大利地方重新进入欧洲了。

有一位军官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在土耳其斯坦时，他们在一个城市的商业中心举行了一次音乐会。大家都找卢基斯坦（波兰）的号手，因为他们听说过他们的音乐的威力。所以他们吹奏了一切可以想得到的曲调。但是人们问他们是否不会再吹奏别的了——因此他们最后又吹奏了这曲午号。那些知道鞑靼人羽箭故事的兴高采烈的群众一听就听得

①② 1944年4月24日。

③ 希腊哲学家兼历史学家（公元前434—355年）。——译者

出的。他们有这样一种传说，只有在一个卢基斯坦的号手在土耳其斯坦当地吹出这种号声时，全世界人民才会有和平和自由的来临。可喜可贺的预兆！<sup>①</sup>

在这期间，我们的生活由于我的妻子从伦敦到来而感到莫大的快慰。她将勾留四个月，先在阿尔及尔，继而在我迁动之后，又在那不勒斯小住。她生活得很愉快，无疑因她的纯朴和妩媚之处也给别人以很大快慰。

498 在盟总和伦敦及华盛顿之间就国务院所提宣布罗马为“不设防城市”的建议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英国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曾发出一份不知所云的电报（外交部特别软弱无力），我曾经费了很大的气力〔表明〕我们的主要利益倒不是要轰炸在德国人手中的罗马，而是要利用我们攻占后的这个城市。我们必须非常当心不要束缚我们的手脚。<sup>②</sup>

我问“不设防城市”一词作何解释，而我在询问律师之后，很好笑地发现它毫无意义，而且在1907年的海牙公约中也未曾使用。结果，如众所周知，盟军所加于罗马的损害是微乎其微的，因为我们的轰炸只局限于城外的货车停车处。

消息仍然不错。然而关键性时刻已经到来——在亚历山大战术运用上至关重要的一些步骤。安齐奥的部队今晨发动攻势，同时第8军袭击横跨利里河谷的希特勒防线——固若金汤的一条防线。……在中路正受到进攻的同时，法国部队试图迂回一侧而波兰部队则试图迂回另一侧。<sup>③</sup>

5月24日，威尔逊将军移至卡塞塔我们的前沿总部。26日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讨论攻占罗马以后的作法。

在程序方面达成一致的协议。

---

① 1944年4月24日。

② 1944年5月16日。

③ 1944年5月23日。

(甲) 在罗马将不举行正式入城式。亚历山大将军非常渴望将罗马的攻占，真正地作为军事行动看待。战役是以摧毁德国军队为目的，任何凯旋式都应该推迟到这个目标完成之后。

(乙) 约翰逊将军将代表美国第5军的克拉克将军担任总督。他将偕同“S”部队，执行一切正式委派的任务，盟国军政府的官员也将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盟国军政府将于第一个阶段结束时进行接管，之后就开始第二个阶段。 499

(丙) 讨论了意大利政府的地位。在我看来清清楚楚的是，麦克法兰将军已多半对巴多利奥和亲王承担了一项义务。我一点不欢喜这种作法。<sup>①</sup>

6月1日，我见到梅森—麦克法兰将军。

他终于坚持要国王执行关于逊位和指派他儿子为摄政王的决定。看上去国王仍力图毁约。我也曾劝麦克法兰不让国王去罗马，甚至不让他去那不勒斯。我对麦克法兰说，如果国王胡闹，就把他放在飞机上送到肯尼亚去。<sup>②</sup>

6月4日，盟军进入罗马。我们在阿尔及尔举行了一次伊顿学院校友的聚餐会，并拍给亚历山大一封电报：

恭贺你在战事取得胜利的进展，并祝愿你善加利用。

在6月4日攻占罗马，作为哈罗学院的一位校友，你考虑得真周到不过。<sup>③</sup>

对此，他电复，“谢谢诸位，6月4日是什么日子？”这是通过盟总的信号器用明码发出的，但是大大地引起了美国人的兴趣。

国王正式签署了立其子为监国的文件，于是在6月8日，乌姆贝尔托亲王和巴多利奥，偕同他内阁的七名阁员——六党各一名，加上斯福尔扎伯爵——飞往罗马。巴多利奥在梅森—麦克法兰将军的亲临下同罗马民族解放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这个委员会

① 1944年5月26日。

② 1944年6月1日。

③ 1944年6月4日。



是由博诺米主持的，他率同每个政党的一名代表一同前来，其中包括基督教民主党的阿尔奇德·德加斯佩里和社会党的皮埃特罗·南尼在内。从暴露出来的事实中清楚看出，巴多利奥不是被人以  
500 计谋取胜，就是屈服于不可抗拒的压力。无论如何，他已经向摄政王提出了正式辞呈。现在他接受劝告引退，这恰恰是他渴望已久的。博诺米担任了首相，斯福尔扎伯爵担任了外交大臣；否则新政府就和旧政府相去无几了。但是这些变动在伦敦引起了轰动。我接到丘吉尔的一封激烈的电报，对这个结果表示愕然。他不理解我为什么把这个问题交由梅森·麦克法兰处理，他无权“随便转移巴多利奥的权力”。意大利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意大利政府只能在盟国管制下治理所指定给他们的省份。巴多利奥是同我们缔结条约有着义务关系的唯一的人。

关于让巴多利奥政府到罗马去而不把意大利政治家们找到萨勒诺来将发生的无可避免的后果，我早已向梅森·麦克法兰和诺埃尔·查尔斯提出过警告。

他们拒绝了我的忠告之后，我又警告外交部。但他们宁取查尔斯的看法。顺便提一句，梅森·麦克法兰已经当然不得不让政府党耽在罗马。他还会再把他们赶出去吗？<sup>①</sup>

更多的麻烦相继而来。梅森·麦克法兰将军试图挽回一二，

没有参谋长联合会议的任何指令，就自行表示，任命斯福尔扎伯爵为外交大臣，“不会得到盟国政府方面的多大赞同”，这一步骤引起了代理国务卿代表华盛顿向伦敦方面提出抗议，他完全有正当理由抱怨说，他的政府不曾受到磋商。实则，后来美国政府甚至要求威尔逊将军通知博诺米先生说，梅森·麦克法兰的意见并不代表美国政府的意见，在美国政府看来，任命斯福尔扎为外交大臣是完完全全可以赞同的。<sup>②</sup>

---

① 1944年6月9日。

② 哈里斯，前引书，第202页。

所有这一切正是 1943 年法国政治的重演。局势因南斯拉夫 501 危机的加剧，加之年轻国王的到达而复杂化。虽然意大利事务的管理事实上无疑是手忙脚乱的，但结果却十分良好。博诺米正是我们希望的那样一种政府的一个可尊敬的首脑。象德加斯佩里和季乌塞佩·萨拉加特这类人的入阁更增加了政府的力量。也许没有充分认识到的是，纽约州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是关键性的一州，而斯福尔扎却声称可以左右成千上万张的选票。

不幸，所有这些棘手的问题对于梅森—麦克法兰衰弱的身体都发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虽然他同老病脊椎劳损一直作勇敢斗争，但是到 6 月底他支持不下去了。我劝他请病假回国，并宣布因健康的关系而辞职。一位美国军官，美国海军上校埃勒里·斯通继他担任代理主任委员。

盟国政府在同顾问委员会磋商以前，拒绝给意大利新政府以承认，但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顾全面子”而已。一旦两项主要条件得到承认，委员会表示满意，就立即给新政府以正式行事的权力了。

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新的出乎意外的问题，使我不得不短期返回伦敦一趟。这是一个方便的时刻；因为罗马的解放和博诺米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意大利问题第一个阶段的结束。我们从卡西比尔的果木园到意大利投降已经跋涉很长一段路程了。

## 第十八章 “铁砧军事行动”

罗马解放的消息使整个世界为之震动。把野蛮人从最著名的一个城市驱逐出去,受到了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友邦还是中立国的热诚欢迎。但是罗马并不是真正的,无疑也不是唯一的目标。

……由于了解亚历山大的计划,所以我对战事的第二个阶段要关心得多。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中,他有歼灭德军的真正可能性。<sup>①</sup>

6月6日,我们接到了有关在法国登陆的第一批报告:“霸王军事行动”终于发动了。

我早已从我们频繁会晤和密切交往中稍稍得知亚历山大胸中所形成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自己的幕僚,哈丁将军、罗伯逊将军和乔·坎农将军(美国空军)已经在制订行动细节。

重大的战略问题现在必须解决。亚历山大把他对形势估计的副本给了我一份。他想要在东面发动进攻——但是我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会坚持在西面行动。亚历山大及其部队的前途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把在意大利的部队投闲置散或化整为零,似乎是极可惋惜的,因为这些部队现在已经成为一支伟大的战斗力量,对自己和对他们的指挥官都满怀信心。<sup>②</sup>

此刻,美国参谋长、在美国仅次于总统的最有权势的人物马歇尔将军,正在美国空军首脑阿诺德将军陪同下访问意大利。在为向他表示敬意所举行的各式各样仪式的过程中,我开始感到有些美国“大员”对于亚历山大的计划并非完全不抱同情。要想在巴尔干有

① 1944年6月5日。

② 1944年6月17日。

所作为，自然要遇到教条式的反对。实则，我记得马歇尔将军在一次宴会上曾经问我：“喏，这个卢布尔雅那在哪里？要是在巴尔干，我们就不能去。”我告诉他说，实际上是在奥地利，他看上去如释重负。

在6月17日埃克将军（美国空军）为马歇尔举行的一次正式宴会之后，我同亚历山大有过一次长谈。他极盼我同甘默尔将军（威尔逊的参谋长）能同去伦敦晋见首相。他认为我也许能比电报把问题讲得更打动人些。我力称这是我职分以外的事，但是，只要威尔逊同意，我自然愿意尽其绵薄。我立刻动身去看威尔逊，在得到了他的同意之后，我又在卡塞塔郊外亚历山大的专车上同他作了一次商谈。他解释了他的计划的战术和战略方面达一个多小时之久，其言词的简练，一如往昔，但是所表达的气魄和热情却是我向所未见的。他把他拍给首相的私人电报拿给我看，电文是字字有力，甚至感动人心的。在这封电报中他指出，凯塞林的第10军和第14军现在已经是一支打败了的军队，虽然还没有在战场上歼灭。德国人拟以十至十二师的兵力据守亚平宁山区阵地，那是一条一百八十英里的战线。亚历山大声称，如果他目前的兵力能保持不动，他就能将德军截成两段，并将德国在意大利的军队一举而歼灭之。那么他就可以所向披靡，挥兵直捣维也纳，除非德国人另派十师以上的生力军去阻击。如果他们采取这种办法，那么对“霸王军事行动”和法国战场的支援也就莫过于此了。他甚至声称，这是一举打败德军可能获得不可预卜结果的机会，良机不可坐失。

因而，在两位司令官的同意下，我抱着竭尽绵薄给亚历山大助一臂之力的私衷，以甚至作最广泛的解释也决非我的份外的决心 504 而出发了。

关于丘吉尔反对进占西欧的传说，在战争的许多阶段都议论纷纭。美国人被说成是准备把一切都寄托在法国的登陆上。据



说，丘吉尔，为他们自己打算而要利用地中海和巴尔干的机会，便一再设法拖延。丘吉尔对此已经很清楚加以表白：事实并非如此。他接受了，而且毫不含糊地支持这个伟大的“霸王”计划。但是，一则由于他秉性刚强或固执，一则由于他清楚地看出有着既可准备进行地中海战役而又不会贻误在法国的战机的可能性，所以他不愿意接受那种死搬硬套的全局战略原则；如果在不妨害主要原则之下而能取得额外的战果，那又何必丢掉不要呢。因而先后有“火炬军事行动”、“爱斯基摩人军事行动”和“排山倒海军事行动”——分别发动于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大陆。诚然，在许多月之前的德黑兰会议上已经一致同意，诺曼第的军事行动应由法国南部的登陆予以声援。但是这时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1943年年底以前，在意大利的部队由于调供“霸王军事行动”之用而日益削弱，这就减低了亚历山大的兵力，而凯塞林的兵力却得到了加强。原来的时间表已经推迟。“铁砧军事行动”——拟议中的法国南部登陆——在8月中旬以前无论如何是无法发动了。

丘吉尔在他所著的第二次世界战史一书中已经叙明了这项冲突的整个原委。<sup>①</sup>在这篇信而有征的叙述中，所有这些重大问题都以主角之一的十足权威性予以阐明。但是就个人管见补陈一二，也许不无裨益，这一则是因为有助于使各式各样的身预其事者更加清楚明白，一则是因为考虑到欧洲方面嗣后的发展，而倒并不是要将过去的争论旧事重提。

505 我不认为凡是不曾和亚历山大将军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能领会他的权威和他的自信心之所以产生。他如此坚决、如此必操胜券地提出他的计划这一事实，在他比在几乎其它任何指挥官都更加意义重大。他不是一个人惯于言过其实或自吹自擂的人。

---

<sup>①</sup> 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胜利与悲剧》（伦敦，1954年版），第4章。

毫无疑问，如果登陆艇和部队不曾在 1943 年 9 月间就那样无情地，那样过早地——象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调走，意大利战役进展的速度原会是大不相同的。

在一般公众看来，意大利的冬季战役似乎过分地拖拉；但是在知内情的人看来，他能以这样微弱的人力物力作出这样大的成绩，却无异是一个奇迹。

现在选择是清清楚楚的。不出乎下述两者之一：

要末是“铁砧军事行动”（在法国南部），要末是挥师东向，渡波河和皮阿韦河，攻取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特利亚半岛，越卢布尔雅那峡口，进逼维也纳。

早已从亚历山大将军所指挥的部队中调走了三个美国师，全部投入萨勒莫两栖作战的训练中。接着又调去了一个美国师和三个法国师——总共八个师。同时，支持意大利战役的百分之七十的空军将被调去。所以，参谋长联合会议看上去是严令

在皮萨—里米尼线上按兵不动，不去试图攻取亚平宁山脉，把亚平宁山区阵地、波河流域以及著名的铜墙铁壁的“四边形要塞”都留在德国人手中；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胜利的极峰时鸣金收兵。

威尔逊—亚历山大的代替方案，我们为方便起见称之为“腋窝军事行动”。在我离开阿尔及尔以前，这项计划在威尔逊将军拍致英国三军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合会议的一份电报中业经详加陈明。诚然，这份电报名义上是拍给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因为决定何者是支持“霸王军事行动”最好的战术和战略方法的任务已经由参谋长联合会议委托给艾森豪威尔和威尔逊。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他们已经把责任推到这两位将军身上了。

21 日，星期三下午，甘默尔将军和我到达伦敦。我们并不是 506 没有得到鼓励的，尤其是想到马歇尔将军并不是原所料想的那样抱敌视态度，就更加兴致勃勃了。

下午4点，我往访艾登。他对我的到来表示相当诧异，但是我说明了情况。

下午6至9点15分。6点钟首相接见我。他在新建耳房里的床上。他一上来就说，“我认为我[应该]告诉你，外交部对于你未经许可而来有点恼火。”我说我已经拍了一份电报。当然，我是突然动身的。他接下去说：“我也应该告诉你，我很高兴你能来一趟。你不是外交部的属员。你是我的属员和同僚，你应该作你愿意作的任何事情。”这看上去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开端。

在漫长的讨论过程中，我得以让丘吉尔理解了照我们所理解的地中海的全貌。他对亚历山大的私人电报已经获有深刻印象，但至于采取何种步骤，似乎举棋不定。在下午晚些时候，艾登参加进来。起初，丘吉尔想在当夜召开一次参谋长会议。但是嗣经明智地决定，先让甘默尔将军将威尔逊将军的文件提交英国三军参谋长，同他们逐项详加讨论后，再在第二天晚上召开会议。这样可以提供考虑的时间。因而，在6月22日，星期四，下午10点30分举行了会议。英国所有三军参谋长以及外交大臣全都出席。甘默尔和我应邀代表地中海司令部出席。

首相非常巧妙地提出这个问题，既不明确地赞成或反对“铁砧军事行动”，也不明确地赞成或反对“腋窝军事行动”。他要我把照我所理解的这个计划提出来，并一般地谈一谈亚历山大将军的热情和信心。我尽力而为之。显而易见，空军参谋长非常感兴趣，他反对把空军打碎，用在两个战场上。帝国总参谋长似乎比较踌躇不决，海军首席大臣在讨论时不大发言。散会后，首相把我一直留到深夜两点左右。他显然大为兴奋，对于“腋窝军事行动”在战略上和政治上的莫大可能性深感兴趣。

6月25日，星期日，我应召去首相别墅。正是在这一天丘吉尔最后提出那份在前一晚印成书面的草案。这是供英国三军参谋长考虑的一篇有力的说明。他撰写这篇文件费了大半天的时间，结果似乎已精疲力尽。

6点钟左右他坐在客厅里说，“我是一个年老力衰的人了。我已感到心力交瘁。”丘吉尔夫人说，“但是想一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怎样感觉吧！”对此，温斯顿答称，“哎，但至少墨索里尼因谋杀他的女婿而已经感到满意了。”这个巧妙的回答使他如此开心，以致去作了一次散步，看上去又振作起来。

我们原应该在26日离开英国，但是丘吉尔希望我们留下来等待发展。接到了美国参谋长的一封电报，以多少带点专断的口吻拒绝了威尔逊致艾森豪威尔将军最初建议“腋窝军事行动”的那份电报。迟至26日，星期一，英国参谋长发出了一份以理服人的回电，说明他们宁取按照丘吉尔文件上的方针所拟议的“腋窝军事行动”。到28日下午收到了美国参谋长的回音：

这不仅仅是对英国计划的一个粗卤的驳回，而且甚至是一个侮辱性的拒绝。这使得首相是如此震怒，以致想要以极强硬的言词电复总统；但是经过考虑之后，决定由英国三军参谋长正式答复说，他们不能变更他们所提供给英王陛下政府的条陈，他们对政府有责任提供他们所能想出的最好的专业意见。

28日深夜，我谒见首相，他已经将他的文件重新写过，并且给了我一份。<sup>①</sup>他对我应命就他的初稿所写的批评意见表示谢意，并决定以他的修订稿连同一项请再予考虑的呼吁电致总统。丘吉尔有一切理由切盼把意大利战役继续下去。至少我们必须跨过皮萨—里米尼线，攻取波河流域。即使今夏不可能向的里雅斯特乘胜追击，这个机会仍应留待来春。尽管有这项堂堂正正的公文，尽管是我所阅读过的最为议论纵横、头头是道的文件之一，然而我得到的印象是：

鉴于美国部队对欧洲战役和一般局势所作的重大贡献，如果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坚持“铁砧军事行动”，我们就不能不让步。我们可以苦斗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可以把对我们看法的以理服人的说明留在纪录上供历史

<sup>①</sup> 已作为丘吉尔的《胜利与悲剧》的附录四刊印。



去判断,而且历史家也会看到,美国人对任何论据都始终没有答复,始终没有试图讨论或辩论这些要点,而只是给以直截了当的否定,并象一个贪婪的放债人一样地坚持自以为划算的东西不放。

当夜我离开伦敦,翌晨到达阿尔及尔。当我们谈说事情的原委时,“大象”威尔逊是具有同情心的和富于鉴别力的,但是并不指望成功。

7月1日凌晨,我从阿尔及尔动身前往博耳塞纳湖畔亚历山大将军的前哨营地。

我发现亚历山大将军镇静自若,一如往昔。稍事休息后,我们乘汽艇在湖上作短程的航行,这使他得到很大的乐趣。我们登上了一个我们去过并且欣赏过的小岛,在晚餐时分,趁晚凉取道而归。我向他说明了形势,拿文件给他看,并且象往常一样地欣赏亚历山大营地中那种沉寂、幽静并稍带退隐气氛的乐趣。

于深夜收到了帝国参谋总长给亚历山大将军的一封私人电报,说他几无成功之望。

第二天,7月2日,亚历山大既然了解“腋窝军事行动”未必能得到批准,就开始修改他的计划,并搜索整个地中海,看一看尽管他所部兵力减少,是否还能至少执行原来“腋窝”计划的第一部分。

509 这就不免要在地中海地区到处搜罗“空军力量”,缩减沿岸巡逻区或缩减特勤执行局对希腊、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空军力量”使用,而在中东冒险地缩减至少一、两师的防卫兵力。如果在巴勒斯坦要发生革命的话,我不认为这会等到战后,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从那里借调一个师,为期两个月。我们可以从伊拉克抽调一个印度师,或许在季候风期间再借调另一个印度师,从马耳他和直布罗陀搜罗一些零星部队——两个营——而以调自英国的国民警卫队接替他们,在中东搜求船坞公司、修理工场等等。……

这时在前方我们已经有一个意大利师在一段沉寂的战线上起着相当不错的作用,所以我建议再尽力招募两个师。

以这种和那种方法，在地中海各个不同部分冒相当风险，以最差的军队守住战线上不打算发动进攻的那些部分，而集中足够的打击力量将敌人赶出哥特线（即皮萨—里米尼线），越过亚平宁山脉，跨过波河，攻取“四边要塞”，进而居于往任何方向，特别是往东方乘胜追击的地位，这将是可能的。万一“霸王军事行动”和“铁砧军事行动”都陷于僵持状态，那么这在来年就会顺着很有希望的路子发展下去，反过来如果不是这样作，而“霸王军事行动”和“铁砧军事行动”都告失败的话，那么形势将会是真正严重的，打败德国的可能性就会相应变小。

这时接到了首相的一封电报，要亚历山大立刻返回伦敦。我们下午无事，于是去参观奥尔韦埃托，并欣赏那里美丽的大教堂及其南走廊中著名的西尼约雷利壁画。我们回到湖畔，乘汽艇作了另一次短程航行，并于晚餐前洗了一个澡。

丘吉尔最后接受了赞成“铁砧军事行动”的决定。我们现在已处于更加孱弱的地位，更加仰赖于我们盟国的财政和军事力量。对丘吉尔来说，这个决定，而尤其是送达这个决定的方法，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我来说，涉身于高级战略，虽则未能实现，却不失为一番令人神往的经历。 510

我受到……首相的款待。我对于他的工作方法有了非常清楚的了解，我在他处于困境的时候比以往更加想到同他的真正友谊。我一直很感兴趣地观察威尔逊将军的内心活动，他忠诚地对待他名义上的部下亚历山大将军；我也注意到亚历山大将军在明明已经证明……他的希望落空的一个处境中的自制力、品格和决心。

这个决定的直接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仅在意大利军队的物质力量方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在士气方面。似乎从这个战役中失去了什么东西。在9月中旬，我有一次去拜访亚历山大，发现他沉着镇静，但是精疲力竭，甚至于紧张过度。

他对于各国对他的战役的轻视和向来不予支持，殊感痛心。甚至在为法国的军事行动作出一切牺牲的基础上，只要作出比较坚决的努力来

稍稍假以援手,对他就裨益非浅了。他已经(为“铁砧军事行动”)而失去了七个师和百分之七十的空军。但是调自中东的一个空运旅或空运师未始不会使一切改观。事实上,德国人有二十六个师同他的二十个师(其中包括巴西师和黑人师)对垒交锋,而且在哥特线上防御阵地所据的天险比在卡西诺更加坚固。

然而,他仍然认为他有可能取得一个突破,尽管他的处境有那么多不利之点。<sup>①</sup>

我对于亚历山大的自我克制和忠心耿耿从来没有这样钦佩得五体投地。他承认丘吉尔为了支持他而所作的惊人努力,他对英国三军参谋长对他的宏伟构想的一致同意深以为慰。

“铁砧军事行动”这时重新命名为“龙骑兵军事行动”,一则无疑是为了提防敌人已经获悉这个代号的含义,一则是为了满足英国人的情绪。甚至后来丘吉尔为把这项袭击转到法国的西南海岸所作的一项努力,也是我们的盟国所不能接受的。事实上,“铁砧军事行动”对法国的战役很少或根本没有影响。实则,以这项牵制行动相威胁比真正付诸实施也许可以使德国更多的部队动弹不得。但是这项几乎是美国单方面的决定的后果,就象抛在水塘里的一块石头一样,已经具有愈来愈扩大的重要性。抵消不良影响的负担已经大部分落在美国人民的头上了。

如能突破卢布尔雅那峡口并长驱直入奥地利,原会使巴尔干和东欧的整个政治局势幡然改观。罗斯福一直坚持以一年前在德黑兰曾经告诉过斯大林在法国南部登陆这一事实作为反对这项大胆概念的论据之一。背弃这项决定该是错误的。但是,第一,战术问题纯粹是英、美人的事。第二,仅就所涉及的战略上的错综复杂关系而论,俄国人不想让盟国越出西欧一步,不欢迎他们闯入大陆上的中部和东部国家,难道还不清清楚楚吗?但是撇开罗斯福当

<sup>①</sup> 1944年9月15日。

时几乎不惜任何代价来讨好斯大林一节不谈，对于英国政策的几乎成为病态的满怀狐疑，简直无法克服，尤其是对巴尔干的政策。不到几个月的工夫，这就要对希腊的前途发生一种有害的而且是近乎致命的影响了。

从而种下了瓜分欧洲的种籽，而这种可悲的瓜分注定要支配一切政治和战略考虑达一代之久。虽然丘吉尔对于“铁砧军事行动”的原委作了详细的、引人入胜的描述，但是他并没有对于它所牵连的错综复杂情况多费笔墨。然而在整個这些年月中，我却一直把 1944 年 6 月的这项决定作为历史上可悲的转折点之一来回忆的。



## 第十九章 从阿尔及尔到卡塞塔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所商定的变更，对盟军总部和中东司令部有关联的职权，并没有作任何正式的更改。然而，这些变更却标志着开罗方面的权力开始缩小，而阿尔及尔方面的权力则开始扩大。这的确是很自然的事。正是原来从开罗采取的军事行动并以保卫埃及和运河为主要目的的英国部队所取得的节节胜利，使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基地。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所统帅的得胜军已经同在法属北非登陆的英、美部队会师。在统一指挥下进行作战的英军和美军，由于突尼斯的告捷，把非洲的敌军打得一败涂地。他们共同解放了西西里；他们共同进占了意大利。所有这些军事行动都是从阿尔及尔方面，而不是从开罗方面指挥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前往指挥“霸王军事行动”，使我们失去了一位主帅人物。他带走了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和其他几位英、美名将。所以，在“大象”威尔逊将军和他的参谋长甘默尔将军——一个很少或根本没有同盟国共事经验的英国军官——到达阿尔及尔时，他们面临一种微妙的局势。保持美国方面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墨菲已经离去。分别作为英、美派驻法国委员会代表或大使的达夫·库珀和埃德·威尔逊，对他们的工作既陌生，对于盟军司令部的特殊政治结构又毫无经验。同时，随着美国的人力和物力目前已更加与英国的不相上下并且不久就要占支配地位，显而易见，全面合作就比以往更为重要了。

513 美国人既是那样极力避免被拖进东地中海而尤其是巴尔干的军事行动中，所以很讨厌被蒙在鼓里。因此，经常把整个这一地区

的一切事态进展情况告诉他们至为重要的。尽管有种种异议和危险，但是对南斯拉夫、希腊和其他巴尔干国家事务所承担的责任，就及时逐渐地，但无可避免地开始从开罗的佩吉特将军转移到先在阿尔及尔、后来在卡塞塔的威尔逊将军身上。理由是明显的。供应品、部队、基地和飞机场都在我们的手里。所牵涉的问题，往往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多焦虑，有时成为伦敦和华盛顿之间的冲突的原因。在对法国事务上，他们有时是莫名其妙地喜欢持不同意见。所以我们在当地的任务是，乞灵于并保持住由艾森豪威尔将军留给他的后任的英、美善意这一极其丰富、最可宝贵的遗产，来平息那种令人按捺不住的火气，并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在1944年1、2整整两个月当中，关于我个人的前途问题在国内都进行过讨论，并且拟出了各式各样的、经过细心推敲的指示草案。在1月底，通知我，要就威尔逊统辖下——土耳其除外——的所有有关各国的问题提供政治方面的建议。我自然要求有一个工作班子、一些情报以及关于英国政府究竟希望怎样作的想法。但是宛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伦敦外交部不可思议的思想活动可以举一个实例作为说明，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罗杰·梅金斯在阿尔及尔半夜被喊醒。这是一封“最急”电。必须马上就随便什么问题——即使没有实际巨大的重要性——同巴多利奥达成一项协议。对此，罗杰相当幽默地电复如下：

巴多利奥在布林迪西；哈罗德·卡奇亚在萨勒诺；梅森·麦克法兰将军在撒丁岛；首相在马拉喀什；哈尔福德卧病在床。在适当地照顾到人事和地址方面的困难情况下，我当尽速遵命办理。

当2月间我在伦敦时，我曾经同丘吉尔和艾登有过一些商谈。但我随即发现他们忙于要公，无暇再为我的问题操心。一时我认 514  
为我的工作会无法推动，甚至不可能推动。但无论如何它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工作。不久事情就自然而然解决了。这时我已经发

现,重要的是不要过问太多的问题。当3月底我在开罗的时候,业经毫不费事取得同意的是对南斯拉夫所负的一般责任,包括对我们代表团的管辖权在内,一并归由威尔逊将军承担。莫因勋爵——现任常驻开罗大臣——根据明显的实际理由,确认为这种办法是明智的。而且,因为美国人如果不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就无法工作,所以最好在每一人问题上都要有美国人参与其事——至少要把我们所知道的也让他们知道,即使在他们也许不愿和我共同作出决定的时候,也要如此。这一点只有在盟总方能办到。当时,外交部坚持希腊事务应当仍由开罗方面和莫因主管。这似乎是切合实际的;因为希腊的残余部队,连同希腊政府,都在中东,显然只能由开罗方面控制。但是,在1944年9月以后,希腊政府既迁到意大利的萨勒诺,自然就应该将希腊事务移交威尔逊将军管辖了。起初,我们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不甚相干。后来,派驻该两国“解放”政府的临时大使找上我们总部,我们变成他们的紧急公文的发送站。因此,尽管外交部对我的活动抱有一定不信任的自然倾向,在1944这一年,我却无可避免地承担了范围越来越大的责任。

随着达夫·库珀的任命,一切直接与法国有关的职务我都得卸肩了,除非他们的行动影响到盟军最高统帅。但是在1944年7月底我们能够从阿尔及尔迁移到那不勒斯以前,我尽管在这一带地方飞来飞去,但是主要办公地点仍然是在阿尔及尔。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还是无法摆脱有关法国方面的事务。我同达夫·库珀密切配合,他在各方面都证明是一个可钦佩的同僚。

515 所发生的第一个困难是3月10日关于皮舍的提审问题。在我访问英国归来之后,这次的审问是阿尔及尔唯一引人兴趣和争论的主题。

皮舍表演得很不错。他显然很聪明,但寡廉鲜耻。如果把他枪决,

我认为那是天公地道的。但是一般地说，这样作会对于戴高乐的名誉和委员会有不利影响。我想戴高乐会愿意宽恕他，却又害怕抵抗运动（反对）。在他们看来，他是一个双料的卖国贼。<sup>①</sup>

威尔逊将军多少有点担心审问对他所统帅的法国军队的影响。我坦率对他说，我不认为会有任何反应，因为皮舍是一个文职官员。要是他们开始审讯海、陆军军人，那就会是另一码事了。实则，对德里安海军上将提起的诉讼倒是铁证如山的，我对于这个案子的前景颇为担心。皮舍是理应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是不会有有什么反应的。

一个困难得多的问题看来是就法国部队的统辖权商谈一个新协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因罗斯福不愿承认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法国本土的权威而复杂化。马西格利在同我讨论意大利顾问委员会事务的过程中，突然对总统大肆攻击。

我担心美国人把他们的对法政策搞得一塌糊涂，并且还拉我们去支持他们。我很能理解英王陛下政府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决心同他们抗争的困难，但是我担心这会在法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恶感。麻烦的是，这在战后不会真正有损于美国人，然而随着俄国力量的日益增长，我却感到我们非依靠法国和其他中欧国家同我们合作不可。<sup>②</sup>

在这期间，法国在4月初又爆发了一次新的危机。当我们在意大利钦布罗内别墅时，措词激烈的电报一一照转给我。法国委员会未征询吉罗的意见就批准并发布了一项命令，擅自将法国武装部队的组织和调度的最终权力交付给主席——也就是戴高乐，这一行动已经导致吉罗发表了他决定辞职下野的声明。他曾以其特有的忠诚感电令统率在意大利作战的法国部队的朱安将军要对英、美部队依旧以赤诚相待。盟军总部的美国副司令德弗斯将军往访吉罗，试图劝请他改变他的决定。威尔逊将军根据我的建议，

<sup>①</sup> 1944年3月10日。

<sup>②</sup> 1944年3月29日。



致电参谋长联合会议提出他的看法：造成麻烦的部分原因就是法国人对于他们所得到的勉勉强强的政治承认深为愤慨，特别是对于美国方面更为愤慨。吉罗在同达夫·库珀的谈话中，表示坚持下野的决心。墨菲往访朱安，朱安确信，吉罗的辞职虽可惋惜，但无关大局。我对梅金斯完全信任，认为我没有返回阿尔及尔的必要。但是我却发给他内容如下的电报：

(1) 吉罗垂死挣扎的时间已经太久了。让他死去吧。

(2) 但是把握住朱安。他的意见看上去非常通情达理，我相信他很了解军队。

(3) 我确信库珀大使会冷静处之。我不知道墨菲大使会讲什么，但是告诉威尔逊将军，依我之见，吉罗辞职不会有什么真正损害。

(4) 请拿这封电报给库珀大使看。

正如我所料，达夫·库珀对这件事处之以非常冷静的态度。

但是，戴高乐决心

要把吉罗以总司令身份有着超宪法的地位和握有同盟国在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范围以外的私人协议的这种概念一举而予以消除。这种概念是〔1943年〕2月在安法开始出现的。它终于在十四个月之后消逝了。<sup>①</sup>

几天之后，我回到阿尔及尔，和戴高乐共进晚餐，他兴高采烈。

517 他似乎对于科德尔·赫尔最近所作关于法国委员会在法国本土的地位的声明，颇为满意。

关于吉罗，我想他对于自己拒绝接受总监这个崇高的职位，一定是不胜悔恨之至。但是他摆脱现役指挥权的决心却十分坚决。我不得不说我认为是正确的。

---

<sup>①</sup> 1944年4月6日。

晚餐后，我往访达夫·库珀，把我的谈话告诉他。<sup>①</sup>

4月18日，我和正在我这里勾留三、五天的马耳他现任总督兼总司令戈特勋爵同去夏宫向吉罗致敬。这差不多是他在夏宫的最后一天了，他最初搬进来是在达尔朗遇刺之后，1942年12月24日。当时他曾经是一手操纵全局的主宰——“军民总监”。威尔逊将军和达夫·库珀也来参加这个小小的欢送会。乔治将军在座，他妙语如珠、目空一切、意志坚强，一如往昔。

吉罗举止庄严高贵，这使人原谅了他的一切缺点。在一切谈话和交谈（达一小时之久）中没有提到任何最近的事态。只是相互回忆上次战争和这次战争的开头一年——正如你在陆、海军俱乐部所会听到的那样。

我们有一大队——佩带军刀、身穿红斗篷、骑着白马的阿尔及尔骑兵卫队和乐队，迎送我们出入夏宫。

我想吉罗真正感激这次的拜访，而令人快慰的是，在这个凄惨的小小仪式中毕竟还有一些高贵的和个人品德的东西。<sup>②</sup>

然而，目睹一个虽有错误但仍不失为可敬的诚实人一生事业的终场，却是苦痛的。

几天之后，我有机会去访问驻扎在意大利的法国部队。我是和亚历山大将军同乘他的敞篷车前往的。

一路非常寂静；路面被炸得凸凹不平。

法国人在这里比在阿尔及尔表现好得多。在这里他们渴望恢复自信，而也确有所恢复了。<sup>③</sup>

毫无疑问，没有一个人“想到那个老人”——也就是说，悔恨重重的吉罗。 518

关于控制法国部队的使用及其组织的问题，出乎意外地、不动

① 1944年4月13日。

② 1944年4月18日。

③ 1944年4月22日。

声色地解决了。我佩服威尔逊将军处理一些次要问题的手腕，佩服指导谈判的德拉特尔·德塔西尼将军的通情达理。据我看，法国事务依旧是风平浪静，只是到5月15日才发生了两件事。法国代表大会议决：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现在应改称为法国临时政府。虽然我知道美国人会表示反对，但是我不能有任何异议。实则这不过是对现在一个既成事实的正式承认而已。比较重要的却是戴高乐正式废除达尔朗—克拉克协定。这一开始就引起了一定的焦虑，但是我们在盟总决定对在辩论过程中所发表的这项声明，不予正式注意。我们已经着手修改这项协定，没有任何理由不应该继续讨论。我力劝伦敦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设法回避，而交由我们在当地处理。为了讲给公众听，我们才把威尔逊将军的参谋长甘默尔将军早已就这个问题同法国参谋长进行接触一事作了声明，而并没有对事实上的协议予以否认。从经济和军事需要的观点来看，使我更加焦虑得多的却是法国人在北非从农场和工厂召去了过多的工人，有欧洲人也有土著。在这个时刻，对我们来说，人力对生产比对军事方面更为重要。我劝请威尔逊将军同戴高乐谈一谈这个问题。

就小麦和谷物的一般情况而论，法国人也已经陷于严重的困难中。在突尼斯只有五天的供应，在阿尔及利亚只有一个星期的存粮——而收成尚未到手。今年在计算方面他们已经有过两次错误。他们已经向我们借了三万多吨……（他们在法属北非应该是一个输出国而不应该是一个输入国）。……他们对法兰西帝国的那种大肆夸夸其谈的作风没有认真地稍加注意，这倒的确是一件憾事。

519

我想事实是，在法国本土的法国人（而尤其是政府）所考虑的，只限于法国本身的事。好象是一个流亡的英国政府设在内罗毕一样。英国的移民痛恨他们正不亚于“殖民地人民”痛恨这整套结构。“殖民地人民”渴望从法国人手里解放出来也正不亚于法国人渴望从德国人手里解

放出来！<sup>①</sup>

在各项计算错误和混乱之中，对蝗灾的计算是最错误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讨厌的生物漫天遍野的异常景象。它们使得白天昏暗无光达数日之久，一旦从门窗飞入，就无法把它们逐出。现在它们已经去到沙地产卵了。

从现在起，在一个月到六个星期之内，幼虫就要孵化出来，为毒杀害虫准备下麸子是至关重要的。<sup>②</sup>

### 最后经商定

再借给他们一些小麦，条件是他们必须尽量把麸皮从他们目前的存粮和这批新麦中轧出来。至于其余，他们不得不勒紧裤带，靠菜蔬为生直到麦熟收割为止。我们也决定把盟国供应法国的食粮计划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真正在这里为法国本土窖藏或囤积食粮，那么，既然详细了解我们对于解放后的法国慷慨乐施的计划，他们也就可以准备把藏起来的那些粮食拿出来了。<sup>③</sup>

成为我们同法国当局经济关系发展标志的一个问题，这时得到了解决。在1942年11月刚刚登陆之后，艾森豪威尔就成立了一个通称为北非经济委员会的组织来处理这时在他管辖下广阔领土进出口的复杂问题。这个委员会是盟国在北非所有事业中最成功的一个。墨菲和我担任名义主席，实际工作却是在盖尔将军和献身于这类复杂任务的英、美文武官员的一个优秀班子领导下承 520 办的。一年多来委员会的工作占去了我很多的时间，而我同供应部和殖民部双方的联系，经证明是有很大帮助的。英国委员中最超群出众、最精明强干的是罗斯科·赫伯特。我很少遇到过一位比他更能令人钦佩的文官——绝对忠于职守、办事有效、不知疲倦、乐观而富有幽默感。要说美国的大多数代表是业余人员而英国官员是内行的专家，该不是不公平的。他们是从粮食部、供应部

<sup>①②③</sup> 1944年5月20日。



和其他专业部调来的。委员会的职能是为盟军的战争努力、增加北非领地的出口并维持主要的进口。出口以原料为主，其中有一些极其重要。其他象突尼斯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手中解放出来之后的橄榄油，则变成具有特殊价值的物资。有时我们不能不买进我们不大需要的东西，以便帮助当地居民。因此我们介绍英国公众饮用阿尔及利亚的葡萄酒，这是为了供空船作压舱货之用，并给予阿尔及利亚以切实帮助。同样，委员会不能不处理为维持北非居民适当的衣食供应这一棘手问题。这项工作因小麦的囤积和应付黑市的困难而不断遭受阻难。

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昏眩的工作。英、美的合作没有一个领域是那样真诚，那样卓著成效。实则，该委员会依然在世的老委员仍不时团聚，以保持这时结成的友谊。我们所克服的困难实不胜枚举。我们和中东供应中心以及斯温顿勋爵所领导的西非委员会的关系是密切的、和谐的。在许多麻烦的政治军事危机之中，当时不为人所注意的、从来没有得到充分承认的这项工作，却是一种切实合作的胜利。

在这个时候最动人的事件之一是“格里普索尔姆号”载着英国以及一些美国被遣返的战俘从巴塞罗那的到达。我的妻子这时正在阿尔及尔，我们一起去接船。我们发现这些人虽身受重伤并经长期监禁，但是心情却很好。

一批提兹河畔和太恩河畔的小伙子——有一个斯德哥尔摩人。同他们谈话真是太有意思。有一个中士说，“先生，德国人现在非常心虚胆怯，的确非常心虚胆怯！”我不大明白，何以见得他们如此呢；大概是因为对我们俘虏不太那么虐待吧。<sup>①</sup>

在6月初我同墨菲有过一次长谈，他对于伦敦和华盛顿之间不象过去那样亲密而感到苦恼。

---

<sup>①</sup> 1944年5月20日。

总统和首相之间的蜜月阶段已成过去，同平淡的婚后生活分不开的通常麻烦和分歧已开始出现。这一切对在这个战场上的美国人都不无影响。<sup>①</sup>

我不能不同意他对于情况变化的看法，而正是因为我对墨菲的感情以及我们向来合作无间的这个事实，所以更加令人耿耿。

关于法国事务，总统依然是毫不妥协的。鲍勃对于达夫·库珀没有把英国邀请戴高乐去伦敦一事通知他或查平（美国代办），啧有烦言。在阿尔及尔等地英、美外交官之间不完全信任，二十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我说这是因为事务繁忙所致，尽力把这件事弥合过去，但我对此万分抱歉。<sup>②</sup>

但是墨菲依然象过去一样的友好。

在这期间，“霸王军事行动”已经开始；尽管在伦敦同戴高乐展开了颇为幼稚的辩论，在阿尔及尔的法国人的兴奋和热诚却与日俱增。当月底我在伦敦的时候，我向外交部提出了我的计划，主张一旦情况允许就立刻将委员会从阿尔及尔迁到法国，扩大它的基础，召集法国名流组织一个谘询会议来重新肯定业经在阿尔及尔批准的宪法程序。

最后，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我没有进一步插手之下解决的。522  
但无可避免的事实是，英国方面，而尤其是美国方面所用来对待法国当时和早先的要求的处理方法，戴高乐始终耿耿于怀。但是说句公平话，他对于我们在这段关键性、创造性时日试图给以协助的那些人，却也一直是感激不尽的。

7月21日，盟总从阿尔及尔迁到卡塞塔。在我们离开的几天之前，法国临时政府的所有成员来给我送行。我认为这是感人至深的高情厚谊，所讲的话虽不免过奖，却是令人快慰的。最后，戴高乐作了一次私人拜访。我们为外交团全体，法国的官方和非官

<sup>①②</sup> 1944年6月5日。

方友人以及英、美的陆、海、空军军官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鸡尾酒会。

多罗西和我，偕同一小批干部，携带大量行李和一只鸚鵡，搭乘威尔逊将军的座机起程。在航程中，鸚鵡生了一个蛋，这被看成是一个吉兆。将军同来那不勒斯，到我的别墅小住，带有他的副官、他的苏丹籍仆人和缅甸籍仆人，但是没有带他的小猫，因为小猫失踪了。旅途有点累人，但十分愉快。大部分货车和轿车，包括最高统帅的车子在内，都损坏了。我们在那不勒斯的别墅“配备有意大利仆人（为数约八、九人）和他们的亲友（共约八、九十人）。我们的英籍仆人除一名中士和一名勤务兵外都已经去卡塞塔了。”<sup>①</sup>当晚大家都在威廉爵士和汉密尔顿夫人的著名公馆——豪华的埃玛别墅同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爵士（现任地中海总司令）一道进餐。

经过了十八个月变化多端、往往富有刺激性但始终趣味无穷的经历之后，就这样结束了我在阿尔及尔的驻节生活。因为战争的迅速发展随即导致了巴黎的解放和法国政府的建立，所以实际上也就这样结束了我同法国事务的联系。阿尔及尔又恢复到它作为一个殖民地城市的旧有地位。

然而对我来说，一如对许许多多英、美官兵来说，阿尔及尔依然是英、美合作的第一次伟大成功和一个复兴的自由法国重振国威的象征。

从1944年7月起至战争结束，我们的正式总部一直设在卡塞塔宫。在1月间，我首次在那里勾留，随后就设立了一个前哨站供我自己使用。这个令人瞠目的建筑物是那不勒斯地区的许多游客所熟悉的。在这一段或那段时期在非常环境中服务的成千上万盟国官兵无疑会是清楚记得的。当我在1月间第一次看到这座宫殿时，它正被克拉克将军用作第5军军部。

<sup>①</sup> 1944年7月21日。

这幢大厦(建于1760年左右)我相信比凡尔赛宫还要大。共有四个大庭院,三千多间房屋及其他建筑。花园通往山腰,喷泉、石像、溪流等比比皆是。运河水塘被韦恩·克拉克将军(第5军军部暂时也设在这里)用来降落轻便飞机(有浮动装置)。人工瀑布(显然是按杜克爵士在查茨沃思作品中仿造的)、假山、山坡以及今天暖洋洋的太阳——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愉快的下午的赏心乐事。<sup>①</sup>

花园相当零乱,但是可以想见,它有着这样多的喷泉、鱼池、湖泊、果园和庙宇,原来该是如何风光旖旎。双西西里的国王布尔邦朝的查理三世,确乎遗留下一个非凡的建筑物。两年多来,它注定要将成千上万的英、美官兵,连同随军商店、盟军膳厅和进占军的所有其他随身用具安置在原来为十八世纪的廷臣所供备的大厅里。在花园尽头有一间先后由威尔逊将军和亚历山大将军占用的玲珑精致的猎舍;在这个小村落里,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庐舍,可供必要时留宿之用。但是我还在二十英里外的那不勒斯另有一个别墅。虽然由于路上往来车辆拥挤,旅程往往令人厌烦,但是在炎热的黄昏回到海湾的旖旎风光之中,却是乐事。我的别墅——卡拉多里——位于离所谓罗森堡别墅不远、贴近埃玛别墅的波西利波地方。 524

虽然我飞往阿尔及尔现在已不再有必要,但是到罗马、巴里、开罗以及后来到希腊去,还是很频繁。然而或多或少地在一个地方住定下来,总让人松一口气。我们在那不勒斯定居下来之后不久——我的妻子在此作了短期勾留——因英王乔治六世的来访而大为振奋。7月23日下午他准时飞抵机场,当晚海军上将约翰·坎宁安爵士设宴,“大象”威尔逊和我是仅有的两个陪客。诺埃尔·查尔斯爵士和达西·奥斯本爵士曾经在我的别墅里同我的妻子和罗杰·梅金斯及哈罗德·卡奇亚共进晚餐。

<sup>①</sup> 1944年1月27日。



英王表示愿意会见他们，于是派人去请。因为从卡拉多里别墅乘车到埃玛别墅不过五分钟的路程，所以我们以为他们会马上就到。但是耽搁了很久，陛下似乎有点不耐烦。最后搞清楚，他们原已来到埃玛别墅，但是邓达斯将军(参谋长)以为他们是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终于到达……大家说说笑笑直到深夜。<sup>①</sup>

第二天在卡塞塔宫正中的宴会厅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各军种和各国许许多多官佐和军属都应邀出席。

我们一行人(“落到”我作为排头)包括查尔斯、奥斯本、梅金斯、卡奇亚、朗博尔德、布罗德(来自巴里)和温德姆。<sup>②</sup>

国王走了一圈，同客人一一握手，因为威尔逊将军当然不能认识他们每一个人，所以就要由我这个排头来介绍了。

午餐后，英王陛下动身去飞机场。他将几天在亚历山大将军照顾下去前线一行，检阅部队并受部队的瞻仰。7月31日，英王检阅加拿大兵团，我不胜荣幸地应邀观礼。这次操演实蔚为壮观——是一次旧式的阅兵式——部队热情洋溢。午餐后，偕同加拿大军官驱车回到卡西诺，听取亚历山大将军对整个战役的阐述。

第二天我奉召去埃玛别墅，英王留谈一小时。我对他对于一切发展情况的博闻强记获有深刻印象。

他对今天早晨发生的一件事情颇觉有趣。意大利国王(正如我在一、两天前所发现并于昨天告诉英王的那样)没有向任何人说一声就在大约十天前来到那不勒斯，在罗斯伯里别墅住下来。

不幸，我忘记告诉地中海总司令。一大早(大约5点30分或6点)在紧靠别墅外面发现有两个人在小船上钓鱼，形迹可疑，侦查艇(整夜在埃玛别墅外面巡逻)于是加以逮捕。这两个人原来是意大利国王和王后。他们(或不如说王后)大声抗议，喧嚣声把英王吵醒，他把头伸到窗子外面来。

---

① 1944年7月23日。

② 1944年7月24日。

英王自然问为什么吵嚷。

“陛下，他说他是国王。”

“什么国王？”

“陛下，意大利国王。”

（《蔷薇和指环》的一场话剧。）

最后，意大利王后拿出一张巨大的名片（《爱丽斯漫游记》上那种大小的），交给了海军少校。

青年军官的报告（连同那张名片）使英王感到非常有趣，他把那张名片留下来作为纪念。<sup>①</sup>

这个事件之后，在我看来意大利国王留在那不勒斯是不智的，因此我们劝他回返拉韦洛。第二天下午英王乔治起程。

英王陛下自始至终精神饱满。这是一次真正愉快而成功的访问。<sup>②</sup>

因为在整个这段期间我们有很多本身的工作要作，这些访问 526 是有点让人分心的。然而这却使我们快慰倍增。

1944年3月21日，英国援助铁托在南斯拉夫的抵抗运动的管理权从中东移交盟总。虽然经常把一切情况通知美国人，但是他们并没有积极参与其事。

自从德国人进攻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投降以来，差不多三年过去了。国王彼得及其政府先后撤至开罗和伦敦。在1941年，米哈洛维奇和塞尔维亚人开始了游击队运动。这些人通称为彻特尼克游击队。他们效忠国王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英国派遣联络官去协助他们，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很积极地困扰德军，后来有通敌嫌疑。在1941年秋季，铁托和他的共产党游击队开始了他们的活动。但是直到1943年5月才有英国联络官派到铁托方面。当年9月，菲茨罗伊·麦克莱恩前来领导代表团，他非常巧妙地成功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当1943年秋季意大利崩溃时，在南斯拉夫的意大

<sup>①</sup> 1944年8月1日。

<sup>②</sup> 1944年8月2日。

利士兵被铁托的游击队员缴械，游击队从而变得非常强大。彻特尼克游击队，这支君主制和被认成是正统流亡政府的追随者却相对地削弱了。在11月间，铁托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正式剥夺了南斯拉夫政府的一切权利。不久之后，在德黑兰会议上，所有盟国一致同意给铁托和他的游击队员以最大限度的支持。美国人相当勉强地同意了这一点，但是随即出现了和法属北非的情况颇为相似的局面。美国人倾向于支持米哈洛维奇，虽然他们已经同意了德黑兰的决议。墨菲对于因此而引起的发展忧心忡忡。我经常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他，他也不时表示自己的焦虑。

527 他(墨菲)(在战略情报局的激励下)当然倾向于米哈洛维奇，而不能遵循首相的亲铁托政策。但如何使他发生兴趣却是非常重要的。我总认为我们应该想办法让美国卷入巴尔干事务。我也同样确信，要这样作，方法不外是通过盟总(由美国人创始并具有有一种真正的盟国传统)而不是通过中东。开罗是令人怀疑的——不知为什么他们的思想总是同帝国主义、吉卜林之类联系在一起。<sup>①</sup>

到1943年12月间，英国最有见地的看法认为游击队终必统治南斯拉夫，而君主制前途渺茫，已不再成为一种起统一作用的因素。同时，这个地区在军事上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得到了充分支持的铁托的武装力量，可以牵制德方很多师的兵力，这对于意大利前线，以及稍晚一些时候对于法国前线，都是大有帮助的。

1944年2月22日，丘吉尔在下院说明了我们何以要支持现已统辖有进行各式各样军事活动的大约二十五万人的铁托的种种理由。国王彼得仍然不愿否认米哈洛维奇，而王室政府的威权看上去已几乎荡然无存。然而，由于从德黑兰决议的立场看来一种莫明其妙的自相矛盾的作法，意大利顾问委员会的南斯拉夫代表依然是由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选派的。我记得斯米尔加尼奇曾以这个

---

<sup>①</sup> 1944年6月5日。

身份受到了正式欢迎。在这个时候，菲利普·布罗德先生正担任英国派驻南斯拉夫政府大使馆的参赞，大使则是拉尔夫·史蒂文森。但是因为南斯拉夫国王和首相已去伦敦，政府已徒具虚名，除开或许在旧塞尔维亚境内各地外，毫无威权可言，所以我商请将布罗德调到我的工作班子里，在巴里工作。在战争的下余时间，布罗德以可钦可佩的忠诚在我手下供职，有时在巴里，有时在阿尔及尔。

外交部自然对于这种棘手的局势感到忧虑。我们已经正式承认伦敦的南斯拉夫政府，并派有大使，而同时一切实际工作都在比尔·迪金和伦道夫·丘吉尔的支持下由菲茨罗伊·麦克莱恩所领导的使团在巴里办理。尽管有这种理论上的困难，事情随即得在 528 切合实际的基础上推动起来。虽然首相在他那一方面竭尽全力促使彼得国王及其依附者同铁托及其支持者达成一项和解或至少达成一项工作上的协议，而我们在我们这一方面则继续给铁托以物资上和现金上的一切可能的援助。自 1944 年春起，我们给米哈洛维奇的帮助微乎其微了。

虽然丘吉尔敦促国王取消他的政府，但是他说他不服，直到 5 月 17 日国王方始成立了在克罗地亚领袖、一位叫作苏巴希奇的克罗地亚大君领导下的政府。

几天之后，威尔逊将军和我到巴里去调查整个的组织，当 5 月 28 日我们正在那里的时候，

传来了德军袭击铁托总部的消息。俘获他和伦道夫的企图——究竟哪一个人是更大的胜利品则很难说——似乎只以间不容发之差而告失败，元帅大约在两小时前逃往山区。<sup>①</sup>

被德国人赶出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突然在 6 月 4 日来到巴里。

午夜因为一封“最急件”被喊醒，来文的内容是铁托已不得不离开南

---

① 1944 年 6 月 4 日。



斯拉夫，现正在巴里。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他必须尽速离开意大利领土，在同威尔逊将军商量之后，我们发出了这样内容的一封电报。

529 在上午9点30分的一次会议之后，我们还决定派麦克莱恩立即去巴里。建议元帅去维斯岛，因为该岛已经由英国突击兵和游击部队的联合行动攻占。这样他就会是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而不是一个亡命者了。布罗德似乎认为他在维斯岛比他去大陆可以更有效地控制他的游击队的活动，但是我不确知心理上的影响会是怎样。就某种意义来讲，这可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会加强我们对他的控制。<sup>①</sup>

在这个时候，我得知苏巴希奇已经呼吁铁托举行会谈。建议彼得国王去马耳他，在那里勾留三、五天，同时现任王室政府的首相苏巴希奇偕同史蒂文森去维斯岛开始谈判。国王现在准备指派铁托为南斯拉夫最高军事统帅。希望能以这种方法，并提供基金——仍然是南斯拉夫中央银行的财产——来取得某种和解。

6月11日，南斯拉夫的一行人到达阿尔及尔。

他们一共八人。国王、大君、拉尔夫·史蒂文森、贝利上校以及国王的侍从官从飞机场被送……〔到盟总〕。<sup>②</sup>

威尔逊将军要到下午才能拨冗接待，所以我把这一行人接到我的别墅来（我还没有迁到卡塞塔），并飧以午餐。在威尔逊将军来到我们这里之后，

经决定，在适当的机会出现以前，国王应〔前往并〕暂留马耳他，如果可能，史蒂文森和大君在为会见米哈洛维奇的政治顾问托帕洛维奇先生和南斯拉夫其他各界名流而到巴里作短期访问之后，应即前往维斯岛。如果铁托愿意来卡塞塔拜会威尔逊将军，那么整个这一行人就再行折回，至于应否在适当的时刻将国王从马耳他请来，那要看铁托的情绪而定。

我到飞机场给国王送行。<sup>③</sup>

我小心翼翼地把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全部告诉墨菲和美国人，因

---

①②③ 1944年6月11日。

为我意识到要是他们把这件事看作是由单方面掌握的，那就会构成相当紧张的局势。后来发现华盛顿和莫斯科已经从伦敦方面得知这项总计划，我才安下心来。

在这期间，我们就南斯拉夫的两集团之间的和解计划进行了一些有益的谈判。在16日，我听说苏巴希奇和史蒂文森已经在巴里看到米哈洛维奇的代表，并已经去维斯岛，国王则留在马耳他。伦道夫·丘吉尔现在在我们这一行人中，我曾经劝请威尔逊将军下令把他从南斯拉夫接出来。对此，他自然感到气愤，但我确信这是必要的。 530

我不愿意他被德国人俘获，或受到严刑拷问，一则是为了首相的缘故，一则是因为我确信他知道的太多。无论如何，自从接出来以后，他过得并不坏。他曾去过罗马，会见过教皇……一般说他是过得愉快的。最后商定，让他去英国度假，然后再作为英国的联络官返回波斯尼亚。<sup>①</sup>

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苏巴希奇和铁托缔结了一项差强人意的临时协定。苏巴希奇承认了铁托对游击队在塞尔维亚的力量所作的估计，并得出了应该抛弃米哈洛维奇的这样一个结论。铁托自己也愿意承认这样一项原则：在战争结束后，南斯拉夫的各民族得自由决定君主制和宪法的问题。同时，铁托将给王室政府推荐两名阁员。他向苏巴希奇保证说，他不打算推行共产主义制度或以一党路线强加于国人。虽然我们很多人不相信铁托能够履行这项保证——纵使他有这种愿望——但是从我们当前军事需要的观点来看，局势似乎并非无望。

当6月间我为了“铁砧军事行动”的问题正在伦敦的时候，曾经就南斯拉夫的局势同首相商谈。同时在伦敦的菲茨罗伊和伦道夫都大力支持关于英国和彼得国王应全力支持铁托运动这样一种看法。虽然外交部仍然在为彻特尼克游击队的地位烦心，但是事

<sup>①</sup> 1944年6月16日。

实上这种议论多属空谈。前途注定是要由事态的发展来决定的。

我一回到那不勒斯就看到很多曾经同彻特尼克游击队在一起的英国军官，这些人自然认为：除非采取某种激烈行动，两个游击队集团之间的内战势将无可避免。7月11日，我们收到一封电报，略称铁托元帅终于不准备来卡塞塔进行拟议的访问。这大约是因为他不愿意再同苏巴希奇博士会晤，也许因为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同时，显而易见，苏巴希奇的新政府，诸事都不顺手。旧塞尔维亚党尽量制造麻烦，而南斯拉夫的驻美大使福蒂奇则特别令人头痛。第二天，菲茨罗伊到达，他告诉我们说，游击队的韦莱比特将军已奉铁托的指令，嘱偕同向苏巴希奇政府推荐的两个人立即前往伦敦。这看来是颇有希望的。于是墨菲和我到我们在卡塞塔村分配给苏巴希奇的小小别墅中去拜访他。他的确为人和善、乐观，他一上来就指出，政治天空看上去几乎是完全晴朗的。在我们告诉他铁托已经拒绝前来会晤之后，他毫未表示失望，却说，“这只不过是一小块乌云，瞬息即逝。”

伦敦、华盛顿和卡塞塔之间的电报往还，象往常一样真是千头万绪。看上去铁托将派他自己的代表到塞尔维亚，其中包括兰科维奇、卡尔戴利和其他一、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以教条式共产主义者和幕后大权在握而知名的，第一个是塞尔维尔人，第二个是斯洛文尼亚人。苏巴希奇和其他在卡塞塔的南斯拉夫人这时决定返回伦敦。

星期六晚间兴高采烈的大君前来共进晚餐。他精神极佳，情绪重又好起来，满怀热情和希望，讲了上次战争许多战役的原委以及此次战争许多斗争和考验的故事。他总的想法是回到伦敦，尽其所能给旧塞尔维亚党施加影响，以动员国王和宫廷为主，然后或许访问莫斯科，以期托斯大林之福和朝拜马克思主义圣地之功，建议同铁托举行另一次会议。他认为这样会使托铁的处境轻松一些，因为他显然受到他本党内极端分子

的猜疑，也许要被谴责为把自己出卖给温和派和国王，而遭受严重损害。532

7月16日接到一封电报，略称：铁托曾经告诉我们代表团的负责官员说，他想到意大利来，并愿意同威尔逊将军会晤。正计划访问意大利的丘吉尔，也很渴望会见铁托。

8月7日，铁托到达那不勒斯。丘吉尔可望在三、两天内到达。

〔铁托〕同盟军最高统帅有过一次军事商谈，并且已经去拜访亚历山大将军——乘飞机前往。要末他真的害怕了，要末他想逗留罗马，再就是因为他在盟军最高统帅的豪华宴会上酒菜吃得过量而生病。无论如何，他确实拒绝乘飞机飞回。他已去罗马（拜访鲍戈莫洛夫），并订于明天〔乘汽车〕返回。<sup>①</sup>

8月9日，铁托从罗马折回，

来到卡塞塔别墅午餐。他由他的两名幕僚和〔一名〕翻译，并由……菲茨罗伊·麦克莱恩陪同。我对麦克莱恩说，我不准备让铁托元帅的警卫员在午餐时站在我的饭厅里。我想〔他〕会向元帅说明这在我国不是绅士习惯。立场坚定证明是成功的。警卫员都站在走廊里了。<sup>②</sup>

铁托给我以非常好的印象，我们的谈话是简单扼要的。

他态度沉着、有礼貌、有风趣，看上去也通情达理。我想他是非常善自检点的。要评价他的品质，殊非易易。他显然具有发号施令的品格和力量。他个子不高，比较结实，甚至比我所料想的还要胖些，但是他具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威严。<sup>③</sup>

美国人非常有礼貌。他们

不能把任何社会人物都拒之于千里之外，尽管他们对米哈洛维奇将军有自然的偏向，但也很重视铁托。埃克将军在他的营房里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有乐队演奏，美酒畅饮。元帅似乎对于美国人所展示财富和豪华获得了充分的印象。<sup>④</sup> 533

要让铁托在等待首相期间不空闲下来，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得

---

① 1944年8月17日。

②③ 1944年8月9日。

④ 1944年8月10日。



以告诉他说,首相将比原预定的日期早两天前来,并且第二天就可以拨冗会晤。我的妻子陪他到那不勒斯湾去划船,但是他一身厚制服和金链,一定热得够呛。

我……告诉他说,苏巴希奇将偕同他的几位顾问前来同元帅举行商谈。铁托表示很满意,似乎对这类安排感到快慰。但是,显而易见,他正非常高兴地指望同丘吉尔见面。<sup>①</sup>

会晤终于在8月12日,星期六上午,在首相下榻的里瓦尔塔别墅举行了。

铁托元帅于正午到达,首相和铁托随即举行会议。在场的其他人员只有作纪录的鲍勃·狄克逊和两名翻译。我推测谈判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是实况不曾真正透露。在会议后举行的午宴上我也在座。<sup>②</sup>

我确信,铁托在战争结束后要握有全部控制权。

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局势的发展很不令人满意。铁托在他那一方面开始制造麻烦,而国王的政府则表现出缺乏现实性。9月2日,苏巴希奇向铁托发出呼吁,建议成立联合政府,但是铁托报之以冷淡的答复。9月初,我见到苏巴希奇的一位阁员,向他力陈武装力量有必要立即统一起来,苏巴希奇也非尽速亲往南斯拉夫不可。然后,英国政府试图争取苏联的支持,迫使铁托共组联合政府。但是局势开始恶化。铁托甚至硬说盟军司令部在援助米哈洛维奇;但是我们极力老实地予以否认。丘吉尔对这项责难以个人名义发出一份抗议的电报。铁托继而坚称成立联合政府的时机尚未成熟。俄国人随即开始长驱直入南斯拉夫领土,这显然加强了游击队员中锋芒逼人的共产党员。麦克莱恩向我们表示他对局势的看法:

他预料在欧洲战争过去之后,铁托会按照俄国的计划举行一次选举

---

① 1944年8月11日。

② 1944年8月12日。

或公民投票。(他不认为会发生大规模内战，因为米哈洛维奇将望风而逃，而铁托的实力，既有俄国军队站在他一边，又有我们给他的精良装备，会是非常强大的。)

这次选举的结果会是全部“党”人和政府提名人百分之百当选。他们会进而选举立宪会议等等，南斯拉夫联邦会根据民族解放委员会业经宣布的原则产生。

国王将不会受人理睬，苏巴希奇的政府也不会。如果苏巴希奇和他的朋友来到南斯拉夫，他们不会被枪决。相反，他们会被要求参加政府。<sup>①</sup>

大国承认的问题会随即发生。俄国会给以热情洋溢的立即承认，并派去一名大使，携同一个人数众多、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工作班子。

英国和美国将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踌躇不决并承认国王的政府(不管是由苏巴希奇主持，如果他证明忠于国王的话，还是由另一人主持，如果苏巴希奇投奔铁托的话)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而派一名“观察员”或一名“使者”去贝尔格莱德作为折衷办法，那么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机会，把我们长时期千辛万苦树立的好感全付东流，而当然会把铁托推到俄国熊的怀抱。他未必太渴望那种使人窒息的拥抱。但是(如果他受到美、英的冷淡)他将别无抉择。<sup>②</sup>

麦克莱恩在9月25日威尔逊将军的会议上提出的这个论点使我感到很有说服力。我不能不认为关于“铁砧军事行动”的决定已严重地削弱了我们达成我们在巴尔干的目标的希望。我们必须马上着手派代表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商讨救济等问题。但是俄国的军事存在和我们的不在场，必定使我们屈居于俯仰由人的地位。然而，随着时日的推移，当时机到来时，竟一反参谋长联合会议的偏爱，救济办法却是同铁托政府而并不是同王室政府订定的。由于签订平衡西方盟国和俄国在南斯拉夫的影响的一般协定而将

<sup>①②</sup> 1944年9月25日。

于1944年10月举行的莫斯科会谈，似乎是有希望了。但是我深深认为，如果要取得任何进展的话，对我们来说，放弃国王会是必要的。

米哈洛维奇也许仍然认为他获有美国的一定支持，这时致电威尔逊，要求我们放弃铁托和在莫斯科达成的一切协议。我们自然复电坚决拒绝。作为铁托和苏巴希奇在塞尔维亚商谈的结果，经一致同意，应由三名摄政和三名部长组织一次制宪公民投票。在这期间，铁托政府应握有立法全权。到11月1日，经铁托和苏巴希奇商定，认为应维持立宪君主制，但是在举行公民投票之前，国王不得回国。这似乎是事态的一个有希望的转折点。“情况的确看上去因莫斯科会议而大有希望，只要能长此这样下去！”<sup>①</sup>

看来（由于莫斯科会议）苏巴希奇—铁托协议可能得到贯彻执行，唯一的危险是温斯顿将对指派三个摄政的建议提出强烈抗议。他非常欢喜国王。但是为了彼得国王的缘故而要破坏非常有希望的发展，那会真正是一桩大错。不管我们怎么办，我不相信这个可怜的孩子有重新登基的任何可能。而远为重要的是，要防止南斯拉夫的内战和加强英国在那里的影响。目前我们确有一箭双雕的良机。<sup>②</sup>

536 铁托和苏巴希奇之间的补充协议是在12月7日签字的，现在是要丘吉尔和艾登来劝请国王接受了。他们毫不含糊地对他说，他非这样作不可，并指出铁托握有实际控制权，英国政府决不会为使国王复位而进行武装干涉。国王不听劝说，竟然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反对；但是英国政府正确决定：协议必须有效，对国王可置之不理。铁托对这种发展并不烦心，因为他认为这已经置国王于万劫不复之境了。

到1945年1月底，斯大林催促对南斯拉夫联合政府的承认，但是美国人抱怀疑态度。这时国王免去了苏巴希奇及其朋友的职

<sup>①②</sup> 1944年11月5日。

务。但是我们坚定不移，苏巴希奇和他的同僚终于在2月初动身去南斯拉夫。彼得国王终于批准了一个摄政委员会的成立，这个委员会和新政府都在3月初就职。

所以，到这个运动结束时，我们尽管有种种困难，似乎已经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史蒂文森和麦克莱恩耐心而巧妙地执行他们的任务。虽然南斯拉夫后来的历史走上了一条不同的路，我们却无可自责——我们已经尽到我们的力量了。伦敦和华盛顿双方着重点之不同再次令人遗憾；然而这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事态的发展起了支配作用。在战争结束时，俄国人在巴尔干的存在证明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1945年11月举行了国民议会的选举。苏巴希奇这时已经辞职，作为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竞选的形形色色亲铁托的政党赢得了压倒的多数。英、法两国随即给铁托政府以承认。国民议会在11月底宣布共和国——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宪法以苏俄的宪法为楷模。从那一天起，就创始了左翼（由于文字的不可思议的滥用）所谓的“人民民主”，也就是一般人们所称的极权国家。翌年（1946年）4月间，美国给以承认。在下月，已经落在政府手里 537 的米哈洛维奇经过审讯后枪决。只要让亚历山大将军在1944年夏季按照他的计划行事，那么这段历史就可能大不相同的了。



## 第二十章 意大利的新政

自从意大利于投降后取得参战友国的临时地位以来，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十二个月了。然而问题依然存在。究竟仍然将意大利作为一个战败的敌国看待、依照无条件投降的严格条件予以处理呢？还是承认它为对德斗争中的一个盟国呢？

如果战役进展比较迅速，政治问题未始不会容易解决些。不幸，在整个战争的每一个阶段上，在不同战区的要求之间都有尖锐的冲突。如果亚历山大将军那怕有适当数量登陆艇的供应，他也未始不能充分利用他的一个战略上的优点——在盟国握有完全制海权的东、西两面海域敌军侧翼的弱点。但是在“雪崩军事行动”之后，除开少数可供安齐奥登陆之用的以外，登陆艇全部都调去应付“霸王军事行动”和太平洋战争欲壑难填的需求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意大利脊部的战事给守军方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加给进攻部队以沉重的负担。这种不利条件，加上异常恶劣的天气，使亚历山大将军所部不可能在1943年年底推进到加里利阿诺河和桑格罗河线以外。因此，意大利的大部分，而且在财富和工业产量方面要重要得多的那一部分，依然掌握在德国人手里。在1944年春季以前重新发动攻势是不可能的。甚至在攻占罗马之后，德国部队仍然成功地重新集结，阵地坚强。意大利的首都攻下来了，但是凯塞林的军队逃跑了。直到1944年8月底，夏季攻势方才开始。

在这些星期中，我和亚历山大常常见面，他对我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我能够理解他的希望和他的挫折。虽然他已渐渐能够推进他的战线，以致到深秋时，战线已经从里米尼以北一直延伸到斯

培西亚以南，从而解放了军用民需的安科纳和里窝那这两个重要港口。然而，他竟功败垂成，既无优势兵力，又遇到棋逢对手的德国指挥官，以致“亚历山大的攻势，功亏一篑，未能取得应有的成功”。<sup>①</sup>

正值鏖战方殷之际，他邀我到离锡耶纳大约三英里地方他的前沿司令部去。

象往常一样，将军在一片地势起伏的小小森林之中物色到一个明媚秀丽的地点，周围是农地和葡萄园。我住在一个农舍里（接收过来作为客舍之用）。将军……住在他的篷车里。饭厅和休息室都设在帐篷里。营地充满了常有的那种沉着镇静的气氛。

然而，亚历山大将军看上去已疲惫不堪。……<sup>②</sup>

但是他仍然指望突破。那天晚上，安德斯将军和我们共餐，并且作了一次长谈。他对华沙的悲剧自然备极辛酸，但是他的忠诚依然毫不动摇。第二天上午我照例出席晨会。第五军在扼佛罗伦萨一波伦亚公路要冲的富塔隘口，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第八军在里米尼前线也立下了战功。

但是德国人正殊死抵抗，并且增援他们的左翼。利斯将军这时以七个师迎击德国九师的兵力。这是与时间赛跑……因为气候不久就要突变，由于河水暴涨，到了春天前，山区战线是无法展开的。<sup>③</sup>

我们乘坐已经从开罗一路来到罗马的那辆著名敞篷车前往佛罗伦萨。在第五军军部，我们发现参谋长冈瑟将军满怀希望，但不免有点焦急。在佛罗伦萨以北的一个叫作拉特雷利亚的小村庄，我们攀登到一个小山顶，然后又登上一座高塔的顶层。整个雄伟的亚平宁山脉绵亘在我们前面；我们拿着望远镜和地图观看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达两小时之久。 540

① 丘吉尔：《胜利与悲剧》，第111页。

② 1944年9月15日。

③ 1944年9月16日。

第五军的主要作战集中于富塔隘口周围，对东南方的一座卡特里亚山(高五千六百英尺)的进攻正在进行中。这证明已获部分成功，但是在守军占这样非凡地利的地方能够取得尺寸的进展，在我看来都无异是奇迹。<sup>①</sup>

守军防线如此坚固，战争中的这样一种情况，给了我强烈的印象。

烟幕的大量使用，甚至在我们所踞这样一个有利于作仔细观察的地点，也难以看清一场现代战斗。烟幕是步兵逼近这样固若金汤的阵地的唯一希望，除支援的炮兵所发射的烟幕弹和炮弹外，他还为这个目的使用了自己的迫击炮。<sup>②</sup>

有一位负责观察哨的美国上校向我们解释了这场战役的各突出点。

亚历山大将军(照用了他一向的外交手法)接受了这个教训——但是显而易见，对山川形势的一切特点，他早已成竹在胸，并(凭由一种战术上的直觉)了然此次军事行动的成败要取决于哪些点。<sup>③</sup>

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在佛罗伦萨小作勾留。中央大教堂、洗礼堂、季奥托塔、故宫、兰齐美术品陈列馆和新圣玛利亚教堂——所有这些都完好无损。洗礼堂的铜门用墙围起来，保险无虞。但是所有的桥都炸毁了(除了那座古桥)。盟军的炸弹和炮弹都没有落在城里，而只投在城外火车货运的集结场上。这是亚历山大的命令。一切破坏都是德国人造成的。

541 [亚历山大]非常引为自豪的是，就此次战役而论，他已经成功地保全了罗马、佛罗伦萨、彼萨、锡耶纳、阿西西、佩鲁贾和乌尔比诺，只有一些轻微的损失和敌军撤退时肆意进行的破坏。将军素以爱惜他部下的性命而负有盛名。他对于艺术品也是同样着意当心的。<sup>④</sup>

他对于战争的结局显然没有信心。他会节节胜利，他会牵制住德国的大军，而对法国战役大有帮助。但是在来年的战役开始以前，他无法彻底歼灭德军。

---

①②③④ 1944年9月16日。

尽管他在表面上有很大的自制力，但是一连五年指挥作战，几乎始终在焦虑万状和经常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已经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sup>①</sup>

9月21日，我能够再一次到他的前沿营地。伤亡惨重，但是颇有进展。里米尼已经攻下，前线似乎渐渐松动。但是毕竟没有足够的兵力去取得彻底胜利。

在这种形势下，自然所有各阶层的意大利人都会感到坐立不安、郁郁寡欢。甚至政治家也已经相当天真地认为他们只有抛弃他们的盟国，投降他们的敌人，方能使意大利免于战争的苦难。他们曾经低估了德国人的顽强性和实力而高估了英、美在东、西两面巨大的重压下，为迅速征服意大利半岛而投入足够的部队。然而倒也可以这样论证说：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德国人以越多的师投入意大利，就越能减轻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即将在法国采取行动的盟军的压力。就某种意义来说，希特勒在意大利又犯了他曾经在突尼斯所犯的错误。然而，这对于意大利人却是不好受的。因而我确信不能不设法鼓舞他们的士气。如果还不可能缔结最后和约和完全同盟，我们能否设法使“参战友国”一词成为事实呢？

意大利的经济情况的确令人焦虑。通货膨胀已大规模开始，正如我们后来在希腊所发现的情形那样，诊断容易而医治难。在1944年5月初，我拟具了一份以讨论货币问题为主的南意大利经济问题的文件，而劳埃德那位具有了不起权威的英国官员奉派来给我们出谋划策。从1943年秋我们占领西西里起直到1944年春，在解放区已经发行了价值二十亿里拉的纸币。旧日的野蛮战争方法，包括就地筹饷和让居民忍饥挨饿在内，至少避免了通货膨胀的问题。

……人们简直无法对下述事实佯作不知：即便德国人取法肆行劫掠

---

<sup>①</sup> 1944年9月16日。



而不付分文的中世纪制度到了那样的程度，而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损害，比之入侵军以他们在到达前所小心翼翼制造的纸币支付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现代办法，还要好得多。

货币对一个被占领国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损害，实有甚于掠夺。<sup>①</sup>

盟国反通货膨胀委员会已经成立。一项全体一致的建议就是增加面包的定量配给，定量当时仍仅仅二百克。据认为反通货膨胀政策的中心点就是要把定量提高到三百克，借以打破黑市。结果，农场主会更可能把收成送进公仓而不非法予以处理。如果我们能掌握意大利的收成，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将人民维持在一较好水平上，而同时又节省了盟国的航运。所以在目前我们同参谋长联合会议展开的争论中有两个目的——人道主义的和财政的。第一是我们想让买不起黑市东西的人吃饱的这个意愿；第二是我们希望防止工资以黑市价格为基础的上升，来掌握以至制止通货膨胀。据我们一些专家的计算，当时意大利的实际消费量平均约为三百克的面包和面团，其中只有三分之二是依法取得的。5月31日，我们举行了一次经济组的大会，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劳埃德的报告。

543 劳埃德的莅临当然完全是喜从天降，我在几个星期以前试图应用的刺激品没有他的来临是不会著有成效的。他既老练而又富有才智，当然，报告的大部分是出诸他的手笔。<sup>②</sup>

因而，在6月8日威尔逊将军批准自7月1日起实施三百克的暂行定量配给。因为上年仅仅征收到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供官方分配之用，由于定量配给的增加，所以我们满怀信心地指望大约有百分之五十供作分配。参谋长联合会议迅即予以批驳，他们要求延缓实行。电讯争论相继而来。然而，消息已经泄露出去，要撤销决议

① 1944年4月10日致德斯蒙德·莫顿爵士函。

② 1944年5月31日。

已为时太晚。所有意大利官员和盟国军官都已得到通知，除照旧施行外，别无抉择。威尔逊将军太容易被参谋长联合会议——或不如说以他们名义发出——的责难打搅了。所以我在伦敦给以大力支持，指出所有在现场的英、美专家已一致同意这是一个明智的“反囤积和反通货膨胀的措施”。在我看，参谋长联合会议凭以进行工作的假定是错误的，从而推论也是虚妄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威尔逊将军所采取的是一项所有对现代战争所造成的问题富有经验的经济学家原会一致同意的一项大胆的及时行动，其所应得该是褒扬而不是责难。

在整个这场争吵中，对意大利局面的既爱又恨的情绪，依然是我们面临的困难的原因之一。盟国的政策究竟是要从意大利人榨取我们所能榨取的一切呢，还是要争取他们对战后欧洲的感恩图报呢？我们是要作以怨报怨之神呢？还是要作救星呢？

令我殊为震惊是，我在7月底听到伦敦方面有这样一种说法：应该让意大利人明白，他们的苦难是他们自己的过错；第一，因为多年来不合理的政策，第二，因为意大利曾经对我们宣战，而且这正是现在我们何以会耽在意大利领土上的原因。这些责难是确凿有据的，但是既有失宽厚，也没有什么建设性。

无论如何威尔逊将军对他的顾问人员的信任和他自己的勇气 544不久就证明是不无道理的。国务卿和财政大臣要我就那不勒斯新定量配给的效果有所说明。7月19日我得以报告如下：

黑市面包已经从一百六十里拉降至六十里拉；面粉从每公斤三百里拉降至四十里拉。这无疑将使防止工资水平膨胀性的上升工作更容易进行些。

生产问题踵随消费问题而来。意大利的反常地位使得“租借法案”基金无法供意大利政府或代表该政府的管制委员会利用。这是一个莫大的缺陷，后来才为美国新立法所补救。

其次一个重大的难题就是动力——特别是电力。德国人在撤退时把所有的东西已摧毁无遗。虽然我们已能作一些修复工作，但是对于任何可供利用的生产能力自然都存在有相当大的竞争。陆军方面希望多多益善，以供他们的紧急需要；海军方面已经成功地使一些海军兵工厂开工。在乔治·克拉克将军（盖尔将军的后任）的帮助下，我拟出了一项计划，使意大利政府和管制委员会都得以我国供应部为基础作为一种制度进行工作，尽管这个制度是很不完善的。我承认首要之务应该是为盟国广义的军事目的服务；但是民用生产也至关重要。优先权不应该是绝对的。我们必须使人民得到满足而避免不必要的进口和航运。对平民来说，食品、肥料、衣着、房屋和运输乃是基本的需要。在后方地区（塔兰托、布林迪西和那不勒斯），已经有巩固根基的海、陆军工厂应该象兵工厂和皇家造船厂一样地运转；在前方地区临时开工的工厂自然可以置诸部队当局的管辖下，但是所有其他企业单位则应由盟国管制委员会会同意大利各部管理。所以，这个制度大都靠了布赖恩·罗伯逊的帮助而渐渐运转裕如了。但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

一个能够鼓励地方生产的饶有兴味的事例，就是位于那不勒斯附近的大麻工业。大麻工业在彻底瓦解之后，业经大麻管制局局长巴克豪斯先生予以完全改组。1944年8月间我到那里参观，对他取得的成就获有深刻印象。

我们参观了大麻的收集、漂染、梳理、纺织等各种不同的工序，并参观了麻绳制造和其他……工厂。我很感兴趣地看到很多来自贝尔法斯特的库姆·巴伯厂的专用机器，这个企业是我在供应部时经常打交道的一个。巴克豪斯显然完成了一件重要任务。在他厂里有领正规工资的八千多名工人，并且个个似乎都相当愉快。他的生产很不错。举例来说，自从巴克豪斯接手之后，整个地中海海军的麻绳需要已经得到了

满足。<sup>①</sup>

虽然我的职务仍仅仅是“驻节大臣”兼威尔逊将军的顾问，但是我发现委员会的代理主席斯通海军上校和所有英、美成员都是友好的、通力合作的。我们唯一的麻烦就是经济组没有受到华盛顿的良好对待。（美国）派来了一连串的代表，但是其中似乎没有一个在职两个月以上的。也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华盛顿后来抱怨英国人在经济事务方面的权限太大，但是美国方面的人选却落在这样一些人的身上，他们虽则对至关重要的总统选举会是斫轮老手，但在对意大利问题进行的斗争中却非得力的同僚。这就削弱了由他们担任主要职位的整个经济组。

经济组从来不曾有机会一显身手。先是格雷迪从美国前来，勾留了五个星期，然后返回美国，休假大约有五个月之久。他回来了才一个月……接着就退休还乡。继他之后而来的是纽约的一位律师奥德怀尔准 546 将，这是一个纯政治性的任命。他是纽约州的一个民主党领袖。他现在已经返回美国，大概是为总统竞选奔走吧。他出乎意外地通情达理，但自然根本是一个外行。他的副手安托里尼也是一个政治性人物。我们在经济组没有英国籍的副主管，而在各种不同的小组委员会都派有人手。其中有一些很不错，但另一些则显然很糟。<sup>②</sup>

这些政客们以准将的身份前来，作几个星期的走马看花，然后就分别回到至关重要的各州、尤其纽约州的选区对抗其对手去了。

在这期间，在政治战线上已经有了一些发展。在1944年春季，外交部在巴多利奥元帅所提盟国地位的要求驱使下，曾提出一项采取某种积极行动的建议。他们提议，盟国一旦“查明军事形势允许这样作”并且“意大利政府有充分的权力代表意大利人民讲话”，应即准备废弃停战体制，而签订初步和约。这项计划无疑部分地受到早已派遣一位大使的俄国政府当前态度的刺激。虽然威尔逊

<sup>①</sup> 1944年8月11日。

<sup>②</sup> 1944年9月14日。



将军和亚历山大都赞成这项办法，我也给以支持，但是国务院起初并不热心接受。然而到8月间丘吉尔到达罗马时，他们正小心翼翼地作出某种让步。于是我提出了一种不妨称之为暂定条约的东西，并且在8月22日在英国驻罗马大使馆举行的一次漫长会议中曾详加讨论。我们自然都知道，一项正式和约是有种种困难的，因为在战争过去之后，还有很多有待决定的问题，尤其是意大利殖民地和舰队处置的问题。

会议是在热得要命的一天举行的，从2点30分一直持续到下午7点。除开丘吉尔和我自己之外，在座的还有诺埃尔·查尔斯爵士、罗杰·梅金斯和代表外交部的鲍勃·迪克森。实际上是有两个问题，一个关系到我们本身的内部组织，另一个更加根本的是，为了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帮助意大利应该作些什么？在这漫长的讨论中，

温斯顿象一只狗咬住一块骨头不放一样。但是他的特殊方法成功地引出了实情真相——并且把所有那类听起来满好、但显然行不通的官僚主义的外交部建议抛开。

鲍勃·迪克森根据他摘录的要点进行了果敢的斗争。他的任务是抬高查尔斯而清算我本人。但是温斯顿一概听不进。当查尔斯可怜巴巴地喊出“那我干什么呢？”的时候，他回答说，“大使向来都干些什么呢？”当他了解到查尔斯没有任何行政职务，而他的外交职务也只限于作为派驻一个虚有其名的政府的大使时，他非常藐视高级专员这个头衔。<sup>①</sup>

首相进而暗示，我们所同意的任何新政策都必须在即将举行的魁北克会议上予以讨论。他认为应该以我作为执行新政策的工具。

他希望由我主持管制委员会，实行新政策。他不想要一份条约，但是他希望有一个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他说这是政治家而不是外交家的任务。<sup>②</sup>

---

<sup>①②</sup> 1944年8月22日。

关于讨论的实质，丘吉尔欣然同意应该把意大利视为“一个友好的共同作战国而不再视为一个敌国”的意见，因而对它应该免于适用对敌贸易法，从而得恢复一定的出口和货币的内流。如果美国人同意的话，它将可享有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日益增加的责任应移交给意大利政府。其细节将在魁北克予以研究。

丘吉尔在这次访问期间看起来毫无倦容。在我们漫长会议的次日，他在上午 11 点谒见教皇，中午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一项友好的、提供情况的声明，同皮埃德蒙特亲王共进午餐，并同意大利政府举行了一小时的商谈。 548

所以，他在一天之内看到了所有各种形式的权力——宗教的、帝王的、政府的——和这个王国的第四阶层。<sup>①</sup>

他的多才多艺和他的忠于职守是少见的，而且他看上去象儿童一样地以此为乐。我非常高兴他会见了意大利政府的所有成员，从而他预先防止了因仅仅会见政治上的“右翼”（博诺米和巴多利奥）而在这里和国内肯定会招致的批评。

紧接着在丘吉尔的访问以后，英、美职工会领袖一行人等前来考察工作的进展情形。此行显然是欧内斯特·贝文组织的，希望他们对于意大利劳工领袖应如何适当地管理自由工会有所指教。我特别高兴接待英国的成员，汤姆·奥布赖恩和威廉·劳瑟，我同他们结成了永恒的友谊。美国方面是巴尔扎尼和安托利尼，他们不同于我们的那两位，不大能讲英语，而是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

他们因为在到达的当天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对盟国管制委员会及其所有干部全都痛加指责，并且毫无根据地指称英国人正试图把意大利变成一个殖民地，从而造成了相当的骚动。<sup>②</sup>

英、美大使力图劝说军事检查员扣住这条新闻不发，但是有关官员很明智地拒绝了。

① 1944年8月23日。

② 1944年8月29日。

〔报道〕未始不会马上就发到纽约，报纸上未始不会有这样一条显眼的大标题：“英国将军试图箝制美国工人的言论！”<sup>①</sup>

549 在等待进一步政治发展的时候，我抽空到前线去了几天。这是我始终渴望的，一则因为这可以调剂一下在总部的生活，令人心神一爽；再则因为将军们欢喜看看另一个世界的人，听听一些新闻；尤其因为我很想知道是否有可以证明任何具有决定性的战役的机会。

因而在9月21日1点左右，我经由锡耶纳到达了亚历山大的前沿营地。我发现意大利部队的一位前中将师长、现任监国乌姆贝尔托亲王的副官长因凡泰将军，正在同亚历山大将军相互交换对西部沙漠战事的回忆。

将军看上去精神抖擞。经过昨天美国人在富塔隘口、英国人在右翼遭到惨重伤亡（第五十六师计……三千人）的一天鏖战之后，正取得相当的进展。里米尼已经攻下，拚死决一雌雄的角逐，渐近尾声，已大可指望敌军再经不起更多的迎头痛击了。<sup>②</sup>

噫，他们竟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网罗。第二天，9月22日凌晨，我们分乘两辆“飞车”去访问现由利斯将军统率的第八军。前沿司令部刚刚位于里米尼以南三、五英里的科里亚诺山那面。我们首先去由伯恩斯将军统率的加拿大军团，他们兴高采烈，由于他们的胜利而非常高兴。他们的装甲师，连同新西兰的装甲部队，正开始跨过流经里米尼的马雷基亚河而向平原挺进。英国和加拿大的步兵攻占了这个最后的制高点（福尔图纳塔山），这才使希腊旅可以进入里米尼，并使部队进入平原。〔我们的部队〕从一个山头打过一个山头，转战达一个月之久。鉴于德国人在数量上所占的优势以及在地形上所占据的极其有利的位置——盘踞于几乎无法攻破的

---

① 1944年8月29日。

② 1944年9月21日。

高地上——这的确是一个军事上的伟大奇迹。<sup>①</sup>

两位将军和我驱车去已攻占的福尔图纳塔山，观看跨河而东的战斗。我们在里米尼已经建有几处桥头堡。然后我们乘吉普车去里米尼。 550

城市遭到了相当严重的破坏，但不是不可修复的。那里有一些文艺复兴时代以及一些年代更早的华丽建筑物。因为这个地方是昨天才攻下来的，所以满目凄凉。但是我确信它会“收拾得”比现在看上去的情况好些。

这些半遭破坏的建筑物的一个大难题就是要防止因恶劣气候和雨季来临而进一步损坏。但是盟国管制委员会艺术品小组委员会正在帮助意大利人，并作出了辉煌的保护工作。<sup>②</sup>

实际上，里米尼的人口已全部逃亡，大部分逃往早已充满了难民的圣马力诺。继而我们驱车过河，观看装甲部队的前进。德国人炮火很猛，展开了极其顽强的阻击战。后来，我们回到利斯将军的总部。亚历山大将军乘“飞车”动身，我在奥利弗·利斯那里舒舒适适地过了一晚。

我住在一辆非常舒服的篷车里，有一些极其精致的描金的家具。这是特别“腾”出来供英王乔治莅临时使用的。

第二天我们一大早乘一辆由利斯将军驾驶的吉普车动身。我们从各个不同的侧旁，距离实际前线不远的各点，遍历整个前线。事态在进展，将军到处都受到笑脸的欢迎。

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得人心的人物，我对他说，他指挥全局象指挥一次竞选运动一样。同上一次战争相比，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那时的一位将军是一个高高在上、心广体胖、白发银须的人物，身着裁制得无瑕可指的军装，足蹬雪亮带着刺马的皮靴，偶尔从豪华的大厦里出来，〔坐〕在他的巨型罗尔斯牌轿车上。……现在部队的指挥官则是年轻人，穿着短裤和敞领衬衫，自驾吉普车，并且当他在拥挤、泥泞的道路上，沿着大炮、

①② 1944年9月22日。



坦克、卡车、坦克运输船等等擦过的时候，频频向部队招手和大声问候，而且在他驱车经过的时候，敌人也许实际上正在轰击这条道路。<sup>①</sup>

进占圣马力诺已经是必要的，为此而使用了印度师和苏格兰旅的部队。一切仪式都照样举行了。

这个小小的共和国是一种多少有点荒谬的新和旧的混合体。我们受到两摄政之一——带着一副白手套，穿着一套非常长大的燕尾服（象一个管家）——和内阁的欢迎。（我们猜想两摄政大概共总只有一套燕尾服，所以一次只能有一个人执行职务。）<sup>②</sup>

经过彼此行礼如仪之后，将军和我被领到会议室。

市政厅是1850年哥特式的——同巴利奥尔的市政厅很相像——也是圣马力诺主要出口品之一，也就是出售头衔的产物。这个建筑物连同位于岩石之上的中世纪城市的大部分，主要都是由一位美国妇人捐建的。这位女施主还捐办了给水系统。为此之故，尤其是为了最后的那一项贡献，特酬以“水——万古长存女公爵”的荣衔！<sup>③</sup>

在敬酒和几段讲话之后，两执政之一开始提出因轰炸等而在他的国内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的问题。幸而正在这个时刻笛手在外面广场上大声吹奏起来，喧嚣耳际的笛声使我得以逃避这个尴尬的问题。但是这个争端一直拖延了很多年才得到最后解决。

在这种一片混乱之中，

印度师师长带着在附近一座小山上进行反攻的计划来了，在那里两、三千码以外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sup>④</sup>

整个场面真正是妙不可言的。两摄政之一和他的那些身着燕尾服的大人先生们正讨论着赔偿；将军和我则在笛声和炮声的喧嚣中客套连篇，而战斗却在靠我很近的地方进行着。我们居高临下，可以看到山麓和河流，看到战斗的进行。

第二天，9月24日上午9点，

我同利斯将军一起离开营地，乘汽车越过哥特线，这条线是他的队

①②③④ 1944年9月23日。

伍在8月底成功地突破的。这是在宽阔的山谷中一个固若金汤的阵地，布有大量的电网和地雷，并有许多非常坚固的据点，包括在后面那一排小山居高临下的阵地中埋伏在混凝土基地里的坦克车在内，使阵地更加坚固。这是靠了谋略才攻陷的。进攻是由六个师在一个狭窄的前线出其不意地发动的。德国人当时正据守着防线前面的那一系列小山，但是在他们尚未来得及把人力在战线配备妥当之前就被仓皇地赶出去了。穿过地雷阵地标明的小路依然畅通，我们的部队就顺着这些标明的小路冲过去，并……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把德国人〔全部逐出〕战线——真是一个辉煌的成就。<sup>①</sup>

在9月底，使我深以为憾的是，把罗杰·梅金斯从我这里调走了。我在卡塞塔挂有拿破仑派绘画的堂皇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欢送会，罗杰为他自己在盟军总部赢得了这样的地位是应该归功于他在这个办公室里的终日勤劳的。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服务员们端出来大量酒饌而他们自己并没有酩酊一醉。在我的欢送会之后，我们去参加“大象”威尔逊将军和他的幕僚在猎舍里为罗杰举行的精选嘉宾的宴会。

失去罗杰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甚至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他在我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中一直是一个非常忠实的支持者，并且是一个很投合人意的伙伴和朋友。我们象连队伙食团里的尉官一样地生活在一起大约两年之久而没有任何争吵，我认为这是应该归功于我们双方（罗杰的脾气比我更加容易激动）。他感人的地方是他工作的标准。他从来不甘居人后。这种作风不但在任职期间贯彻始终，而且鼓励了其他的人。

这个调动将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想基特·斯蒂尔会是投合人意 553 的，得力的。但是他没有使罗杰在公务中成为这样一个独一无二人物的那种敏锐的头脑和几乎僧侣般的忠于职守。<sup>②</sup>

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之后，在海德公园罗斯福总统的家举行

① 1944年9月24日。

② 1944年9月29日。

了关于意大利问题的进一步磋商，9月26日发表了由这两位政治家签署的声明。这就是通称的海德公园声明。该声明承认意大利人民在过去十二个月中已经表现出他们要自由以及他们希望站在民主国家一边作战并在联合作战国家取得一个席位的意愿。总统和首相愿意鼓励那些要求政治上再生的意大利人，并让意大利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使他们在打败德国的事业中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日益繁重的管理权逐渐交给意大利政府，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名称将予更改，取消“管制”一词（这就中间一字不发音了）。英国的高级专员和美国的对等官员将改为大使，并要求意大利政府分别派遣代表到华盛顿和伦敦。善后救济总署将发送医药救济和其他主要的供应品。需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恢复意大利的经济，一则作为一种军事措施，一则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意大利资源。盟国将尽可能协助修复电力系统和铁路，并提供汽车运输车辆。他们将提供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工业专家协助这方面的工作。对敌贸易法将予以修改。最后，盟国指望有一天意大利能全国获得解放，并举行自由选举。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这项声明在意大利都受到了欢迎，在英国和美国也同样受到欢迎。这自然足以导致对该政府并来自该政府本身要求立即采取新的行动的压力。博诺米坚持催促我尽速拟订细则。

554 作为这些变革的一部分，我的任命也得到了一致同意，11月10日正式发表。我担任了盟国委员会的代主席，而以盟军最高统帅任主席。

在这期间，意大利政府送出一份备忘录，要求立即变更委员会的整个体制，包括接纳意大利代表进入委员会这点在内。他们还要求委员会应主要由文官组成，附加于意大利非正式成立的各部的盟国官员应予撤除。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建议都超出了声明所提出的政策。所以我就职后马上要做的就是劝请两国政府同意给我

一项指示,然后我在10月提出我的建议草案全文。

对于这项文件进行着月复一月的讨论,但是我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执行了很多决议。有很多实际工作有待处理。到这年年底,我取消了委员会的政治组,以便让两位大使发挥正常职能。北部的问题愈来愈逼到我们头上。指示已下达特勤行动局和战略情报局的官员,要他们说服游击队在敌人撤退时维持治安,特别是防范德国人破坏公用事业。11月17日,关于各游击队委员会的合流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举行了重要的磋商。

但是从实际观点来看,最为重要的就是经济发展。总统在他争取连任的艰苦竞选运动中,开始对海德公园声明作越来越宽大的解释。直到这时为止,面包配给只在意大利解放区增加到三百克。威尔逊将军并非不自然地询问是否总统的允诺意味着随着军队的前进,对意大利所有解放了的地方一律立即实行三百克的定量配给。这迟早会需要更多的进口。参谋长大概不为政治家的需要所影响,依然无动于衷,或不如说保持一种坚定的,然而重要的缄默。最后,在10月底,总统声称由他承担要威尔逊将军增加定量配给的责任;丘吉尔立即提出反要求,通知罗斯福说,既然他承555诺挑起这个担子,他现在就必须搜求船只。

经济在这些和其他许多方面都有了改善。可供利用的动力日有增加;运输逐渐完备。意大利政府开始相当独立地发挥其职能;意大利政府和其他盟国之间的直接外交关系已经恢复;盟国委员会逐渐从管制变成为友好的劝告。所有这些进展都在缓慢、然而稳步地取得。

在若干问题上,美国政策渐渐证明是多少有点令人为难,而总统10月10日的声明也并非毫无令人为难之处。该项声明说,美国愿供给意大利以“迄今和嗣后发给”在意大利的美国部队的盟国纸币等值的美元。如果要英国作类似的让步,英国国库势难负担。



我们所能答应作的，就是让意大利在航运许可的条件下为进口使用他们对英国或英镑区所进行的出口等值的英镑。随着错综复杂的和有时互相矛盾的指示不断从华盛顿和伦敦的各不同单位纷至沓来，立刻就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情况必须予以调整。因而经商定，要我在10月底去伦敦谋求我的同僚的意见一致，并经过同有关官员充分磋商之后，前往华盛顿，以便试图解决很多依然暧昧不清的问题。到那时无论如何总统选举已经过去。11月12日我已回到希腊，11月16日正式就任为委员会的首脑。委员会占用了一座宽广的法西斯的现代化大楼，即过去的劳资协商部。海军准将埃勒里·斯通已经批准为代理主任委员。他偕同他的可敬的参谋长陆军准将莫里斯·勒希正式接待了我，我们用了一整天讨论我的伦敦和华盛顿之行。

556 动身之前我曾蒙教皇召见，这似乎是因我的职位关系而有此必要。这次私人晋见是由达西·奥斯本爵士安排的，时间订为18日上午10点30分。达西爵士介绍过我之后就退出。教皇庇护十二世正坐在近门的一张书桌前。他站起来欢迎我，握手后，让我坐在桌旁的一张椅子上。

他一上来用英语交谈，但是我事先得知，他法语说得比较流利，所以我们随即改用法语。尽管现在我在作会谈纪录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经验，但是要对他（或我）所谈的一切非常确切地记录下来，却颇感为难。触及到了很多问题——浮光掠影、象雀跃一般地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我想我未能很注意倾听，因为我在想很多别的事情——教皇的仪表、声音和姿态；房间；际会；教皇权位的长期历史；把我带进梵蒂冈的奇特机缘——离圣马丁街很远，离阿兰更远；<sup>①</sup>

陛下对于世界似乎感到沮丧，他自己也许同样是消沉的。

他谈到共产主义，谈到宗教信仰的危机，谈到苦难。他在德国居住

---

<sup>①</sup> 1944年11月18日。

时间很长,也了解英国,当然意大利是他的故乡。他为各国,尤其是为意大利而叹息,哀叹被派系活动弄得四分五裂,惨遭战祸蹂躏。他以尊敬的、几乎敬畏的心情谈到丘吉尔。深情款款地谈到我国国王。谈到坦普尔大主教的过早去世对英格兰教会的损失。但是我感到很难多说什么或回忆我所说过的话。……教皇接下去悲痛地从一点谈到另一点。我那时得到的主要印象是一种离奇的对比——外观富丽堂皇的宽广大厦——圣彼得教堂——梵蒂冈——数不尽的一套又一套的房间,奢华的家俱和庞大的财富贮藏室……然后一种超时间感——在这里时间是毫无意义的。一个一个世纪地送往迎来,但是这像生活在一个想像的世界中。而在这一切的中心,在走过教皇卫士、贵族卫士、大人阁下、主教、红衣主教以及各个时代的雪泥鸿爪之后——坐着一位矮小的、德高望重的人,忧心忡忡,但显然圣洁无私——既是一个可怜的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他给了我一枚小小的纪念章——和一种非正式的祝福。后来他又赐 557  
以类乎伯爵的荣衔,连同另一枚较好的纪念章和一封极其亲切的信。①

25日,星期六我到达伦敦。我们的正式工作将于星期一开始。业经奉派继任迪尔陆军元帅在华盛顿的职务的威尔逊将军已从卡塞塔归来,并到内阁办公室我的房间里来看我。他即将任命为陆军元帅,这次晋级完全是分所应得的。威尔逊是一个很好共事的人,忠诚老实,光明正大。他天生的精明锐利使他得益匪浅,并且他渐渐学会了如何同美国人相处。他在华盛顿证明是很成功的,虽则没有人能同迪尔相比。但是统率权的变动意味着亚历山大将军(现已晋升陆军元帅)将担任地中海最高指挥官,这使我不胜高兴。

第二个星期完全被陆军部和财政部召开的各式各样会议占去了。到12月4日,下一个星期一,我为各式各样正式委员会的一次联席会议准备的内阁文件已经齐妥。我在同一天午餐时看到首

① 1944年11月18日。

相,告诉他说一切进行顺利。然而,

欧洲整个的供应和航运问题已经由意大利的这些建议揭示出来。而航运的情况令人绝望,一则因为原期待对德战争在1944年12月31日可以结束,一则因为德国人盘据法国港口为时有那样之久,更由于有广大的解放区需要照顾而战争又了无终期。过去的一切计算都已经错了,在1945年第一季度估计的短缺至少有五百万吨。何况,美国人坚持调用越来越多的船只于太平洋战争。他们的军事行动愈成功,他们的交通线就变得愈长,他们对船舶的需求也就愈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sup>①</sup>

558 我的文件已经获得批准,并交内阁传阅,看来无疑会获得接受。我满指望在这个周末之前动身去华盛顿。在这期间,正如只要离开三、两天似乎就总会发生的情况那样,在罗马又开始了两个新的争吵。我每天阅读电报并常常去看外交大臣。这是改为从伦敦方面观察事态发展的一种转变。第一个麻烦就是意大利政府寿命的危机。

这是典型的——几乎是阿尔及利亚式的。政府的威望已经因若干事件而降低。在卡鲁索审讯中,对一位证人的私刑拷问和一位叫卡雷塔的科埃莉王后监狱的前典狱长在警察无能为力或抱有同情的情况下为暴民所溺毙,这被看作是与盟国正试图适应“新政”的高要求不相容的。麻烦渐渐在阁员之中蔓延开来。

左翼各政党的一系列阴谋诡计——其中斯福尔扎伯爵的手法也可清楚看出——以及他们在比较重要的内阁各部中争占优势的企图,终于导致博诺米先生在11月26日提出辞呈。<sup>②</sup>

监国遵照正确的手续征询众议院和众议院未来的两位议长奥兰多和托雷塔的意见。各政党领袖以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在没有他们的那位主席博诺米自愿缺席的情况下举行了会议。他们推

① 1944年12月4日。

② 哈里斯,前引书,第214页。

选斯福尔扎为主席。随后他们决定,除非将外交部交给斯福尔扎,博诺米就组不成联合政府。现在局势不容易收拾了。对丘吉尔来说,斯福尔扎是一个激怒他的人物,我常常感到颇善于寻开心的罗斯福利用这位意大利政治家像斗牛士的斗篷一样地激怒他的同僚和朋友。无论如何,当全都曾经是博诺米政府成员的德加斯佩里、萨拉加特和奇阿卡这三位政党领袖的一个代表团问诺埃尔·查尔斯爵士是否英国对斯福尔扎的反对仍然有效时,查尔斯只能回答说,如果斯福尔扎担任外长,那么我们同意大利关系的任何改善将是不可能的。<sup>①</sup>这当然是根据伦敦方面的意旨,并且是一种看法的表示,且不管是如何不明智,但并不是一个否决。我自行致电斯蒂尔澄清形势。斯福尔扎实际上已被任命为驻华盛顿大使,只要意大利风暴在他到任以后再爆发,那也就未始不会太平无事了。

这个事件有一方面使我很高兴:

无论如何,意大利危机就新制度如何运行给了我们一个例证。作为一个英、美机构的盟国委员会,除非奉到(英美)参谋长联合会议的直接指令,决不干预其事。英、美两国大使各自独立行动(并且在这个场合下是单方面的),各人代表本国政府的观点。

这个程序是严格遵守的,无论是我、我的副手斯通海军准将、还是管制委员会的任何成员,对于被看作是纯粹的意大利问题,都不表示任何意见。然而,这个事件是不幸的,尤其在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无论在意大利或其他地方都已经丧失了一些我们合作初期那种热情的时候。这甚至于使老克罗奇都起而抗议。但是什么都不能使丘吉尔动摇。他厌恶斯福尔扎,并且不信任他。美国人提出抗议,但是既有这样多的其他危机要我们去对付——包括德国人在阿登山脉的反攻在内——所以经过尖锐的电报往来以及现任国务

<sup>①</sup> 哈里斯,前引书,第214页。



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和首相的进一步相互责备之后，也就把问题丢开了。

最后，博诺米取得了一次相当的胜利。所谓的行动党不但要求由斯福尔扎担任外交大臣，而且还批评博诺米把他的辞呈递交监国而不递交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一完全正确的行动。社会党人也参与一起抗议。这两集团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什么认真其事的追随者。说来奇怪的是，共产党人认为这一切反对都是荒谬的，这样博诺米方能组成一个四党政府，并能从危机中挣脱出来而且得到加强。斯福尔扎没有做成外交大臣。两位强有力的人物是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加斯贝利和共产党的陶里亚蒂。既然争取到了这两个人，博诺米就居于—强有力的地位了。基督教民主党的威权的确有了增长，他们在意大利政治上的长期支配地位随着第二届博诺米政府而开始了。

虽然意大利危机继续了不少时日，但是新政府终于在12月12日组成，并到1945年6月一个包括所有各党在内的新联合政府组成时止一直没有变动。很多悲观主义者所预料的内战或革命的危险，就这样成功地避免了。

第二个争吵就更加令人想到阿尔及尔了。当我正在伦敦商谈意大利新政的细节时，我看到一份电报，内容涉及作为意大利“清洗运动”的一部分，巴多利奥元帅有身遭逮捕和交付审判之虞，而清洗运动已经以并非不适当的报复方法进行若干时日了。我以这份电报就商于奥姆·萨金特爵士，并建议由我们基于军事的理由要求美国人会同进行干涉。显然我们不能听任把巴多利奥监禁或判处死刑，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不应该承担一些责任。12月7日，艾登对我说，国务院，虽态度友好，然而不愿插手。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言明我们不愿单独干涉并且像是要说到作到，我认为我们可以使美国感到羞愧而不能不

承担他们的一份责任。甚至柯克大使也不愿看到这位老元帅在他豪华的私邸外面遭枪决。最后,对于这类不愉快的事和往常一样,又落到英国人去肩负这个重担。

诺埃尔·查尔斯在我们于12月5日接到的那封电报中叙明了整个经过。元帅曾经去请他出谋划策。按照他的想法是由于斯福尔扎的煽动,他即将遭到逮捕并会交付审判。他应该怎么办呢?究竟应该留在罗马自己家里还是躲到乡下朋友家里去呢?查尔斯立即答应去征询盟国当局的意见。柯克的看法是,“在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以前”,我们决不采取任何措施。在他想这就是“我们的民主立场”。丘吉尔当然作出了迅速的、独具特色的反应。他致电查尔斯,要他个人负责元帅的安全,并在英国大使馆或某一同样安全的地方给以避难权。元帅毕竟签署过停战协定和我们得以在意大利立脚的各式各样文件。不经两盟国政府的同意是不能把他交付审判的。这是事关我们的军事荣誉,并有关他曾忠实相与交往的海、陆军将领的军事荣誉的。<sup>561</sup>

因而,查尔斯采取了行动,把元帅安全地安置在英国大使馆。然后必须征询一下美国人意见。但是总统不在华盛顿,斯退丁纽斯是唯一可以就地相商的人。他也就动身去纽约,而不愿有所作为。下一步的建议是把巴多利奥送到马耳他。当然最好是盟国共同行动,同时也并非不能希望国务院同意,这是最高统帅可以根据军事理由合理地进行干涉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含糊其词”,我就建议把元帅作为客人接进归属于地中海最高指挥部的里瓦尔塔别墅中,这样他就将处于一位对参谋长联合会议负责的盟军司令官照顾之下了。

最后,斯福尔扎和博诺米给了巴多里奥以非常明确的保证:第一,他不会怂恿对元帅提起诉讼;第二,他愿给以保护。博诺米向查尔斯和柯克大使都重申了他的保证。毫不奇怪,国务院因为最

近对意大利政府危机的争执而不急于要在这件事情上助我们一臂之力。虽然如此，我们和他们在道义上都有责任保护曾经同我们谈判我们的权力证书的这个人。

亚历山大和我都明白表示，万一重新威胁巴多利奥的人身自由，英国的保安人员就要安排他立即飞往马耳他。结果，这件事逐渐过去了。元帅得以平安地生活下去，直到战争结束。在后一阶段，他被免除了参议院的职务，但是没有受到任何更大的迫害。

562 我在伦敦的工作现在完毕了。内阁已经批准了我为贯彻新政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细节而拟具的正式文件。我准备在12月9日动身去美国。一切都同首相和总统商定；我已经领到出发指令和一切文件。但是盟国驻意大利委员会的代理主席注定不是西行而是东去；不是赴华盛顿，而是去雅典；不是为了我们要分担责任的那个和平改革计划，去争取美国的支持，而是为了要去帮助进行一场革命战争，而我们的盟邦美国对这场革命战争是要想置身事外以逃避负担和风险。

## 第二十一章 希腊的解放

563

在1944年初,有这样一个笼统的谅解:希腊事务将在适当的时候划归威尔逊将军管辖,因此也就归入我的责任范围之内。事实上,一则由于实际的原因,一则因为要把管辖权抓在英国手里的意愿,迟至这一年的中期,外交部仍明确地坚持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依旧应留交莫因勋爵和中东战区的佩吉特将军去管辖。8月间首相在意大利的时候,曾经同威尔逊将军及其幕僚和顾问人员讨论了希腊事务。莫因勋爵和佩吉特将军都应召参加。使我非常引以为憾的是,墨菲已经重又参加到艾森豪威尔的工作班子去了。但是,他的后任柯克,不是出席会议就是由我们把情况告诉他。

这时有两件事决定了我的前途。莫因勋爵和佩吉特将军搭乘的飞机坠毁,所以他们没有出席开头几次的讨论。希腊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在同丘吉尔单独会见后,接受了他所提出的希腊政府应立即迁往意大利的建议。

帕潘德里欧热情洋溢地予以接受,尤其是因为他想要让希腊民族解放阵线的五个阁员(已经终于同意参加)摆脱笼罩开罗的那种阴谋诡计的毒氛,所以就更加求之不得了。

希腊的历届流亡政府都在牧羊人旅馆的酒吧里被搞垮了。①

经决定,把他们安顿在那不勒斯南面的萨勒诺。

巴尔干人〔军事联络员〕的总部将偕同休斯将军的救济组织和善后 564  
救济总署的必要部分迁往那不勒斯。

① 1944年8月21日。



一个空运旅将准备从巴里调至雅典，其他两个旅（不是来自中东就是来自意大利）则视德国人投降或撤退时的总的战况而定。

斯科比将军（一个优秀的人选）将担任……部队指挥官。……<sup>①</sup>

这至少是一个计划。

佩吉特将军自然很伤心，但是首相今天上午要会见他。他是一个高尚的人，我深信他会乐意接受这次移交的有力的论据的。

罗杰〔梅金斯〕出席了一次将领等等的会议（偕同利珀）来拟具细节。

中午12点，同莫因、斯蒂尔、利珀和罗杰就希腊问题举行会议。莫因的……风采依旧不减当年。但是气氛有点紧张<sup>②</sup>

当丘吉尔在长期访问后离开意大利时，他或多或少处于一个令人失望的先知的地位。既奉外交部之命减轻了我多少有点不明确的任务，他却又以许多新的重要工作照顾到了我的头上。他力劝我担任意大利盟国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一般地接管巴尔干事务（罗马尼亚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而特别是对希腊事务负责。罗马尼亚自行宣布为“参战友国”，我不禁好笑。“我决未想到去年9月我在突尼斯向艾森豪威尔将军建议的‘参战友国’一词会变成如此著名一个词！”<sup>③</sup>意大利人当然怒不可遏。但是由于伦敦方面的踌躇不决，所以我们不能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派出我们的使节。

我同我们派驻希腊政府的大使雷克斯·利珀<sup>④</sup>的联系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发现自己同这位富有吸引力、富有同情心的人在一起亲密无间地工作，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可喜的机缘。他不但是一位博通艺术和文学的最杰出学者，而且对于希腊政治变化

<sup>①</sup> 1944年8月21日。

<sup>②</sup> 1944年8月22日。

<sup>③</sup> 1944年8月23日。

<sup>④</sup> 后来的雷金纳德·利珀爵士。

多端的万花筒般的局面有非常敏锐而确切的理解。他了解希腊人，他们也了解他。他不但有很大的个人魅力，而且有无限的耐性。尽管他温和宽厚，但是却不容易受骗。虽然他相信人，但是对于很多人和所有政治家都怀有并非不健全的猜疑。当1944年上半年我对于希腊的兴趣刚刚开始而稍稍同他发生接触时，他就对我推心置腹，知无不言。他不但对我毫无嫉忌之意，而且具有配合协作的无上才能。

在这战争的最后一年中，我发现我作为一个政务大臣有四个大使或多或少地对我负责：驻意大利的诺埃尔·查尔斯；驻南斯拉夫的拉尔夫·史蒂文森；驻法国的达夫·库珀和现在驻希腊的雷克斯·利珀。后来又有驻罗马尼亚的约翰·勒拉吉泰尔和驻保加利亚的威廉·豪斯顿—博斯沃尔。自然我们的共事是随着战役的情况和他们派驻国家的发展不同而不同。虽然如此，这些关系不能不是微妙的，而且会很容易变成争执和口角。事实上，我有这些人一起共事是非常幸运的。所有这些外交官首先要服从外交大臣和外交部；然而他们却认为自己或多或少要受作为盟军最高统帅顾问的我本人的节制。如果他们是那样欣然接受这种处境，那是因为他们足够明智地能认识到受他们保护的人的生命和力量都取决于最高统帅部的态度。每一个人都仰赖于盟总所给他们的一切（自部队至食粮）。这时人们认为我对陆、海、空当局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何况，在战时既然人人都广泛地站在同一方面，所以就不能不有强有力的合作。在希腊，最大的考验即将到来。

现代希腊，像古代希腊一样，是一个在公、私命运上有迅速变化而且往往有惊人变化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接着就发生了对小亚细亚致命的人侵，以及因此而造成物资和精神方面的惨重损失。首先的反应就是对主张这种野心勃勃的远征的人们毫不留情地加以报复。继而，在1923年年底，国王乔治二世被废离

国。之后，在韦尼泽洛斯领导下稳定的共和党政府有四个比较繁荣的年头。但是希腊，像其他每一个国家一样，受到了1929—1931年经济危机的袭击。罢工和物价上涨随之而来。在大约一年的间隔内，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选举。1935年3月间，韦尼泽洛斯派的一次图谋未遂的武装政变失败，跟着是当年韦尼泽洛斯派未参加的一次大选。1935年秋季就恢复君主制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投票的方法一般认为是一次公开的丑闻。但结果是国王乔治二世复位。他以殊可称道的大公无私态度竭力在保皇派，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党，和共和党，也就是韦尼泽洛斯派之间进行调解。在1936年1月的大选中，两党差不多平分秋色，因而十五名共产党人则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惯常的明争暗夺随之而来，实则两大党的政治家，除在君主制问题上以外，所见根本并无不同之处。公务的处理却因两党旗鼓相当而又虚弱无力的对抗弄得几乎寸步难行。于是军队插手了。据声明：如果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甘受十五名共产党人的诱惑，在他们的支持下上台，军队将不能袖手旁观。军队领袖梅塔克萨斯将军先任国防大臣，随后又担任了首相。彼此不肯作任何让步的两党投票支持他，议会一直休会到1936年秋季。但是从此没有再复会。那年8月间，梅塔克萨斯终止了宪法，厉行独裁制。他无疑是相当有能力的，也像很多独裁者一样，在道路、运输、甚至教育方面都作出了切实的改进。但是他在1940年秋意大利进攻希腊三、两个月之后逝世，于是由伊奥安尼斯·楚泽罗斯继任。

在1941年3月1日，英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著名的决定。丘吉尔及其内阁不惜牺牲我们在沙漠战争所承担的义务，而为了忠于我们传统的友谊，决定驰援希腊。不到六个星期的工夫，  
568 德国人就在这次意大利人无力招架的战役中获胜。4月24日，希腊人被迫投降，英国和希腊军队被赶到克里特岛。克里特岛遭到

了战争史上最猛烈的一次攻击。在4月底已经进入雅典的德国人,得以并非出乎意料之外地成立了一系列卖国政府,主要是由前保皇党分子所组成的。国王和楚泽罗斯被迫和我们的部队一起离开克里特岛,先去埃及,然后转往伦敦。到仲夏之际,德国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希腊的领土,持续了三年以上。

既有一个背叛祖国的傀儡政府,又在外国的军事占领下,而且原是一个交通窳败的山国,又历来盗匪横行,因而游击队运动或爱国运动随即产生了。民族解放阵线迅即成立,但事实上是在希腊共产党的控制之下。1942年春季,民族统一战线宣布埃拉斯游击队(ELAS)的成立,也就是在他们统辖下而成立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有人誉为爱国主义者,有人则把它看成是纯粹共产党人。在初夏,另一支游击队开始在山区出现。其中最重要的是向共和党政治领导人效忠的埃泽斯游击队(EDES)。另一个具有温和左翼倾向的叫作埃卡游击队(EKKA)的团体也相继出现。

所有关于这些活动的情报开始传到中东总部,于是在1942年秋季英国官员和密使奉派去希腊。他们原来的目的是破坏德国的交通,然后打算返回埃及。但是他们奉命留下来作为英国的军事代表团,他们的任务是组织和支持游击队运动,而不问他们政治身份如何,其目的是继续阻挠德国人的交通,以一切可能的方法使他们疲于奔命。这样,巴尔干的游击战就在希腊,也象在南斯拉夫一样,在英国当局的帮助下展开了。

至于这一着是否明智,则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惠灵顿公爵在同马洪勋爵的谈话中有一次表达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透辟见解:“我对于为了政治目的而促使任何一个国家革命化,向来是诚惶诚恐的。我总是说——如果他们自行揭竿而起,那很好,但是不要把他们煽动起来;这是一个可怕的责任。”英国政府会声称,他们 569  
他们在各个占领国中所作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公爵的格言的严格范围



内进行的。游击队是他们自己发动起来的。我们的目的不是政治的、而是军事的。在我们非常孱弱的时候，各个不同的游击队组织曾给过我们切实的军事帮助。虽然如此，我们的责任确实很大，并且在某些场合下，终于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在希腊，一旦作出决定，军官、军事物资、供应品，而尤其是金镑就开始源源而至。我不久就懂得了游击队的特性。除去硬币什么也不中他们的意。在欧洲，他们不能不象丹麦一样，求取金镑。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他们照例获得了玛丽亚·特里萨银元。

在 1943 年春季，游击队在迈尔斯准将和英国代表团官员的指导和鼓励下活跃于整个大陆各地。但是，象在南斯拉夫和后来在意大利的那种同样不祥的发展，在希腊也显现出来。埃拉斯游击队开始袭击其他一切敌对性的游击队组织，并且如有可能，就消灭它们。这时希腊居民除德国占领所加的苦难外，又受到了内战的威胁。

在 1943 年 2 月，撤退到中东的正规军中又发生了风波，这无疑受到了共产党代理人的鼓动。因而一直流亡在伦敦的国王和楚泽罗斯政府，在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决定迁往开罗。内阁重新改组，吸收了若干共和党人。在希腊本土，由于英国代表团努力的结果，已经试图商谈一项“全国游击队协议”。（在整个这段期间，我们对埃拉斯游击队已经有相当把握，因为他们的武装、现金和在一定程度上上的粮食，都仰赖于我们。没有英国陆军和空军人员的大胆和勇敢工作，游击队是难免瓦解的。）协议终于在 7 月间签字，以埃拉斯游击队的代表三人以及埃泽斯和埃卡两支游击队的代表各一人组织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同时，留在雅典的政治家则  
570 要求国王正式声明：希腊及其宪法的前途，不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应于战后通过自由选举决定。对此，国王表示同意，并于 7 月 4 日将他的意图广播周知。1943 年 8 月间，六位抗敌的领袖，埃拉

斯游击队四人，埃泽斯游击队和埃卡游击队各一人，被送到开罗。虽然他们代表政治和经济方面根本不同的意见，但他们都是共和党人。现在他们要求国王在全民投票以前不要返回希腊，他们的要求也得到了内阁中共和党阁员的支持。他们还要求将国防、司法和内政各部交给各个游击队组织的领袖，并应在希腊本土执行职务。果不出所料，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罗斯福和丘吉尔很大的意见分歧，但是在1943年8月的最后两个星期和9月初，这两位政治家终于一致同意国王只应在德国人撤离或被逐出之后再返回希腊，公民投票应于他返国后举行。

凡是熟习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竞选运动正统方法的人，对于其他大多数国家中任何正在当权的政府赢得公民投票的力量之大，是难以理解的。独裁者总是以压倒多数取胜，正如拿破仑三世等等所证明的那样。所以在进行成败攸关的决定时，关于国王应否耽在希腊的争论，并不是一个学究式的争论，而是事关成败的。

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自然提高了每个地中海国家的爱国志士的希望。所以在仲夏之际，抗敌代表除国王的拒绝外什么也没有从埃及带回来，这年冬季就消磨在埃拉斯和埃泽斯这两支游击队间的战事之中了。攻击是由埃拉斯游击队开端的，只是在1944年2月间，一则由于精疲力竭，再则由于英国方面精神和物质的压力，这才通过普拉卡协议至少得到了暂时的休战。各个组织因此答应放弃这次自相残杀战争而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德国人身上。他们还承允在时机到来时利用他们的一切力量给盟国部队的重返希腊以便利。

在1944年初，虽然还没有正式办理移交，但是我已开始同希腊事务发生关系，并尽力查明真相。显而易见，无论是在开罗方面还是在阿尔及尔方面的带动下，物资援助都势必要大部分得自我们英美来源。3月底在开罗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的有威尔逊将

军和新任中东司令佩吉特将军以及所有“高级将领”，另外，雷克斯·利珀以及莫因和我本人也包括在内。在讨论了一些主要是与巴尔干各式各样游击队打交道的机构如何合理化的问题之后，利珀就当前希腊的形势向我们提出了他的意见。以普拉卡协议作为结束的这番磋商仍然遗留下两个未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是“希腊的总司令”问题，他认为可以不声不响地把这个问题丢开，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同意任何特定的人选。第二个是“政治委员会”问题。

民族解放阵线经过一段沉默之后，宣布成立以瓦基尔齐斯为主席的一个纯民族解放阵线委员会。瓦基尔齐斯是埃卡游击队的一个前代表，现在已经转到民族解放阵线方面，埃卡游击队也已经否认与他有任何关系。他们曾分别致电楚泽罗斯和中东希腊总部，用唱高调的词句告以这个委员会的组织和目的。楚泽罗斯先生已电复民族解放阵线，告诉他们说他仍然奉行组织民族团结政府的政策，并说他们应该参加同其他政党在雅典举行的商谈。

但是对于这项呼吁，民族解放阵线未作反应。在希腊山区建立的这个委员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共产党战线的组织和一个潜在的对峙政府。驻在埃及的希腊部队的一些军官要求根据类似的方针改组这个合法政府。为了应付他们的一部分要求，楚泽罗斯试图以来自雅典方面的，以及来自达马斯基诺斯大主教和其余一些政治家的赞成国王引退的电报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利珀力劝国王接受摄政制。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他是否自甘引退，而这却是一时无望的，虽则他后来同意没有他的政府的许可不返回希腊。

不幸，关于国王问题的激烈冲突给了正规军当中的政治煽动家以可乘之机。对意大利的任何增援都是迫切需要的，但亚历山大正希望调往的那一个希腊旅却哗变了，因而予以缴械。这个风潮现在蔓延到了希腊海军；水兵以及一些官佐声明赞成共和，要求现行政府辞职。在处理哗变的部队这项棘手的工作中，丘吉尔不



能不采取非常强硬的路线。使用武力，这是一项非常不愉快的责任。首谋分子不能不加以逮捕，虽然事实上伤亡无几，希腊这一步兵旅虽终于以饷尽粮绝而投降，但这个意外却是一桩可悲的事件，致使局势沦于无可救药的混乱状态。丘吉尔不得不向罗斯福和斯大林为自己的政策进行解释和辩护。

现代希腊最伟大的领袖的儿子索福克莱斯·韦尼泽洛斯这时就任首相职。但是他竟无法保住这个职位。经过在黎巴嫩召开的一次由所有相互冲突的组织派有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之后，终于一致同意应在帕潘德里欧的领导下组织一个基础广泛的政府。这项协议，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无疑是“前途有望的”；但是，由于并没有真正面对国王地位的问题，所以还将产生新的骚动。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同意大利顾问委员会的希腊委员波利蒂斯先生有过一次商谈。他把埃拉斯游击队说成一部分是共产党，一部分是土匪。他不把他们看作是像铁托的追随者那样组织完善的队伍，但是他坚决主张必须组织一基础广泛得多的政府，而且王室问题非解决不可。事实的真相是，共产党聪明地利用了国王的问题来制造骚乱。

利珀以无以复加的高明手腕使黎巴嫩会议圆满结束，5月24日，一个民族团结政府事实上已经组成。美国人以至俄国人似乎都承认了希腊是英国特殊利益所在的这个立场。

其次，希腊军队必须改组。帕潘德里欧想要解散非正规军，但是威尔逊将军和我抱同样看法，认为对一个流亡政府来说，这是行不通的。要下令解散游击队，结果只是失去对他们一切影响力。这时威尔逊将军或多或少地管辖这件事，而我自己，不论合法与否，事实上却已经从莫因勋爵手里把事情接了过来。在6月初，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多讨论。

下午3点。本菲尔德准将（来自开罗）向我说明了帕潘德里欧先生



的计划。我想要以通常的方法组织一支希腊国民军——也就是，招募兵员，指派正式军官。这就非要希腊游击队和非正规军一律自行解散不可。我不认为他们会同意这样作。

我后来同〔威尔逊将军〕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和我抱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应该以非正规军作为国民军的基础，而以温和分子渗入进去，俾使他们逐渐放弃极端主义。民族解放阵线多半会同意的。帕潘德里欧是不是会呢？我们决定就这个问题草拟一份电报，分致开罗和伦敦。<sup>①</sup>

我们这时同仍在埃及的利珀函电交驰。我怀疑帕潘德里欧和国王是否在私人基础上达成了任何协议。埃拉斯游击队和民族解放阵线在布卢姆斯伯里、舰队街和威斯敏斯特的所谓进步人士中获有大量支持<sup>②</sup>。我们同希腊温和的中间势力密切合作的唯一希望似乎就是摆脱同王室事业太密切的联系。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困难的抉择。

在这期间，美国人虽同意参加救济和善后工作，但是7月间马歇尔的一封正式电报中清楚表明他们不愿承担其他任何责任。

在同意依照黎巴嫩谅解担任政府职务之前，共产党人随即开始提出无法接受的要求。他们要求埃拉斯游击队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直到解放时为止。他们要求抵抗部队的最高统帅必须由埃拉斯游击队中遴选。他们要求以七个重要的部交给政治委员会的574 成员，并以政府的一部分设在希腊山区。往往难以想到在这一切争执期间，德国人正占领着希腊，控制着城市、港口和交通。然而，这个国家的地势是那样崎岖嵯峨，盗匪出没的传统又是那样牢不可破，以致在目无法纪成为爱国行为的时候，德国人要对整个这个国家行使权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我们来说，局势也几乎同样令人担心。“我生怕希腊要成为

① 1944年6月8日。

② 布卢姆斯伯里是伦敦的文化区；舰队街是伦敦的报馆区；威斯敏斯特是英国议会所在地。——译者

利珀大使的赘瘤，”<sup>①</sup>我这样写道，同时还提出了另一个预言：

如果南斯拉夫对我们也照这样行事，我不会感到奇怪。首相试图走得很快，而没有给大君(苏巴希克)和铁托本人留下足够的余地。我从吉罗—戴高乐事件中汲取了教训，不要过问得太多，对于结果也不要显得过分关心。<sup>②</sup>

在这期间，我们在盟总认真地讨论了在我进入希腊之前，是否该同希腊政府达成任何协议；或不要让我们束缚住自己的手脚，是否会更好一些。丘吉尔和艾登公开攻击民族解放阵线阻挠希腊的统一。利珀告诉我们说，帕潘德里欧本人认为，如果要避免内战，英国军队必须在德国人撤退后四十八小时之内进入雅典。但是在8月初，民族解放阵线突然改变了态度，这是否是按照俄国的指示办理，我不得而知。当8月底丘吉尔路过开罗时会见了帕潘德里欧，并开始制订在德国人撤退之后把军队开进希腊的计划。赋予这支部队的任务是：

设置希腊政府，一旦飞机场落在我们手里，就立即乘飞机返国；接受或促使任何德国部队就地投降；以及开辟输送救济品的道路。

所有这一切显然都要在威尔逊将军指挥下进行。所使用的部队 575  
如下：

调自意大利的一个伞兵旅，继之以调自中东的第23装甲旅和一些其他部队，共约一个师的兵力。这些兵力，威尔逊将军可以在不影响亚历山大将军军事行动的条件下进行抽调。

通往比雷埃夫斯的水路应予扫清，这要用一个星期的工夫，但是为此，坎宁安海军上将希望能在一个月之前预先得到通知。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方面的默许。他们的三军参谋长不愿意把他们的飞机用于这样一项军事行动；我们势必要从艾森豪威尔所指挥的在法国我们自己的飞机调派一些前来。虽然丘吉尔向帕潘

<sup>①②</sup> 1944年6月6日。

德里欧说明他不能就派遣英国武装援助接受任何明确义务，但是他相当清楚地表示，我们愿尽力而为。

在这期间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希腊政府将从腐败风气中的中东迁入新的并如所希望的那样比较健康气氛中的萨勒诺。罗斯福同意了这个计划，也同意了使用美国飞机。8月底，丘吉尔返回那不勒斯。

全班人马兴高彩烈地飞返回来。首相对总统有关希腊的答复，非常高兴，总统同意了他所有的建议，包括用美国飞机将英国部队运至雅典和立即将希腊政府从开罗迁至那不勒斯这一建议在内。<sup>①</sup>

到9月的第一个周末，为英国部队在德国人撤退后立即开往希腊所作一切部署，都渐渐安排就绪。

关于宣言、政治战的方针、英国部队的法律地位以及供部队用的货币（目前希腊通货正处于脱缰之马似的膨胀状态中，一个面包六千万德拉克马<sup>②</sup>！）所有这些问题，盟总要求我的办公室提出建议。

576

美国人（尤其是第5组的斯波福德上校）是非常通情达理、非常出力的，正如我所料到的，一旦军事行动的指挥从开罗转移到卡塞塔，他们就将那样。<sup>③</sup>

成败攸关的时刻现正渐渐逼近。关于希腊共产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事态演变对我们都不是有帮助的。

保加利亚的局势非但很不满人意，甚至令人怵目惊心。我担心外交部已经又失掉了一次机会。如果外交部让我们而不是让开罗方面来掌握，我认为我们未始不能在俄国干涉之前就取得停战协定的签字了。要是保加利亚的代表来到这里，我们原会对待他们就象我们在西西里对待意大利人一样。毕竟我们的手里有着战略空军。……<sup>④</sup>

但是机会已经失之交臂。

① 1944年8月27日。

② 希腊的货币单位。——译者

③ 1944年9月3日。

④ 1944年9月11日。

在伦敦和华盛顿之间正在就条件和条款方面进行学究式的辩论时，俄国人夺得了主动权。我担心我们在巴尔干的威望会受到相应的损害。希腊人早已蠢蠢欲动，帕潘德里欧政府中的共产党阁员可能轻易辞职。他们正在论证说，希腊应该寄望于克里姆林的东升旭日，而不应寄望于唐宁街的西坠金乌。<sup>①</sup>

德国人现在已经明确地开始撤退。即使以我的孤陋寡闻，也看出局势是岌岌可危。

据我管见所及，到达雅典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军事行动并没有真正“进行”，虽则进出路已加以防守）。与此同时，俄国人正进逼索非亚，而且会直捣色雷斯。德国人正在撤离这个群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只要有一个未被合法政府所填补的空隙，民族解放阵线和埃拉斯游击队就肯定会夺取，另一个共产党（或强盗）政府就会成立起来。<sup>②</sup>

在此后几个星期中，各种惊人的消息纷至沓来。埃拉斯游击队正在屠杀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的军民。在皮尔戈斯的暴行 577 也许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其余地方和嗣后在雅典方面所会发生的情况的一个预兆。保加利亚人报告说，互相对峙的希腊游击队——埃拉斯游击队和埃泽斯游击队——正在为色雷斯的行政管理权同他们争吵。英国军事行动无可避免的耽延造成了

正处于民族解放阵线在凡是德国撤出的地方都进行夺权的这种严重危险之中。而且，我们还担心苏联方面会鼓励保加利亚人（即将撤离希腊北部）会向民族解放阵线办理移交。但是我们的计划正在取得些微进展。我们已经夺取基西拉岛，希腊委员会也首途前往那个敌军已经撤出的群岛。<sup>③</sup>

这时利珀和我在一起亲密无间地工作，几乎每天碰头。希腊政府在萨勒诺自然变得非常不耐烦，眼巴巴看着希腊的事态随着

① 1944年9月11日。

② 1944年9月12日。

③ 1944年9月18日。



德国人的渐次撤退而有了迅速发展。重要的似乎是要争取埃泽斯游击队的泽尔瓦斯将军和埃拉斯游击队和民族解放阵线的萨拉菲斯将军同我会面,以便商订一项步调一致的计划。

9月25日我们在卡塞塔组织了一次全面的会议,在会议上帕潘德里欧和他的四位部长同泽尔瓦斯和萨拉菲斯两位将军会面了。上午,我们的斯科比将军和游击队领袖举行了军事谈判。接着就是游击队领袖和希腊阁员之间的一次会议。军人,包括游击队员,去同威尔逊将军共进午餐,政治家则来到我这里。第一天气氛虽不太好,但情况总算渐渐有了改进。

578 帕潘德里欧在花园里单独同我作过一次商谈。他似乎非常焦急,渴望我们把他们的政府立即送入希腊,纵使不能去到雅典。任何进一步的耽延都会削弱它的威望,并使得他的政府中埃拉斯游击队和民族解放战线的成员无法(即使他们愿意的话)再干下去了。德国人离去后的空隙应填补起来。要是政府和英国军队不在那里,共产党就会捷足先登,并且会稳如泰山地盘踞在那儿,以后就再也赶他们不出去了。<sup>①</sup>

第二天,卡塞塔协定签了字。利珀告诉我说,希腊人虽久经激战,举止却彬彬有礼。我力劝他一定要举行一次全体会议,由所有各方签署一项文件,将政治和军事协议一并包括在内。这一点相应办到了。

实际上,这项协定将所有游击队都置诸希腊政府和即将统率英国远征军的斯科比将军的领导下。我立即将副本分送现已取代墨菲的柯克大使及其主要助手奥菲先生和美国副参谋长鲁克斯将军。鲁克斯将军是一位富有魅力和享有盛名的军人。将希腊问题的管辖权从开罗移到卡塞塔的巨大优点之一就是至少能够使美国人了解我们本身的情况。不管伦敦和华盛顿之间对希腊政治问题后来的争执怎样,但作为我们同志的美国文武官员所表现的

<sup>①</sup> 1944年9月25日。

却是最大的同情和合作。

经过进一步讨论之后，我建议我们应该尽速将希腊政府安置在科林斯湾的帕特拉斯。如果听任一个空隙继续存在下去，我就看不出如何一个政府能够迁返而具有任何权威。要争取到这个地位就不能不有所行动。

虽然我们己经争取到伦敦方面的同意和威尔逊将军对这项措施的全权处理，但是希腊政府突然担心害怕起来。他们不愿意去帕特拉斯，实则不愿意去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任何地方。他们经不起一次失败；那里没有足够的英国部队；没有希腊的一兵一卒；救济品的供应则少到令人失望的程度，如此等等。我认为以此上报是不明智的，经过商讨之后，我说服了利珀。我们将在

首相眼神里显得颀预糊涂，优柔寡断。我们今天迫切陈词，电请许可派遣一支远征军，把政府送进帕特拉斯；明天又说，我们改变了主张，希腊政府现在正考虑到我们的种种担心。<sup>①</sup>

虽然希腊政府不愿意去希腊，但是第二天出乎意外到达的王储却无疑是愿意的。

9月30日晨，王储，即季阿佐克，往访威尔逊将军。利珀和我也在座。

我为王储感到难过。他显然诚心诚意，很想为他的弟兄和王朝鞠躬尽瘁。但是我怕他抱着对王权的照例幻想而自吃其苦。他认为只要他在希腊一露面，就会“扭转民心，大获全胜”。<sup>②</sup>

我们试图向他解释，如果他现在要去希腊，那小心翼翼地建立起来的帕潘德里欧政府就会土崩瓦解。唯一得到好处的，就是势必接管这个国家的民族解放阵线和埃拉斯游击队。

接着就是一番冗长的、非常吃力的谈判。显然，国王并不认为自己受他所作的声明，即非得到他的政府同意不返回希腊那项声明的约束。

---

<sup>①②</sup> 1944年9月30日。

关于这种局面总是有一些含糊不清的东西。甚至据坚称，国王的那封信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含义不清，虽则英文本似乎清清楚楚……并且十分令人满意。有一点我是肯定的，即使以温斯顿的声望也不能让他用英国武力把一个国王强行加给希腊。<sup>①</sup>

王储尽管对我们的态度感到失望，但行为举止却谦恭有礼，接下来的午餐进行得很顺利。

在下一个星期中我因为咽喉和肺部感染不能不住进医院，但是我不久就痊愈了，得以把希腊事务接着办下去。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供应问题。中东不能再帮我们什么忙了，因为佩吉特将军已经把他的权力交给威尔逊将军。我开始对于准备的情况作了一次慎重的（和有欠考虑的）调查。

580

粮食幸而还没有问题——但只是因为要从一般军事储备中提取，所以甚至开罗的计划人员也毫无办法。医药也是一样——而我想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

但是当我问到毛毯、服装、运输、供修理房屋用的铁钉和小工具、肥皂、肥料、种籽等等时，样样都“订购”了，“指望12月交货”。（如果德国人从希腊撤出得太快，那会发生什么情况，计划人员似乎不曾想到。）

但是“订购”意味着订单已经在华盛顿的庞大机构登过记（我清楚记得供应部和殖民事务部的情形），所谓“指望12月交货”，那意味着，如果有船，并分配以这项任务，而且在10月间从美国开出，这样订货也许会在12月到达亚历山大港。<sup>②</sup>

我立刻求助于美国方面，第5组的斯波福德上校（现在是将军）那位真正出色的军官答应帮忙。

很多不合理的事情之一就是关于服装的情况。美国红十字会有一百万套衣服想拨给希腊人。善后救济总署说，东西必须售出，不能赠送。所以美国红十字会似乎要把衣服送给法国人，因为法国人（确是聪明的

---

① 1944年9月30日。

② 1944年10月4日。

民族)曾订明根本不受善后救济总署契约的限制。①

后来,我改变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至少极力主张不妨让希腊政府出售这类赠品,以便吸收货币回笼和提供一定的财政收入。

10月4日,英国第一批部队在科林斯湾南面的帕特拉斯登岸,但我们用了很大的压力,才说服了希腊政府的任何成员前往该地。最后,帕潘德里欧答应在10月11日飞往帕特拉斯,并在那里设置一伯罗奔尼撒半岛高级专员,专员人选可能是帕纳约蒂斯·卡内尔洛普洛斯。但是,使我大为遗憾的是,这个计划事实上破产了,因为整个希腊政府宁愿等到他们能够全部进入希腊时再采取行动。从北方又传来风波再起的报告,那里的保加利亚人声称他们已应苏联政府之请进入了这个国家。因为丘吉尔正在去莫斯科的途中来到意大利,所以我便将这种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帕特拉斯港将迅速扫清,供应品即将开始输入。指挥英国先头部队的杰利科上校证明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军官,他设法同埃拉斯游击队领袖阿里斯建立了一定的关系。 581

10月8日,丘吉尔和艾登在卡塞塔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凡是想得到的人几乎都出席了,其中包括布鲁克、伊斯梅和亚历山大在内。艾登和帕潘德里欧进行了商谈,后来丘吉尔出场了,他表演了一出独白戏,内容是以谈君主制的优点为主。

帕潘德里欧看上去非常不安——但其不安的心情并不比我们其余的人们更甚。

在这套说教结束之后,这一行人动身逕往机场。②

我承认把他们送走,我并不引以为憾。

在同安东尼驱车回来的时候,我发觉[莫斯科之行的目的]是:

(甲) 试图探询俄国的军事计划。

(乙) 试图解决波兰问题。

---

① 1944年10月4日。

② 1944年10月8日。



(丙) 试图解决一些巴尔干的纠纷——尤其是同保加利亚的停战协定和色雷斯的地位。

安东尼对温斯顿所作的保皇派的说教给帕潘德里欧的显然不良影响,似乎非常烦恼。他要我尽力把事情弄得顺手些。<sup>①</sup>

我往访帕潘德里欧,并发现他象往常一样地口若悬河,谈笑风生。希腊和英国非始终联系在一起不可。我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希腊不能不是保卫帝国航线的一个堡垒。目前,罗马尼亚已几乎完全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实即一个傀儡国。保加利亚,多亏传统的爱国主义,还没有完全落于苏联的掌握中,但是必然越来越为俄国势力所左右。

582 帕潘德里欧先生接下去说,我们不能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若无睹:尽管我们在西线和在意大利高奏凯歌,但是英国的威望已日薄西山,而俄国总的说来在巴尔干声威大振。而且,我们为了要进攻德国人,已经在希腊本土唤醒并武装了非常危险的共产党部队。他不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而把它看作是一个革命运动。民族解放阵线因为适合莫斯科的需要暂时在政府中服务,但是他了解,一旦认为时机更加有利,就会下令脱离政府,尽量制造麻烦。意大利的共产主义运动,据他说,正奉行着同样的方针。

对于意大利,他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明智的、豁达大度、高瞻远瞩的。他最后又把话锋转到希腊的需要。第一,必须让保加利亚人撤出希腊领土。如果真是保加利亚部队有必要作为俄国军队一个侧卫,那么也必须同希腊政府缔结适当的协议。第二,必须有一支尽量大的英国部队在希腊登陆来维持秩序。只要德国人占领着萨洛尼卡和其他重要据点,这样作就是有一定正当理由的。第三,必须立即成立一支希腊国民军。只要对德战争继续一天,它就应该发挥它一天的作用,不管其作用是如何有限。只有给步兵营加以装备,这一点就可以作到。炮兵则不妨是英国的。最后,必须为

---

<sup>①</sup> 1944年10月8日。

救济作出巨大的努力。

我对帕潘德里欧的真诚获有深刻印象；但是，当然，他把我们所能支配的物资估计太高。毕竟在意大利还进行着激战。在我提过一些问题之后，他把这件事转陈国王。

他说，同我们所讨论的重大历史问题相比，君主制问题实际上是不那么重要的。重大的分歧不是在共和派和君主派之间，而是在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所以，要让温和派的力量在一个真正陈腐的争论上分裂开来，殊为可悲。同时，局势是非常微妙的。他曾经忧心忡忡地听取了丘吉尔的意见。听到丘吉尔先生同他所谈的唯一希腊问题就是君主制问题，他就更加不胜其忧心如焚了。 583

我自然回答说，其他一切问题已经同外交大臣谈过了，所以丘吉尔先生认为他是履行一项道义上的责任。帕潘德里欧回答说，他把丘吉尔看作是所有在世的政治家中最伟大的一个——世界上真正的伟大人物之一。他欣赏他的个人忠诚感和传统感。然而，实际困难依然如故。

在政府迁雅典之后，阁员的一些调动势必要予以批准，一些命令势必要予以签署。如果国王在英国，这些事情怎么办呢？同时，要是国王前来希腊，政府就会立即瓦解，民族解放阵线将会通过革命夺取政权。

解决办法是不妨指派一个由三、四名年高德劭的政治家组成一个摄政委员会，如果可能的话，包括国王的一些朋友在内。一旦希腊政府迁回雅典，这个问题就可告一结束。事情的确是迫切的。

在这期间，我答应再一次向伦敦提出希腊北部的保加利亚人的问题，希望能对苏联政府施加充分的压力，以满足希腊的渴望。

我们得自希腊的消息是悲惨的。10月12日，德国人正大规模地进行撤退，但是随退随将一切交通破坏殆尽。果真他们在那一天在全国范围内一举而撤退的话，共产党也许会夺取政权。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在试图这样作之前又等待了六个星期。

“甘露蜜军事行动”——打回雅典去——已经订于10月15日发动。10月13日，星期五晚，我登上海军上将曼斯菲尔德的旗舰，即英国军舰《猎户星座号》。斯科比将军和他的一些幕僚也同时到来。当然，我们一直到14日，星期六，午夜刚过方始开船。这样我  
584 就不管愿不愿意而且几乎碰巧地参与了一次新冒险的高峰阶段。

局势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我们至少有卡塞塔协定作为自己的根据，如果我们能够迅速到达，希腊政府也许就能坚持他们的权力。然而，即使我们避免了实际革命，可是在希腊经过了多年忧患和混乱之后，恢复任何种类文明生活的任务，都的确是障碍重重、危机四伏的。

10月15日，星期日凌晨，我们到达了波罗斯湾外面的集合点。从亚历山大港开来运送我们远征军的那一部分船舰及时同我们会合。除《猎户星座号》之外，我们只率同《天狼星号》和另一两艘驱逐舰。现在同我们会合的有《曙光号》、《埃杰克斯号》和《黑王子号》等巡洋舰，以及若干艘驱逐舰、登陆艇和扫雷艇。另一批登陆艇、商船和“起重船”连同希腊战舰《阿韦罗夫号》则在我们后面。搭乘战舰的是由利珀陪同的希腊政府人员。第一批共有四十艘船，第二批约有七、八十艘。我们前进的速度很慢，以扫雷艇为先驱。在扫雷艇的后面是驱逐舰，以《猎户星座号》为先导，《天狼星号》则紧跟在我们的后面。斯科比将军和我获准整日站在舰桥上。阴霾蔽空，暴风雨时兴，但海面平静如恒。

大约9点或9点30分遭到了第一次阻碍。我们看到了若干水雷在扫雷艇驶过它们的时候爆炸了。继而一个扫雷艇被炸掉（一艘英国船）。我们可以从望远镜里看到这艘船——船身整个右侧，但是仍然浮在水面。汽艇和各式各样的船只都急往驰援。有一些伤亡——但是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有多少。<sup>①</sup>

---

① 1944年10月15日。

一小时以后，一艘希腊扫雷艇触雷沉没，另一艘英国扫雷艇受伤。这时我们已经到达埃基纳北端对面的地方。

对我们来说意外幸运的是，突击队已经设法在一、两天以前将德国炮手清除出埃基纳。岛上有一些非常坚固的海岸炮台（在岛的南、北两端），这些炮台在我们为布雷区问题所纠缠时就不能不给我们造成严重损害。<sup>①</sup>

鉴于扫雷艇遇到的困难和布雷区可怕的性质，海军上将采取了一项明智的决定：

我们退回几英里到波罗斯湾对面的一个地点。在这里，我们一直等到扫雷艇能够开过去并将航路加以扩大时为止。第一个被击中的半沉没的扫雷艇在布雷舰的拖曳下从我们旁边驶过，我想它已能安全地进入波罗斯港了。另一艘也到达了安全的停泊所。但是一艘小型载水船……在我们很近的地方触雷——恰恰离我们船的右舷不远——象一块石头一样地沉下去了。十二人获救，另十人或十五人遭灭顶之灾。<sup>②</sup>

在这期间，若干水雷的锚索已经割断，开始漂浮在水面上顺流而下，并且成为各式各样武器射击的靶子。

很象在茂密的羊齿草丛中试图猎兔子一样。水雷不容易看到，也不容易击中。有时被击穿，从而贯满了水。有时则爆炸。有一个水雷在我们很近的地方被一举而击中，“嘣嘣”一声爆炸了，当报之以热烈的喝采。<sup>③</sup>

正午刚到，海军上将就决定重新开始前进。又有几个水雷拿掉或爆炸掉了，这一天清除掉的水雷不下四十五至五十之间。最后，这支小舰队的先头部队在夜幕降临以前到达了法莱龙湾离岸几英里的停泊所。第二部分则停泊在波罗斯湾过宿。

这完全是一番惊心动魄的经历——它真实地给人们一个概念：今天海军所面临的问题和所应具有的一切技巧。幸而我们没有受到敌机的侵扰。只有一架飞机（Ju. 88 式）逼临，但立即就被昨天进驻梅加拉飞机

①②③ 1944年10月15日。



场的喷火式战斗机击落了。①

586 在我们碇泊之后，我们不顾《阿韦罗夫号》战舰上一位希腊阁员的电报抗议，决定不试图在当晚登陆。消息似乎相当令人满意。空降旅的一个营已经在雅典立定脚跟，另一个营将在第二天到达梅加拉，并从那里开进去。英国部队受到广大居民欢欣若狂的接待。第二天，星期一，关于港口和这个城市的情况，报告开始源源而来。

在比雷埃夫斯内港，德国人进行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在另一些地方却没有那样严重。发电站被埃拉斯游击队保全了下来，他们击退了德国对发电站的进攻，所以依然有电灯和电力。马拉松水闸没有遭到破坏。据悉爆炸物已经放进去，但又据说靠了勇气和贿赂而已经清除了。这种行为是堪与荷马史诗中的奥德赛媲美的。如果没有定时爆炸装置爆炸，那就意味着水的供应可确保无虞了。②

若干艘瑞典救济船已经达到，并正在立下奇功，因为各种供应品，尤其是粮食，需要孔殷。但是在埃拉斯游击队同港口当局和希腊王室政府之间已经发生纠纷。在我们看似乎唯一的办法就是恪守卡塞塔协议的文字和精神。遇有困难都应一律报告有关组织的上级官员。然而，第一批报告有点令人烦心。我们听帕潘德里欧和他的政府说，他们希望在星期三举行正式入城式。所有这一切，利珀和我自然都不会参与其事；和希腊政府同居于舞台中心的应该是一批纯军事人员。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希腊政府不愿在星期二登陆。解释是简单而又令人感动的。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占正是在一个星期二。这个日子始终没有被遗忘。它的影响在希腊，实则在整个巴尔干是压倒一切的。虽然希腊政府自从德国占领以后就流亡国外，并且积年累月五内如焚地

---

① 1944年10月15日。

② 1944年10月16日。

指望重返故国，然而，往事的回忆是如此有力，以致他们宁愿呆在 587  
他们的战舰上无事可作，而不肯冒将会踵随在这样存亡攸关的一个日子所作重要决定而来的恶运的风险。这在当时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当大约十二年后我们面临塞浦路斯问题时，我把这件事铭记为在土耳其人宰割下受了四百多年压迫的希腊人永不泯灭的情感的一个事例。

10月18日，星期三，上午7点我离开《猎户星座号》。

让利珀（从“大卫王子号”——在承平年月里往来于多佛尔和加来或纽黑文和第厄普之间的海峡渡轮——下来）搭乘我的车子。①

我们先去大饭店，那里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套房间，从那里可以俯临惠法广场，然后又从那里去英国大使馆。（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要在这个建筑物里在何等心情激动的情况下消磨多少个星期。）

我们找到了瑞士代办，他正在把他自1940年以来所负责的财产向利珀的一名馆员办理交待。那位希腊高等法院的老公务员惠然莅临，在一种感情极其冲动的场面下把我当作英国大使来欢迎，热烈握手，热泪盈眶！在说明了利珀的身份之后，他又同样热烈地握手，同样热泪盈眶。

这真是令人非常感动。这个老头子的诚挚忠实真正是发诸内心的。②

英国大使馆原是韦尼泽洛斯为他个人使用而建造的，但是后来为我们所占用。这是一幢很不错的房子，供作招待宾客之用固大可赞赏，但也并非完全不适合于应付一次围攻。

我们于是返回旅馆，从阳台上观看一个惊人的场面。在上午麇集的广大人群，部分是无组织的观众，部分是有组织的游行队伍。

后者完全是民族解放阵线（或希腊共产党）连同被允许参加的少数埃拉斯游击队（共产党游击队）的代表。这些游行队伍都带有大量旗帜和其它标志，显然是组织得很好，在统一领导之下的。他们秩序井然，欢 588  
欣鼓舞。旗帜上一般都标写着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名字。整个人

①② 1944年10月18日。

群，不论是共产党还是资产阶级，看来都是非常亲盟国的，特别是亲英的。<sup>①</sup>

最后，经过兴高采烈的歌唱、欢呼和喝倒采所占去的一段相当长的间隔之后，大约正午时分，首相帕潘德里欧在正对王宫的广场那一面的一幢房子的阳台上出现了。在他的两边（看上去让人很不舒服）是斯科比将军和海军上将曼斯菲尔德。驱车穿行全城和在大教堂唱谢恩赞美歌占去了上午的前一半时间。

希腊首相受到了欢迎，并发表了一席长篇大论、热情奔放的讲话。一队队有组织的民族解放阵线队伍（约占人群的半数）不时将讲话打断，但还没有采取攻势，而是齐声合唱：民族—解放—阵线—我们—不要—国王—等等。这些举动似乎并没有过分干扰帕潘德里欧先生，但是却使大会中保持肃静的那一部分人感到厌烦。<sup>②</sup>

帕潘德里欧不断地提到多德卡尼群岛，北伊皮罗斯和其他一些领土要求，显然试图激起一股热情，以图转移视线，抹杀内政问题。虽然局势显然是危险的，但我认为眼前的危机已成过去。

要是德国撤走而希腊政府再迟迟不到达，要是希腊政府到达而没有英国大量陆、空军同时着陆，我想民族解放阵线未始不会夺得政权。这个武装政变也许不会是流血的，但可能成功。<sup>③</sup>

但是，我们当然不知道莫斯科方面是否有什么命令，如果有的话，也不知道是哪一种性质的。

在这一天稍晚一些时候，各式各样的幕僚人员都从卡塞塔到达了，于是在斯科比将军的主持下举行了一次会议。

589

我提出的仅仅……是：

（甲）除非帕潘德里欧立即处理通货的紧张局面，不然就会发生非常严重的危机，政府就会垮台。

（乙）除非能找出办法，将德国人撤出的领土中的埃拉斯游击队（和其他一切游击队）解除武装，并创立一支将游击队中优秀分子吸收进去

---

①②③ 1944年10月18日。

的希腊国民军,否则就会有无可避免地导致内战的非常危险的局面。

(丙)除非救济品能迅速起运上岸,并以比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能提出的有任何保证更好的发送计划来加以支持,否则我们就会使居民大失所望,从而引起对合法政府的反抗。<sup>①</sup>

所有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同意,但是我们要怎样争取到执行这些建议的任何真正行动呢?华盛顿方面抱怀疑和敌视的态度,伦敦方面则深深地担心着其他许多问题。关于通货问题,我们无论从陆军部或财政部都没有得到任何建设性的意见。

在这同一天下午6、7点钟之间,我两次访问希腊王室。第一次是访问尼古拉斯公主,肯特公爵夫人的母亲。万一她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何信息想送给她的女儿,我认为为了礼貌,我的访问是适当的。但是,她似乎供应得很好,居住在一幢宽敞舒适的宅邸里,我受到了一次好极了的午茶的款待。这位公主,这位端庄秀丽、仪态大方的夫人,使我想到昔日爱德华时代的伟大人物。在批评德国人的错误和卑鄙行为的同时,她深以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危险为虑。她听说共产党在希腊夺取政权的企图不会耽延很久;她的话证明是对的。

我接着去造访的是希腊安德鲁公主,她的生活条件却很简陋,虽然还谈不上凄惨。她的弟兄路易斯·蒙巴顿勋爵曾给威尔逊将军连拍急电,打听消息。安德鲁公主在整个占领期间一直留在希腊,显然在同瑞典的救济计划和瑞士红十字会合作下,不辞劳瘁地 590 致力于救济工作,尤其是儿童救济工作。

她简直没有什么抱怨,但是当我力请她告诉我们需要什么帮助时,她承认她和她的伴侣(我想一定作过女管家的一位老侍女)需要食品。她们有足够的面包,但是她们没有任何“副食品”——糖、茶、咖啡、米或任何罐头食品。(这些东西现在要由部队给她——我昨天派去看她的那

<sup>①</sup> 1944年10月18日。



位军官太好了，副食品今天已经送到。)①

她接下去谈到她的儿子。

显然这个小伙子是在我们的海军里——一个上尉或中尉——一直干得很好。公主指望他会在地中海，但是他已经去远东了。②

这个人就是菲利普亲王，现在的爱丁堡公爵。

第二天我从雅典动身去卡塞塔。我立即去参加威尔逊将军的会议，我尽可能对局势作了汇报。我们决定从英国的库存中为希腊人领取军装，并希望得到补充。果不出我所料，希腊的通货危机已渐臻极峰。

当德拉克马已实际上——实则完全——一文不值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最后阶段。这意味着所有店铺歇业，停止买卖，从而造成了艰难、困苦和失望。

雅典方面建议输送二十万英镑。但是，当然，这个数目用不了三、五天就会花得一干二净。③

我们在一些顾问的帮助下，拟具了一个计划，交由那位活跃的、才智兼备的军官索瑟德中校带回伦敦，试图取得陆军部、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的同意。我们想要发行英国军用券(英国军政府纸币)作为  
591 一种新通货，象 1921—1923 年德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临时纸马克一样，流通到希腊新通货可以采用时为止。

10月21日，我必须去看从莫斯科回国途中的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艾登一直逗留在开罗，随后来雅典同我们会晤。在威尔逊将军住处进晚餐时，丘吉尔

就莫斯科之行给了我们一个饶有兴趣的描述，对于他所受到的接待显然大为高兴。俄国人比向来都更加热心相助。斯大林光临英国大使馆进餐这个事实本身(完全破天荒的)就给人以深刻印象。他还亲临飞机场给他们送行。④

---

①② 1944年10月18日。

③④ 1944年10月21日。

照他说，军事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俄国人比通常公开了他们更多的计划。外长莫洛托夫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谈判对手，他和维辛斯基都是咬文嚼字，拘泥法理的。关于波兰问题取得了一些进展，丘吉尔曾经对波兰人说，他们必须承认寇松线，然后再争取他们所能取得的其他让步。

关于南斯拉夫，商谈的结果得到了一项真正有益的声明，现在铁托和苏瓦希奇似乎有了谈判成功的良机。（但是外交部和温斯顿必须放弃国王。）关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管制委员会，有很多极其不合理的争论，但是我们输了。不过希腊问题是令人满意的。总之，结果可说不虚此行，首相对于未来所抱的希望比我向来了解的都更大。<sup>①</sup>

正是在这个场合下，丘吉尔就俄国和西方在各国的势力作出了据他认为满意的安排。在罗马尼亚，俄国将享有百分之九十的优势；对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将平分秋色；在保加利亚，俄国将享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优势。但是在希腊，依照美国的意见，英国将享有百分之九十的影响力，而俄国只享有百分之十。<sup>②</sup> 当他告诉我这一切时，我怀疑那百分之十终究会变成什么样子。

10月26日，我接到艾登的电报嘱尽速去雅典。我很高兴回希腊，而且很幸运得搭乘空军中将斯莱塞的坐机，米切尔 B. 25 式 592 飞机。基特·斯蒂尔和我同来，一下飞机，马上驱车前往大使馆，在那里我们遇到利珀大使和夫人，艾登、鲍勃·狄克逊以及莫因勋爵。现在我们就要开始两、三天非常紧张的日子了。

局势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我们都了解是危机四伏的。一个革命形势的严重局面已完全形成。政府软弱无力，而且毫无权威或威望地从长期流亡中刚刚迁回。韦尼泽洛斯派和人民党这两个旧政党之间无益的、看上去不相干的斗争，已经大大地损害了民主政

①② 1944年10月21日。

③ 丘吉尔：《胜利与悲剧》，第198页。

治家的声誉,而大大有利于共产党,这是共产党必然加以利用的一种形势。国王地位问题依然未解决。在这期间,野蛮而具有破坏性的德国占领已经导致了社会组织的全盘瓦解。“过去中产阶级中的很多人已经和贫民排在同一条一字长蛇阵里,耐心地等待一碗残羹。匮乏象一部巨型压路机一样,夷平了过去的社会差别。”<sup>①</sup>据我们从先后在迈尔斯准将和伍德豪斯上校出色领导下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的成员给我们的情报中所清楚了解,在梅塔克萨斯四年独裁期间已经几乎歼灭了共产党,现在却是希腊最活跃,组织最为有效的一个实体了。事实上,它控制了民族解放阵线,并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掩饰下作好了夺取政权的一切准备。它已经开始了尽可能清除敌对游击队团体的激烈战役。它已经把埃泽斯游击队驱进并限制在伊皮鲁斯山区。英国部队的人数不多,与其说是一支真正的军事远征队不如说是作为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开进希腊的。自从1943年秋季意大利投降之后,英国对游击队的控制由于埃拉斯游击队实际上成功地夺取了塞萨利地方的远征意大利的皮内罗洛师的全部武器而大为削弱。

然而,表面上看去一切都是平静的。我们只能假定这是俄国  
593 人履行他们同丘吉尔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并有严令下达到共产党游击队的。

在这种情况下,危险虽依然存在,我们却集中精力于希腊人民当务之急。财政情况已是山穷水尽,盟国的接济很不充分。艾登的莅临帮助我们作了只能依靠一时权宜之计所能作的事情。大使馆的会议几乎接连不断。在10月27日,

我们发出大量电报,要求大型快船、咖啡、金镑、油籽、飞机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商品,这些据认为在货币危机中都是大有用途的。我们对于港

---

<sup>①</sup> 乔治·库索拉斯:《革命和失败》(Revolution and Defeat)(伦敦,1965年版),第151页。

口的情况以及大批陆、海军官员对所能卸下的吨位作出的种种不同估计，进行了无数次的讨论。我们闯进已故大使(迈克尔·帕勒里特爵士)的酒窖，用他的香槟酒来提神。最后，在凌晨二时左右，我们躺在睡椅上体味着我们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彼此间的缺点，令人不能入睡。<sup>①</sup>

为了把这一切工作纳入轨道，我拟具了一项即将为协助斯科比将军而成立的经济政治顾问委员会的计划，这项计划得到了一致同意。委员会由作为我的代表的斯蒂尔、在财政部专门派来的戴维·韦利爵士协助下的财政专家劳埃德和由中东供应中心借调来的杰克逊中校共同组成。哈罗德·卡奇亚后来取代了斯蒂尔，他在意大利委员会的位置则由亨利·霍普金森递补。我们尽量将所发生的一切告诉美国人，但是他们的大使却采取超然的态度。

第二天，星期日，我们等待了韦利一整天。

他终于到达（大约下午8时），在特别布置的闪光信号的帮助下着陆。

韦利的来临是同奥米克龙·派爵士的来临一样的。所有这些地方上的谋士都很不错。最后，伦敦的大专家来了——重金礼聘，所费不赀。他是一个出色的小人物，一个显然坚强的角色，一脸富有魅力的、甚至孩子气的笑容，并且很会开玩笑。他耐心倾听（晚餐后所进行的磋商），同意了迄今所适用的救治办法，考虑一项紧急手术，认为病人也许会死亡，但是开具死亡证不会有什么麻烦——他把我们送上床的时候大家都有点泄气，但心潮澎湃，激动异常。<sup>②</sup>

30日，我为了处理有关意大利紧急公务不得不回去。但是在11月1日下午我又折回希腊，并发现我们所有的顾问人员都在辛勤工作。民族解放阵线和游击队仍然平静无事，但是据我看，在供应和货币稳定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除各方面游击队的武装。委员会和专家都孜孜于他们的计划。我们派出几个希腊人

<sup>①</sup> 1944年10月27日。

<sup>②</sup> 1944年10月29日。



组成的小组去采办橄榄油。但是当然存亡攸关的事则是如何以一种新通货来恢复货币的稳定。韦利留交我们一份辉煌的备忘录——我名之为“稳定币值儿童指南”——人人都在原则上予以同意，最后在11月3日下午将这项备忘录送交帕潘德里欧。帕潘德里欧是由一位叫作泽洛塔斯的财政部次长兼国家银行代总裁陪伴的。作为民族解放阵线代表而具有相当重要性的斯沃洛斯也在场。希腊人要求增加供应和贷款。

我是以答复斯沃洛斯来开始谈判的，并且只以讨论供应问题为限。但是我一上来就（非常坚定地）说，我不愿要求英王陛下政府给予任何进一步的援助，除非清楚了解他们能作到一切非作不可的事情，不仅能稳定币值，而且能保持稳定。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改变计算工资的制度和真正试图以纯粹通货膨胀以外的方法来作到预算平衡。也就是，他们必须削减薪金等等开支，必须征税，必须——尽速——开始办理储蓄，并发行内债。

595

所有这一切都得到了同意，帕潘德里欧对于我这样压制斯沃洛斯（共产党或民族解放阵线的财政部长），显然感激不尽。继而我详述了自从艾登先生来访和他召我来雅典时起，我如何想尽一切办法加速供应和把数量提高到原计划标准以上。…我们正设法从埃及购买棉花来恢复工业。我们已经用战舰运进象咖啡这类特别“赚钱”的供应品。我们正设法从土耳其取得棉油籽。这些油籽早些时候业经〔美国人〕根据先买权买下，我们可尽力争取早日转让装船。我们即将派人携带金镑分别去米提利尼和卡拉马塔采购橄榄油。①

韦利处理贷款问题并研究预算数字，同时郑重其事地但以一种特别具有吸引力的方式发出警告；这是一番巧妙的表演。我们最后同意向英国政府建议，准许新德拉克玛和英国军用券可以互相兑换，从而给新德拉克玛以信用。不超过三百万的军用券可立即提供应用，虽则这必须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一项协议，而且不得公

① 1944年11月3日。

布。我们也不会让英国军用券成为可以出口的或成为可以兑换英镑的货币。

我必须在11月4日返回卡塞塔，并发觉威尔逊将军有点担心。

由于我们在希腊的行动而在美国人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麻烦”。这当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美国人参加救济和善后工作，但是不参加政治或军事行动。自然，要划清这条界限是不太容易的，要他们参加或把他们丢开都会同样得罪他们。

不幸，鲍勃·狄克逊就10月26和27日夜的一切非常行动写了一篇纪录送交盟军最高司令部。他交给后勤部部长(克拉克将军)，后者又交给斯波福德(第5组美国人)，故有此泪！美国人极力反对。我们不仅曾经在英国大使馆同国务卿、莫因勋爵、威尔逊将军、坎宁安海军上将和我自己举行过会议，而且我们还颁发了(或认为我们曾颁发过)与参谋长联合会议规定救济物资售价的指示相反的命令。我们因为要为希腊政府取得财政收入作出一些努力，而竟违反了米提亚人和波斯人的法律。<sup>①</sup>

我们总算设法一笑置之。幸而我能够说有一位美国专家至少非正式地出席过斯科比的委员会。然而这次小小的意外却不失为一个警告。

11月7日我飞返雅典，发现事情有点脱节。韦利已经同意呆在我们这里，并正以无瑕可击的手腕掌握着希腊人，但是

希腊混乱如常。没有一个人能长久地“稳住不动”。韦利谈了一整天，总算征得了他们对于一个计划的同意。但是一夜之间他们又有了一大堆新的好主意，所以第二天早晨他又得从头谈起。<sup>②</sup>

在这期间，在公共秩序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希腊的山地作战旅将从意大利调来协助政府，否则他们除去残余的宪兵之外，

<sup>①</sup> 1944年11月5日。

<sup>②</sup> 1944年11月7日。

就没有一兵一卒。大量的武装部队却掌握在埃拉斯游击队手里。

一支新的国民警卫军就要在11月20日诞生了(像出自宙斯主神头部的智慧女神一样)。谁也没有为这一、两万人安排制服和装备(我想他们指望同样从威尔逊将军的肚皮里产生出来)。<sup>①</sup>

希腊政府的主要困难之一就是它没有任何财政收入。我们希望把我们所能争取到的供应品交给他们出售。但是红十字会供应品的瑞典分配人员纯粹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各式各样国际团体的代理人,坚持非把救济品无偿地发给人民不可。在同帕潘德里欧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瑞典人终于同意了我们的计划,这个计划就逐条逐款地构成为韦利所拟具的备忘录。必须有一项新工资水平;必须设法增加财政收入;必须课征赋税。最后特别提到了已于11月9日发布的稳定币值的必要命令和公告。比率是,一新德拉克玛兑五百亿旧币,六百新德拉克玛兑一英镑,可兑换英国军用券。

597

让我们希望它能恢复信用吧!目前人人都一早出售黄金,傍晚出售德拉克玛!这种损失,在公众心理上,或许为一种可以得到挽救并希望将来可以稳定的一种宽慰感而大大获得补偿的。但是,我们了解,这要取决于政府能否通过出售供应品,税课和(或)举借内债而得到财政收入。在目前条件下,后两项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他们被迫每星期印发纸币以支付他们职工的薪金而不能以上述方法之一收回同等的货币,那么在三、两个月的工夫,就会出现新的通货膨胀,而导致新的崩溃。<sup>②</sup>

在同一天早晨,我看到帕潘德里欧,我发现他勇气十足,接着就有所谓山地作战旅的三个营穿过大街。他们在1941年已经离开希腊,曾经在阿拉曼作过战,一度隶属于驻意大利的第八军,刚刚在几个星期以前攻占了里米尼。虽然年初他们曾与埃及的兵变有牵连,但是现在被看作是可靠的劲旅。群众是热情洋溢的,但是

<sup>①</sup> 1944年11月7日。

<sup>②</sup> 1944年11月9日。

似乎比我在早几次示威游行中所看到的更加资产阶级、更不那么无产阶级。这一旅的到达,无疑更加使人增加了信心。

11月11日是真正稳定的日子,而且是停战日,这一天又举行游行来进行庆祝。在无名英雄墓前举行了纪念仪式,但是埃拉斯游击部队一律未到。达玛斯基诺斯大主教主持大会。

这位声名赫赫的人物——身长六英尺有奇——穿着黑袍,他的希腊教的帽子上面饰以黑罩布,手持一根银头的长长黑檀木手杖,以一种优美的男中音的声调吟诵祈祷文,那种合乎主教身份的仪态是高贵的,神圣的,感人至深的。<sup>①</sup>

在采行了货币改革之后,希腊政府为“韦利爵士”、“利珀爵士”和我本人举行一次盛大午宴。这种货币不稳定现象还肯定要经过一段长的过程,因为它显然是以黑市食品为基础的。

我在13日动身去那不勒斯时感到我们已经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摆在希腊政府和人民的面前还有许多问题。但是只要对莫斯科协议信守不渝,就大有迎刃而解的希望。现在我非着手意大利事务不可了,这就不能不有伦敦之行。我在动身之前所能作的,只不过是敦促威尔逊将军拟订一项计划,以防万一协议失败,埃拉斯游击队试图制造纠纷。 598

在我动身之前,作出了一项最后决定。作为最高司令官的威尔逊将军,不顾专家的意见,接受了斯科比将军的这样一项建议:我们必须保证希腊人得到一些额外的配给。数量固属微不足道,但是这个原则却和规章,特别是华盛顿的规章相抵触。然而,在我看来,一位最高司令官,要保持其最高地位,就非冲破规章的限制不可。

这是我卷入希腊事务第一幕的告终。我料想不到在三、两个星期之后回到希腊时,正遇上—一个暗淡的、悲剧性收场。

---

<sup>①</sup> 1944年11月11日。



## 第二十二章 希腊的叛乱

### 1. 雅典之战

伦敦方面收到的第一批关于希腊事务的电报是令人鼓舞的。一切都取决于帕潘德里欧同共产党领袖就游击队复员问题举行的谈判能否成功。他当然渴望将所有的问题一举而全盘解决。所以他要求在他的政府中的民族解放阵线的主要阁员斯沃洛斯、齐里莫科斯和泽弗戈斯自行起草一道命令交由全体内阁批准。根据这道命令所列的条件,埃泽斯游击队和埃拉斯游击队两方面的部队,以及中东的希腊军队应于12月10日一律复员。拟以山地作战旅,即所谓的“神圣营”那支埃泽斯游击部队和埃拉斯游击队的一个旅为核心组成国民军。埃拉斯旅,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游击队,在人数和武器方面,同其余部队合在一起的人数和武器大致相等。

因为这项协议一旦破裂,就会有许许多多误解和误传相继而来,所以它的条件是重要的。那个所谓的山地作战旅自然被共产党(后来也被他们的同情者或受骗者)认作是“反动的”。因为它是由希腊武装部队中东兵变后的残余忠诚分子建立起来的。又因为作为意大利战场盟军一部分的这支部队所立的战功以攻占里米尼城而达于顶点,所以它这时通称为里米尼旅。神圣营是由正规军军官组成的,它的同情无疑是在“资产阶级”方面。但是,有了埃拉斯旅,平衡就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了。无论如何,这项协议的关键在于共产党是否同意希腊全国游击队立即复员以及在作为新国民军基础的左右两翼部队之间是否能保持均等。①

① 库索拉斯:《革命和失败》,第199页。

这项契约的确是帕潘德里欧外交手腕的胜利。11月28日，他向新闻界公布了这项草约的条件，并表示他确信正式文件可于当天签字。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共产党领袖竟自食其言。他们提出了完全无法接受的建议。现在他们要求山地作战旅和神圣营一并复员，虽然在情绪十分激动的谈判过程中帕潘德里欧已尽其力所能及，但是显而易见，共产党领袖已经决定要直接夺取政权。民族解放阵线的六名部长辞去了政府的职务。民族解放阵线的警察拒绝按照同意了的办法交出武器。总罢工的通知已经公布。在这个当口，丘吉尔答应给斯科比将军和帕潘德里欧以全面支持。从斯科比在12月1日发表的声明中可以清楚看出：立宪政府将维持到一个拥有合法武装部队的希腊国建立起来，并可以举行自由选举时为止。

12月3日，星期日，内战开始了。至于那个星期日宪法广场上的示威运动到底怎样引起了群众和警察的冲突，嗣后议论纷纭，浪费了不少笔墨。有一些比较天真的外国评论家将一切责任都归咎于警察，因为他们曾经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了一阵机关枪，造成若干伤亡。但是不应忘记，在所谓手无寸铁的群众之中有很多全副武装的埃拉斯游击队，而且警察所奉的命令是放空枪驱散暴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致命的射击是由共产党煽动分子发出的。不管孰是孰非，无疑，12月3日星期日的事件，虽则对于历史家来说也许是标志12月革命开始的一个方便日期，然而并不是革命的肇因。共产党的造反决不是由一次政治示威期间的不幸冲突挑动起来的。这是西安托斯和伊奥安尼泽斯这两位共产党领袖至少在五天以前所作的明确决定的结果。<sup>①</sup>不幸，我们现在从很多历史家 601 周详审慎、证据确凿的揭示中已经获悉的情形，在当时却真相不明。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坐在广场一侧的弗雷塔格内大饭店中一排

<sup>①</sup> 库索拉斯前书，第207页。

排外国记者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一桩血案。在随即被谴责为雅典“法西斯警察”故意行动的那桩枪击手无寸铁的群众的事件开始时，外国记者所坐的位置仿佛是贴近出事地点的。那一天民族解放阵线无疑赢得了外交上的胜利。<sup>①</sup> 这种妄言谎语的种籽也并非播在贫瘠不毛的土壤上。

这时，英国人民忍受战争之苦已经有五年多了。早先所抱的西欧战事迅即结束的希望已渐成泡影。在局势危急之际，由一个才智出群超众的人领导成立了多少有点不自然的联合政府，其内在的压力，已开始有了发展。因为胜败之局已不卜可知，于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就把心意越来越转向和平的机会了。在报界内外，准备对丘吉尔表示特殊敌意的已大有人在。很多人把接受他为首相看作是迫于危机的一种令人遗憾的不得已之举。但是他们不欢喜他支配一切的作风，而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希望尽速恢复到庸才制度。所以很多报纸，尤其是《泰晤士报》、《每日记事报》以及《曼彻斯特卫报》在整个希腊危机期间都是危险的反对派。其他无论在新闻界还是在议会中的人，却真正是忧心忡忡的，但是渐渐愿意了解并承认事实。然而有两个人却自始就不曾有过迟疑。自12月3日起，丘吉尔就直接掌握大局，自从最初一段令人焦虑的时日起直到叛乱结束止，先后给斯科比和利珀以及亚历山大和我以全面支持。同样，欧内斯特·贝文无论在这个时刻或直到叛乱结束时，面临着一度似乎要威胁到政府的稳定和英美友谊力量的那股感情冲动的浪潮，都是以坚若盘石的忠诚力挽狂澜。

602 在起初这段时期，我正肩负着意大利问题的使命出差在伦敦。我常常看到艾登和丘吉尔，读到随时从雅典拍来的一切电报。12月5日，丘吉尔在议会宣布了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于是就有人信

---

<sup>①</sup> 雷金纳德·利珀爵士：《在希腊人会晤希腊人的时候》（When Greek Meets Greeks）（伦敦，1950年版），第101页。

手抓来作为口实，尤其是安奈林·比万和左翼的其他人等。在下院其他人中抱批评态度的也颇不乏人。

希腊方面的消息非常不幸。……看上去象是内战。〔我们〕同我们的美国盟友已经越来越疏远，而英国的大部分舆论却又是混乱的、抱敌意的。<sup>①</sup>

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在英国军队采取行动的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严厉批评英国的政策。“让解放了的国家在没有外界的干涉下自行解决他们政府的问题”这一原则也许是健全的，但是这个原则对于雅典的现实军事政治情况实际上却无法适用。在希腊，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抵抗运动曾经被我们的宣传捧成为以拜伦式的孤忠为他们国家的自由而战的英勇侠义的理想主义者的团体。事实上尽管具有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却已经成为共产党野心的工具。如果说连一部分重要的英国新闻界都接受了这种通俗观点，那么斯退丁纽斯为来自许多美国记者的那种感情用事的报告所蒙骗，也就是全然不足为奇了。结果无疑是不幸的；因为英国部队不能不在没有美国的帮助下，实则在美国夸张了的、和有时惹人反感的中立表示的限制下，进行解放战争。我们当时无法知道美国人不久就会得到他们的教训，并在三年之后为击退共产党对希腊人民的自由另一次同样危险的进攻，而肩负起重担。

12月8日，下院举行全面辩论，不独涉及希腊，而且涉及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最近事态。这样，辩论就涉及到了成为战争结束阶段一个无可避免部分的所谓“对解放了的国家的干涉行为”的整个领域。

举行希腊问题的辩论。我到下院去听丘吉尔的讲话。他的发言是 603  
一次了不起的议会杰作，气魄宏伟雄壮。……安东尼出色的“收尾”是首相所作引言的补充，补充了很多点的细节——尤其是关于希腊问题。修

<sup>①</sup> 1944年12月5日和7日。



正案的设计人把面铺得如此之广，以致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重大错误。如果他们把它缩小到希腊问题，那么首相就会无法展开一般辩论，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比利时、荷兰等等对他阐明他的主题是大有帮助的。英国报纸迄今都很令人遗憾，美国报纸则更糟。<sup>①</sup>

丘吉尔的发言有一些著名的段落。他怒发冲冠地驳斥把民主和暴民法律等同起来的这种新风。有一句并非只有瞬息价值的名言：“民主决不是一个携带手提机关枪的人可以在街头勾搭上的娼妓。”<sup>②</sup>

虽然在下院以是压倒之势获胜的——投政府的反对票的只有三十名议员，而且都是无足轻重之辈——但是我意识到在很多方面不无真正的焦虑。后来真实情况为人所共知了。共产党所犯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业经为前往访问的工会代表所亲眼目睹。不但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外交官而且是最优秀的政治评论家的英国军人，尤其能判断埃拉斯革命的真正性质。于是批评的声音开始沉寂了。但是在争论不休的时候，批评的声音却是尖锐的，刺耳的。很多报纸拒不面对事实，这种情况就某种意义来讲，使我想到了战前年月。对希特勒和法西斯分子的批评在很多人看来是无礼的举动。现在要对共产党有任何缺乏信心的表示，又显然是不恭之至。

虽然如此，1944年12月希腊革命的起源仍然暧昧不明。已经有了以卡塞塔协议而登峰造极的一系列安排，得凭以将一切游击  
604 部队置诸英国的指挥之下。甚至直到最后时刻，至关重要的复员问题看上去还仿佛可以按照民族解放阵线自己建议的方式获得一致同意。关于在巴尔干各个国家的利益分配问题，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似乎仍然信守不渝。那么为什么又会有这次突然的变化呢？是1944年11月底所发生的情况诱使希腊的共产党领导人要

① 1944年12月8日。

② 《英国议会议事录》1944年12月8日。

把这个国家投入内战吗？历史家迄今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有些人认为这项决定是纯粹地方级作出的，并没有请示共产党的领导。另一些人则坚称这是苏联最高当局的决定，而且的确还可以举出一些有力的证明。<sup>①</sup>也许最简单的解释是正确的。尽管丘吉尔有直接命令给斯科比，而且帕潘德里欧也拿给他的共产党同僚看过，尽管英国政府的明显利益在于按照正常方法管理希腊事务，但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在最后片刻以两个有利的情况为可乘之机而得到了鼓舞。第一，这时斯科比将军的部队和军事部署显然薄弱；第二，英、美两国政府对于如何掌握解放了的国家分歧日益加剧。因此，斯大林也许不曾鼓励甚至同意这场革命。实则，他也许被革命的发展弄得惴惴不安。莫斯科的报纸的确没有参加英、美两国报纸普遍对丘吉尔的谴责。《真理报》或《消息报》并无一字责难之词。<sup>②</sup>斯大林也许决定任事态自然发展，无论如何在最初阶段是这样的。如果英国政府，以它的美国盟邦的冷淡为虑，或迫于国内批评者的威吓，而决定听其自然，或听任革命或内战在希腊发展下去，英国不加任何干涉，那么就反抗希特勒战争的进展而言，原不会有任何损失。如果不是在丘吉尔而是在其他任何人的领导下，情况就很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硬汉牢牢地掌握了事态，什么也不能使 605 他松手。甚至从亚历山大已经单薄的兵力中调走了大量部队，也吓他不住。所以，大部分由于丘吉尔的坚定不移，这第一个给世界带来自由的希腊，才没有注定像中欧和东欧其他很多国家那样被吸引进极权主义奴役的大漩涡之中。丘吉尔得到了贝文的支持，而贝文为政府政策所作的大胆辩护对工会代表大会则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

① 沃伊特：《希腊的民变》(The Greek Sediton) (伦敦，1949年版)，第210—212和254页，翻印了一封信，来自共产党将军马尔科斯的这封信上提到的“诱使我们发动民众起义的1944年12月斯大林同志的那封历史性的电报”。

② 丘吉尔：《胜利与悲剧》，第255页。

在辩论的那天晚上，丘吉尔派人来找我。我发现他单独一个人耽在那所“附属建筑物”里，精疲力竭，并且有点急躁的情绪。略事寒暄之后，他突然抨击我“擅离职守”。他几乎意在言外把我离开罗马和雅典说成是真正“胆小如鼠”。我断然对他说，我是奉他的命令返国的；我现在是意大利盟国委员会的主席；我在几小时以前已经得到了内阁会议对我所拟意大利建议的批准。最后，我提醒他说，他已经致电美国总统，告以我将在一、两天之内去华盛顿商讨所有这些问题，此外还要讨论关于地中海和欧洲解放地区的供应问题。

他虽承认这都是事实，但仍然说他直觉地感到我应该回去帮助亚历山大。我说那我再高兴不过了，我愿立即动身。但是他必须把事情向总统讲清楚，并派另一位大臣去华盛顿。

他无精打采、情绪沮丧地漫谈下去。那场辩论显然已经使得他疲惫不堪，我想他体会到了我们现在开始实施的希腊政策的内在危险性。他已经赢得了那场辩论，但是并没有赢得希腊战役。<sup>①</sup>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他在我辞出之后写的一封短笺，他说：

606 今晨外交大臣对我说，他认为你应该东去，正如昨晚你所推断的那样，这也是我的看法。有你同亚历山大在一起，随时就罗马和雅典方面现在不胜其多的政治问题提供意见，我深信是重要的。在我看来，这个活动范围和原指派给你在华盛顿担任的任务相比，似乎有过之无不及。我确信你决不会坐失良机，要永远切记我们的格言：“没有胜利就没有和平”。

在这期间，约翰·温德姆一大早打电话来说，亚历山大元帅的坐机已经延期。所以我可以第二天同他一起飞回，如果同意这样作的话。我在外交部的机要室里消磨了一个不平凡的上午，在艾登、丘吉尔和我自己之间进行着穿梭般的电话交谈，艾登在乡间，丘吉尔仍在伦敦。首相又改变了主意，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但

<sup>①</sup> 1944年12月8日。

是艾登认为我最好是去雅典。“于是我说我希望去雅典，但是更加希望有几道命令。”<sup>①</sup> 下午我得到了一项断然的决定。赞成我去雅典，到亚历山大那里。我自然感到高兴。

供应问题在华盛顿肯定是不能解决的。在雅典的政治问题也多半无法解决。但是第二个问题是人的问题，是富有刺激性的，而且在这方面，我自认为所具备的那点本领也更有用些。<sup>②</sup>

为事先就这项决定作好准备，我曾经邀请外交部和陆军部在三点钟举行一次会议，以便为执行我的意大利计划和供应计划作出一切必要的部署。到7点钟，所有电报都已拟就，并且已经发出了。

关于意大利的政治决定，我想美国国务院无疑会是中意的。这方面的困难多半是在伦敦而不是华盛顿。我已经把所有这一切向内阁讲清楚，并且我们已经把我的文件的文本电告哈利法克斯。关于地中海的供应问题，也许马里斯和斯波福德准将就可以解决。更广泛的供应问题势非专门派一位大臣前去不可。我将派巴斯蒂昂上校去华盛顿，带给斯波福德一封信和一份已经取得我的同僚同意的详细说明。<sup>③</sup>

结果，理查德·劳承担了我的任务。罗杰·梅金斯这时正在华盛顿，607在他和哈利法克斯的帮助下，我所孜孜从事的一切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第二天早晨6点钟，亚历山大和我携同我们的小小工作班子一起动身，下午刚过就到达了卡塞塔。现在已经是元帅的威尔逊尚未启程去华盛顿，所以我们能同他和甘默尔将军讨论一下希腊方面的一切最近消息。菲利普·布罗德这时担任我的办公室主任，有一大堆有关意大利的事务必须加以处理，因为巴多利奥的处境仍然险恶万状。但是我们一致同意，如果有任何危险，就要他飞往马耳他，并且已把这项决定通知了美国方面。向威尔逊告辞后，

---

①② 1944年12月9日。

③ 1944年12月11日。



我们在第二天，12月11日晨9点30分离开了意大利，我们一行人计有亚历山大、梅因沃林准将（他的准将参谋）、鲁珀特·克拉克（他的副官）、约翰·温德姆和我。

大约1点30分我们到达卡拉马基机场（塔蒂机场在叛军手里）。由于从机场去市中心的道路处于叛军的炮火之下，所以耽误了大约一小时，我们才动身去斯科比将军的总部。亚历山大乘坐一辆坦克，我乘坐另一辆。（为一个中年政治家所提供的地方是很有限的。）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出巡，我可以通过潜望镜看见所发生的一切。实际上，相当平静，似乎只有一些零星的射击。<sup>①</sup>

我们到达总部之后，斯科比将军说明了形势。我津津有味地注意着元帅如何迅速地领悟了这些颇有点难以对付的事件。实际上，形势简直是不能再坏了。我们不禁大吃一惊，直到最后时刻我还希望问题会得到解决，原来我们低估了叛军的军事技能、决心和力量。

608 目前，英国部队（以及大使馆）被围困在雅典这个范围很小的中心区。我们在建筑物林立的五十平方英里的地区中（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据守着大约五至十平方英里。塔蒂的飞机场已经陷落，空军总部和地勤工作班子共约八百人被切断在那个郊区。我们在卡拉马基的飞机场也很不安全，而且在机场和雅典市区之间交通完全处于炮火之下。我们连一个港口也没有占据。我们已经失去了比雷埃夫斯、赫拉克莱等港。我们守卫在法莱龙湾的海滨上，但是我们在飞机场和海滨或雅典和海滨之间并没有真正的交通。换句话说，我们已没有任何可以进行军事行动的安全基地。<sup>②</sup>

这样叛军就占有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五分之四；他们占有周围的一切丘陵，他们占有港口；他们已经攻占了一个飞机场，并且正威胁着另一个飞机场。

---

①② 1944年12月11日。

我们原在市区存有几大批存粮和弹药，但是大多数已经丧失。按目前的消费率来说，我们只有大约五天的存粮和大约八天的弹药。叛军控制了发电站。<sup>①</sup>

我们从将军的总部去到大使馆，在那里受到了利珀的接待。大使问我们军事形势，元帅答复如下：

你处于严重局势中。你的海口被切断，你的机场只能靠坦克或装甲车才能到达，你已经处于寡不敌众的地位，你的仓储已经被包围，你只有三天的弹药。我还来得及加以挽救，但是也许要用两个星期的工夫。这需要从意大利开来两个战斗师。笨重货物将不得不在未设防的法莱龙海滨起岸，而12月并不是进行这项工作最适当的月份。<sup>②</sup>

然后我们讨论政治局势，利珀主张要求国王同意指派大主教为摄政，他并没有费多大事就说服了我们。这种主张的理由是简单的，但是令人信服的。虽然埃拉斯拥有游击队或“爱国”部队的支持，但是我们的情报使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加入叛军的那些人很多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无疑生怕国王的政府会是右翼的，反动的。他们生怕给予通敌分子以太多的回旋余地。<sup>609</sup>他们曾经被他们领袖说服，认为原来的复员计划，虽经共产党部队接受，却是不公平的。而尤其是他们把国王同麦塔克萨斯的独裁制联系了起来，所以他们真正相信国王的返国将是采取反对人民武装力量的广泛行动的信号。何况，旧自由党和韦尼泽洛斯派的政治家虽然是激烈反共的，确实比保守党几乎还要激烈，但是他们有反对王权的悠久传统。所以，正值国家面临共产主义革命之际，在希腊可以称作为温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人士却由于一个大体上陈腐的争论而分崩离析，但是革命一旦成功，那就永无翻转之日了。摄政制在我们看来会是将这些力量团结起来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sup>①</sup> 1944年12月11日。

<sup>②</sup> 利珀，前引书，第114—115页。

君主主义者会由于保全了制度而感到满意，而共和主义者也会由于国王的去位而受到鼓舞。

亚历山大和我于是采取了我们在随后很多场合所奉行的那个办法；我们联名发给首相一电。这个办法无论是对外交部还是对三军参谋长都是不怎么受欢迎的。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样作却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我们的一切建议从现在起都是相互衔接的，伦敦方面插不进任何楔子把我们在行动领域中分裂开来。电报的第一部分陈述了军事形势的实况，以及陆军元帅发出的要求增援的命令。他并不掩饰困难和危险；被围的部队很可能等不到援助到达就弹尽粮绝了。在比雷埃夫斯得以肃清和守住之前，一切都将要看天气和登陆艇能否利用法莱龙湾的海滨而定。在政治方面，我们建议指派大主教为摄政这一刻不容缓的措施。只有他能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指派帕潘德里欧的继任人选，如果他认为合适的话。他是在整个德国占领期间一直留在雅典的寥寥几位名流之一，并且因为严词拒绝德国人的要求而享有很高的声誉。只有他在时机成熟时方能以摄政身份开始同叛军谈判。这样，“  
610 我们可以自己不用作倡议人而收到和解的实效”。这是对暴力干涉的指责最好的答复。陆军元帅继之以一封给首相的私人电报，要求准许他自己和我去访问大主教，以便使他对我们的政治和军事意图了无怀疑。但是在我们能够解决摄政问题以前，这样作是无益的。我们究竟能够多快让国王采取行动呢？

第二天叛军的代表之一波尔菲罗耶尼斯向斯科比将军提出一项建议。亚历山大和我，在利珀的帮助下，决定了复文的条件。

[条件]是非常温和而合理的（也同我们脆弱的军事地位一致）。我们要求他们撤出阿提卡（就正规的游击队而言）。在雅典的游击队要放下武器——然后再谈解决的步骤。<sup>①</sup>

<sup>①</sup> 1944年12月12日。

首相的复电在傍晚到达，内容给了我们一些鼓励。一切军事措施都得到了同意；但是关于摄政制，国王是顽固不化的。他建议任命大主教为首相，这当然完全无济于事。所以我们发出一份强硬的复电，力请本国政府对国王施加更大的压力。

这时亚历山大回到卡塞塔，我应他之请并在利珀的完全同意下，仍留在大使馆。我的处境当然相当微妙，但是我尽力减少任何分割权力的危险。在很多年以后，我高兴地读到大使对我们的合作所作的宽宏大量的记述。<sup>①</sup>

大使馆的生活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包括仆役和警卫在内共约五十人，活动和住宿都在这个房子里。除开在用墙围起来的花园里一点点地方作点身体锻炼外，任何人都非因公一律不得外出。甚至要到这个花园去，也不能不冒被狙击手的枪弹击中的危险。所有临街的房屋都腾空出来，床铺一律放在走廊里。秘书和打字员们的宿舍由利珀夫人布置得令人赞叹不已。夫人温文尔雅、仪态大方，在这段围攻时期主持其事达许多个星期之久。

611

利珀夫人真正是一位了不起的妇女。她使大使馆的整个班子，不问男女，都一直心平气和；物资来源很少，她和厨师却做出了真正出色的饭菜。

叛军相去不过二、三百码，据有伊利苏斯河紧对岸的所有地方。要从大使馆到总部去，必须搭乘装甲车或坦克车，要是搭乘“薄皮”车就要从一些隐蔽的街道开足马力，疾驰而过。

一日三餐，都是在使馆的大厅或休息室里共进的。有坐位的二十四至二十六人。每人所分得的一份比陆军的配给量稍为减少些。

没有暖气（因为没有电力运转供暖设备）。没有自来水（因为叛军已经把我们所依赖的哈兹里安蓄水池抽干）。没有灯（因叛军占据了发电站）。

我们幸而把所有浴缸里都储满了水；我们花园里有一个百合花池；

<sup>①</sup> 利珀，前引书，第115页。



今天我们已发现了一口废井，这或许至少可供我们以适于烹饪和洗涤的用水。<sup>①</sup>

在12月13日这一天，我们的工作班子里增加了一个重要成员——奥斯伯特·兰开斯特，他前来担任新闻参赞，是一个在危急时可以信赖的人，常识既丰，又很风趣。

在援军到达以前，斯科比将军所统率的少数部队只能在战术上取守势。时时处于枪林弹雨之中。在大使馆的书房里，枪弹破窗而入，但是有一个角落可坐，而不必冒过分的危险。我们预料会有一支大编队从体育场方面发动一次进攻，但是这一行动为空军所粉碎。大使馆后面的那座小山利卡韦图斯山，为我们的部队所据守，但是，说来奇怪，下面的山坡却在叛军手里。扫荡行动开始时非常困难，一部分是因为很多叛军都穿着便服。我们的重炮很少——只有寥寥几座发射二十五磅重炮弹的炮和一些坦克。我们也不愿担负把这个城市的大部夷为废墟的责任。

昨晚对我们发动了一次非常猛烈的进攻。叛军猛扑我们的一个装甲旅的司令部，并且冲进去了。战斗现仍在进行中。距大使馆约仅三百码。<sup>②</sup>

12月14日，帕潘德里欧来见大使和我。我们力劝他让我们致电国王，建议摄政制，我们认为我们已经使他心悦诚服。其实，他却有点举棋不定，因为他和他的政府自然地担心大主教会作出激烈的更张。同一天早晨大主教来访。这是我同他的初次会晤。因为他和大多数希腊人不同，既不能讲法语也不能讲英语，所以我们必须依靠译员。

我对于这位教士对欧洲政治的广泛理解、他的见识、性格和魄力，获有深刻印象。他愿意接受摄政制，但是体会到种种困难。至于不应实行报复和反革命行动一节，他和我们抱同样的看法。<sup>③</sup>

---

①② 1944年12月13日。

③ 1944年12月14日。

在下午晚一些时候，我到帕潘德里欧的办公处看他，他的办公地点位于保护地带之内。我原希望得到呈请国王任命大主教的那份电报的副本，但是我的希望落空了。

他整个变卦了。他说各党领袖全都反对摄政制。说什么那会被看作是软弱的表示，共产主义非完全扑灭不可等等。他介绍了两位抱同样见解的同僚（人民党或保皇党人）。我大为沮丧而归。<sup>①</sup>

同时，白天的战事也一直不顺手。叛军实际上已被逐出装甲旅司令部，但是他们却俘虏了我方一百人，真是糟透了。

我们预料今晚有另一次猛攻。叛军正在我们房子的后面（在利卡韦图斯山上）和前面（伊利苏斯河对岸）摆开阵势。在后一地带，皇家空军 613 正试图以机枪火力把他们驱散。<sup>②</sup>

伦敦方面则用电报来轰炸我们，其中之一是告诉我们帕潘德里欧曾经劝请国王反对摄政制，或者据国王这样说。12月15日承陆军元帅电告，他将指派驻意大利第十军团司令霍克斯沃里负责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军事行动。这可使斯科比腾出手来应付一般问题，并给我们一位第一流的、经验丰富的野战司令官。在亚历山大离去以前我们商量了这个计划，我高兴看到这个计划已尽快付诸实施。

来自国内的消息仍然令人惴惴不安。虽然我们到达雅典是受到欢迎的，并且普遍希望亚历山大和我能谈判出一项解决的办法，但是对于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却没有真正了解。丘吉尔多少有点挑衅性的演讲赢得了他的一些美国朋友的钦佩，即如亨利·霍普金斯。但是霍普金斯在罗斯福面前已经不再有过去的那种地位，而国务院却依然是遇事掣肘。美国新闻界也是抱吹毛求疵的态度，并且深深为同希腊政府一起被封锁在弗雷塔格内大饭店中的新闻记者所作的肤浅的描述所吸引。军事前景也不令人鼓舞。

<sup>①②</sup> 1944年12月14日。

我们只能希望通过肃清雅典和阿提卡，或许经过相当期间之后肃清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一些地方来完成一次援救的军事行动。我们不能在希腊的中部和北部发动一次战役。在萨洛尼卡，多亏当地英国代表的巧妙手法，叛军和合法政府达成了一项得来不易的休战。意大利战事，因为时届严冬，已停顿下来，亚历山大这才有可能抽调两个，甚至必要时三个师来收拾希腊的残局。但是为了在意大利不久就要发动的春季攻势，这两、三个师是不可少的。所以既经炫示兵威，立即商谈一项解决办法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项办法能包括普遍收缴武器和遣返战俘的话。虽然我们很难  
614 希望达成一项全面的媾和条约，但是即使局部的措施也会有助于整个国家的安定。所以我们不需要英、美评论员方面的任何劝告。在陆军元帅承担广泛的义务的情况下，尽速结束希腊方面的军事行动，是对他有利的。

在这期间，我们忧心忡忡地等待我们的命运。我们是否会重蹈戈登在喀土穆的覆辙，或是否援军能跨过法莱龙湾的海滨及时登陆，就要看这三、两个星期天气是否晴朗、海上是否风平浪静而定了。

第二天一天主要是用在试图说服希腊的所有政治家向国王建议摄政制上面。12月15日，斯科比、利珀和我往访帕潘德里欧，力劝他采取这一办法。

我们提出三点理由：

第一，希腊在危机之中必须有一“国家元首”。他们目前既没有君主国的优点，也没有共和国的长处。我们都知道国王不能来到希腊，而又没有一个总统。所以我们在原则上主张摄政制。再者，一旦议定休战，或者雅典近郊的叛党或被兜捕或被逐退，那就不能不举行和平解决的谈判。谈判应该是在一个希腊人而不是在一个英国大臣或将军主持下进行。

第二,大主教的任命会大有助于满足美国的舆论。

第三,这会有助于英王陛下政府的立场。丘吉尔先生曾经凭靠他的威望而获胜。但是国内物议沸腾,而且方兴未艾,这一步骤会给英王陛下政府以莫大帮助。①

帕潘德里欧显然为我们的议论所感动,现在赞成摄政制了,但是主张三人摄政制。他建议由大主教、普拉斯蒂拉斯将军(这时从流亡中回到雅典)和国王的一位很受尊敬的朋友兹拉古米斯三人担任。他相信这个解决办法会得到索福利斯的支持。利珀和我于是往访索福利斯——一位年高望重的自由党领袖,韦尼泽洛斯派传统的继承人。他过去反对摄政制,但是他和他的朋友现在愿意接受。但是他宁取一人摄政制——由大主教担任。我们把所有这一切都照转伦敦。晚间我们收到了帕潘德里欧拟由我们的渠道拍致国王的一封电报,另有索福利斯的一封。帕潘德里欧仍然主张三人摄政;索福利斯则主张一人制。普拉斯蒂拉斯接着来访。

他曾流亡十二年之久。他是一个热衷共和主义者。他是一个独裁者,但是自愿辞职(这使他成为一个“好”独裁者)并举行选举,然后离开希腊。他同叛军誓不两立,但是在其他方面他丝毫不露声色。②

然而,这一天注定是要以通常的混乱情形告终的。

晚餐后,大主教方面的特使来说,他自己、帕潘德里欧和索福利斯对一切问题都已取得同意。帕潘德里欧和索福利斯拟建议国王任命一位摄政(大主教),以普拉斯蒂拉斯任首相,以帕潘德里欧和索福利斯同任副首相。

午夜前后,这位特使又来了。索福利斯现已背叛这项协议。大主教的特使说,“这太讨厌了!”③

第二天,12月16日凌晨卡内洛普洛斯来访。他现在已经取代作为民族解放阵线代表的斯沃洛斯而担任了被包围着的政府的财政大臣。他赞成以大主教为唯一的摄政。

①②③ 1944年12月15日。



10点30分去总部。一路未闻到枪声。看到斯科比，告以当前形势。军事形势应随着霍克斯沃思和第四师的陆续到达而开始好转。<sup>①</sup>中午我携同大使馆的戴维·鲍尔弗那位殊可钦佩的译员往访大主教。

616 一次非常愉快的会晤。我对于这位至福尊者的评价每一次见到他都证明是信然不诬。对待叛军，他希望持坚定态度，但是他不愿有一次反革命行动。我说在恕罪和宽仁之间是有一适当的界限的。这使他很中意。<sup>②</sup>

叛军在同一天答复了斯科比最后提出的条件。虽然他们接受了他的条件之一，但是拒绝了其他各项。他们依然要求里米尼旅复员。经过反复讨论之后，复文取得了一致同意。同希腊的政治家们往来拜访，川流不息，利珀同他们周旋，既有耐心，也很有手法。我们依然抱乐观态度。

12月17日，星期日，一批新电报开始从伦敦方面纷至沓来。

希腊的政治家们……曾经对国王说，从希腊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反对摄政制的。但是他们认为如果象麦克米伦和利珀（特别是麦克米伦）对他们所说的那样，除非同意摄政制，不然的话英王陛下政府和丘吉尔就要垮台，他们会认为非接受不可。他们把我的论据完全曲解了，对我谈及国内舆论所持的论据，甚至夸张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所以他们使国王能够对首相和安东尼说，他的希腊顾问人员反对摄政制，并且无事生非，在我和伦敦之间制造麻烦。……温斯顿和安东尼……自然弄得有点如入五里雾中。无论如何，国王坚持目前的形式。我当然〔把我的解释〕立即电告伦敦。在这一天晚一些时候，我收到丘吉尔私人拍给我的一封非常亲切的电报。<sup>③</sup>

午餐前，大主教根据他自己的请求来到大使馆。他告诉我们

---

①② 1944年12月16日。

③ 1944年12月17日。

希腊的政治家现在正试图以一项政治声明强加在他头上。

这项声明的目的是：(甲)要大主教提出一项表示赞成现政府的最惹人反感的证明书；(乙)就未来的解决办法束缚住大主教的手脚。例如，要他言明，凡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者（不论曾参加叛变与否），无论文、武官职，一律永不录用；这位至福尊者希望听取我们的意见。我对他说，政府似乎不仅把他看作是教会的高级教士，而且把他看作是圣彼得本身。他回答说，“不，他们所要的不是天堂而是尘世。”最后，我们力劝他坚持照他自己的见解写他自己的声明。<sup>①</sup>

在下午晚一些时候，担任同大主教方面接头的译员兼联络员的马修斯少校来报告说，发表声明的这整套想法现在已经放弃了。希腊阁员不肯接受这种新形式的声明。这是第一个迹象，向我充分表明了希腊政治家之中的一种十分自然的、但就我们当前需要来说却很危险的态度。他们在丘吉尔的坚决态度和援军到达的鼓励下，开始希望我们不但能援救位于雅典及其邻近的希腊政府，而且能在希腊全境之内取得对共产党的彻底胜利。这说明了他们对于向国王提出关于摄政制的坚定意见依然踌躇不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职位，而且因为其中很多人真正担心大主教所决定予以维护的那种温和的中间立场。我认为这种情绪不能不以坚决态度加以对付。在听到这段报告后，我往访斯科比，因为他深受希腊政府的尊敬。

我要求他（他也同意了）往访帕潘德里欧，坦率对他说，我们不（再重复一遍不）准备成为在希腊全境之内进行一次右翼反动行动的工具。我们希望取得一项和解的解决办法，我们不会让自己拖进一场长期战争，为消灭共产党而从希腊的一端打到另一端。<sup>②</sup>

在随后两天之中，关于致国王的电报文稿仍然争论不休，更由于围攻依然继续不停，所以大使馆中全体人员都有点惶惶不安。官员不准外出，对姑娘们限制尤严。我每天必定步行到军事总部一、

<sup>①②</sup> 1944年12月17日。

618 两次,去找一点安慰。18日,我在几天以前派往卡塞塔的约翰·温德姆带回来了三十六个鸡蛋和十二瓶威士忌酒。这无疑有助于使我精神为之一振,因为碎火腿和饼干已开始令人生厌了。

在这期间,亚历山大正从他的卡塞塔总部支持我们要求一项不仅军事方面而且政治方面的解决办法。12月15日,他对首相说,最好的机会莫过于通过大主教。如果我们争取不到这一点,他为了确保肃清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全境,将不得不从意大利前线调派大量援军。丘吉尔并不完全欢喜这种办法,对于向国王施加压力仍然踌躇不决,尤其是有鉴于阁员们内心矛盾的态度。我们只能静待。

大使馆里没有暖气,天寒地冻,非常讨厌——罅隙里吹进来的风,亦复如此。我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档案室(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上),约翰也睡在那里。一、两天前曾有一颗子弹穿窗而入。我们把这间屋子叫做“裤子后插袋俱乐部”,既然我们有了杜松子酒和威士忌酒,所以每天晚饭前都有一番小聚,并有几位姑娘来调剂一下空气。<sup>①</sup>

还有一种通称为“大茴香利久酒”的饮料,虽然有害健康,还是令人忍不住一酌。

12月19日,在访问陆军总部之后,我得知

军事形势已逐渐好转,只有位于凯菲西亚的空军总部是一个例外,空军总部已经被围和被切断达两个星期之久,也许不能不投降——约七百人之数——果真如此,那是非常不幸的。一支驰援的坦克队正试图突破包围,冲进他们那里,但这不是易事。<sup>②</sup>

黄昏时分,我同希腊首相作了一次长谈,发现他象往常一样,是投合人意的和热心帮助的,但是我认为至少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的情绪是有点危险的乐观。他不愿意听什么妥协或和解,除了谈对共产党的全盘胜利,别的什么都不谈。

<sup>①</sup> 1944年12月18日。

<sup>②</sup> 1944年12月19日。

从他的观点来看，也许从欧洲的长远观点来看，他可能是对的。但 619  
是我认为他对我们军事方面的困难或他的北部边境上的危险是一无所  
知的。在对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我们是不希望掀起对俄国  
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无疑是不中帕潘德里欧先生之意的。<sup>①</sup>

同时，那天下午我收到了丘吉尔一封怒气冲冲的电报。

他因为我曾以国内政治形势和英、美关系为由，而不仅仅以纯希腊  
问题方面的考虑来力主摄政制，对我非常生气。<sup>②</sup>

希腊的阁员们自然曾拿我就英国政府的政治需要所提的论据大作  
文章。丘吉尔对于我妄用他的名义，啧有烦言，认为即使有正当理由，这也是不对的。然而我认为他不久就会宽恕我的，实际上他正  
是这样做了。

随着英国在希腊军事压力的增加，措词含糊的函信继续通过  
波尔菲罗耶尼斯等人由前线对方源源而来。斯科比坚持他那些毕  
竟还是非常适度的条件：叛军必须撤出阿提卡并在雅典和比雷埃  
夫斯放下武器，然后才可以就一般的和解开始谈判。这些条件，如  
果接受，可以给他们在希腊北部留下一支整编的军队和一条确定的  
边界。他们非但不在这些有利条件依然有效的时候予以接受，  
而且试图另行增加他们自己的许多条件，而这些条件全都是我们  
原不可能接受的。

在 19 日晚间我同利珀商量之后，决定第二天去卡塞塔。我认  
为我不能不去看亚历山大，同他讨论一下整个形势。所以我在 20  
日凌晨偕同哈罗德·卡奇亚和利珀工作班子里的爱德华·沃纳一  
起动身。在卡塞塔宫的猎舍里同亚历山大共进午餐之后，举行了一  
次全体会议。除陆军元帅外，在座的还有斯莱塞空军中将、哈丁 620  
将军和西伦将军（代表斯马茨陆军元帅）。我由卡奇亚陪同出席。

最后经决定：

---

①② 1944 年 12 月 19 日。



(甲) 应由哈丁将军为亚历山大起草一份致温斯顿的电报,叙明军事形势。电报应于明晨我动身去希腊之前拟妥,交我过目。

(乙) 由西伦将军致电斯马茨将军,叙明军事形势,更详细地说明政治形势,力促斯马茨劝请希腊国王赞成摄政制。(希腊国王曾向斯马茨提出呼吁,打电报给他说,温斯顿对他大施压力,要他指派摄政。听闻之下,不胜欣慰!)斯马茨很能左右国王。……

(丙) 我应力劝英王陛下政府和我在当地所能影响的一切希腊政治家赞成摄政制。

一旦当前的军事行动稍有进展,我们就在雅典及早举行会谈。①

意大利方面有很多工作有待办理,我担心我不惜在上面花费了那样多气力的计划现在只是漫无条理地推行下去。但是我除去向华盛顿发出几份令人鼓舞的电报外,不可能再多所作为了。那天晚上先舒舒服服地洗了一次热水浴,然后在那不勒斯自己的寓所吃了一顿可口的晚餐,这虽则也许有点不应该,但却实在适意。

第二天一早,亚历山大致丘吉尔的电报在我通篇阅读之后就及时以急件发出了。

这封电报将会有所裨益,总可以给局势以比较现实的看法了。可怜的温斯顿!一则因为希腊和波兰的形势,一则因为德国在西线的突破,这将是一个凶险难测的圣诞节。②

这封电报无疑给首相以深刻印象。其内容如下:

621 接奉 12 月 19 日电,拜读之下,我最所关心的,是要您确切了解局势的真相以及我们所能作的是什么是不能作的是什么。这是我的职责。您也许了解英国在希腊的兵力以及我能从意大利前线调出多少增援部队,如果迫于形势而不得不这样做的话。

假如埃拉斯游击队继续打下去,据我估计,肃清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并加以固守,该是可能的,但是却无法打败游击队,并迫使他们

① 1944 年 12 月 20 日。

② 1944 年 12 月 21 日。

投降。除此之外，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在希腊大陆上进行军事行动。在德国占领期间，他们在大陆上保持着六、七个师的兵力，此外，在希腊诸岛还有相当于四个师的兵力。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能始终保持交通畅通，我怀疑是否我们所遇到的力量和决心将比他们所遇到的弱些。

德国人在意大利前线上的意图非谨慎提防不可。西方最近的事态发展以及同美国第五军对垒的党卫军第十六师的去向不明和动静毫无，就表明了我们不能不防范突如其来的行动。为了让您清楚了解军事形势，为了强调我认为希腊问题无法以军事方法解决，所以我提到这种种因素。答案不能不求诸政治方面。

最后，我想您知道，您永远可以信赖我会尽我力所能及，执行您的意愿，但是我恳切希望您能为希腊问题找到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因为我深信在我们肃清了雅典—比雷埃夫斯地区之后，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就我们目前的兵力而言，是鞭长莫及的。<sup>①</sup>

同时，我认为给艾登写一封私函是明智的，这封信我已托由那天回国的一位军官面呈。

我怕你和温斯顿也许认为我们在雅典渐渐有点张惶失措，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诚然，我们经过了一次特殊的经历，险些没能逃脱一场天字第一号的浩劫。因为原来所作的部署只适合于一次童子军大会演而不适合于一场战争，我们的军人和外交官只是从一场大屠杀中死里逃生。 622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正渐渐取得军事上的优势；但是，在我看，甚至这个阶段，似乎要比某些人所设想的长一些，也要更加艰巨。……

亚历山大和我一致认为，希腊问题没有（再说一遍没有）军事解决办法。它只能通过一项政治协议来解决。这正是何以我们为大主教的摄政一职以这样多的方法斗争了这样久的时间。我了解首相认为我为此未免过虑，但是我向您保证，雷克斯·利珀和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政治解决是使局势松动一点的唯一办法。（希腊）国王顽固不化，我推断现在又退到宪法的细节上去了。我所能说的是“我是站在宪法之上的”。当他使

<sup>①</sup> 转载于丘吉尔的《胜利与悲剧》，第269页。

梅塔克萨斯成为独裁者的时候，他并不顾及依据宪法而来的两种攻击。至于那些政客们……他们的不择手段是我在地中海迄今所罕见的。……

如果我们得不到这位摄政，我们无论如何非另想办法不可。……结果，我们将不得不自行召集会议。

……而且，我认为对于希腊的舆论很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我不太相信反对民族解放阵线和埃拉斯游击队的人会象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多。要断定政治舆论总是困难的，甚至在本国之内，也是一样。举例来说，您能告诉我在下一次选举究竟是保守党还是工党当选吗？我确信，民族解放阵线在希腊拥有大量的同情者，一种稳健合理的进步政策可以使不着实际的激进分子脱离严谨的共产党核心。〔某些人所〕想要奉行的政策，其结果会不是溶解民族解放阵线和埃拉斯游击队的力量，而是使之凝聚起来。

西伦将军出色地执行了他的计划，并拍给斯马茨一份强有力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说，亚历山大不愿再进一步削弱他在意大利前线的力量；又说雅典和比雷埃夫斯一旦肃清，就需要一个政治解决。他进而力陈，不管大局怎样变，对国王只会有益无损。如果内  
623 战继续下去，所有稳健分子都会离心离德，人民终于会请国王出来领导。如果，在另一方面，他的行动是成功的，他无疑会得到充分的荣誉。在圣诞节前夕我收到了这份可喜的电报的副本。

21日我回到雅典，发现续有函电通过中间人从战线对方源源而来。我们在复电中清楚表明，我可以保证不会有报复行为，对于凡未犯刑事罪的人，一律实行政治大赦，另外我们保证，休战条件如被接受，当即进行谈判。

军事形势正渐渐好转，但进展必然是缓慢的。我〔提出〕这样一个意见：陆军元帅一到就立刻作复，要求埃拉斯委员会前来会晤。这个意见在大家乍看起来似乎是有点革命性的（利珀赞成这一点），时机也许还有点不成熟。斯科比将军比我所想象的更能接受这个意见。<sup>①</sup>

---

① 1944年12月23日。

我们现在静候亚历山大莅临雅典，但是不幸，消息传来，说天气太坏，不宜飞行。所以他要乘驱逐舰前来，希望在24日圣诞节前夕深夜到达。我对于某些希腊人的态度仍然忧心忡忡，他们不顾英国的困难和所承担的义务，而抱着消灭共产党的决心，要战到英国不剩一兵一卒来达到这个目的。虽然如此，我看得出，他们担心的是：要得不到最后的决定性胜利，那么，在战争结束后，还会有另一场战祸。而且事实将证明这并非杞人忧天。对希腊人来说，幸运的是，美国人这时虽然开着插有美国国旗的小轿车和吉普车到处乱跑，以表示中立，但是不久就要从我们手中把火炬接过去了。

圣诞节前夕又等待了一天。

沿着我们的大街开枪射击的那个狙击手一直活跃着，但是他似乎倒让我们随便耽在花园里。<sup>①</sup>

在下午晚一些时候，大主教来了。他的访问似乎总是受欢迎的。

我对于他的精明和克制获有深刻印象。他的神学知识怎么样，我不了解；但是他的政治知识非常全面，视野也比我向来所看到的希腊政治家要开阔得多。我们同他一起详细讨论了他的圣诞节训谕的文本。他告诉叛军说，他们必须放下武器；同时他指出必须有和解的和平而不是继之以报复行为的休战。<sup>②</sup>

刚刚进过晚餐，我们就接到首相一封莫明其妙的电报，要我们去看他拍给亚历山大的一封电报。不幸，由于天气太坏，他乘坐的驱逐舰再次延期，他要到圣诞节才能到达。因此我们弄得百思不解，简直摸不着头脑。

下午11点30分，在陷入重围的大使馆客厅里，我们举行了一个愉快的小小礼拜式；凡是不值勤的干部和士兵几乎全都参加了。利珀夫人从无到有地作出了几棵可爱的小小圣诞树，奥斯伯特·兰开斯特先生剪了一些（圣约瑟、圣母玛利亚、马槽中的圣童、国王和牧羊人）的剪影，在背后灯光的衬托下，成为一种别有风趣的装饰品。

①② 1944年12月24日。



我们在圣餐式的适当时刻唱了几首颂歌，大约12点15分礼毕。  
1944年圣诞节就这样开始了。

炮声隆隆——这是对利卡贝图斯后面某一段市区发动的一次夜袭。<sup>①</sup>

我们的情报官员带给我们一项消息。暴行愈益加剧，我们部队中有一些人对于英国政府的行动究竟是对是错，开始还抱怀疑态度，现在却人人怒发冲冠了。

从信件检查中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几乎是普遍的——甚至据说在伞兵旅中为数可观的格拉斯哥共产党人也不例外。<sup>②</sup>

亚历山大经过了一番辛苦的旅程之后，于上午11时到达。他拿出电报，向我们揭示出秘密的底蕴，电报内容如下：“你们的两个朋友即将前来同你们会晤，我是其中之一。”当然，这只能指首相和外交大臣而言了。利珀和我同亚历山大讨论了我们下述的建议：  
625 召开一次“普遍代表希腊政见”的会议，将埃拉斯游击队的代表一并包括在内。拟以大主教为主席。虽然我们确信这是最好的计划，但是显然我们不能不静候首相一行人等的莅临。

圣诞节下午，亚历山大、利珀和我同去飞机场。天气严寒，刺骨寒风从山间吹来。所以我们劝请首相留在飞机上同我们商谈。

我原以为是一道很不好过的难关——但是丘吉尔襟怀洒落，虽然谈不上修养有素。两小时后（其间亚历山大很有帮助，安东尼也是如此），回顾了整个战略、战术和政治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sup>③</sup>

我们决定进而商谈我们召开一次会议的计划。公报草案早已拟妥，我们所要作的只是把会议的召集人换为丘吉尔，并预先通知大主教和帕潘德里欧。丘吉尔、艾登等一行人乘坐一辆装甲车去比雷埃夫斯（现在已将大部分地区夺回），然后从那里去到《阿贾克斯号》护卫舰，这时曼斯菲尔德海军上将已经将他的旗帜换在这艘兵

①②③ 1944年12月25日。

舰上。

在下午7点左右我们设法把帕潘德里欧和大主教一齐接到船上，当然是乘“坚固的”车子前来的。丘吉尔决定先会见帕潘德里欧，因为他是真正的首相，这次会见，有利珀在座。所以当大主教正在甲板上等候会见，不知怎样混进水手的化妆庆祝会时，他们两个人摆脱了那种尴尬的局面。大主教并非不自然地被人误认作一个滑稽角色，而他自己对于一艘英国兵舰似乎已经为一帮脸庞漆黑、弹奏各式各样奇异乐器的人暂时接管，也不禁为之愕然。然而，一切都解释清楚了，若干星期以来一直打趣我钦佩这样一位“烦死人的教士，一位中世纪的残遗”的丘吉尔，现在象是也欢喜这位大主教了。

到下午8点，一切都作出了决定。会议将于第二天下午4时召开。会议将是小型的，但具有充分代表性，并将邀请埃拉斯游击 626 队的三、四位代表出席。大主教和希腊首相引退，大使也出去分发正式请柬，并一定要斯科比将军向埃拉斯中央委员会提出下述必要的保证：如果他们愿意出席，即准备通行证。我应邀留在《阿贾克斯号》上晚餐，并

势必要进行解释，争辩，讨论和洗耳恭听！这真令人疲惫难受，但却也颇有趣……艾登非常友好——他显然曾吃尽苦头。希腊人的国王一直顽固不化，而温斯顿又不愿对他过分施加压力。<sup>①</sup>

第二天上午大主教来到大使馆，我们把代表名单和他的开幕词草稿以及要规定的步骤检查了一遍。要是埃拉斯接受或拒绝邀请，应该怎样办，我们也都作了安排。至于谁应该出席，则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索福利斯起初拒绝出席，一则因为他不愿意同埃拉斯方面的代表会面，一则因为他不同意限制人数。人民党或保守党的保皇派不愿承认马克西莫斯是他们的领袖，而要求另派代表。

<sup>①</sup> 1944年12月25日。

帕潘德里欧开始看出种种可能的发展，所以对这个计划不太感兴趣，但也试图让他多几个朋友受到邀请。

最后，大使馆将书面请柬分送给选定的代表，我们通过各种方法明白表示，他们必须要么接受邀请而不再争论，要么承担公开拒绝丘吉尔先生邀请的责任。<sup>①</sup>

我们一则为了安全，一则为了舒适的缘故，曾劝请丘吉尔和艾登留在《阿贾克斯号》上，但是他们在午餐后来到了大使馆。我非常担心天气的严寒，生怕丘吉尔会患恶性感冒。但是在首相访问期间我总算从部队借来了几只火炉。

627 3点30分，收到了〔埃拉斯方面〕的通知，要求推迟一小时，对此我们同意了。希腊的政治家们齐集弗雷塔格内大饭店；埃拉斯的代表将被接到总部；我们在大使馆静候。会议将在希腊外交部举行，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尽可能保密。我们因为今天早晨在弗雷塔内大饭店下面发现大量炸药而已经有点震惊。〔关于会议的〕公告已于昨晚在英国广播电台按时发表。这〔在国内〕应该有良好的影响。<sup>②</sup>

我们已经作好安排，将希腊政治家从弗雷塔内大饭店送到会场。大主教来到大使馆，下午快要到5点钟的时候我们分乘装甲车两辆出发。林肯·麦克维（美国大使）、波波夫上校（苏联代表）和法国公使被邀请旁听，全都接受了邀请。我们认为这对我们是一大成功。

因为没有电灯，所以会议室由放在一个大椭圆形桌上的防风灯来照明。大主教坐在正中的座位上。在他的右手是丘吉尔，身着空军准将制服；他旁边是艾登。在他的左手是亚历山大、利珀和我。希腊人坐在对面。在桌子的一端是三位观察员，另一端的位子则留给埃拉斯的代表。开始时很冷，但是不久就靠了灯和人的热气暖和起来了。埃拉斯的代表没有露面，我们也没有得到任

---

①② 1944年12月26日。

何讯息，虽然他们的战线近在咫尺。当我们等待的时候，大炮、机关枪和步枪的喧嚣声响彻耳际。最后，经决定，没有他们出席会议照样开始，而不让会议完全失败。因而，大主教以欢迎丘吉尔的简短致词开始了会议，语句非常郑重，非常得体。然后他请丘吉尔发言。

首相讲话刚约五分钟的光景，有人大声敲门。埃拉斯的代表驾到了！

我们全体站起来。三个穿着英国野战军服的人走进来了。他们鞠躬，我们也鞠躬。大家就座，会议重又开始。大主教又把他的致词重讲了一遍。重又翻译了一遍。然后首相开始讲话，讲了二十至二十五分钟左右——加上翻译，时间当然要长些。他的讲话极妙——明确、坚定而又有说服力。他一方面使埃拉斯的心目中对我们的军事力量毫无怀疑余地；在另一方面，他也向希腊政治家们清楚表明，他决无意利用我们来推行一项反动政策。他希望和平、大赦以及对救济和经济复兴的再接再厉。<sup>①</sup>

丘吉尔进而斩钉截铁地声称，斯大林支持我们的干涉，并提到罗斯福也已同意，正如在8月间他确曾同意的那样。<sup>②</sup>这话大有裨益。如果当时我们能够公布他给丘吉尔的电报，那未始不会收很大效果。“但是总统让我们大丢面子，温斯顿伤心之至”。<sup>③</sup>然后艾登讲了几句话，中肯、谦和、而又简洁。亚历山大特出的风格十分得体讲了一席类似的话：“我愿意看到希腊旅帮助我们在意大利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作战而不是……把我所部的师旅用之于希腊。”<sup>④</sup>

然后大主教请提出问题。略停之后，马克西莫斯作了简短发言，接着就是帕潘德里欧。然后，埃拉斯的代表之一帕尔察利泽斯起立。

---

① 1944年12月26日。

② 丘吉尔：《胜利与悲剧》，第99—100页。

③④ 1944年12月26日。



他是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书记——一位具有极端的、热狂的共产党见解的教授。一个相貌端正的人，满脸讨人欢喜的笑容，一口美丽的皓齿，语调安详镇定，一副老实模样。另两位代表是共产党的书记西安托斯那个令人讨厌面孔如鼠的人和那位相貌端正、颇有英国人风度的曼塔卡斯将军——一个身材魁梧的克里特岛人。<sup>①</sup>

帕尔察利泽斯谦恭有礼，口齿伶俐。他欢迎丘吉尔的举动，自称代表希腊广大人民并希望英、希之间的和平。

629 我认为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尤其是想到了这些人对我们的军队和希腊全国无辜同胞所犯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但是，丘吉尔却深受感动。<sup>②</sup>

索福利斯于是提出了代表权的问题，艾登解释说，我们只是在非正式基础上召集若干人开会作为一个发端。我们认为最好让会议的人数少一些，但是他们当然可以自行决定，并互选他们所希望的任何人。丘吉尔于是起立，对他们所讲的一切表示谢意。

由我们所创始的这次会议现在将完全交到希腊人手里。“我们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你们应该竟其全功！”我们于是走出，由首相带头。当我们绕着桌子走向门口的时候，我们同所有代表一一握手，包括埃拉斯的代表在内。外国观察家同我们一起走出来。首相直接去到船上。我们离开时大约是6点30分。<sup>③</sup>

当我偕同卡奇亚回到大使馆时，在体育场附近的一场战斗中炮声隆隆，枪声嘎嘎。

我不认为会议能产生直接结果，但是希望能为某些事情奠定一个基础。主要的事情是要得到摄政制，因为摄政制将导致政府的一次变革，并给予全国以一般的信心。

亚历山大和我同去船上进晚餐，以便消磨另一个长夜。关于比利时的战争，蒙哥马利拍来了大量电报，这一些和另一些话题缓和了紧张气氛。但是我们所谈论的大部分是希腊问题。“幸而温

<sup>①②③</sup> 1944年12月26日。

斯顿已倾心于大主教。”<sup>①</sup> 上午两点左右我们回到大使馆。

翌日，12月27日，上午10时，大主教来访，告以我们离开后的经过情形。他们显然吵得很凶，一直继续到下午10时，于是休会到第二天。

我们从自己的来源(听听外面!)早已得到了这项消息。有一次听到普拉斯蒂拉斯将军对一个共产党人大声喊道：“坐下去，屠夫!”<sup>②</sup>

11点15分左右丘吉尔从船上来临，我们在大使馆共进午餐。 630

他心情很好，由亚历山大带往一个“观察哨”，从那里可以俯视全城，并对正在进行中的战斗得到一个概念。当然，这件事是一种“超级悉尼街”，他十分欣赏有一位军事艺术大师向他说明整个问题。<sup>③</sup>

午餐后，美国大使麦克维晋见丘吉尔，这次我不在座，但是从他离去时的神态可以清楚看出他已经得知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真实情况。于是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一部分“不作纪录”，一部分“作了纪录”，会上丘吉尔和艾登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会后，大主教又来，把情况告诉我们。会议休会到下午4时。在这期间，埃拉斯的代表们要求私下会见丘吉尔，对此，他在大主教极力劝告下，复函婉谢。

温斯顿很想会见他们，但是我劝他(安东尼也同意)，我们要是把赌注押在大主教身上，那我们就应该让他采取他认为最有利的行动。温斯顿一则想作为一个好的新闻记者来会见他们，一则因为他具有一种可爱的、但有时危险的天真。他认为他能够把他们争取过来。但是我认为他会更可能受骗和被出卖。<sup>④</sup>

当丘吉尔和大主教在那天下午会晤的时候，我们试图劝请他们利用这幢房子的地下室或后间，因为那里安全。但是丘吉尔坚不同意。我现在可以看到他们：大主教戴着他的大兜帽，穿着长袍，丘吉尔身着制服，两人靠在推到大使书房尽头靠墙的沙发上，

① 1944年12月26日。

②③④ 1944年12月27日。

他们认为那里是枪弹打不到的。然而，他却欢喜那已经破碎、但修补起来的窗户以及那面墙上的累累弹痕。

631 因为埃拉斯的要求高到不可容忍的程度，所以简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因而大主教暂且休会。显然，在摄政制决定以前，无法前进一步。丘吉尔已经亲自看到了这种情况，现在同意了我们对这个问题所作的估计。所以，利珀和我去看帕潘德里欧，促请他代表整个政府致电国王，报告会议一致赞成建立摄政制，并相应提出正式建议。经过商量之后，帕潘德里欧同意了。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我们同大主教保持接触——当然得知他已经发表了一项公告，包括这三点——以及第4点，即帕潘德里欧已经在今天上午提出辞呈。对这位选定的摄政的确无瑕可击。<sup>①</sup>

11点30分左右我回到船上汇报。

丘吉尔越来越欢喜大主教，但是对于他拒绝和埃拉斯的代表作私人会见，仍然很着急。<sup>②</sup>

第二天，我们已经商定在下午1时飞返那不勒斯。但是亚历山大，利珀和我一早就被召唤到巡洋舰上。我们发现丘吉尔仍然为埃拉斯的代表而忧心忡忡。他想再留一天，召集另一次会议。他不喜欢没有得到和约或休战就回国的这种想法。我主张他立刻回去争取摄政制。这会是对希腊的一个贡献，但只能在伦敦完成。最后，为解决问题，经决定发表一项公告，由英国政府对摄政制公开承担责任。我们终于离去，在下午晚些时候到达了那不勒斯。

就这样戏曲性地结束了希腊叛乱的第一个阶段。雅典的危局渐告结束。下一步将是停战协定，然后也许是和约。这位不屈不挠的老人，不惜冒对自己健康，甚至对自己生命的严重危险，为所有这一切作出了无比的贡献。六个星期之后，他将接受这个雅典古城中任何外国人一向未受到过的盛大欢迎。

<sup>①②</sup> 1944年12月27日。

## 第二十三章 希腊的叛乱

632

### 2. 缔和

现在我回到了罗马，住在帕里锡别墅，也就是约翰在皮阿门外诺曼塔纳街上为我弄到的那幢房子里。这幢房子又宽敞又暖和，并有极好的浴室，但是一种摹拟法国式样的建筑，到处镶嵌着金边和镜子，想象不到的难看。不过对我们非常合用。我们在这里度过1944年的除夕。自从我在地中海着手这项没有经验的事业，至今已经整整两年了。1943年1月1日上午1时约翰、坎贝尔小姐、威廉斯小姐和我从康沃耳动身前往阿尔及尔。我的工作班子的其他成员有的已经来到，有的已赴任他去，他们是：鲍勃·狄克逊；给了我十八个月得力帮助的罗杰·梅金斯；现在充任我驻雅典代表的哈罗德·卡奇亚；现仍和我一起在意大利的亨利·霍普金森；留下和达夫·库珀在一起的帕特·赖利；只同我共事一、两个月的吉姆·鲍克，以及托尼·朗博尔德、基特·斯蒂尔和菲利普·布罗德。原来的一行人只剩下约翰和坎贝尔小姐了。

12月30日我们已经得到消息说，希腊人的国王终于同意指派大主教为摄政。诚然，为劝导国王采取这一步骤，丘吉尔和艾登曾经给了他若干保证，而他不是加以曲解就是滥加利用。在这些保证之中有一项是希望摄政和国王保持密切接触，“并听从他的谕示”。随即开始清楚看出，麻烦跟着就要来了，尤其是关于那项据说的保证：在任何新政府中决不延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任何代表。

在这期间，我认为摄政制是一个真正的收获：

首先，这是一种行动；当政治局势已经陷入“僵局”时，重要的是要 633



动。我非常希望大主教任命的新政府能够突人民族解放阵线的阵地，把温和分子同极端分子离间开来。<sup>①</sup>

而且这是我们在有别于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所能作出的唯一贡献。这正是何以利珀和我在伦敦那样不惜唇舌，反复力争的。

温斯顿的访问已经使他深信“国家元首”既确有必要，达马斯基诺斯大主教也人地相宜。安东尼则早已被说服。现在就要靠我们去指导大主教了。<sup>②</sup>

虽然我在意大利有很多公事要办，但是在下一个阶段上经常前往雅典乃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保证：总司令、大使和我始终采取同一方针，如果有什么分歧，我们须自行解决而不让伦敦方面得知。虽然也有一些尴尬的时刻，但这个主要目的是达到了。

在任命了摄政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政府。经过反复磋商，普拉斯蒂拉斯将军在1月4日接受了首相职位。普拉斯蒂拉斯起初一直不情愿；继而，象所有的将军一样，又高估了新国民军的需要和英国方面供给它以他们所要求的装备的能力。他一上来就要求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要完全由我们来装备。但是在摄政的英明而有效的影响下，普拉斯蒂拉斯放弃了这个条件，于是一个新政府在广泛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了。财政这项几乎无望的工作交在乔治·西泽里斯这位相当有经验的韦尼泽洛斯派手里；外事，包括报刊管理在内，则托由可靠的最精干、最明敏的人士之一伊奥安尼斯·索菲阿诺普洛斯负责。

埃拉斯游击队现在开始迫使斯科比将军停止战斗，他们在泽夫戈斯领导下的代表团甚至声称他们已经接受了斯科比将军的条件。但是，象往常一样，他们提出了其他许多问题，诸如山地作战旅和宪兵队的前途这类问题，所有这些斯科比都非常适当地声称应由希腊政府去决定。摄政拒绝会见代表团，但是以书面表示“对

<sup>①②</sup> 1944年12月31日。

他们准备就停止敌对行动进行商谈”一事感到高兴。在这期间，菲利普·布罗德从卡塞塔打电话来转达亚历山大的话说，斯科比和利珀打算撤回休战条件而向埃拉斯游击队提出最后通牒。

我反对这个意见。我们应该听其自然，让局势稍稍有所开展。布罗德后来回电给我说，外交大臣同意我的看法。<sup>①</sup>

因而有指示送达雅典。

同亚历山大略事商量之后，看来最好是我到希腊去一趟。1月4日迟暮，我到达大使馆。我发现大使形容憔悴，但是看到我很高兴。我们正要就寝，斯科比将军打电话来，对伯罗奔尼撒半岛，尤其是对佩特雷形势的恶化，表示关切。在港口外《猎户星座号》舰上的曼斯菲尔德海军上将和驻扎该口的旅长亨特准将送来了令人沮丧的报告。我最后同意电告亚历山大。显然我们不能不要么撤出佩雷斯，将我们的部队和忠诚的游击队一体转移，要么就增调援军。

第二天风传埃拉斯游击队领导人愿意前来谈判休战协定。我们决定坚持我们条件，而把其他任何问题都交给希腊政府处理。傍晚我往访摄政，他完全同意这项方针。然而，那天下午埃拉斯游击队的代表没有来。可是陆军元帅却来到了。

他足智多谋，似乎很高兴能够在这个阶段上前来。关于佩雷斯，他已经接受了我的看法，已经从意大利调来了一个旅和一个装甲团。但是在11日以前怕不能开到，要有一段令人为难的间隔时间。<sup>②</sup>

他还携同梅因沃林准将那位足智多谋而又经验丰富的军官来接替斯科比的现任参谋长。梅因沃林在这段风波的整个下余期间，证明是一个有手腕、有力量的突出人才。此外，亚历山大把霍克斯沃思将军的职权扩充到不仅仅包括雅典，而且把希腊的一切军事行

<sup>①</sup> 1945年1月2日。

<sup>②</sup> 1945年1月5日。

动都包括在内,因为我们正开始为萨洛尼卡而忧心忡忡。

1月6日,为拟订下一阶段的计划花了一上午的时间,因为军事形势正在迅速好转。我切盼希腊政府

能处理一向成为争纷之主因的所有问题(山地作战旅、神圣营、宪兵队、警察、通敌分子的清洗、大赦等等),并从而把共产党完全孤立于民族解放委员会一般支持者之外。<sup>①</sup>

虽然这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希腊军队的改组,但这却是一种有用的运用。午餐后,亚历山大、利珀和我出去散步。

雅典的整个气氛变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所有居民都出来散步,晒太阳,而在两、三天以前,那些地方甚至连去看一看都是危险的。我们一路走到体育场,遍历伊利苏斯河对岸各区,这些地方,上星期叛军还顽强据守,并且经常从那里向耽在大使馆里的我们开枪射击。<sup>②</sup>

陆军元帅是差不多大家都认识的。军人当然敬礼,平民也脱帽或挥手致敬。看到人们在现已称之为“第二次解放”中的那种欢欣鼓舞之情,却是意想不到的。

我现在开始感到斯科比将军原来的休战条件大部分已经过时,如果埃拉斯游击队突然予以接受,我们会显得愚不可及。我们只要求他们从雅典撤到阿蒂卡的边界上,并在雅典放下武器。但是现在他们已被逐出雅典,而且不久将被逐出阿蒂卡。

636 虽然原来的休战条件在初提出来的时候(12月12日)是合理的,虽然嗣后我们也一直坚持,但是现在这些条件却非常不合时宜了。<sup>③</sup>

何况还有战俘和人质的问题。所以我草拟了一项撤销休战条件的公告。我自然征询过亚历山大和大使的意见。作为新闻专家的奥斯伯特·兰开斯特又为了英、美新闻界而加以修饰润色,斯科比将军欣然同意。第二天我们举行英国记者招待会,会上我对我们撤回目前休战条件的理由试图加以解释。

---

①②③ 1945年1月6日。

我希望他们不会太抱敌意。显然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了解真情实况。即使他们发送通情达理的报道回国,大多数编辑也会不予刊登。<sup>①</sup>以斯科比的名义发表的声明着重指出,自从原条件提出以来,形势已经有了变化。现在有了一个摄政和一个新政府,保皇派的政变再也不用担心了。虽然双方都获有战俘,但是埃拉斯游击队拒不准许红十字会访问他们的战俘营。另外还有违反文明战争规定而掳去的平民人质的问题。斯科比将军前此为休战提出的两项条件现在不能不认为已经撤销。但他总是会为谈判条件作好准备的。

然后我们开始考虑取代旧有休战条件的适当条件究竟应该是什么,以防斯科比会被问到这一点。埃拉斯游击队继续作出多少有点半心半意的尝试,来同我们取得联系。

今天下午有一个人骑着三轮摩托车来到美国大使馆,但是他的全权证书似乎多少有点暧昧不明。<sup>②</sup>

所以时间是不容耽搁的。我们一致同意新休战协定必须要求

把分界线再往前推,并要求在这条分界线以东和以南——即沃奥蒂阿、阿蒂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全境——以及在基克拉迪群岛的埃拉斯游击队部队一律解除武装。这就使我们可以加强我们在萨洛尼卡中的地位。<sup>③</sup>

在我们对一切取得一致意见之后,陆军元帅和我回到那不勒斯。雅典和阿蒂卡之战现在就要临到最后阶段了。 637

丘吉尔对于我们没有征询伦敦的意见就撤销斯科比的休战条件,看上去颇为恼怒。但是那位“骑三轮摩托车人”的插曲却使我们对自己未失机宜引以为慰。略事商量之后,亚历山大和我决定不答复丘吉尔的电报,因为我们认为局势很快就会明朗起来。实际上,到1月10日,我们已经分别从利珀和斯科比方面收到了若干颇令人兴奋的电报。一个妥善组成的代表团现在已经偕同泽夫

<sup>①②</sup> 1945年1月7日。

<sup>③</sup> 1945年1月10日。



戈斯等人到达。将军和大使要求授权提出我们留交他们的休战条件。因为他们已分别致电伦敦和卡塞塔两处，所以事情变得颇为混乱。而且，虽然他们在日间对这些条件似乎十分高兴，但是到了午夜，他们却又要把条件提高了。他们想要以下述的方法来提

把分界线推后到包括拉米阿和沃洛斯在内，而且还包括从萨洛尼卡的撤退。经过商量之后，亚历山大和我决定同意萨洛尼卡，但是不同意再向北推进……到沃洛斯和拉米阿，并致电伦敦和雅典。<sup>①</sup>

最后，在1月12日凌晨，接到电报说，休战协定已终于签字。其中只有一项删除。虽然战俘将进行交换，但是共产党人断然拒绝交出他们所掳获的平民人质。利珀和斯科比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决定不予坚持。埃拉斯游击队下定决心宁使谈判决裂也决不同意。在我看来，我们代表的决定是正确的，虽则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诚然，敌对行动继续下去会加诸埃拉斯游击队以更大的损害，但是我们未必能使平民人质归来。人质将要么身遭杀戮，象成千上万的人已经遭受到的那样，要么被带到越来越远的地方，说不定会劳累而死。最好是能立即缔和，而把归还人质的问题作为随即举行的和平谈判中第一批项目之一提出。普拉斯蒂拉斯怒不可遏，摄政深感不快。大主教在一项公开宣言中声称，共产党拒绝释放无辜男女，听闻之下曷胜震惊。但是他并没有撤回一致同意的和解建议。

如果埃拉斯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们能够帮助重新建立法律和秩序，象在一个文明国家法律规定下应有的情形那样，他会欣然促成他们和希腊政府代表之间的会谈。<sup>②</sup>

这样，休战协定终于达成。

已经进行了五个星期并由我们的士兵逐街逐巷进行的雅典争

---

① 1945年1月10日。

② 利珀：《在希腊人会晤希腊人的时候》，第134页。

夺战，现已告一结束。起初混淆视听、易致误解的国内舆论，已开始渐渐认识到事关成败了。他们对于曾经把它视为爱国主义者的这支武装力量，没有再比在人质这一问题上使他们对其更厌恶的了。从家里拖出去数英里之外，惨遭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暴行，其人数约一万五千到两万名之多，在这些不幸的人中，有老有少。此外，在埃拉斯游击队占领期间在雅典及其郊区所犯下的暴行，在此后几天中也都揭露出来。单单在佩里斯特里一区，惨遭杀戮的人就有一千五百名左右。在沃尔特·西特林爵士率领下前来的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团至少看到有二百五十具尸体从他们被投入的沟渠中拖出来，待人认领。正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这些人都是有组织的谋杀的受害者，都是在一个没有发生战斗的地区中一些秘密地方处决的。许多是双手捆在背后被枪毙的。出诸这样一个工会领袖的著名团体之手的这份报告书，大有助于使英国人民了解真相并为之震惊。

当时我将一些总的感想记录如下：

1月11日。在考虑希腊事态时，我……认为——除希腊共产党这些阴谋者外——希腊人的国王也是一个道地的坏蛋。远在1943年冬季在开罗的时候，他就很不老实。要是当时他能写一封词义明确的信（而不是一封词义含混的信），言明在应人民票决的号召之前，他不会回国，那么这项反君主制宣传的有力武器原不会为极端分子所利用。应该记住的是，在希腊差不多总是君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平分秋色。国王一直是一个党的首脑……而不是国家的首脑。韦尼泽洛斯的传统是类似共和主义者的——并且是亲英的。

但是这种分裂的悲剧一面是，使得资产阶级政党互相倾轧而不是团结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争执点将不是君主主义对共和主义，而是自由和民主生活方式对“左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警察国家。

再者，如果国王在黎巴嫩会议之后提出一项坦率的保证，那么帕潘

德里欧的地位——一反那种暧昧的、易致误解的情形——未始不会是稳固的。……

甚至在亚历山大和我在12月11日到达雅典之后，要是国王立即接受了我们的联合建议，而不把前三个(星期)浪费在无益的讨价还价和阴谋诡计上……，我想大主教也许就能在那个早期阶段上制止战斗。单单有他作为摄政，也就未始不会至少防止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埃拉斯游击队的支持者那样大量的团结在西安托斯和共产党的极端领导之下。<sup>①</sup>

甚至在休战协定之后仍然有一段长路要走，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旅程上已经步过了一个重要的——实则成败攸关的——里程碑。

第一个阶段是被围。当时，我们在军事上所能作的只不过是采取措施，以避免另一次喀土穆。在政治上我们所能作的就是去掉国王——消除一个争执的问题。……这是温斯顿访问的一个成就。第二个阶段[是]最后肃清雅典和把叛军追击到无险可守的地方[并]以休战协定作为结束。我们现在必须为第三个阶段作出军事和政治计划。我们必须试图将休战协定转变为和平条约；我们必须为万一不能得到和约而作出正确的军事部署。……如果亚历山大和我依然使用我们向来所设计的制订政治军事联合计划并以我们两人的名义送致英王陛下政府的那种方法，我认为我们也许能有所成就。现在我们的困难当然是在希腊政府方面。……普拉斯蒂拉斯——希腊的克伦威尔——想要把叛军打得一败涂地。但是(正如德国人所发现的那样)，他们一旦退到山间，那就不那么轻而易举了。无论是我们在对德战争中的军事义务承担还是英国的舆论，都不允许我们打到底。……埃拉斯一直扣留着希腊的人质。我固然为这些人难过，但……这却将证明是我们的一个有利武器。这在国内给埃拉斯游击队以政治上不利的影 响，并使我们能以普遍大赦的必要性来劝说希腊政府。<sup>②</sup>

斯科比将军对于不曾给他以几个星期，甚或几天的时间去打垮埃拉斯游击队，不能不感到遗憾。他担心他们会静以观变，然后再卷土重来，而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休战协定于1月15

① 1945年1月11日。

② 1945年1月12日。

日上午1时生效,并且在最后一、两天又取得了新的进展。希腊政府曾经向斯科比将军提出正式要求,请为恢复希腊的法律和秩序,作好必要的军事部署。但是这时意大利战役的最后阶段即将开始。所以对我们在希腊的努力加以限制是至关重要的。凡是我們所能给予他们的军事装备,我们无不愿提供。不幸,我们甚至在这方面也得不到美国的任何帮助。但是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专心致志于缔和,把休战协定变成为比较确切、比较持久的东西。

因而在1月16日,亚历山大和我再一次动身去雅典。利珀、卡奇亚、斯科比、陆军元帅和我作了充分的商讨。大使对于希腊政府接受我们方案的可能性颇抱悲观。照我们的惯行办法,亚历山大起草了一份致丘吉尔的联名电报的军事部分,而政治部分则由我执笔。电报拟妥,于1月17日凌晨以急件发出。<sup>①</sup>电报的主要目的是促请立即开始谈判并提出一恢复和平的宽大基础。人质的 641  
释放和所有希腊部队的解除武装是政府所要求的最重要之点。作为酬答的是,大赦问题必须加以正视。争论纷纭的山地作战旅和神圣营可以打碎,以之作为国民军的骨干。选举问题和君主制之争可以搁置到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建议我们应该要求尽速指派参加和谈的代表。如果谈判失败,休战协定即宣布作废。但我们所提条件的性质是宽大的——也许过分宽大了——所以拒绝和平的人会被暴露出来,而自蒙其害。虽然在希腊全境采取任何大规模军事行动是非常错误的,但是靠我们所能调度的部队还能有所作为。事实上,我们所提的建议,就是在三个星期之后签署的瓦尔基扎和约的基础。

17日,亚历山大和我花了一天的时间视察部队之后,往访大主教。我们的目的是争取他对我们计划的支持。

陆军元帅一开始就对军事前途作了颇带失败主义气息的叙述。他

<sup>①</sup> 这份电报作为附录3转载于后。



强调了在山区进行军事行动是如何艰巨，如果必须以武力肃清叛军的话。他考虑到有抽调几师兵力去意大利以至去西线的必要，他也解释了何以必须把他在希腊承担的军事义务减至最低的限度。<sup>①</sup>

说这番话的目的是要使希腊的态度稍稍收敛一点。但是大主教并没有作出非常有利的反应。我于是阐明了我的政治主题，而在这方面也颇遭白眼。

尤其是关于“大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公式，就是把所有具有武装反抗政府之罪的人一律包括在大赦之内，至于那些有着杀人、强奸、抢劫等罪的犯人，应由一切有威望的军事法庭惩处，不在此列。<sup>②</sup>

在其他各点上，尤其是关于会议的问题，或关于召开会议的提议，  
642 我们却取得了进展。但是，从平民中掳获人质和拒不把他们交出作为休战协定的一部分，引起了极大的愤激。

要不把交出人质作为会谈的一个先决条件，要劝说他的政府同埃拉斯游击队进行会谈，他会发现那是大非易事。<sup>③</sup>

但是，我们详细研究了所有势非解决不可的问题，如果会议的确举行的话——日期、地点、组成、主席等等。大主教同意宁以索菲阿诺波洛斯那位比较有灵活性的谈判者而不以普拉斯蒂拉斯来领导政府小组。总起来说，这是一次不错的会见，我认为满意。

翌晨，指派戈纳塔斯担任马其顿总督的任命发表了。他是普拉斯蒂拉斯的老友，据说是希腊最干练的人员之一。但是，不幸他同过去由德国人招募和武装起来的“保安营”有所牵连。所以，当亚历山大和我去看普拉斯蒂拉斯时，我留下陆军元帅去同他举行纯军事商谈，而要求普拉斯蒂拉斯于商谈完毕再来大使馆。

陆军元帅的谈话显然对他是有影响的。但是我很担心将军已列进了“伟大领袖”之类的人物了。他的态度毋宁是“只要给我一支装甲纵

---

①②③ 1945年1月17日。

队，让我使用三天，我就可以将他们解决”。（这种作风是纯吉罗式的！）这使得亚历山大感到为难，他试图说明机械化部队在山区难以施展，而又缺乏骡子、山炮等等。……但是亚历山大一定给了他一个深刻影响，因为……经过一小时的谈话（通过翻译），他同意了我们的所有各点。这些都及时汇报到伦敦，对温斯顿和安东尼应该是有帮助的。不要戈纳托斯；〔而〕要为大赦提出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公式。<sup>①</sup>

在此后几天中，索菲阿诺波洛斯证明是很有助益的，一切似乎都走向会议的开幕。但关于会议的组成却发生了若干问题，特别是由于一个叫作埃尔兹(ELD)的社会主义者团体的一些代表的蒞临。他们在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已经同左右民族解放阵线的希腊共产党这个纯粹的共产党组织决裂了。这些人由一位叫齐里莫科斯的绅士<sup>643</sup>为代表，此人似乎引起了我们政府的朋友比共产党人自己甚至更大的厌恶。

就会议问题所进行的初步谈判是令人厌烦的、劳神费力的。谈判拖延了很长一段期间，我因为急于要尽速返回意大利，变得多少有点不耐烦了。唯一的消遣却将得之于我同希腊各形各色人物的多次谈话中：

……索菲阿诺波洛斯、佩里克莱斯·拉利斯和马克罗波洛斯是政府内定的三个代表。索菲阿诺波洛斯是一个聪明人——另两个则沉默寡言。我们研究了整个问题，在政府方案的内容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在战术方面，希腊坚持要知道，如果会议失败，而只能以武力解决的话，那我们究将给予多大支持。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有充分的支持，他们将在会议上采取比较强硬的方针——他们认为这是唯一成功的希望。我答应考虑一下再告诉他们。<sup>②</sup>

我最后通知他们说，在我看，英国方面

现在应该发表一项公开声明，宣布如果会议失败，我们将以我们的全部军事力量支持希腊政府。我们应该补充一句，希腊政府将提出很有助于

<sup>①②</sup> 1945年1月19日。

和解的和豁达大度的建议，建议应和我们磋商之后再拟订出来。我想这个方法是唯一的途径，使我们有机会把停战协定变成和平条约。有一点示弱则只会使埃拉斯游击队更加不妥协。①

1月20日关于希腊问题的辩论在下院进行得很顺利，表决也是令人满意的。

我得到的印象是：在国内，工党毕竟不敢那样确信希腊真正是一个适合于攻球的三柱门。但是（可惜）下院的一次顺利表决并不解决我的问题。这反而增加了问题，因为这有助于使希腊人趾高气扬起来，并对我要求和解的论据发生疑问。……幸而，我认为大主教是非常通情达理的，不致因为这类的考虑而打乱了他的步骤。②

644 21日我回到那不勒斯，但是不幸，1月25日新的风波又起。关于代表问题，一直不能达成协议，卡奇亚警告我说，会议纵使开得成，怕也非大大拖延不可。所以我再一次动身去雅典。我担心（希腊）政府会把球打得太远了。

而且英王陛下政府既经同意我的要求，答应给希腊政府以充分支持，我担心〔希腊人会〕试图过分逼勒我们。他们自然希望我们用我们的军队乘胜追击埃拉斯游击部队而把他们一举歼灭。但我们所希望的却是一件和约——如果这是人力所能及的话——以便把我们的大部分部队尽速撤出来。③

我到达之后，大使就向我说明了总的形势。至于埃拉斯游击队究竟派头头还是派助手参加会议，仍然有一番颇为枯燥乏味的论辩。但是，结果，靠了非常巧妙的手腕，大主教得以如愿以偿，共产党在他们的代表团中至少列进了他们的两名领导人。但是预备会旷日持久，令人颇不耐烦。唯一的好处是我能乘机处理一些其他的问题。关于供应和财政问题有一些有益的谈商，在恢复秩序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普拉斯蒂拉斯将军虽然不愿意取消戒

---

①② 1945年1月20日。

③ 1945年1月25日。

严，但是由于同意让检查官行使一定的真正权力和逐渐将监狱腾空，因而事实上已经使戒严失去了它的效果之一。

在等待下一阶段的时候，我认为去看一看希腊其他各地的情况将是有益的。所以在1月26日我飞往佩特雷，那里的局势曾经使我们担了不少的心。我有那架米切尔式轰炸机可供调遣，因而作了一次顺科林斯湾而下的奇妙的飞行。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科林斯湾比今天更美丽了。帕尔纳索斯峰积雪未融，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崇山峻岭矗立于南岸，允称奇观。在飞过伊泰阿时，我们可以比平常更清楚地看到阿姆菲萨和泽尔菲的山峰。今天天气晴朗，但有霜冻。①

飞机场——在佩特雷以西车行约一小时的地方——在风波以前曾经开放，但是后来又废弃了。在叛乱期间我们在佩特雷只驻有一个旅，而且是处于脆弱的地位。周长很小，群山环峙。但是，我们扼守港口地区，港外的巡洋舰给部队以相当信心。我们驱车所过的乡野都是富庶、平坦而又丰饶的——盛产小麦、柑橘、柠檬、葡萄和类似的作物。我们停下来同几名英国士兵和几名希腊国民军攀谈。

我看到一些家禽和相当多的火鸡——但是我们后来听说，瞒过了或逃过了德国人之手的大部分劫遗都被埃拉斯游击队在他们撤退前席卷而去。②

我们受到前驻巴勒斯坦外事人员尼科尔先生的欢迎。他曾经被暴力团击穿肺部。尽管年事已高——近五、六十岁，但是现已康复。他这时担任临时领事。之后我们前往军事联络总部。

这是一个分配救济品的组织。它将由善后救济总署来接替。……在这期间，这些英国官员同骇人的困难进行着勇敢的搏斗。第一个问题当然是在埃拉斯游击队的占领区怎么办。我们是否要在那里进行分配呢？一方面，人民嗷嗷待哺；另一方面，救济品几乎无疑要立即被叛军夺

①② 1945年1月26日。



去。①

已经取得了某种折衷方案。凡是能够进行物物交换的地方——也就是，凡是能以一条小船运进面包、面粉、糖和其他必需品而运回橄榄油的地方，都准许进行这种货物交换。

我们在北非和意大利早已看到过的那些问题，现在又在希腊渐渐呈现出来。我们所面临的是

646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所发展的为生活所必需的资源，几乎全面遭到破坏。所遇到的难题总是一样的。不是没有动力，就是没有机器、没有原料、没有劳动力或者没有现款（我的意思是说硬币——里拉或德拉克马）。如果所有这些生产要素万一能够在一时一地配备齐全，那倒是一个奇迹。而如果这种奇迹（并非不常常取得）不是及时的、自动的，那么，英国军事当局就要遭到猛烈的批评和抨击——在当地固所不免，而在国内却还要刻毒得多。……②

亨特准将那位具备必不可少的圆到、坚定和坦率于一身的优秀青年军官，在最险恶的时候曾经扼守佩特雷，但是他一定有过一些焦虑的时刻。午餐后，我看到市长或州长。我们所有的官员似乎都欢喜他，切盼能让他留任。我答应作出安排，让他不必逊位；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在返回雅典之后办到。皮尔戈斯的形势几乎更糟。尽管缔结了休战协定，但是埃拉斯游击队并未撤出，因为这里无路可通，所以非靠海军帮助我们不可。

皮尔戈斯的农民非常富足（照希腊通常情形来说），埃拉斯游击队似乎把他们所能拿到的一切全都席卷而去——牛、羊、家禽等等。③

我回到雅典，希望同沃尔特·西特林爵士及其一行人等会面，共进午餐。但是，除开全国铁路员工工会的约翰·本斯特德之外，他们所有的人都由于辛勤工作而精疲力竭，无疑更对所看到的情况而震惊。

---

①②③ 1945年1月26日。

第二天，我想去克里特岛一行是有益的。前一夜我给驻在那里的一支小小英国部队的指挥官送出信息，希望能派一辆小轿车或吉普车来接我们，并举行一次野餐。实际上，我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豪华而热诚的款待。这一天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因为飞行得相当低，所以群岛的壮丽景色一览无遗。我们稍稍东转以避免仍然在德国人手中的米洛斯。

我们把纳克索斯留在我们后面了——因而想到了被放弃的可怜的阿里阿泽内——继而高翔天际，飞行于一层薄薄的云雾之上，积雪覆盖的雄伟的伊达山的峰峦一一映入眼底。<sup>①</sup> 647

我们在伊拉克利翁附近的一条狭长地段上着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看到了有大批的人和车辆在等候。我受到了热烈掌声和响亮号令声的欢迎；这我才意识到此次克里特岛之行的确是令人难忘的。管辖这个岛之半的省长帕佩奥安尼斯先生前来迎接。

帕佩奥安尼斯是他的人民之父——一位英雄本色的克里特岛人物——克里特岛的一位伟大酋长，满头白发，在山间耽了三年，曾率领他的部族人并肩作战。他戴了一顶黑色的克里特便帽（类似苏格兰高地帽），实则并没有垂在前额的那种奇怪的流苏（象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姑老太），而是一种绷带式的，有一边卷起来，看上去象一顶弗利治亚帽。<sup>②</sup>

克里特岛的形势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在岛的东端有一万名德国人关在一种自愿的俘虏营中。我曾经受到卡塞塔军事干部的警告，不要鼓励他们投降。否则根据战争章程我们就有义务给他们以衣食，而在现行条件下，这一点却无法作到。帕佩奥安尼斯切望：要么任由德国人挨饿，要么由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予以肃清。这似乎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继而我被介绍给军事总督、当天成立的新国民警卫队的队长、市长、忠诚的游击队埃奥克(EOK)的首脑、希腊海军主管官以及

---

<sup>①②</sup> 1945年1月27日。

最后在克里特岛工作将近三年的英国联络官史密斯—休斯少校。这时，已经形成了前往城里的一大队人。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其中有各种不同年龄和类型的男男女女。我乘坐一辆借自当地大主教的敞篷轿车，车上飘扬着一面带有十字架和其他宗教标志的漂亮黄旗。

648

一到海拉克利翁的主要广场，我们就被带进一个市政厅或市政府之类的地方。街上人山人海。似乎倾城而出。沿途各地列有仪仗队——仪表堂堂的土匪，络腮胡子、黑色克里特帽和一副非常怕人的面貌。有时这支新组成的国民警卫队穿着比较正统的英国制服，我们就停下来检阅。在穿过欢欣鼓舞的群众、鲜花和亲吻而进入市政厅时，我被一一介绍给另一些社会名流和官员，有俗界人士，也有僧侣。<sup>①</sup>

大主教照例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给人印象之深几乎不亚于雅典的大主教。多次的白兰地祝酒。继而我被推到阳台上去向时时增多的人群讲话。

这一切都颇为可笑，因为虽则他们自然一个字听不懂，但是我认为尽量把声音放高是有礼貌的。译员的声音却不很洪亮。要是倒过来那就好了。但是，人人都欢天喜地，我[讲了]几句希腊语作为结尾。<sup>②</sup>

我讲完，接着是帕佩奥安尼斯感动人心的讲话，之后，我们走出市政厅，一路在掌声和鲜花的新风暴之中驱车至克诺索斯。上一次我在克诺索斯是1930年偕同通常的一批英国学者和希腊响导在一艘“希腊巡洋舰上”，这一次则是在一批威武堂堂的克里特岛人的扈从之下，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用手提机关枪和子弹带武装起来的。我们回到海拉克利翁进午餐。帕佩奥安尼斯先生为酒食菲薄深致歉意，因为节目是在那样匆匆情况下安排出来的。

但是，我们有小吃——通心粉——羊肉片蔬菜——猪肉土豆——糖蜜布丁——咖啡，所以我们吃得并不太坏。在午餐开始前，我们还有大

---

①② 1945年1月27日。

量的克里特岛美酒——很象午餐红葡萄酒——当然还有“乌佐酒”（一种伏特加之类的酒），以及黑橄榄和饼干。就一个仍部分为德国人占领的饥馑小岛来说，已经很不错了！<sup>①</sup>

午餐后继之以更多的游行行列和访问。在飞机场又是一番讲话，<sup>649</sup>而且他们不顾我的反对，坚持把几箱酒、几筐橄榄和其他美味食品装进我的飞机。

我回来之后，关于出席会议成员问题的辩论仍未了结。我认为，除西安托斯本人必须出席外，其他都不相干，我总算说服了大主教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努力。

29日，因为仍然没有得到叛军总部方面的任何消息，我驱车前往提弗，在那里我找到了统率第七师的沃德将军。

他坚持我们继续向卡尔基斯（在埃维厄岛上）进发。……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从一路至海的小径上望去，景色壮丽异常。在卡尔基斯我们找到一位主管这个地方的年轻旅长，名叫休史密斯。虽然根据休战协定，这个地方在名义上是我们的领域，但是迄今还没有一位希腊政府的代表（作为县长或州长）露面，而这位旅长会同由叛乱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组织的联合委员会，把这个地方似乎管理得十分成功。<sup>②</sup>

这位军官因为想到他不久可能不得不把职务移交给一位希腊官员而感到痛心，因为他已经组织了渔业、救火队、邮局和电话系统，并且颇以这类不寻常的任务为乐。

1月30日，仍然没有答复，于是我决定去萨洛尼卡。哈罗德·卡奇亚和我偕以俱往。米切尔式飞机出毛病了，所以我从陆军军械部借了一架看上去很合用的惠林顿式飞机。在萨洛尼卡，我受到了洛维特准将和拉普总领事的欢迎。这两个人在整个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一直干得非常出色。我们只以少量兵力抗击埃拉斯游击队的庞大的、装备精良的部队。幸而，埃拉斯游击队的维尔卡

① 1945年1月29日。

② 1945年1月30日。



齐斯将军那位海盗兼冒险家，是一个可以发生和保持合理关系的人。他曾经是一个正规军军官，在第一次大战中获有三等殊勋勋章。靠了意志坚决和态度谦和而避免了一次危机。甚至在雅典之战最凶险时期，萨洛尼卡的埃拉斯游击部队依然保持平静，虽则是咄咄逼人、横行霸道和令人难以容忍的。

但是这位准将了解他〔自己〕的弱点，领事也深知他的对手。无休无止的谈判，加上追溯历史漫无边际的讨论，占了整整一天——由于一天过去而没有真正的进攻，英国在雅典的处境开始有了好转，这对萨洛尼卡也有相应的影响。<sup>①</sup>

我们就下一阶段作了一些有益的商谈。

当然，萨洛尼卡的经济情况是无可救药的。我们所据守的地界有大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半径。四十万人的这个城市完全靠救济为生。这个富庶平原和整个马其顿的大部分地区（萨洛尼卡所能赖以生为的唯一地区）却掌握在敌人手中。<sup>②</sup>

我告诉飞机驾驶员说，我们必须在下午3点30分动身，如果可能的话，以便在太阳落山之前飞回。当我们到达机场时，驾驶员和机务人员都无影无踪。他们也没有为引擎的保温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而外面寒风肆虐，冷气逼人。

通过各种努力和处理，试行换用新电池等等，花了两个小时的工夫，左、右两翼的发动机还是发动不起来。（没有辅助性的自动发动机可供利用。）最后，在我们已经断了这个念头的时候，两翼的发动机发动起来了，我们终于在大约5点45分起飞。到这时，有一大批人已经登上飞机，其中大部分是准将。我们终于偕同大约十位旅客起程。<sup>③</sup>

回程的飞行甚至使我们的军界旅客都为之惊慌失措。夜幕很快降临了。我们的驾驶员虽然是一个多少有点荒唐的青年，却是一个“夜间飞行”的老手。他把我们成功地带过云层和风暴，经过了多多少少颠簸，我们总算放下心来，看到雅典的灯火了。在卡拉马基

<sup>①②③</sup> 1945年1月30日。

飞机场没有电气照明系统,而只有火把。在狂风中,这些火把一点燃就被吹灭。驾驶员盘旋空中,

寻找至少有一个恰巧出现可以照出跑道的相当长的一段光线这样刹那间的机会去着陆。最后总算成功了,在下午8点左右我们成功地着陆。<sup>①</sup>

这时埃拉斯游击队方面的复文送到了。复文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至于是否应该接受,也有过一些争论。第一天,1月31日,我们听说在西安托斯领导下,包括帕尔扎利泽斯、齐里莫科斯和萨拉菲斯将军在内的埃拉斯代表团已经偕同其他三人首途。所以我们劝请摄政和大臣们接受这种形势,除齐里莫科斯这个有争议的人物外,所有人都应该送到准备接待他们的那幢房子去。齐里莫科斯的地位确实是荒唐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似乎是,要末他自行宣布为共产党人,要末会议缩减为每方两人,要末,作为另一种可能性,另推选一个叫作塞奥斯的那位自称为共产党的人取代齐里莫科斯。最后,经过多次往返,于齐里莫科斯表示愿意去雅典探望他的祖母之后,解决办法似乎已经在望。这一切都引起我的关心,因为我确信,

如果我们不万分谨慎处理齐里莫科斯的代表资格问题,会议就会开不成。萨拉菲斯和帕尔扎利泽斯宁可回去,也不肯在这件事情上遭受一次丢脸的拒绝。在这个不相干的问题上让会议破裂或开不成,当然是一件真正愚蠢的举动。<sup>②</sup>

但是在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之前还要有许许多多令人厌烦的谈判。我不得不警告摄政说,他是会议的召集人,至少要把会议召开起来,这对他的威望,以及对政府的威望都是至关重要的。我还必须十分明确地说,英王陛下政府是否继续支持,应视希腊政府能否接受我们的劝告把会议召开起来而定。

<sup>①</sup> 1945年1月30日。

<sup>②</sup> 1945年2月1日。

结果，齐里莫科斯在可怜的索菲阿诺波洛斯几乎要哭出来的情况下，被接受了，而他也能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这一长串谈判终于在2月2日告一结束，当我同摄政握手时，他说：

我深深感谢你。你可以信赖我一定会为会议的召开而施加最大压力。<sup>①</sup>

652 这是小题大作，在当时看来，环绕着我们的颇带东方式的气氛中，那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的，并且对英国人来说令人火冒三丈的。但是，希腊人却似乎乐此不疲。

2日下午5点30分，我收到摄政的通知说，一切都已最终取得一致同意，会议将于9点钟开始。

下午7点，索菲阿诺波洛斯出现在大使馆，容光焕发，兴致勃勃。你会认为根本没有遭到过任何障碍或争论。……我仔细研究了上的讲话，为他写了一份政府建议的摘要。关于出席会议的人选之争的好处之一，就是似乎每一个人对于实质问题都失去兴趣了。索菲阿诺波洛斯接受了我们的全部建议而没有一句烦言，虽然内中有很多点都是若干星期以来激烈争论的主题（也就是，解散神圣〔营〕和山地作战旅）。<sup>②</sup>

晚餐后，我们听说会议这时正在距离雅典数英里的一个叫作瓦尔基扎的小小游览胜地的一座精致别墅里举行，索菲阿诺波洛斯按时致了开幕词。会议开始一段时间，英国人不在场。梅因沃林准将被邀去协助拟定军事细节——埃拉斯应交出的武器以及他们应撤出的那条防线。同意的最后数字是步枪四万一千五百支，机关枪十五挺，迫击炮一百六十三门，各式野战炮三十二门。军事条款并不是最难安排的。西安托斯所力争的两点是大赦问题和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政府的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他不大能坚持。第一个问题却比较棘手。

---

<sup>①②</sup> 1945年2月2日。

西安托斯坚决拒绝接受政府的大赦方式。他要求把大赦适用于所有罪行——甚至谋杀、强奸、抢劫或纵火也不例外。这当然是因为他生怕共产党保安部或恐怖帮伙之类组织的瓦解，这类组织支配着城市和乡村，而他的权力也就取决于这类组织能否继续存在。他将面临他的较好的正规部队的解除武装和瓦解。他不能再容忍丧失他的革命组织的核心。<sup>①</sup> 653

第二天我拟具了致首相的电报，要求授权以我们所有军事力量作为最后手段给西安托斯以威胁，如果他不屈服的话。下午12点30分，我应邀访问大主教。他对我建议争取丘吉尔给以进一步的支持，非常感激，但是他认为目前尚无此必要。这类谈判将不会中止。像希腊的一切争论一样，将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

在这期间，由于雅典方面进行的大规模逮捕和特别法庭的成立而爆发了另一次风潮。把审讯推迟到会议达成最终结论之后再谈，似乎要好得多。我费了相当气力总算说服了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使他承认这是适当的办法。

问题就这样拖延下去。2月5日，我们得悉西安托斯像是要接受一项关于大赦的折衷方案，至少是在原则上。会议已经休会若干天；现在他希望复会讨论细节了。

所以会议还没有寿终正寝！留心一下共产党所采取的方针是饶有兴味的。很可能他们已经决定不在任何问题上决裂，至少直到三强会议〔雅尔达会议〕结束以后。他们似乎相信斯大林会设法帮助他们的。就我来说，我确信他会试图拿希腊作为对波兰问题讲价的条件。<sup>②</sup>

现在会有一段休歇，因为显然谁也不愿意会议破裂，至少就目前来说是如此。由于我的新职务关系，意大利方面迫切需要我，所以我决定回去三、两天。

2月10日——我的五十岁生日——我又一次偕同约翰·温

① 1945年2月3日。

② 1945年2月5日。



德姆和忠实的坎贝尔小姐动身返回雅典。

654 我发现大使馆情绪很好。会议实际上已经失败了一、两次，但是总算勉强开成了。(一)解除武装和(二)成立国民军这两个问题在希腊人之间造成了僵局。这终于由极其可贵的梅因沃林准将(经过九小时的辩论之后)得以解决了。如果最终签订和约,切实执行这些条款,那就应该有相当程度的真正解除武装。埃拉斯游击队公布了(一)他们各师的位置,(二)他们的武器。当然,关于第(二)项他们是以多报少的。但是,只要他们能这样坦率进行谈判,事情就有希望了。①

我还带有戴维·韦利爵士在身边,来帮同处理再一次恶化的财政形势。

2月11日,星期日,下午8点钟,收到摄政的私人秘书耶奥尔伊阿基斯先生的一封信,说局势已无可救药。经过四个小时的谈判之后,还达不成任何协议。他建议大使和我前往瓦尔基扎设法解决这个最后的问题。经过考虑之后,我们同意照办,但只有双方都希望我们插手才行。不久之后,答复来了,在这项谅解之下要求我们前往。大约在下午9点45分,我们到达会议地点,发现代表们齐集在一幢新建别墅的大休息室里。经过十天的使用,这幢房子已经有点搞脏了。

会议由以下一些人所组成:政府的三个代表——索菲阿诺波洛斯,佩里克莱斯·拉利斯和马克罗波洛斯坐在会议桌的一边,另一边是西安托斯,帕尔察利泽斯和现在赫赫有名的或是臭名远扬的齐里莫科斯。两位秘书和两位速记员坐在桌子的一端,大使和我坐在另一端(看上去颇让人感觉象是《平底船船夫》里的国王们。②)

大使用三、两句话解释了我们来到这里的理由,并要求双方说明他们的立场。在这段话的鼓励下,索非阿诺波洛斯发表了一席冗长而巧妙的讲话,概述了谈判的整个过程。他的态度是和解的。他

① 1945年2月10日。

② 1945年2月11日。

说明了如何在英国官员，尤其是在梅因沃林准将对各种不同技术问题的帮助下，经历了若干天的艰辛，

对于大赦、非正规军的解除武装、新国民军的成立、宪兵队或警察的前途、包括组织工会和公共集会权利在内的公民政治自由、在公职中对通敌者的清洗和在适当场合下对他们的惩处，以及人质和俘虏的遣返等棘手问题，已一一达成协议。<sup>①</sup>

剩下了最后一个问题——即在戒严的情况下军法或戒严法应保持到怎样的程度。政府的意思是，在“和约”生效以前应继续有效；他们准备把这解释为“到解除武装的时候”。现在他们愿作出进一步的让步。他们愿意放弃宪法第五条废止逮捕证状手续的固有权利，但是这要等到解除武装完毕以后方能适用。换句话说，即暂停实施相当于“人身保护令”之类的权利，此项权利今后不得使用，但是放弃这项权利的日期应在交出武器之后。这席讲话持续了一小时。然后西安托斯起立。

[他]是一个面无表情、内藏奸诈和看上去足智多谋的人——中等身材、身着戎服、有点秃顶（后脑杓却有一丛惹人生气的乱发）。他看上去劳累不堪、精疲力尽——但是我认为这部分是装模作样的。他所讲的话，仿佛全世界操心的重担都压在他这位疲劳的泰坦巨人的双肩。他一上来语调非常平和——几乎听不清——但逐渐发展，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他用的那一个蒙受不白之冤的方法是巧妙的，富有成效的。到结尾时，使你几乎相信甚至不曾有过任何内战、任何叛乱、任何骚动——除非是照特殊的意义讲。由于误会，曾经是有过某种混乱的，但不曾有过任何罪行——或许双方都有过一些可引以为憾的小事件，而在这种环境下是十分自然的。<sup>②</sup>

他接下去感谢英国人——他的朋友和盟国。他感激那天晚上我们的出席。他和他的朋友只有一个目的——希腊人民的宪法上的自由。

---

<sup>①②</sup> 1945年2月11日。

656 至于解除武装的问题，圆满的协议已经达成，应当真心实意地予以执行。（那天早晨我已经从最秘密的来源获得了有关埃拉斯指挥部为规避执行协议条件而早已下达各师和各作战编制部队的命令——把最精良的武器隐匿起来，而只把劣等武器交出！竟是这样的真心实意呀！）<sup>①</sup>

关于宪法上的自由问题，他和他的朋友抱非常强硬的态度。人们几乎会认为他是一位十九世纪的自由党教授。任何戒严法——甚至政府所建议的那种加以限制的制度——或民事法正常执行手续的任何暂停实施，都同自由原则不相符合。甚至最严重的国内形势也不能证明这种办法是正当的。没有任何理由暂停实施，因为解除武装业经取得一致同意，而且马上就可以办理竣事。

他深深担心允许普通法罪行可予惩罚的大赦条款会被滥用——尤其是如果人们可以没有逮捕证而加以逮捕的话。这将以法律为借口的一种剥夺人权的文件。而且无论如何，除在酣战之际双方有寥寥几桩罪行外，他不相信还有别的事情。（我不禁想起在佩里斯特里和其他地方发现的残缺不全的老老少少的男女尸体。）西安托斯要回到山区——去说服他的部队接受和约和解除武装，并说服从雅典跑出去的难民返回家园。如果在戒严法之下，他们处于非法逮捕的恐怖中，而没有普通法程序所提供的宪法保障，他怎么能去这样作呢？<sup>②</sup>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其中是有些道理的。我自己就一直竭力防止这类普遍的逮捕。）所以西安托斯不能同意这种没有逮捕证的逮捕权，那怕实行一个短暂时期也罢。他不能签署载有这样一项条款的和约。如果他这样作，就会遭到拒绝。有待解决的还有其他两点：如何对待民警或宪兵中可能参加过埃拉斯游击队的人们以及同样情况的文官的问题。但是他认为这两点可以某种妥协办法予以满足。至于法官逮捕令的神圣性，他非坚持不可。

657 这种伟大的宪政情绪把我们搞到将近午夜。我于是要求澄清

<sup>①②</sup> 1945年2月11日。

一下,关于没有逮捕证不受逮捕的问题,我这样想是否正确:

政府建议继续暂停实施,直到解除武装竣事以后;民族解放阵线建议,正常制度应于和约签字后立即予以恢复。<sup>①</sup>

双方一致认为这是争执之点。我于是问解除武装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我认为原则上也许是十五天,实际上是二十天。是这样吗?双方一致同意。难道为了这十五到二十天,竟要危及会议的全部工作并把希腊投入内战吗?似乎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否认这一点。所以大使和我认为我们不妨暂停正式会议,腾出一段间隔时间来供深思熟虑。我们走进另一个房间,希望能分别在一起商量一下。当然,先和政府代表商谈,但后来埃拉斯游击队代表坚持要参与我们的商谈。

从我们同政府方面的商谈中,立刻认清,二十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因为他们希望在这期间对嫌疑分子进行大逮捕。当我看到西安托斯时,显而易见,他们也同样考虑到他们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支持者。

西安托斯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些人当中有很多犯过残暴的罪行。但是他也知道,更多的人会“因涉嫌”而被捕,并靠这种种方法把他们稳稳地拘留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这些人正是他赖以在大城市重建共产党小组的力量。<sup>②</sup>

这时大约是上午两点钟。我们接着同摄政所信赖的秘书耶奥尔伊阿基斯商谈。提出了一项可能的折衷方案:凭法官的拘票进行逮捕的正规民事方法,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应于和约签字后立即恢复。在希腊的其他地方则应于解除武装有效执行后施行。

这项折衷案的理由是,政府占……领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已有几个星期之久,已经可以采取正规方法,而在希腊其他各地,没有法官、没有县长或市长——事实上没有任何民政管理机构。<sup>③</sup>

<sup>①</sup> 1945年2月11日。

<sup>②③</sup> 1945年2月12日。



耶奥尔伊阿基斯回去分别会见耽在各自房间里的双方代表，告诉他们这是我们的决定。

不久之后，他回来告诉我们说，这可以“办得到”。

所以，在上午两点左右，全体会议复会。我把这个折衷计划解释为一个适当的、合理的解决办法。双方对于这样新的、意想不到的合理建议，甚为惊喜。经过对这一计划具体执行的各个细节详加讨论之后，它终于取得了一致同意。<sup>①</sup>

对于警察和文官中的埃拉斯成员这一问题还进行过颇为冗长的讨论。但这不是实质问题，很明显，这两点不会成为决裂的原因。利珀和我都不甚有兴趣的一些颇为复杂的条例得到了同意。这时是上午3点左右，西安托斯认为差不多是就寝的时候了。但是我认为不签署某种协议就散会将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说，皮里克莱斯先生和齐里莫科斯先生这两位卓越的律师肯定能迅速起草一份文本。但是只有一个打字员，而他又非常不熟练——只能用一个手指逐字打印。

略事商量之后即开始工作，但是到了早晨4点左右，已清楚看出，第一，十天会议期间所达成协议的全部稿本，未能拟就；第二，任务太重，非今夜所能完成；第三，西安托斯在有相当时间仔细研究之前，坚决拒绝签署这项文件。<sup>②</sup>

但是我仍下定决心，就是在早晨4点钟不签字，也决不离开。

659 所以，经决定拟具一项业经同意各点的摘要，并拟具一项声明，载明：通过会议所有争论各点已经取得了完全一致的协议；一份希腊文文本正在拟具，但由于时间太晚，只能在当天晚些时候才能准备妥齐，所以正式签字只能于当天下午2时；那个草拟的简短文件我本人和大使都已签字。<sup>③</sup>

这项文件靠了那唯一可供利用的手段用了一小时才打印出来，但是最后总算把文件准备妥齐了，包括一项有待发表的公告。在早

---

①②③ 1945年2月12日。

晨5点左右,全体会议再一次开会,两边各三人,大使和我偕同秘书坐在一端。在房间里到处睡着或躺着的旁观者被喊了起来,请了出去。正式签字之后,索菲阿诺波洛斯发表了一席简单的讲话,西安托斯也讲了话,我补充了几句贺词和祝词。我们在2月12日晨5点30分离去。

文件在下午两点还是没有预备妥齐。关于措词有很多争论,到了下午7点才签字。虽然如此,由于我们稳步前进,所以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危险。

我们工作完成恰是时候,因为雅尔达会议现在正要结束,我们非常希望丘吉尔和艾登在归途中在雅典稍事勾留。可是,他们虽然发来第一批函电祝贺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却使我们的希望落空。丘吉尔不能亲自前来。

摄政……非常失望。所以利珀和我分别致电温斯顿,促请他命驾前来,那怕只勾留几小时也好。我们今天清早相当高兴地接到电报说,当日下午4点30分一行人员将全体到达。早餐后,我们立即通知英国军事当局,然后告诉摄政。一个总计划在上午制订出来,这项计划证明是非常成功的。问题是要把成功和安全问题结合一起考虑。像通常一样,这同样要相互妥协。<sup>①</sup>

结果,安全问题被抛到九霄云外。

撇开这次访问的振奋人心不谈,单单艾登、卡多根、亚历山大、爱德华·布里奇(内阁秘书)和其他显要的莅临,就使我们可以对有关希腊、意大利以及南斯拉夫方面的很多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了。

这是一个美丽的黄昏,长空万里无云,海面、山巅和城市都笼罩在别具情调、极其美妙的希腊之光之下。在机场的各式各样的献礼完毕之后,我们动身去雅典,前往位于英国大使馆和宪法广场旧王宫之间的摄政官邸。 660

<sup>①</sup> 1945年2月14日。

经过几分钟的行礼如仪之后，又是一长列队伍。这一次摄政和首相共乘一辆敞篷汽车，缓步穿过热情洋溢的人群之间。<sup>①</sup>

沿街站岗的希腊士兵控制不住广大的人群，我生怕发生什么不幸的意外。我们慢步穿行而过，从旁门进入王宫。当我们走到俯临宪法广场的阳台上时，眼前呈现一片非凡的景象。

一望无际的翘首企望的面庞，有如翻腾起来的海洋，人数之多和人们所表现的气度是我向所未见的。估计人数约两万至七万。我想四万大约是准确的。整个广场（除开在“无名英雄墓”前空出一块地方之外）……挤得满满的。所有的房屋、窗口和屋顶都是黑压压一片。单单布雷塔内大饭店就有数百人。在我们后面的旧王宫，每一个窗口和屋顶都挤得水泄不通。欢迎会不仅仅就它的洋溢热情来说，而且就它的井然有序来说，确是了不起的。<sup>②</sup>

简直听不见我们那样习以为常的有组织的口号声：“民族——解放——阵线”，“埃——泽——斯”。保皇派甚至一个示威游行的也没有。这是一个民主的人群，把大主教和丘吉尔作为民主的领袖而向之鼓掌欢呼；极权主义的伎俩是无处施展的。

看了10月14日帕潘德里欧举行入城式那天的人群，这次不禁使我愕然。在那一次的人群中，有两个极其仇视的部分，使人有一种挑衅感和紧张感。在这一次的人群中，则使人有一种轻松感和胜利感；由于这个民族曾经备尝艰辛，对于那些曾经救助过自己的人们——一个是体现出希腊方面努力的大主教——摄政；一个是体现他们所钦慕的盟国的一切素质——气魄、公正和决心——的英国首相，表示感激和崇敬，有一种感恩和自豪的情绪。<sup>③</sup>

当然，每个人都不会忘记1944年的圣诞节，寒冷、黑暗，到处是装甲车和坦克车。现在，却像是和平时期的—场足球比赛或赛跑了。和约终于签字了，和暖如春，阳光灿烂，那一天雅典真正是“紫罗兰”之城。人人心中都存有这样一个对比。

<sup>①②③</sup> 1945年2月14日。

大主教讲了几句可钦可敬的话。丘吉尔的答词是即席的，然而却句句珠玑。也许，翻译每句话需用相当时间，这就帮助了他的构思。他最后几句是令人永志难忘的：

让谁也不要玩忽自己对国家的职守。让人人都起而为这个辉煌时日作出贡献。让希腊国家在人人心中都居于首位，在每一位男男女女的思想中都以此为重。让希腊的前途在他们眼中光芒闪耀。我由衷地祝愿你们繁荣昌盛。我由衷地希望希腊在此次战争中惨遭苦难的国家行列中作出适当的贡献。让正义得以伸张。让党派的嫌怨从此消逝。让这里有团结。让这里有坚决的同志之谊。愿希腊万古常青！愿希腊为大家作出榜样！<sup>①</sup>

经过几次适当的推让之后，接着是普拉斯蒂拉斯将军和艾登发表的简短讲话。众乐齐鸣，欢呼若狂。经过在王宫内阁会议室中一次长达三刻钟的聚会，同主要阁员会晤之后，我们离去。这一次摄政单独乘坐他的小轿车，丘吉尔和艾登同车，大使和我在后面。从王宫到大使馆，沿途万众簇拥，采声四起。大使馆的盛大晚宴，前来参加的有三十六人。我坐在丘吉尔的右手，他兴致勃勃，对他个人的胜利表示欣慰。10点30分，摄政前来商谈，席间只有丘吉尔、艾登、利珀和我在座。商谈部分是轻松愉快的，部分是严肃认真的，丘吉尔和大主教似乎可以说是比以往相处得更好。丘吉尔及其一行于午夜动身，但是艾登和他的属员留下来了。第二天我们就希腊、意大利和南斯拉夫问题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我已<sup>662</sup>已经准备了一份关于所有政治问题的备忘录，韦利也准备了一份关于希腊的所有经济问题的备忘录。所以，讨论比通常有条理——我们甚至设法取得了一些决定！

因为陆军元帅从来没有观光过马拉松，我想我们最好花一个下午带他到那里去一趟。当那次战役尚在进行时，波斯人离雅典

<sup>①</sup> 利珀，前引书，第154页。



二十六英里；当亚历山大接掌中东指挥权的时候，德国人离开罗七十英里。

当晚希腊政府设宴回请，想方设法准备了大量佳肴美酒，席间发表了大篇演讲。这一晚是以同希腊阁员讨论财政经济问题来结束的。艾登给他们上了一堂有益的课，力劝他们不要完全倚赖我们，而要自己多作努力。讨论一直进行得非常顺利，直到财政大臣西泽里斯以一席枯燥无味、牢骚满腹、啰啰嗦嗦的冗长讲话作答时止。在我陪同艾登去向摄政告辞时，艾登把一切情形告诉了他，摄政似乎对于他的直言无讳感到高兴。

第二天我们都离开了雅典。

英国报界有点难以为情地欢迎并盛赞瓦尔基扎和约。他们也没有嫉妒首相的胜利，报道是全面、热情洋溢的。谬承以很大一部分功劳归之于我。对于(和约)条件的温和与宽大很正确地予以重视。然而，无论当时或者很久以后，却都没有吸取到任何真正的教训。

大家一直认为民族解放运动连同它的工具埃拉斯游击队都是由各式各样爱国人士所组成的真正抵抗运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固然很多游击队员无疑是出于民族自豪的崇高动机而被吸引去的，但是指导力量却是最激烈的共产党人。我认为我们可以凭靠温和与公正的态度把他们的很多支持者争取过来，并至少可以为将来比较自由的政策奠定基础。希腊一直太常常摇摆于独裁和政治  
663 混乱之间了。何况，在希腊事务中尽管长期的和几乎荒谬的政治危机已司空见惯，而且习以为常，但是在广大的人民当中却由于埃拉斯游击队的犯罪活动和骇人听闻的暴行而有一种心情的激变。虽然如此，雅尔达会议必定产生了它的影响。斯大林也许曾经对于违反莫斯科协定的行为视若无睹，听任共产党人试图夺取希腊，如果他们能够取得成功的话。但是在英国政府作出了那样坚决的反应，

在丘吉尔的决心那样明显地表示出来之后，斯大林无疑会认为，最好是放弃这个企图，而另伺良机。甚至来自保加利亚或阿尔巴尼亚或南斯拉夫的游击部队也集结不起充分的兵力来反抗丘吉尔已经调进希腊的组织良好的部队。仔细考虑之后，在我看来清清楚楚的是，西安托斯已经接到了命令，要求达成一项协议。他为自己的人，尤其是为保存共产主义运动的基干分子而进行了艰苦的、巧妙的斗争。波波夫上校正在现场，并与斯大林经常联系。西安托斯无疑已经被告知，现在最好是“为了更好地跳跃而后退”。

我的很多希腊朋友当时和后来都责备我们没有强行取得一个结果，并把希腊战役进行到可以将革命的共产主义全部肃清的地步。我们的很多英国朋友认为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左倾主义的一种形式，可以用宽厚态度或甜言蜜语加以软化。基本上我们的希腊批评者是对的。如果我们有这个力量，如果我们不曾面临华盛顿和美国政府的敌视，如果不曾以不充分的兵力承担了艰难棘手的意大利战役，如果英国舆论充分掌握了真情实况，那我们未始不会完成这项任务的。

虽然叛乱的结束减轻了我对希腊事务的主要忧虑，但是我对地中海盟军最高司令部仍负有从旁协助和进言献策的责任，尤其是因为英国部队承担着沉重的义务。所以在雅典大使馆和卡塞塔我的办公处之间，函电往来依然源源不断。在战役结束前我三次不得不应大使之邀前往雅典。其中的第一次是在3月初。

2月28日我曾经接到利珀的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664

我极需您和陆军元帅的帮助。无论在政治还是在军事方面，希腊人都需要有一项要求采取适当行动的号召，我们必须协同一起去作。您和陆军元帅能否无论如何周末来此一行？这样麻烦您们，深感抱歉，但是我怀疑我个人是否能把这件事情办好。

在我征求亚历山大的意见时，他对于大使不能自行处理，似乎颇为

烦恼。在他忙于计划春季攻势和处理北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紧急问题时,要他腾出时间,显然是有困难的。风潮主要是由普拉斯蒂拉斯所作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任命而引起的。

普拉斯蒂拉斯政府的作法显得颇为不智:迫使佩里克莱斯·拉利斯去职,是“右翼”复辟的一个危险信号。各类军事任命都正在发表,指命的大多数人都是韦尼泽洛斯派的年迈将军,都是普拉斯蒂拉斯1922年时的老友,但无论在政治或在专业方面都是不合适的。<sup>①</sup>

而且,亚历山大还面临着一项新建议。在接到雅典方面电报之后的那一天,他告诉我一个令人心烦意乱的消息。

……他现已奉到明确指令,要他去担任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副手”。他将在短期内启程。去担任一个“副司令”,真正使他有点难堪,而且这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如果他想要有所作为的话,那他就非异常坚定、手段异常高明不可。当然,他应该(根据专业方面)掌握指挥权。但是英国部队和美国部队之间的不平衡使之成为不可能。这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我同亚历山大共事一直是极其愉快的。<sup>②</sup>

既然对于德国人在阿登穷凶极恶的反攻一直应付得很成功,在我看来这项调动现在是很不必要的。结果,这个计划全成泡影。同时,我们一致同意由我去雅典,因为大使显然感到需要支持。

665 我带着亚历山大的指令,要求将、校级军官的选拔只应根据专业方面的考虑进行。他清楚表明,在这个成败攸关的时刻,他不能认为大量抽调他的人员是有道理的,除非他确信这是以效率为重而不是为了派系关系。我又照例求助于摄政。他切盼暂时维持普拉斯蒂拉斯不动,实则希望把他一直维持到选举。但是他认为他可以让普拉斯蒂拉斯接受我们的合作条件。

当我往访普拉斯蒂拉斯时,我发现他更加夜郎自大。希腊军队正在取得辉煌的进步;全国没有任何骚动;全国人民都绝对相信

① 1945年3月1日。

② 1945年3月2日。

他个人；在他看，或许除开在萨洛尼卡方面，英国部队留下来并无任何必要。尽管缴收了武器，但考虑到希腊有一大部分仍然在埃拉斯游击队手中，这似乎是很不现实的。我于是就依照瓦尔基扎协定成立国民军一事，开始对他稍稍施加压力。关于确切条款，将军并不认为是重要的；而他正在作出真正的努力，没法在各选拔委员会把一些埃拉斯游击队的军官和军士吸收进国民军。

清晨斯科比将军曾经来访。……斯科比将军认为普拉斯蒂拉斯将军是愚蠢的。普拉斯蒂拉斯将军则把斯科比将军看作是笨伯。<sup>①</sup>

同一天，西安托斯、帕尔扎利泽斯和齐里莫科斯来访；他们对政府执行协议，在细节方面有很多怨言。但是我不认为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他们有一怨言使我感到未免有点天真。

他们说，虽然他们可以自由印行他们的报纸，但是卖报的报童却有人跟踪！<sup>②</sup>

第二天下午，大使和我再一次访问摄政，他似乎对于我们不要求政府立即进行人事变动的看法，感到安心。尽可能拖延这种变动将是明智的。 666

三军参谋长现在正为了要把我们的军队全部撤出希腊而开始施加压力，普拉斯蒂拉斯无疑会以装备作为交换条件而予以同意。斯科比和大使都非常担心，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终于在4月中旬决定暂时留下的将不是仅仅一个师而是两个师的兵力。这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我们不愿重新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受牵连有余，而万一有事，维持有效的秩序却又不足。何况，战事在德国本土的迅速进展，似乎证明这种办法是不无理由的。在意大利即将发动最后的反攻，这当然要抽调另一个师去予以支持。但是亚历山大以他通常的宽宏大度接受了我们的结论。我们只好要么撤出希腊，

<sup>①</sup> 1945年3月13日。

<sup>②</sup> 1945年3月14日。



要么对自己的力量具有信心。

3月17日,我返回意大利,在德国崩溃之前,有必要访问意大利也就仅仅再有一次了。关于确定选举日期以及就君主制问题举行公民投票两事进行了反复磋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证明还为期过早,因为选民登记机构根本不存在,而必须重新建立。

盟军在德国进展的惊人消息传来,使我感到这一次或许会是我插手希腊政治的最后一次了。4月10日我到达雅典,发现普拉斯蒂拉斯已经换为伏尔加里斯。伏尔加里斯是一位投合人意的、富有吸引力的人物,常识极其丰富。他清楚表明,他的内阁的唯一目的就是在国家生活中进行必要的改组,以便尽速举行选举。这会是一个“侍候人的”政府。但是现在出乎意料之外,美国人开始插手其事了。在危险时刻至少官方曾经表示不友好的中立态度,而现在他们却改变了立场。

667 由于美国人很“看重”普拉斯蒂拉斯,因而引起了另一次纠纷。近来他们一直非常注意他,在各式各样的借口下从美国派来了各形各色的人。厚道的人说,美国人欢喜普拉斯蒂拉斯,因为他是共和主义者;抱怀疑态度的人说,他试图为战后贸易取得让与权。后一种看法却得到了下述事实的支持:他们事实上要普拉斯蒂拉斯签署一项非常有利的航空协定,这项协定将会给泛美航空公司一个强有力的和占优势的地位。幸而我听到了这件事并及时加以阻止。但是这却可以说明美国的态度,而尤其是斯退丁纽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讲了这样一句话:关于政府的变动,摄政并没有征询过美国大使的意见。<sup>①</sup>

第二天,4月10日,当艾登和出席雅尔达会议的一行人等来访问我们的时候,我们的2月商谈达到了最高峰。我们的建议已经得到内阁的批准,新制度就要立即生效。所有英国代表团和顾问都将在大使的领导下协调一致。斯科比将军的职务将由只统率英国

---

<sup>①</sup> 1945年4月9日。

部队的某军团的司令接替。斯莫尔伍德将军已经前来担任军事代表团团长，特纳海军上将和特特尔空军中将则早已在这里。昆廷·希尔爵士也已经到达，担任财政顾问。我们如期在11点30分举行会议，我解释了这个新体制，在结尾时对斯科比将军作了适当的赞扬；将军一向表现出真正了不起的勇气和忠诚。

我所犯的唯一错误是后来把我的笔记交给秘书去帮助他作的纪录，但是忘记我的笔记在这一点上有“对斯科比将军所作的盛赞之词”！<sup>①</sup>

接着就是一次英国宣传会议，并就史密斯—多里恩准将的联络组所必需的编制同他进行财政方面的磋商。

最后一天是告别的日子。首先是向希腊新首相道贺和告别。他无疑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角色——一个土地神<sup>②</sup>似的人物，尤其是由于不幸折断了踝骨并且在巴黎用熟石膏包扎起来，就更加加强了这个形象。

“咯哒哒，咯哒哒，咯”——他身着耀眼的海军上将制服，精神抖擞，668拄着双拐，笑容满面，雄纠纠地大踏步走进来。<sup>③</sup>

晚间有一次便宴，这次晚宴因迈克尔·帕勒里特爵士的香槟而更加令人快意。我曾经订出了这样一项原则，外交部也并未加否认：当着外交大臣的面闯进前任大使的酒窖的这种行为算是合法的。我们认为这项原则也不妨适用到具有国家重要性的事情上。因为沃尔加里斯海军上将是我们的客人，经过讨论，擅入酒窖也似乎是不无理由的。晚宴后，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在大使的办公室里开始举行。

只有海军上将、大使、卡奇亚和我在座。除开我们沉沉欲睡之外（利珀和我实际上已有几次入睡了），会议是成功的。海军上将真是一位非

① 1945年4月10日。

② 西方民间传说中地下矿藏和财宝的守护神。——译者

③ 1945年4月11日。

常有吸引力的人物，并且非常通达人情世故。他诙谐、调皮、玩世不恭——懂得什么对他合适。同普拉斯蒂拉斯相比，他简直是一个完人。普拉斯蒂拉斯愚蠢、自负、顽固、怪诞、一味留恋过去。沃尔加里斯精明强干、通情达理、灵活而多疑——他生活于现在并决心把握现在。①

沃尔加里斯欣然同意了拟议中的合作体制。英国官员和希腊阁员将不但分别配置于雅典的希腊各部，而且配置于全国各省。沃尔加里斯假装不懂经济，但是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实际懂得的，比他自己所承认的多。

在政治方面，他有才有智、通情达理、温和幽默、公平正直。他希望选举尽快举行，但是他承认由于实际上的困难，在秋季以前是不可能的。因此之故，他倒赞成全国委员会。他希望有一个中间的、甚至中左的政策。他信守瓦尔基扎条约。但是他对于反希腊共产党的反动运动的程度和内战中野蛮行为所激起的情绪的猛烈，是毫不讳言的。“是革命还是叛乱，谁都心里有数。可是那些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暴行，为什么对野蛮人却比对希腊人更能中意呢？”②

669 最后一句话，片言只字地把几乎所有希腊人民的情绪都概括无遗了。人们对于那些暴力和残暴行为的骇人听闻的故事，迄今记忆犹新。

虽然在最后几个星期中还存在若干问题，包括丘吉尔的要求在内，但是却不再需要我亲自来帮助大使了。丘吉尔曾要求在四个月之内举行公民投票，尽管根据实际上的理由是显然不可能的。所以，这一次结果成为我的最后一次访问了。我同利珀的关系在我们整个共事期间一直是愉快的。我一直对他非常尊重，而他的始终不渝的友谊一直是可贵的，牢固的。

我还有另一件愉快的事情值得记录下来。1946年秋季，大主教引退，当他前来访问新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的时候，我曾经

---

①② 1945年4月11日。

在伦敦见到他。但是，嗟，我再见不到他了，因为他在 1948 年与世长辞。然而在他引退的前夕，我收到了下述的一封信：

我非常亲爱的朋友，

当我辞去摄政重任之际，我不禁想起当初我承担我的艰巨任务的那段时日，在我的记忆中，它将永远和您这位可敬爱的人物联系在一起。您的卓越才华、您天赋的领袖才能、您无穷无尽的机智、您对我国的耿耿忠心、您自那时起对我所表示的友谊，在我所走的一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一直是一种无法估计的力量。

我怀着敬爱和感激之情向我亲爱的麦克米伦先生致以最热烈的问候，我将永远是他的仰慕者和忠实的朋友，愿上帝的恩宠永远加在他的身上，愿他在他的伟大国家里安享快乐之福。

达马斯基诺斯

1946 年 9 月 17 日，于雅典



## 第二十四章 战役的结束

在意大利旷日持久的战斗，连同蔓延整个半岛的酣战，曾经导致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和幻想的破灭。尽管我们为恢复这个国家的经济和保证比较充分的食品分配作出了努力，情况仍然是悲惨的。不管美国现在是为了政治上的还是为了别的原因想要作些事情来帮助意大利，联合王国却不能再增加义务承担了，除非牺牲在其他方面而且是甚至更为迫切的要求——部分是在欧洲，部分是在灾难深重的远东殖民地方面的。在政治领域内，尽管当我1944年12月在伦敦之际已有若干困难临近严重关头，博诺米政府却非但保全了下来，而且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前途险峻陷阱重重。

1944年12月30日，我正在那不勒斯，我们在总司令的政治委员会中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由亚历山大主持的会议。他熟练而有条理，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解决了一个长长的议事日程。<sup>①</sup>

关于代表意大利北部游击队运动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同盟军总部和意大利政府之间的协议，麻烦不胜其多。亚历山大是坚决的，而且我也认为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希腊的教训是，我们必须一上来就控制住这类游击队运动。假定夏初战事可以结束的话，那么，取得一个明确的谅解并把英国军官和可靠的意大利人渗透进游击队，现在就是时候了。正是在这个时刻，我第一次同那位抵抗运动军事指挥部的联合司令官帕里先生和那位银行家皮宗尼开始发生联系，这两位都是可钦佩的有魄力的爱国主义者。亚历山大和民

<sup>①</sup> 1944年12月30日。

族解放委员会终于就合作和财政支援问题缔结了一个双边协议。这项协议又由和意大利政府缔结的一项协议加以补充。所有这类的实际谈判，都是颇为棘手的事，因为不能不采取微妙的措词，尤其是涉及停战条款和盟国军政府的那些措词，以便满足外交部和国务院多少有点迂腐的态度。很多法律上的困难在我看来大部分是凭空虚构的；首要之务是要在抵抗组织像在希腊那样变成为单纯共产主义的工具以前，把他们牢牢掌握住。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我正在罗马，元旦我去到委员会的办公室。虽然是例假，办公室里还是有不少领导干部在办公。问题烦多。

在意大利方面，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食品定量配给，意大利部队问题，住房问题，在意大利的战俘以及实行或滥肆“清洗”等等。此外，工业复兴，地方选举，交通问题以及意大利北部的游击队运动等等也都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就我所能见到的来说，这里的工作班子在行政方面相当不错，但在经济方面却很薄弱。他们一直受到盟军总部，而尤其受到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合会议和联合民政委员会的掣肘。<sup>①</sup>

英、美记者曾经——也并非不自然地——对我自从奉派为盟国委员会主席以来的行为举止和我常常不在罗马，而感到多少有点莫名其妙。所以我认为稍稍给他们一点启迪是明智的；因而在1月3日我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出席者颇为踊跃。

在这次招待会上，我就盟国政府力图奉行的政策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说明。自然，在我讲话时我希望能有三、两天之内接到上面的正式指令。实际上，我还必须再等一个月指令才下达，还要再等 672 一个月才奉准通知意大利政府和人民。但是，这种耽延，实际上并没有妨碍我们遵照业经一致同意的概括方针行事。

我向报界代表坦白承认在意大利所广泛体察到的沮丧情绪。

---

<sup>①</sup> 1945年1月1日。

虽然德国人在阿登的反攻已经堵截住了，但是战事只是暂时呈现静止状态。在我们的前线上，在春季以前没有重新开始攻势的希望。在这期间，意大利，像法国那样，分成为三个部分。第一，凯塞林盘踞的意大利，人口二千一百万；第二，在盟国军政府治下的意大利，人口五百万；第三，意大利政府治下的意大利，人口一千九百万。盟国委员会不能不对第一部分预为之计。要是我们想在德国人最后被打败时避免骚动和破坏的话，这是一项最为成败攸关的工作。第二部分不能不为了部队的需要和为迅速归还给意大利政府预作准备而进行管理。至于第三部分，则不能不从旁协助和进言献策。在这个时刻，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是关于它的前两项职能的。我们希望把它的对内安排及其对外关系的整个管理权尽速归还给意大利政府。这将涉及到委员会政治组的撤销和以意大利政府本身辖区内人员的任命归由该国政府自行负责的问题。盟国军事人员将尽可能代之以文职人员。

这些政治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我们所面临的压倒一切的最大困难是供应问题。根据战争规则，采取措施，保证居民免于“疾病和动荡不安”的危险，是进占国的责任，也是利害关系所系。但是这一定则一直是从宽解释，现在我们正试图在广泛得多的基础上帮助意大利恢复元气。概括地说，初期我们所能运进的供应品，都是消费品。输入的唯一资本货——铁路和桥梁的修复、  
673 货车、卡车、发电站、海军造船厂、飞机修理等等——是为满足军事需要的，或者为帮助减少进口的，也就是为了建造农业机器厂和生产肥料之用。最后，我们正在试图刺激出口。在迄今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的意大利地区中，这项工作特别困难。过去最重要的出口或许就是大麻。然而在解放了的欧洲，每一个国家所希望的，都不只是能生存而已，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工作生产。但是这就涉及到如何取得原料和机器的问题。财政是一个难题，但是由于

盟国的慷慨，并不是不可克服的。甚至供应品的利用也可以渐次克服。真正的瓶颈是航运。荒谬的是，盟国的节节胜利反而增加了我们的问题。在早期，船只的沉没超过了建造。现在沉船虽已很少，但是需求却继续超过吨位的供应。在这个时刻，德国人，正如我提醒我的听众那样，仍然盘踞大西洋和英法海峡的一些港口，或至少在1944年整个夏秋两季是一直盘踞在那里的。登陆法国和攻入德国的成功，难免要维持庞大的军队和集聚大量的物资。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节节胜利正导致越来越长的交通线。现在我们必须帮助法国、比利时和希腊的解放区。在这些之外，不久还要加上荷兰和南斯拉夫。供应问题

目前不是钱的问题。钱本身毫无用处。世界上的善心人尽可把他们高兴给意大利的钱全部拿出来，但是只要没有货物和港口可供利用，不能提供船只，那就完全无济于事。

现在斥为“资本主义”的这种有益制度的长期经验，已经[使我们]难以认清这种变革。战争破坏了价格制度，并建立了国家……管制的计划制度。这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战争的一个理由，这是留给诸君讨论的问题。

在接任委员会的代理主席时，我是两年来第一次接受了一个行政职务。

我所能作的……就是研究一些具体问题和探询情况。……在盟国委员会之内有一个庞大的、颇不协调的组织，对于批评非常敏感，而且很 674 缺乏创造力。我必须试图在不过分惊动它之下，加以刺激。<sup>①</sup>

幸而，我得到了斯通海军少将和勒什准将这样两位殊可钦佩的人物，他们既忠心耿耿，又精明强干。

在1、2两个月，关于我的一项指令究应如何措词，电报往来如梭。首先，华盛顿希望把新政策扩充到不仅包括政治和供应问题，

<sup>①</sup> 1945年1月2日。



而且把财政问题也包括在内。继而，抓住了一个不相干的机会，华盛顿竟在一系列令人惊骇的电报中，指责英国人对意大利居心叵测。这些电报是科德尔·赫尔的继任人斯退丁纽斯自行负责的。我不断促请，至少应该履行我的关于实施新政的指令。交涉是按照东方式的步伐进行的。至少不能责备我在希腊虚度岁月，浪费时间。耽延是国务院的态度造成的，国务院这时显然没有任何确定的方向，所抱的想法无异是异想天开。“美国人想尽快‘清算’因欧洲战事而产生的整个形势。”<sup>①</sup>徒劳的野心！不切实际的愿望！

在这期间，伦敦和华盛顿舌剑唇枪，继续不已。美国的一批名记者也参加了混战。他们甚至谴责我们想吞并西西里岛以及意大利的殖民地！自从“火炬军事行动”以来，这种兴风作浪的人在各个不同时期一直都很活跃。但是现在，随着战事临近结束，比平常就越来越唯恐天下不乱了。一种焦灼感开始滋长，这特别影响到远离前线的那些人。然而，甚至在华盛顿的领导层开始谴责英国人“独霸”盟国委员会时，委员会中从事实际工作人员的士气依然没有受到影响。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地中海战役之初树立的那种辉煌的盟国合作榜样，在盟军总部一直保持不衰。我不禁要引证我对报界所采取的立场作为合作精神的一个适当事例。

675

虽然一个英国阁员一方面具有盟国官员的职能，而在另一方面又担任盟军总部英国政治顾问的职位，看起来似乎是一件多少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这次战争使英、美之间如此合作无间，如此彻底一体化成为可能，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欲加的一切谴责之词也就可以免开尊口了。

撇开对于我的指令的实际措词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点不谈，美国人现在又再一次开始就拟议的和约对外交部施加压力。在艾登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适当的方案，现在我同意他的意见。

<sup>①</sup> 伍德沃德：《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外交政策》，第406—407页。

任何和约都会包含严厉的条件以及让与权。这对于意大利人民，其震撼不亚于鼓励。所以，我们建议，对德战争一旦结束，我们要在对德和约发生任何问题之前马上同意大利缔结和约。丘吉尔同意了这项建议，因而在1月17日由我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提出。但是，国务院默不作声，一直没有任何答复。

正在我等待正式指令到达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危险的争论。自从我们开始踏上意大利领土以来，对法西斯分子清洗的问题，就一直是一个难题。在原来的停战条款上曾经要求将凡是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人一律免职。但是要给这个原则确定一个界限或者加以应用，却大非易易。而且清洗的过程是缓慢的。当“清洗”这把利剑闪耀在每一个大小公务员颈项上的时候，办公的效率自然大受影响。此外，有时某一个特定的人，虽然有法法西斯经历，却具有非常可贵的专门知识和技巧。例如，整个南意大利交通系统中的一个高级职员就是这种情形。他在早期——德国人仍然盘踞罗马的时候——曾经表现出很大的勇气，把安齐奥和那不勒斯的所有海底电缆图一齐交给我们，帮助我们工作。这时他受到了盟国委员会和意大利政府的攻击，但盟军总部应信号长之请将他营救出来。这只不过是很多事例中的一个。1944年12月对巴多利奥的威胁则是另一个事例。然而，整个停战协定所倚赖的正是巴多利奥的签字。<sup>676</sup>

1945年初，罗阿塔将军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在墨索里尼倒台时他曾任助理参谋长，并且同清除墨索里尼的计谋有密切牵连。1月10日我正在希腊的时候初次听到他被捕的消息，一回到意大利就同监国乌姆贝尔托亲王的府内大臣马尔凯塞·卢奇费罗讨论了这件事。

罗阿塔将军将于一个星期之内交付审判，审判也许〔会〕揭露出与1943年9月停战协定签字有关的许多详情细节以及1934至1939年这

段时期的特工文件,这或许会使英、美两国政府蒙受重大损害。<sup>①</sup>

我对这一切深感忧虑,但是决定不让亚历山大采取任何行动,除非我们能得到美国政府的明确支持。他们对于巴多利奥的审判,一直规避责任,我切盼避免盟国关系的这种紧张状态重新出现。因为对罗阿塔的指控是,他曾经利用参谋部的情报处作为一个为法西斯主义服务的恐怖主义的工具,所以,审判怎么会把停战协定的谈判牵涉进去是没有任何实际理由的。谁也说不出他在1943年9月间活动的证据究竟对他是否有利。但是,我切盼谨慎行事,所以我作了这样的安排:要斯通

请博诺米布置一下,无论检举或辩护都不得采纳涉及下述两方面的证据:(一)盟国的军事活动,(二)属于或据称属于任何盟国政府档案的。但是,没有我或外交大臣的进一步授权,他将不要求这样作。在这期间,布罗德将代表我致电外交部,请就我们是否应坚持这一点,作出决定;奥菲则代表柯克以类似的词句致电国务院。靠了这种方法我可以让美国人承担义务,如果我们决定采取行动的话。我拒绝单方面行动,虽则柯克和奥菲希望我这样作,但是一旦发生争执而德鲁·皮尔逊先生攻击我们干涉意大利司法时,他们会分担责任吗?<sup>②</sup>

677

无论外交部或国务院都没有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但是甚至在意大利政治的一片混乱中,我们也往往吉星高照。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最后步骤把他交付审判,这位将军就失踪了。

罗阿塔由于真病或者装病,已经从里季纳·科埃利监狱转移到韦尔季利奥陆军医院。

在1945年3月4日夜,他成功地——怎么会成功,始终没有发现——逃跑了,尽管政府作了一切努力寻找他的踪迹——包括一百万里拉的悬赏——但是他一直成功地隐匿到意大利战区盟国军事制度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sup>③</sup>

---

①② 1945年1月12日。

③ 哈里斯:《意大利盟国军政府,1943—1945年》,第224页。

因此物议沸腾，这倒也不是不自然。左翼认为这次事件是一个反动的法西斯阴谋。卡拉比涅里已经指出，要么是庸碌无能，要么是同谋共犯，也许是兼而有之。政府风雨飘摇，摇摇欲坠。但这时事态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当时唯一能加害于博诺米政府的共产党人，宁愿等待。他们的希望集中在北部。

实则北意大利正是我们主要忧虑之所在。亚历山大本人对于游击队问题有浓厚兴趣。

除非我们非常小心谨慎，不然在北意大利就又会出现在一个民族解放委员会或埃拉斯游击队的局面。特别行动执行局武装十万名左右所谓爱国主义者的活动，将会造成同样的革命形势，除非领土一经解放我们就能立即确立一种制度，把他们或是编进我们的部队或是编进意大利部队。然后，我们也许能以薪饷作为交换条件，控制住他们的武器。希腊的教训是，除了“解除武装”之外，其他都无关紧要。政治问题只不过是保留武装力量的借口罢了。<sup>①</sup>

在这个战役结束以前，我们就开始越来越专心致志于这一问题而不遑他顾了。

终于在1月31日，涉及新政的正式指令由参谋长联合会议发出了。我在12月初提出来的条件几乎没有什么更动。

幸而公开宣言的文本还没有确定，而且必须推迟四十八小时发表，以便在公布前通知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希腊会议不是持续太久的话，我差一点就会公布了！这会是一桩“间不容发的险事”。<sup>②</sup>

但是我低估了我们的上级权贵们因循延宕的力量。现在斯退丁纽斯决定反对任何公开宣言。

他的理由是所作的让与和美国政府所愿意给予意大利的相去是如此之远，以致任何宣言都只会造成失望而已。<sup>③</sup>

---

① 1945年1月22日。

② 1945年2月3日。

③ 1945年2月9日。



我们现在建议根据指令向意大利政府和顾问委员会作一口头声明。意大利人立刻体会到出了什么问题了，因而直接向雅尔达会议发出呼吁，要求给予盟国的地位和更多的经济财政援助。但是，当然有其他一些国家提出更多的要求——即如法国，而尤其是比利时。英国政府理所当然地认为，解放了的盟国所提要求的有效性，至少不亚于意大利人。在雅尔达进行的讨论是敷衍了事的。我自然愿意为我所负责的意大利尽力而为。实则，当2月14日艾登刚刚从雅尔达回来，我们在雅典商谈时，我就力劝他说：

美国方面的夸张其词，自然令人气愤，但不要因此而影响自己的判断。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地中海的重要国家土崩瓦解或陷于永久的革命状态中，就这个意义来说，意大利无异是英国的利益所在。我们不希望看到意大利分裂或“变成为共产主义的”。<sup>①</sup>

679 但是要解决盟国地位问题，总要用几个星期，即使不是几个月工夫。眼前却有更加实际的问题。最后，我不管电报闹得怎样翻江倒海，我作出了我自己的决定。我得到了斯通海军少将和勒斯准将的全力支持。我们的计划是简单的。

10点30分意大利顾问委员会将举行会议。届时斯通将出席，说明新指令的要点。下午4点，斯通和我将访问博诺米（首相）和德加斯佩里（外交大臣），同他们详细研究各要点。5点30分我将举行记者招待会。我们研究了各项文件，解决了几个突出的问题。<sup>②</sup>

这个时间表按时执行了，2月24日下午4时，斯通和我往访博诺米和德加斯佩里。我详细研究了列有所拟一切变革的备忘录。<sup>③</sup>意大利已经得到了新的国际地位以及更大的并且在某些场合下完全的行动自由。在业经移交的地区中，盟国委员会现在应只负有用备谘询和进言献策的职能。自然，只要战事继续一天，凌

① 1945年2月15日。

② 1945年2月23日。

③ 这项文件作为附录四，刊于本书之后。

驾一切的军需就必须一天得到保障，但是盟国政府的权利将备而不用，不会影响日常行政。意大利政府现在可以自由地、直接地处理他们和其他政府的关系。他们不再需要通过盟国委员会政治组进行活动，该组将予撤销。他们将有和盟国互派大使的自由权利。他们将得到通过外交邮袋秘密通信的权益。至于国内事务，则凡是政府通过的命令和法律都不再需要呈请批准。政府自上至下的一切任命也无需盟国的同意。唯一的例外是有关参谋部和国防部这类职务的任命，这类任命仍需地中海最高司令部的同意。在意大利辖区工作的盟国官员将一律撤走。联络官和技术专家只有应邀才会留下来。盟国和意大利的文化关系将通过书籍的交换和学者、艺术家等著名专业人员的互访，重新建立起来。至于意大利战俘，如果能就如何在令人满意的基础上利用这些人的服务所作安排获得一致同意的话，那么，他们的战俘身份即可终止。文件的其余部分开列了盟国准备帮助意大利政府进行的经济复兴计划。各种供应品的联合进口方案正在拟订中，这个方案有可能也将适用于资本货物的进口。在我们仔细研究了文件之后，提出了几点意见，例如，能否给意大利人以密码和外交邮袋，对此，答复不能不是“否”，因为他们的密码是著名靠不住的。博诺米和德加斯佩里两人都

似乎因这种让步而感到高兴（虽则有一点点吃惊）。象所有大喊大叫要求自由的人们一样，一旦给了他们，反倒有点吃惊了。但是，一般来说，他们看上去相当满意。象大多数拉丁种族人一样，他们对理论和法律方面甚感兴趣；但我们却避开了〔这两方面〕而注重实践。<sup>①</sup>

他们仍追求“盟国的地位”，但是撇开英国方面对1940年事态的愤慨这类问题不谈，也很难希望法国方面准备在原则上接受这个概念，虽则他们有充分准备在实际上差不多照样行事。意大利阁员

<sup>①</sup> 1945年2月24日。

们也

非常担心我们的地方官员从“意大利境内的意大利人政府”中撤走。他们担心行政标准必然会跟着降低。<sup>①</sup>

当天晚一些时候，我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详细说明所作的新安排。

这项新政，其演进过程，早在十八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实则并不是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而是倒数第二个阶段。在整个这段期间，

681 委员会在同我们意大利朋友合作之下，承担了涤污去垢的工作。在了解了一切困难之后，我认为美、英两国，无论就一向鼓舞各自在意大利的代表的精神来说，还是就他们工作的效率来说，都是无愧的。

我将意大利政府的反应报告外交部，其中自然有一个奥利弗·特威斯特<sup>②</sup>的因素。诺埃尔·查尔斯认为最近几天的事态对于重建英国的威望和抵消那些不那么令人可敬的美国新闻记者的讽刺，是大有裨益的，那些新闻记者长久以来一直力图破坏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

我认为我作为委员会的代理主席，现在应该了解一下我们某些官员在工作中的情况。斯通的少数几个缺点之一，就是他没有充分深入现场。他很少离开罗马，除非是去卡塞塔。无疑这是由于办公室工作繁重的缘故，但是我认为

人们应该出去看一看从事实际工作的小伙子们——往往处在非常艰难、辛苦和危险的条件下龟勉从公。加之，这是一种遍历意大利最美丽地方的非常引人入胜的旅行！<sup>③</sup>

---

① 1945年2月24日。

② 奥利弗·特威斯特是狄更斯著名小说《雾都孤儿》中孤儿的名字。这个孤儿在救济院时受尽虐待，后来又历经艰险，最后才得救。——译者

③ 1945年2月25日。

我带同我的美籍新副官约翰·阿特金森那位漂亮小伙子在身边。考虑到我的盟国官员的地位,我认为,在我的工作班子里增加这个人明智的。他是一个风采动人的官员,以前作过采访记者。所以我把一切必要的记录都交由他执笔。我们首先访问奥尔维埃托,参观西尼约雷利的宏伟壁画和锡耶纳。

锡耶纳古今画家——连同临摹锡耶纳和其他地方的画件——的一次非常了不起的综合性画展,格外引人入胜。<sup>①</sup>

在这两个地方我都会见了盟国军政府的负责官员,讨论了一些突出的问题。在佛罗伦萨,我同第十五集团军的领导官员共进午餐,一天的光阴没有虚度,然后在2月26日,我们前往皮斯托亚、卢卡和皮萨。

我从来没有去过皮斯托亚和卢卡。后者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围以城墙的城镇,几乎没有为战争所波及。城里的塔群是它的一大名胜——一种砖石混合建筑物——有几座是圆形的。有几座是方形的。远远看去,会让人想起牛津。<sup>②</sup>

我们受到了统率美国第四军的格雷廷堡少将的盛宴款待,弦乐伴奏,礼遇有加。招待的殷勤周到是无以复加了。皮萨城的南面曾经遭到猛烈炮火,

但是大教堂和洗礼堂没有受到什么毁损。不幸,我们的一枚炮弹落在圣营(campo santo),铅顶塌了下来,火和水给壁画造成了很大损坏——尤其是贝诺佐·戈佐利斯壁画。在来自各大博物馆的英、美专家指导下正进行着非常仔细的、科学的修复和保存工作。<sup>③</sup>

当晚,我和现在统率第十五集团军的马克·克拉克将军共进午餐。他非常友好,非常有帮助。现在他在陆军元帅的节制下指挥意大利地区的全盘军事行动。

2月27日,我们看到了一些盟国军政府官员的活动情形。我

---

① 1945年2月25日。

②③ 1945年2月26日。



驱车至富塔隘口和洛亚诺以外的第二军前进总部。总部位于通往巴洛尼亚的大路上。

此间基斯将军——一位出类拔萃、上了年纪的虔诚(天主教徒)而又显然非常受人爱戴的将军——为我举行一次隆重的欢迎会和盛大午宴。“老式的”鸡尾酒和丰富的饕餮。……之后，我们蹒跚登上一辆吉普车，前往前线他所部前进师的总部，又从那里去到一个观察哨所。从观察哨所上望去，整个战场可以一览无遗——山峰和山脊仍有待克服或在巴洛尼亚陷落之前有待迂回过去。①

关于军事问题，就谈到这里为止。破坏之后，跟着就是复兴。盟国军政府各式各样的官员带我们去参观照顾人民的种种方法，

683 他们带我们兜了几个已成一片废墟的小村庄——就象蒙吉多罗这样的村庄——居民经过战事的起伏，现在正渐渐归来。这些小村小镇有很多每天还当然或多或少地处于炮火之下。我大体上对盟国军政府的这些官员获有深刻印象。他们中间有些是英国人，大多数(在第五军前线)是美国人。关系看上去很好。英国警察也属于我们最优秀的小伙子之列。他们似乎生来就有管人的“本领”，下至乞丐，上至市长、州长，无不受其管理。美国人在抗斑疹伤寒和抗伤寒预防措施等方面的保健工作非常出色。②

一回到佛罗伦萨，盟国军政府第五军军长休姆准将(美国)就飨我们以盛宴，我是主客，备有印好姓名的卡片和其他一切。

在动身之前，我被带到佛罗伦萨的“难民中心”，那里工作似乎干得不错。修女经管着托儿所和幼儿园，风气普遍良好。意大利医生负责医院。院址是一座旧兵营——因陋就简——在我们帮助下逐渐有了改进。佛罗伦萨的所有儿童都被邀参加一个盛大的圣诞节茶会。这是由部队——大部分是由美国部队——资助的，几个星期以前就请他们捐助“糖果”和现款。……[这一切]至少减轻了一点战争的苦难。③

第二天，2月28日，我乘汽车沿着阿诺河谷到阿雷佐去。

---

①②③ 1945年2月27日。

在佛罗伦萨和阿雷佐之间的半工业化阿诺河河谷有很多特殊问题。褐煤矿是可以开采的；但是在设备和财政方面有很多问题，不知怎样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目前，失业问题不大，因为军队可以把工人用在维修路面和桥梁方面。但是由南往北的铁路还没有越过阿雷佐；我怀疑军队是否要修复阿雷佐和佛罗伦萨之间的铁路。他们有来自东西两面（安科纳和莱高恩）比较方便的供应手段，并且由于重要铁路桥梁的大量破坏，这无论如何是一件巨大的工程。阿雷佐曾经遭到盟国和德国双方炸弹、炮弹和炸药的轰击。<sup>①</sup>

我们从那里去到泰尔尼，过去意大利最大钢厂之一的所在地。我在这里发现一位斯托克顿的老友林奎斯特少校，他是盟国军政府的负责官员。

他们已经设法让几座鼓风机开工了，还有几家钢板钢条厂。德国人造成了大量毁坏（还不止于炸弹），但是在英国皇家工兵部队帮助下，已经作出并且正在作出了了不起的改建工作。早已着手（为破坏了的水利发电站）制造重型钢铸件了。看到一个辗轧厂重开夜班，令人不禁有故乡之思！<sup>②</sup>

这番巡视使我对于我们委员会在依然肩负全部责任的地区内的工作情形有了真正深入观察。巡视完毕后，我在下午 10 点左右到达罗马。

不顾华盛顿方面仍然在加诸委员会的种种麻烦和无聊指责，下一步工作是要紧缩和改进总部的结构；进行并作到同意大利工业尽可能的合作；加速“民用化”的步伐；和发送各种供应品。这些问题占去了此后几个星期的时间。

在恢复攻势之前的暂歇期间，我们有一项主要的忧虑，那就是处理意大利北部游击部队的问题。在初春，普遍的看法是，由于交通运输困难，德国人在北意大利的撤退不会很快。疯狂的法西斯分子和形形色色的新法西斯组织会死抱住德国人不放，虽则结果

<sup>①②</sup> 1945 年 2 月 28 日。

要遭到广大群众的唾弃，这会是意料之中的事。重要的是首先要军队，然后要盟国军政府兼程挺进，把局势控制住。某些爱国主义者小组应作为侦查单位并入意大利的战斗团体；其他一些则应立即作为个人加以募用。随着德国人撤退，应力图对游击队和盟军一视同仁，并颁给奖章和勋章。同时我们认为，德国人一旦开始瓦解，马上就会出现不分青红皂白去参加抵抗运动的要求。凡是抱  
685 骑墙态度的人都会急不暇待地投入胜利者一方。千千万万看风转舵的人都会以他们的原则迎合这时占统治地位的一方。我们最乐观的希望就是把供应品只限于食品和衣着两项；规定数量；务使英、美特遣部队尽速开进重要中心，并将游击队集中于几个中心点，这一则为了同他们商议他们或由他们推荐的人在地方行政中所应承担一份责任，一则为了组织正式的武器移交。

在这个阶段上，重要的是既不低估也不夸大游击队的力量。我们万不可试图捧得他们去另立政府，也不应过分打击他们。很多人认为共产党是意大利最强大的政党，在举行选举时，这种看法就会得到证明。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于扮演一个宪政的角色，是不清楚的。有些观察家认为意大利会分裂为两个敌对的政府，一个在北部，一个在中部和南部。在这期间，采取了一些其他的措施，来帮助接待站处理逃亡的爱国主义者，并在他们等待吸收进军队或民政工作之际给以薪给和食物。这个办法产生了至可宝贵的后果，把很多人吸引出来了。但是在近3月底的时候，我所关切的倒是发现仍然有大量武器和军火放在抵抗小组手里。在同盟军总部谈到这个问题时，我得到保证说，现正采取预防措施，只是在紧邻德国前线的后方未加过问，因为在那里，我们打算在目前即将发动的一次攻势中加以使用。3月26日，我曾就北意大利一旦落在我们手里所应采取的计划，同博诺米有过一次谈话。虽则在最初阶段会处于盟国军政府的管辖下，但是我切盼尽一切可能加强意

大利政府的地位，提高它的威望。凡有助于防止共产党人极端行动的任何方法都不加忽视，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建议应广播一项政府宣言；虽则是在盟国军政府辖区中，也应在米兰、都灵、威尼斯等地举行胜利庆祝会，在庆祝会上所有各党的政府成员都应发表讲话。其次就是改组政府的问题——要把社会行动党也包括在内——并延揽几位来自北方的新人物。我也渴望由新意大利“gruppi”（即战斗营）带队进场，当然，如果他们进场，亲王就没有理由不检阅他们——并同时检阅他的北意大利的臣民。<sup>①</sup>

我将最后一项建议向亚历山大提出，他以同情的态度予以讨论，并且作了相应的安排。博诺米看上去也很高兴。

我们现在深为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交活动所苦。诺埃尔·查尔斯爵士和柯克这两位大使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作了。罗斯福驻梵蒂冈的私人代表迈伦·泰勒，忽来忽去而并没有任何紧急任务。克莱尔·布思·卢斯夫人的到达又是一个豪华宴会的信号。第二天上午去看一看委员会已经推动起来的实际工作，倒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我在西夫上校（马克斯的伊斯雷尔·西夫和斯潘塞的儿子）和约翰·阿特金森陪同下前往契维塔韦基亚。西夫上校在盟国委员会运输小组委员会工作。他非常聪明（正如不出所料的那样）而且风采动人。契维塔韦基亚港现在已经由军方移交给意大利政府。盟国委员会正帮助他们修理和重建。这项工作是在意大利当局管辖下进行的，我们只有两名官员参预其事（一名是运输方面的港口联络官，另一名是修理方面的太恩塞德工程师）。<sup>②</sup>

我对于所取得的成绩具有深刻印象。虽然港口曾经受到很大毁损，而且它的起重机、小麦装卸机之类过去非常出色的设备，也都遭到了破坏，但是现在已有五个停泊所在使用，其中过半数是容纳

① 1945年3月26日。

② 1945年3月27日。



自由轮而不仅仅是沿岸贸易船的。

主管意大利占领区事务的共产党人部长毛罗·斯科奇马罗希  
687 望能获准前去用他的影响力促进亲善和容忍,但是我认为,凡可能作出的安排,现在实际上都正在进行,没有必要答应他的要求。

4月16日,米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无党无派的主席皮佐尼来访。(他以隆吉这个名字而为抵抗运动所熟知。)他是一个银行家,为人和蔼,性格沉静,曾在伦敦大学求学,通情达理而又具有爱国主义精神。他并不隐讳他的焦虑。有些共产党人想去掉他,但是我鼓励他继续坚守岗位,力图对极端分子起缓和作用。

他对于我们在解放以后如何可以成功地和……爱国主义者打交道,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主要问题——象通常一样——将会是解除武装。隆吉不愿再搞政治,想回到商业方面去。这似乎是深可惋惜的,我也以此相告。<sup>①</sup>

在4月中旬,斯科奇马罗希望能每天广播一次。我认为让他这样做倒是一个好主意,虽则有人反对。如果他每天广播,这倒至少可以把他束缚在能以核对的声明上。

虽然在解放到来时定会有一些混乱,但是我们所作的安排证明大体上是成功的,至少就意大利地区而言。最后一次反攻的神速帮了我们的忙。那次反攻在4月9日发动,到月底就结束了。但是依然遗留下一些棘手的问题。在战事的最后几天,意大利想要派他们的代表去北方,并以此就商于副委员斯通海军少将。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兹笔录如下:

1. 我曾经同陆军元帅就关于派三、四名意大利的主要阁员去北意大利这一建议进行商讨。

2. 我们都认为这是不适当的。诚然,在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接受前来罗马的邀请和我们得知他们的谈判结果以前,甚至不应加以

---

<sup>①</sup> 1945年4月16日。

考虑。

3. 卡诺萨的先例在意大利记忆犹新。

688

4. 如果你们愿意以此作为你们同博诺米谈判中的一道指令，即请照办。

下一步就是停发游击队组织的大量津贴。如果我们能够剥夺他们的薪饷和武器，和平改造的前景就会更顺利些。

能够得以比较和平的过渡，应部分归功于皮佐尼自己，部分归功于几个月之后继博诺米担任首相从而成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及南部完全联合之象征的巴里，还部分归功于很多英、美官员在各个领域中沉着镇静、百折不回、专心致志的工作。这些人过去用降落伞空投下来，作为同抵抗组织的联络人员而长期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这时得到了部队和盟国军政府先遣官员的增援，这些官员既老练而又坚定地掌握了艰难局面。意大利多亏了我们在这个伟大的日子到来时给予它的备受折磨的人民以精神和物资方面的援助。我们的成功将在意大利嗣后的政治史记载中得到证实。这是英、美联合组织在这一领域内的最后一个伟大成就。我的确以主持它的重要机构之一——盟国委员会——而引以自豪。

在1944年的夏、秋两季，为向巴尔干各国提供救济曾经拟订了很多计划。休斯将军的组织曾经为此目的从开罗迁到卡塞塔。但是我们一直缺少船只，也缺乏供应品，特别是衣着。早在1944年10月我们就已经提出了我们的要求。

据统计学家计算，如果美国公民自己肯接受三倍半于英国人的衣着标准，那么，美国目前的能力在一年之内就能生产出足够的数量，使整个欧洲重换新装。但是口号自然是“反对在总统[选举]年实行配给”。<sup>①</sup>

在罗马尼亚，到了战役的最后几个月，大局已陷于分崩离析状态。1943年8月迈克尔国王的武装政变已经产生了使德国部队

689

<sup>①</sup> 1945年10月12日。

解除武装的结果。保加利亚也同样试图对德宣战。但是在这两个场合下，俄国人已经夺取了主动权。等到勒罗杰泰尔到达罗马尼亚，霍斯通·博斯瓦尔到达保加利亚的时候，除开为英国人在停战委员会中争取一席之地外，已经几乎无能为力了。关于在巴尔干各国所占势力的百分比问题，莫斯科协定实际上已经予以解决。我不时得到有关大局的极好的简报。但是我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至少在这两个国家一切都完了，在匈牙利亦复如此。1月间，勒罗杰泰尔于归国途中在卡塞塔我们这里小作勾留，并就俄国人管理罗马尼亚管制委员会的情形向我作了汇报。

他们似乎决心把他们所能从这个国家拿到的东西都席卷而去。他们拿走了油井的大部分机器（这碰巧是属于英、美股东的），现在正把很大一部分的居民运走。他们把成年男女（儿童则留下来）带到俄国去开采煤矿等等。但是因为在数九寒天把他们都放在装载牲口的敞篷车上（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所以他们的作法不但看上去非常残酷，而且极其愚蠢——因为其中没有几个能到达目的地。<sup>①</sup>

根据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逻辑，为此而予以定罪的人都是从已经在罗马尼亚定居了很多代、甚至很多世纪的六十万德裔罗马尼亚公民中抓去的。

在阿尔巴尼亚，虽然我们的官员曾经组织了一个抱有亲盟国、反共情绪的强大而忠诚可靠的抵抗运动，但是现在形势已逐渐恶化。霍查将军渐渐取得了支配权，虽然英、美两国政府当然拒绝给以承认，但是我们却奉命送进救济品。结果，阿尔巴尼亚完全落入共产党之手，我们的朋友已处于“被清洗”的危险之中。我清楚记得比尔·麦克莱恩和朱利安·艾默里要求我设法把阿巴斯·库皮和他的组织的其他几个成员清除出去。我未被授权就这样作了，而且从来没有为这样作而引以为憾。阿尔巴尼亚这个具有农民和

---

<sup>①</sup> 1945年1月15日。

氏族传统的蕞尔小国，不但这时变成为共产主义的，而且一直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中流砥柱。实则这个小小的正统的牧羊童大卫向俄国修正主义的金刚戈莱厄思进行挑衅的争斗，却有或多或少荒唐可笑的一面。同时，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我们已经不能不把阿尔巴尼亚甚至比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更加彻底地一笔勾销。

对于奥地利，我们不是直接参与其事的，虽则我们收到了商订占领区协定的困难情形的有关消息。说来奇怪的是，这是除德国外，俄国同意分割权力的唯一的国家，虽则他们并不是处于不能强人从己的地位。这时，我以超然的兴趣注意4月底所发生的一切。在十多年之后，我就要去签订一项条约，终于得以把奥地利从盟国——俄、法、英、美占领之下解放出来。

法国在意大利边境上的军事行动造成了进一步的不安。艾登切盼法国部队在军事行动的条件许可下尽速从意大利地区中撤出去。另一方面，马克·克拉克将军却认为法国加诸意大利西北部奥阿斯塔谷的威胁是牵制德国若干师兵力的一个至可宝贵的因素。到4月20日，据认为德国人将移师东向，去援助开始威胁着他们在波河以南的那种无可救药的处境。在这个时刻，尽管有政治上的牵连，我力请艾登支持亚历山大和克拉克把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考虑置于一切之上的那种愿望。根据两项理由，我认为以此力请是不无道理的。亚历山大由于兵力不断削弱而在战事上遭到多次挫折之后，不要在这个阶段上再给最后胜利加上一道新的障碍似乎是正确的。第二，我认为法国入侵愈深，最终的危险则愈少。如果他们能进入他们无法提出任何权利主张的奥阿斯塔谷以东的地区，那么战役的军事性质也就会突出了。丘吉尔同意这种看法，并且相应致电艾森豪威尔和我。

结果，法国人在完成了他们的战术任务之后，奉命于4月30日撤退。但是指挥部队的将军直截了当地拒绝接受未经法国政府



同意的这道指令，其后果成为德国战败后我们所面临的很多困难问题之一。

由于对意大利西北部不重要的渗入而引起的人心愤激之后，铁托的南斯拉夫游击队对东北各省的重要占领的危险却证明要严重得多。威尼齐亚—特里登蒂纳和威尼齐亚—朱利亚两省既然都有占绝大多数的奥地利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所以尤其脆弱。在早期阶段上经决定必须尽速在这整个区域内建立军政府。1944年8月间，威尔逊将军就盟国可能要采取的态度向铁托元帅提出了警告。国务院和外交部都认为在战后解决办法尚未确定的时候，盟国必须控制这两省。1945年初，已渐渐认清要占领威尼齐亚—朱利亚全省大非易事的时候，亚历山大所采取的方针是：考虑到奥地利方面的军事行动，控制通往的里雅斯特和波拉港的盟国交通线，是有绝对必要的。因此以一条确定的边界将威尼齐亚—朱利亚在军事上分隔开来，即可满足他的要求。但是，在政治上这不是一个很有利的解决办法。这会使对南斯拉夫在这线以东的地区的主权难免要最终予以承认。亚历山大和我认为最好是仿照为奥地利所缔结的协定，安排三国占领，而以南斯拉夫为伙伴国之一。

因为时间紧迫，所以亚历山大决定亲自往访铁托。国务院坚持我们应该把军政府的管辖权扩大

692 到整个威尼齐亚—朱利亚省。如果铁托捷足先登，事实上，这就要作不成了，我认为承认既成事实却要现实得多。<sup>①</sup>

但是亚历山大仍然希望谈判一项无疑是现实主义的纯军事协定。这样一项协定由于能为我们确保的里雅斯特而会满足我们迫不容缓的需要。

美国人强烈反对。作为意大利的“受托人”（他们说），我们应该坚持

---

<sup>①</sup> 1945年2月17日。

占领整个威尼齐亚—朱利亚省，并根据意大利停战条款设立军政府。在理论上这固然很好，但是在事实上，却难以看出我们如何能把铁托驱逐出去。<sup>①</sup>

但是，考虑到美国的反对意见，我不得不劝请亚历山大请示参谋长联合会议。这意味着他只能在这次会晤时“摸一下”铁托的底，回来之后再根据和他商谈的情况提出建议。

当然，这个（很容易变成为迫切的）问题原应该在〔雅尔塔〕会议上予以处理。但是他们要么是忽视了，要么是规避了。<sup>②</sup>

在2月21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铁托同意了通往的里雅斯特的交通线，也同意了盟国军政府必须在我们交通区域以内进行军事行动。但是他要求将他已经建立的民政当局保留下来，虽则他同意要这些机构对盟国军政府负责。他不希望亚历山大占领伊斯特拉半岛，但是他提出经由卢布尔雅那通往奥地利的另外一条交通线。

不久就认清，铁托打算把他的权威伸展到意大利尽可能大的一部分地方。在伊松佐以东，除德国人依然盘踞的地方外，完全处于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控制之下。他们正在竭尽全力把他们权威伸展到乌迪内全省。只要有方法可想，他们决不肯不加一试，包括对共产党人占大多数的意大利旅的颠覆活动在内。

陆军元帅一回来，我们就有一篇很难下笔的报告要写。亚历山大认识到要把我们的政府强加在强大游击部队头上在军事方面的重大困难，他提出了两项可能的办法。第一，把威尼齐亚—朱利亚省分成为两部分，以东部分留给铁托；第二，在全区建立军政府，但是允许南斯拉夫人在里面发挥一定作用。国务院把这两项建议作为一个原则问题而大力进行斗争。但是没有人准备回答亚

---

①② 1945年2月20日。

历山大的成败攸关的问题。如果南斯拉夫人反对他占领威尼齐亚—朱利亚全省，他是否要使用武力呢？对此，没有现成的答案，除非授权他把美国第二军团留下来加强军事地位。

4月26日晨，陆军元帅举行他例行的政治会议。战役日益临近结束；德国投降不过是几天的事了。但是这个严重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威尼齐亚—朱利亚是长长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我们仍未奉到任何指令。经过漫长讨论之后，副参谋长（兰尼兹尔）所拟草案已被驳回，该项草案建议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占领威尼齐亚—朱利亚全省。我却使我的建议得以通过，我的建议是：陆军元帅（如果为了政治原因未接到再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指令）可满足于试图取得的里雅斯特和罗伯逊（或威尔逊）线。这可以作为确保盟国通入奥地利的交通线的一种军事上必要来向铁托和（或）斯大林进行抗辩。<sup>①</sup>

亚历山大把他除非另接指令就打算遵循的这项计划呈报参谋长联合会议。他将攻取威尼齐亚—朱利亚省内对他军事行动必不可少的那些地方，包括的里雅斯特以及通往该地和自该地通入奥地利的交通线在内；并将攻占波拉。在这个地区，他将建立由他负责的盟国军政府。这个政府将通过适当的地方团体来进行管理，不管是意大利人的团体还是南斯拉夫人的团体。同时，他将把他的打算通知铁托元帅，告诉他在这个地区他的任何部队都必须置诸亚历山大他本人的统率之下。但是参谋长联合会议的参谋长们不  
694 满意，并下达了强制执行的命令，饬盟军部队接管威尼齐亚—朱利亚全省，包括阜姆和夸尔纳罗洛群岛在内。他们正要求俄国人对铁托施加压力，要他撤出他的部队。但是，参谋长联合会议显然担心指令的后果，所以补充说，“在任何实际冲突之前，必须同参谋长联合会议先行联系”。这在我们看来似乎是对局势的一种特别不

---

<sup>①</sup> 1945年4月26日

现实的想法。

事实上,对华盛顿和伦敦来说,事态进展得太快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先于南斯拉夫人而到达的里雅斯特,这个任务是5月2日由新西兰师完成的,而没有同南斯拉夫部队发生严重冲突。德国驻防军仍然盘踞在城里,不能不加以对付。但是弗赖伯格将军凭着他素来的沉着镇静,非但能以一箭双雕,而且还进入了已经由铁托部队部分占领的戈里齐亚。

接着是双方加强团结。但是我们面临的困难重重,在得以达成和解之前,很有几番焦虑的时刻。对德战争虽将马上结束,但是欧洲的新冲突和对峙就又要开始了。

随着悲剧的揭幕而使我们愈益关心的另一个国家,就是波兰。它的前途,除了会影响亚历山大统率下的波兰军团的士气之外,原是和我们不相干的。随着时光月复一月的流逝,安德斯将军及其英勇部队一向凭以得到支持的光明希望开始消失了。德黑兰会议是令人沮丧的,然而并不是成败攸关的。倘若波兰丧失寇松线以东的领土,那它会由奥得—尼斯河边界予以补偿。但是在1944年初,安德斯将军及其主要官员开始表示深刻的焦虑。一个波兰人民委员会在华沙成立了。俄国军队开始跨过1939年以前旧波兰的边界,并于1944年1月宣布将寇松线以东的全部领土无限期地归并俄国。

在1944年4月间我访问安德斯将军之后,我一直经由军事联络部门同他保持经常联系。当年5月间,在人民委员会的代表奉派去同波兰爱国主义者同盟的代表会谈时,一个后来成为卢布林委员会的核心建立了起来。无论它的组成或它的性质,对于战场上的波兰军队都不是有吸引力的。历经整个夏季,俄国军队渐渐推进到波兰境内,在1944年7月23日卢布林被攻占或解放之后,发表了一项宣言,宣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俄国向它负行



政上的责任。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门面而已。共产党人盘踞要津，寥寥几名非共产党人后来也都被排除了。悲剧性的华沙起义接踵而来，成为战时最沉痛、最骇人听闻的插曲之一。7月29日，波兰共产党人从莫斯科广播，鼓励华沙的抵抗运动起来反抗德国人。8月1日，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开始了。但是俄国却把他们军队的主要攻势转而南向，直捣罗马尼亚，而并没有为援救华沙作出任何真正的努力。英、美两国政府徒然地试图说服俄国人允许他们利用他们的飞机场供我们驰援的飞机着陆和加油。但是，照例的冷酷无情的否决一直在东方式的、无动于衷的态度下保持到10月2日华沙起义瓦解时为止。所以，可能证明是对共产党统治有危险的人大部分都为德国人成功地加以清除。在踵随莫斯科会议之后的整个这段悲剧性故事中，我们在意大利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但是波兰的好男儿都投入了大约两年前从俄国开出、现在正忠实而勇敢地和我们并肩作战的那些出色的部队中。

1944年9月15日，我在亚历山大的饭厅里同安德斯将军有过一次长谈。

他非常通情达理，承认首先打败德国敌人的必要性。但是，他自然对于俄国人和华沙悲剧备感辛酸。<sup>①</sup>

同时，我认为他会对任何合理的解决办法进行合作，并且我很高兴我们已经商定送他回国去同在伦敦的波兰政府进行商谈。

696 事情的整个悲惨过程继续未已，在伦敦的波兰各政党的不和可能在当中起了作用。然而，卢布林委员会只不过是俄国人手里的一个工具罢了，当雅尔塔会议宣布承认这个机构为临时政府时，这对我们的波兰朋友自然是一个重大打击。关于延揽国外波兰人的民主代表这一手，被看作是一个骗人的幌子。重新肯定俄、英、

---

<sup>①</sup> 1944年9月15日。

美三国“保证建立一强大、自由、独立和民主的波兰”<sup>①</sup>的这个愿望，惨遭轻蔑。这项决定于1945年2月12日公布，安德斯将军的直接反应就是要求陆军元帅将波兰部队调出前线。16日，他发出了他致伦敦的著名电报，电文中声明第二军（安德斯将军的部队）拒绝承认雅尔塔决议，而把在伦敦的波兰政府看作是“一个主权独立自主的波兰的”唯一代表。

正是在这种沉痛的气氛中，我在2月17日会见了安德斯将军。陆军元帅曾经邀他和他的副官卢博米尔斯基亲王共进晚餐。亚历山大明智地鼓励他直言无隐。他自然大有幻梦破灭、万念俱灰之感。

一番颇为沉痛的讨论——或勿宁说独白——其间安德斯将军说，波兰完了，被他的盟国出卖了。整个欧洲屈服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sup>②</sup>

我们无言以对；但是我们心情非常抑郁。

安德斯将军是一个好样的人。他曾经八次受伤，在俄国监狱中关了两年。他曾经在那次踏遍世界许多地方的非凡的进军中同他的波兰同胞在一起——他遍历俄国、土耳其斯坦、巴勒斯坦、埃及和意大利。<sup>③</sup>

这是一个凄惨的黄昏。

波兰人所遭受的最大损失也许就是他们的流亡政府第一任首相西科尔斯基将军的逝世。我确信，要是他在世的话，

伦敦的波兰政府决不会自甘沦于它目前所处的毫无价值的名存实亡的 697  
地位。<sup>④</sup>

安德斯将军即将前往伦敦商谈。我确信他的武士般的忠诚依然不会受到影响，但是显而易见，他的部队一定会有骚动。

往最坏说，他们将瓦解成一批乌合之众。往最好说，他们也只能继续团结到守住一段战线，而无法发动进攻或反攻。我不认为可以把他们用于进攻方面。<sup>⑤</sup>

---

① 雅尔塔宣言，1945年2月11日。

②③④⑤ 1945年2月17日。

这个判断经证明是错误的。我低估了安德斯及其同志们的了不起的高贵和忠诚。他们在4月间的最后几次战役中，冲锋在前，功勋卓著。他们丧失了他们的国家，但是他们保持了他们的荣誉。

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件事。在1946年6月举行胜利游行时，现处于反对党地位的丘吉尔战时内阁的那些旧阁员都分配在一个看台上，可以从那里看到我们所有盟国的胜利游行。没有人请波兰军队参加，却要求在皇家空军服务的出色波兰籍空军战士的二十五名代表出席，但是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拒绝。当时我给安德斯写了一封信表示我的心情。我告诉他，在他的老同志当中，我们的一切欢乐和自豪也许是和歉仄、甚至羞愧感交织在一起的。

4月13日，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传来。当然，我早已听说他的健康情况恶化，这是每一个人在雅尔塔都注意到的。

何况，总统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合照的发表，曾经给人以深刻印象，因为总统看上去是那样羸弱。<sup>①</sup>

虽然如此，他的逝世却仍是一个巨大的震撼。他曾经统治一个先是友好中立国、继而是忠实盟邦的美国那样久的时间，以致仿佛是一个时代的告终。在罗马举行了总统的追悼仪式。

教堂里座无虚席，仪式是令人感动的。意大利内阁全体出席，还有监国(乌姆贝尔亲王)。仪式嫌长一些，但是进行得很好。<sup>②</sup>

在意大利的最后反攻已于4月9日发动。

陆军元帅刚刚开始他的意大利战役。一上来很得手，但是当然我们的兵力非常薄弱，而德方却拥有他们最精锐的几个师。<sup>③</sup>

关于这次战役我们简直没有得到什么消息，我们对于战事的可能发展也没有任何清楚的印象。

北部的真正困难是若干不肯定的因素。如果我们知道究竟德国人

---

① 1945年4月14日。

② 1945年4月12日。

③ 1945年4月15日。

是寸土必争，还是终于集体投降，那么，制订我们的计划就要容易多了。我想我们很可能看到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形——也就是，德、意法西斯部队可能分裂成为两个或更多的集团，并逐渐被逼到这样一种境地：内部核心会苟延残喘一段时期，但终必投降。<sup>①</sup>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未定之天。实则，如果德国人决定打到底，那么不增派部队给亚历山大而要使战事告一结束，将证明是不可能的。

他现在力图在兵力不足的条件下打这最后一仗。他可能靠了他占压倒优势的空军力量的适当战术运用，并靠了他的火力和弹药的优势而取得成功。果真如此，这将是一个奇功殊勋，所以我们还不能不作好拖延时日的准备。<sup>②</sup>

我现在决心要看这场战役的结果，因为我知道这会是最最后一次，失之交臂似乎是一件憾事。我也想看一看军政府官员所作所为的情况。战线呈静止状态已经有好几个月了。现在战争的变动性很大，军政府不得不紧随军队之后，我可以看到真情实况。

4月20日我从罗马动身去佛罗伦萨，马克·克拉克将军派了 699 一辆轿车来接我，并派一位军官给我带来令人鼓舞的消息。5点30分我又离开佛罗伦萨，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就到达了福尔利。在这里，我受到第八军的盟国军政府主管官康·本森空军中将那位老友及其幕僚的欢迎。在同他及其官员稍事商谈之后，我就去同司令官迪克·麦克里里将军共进晚餐，他过去在突尼斯时曾担任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在利斯将军去缅甸之后，他接长第八军。

迪克·麦克里里风采非凡——而且极其聪明有为。他始终使我认为是我在这里送别的那些陆军军官中最精明强干的一个。<sup>③</sup>

晚餐后，将军把我带到他行军的大篷车里，向我说明直至目前为止的战役经过。他现在真正希望有重大的战果——波兰人和新

<sup>①②</sup> 1945年4月15日。

<sup>③</sup> 1945年4月20日。



西兰人在第八军的前线已经作出了很好的开端。

前者自称曾击毙德国人二千名，后者也给敌人以重创，而且他们都是同德国的第一流部队——伞兵部队和装甲部队对垒交锋的。<sup>①</sup>

康·本森已经在盟国军政府的一个出色的时间表上安排了第二天的活动。

我们从福尔利（在这个现代市政厅我度过法西斯式豪华的一夜）动身，走遍法安扎、伊莫拉（刚刚攻占——今天第八军正向它的邻近地方移动）、卢果、腊万纳、克拉塞、切泽纳、里米尼、里奇奥尼和佩扎罗等地。我们巡视的范围包括同这个省的官吏会晤并讨论各种问题（美占区特派员鲍曼上校是我们的向导），视察一个修理好的抽水站，看看为控制这一流域的排水系统是否有进一步修缮的必要；参观一个正在工作的意大利扫雷小组；看了接待和照顾难民的机构以及在盟国监督和帮助下进行的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活动。<sup>②</sup>

700 所有这些官员都“准备好”前往接管这一区的北方各省。

除作为此行之借口或理由的这些业务活动之外，我还有幸在那位考古学专家第八军的牛顿少校的引导下，看一看腊万纳和里米尼。

里米尼惨遭破坏——不幸，美丽的马拉泰斯塔寺也毁于炮火。这个寺院曾经一定是一幢非常美丽的建筑物，它那非凡之美从外形的残迹中犹可概见。它原来是一座十三世纪后期的哥特式教堂。根据西季斯莫多·马拉泰斯塔的命令，靠了阿贝尔蒂的天才，它被建成为一座文艺复兴时代的辉煌建筑物。<sup>③</sup>

腊万纳比较幸运。圣维泰莱庙，加拉·普拉奇迪亚的陵墓，希腊教的洗礼堂，新圣阿波利纳雷堂，阿里乌斯教的洗礼堂和克拉塞的圣阿波利纳雷堂——所有这一切都大体完整无损，它们宏丽的镶嵌细工也保全了下来。狄奥多里墓也没有损毁，虽则有一枚炸弹几

---

① 1945年4月20日。

②③ 1945年4月21日。

乎击中，爆炸于几英尺之外。继而在里奇奥内为我设宴，出席的官员不下六、七十人。由鲍曼上校作主人，热情祝酒；由于他们知道这一天是我的银婚纪念日就更加闹哄起来。

我从里奇奥内乘汽车回到伊莫拉，我在第八军总部附近陆军元帅的“卡利登营地”中一辆舒适篷车里过宿。第二天清晨我偕同麦克里里将军一起乘吉普车启程。酣战方殷，战事进展颇为得手。我们访问了阿巴思诺特将军所部的第五十六师和厄斯金准将所部的第二十四警卫旅。

他们距离前沿阵地约一百码左右。苏格兰警卫队和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为断桥所阻（在桥被毁之前，旧步兵第三团曾试图冲过去）。工程兵需花费六小时，方可继续挺进。显然，尽管战斗激烈，仍是人人奋勇。<sup>①</sup>

我们在第八军前进总部进午餐，在总部我见到了我的老朋友约翰·哈丁，他现在大为高兴的是，他已奉派统率第十三军团。这一天的下午和黄昏，我们都是同新西兰师和波兰人一起度过的。<sup>701</sup>

波兰人仗打得很出色，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关于政治或波兰的前途，一句不谈；除开以军事行动炫威耀武之外，别无所为。我几乎不认识安德斯将军了，我上一次在卡塞塔看到他精神非常抑郁。“一次令人非常愉快的小战役；我们已经击毙德国人两千多名；人们到处都可以察觉。”<sup>②</sup>

第二天，4月23日，的确是一个吉日。第八军借给我一辆小轿车和一名宪兵，我偕同委员会的公共关系官斯图尔特·布朗那位美国人和我的副官阿特金森中尉驱车直入波伦亚。波兰人和美国人刚于前一天开进波伦亚，我们发现这里人心相当激动，但是没有任何混乱情形。统辖第五军军政府的休姆准将已经到达，并且

① 1945年4月21日。

② 1945年4月22日。

把自己安置在金碧辉煌而且未遭毁损的市政厅里。法西斯的黑衫旅曾经在离去的前夕枪决了两名著名的自由主义领袖。尸体停放在市政厅里，一大批秩序井然的群众，拿着鲜花，含着眼泪，川流不息地进行凭吊。

受害者之一，叫马里奥，是一个老人，满头白发，面貌端庄——显然是一位忠厚长者。棺柩敞开着，以便朋友和仰慕者可以最后一次瞻仰他们领袖的遗容。他们是在靠着市政厅的一面墙的地方被枪毙的——血迹历历在目。在他们所站立的地方上面早已布满了鲜花和——不胜悲惨地——近几个月被法西斯黑衫旅处死的男女老幼的照片。<sup>①</sup>

省长——一个法西斯分子——未能来得及逃跑。他已经紧跟着他的最后一个被害人而被游击队枪决。你可以看见他迸溅在砖上的脑浆和洒溅在地上的鲜血。

我们用了一个上午同盟国军政府各式各样官员和一些意大利人讨论公事。

702 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人来访，看上去相当沉着冷静和讲道理的。省、市长的临时任命早已获得一致同意，城内秩序井然。有自来水——和少量电力——可供利用。似乎存有相当数量的食品。人口由于战争地区农村居民的涌入而激增。现在大约有六十万人，而正常时期只有四、五十万。<sup>②</sup>

我们在早经军政府接收的一家饭店中进午餐，饭店里现在是以美国的定量配给，由意大利厨师供应盟国官员，而不是以意大利食品供应德国官员了，这是意味深长的。

之后，休姆将军、布朗、阿特金森和我分乘吉普车两辆，动身去摩德纳，这个城市约在波伦亚西北二十英里，座落不详。我们原拟在前一天到达，但因炮火猛烈而中途折回。不过据说美国坦克已经在那天早晨穿城而过了。

---

<sup>①②</sup> 1945年4月23日。

这番汽车旅行是十分有趣的，甚至是令人兴奋的。前面还有一段路程，每到一个村庄，人们都手持鲜花出来迎候。在离城大约五英里的地方，我们赶上了一营雄纠纠前进的美国步兵。我们问他们去作什么，他们说要去及时攻打摩达纳并加以占领。①

我们驱车进城，希望抢先他们一步。

城里有零乱枪声，但是不太多了。

我们到达市政厅引起了一定的激动。到处是欢呼和拥抱。游击队领袖一听说我是著名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被英国广播电台说成是意大利人民的统治者和意大利人民之父——就马上吻我的两颊。给了我一个臂章，并把我带进市政厅进行正式登记。②

要么是因为这一番举动引来了相当拥挤的人群，要么因为人们已睡好午睡，要么是因为正把一队法西斯分子带进俘虏营，突然之间沸腾起来了。

以游击队员(装备相当精良)为一方，以在各个窗口等处极有利的射击地势的若干德国人及法西斯分子为另一方之间的两小时决斗，现在开始了。③

我们的游击队表现得很好，并开始非常内行地仰射德国人。

他们的一挺机关枪对准一批特别讨厌的狙击手(正控制着大街)，并且把手榴弹运用得得心应手。④

因为没有英、美部队，而我又是一位身穿便装的文官(虽则现在我带上了游击队的臂章)，我和我的同伴只好设法在这一军事行动中显身手。

但是自然，我们不能不显得要作出一点贡献。在继续交火并相当激烈起来的时候，这倒真正不失为一场令人激动的小战斗。当然，有很多游击队员完全漫无目的地开枪和仅仅为了开心而投掷手榴弹。实则，这些大人先生和他们种种稀奇古怪的步枪、手榴弹、手提机关枪等等，倒比我们的敌人使我更加惶惶不安。⑤

---

①②③④⑤ 1945年4月23日。



最后，战斗渐渐沉寂下去，我们不认为就此离开会有失体面了。我们把我们的吉普车开进主要大街附近一个圆柱门廊下的阵地中。

经过许许多多握手和欢呼之后，我们登上吉普车，顺着大街疾驶而去。在我们来到总算未发生任何意外而开进的那道障碍物之前，倒是一帆风顺的——几乎未发一枪一弹。不意这道障碍物外面有一个家伙被喧嚣声引得活跃起来（或许是从午睡中醒来）。无论如何，他相当有效地控制住进出口。我们慌忙从吉普车上跳下来，尽量靠近两边的墙根——虽则有点丢脸，毕竟不失为明智的。我们的几个朋友出来了，他们终于从附近一幢房子的窗口把他抓住。我们于是离去……而没有再发生意外。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插曲。<sup>①</sup>

布朗和我自然自称我们“解放了”摩达亚！

704

我们回到波伦亚，我的轿车和宪兵扈从原都小心翼翼地留在那里。一簇簇人群欢呼雀跃，但不是狂暴恣睢。有几个据说是法西斯分子的姑娘被剃成光头，我们的军政府官员对此加以反对，这是很对的。但是游击队员把这个事件归咎于傻小子们的敌对情绪，而不是归因于政治动机。

星期三（25日），我们将要在波伦亚设法解散三千五百名游击队员，并解除他们的武装。他们将全体列队游行，接受克拉克将军的检阅。他们将缴出步枪，并领取由亚历山大陆军元帅颁发的证明书。（这项办法早已行之于更南边的一些地方，我听说这类证明书在黑市上可以高价出售——这倒是起激励作用的。）他们可以任便选择，或参加意大利军队（如果适龄的话），或进入特设的中心，由我们设法供应三餐并加以照顾，直到他们可以受雇于盟国或回到通常的民用企业就业时为止。<sup>②</sup>

阿特金森和我回到卡莱东营地，陆军元帅将到那里进晚餐。这确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盛会，人人对于战事都极其乐观，因为战局依然一帆风顺。当我回到罗马时，我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

---

<sup>①②</sup> 1945年4月23日。

意大利首相维托里奥·奥兰多已应邀前来午餐。

我欣赏这位老人。他已八十四岁，我看到他就想起劳合·乔治的很多事情。他是西西里岛人（正如劳合·乔治是威尔士人一样），因而和通常的意大利思想类型稍有不同。他非常幽默，看上去精神抖擞。……我们一直谈到3点30分钟。奥兰多对于最近的将来感到悲观，但是对于意大利的最终恢复却抱有信心。他认为共产主义不会以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持续下去，而不得不适应意大利精神，否则就不能维持久长。<sup>①</sup>

现在战事急转直下，我知道它已近尾声了。德国人一败涂地，约有七万人被俘。无论在我本身职责方面还是在协助亚历山大解决他面临的棘手问题——预料中的德国投降问题——方面完成了一切必要任务之后，我溜到阿西西去了。年轻的罗伯特·塞西尔和我偕往，他曾经受过伤，并且已经参加我的工作班子充作另一名副官。<sup>705</sup>

气候温暖宜人。

上午10点，罗伯特和我在象真正英国4月的那种天气中动身，散步到苏巴西奥山山坡上一个小小修道院（埃雷莫·德尔·卡尔切里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原是圣方济栖身之所。往来用了三小时，虽然相当疲乏，但对身体很有裨益。在这样令人神往的环境中安安静静地度过一天，真是妙不可言。我们在烈日下休息时感到非常热，可是一阵阵暴雨却使我们清凉如洗。<sup>②</sup>

我们在几个大教堂里消磨了一下午——其中包括圣方济、圣基阿拉和圣鲁菲诺的上教堂和下教堂。黄昏时分我们听到米兰的游击队员已经抓到并吊死了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分子的消息。幸而直到更晚一些时候，我们并未听到那些骇人听闻的详情细节。

夜幕降临时，从亚历山大方面传来的讯息说，德国代表已经依照同意的条款签署了军事投降书。我们事先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想避开，因为这是军事而不是政治事务。我不出席

<sup>①②</sup> 1945年4月29日。

会有助于防止俄国人怀疑其中有政治的一面。

我很高兴亚历山大的大捷（现在有俘虏十万名）已经继之以和他对垒交锋的军队的投降。这是对他的战略和战术部署的一个全面的辩护词。<sup>①</sup>

现在，要不是在德国本土和其他地方战事还处于最后阶段，大战实际上是告终了。听过无线电广播之后，我们走到大教堂外面的广场上，在夜色苍茫中对人事的沧桑反复思量了一番。

……我决未料到能在阿西西听到地中海战役结束和欧洲战争已临最后阶段的消息。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有时象是过了六个星期，有时则象是过了六年或六十年了。要把战争“告一”结束——或让它临近结束，是多么不容易。<sup>②</sup>

706 夜色多美好。当月亮升起，整个山谷仿佛被人造光照得光明皎洁。

希特勒尽管有他一切的罪恶权势，有他的力量，有他的自吹自擂的伎俩却只是苟延了〔十二年〕。圣方济似乎并没有很大权势，却在这一可爱的〔地方〕，人们看到善的巨大力量而万古常存——一番颇堪令人慰藉的沉思。<sup>③</sup>

在历史上这一伟大的时刻，能在阿西西这样安闲适意，悠然自得，实令人不胜快慰。

---

①②③ 1945年4月29日。

## 第二十五章 德国投降

707

3月8日，凯塞林所部的一些官员希望讨论投降条件的最初迹象已经传到我们这里。这项消息是通过美国战略情报局传来的。根据这项情报，党卫军和德军最高统帅部司令官的代表可以指望前来瑞士的卢加诺，并准备谈判北意大利德国部队的投降。

亚历山大立刻派人来找我，并告知所发生的一切。回想到意大利停战协定一切复杂的准备工作，我劝他首先要打给首相和帝国总参谋长一份私人电报，陈明他建议的应行遵循的办法；其次，在得到伦敦的回音之后，再将这项消息和行动计划正式报告参谋长联合会议。

如果德国官员要办的话，他们就必须去到瑞士，必须携有凯塞林元帅署名的授权证书，必须同意前来盟军总部，而且谈判只能以军事投降为限——而不得涉及任何政治或政府方面的事情。<sup>①</sup>

我们一起拟了一份电报，在3月9日发出。内容如下：

1. 3月8日，本战场战略情报局提供情报说：北意大利党卫军的最高官员、武装党卫军的卡尔·沃尔克将军，偕同大概是派自凯塞林幕僚中的最高统帅部代表，以及多尔曼和西默尔，可望来到瑞士的卢加诺，准备谈判北意大利德国部队的投降条件。3月9日续到的情报证实沃尔夫实际上业已到达，并曾表示愿试图阐明把北意大利排除于冲突之外的方案。他认为单单军事投降是困难的，而宁愿在投降之前，先由北意大利的德国领导人发表一项告德国人民书，说明战斗是毫无希望了，只会造成德国人不必要的流血。他说迄今还没有把凯塞林争取过来，并认为凯氏的支持对计划至关紧要。但是沃尔夫说，现任德国驻意大利法西斯

<sup>①</sup> 1945年3月9日。



政府的大使拉恩和他的意见一致。沃尔夫声称希姆莱不知道他的活动。沃尔夫想直接找凯塞林把计划推荐给他，并愿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代表保持经常联系。

2. 在瑞士会谈之前，多尔曼答应交出最近俘获的民族解放委员会领袖帕里，以作为他们诚意和采取行动的能力的证明。现在得到的情报说，事实上已于3月9日在瑞士将帕里无条件地交出，他的健康状况良好。

3. 战略情报局同沃尔夫正举行进一步的谈判，但是结果如何此间迄今尚未得知。考虑到这些谈判，战略情报局建议我总部代表准备在进展顺利的情况下，前往瑞士讨论全局。

4. 如果战略情报局和沃尔夫之间的进一步谈判发展到德国代表显得是真心实意的，并且有具体的建议可供讨论这种程度的话，那么我就建议要按照下述方针行事：

(甲) 德国的军中信使应前来伯尔尼，随身携带由凯塞林元帅签署的授权证书，证明他们有权进行讨论。

(乙) 战略情报局要安排一个夜间会晤的地点，或是在美国大使馆，或是在英国大使馆均可。如果在大使馆太困难，也可以考虑在另外的地点会晤。

(丙) 我愿派我的美籍副参谋长莱曼·兰尼兹尔少将和我的英籍情报处长艾雷前往伯尔尼。

(丁) 他们将奉命告诉德国人说：

(一) 他们必须前来盟军总部进行详细的军事谈判；

(二) 他们必须安排同凯塞林通信的方法；

(三) 谈判将只以讨论在纯军事基础上而不是在政府或政治基础上的投降方法为限。

5. 请注意主要人物中有两名是党卫军和希姆莱手下的人，这使我非常怀疑。虽然如此，要照样作好准备。

6. 以上所拟办法，请惠予同意。我在被授权以前，将不会象上开第4节(丙)项的建议那样，派代表去伯尔尼。关于嗣后的发展，当随时详

细陈明。

当时我对于这项接触并没有太重视。我们早就收到过美国战略情报局种种同样乐观的报告,但终成泡影。而且,所指定的德国人主要是党卫军的人,而我认为由旧正规军而不是由希特勒—希姆莱那一帮来同我们洽降比较适当。

3月11日(星期日),亚历山大告诉我说,他

已经得到伦敦的回音,于是将他就德国洽降所建议的行动正式报告参谋长联合会议。他似乎认为我们也许真正能办成这件事——但多半不是马上。他对于首相的电报也很高兴。派他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司令的计划已作罢论。亚历山大如释重负,因为那会是一个非常艰巨和尴尬的职位。<sup>①</sup>

下一个星期我一直在雅典;但是在我回来一、两天之后,亚历山大告诉我说,同德国的谈判简直没有什么进展。凯塞林似乎已经离开意大利前线,这必然会使事情放慢下来。3月29日,在地中海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政治会议上,我们就可能的军事投降条件作了长时间讨论。我们没有收到国内的任何指示,总的说来这倒是一个有利之点。我们依然担心克里特岛上的—万六千名敌军,其中大部分是德国人。罗伯特将军现在认为接受他们的投降会是万无一失的,因为他将能够供应他们的伙食,并用船把他们送到中东,可以在那里得到照顾。这当然是个小问题;但是这却使我们开始怀疑,我们将怎样来应付整个德国军队呢,如果他们在北意大利向我们投降的话。<sup>710</sup>

亚历山大在这些和嗣后的谈判中有机会将他对投降条件和进行方法的意见加以澄清。但是三个星期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当4月24日亚历山大所部正予德国人以迎头痛击时,沃尔夫突然又在瑞士出现了。这时他自称携有凯塞林的后任冯·菲廷赫夫将军

---

<sup>①</sup> 1945年3月11日。

颁发的全权证书。依照我们所订的计划，代表德国总司令的冯·施魏尼茨中校和代表党卫军沃尔夫将军的文纳少校这两名军官被带到卡塞塔我们的总部。前者声称携有“C”集团军司令、西南战区总司令和意大利国防军司令冯·菲廷赫夫所颁全权证书。他的证书上注明的日期是1945年4月22日。文纳少校也呈交了1945年4月25日由沃尔夫签署的同样文件。在这次会晤时，参谋长摩根将军(英籍)和副参谋长兰尼兹尔将军(美籍)代表总司令。艾雷将军(情报处处长)也在场。

亚历山大随时以详情相告。第三次、也是决定性的一次会议在4月29日2时举行，亚历山大打电话到阿西西，告诉我的正是这项惊人的消息。用打字机打出的报告书(我得到的那一份字迹模糊不清)的最后一页颇富戏剧性。

摩根中将：我了解你，冯·施魏尼茨中校准备代表西南战区总司令冯·菲廷赫夫将军签署投降条款。对吗？

冯·施魏尼茨中校：是的。

摩根中将：还有你，文纳少校，准备代表党卫军和警察最高司令官兼德国驻意大利国防军全权将军沃尔夫党卫军将军签署投降条款。对吗？

文纳少校：是的。

711

摩根中将：我已奉盟军最高司令亚历山大陆军元帅授权代表他签字。投降书的条款将自1945年5月2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正午12时起生效。对吗？

冯·施魏尼茨中校：是的。

摩根中将：现在我要你们签署文件，我将在你们签署后签字。

冯·施魏尼茨中校：我想提出一项声明，重申我在前几次会议时所讲的话。冯·菲廷赫夫将军给我授权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越冯·菲廷赫夫将军所加的限制，我将自行负责。我想我的总司令会批准我的行动，但是对此我不能给以绝对保证。

摩根中将：我接受这一点。

德国人的态度是正确的,现在我不能不等待代表返回。

我心情愉快地乘汽车回到罗马。在我的别墅里已经安排了一次午宴,除盟国委员会的要员之外,应邀出席的还有首相博诺米、外交大臣德加斯佩里,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和其他一、两个人。虽然德国人在投降协定上的签字有可能被否认,但是看上去这种可能性较小。然而这个秘密迄今尚未透露出来。

意大利人兴高彩烈,但是当然彼此害怕。关于的里雅斯特,德加斯佩里谈了很多。我不能给他任何肯定的消息。陶里亚蒂在应该忠于莫斯科还是应该忠于意大利这个问题上大伤其脑筋。前者将证明是强有力的一方。……①

我同博诺米作了一次长谈。

他在认识方面有了进步。……他的政治眼光相当敏锐。他是否有“精力”度过一个艰难的半革命时期,我不得而知。也许二十五年之后,他的神经会有所改善!每逢我看到他,我就向他鼓吹力量和决心。……毕竟他居于一个极其微妙的地位——既没有国会也没有选举。除开他本身的弱点外,什么也不能导致他垮台。②

午餐后我乘轿车动身去卡塞塔,到那里之后我发现亚历山大 712 和他的主管官员都在殷殷期待,然而却沉着克制。德国代表已经回到波尔萨诺他们的总部,但是接受投降协定的确切消息一直还没有传来。这里有点不好办,尽管谈判人是依式派遣的,然而他们却非常适当地清楚表明,他们的行动必须上级批准。所以我们不得不等待下文。

此后两天,5月1日和2日,是在紧张空气中度过的。

我们地中海战场以外所发生着的一切姑且不谈(即如希特勒之死),每一小时传来的消息都在变化。③

我们在不断地商量。麦克曼尼将军(美国)参加了我们的谈话和商

①② 1945年4月30日。

③ 1945年5月1日和2日。



量,在柯克缺席时,就由他代表这位美国大使。

5月1日我们曾经同波尔萨诺的沃尔夫有过联系,但是没有确切的信息。我们肯定不了星期日所签署的协定是否会得到实践。<sup>①</sup>

在5月1日一整天里,我们听说冯·菲廷赫夫已经被免职。继而据报,沃尔夫和他的朋友已遭逮捕。后来又传来消息说,凯塞林又被起用,但是他要求给他四十八小时的时间来考虑。接着我们被要求安排飞机去营救沃尔夫。继而这项要求又撤销了。

最后在5月2日凌晨,我们接到电报说,凯塞林和沃尔夫经过四个小时电话上的交谈之后,已经达成协议,投降条款将予执行。

但是凯塞林仍希望推迟二十四小时公布。对于所有这些电讯,我总是报以同样的答复——已签字的协定必须信守。最后在2日下午,我们获得波尔萨诺德国总部的明码无线电电报,为投降而下达各个单位的必要命令。于是我们给沃尔夫(并通过他给凯塞林)发出一份最后的电报,说明因为这些电报是明码拍出的,所以我们必须在下午6时30分发表公告。我们是在2日下午5时的一次会议上作出这项决定的,公告也按时发表了。7时30分首相在下院发表讲话。<sup>②</sup>

我们忙得不可开交。

在整个这段时期,我们不得不随时给德国人以适当的答复;通过亚历山大的正式电报通知参谋长联合会议;并通过我的渠道随时报告伦敦——真正够呛。而且我决定在温斯顿能在下院讲话的时候发出一项通告!<sup>③</sup>

我们在这些投降谈判中采取同意大利人的谈判大体相同的手法。

这一天我们是以收听丘吉尔在下院的讲话结束的,大部分讲话是在下午9点的新闻节目中广播的。

听到他对亚历山大和意大利部队的表扬,我非常高兴。我们毕竟胜利了——一次小小的胜利而已!现在是睡觉的时候了——经过了度日

---

<sup>①②③</sup> 1945年5月1日和2日。

如年的两天之后。①

第二天我们听到柏林攻克的消息。我们倒底还是抢先了一步，亚历山大是理应引以自豪的。尽管我们忧虑重重，但是履行投降的实际步骤倒是有条不紊。但这依然只是一个军事投降。

德国人的计划现在越来越清楚了。他们在法律上不能得到的要在事实上得到，也就是向英、美人投降而不向俄国人投降。他们现在正在进行并且仍将进行这种零星的投降——以后卫据守东线，力图保全他们的兵力，而不是保全他们的领土。②

德国人自然了解，如果他们的人成为我们或美国人的战俘，他们会得到照顾、一日三餐和照料，并最终能得以返回德国。但是他们如果落在俄国人手里，多半就会从此无影无踪、渺无音讯了。

凯塞林曾经（通过沃尔夫）致电亚历山大，要求与艾森豪威尔接触——一个非常有趣的发展。③

虽然从德国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他们最好的机会，但是英、美两国 714 却坚决维持同盟，丘吉尔和杜鲁门对他们的许诺无论是在字面的意义上和在精神实质上都是信守不渝的，尽管斯大林狐疑满腹。

5月7日，为陆军元帅将下述通知发交第十五集团军传阅，并抄发许许多多组织、使节、后方总部、代表团和在他节制下的各个基地。

在5月7日0241小时，德国统帅部的一名代表签署了德国全体海、陆、空军部队对盟国远征军、同时对苏维埃统帅部无条件投降。

德国控制下的所有部队应于5月9日0001B小时停止积极军事行动。

所以现在看上去5月8日将是欧洲胜利日了。

中午我们在卡塞塔宫我的房间里仓促组织了一个小型宴会。我们

---

① 1945年5月1日和2日。

② 1945年5月4日。

③ 1945年5月8日。

邀请了我们的整个工作班子（包括来自那不勒斯的仆役、司机、马夫、勤务兵等等在内）以及柯克的整个工作班子。似乎简直不可能想象的一切都真正成为过去了。<sup>①</sup>

第二天，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但感人至深的宗教仪式，参加仪式的有代表亚历山大统率下所有部队的许多司令官和部队。在意大利全国各地举行了其他类似的仪式。正是在这类的一个仪式上，据说有一位礼拜堂牧师是以下述语句开始他讲道前的仪式的：“全能的上帝，因为正是部分靠了您的力量，我们才赢得了这项伟大的胜利。……”不管这句话听来是否有点神学的味道，但似乎是不失公平的，因为我们自己的确尽了不少力量。

这样就结束了我们有史以来最可怕战争的六个年头。我们曾经克服了陆、海、空方面难以胜数的艰难险阻。我们曾经受到了狂风暴雨般的袭击，但是现在我们正驶入比较风平浪静的海洋。然而，在暴风雨之后等待我们帝国和我们人民的究竟是什么命运，谁又能预卜呢？

---

<sup>①</sup> 1945年5月8日。

## 附 录 一

717

### 1941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 英、美、苏三国代表会议议定书

英、美、苏三国代表会议于1941年9月29日至1941年10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根据与会代表的声明和所提资料的研究，就军需的供应问题经一致决定：由英、美两国根据本国生产中心力所能及，自1941年10月初起至1942年6月底止这段期间内向苏联提供军需物资。两国将协助交货和把物资运至苏联。物品名目如下：

	苏联要求的项目	同意供应的项目
1. 飞机	每月400架，其中短程轰炸机300架，战斗机100架。	每月400架，其中轰炸机100架，战斗机300架。由英国每月供应战斗机200架，美国每月供应战斗机100架，轰炸机100架。
2. 坦克 (炮式)	每月小型坦克或中型坦克1,100辆，或者两者合计为1,100辆，至于两者各占的比例数则不固定。	每月500辆，其中小型坦克不超过50%。此外，英国每月供应带机关枪的小型战车200辆；此后这个数目还将增加。
3. 高射炮 (37厘米或以上 [45、75、90厘米]， 连 同 弹 药)	每月300门。	在九个月期间由美国供应90厘米高射炮152门。
4. 反坦克炮 (37厘米)	每月300门	由英国在九个月内供应两磅重炮弹大炮(约40厘米)500门，每座

718



- 或直至60厘米，连同弹药)
5. 反坦克枪 (从12厘米至19厘米，连同弹药) 每月2,000支
  6. 侦察车 每月2,000辆; 货车(3吨、2吨和1.5吨)每月10,000辆。
  7. 战地电话机 有声感应电话机每月6,000部; 自冲电源电话机每月600部。
  8. 战地电话用电缆 (七股绞式) 每月100,000千米。
  9. 水底电缆 (古搭波胶) 每月50千米
  10. 海底电缆 每月100千米
  11. 铝 每月4,000吨(9月份装船的5,000吨不计算在内),另轧辗硬铝每月500吨。
  12. 锡 每月1,500吨
  13. 铅 每月7,000吨
  14. 镍 每月800吨
  15. 钼 每月300吨

附炮弹1,000发; 在这九个月之前为止, 美国供应37厘米大炮756门。共1,256门。

14厘米枪每月200支, 每支枪弹200发。本年度结束后数目增至每月250支; 自1942年3月起增至每月300支, 此后英国供应的枪和弹药可增多。

由美国在此后九个月内供应侦察车5,000辆, 哈里曼先生提出要研究增加侦察车数量的可能性, 并确定交付货车的数量。

这些项目的供应问题将在华盛顿解决, 但其中某些器材目前已可交付。

除在运的5,000吨外, 将在这九个月内由加拿大每月供应2,000吨。此外, 哈里曼先生将研究由美国每月供应铝2,000吨和轧辗硬铝500吨的可能性。

由英国每月供应1,500吨。

由英国每月供应7,000吨。

这项金属的供应问题, 英、美两国将立即进行研究。

由美国每月供应300吨。

16. 钴	每月 10 吨	由英国每月供应 10 吨。
17. 铜(电解)	每月 3,000 吨	由英国每月供应 3,000 吨。
18. 辗黄铜	每月 5,000 吨	部分由美国供应,不足之数,将予以考虑。希望尽可能搜求供应品。
19. 镁合金	每月 300 吨	可能交付的数量将分别在伦敦和华盛顿解决。
20. 锌 (电解)	每月 1,500 吨	英国保证每月供应 1,500 吨,希望美国能供应其中半数,但美国政府不受其拘束。
21. 复合金属	每月 3,000 吨	供应这项金属的可能性,英、美两国将予以研究。
22. 铜管和其他铜制品	每月 300 吨	哈里曼先生将建议供应这些物资。
23. 铁硅合金	每月 7,000 吨	} 供应数量将由英国审定。
24. 铁铬合金	每月 2,000 吨	
25. 坦克用装甲板	每月 10,000 吨	由美国每月供应 1,000 吨。增加 720 供应的可能性将在华盛顿审定。
26. 硬合金和刀具	每月 500,000 美元	供应总额将由英、美两国分别研究。
27. 银钢	每月 50 吨	这项要求将予以研究,有交货的可能。
28. 高速钢	每月 300 吨	} 一俟收到关于规格的通知,当即考虑供应。
29. 工具钢 (碳和合金)	每月 1,500 吨	
30. 刻度钢	每月 13,000 吨	
31. 热轧钢 (碳和合金)	每月 7,000 吨	} 这个问题将由英、美两国分别研究。
32. 短钢条 (铬-硅-锰)	每月 8,000 吨	

- 33. 冷轧钢条 每月 8,000 吨
- 34. 冷辗钢片 每月 8,000 吨
- 35. 锡板 每月 4,000 吨
- 36. 钢丝(按照规格) 每月 7,000 吨
- 37. 钢丝索缆 每月 1,200 吨
- 38. 钢合金管 每月 300 吨
- 39. 不锈钢丝 每月 60 吨
- 40. 镍铬丝 每月 70 吨

- 41. 倒刺铁丝 每月 4,000 吨
- 42. 甲苯 每月 4,000 吨

721

- 43. 硝化甘油 每月 3,000 吨  
粉
- 44. 石炭酸 每月 1,500 吨
- 45. 石油制品 每月 20,000 吨  
(飞机用汽油、飞机用汽油的各种成分、润滑油和滑脂、汽油和煤油,按照规格)

- 46. 乙烯醇 每月 120 吨

美国代表团已予以审查,认为苏联的要求将可得到满足。这个问题只能根据美国的研究给予答复。

美国已决定供应 80 吨(此数字可能有误——译者)。每月 70 吨的要求将由美国尽可能地予以满足。

料想这个数量可以由美国供应。自 1941 年 11 月起,由美国每月供应 1,250 吨。将研究增加供应的可能性。此外,10,000 吨三硝基甲苯将尽早装船,每月供应数量由华盛顿尽快通知。

这个问题将分别由伦敦和华盛顿的有关当局予以审查。

美国将随时准备接受苏联为了保持必需储藏量而提出的要求。

满足这项要求的问题将由华盛顿

- 47. 溴化钠 每月 100 吨
- 48. 磷 每月 100 吨
- 49. 磷苯二甲烯 每月 300 吨
- 50. 二甲苯胺 每月 300 吨
- 51. 二苯胺 每月 300 吨
- 52. 硝化纤维素 每月 300 吨
- 53. 金属切截机床 (按照规格) 每月 1,200 台
- 54. 电炉 每月 50 只
- 55. 锻压机 (按照规格) 每月 4,000,000 美元
- 56. 各种工业用机 每月 3,000,000 美元
- 57. 钻石 每月 150,000 美元
- 58. 磨料 每月 300,000 美元
- 59. 炭精电极 每月 400 吨
- 60. 坩埚炭精 (锡兰) 每月 100 吨
- 61. 橡胶 每月 6,000 吨
- 62. 黄麻 每月 4,000 吨
- 63. 虫胶 每月 300 吨
- 64. 鞋底用皮革 每月 1,500 吨
- 65. 羊毛 每月 2,000 吨
- 66. 军靴 每月 400,000 双
- 67. 军衣料 每月 1,200,000 米

研究。  
 手头无任何情报可供利用，这个问题将由美国审查。  
 将由美国供应。

将分别在伦敦和华盛顿进行研究。

料想会愿意满足苏联的要求，但是不能保证特定类型或规格。所有能够供备的机床将由英、美两国分别提供。

将由英国供应。 722  
 这类物品肯定能供应，但需由美国研究。

将由美国供应。  
 英国可以供应若干，确切数量研究后再通知莫斯科。

这些要求将由英国满足。

美国已经放出 3,000 吨。经华盛顿研究后可能再放出若干。

将由英国发放。  
 每月供应数字将分别在伦敦和华盛顿予以精确规定。



68. 小麦            每月 200,000 吨            加拿大有大量储藏可供利用。
69. 糖              每月 70,000 吨            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有大量食糖可供利用。
70. 可可豆        每月 1,500 吨            将由英国供应。
71. 舰队的要求(按照附件)将在伦敦和华盛顿分别进行考虑。
72. 医药供应的要求(按照附件)将在伦敦和华盛顿分别进行考虑。  
若干项目业经美国红十字会同意赠送。

英国向苏联提出的供应要求(按照附件)将在莫斯科进行考虑。

一旦战争形势有所改变,保卫战的负担转移到其他战场,则有关三国必须共同磋商并决定对目前安排需作何调整。

英国代表团团长            苏联代表团团长  
比弗布鲁克                莫洛托夫

美国代表团团长  
哈里曼

1941 年 10 月 1 日于莫斯科

### 第一号附件

自 1941 年 10 月至 1942 年 6 月底止的海军需要计划

1. 军舰
  - 甲 驱逐舰
 

至 1941 年底	8 艘
-----------	-----
  - 乙 抗磁扫雷艇
 

至 1941 年底	9 艘
-----------	-----
2. 舰用大炮
  - 甲 枪机和零件齐全的 130 厘米 55 一口径炮筒(维克斯式)
 

至 1941 年底	150 件
-----------	-------
  - 乙 127 厘米“双用”大炮,配以全套备用零件和附件、备用炮筒和整套弹药。
 

至 1941 年底	100 门
在 1942 年上半年内	200 门
	共 300 门

丙	25—37 厘米海军用自动高射炮, 配以备用炮筒、备用零件及附件和整套弹药		
	至 1941 年底	500 门	
	在 1942 年上半年内	1,000 门	
		共 1,500 门	
丁	12.7—14 厘米船用高射机关枪, 配以备用零件和整套弹药		724
	至 1941 年底	1,000 架	
	在 1942 年上半年内	2,000 架	
		共 3,000 架	
3.	配有整套装置的船用柴油机和电动机		
甲	功能 1,100—1,800 马力、600 转速		
	在 1942 年上半年内	150 部	
乙	功能 150—210 马力、450 转速		
	在 1942 年上半年内	40 部	
丙	功能 75 马力的“拉斯顿式”柴油机配件		
	至 1941 年底	80 套	
丁	功能 48 马力的“拉斯顿式”柴油机配件		
	至 1941 年底	80 套	
戊	汽油或柴油船用发动机, 配以全套装置, 功能 1,000—1,200 马力、2,000 转速		
	在 1942 年上半年内	300 部	
己	直流柴油发电机		
	220 伏 18—20 千瓦: 800 转速		
	在 1942 年上半年内	100 部	
	115 伏 50 千瓦: 600—700 转速		
	在 1942 年上半年内	50 部	
4.	船用“潜艇探索器”仪表		
	至 1941 年底	150 套	

## 第二号附件

自 1941 年 10 月起至 1942 年 6 月底止的医疗器  
械、医药、化学药品需要计划

<u>号码</u>	<u>物品名称</u>	<u>数量</u>
1.	古柯咸麻醉剂	1,000 公斤
2.	普鲁卡因	3,000 公斤
3.	三溴酚泌	5,000 公斤
4.	盐酸毛果芸香碱	30 公斤
725 5.	氯胺	100,000 公斤
6.	斯妥反汀	750,000 公斤
7.	羊毛脂	100,000 公斤
8.	磺胺吡嗪	30,000 公斤
9.	胺苯磺胺	65,000 公斤
10.	氨基比林	30,000 公斤
11.	鲁米那	5,000 公斤
12.	咖啡素	35,000 公斤
13.	吐根	3,000 公斤
14.	柯柯豆素	20,000 公斤
15.	苯甲酸	10,000 公斤
16.	戊四氮	500 公斤
17.	溴化钠	30,000 公斤
18.	溴化钾	30,000 公斤
19.	吐根素	25 公斤
20.	琼脂	100,000 公斤
21.	豚	3,000 公斤
22.	木蜜醇	500 公斤
23.	麦芽糖	500 公斤
24.	乳糖	500 公斤
25.	石蕊素	150 公斤
26.	抗微油	150 公斤
27.	各种尺码齐全的外科用	

	板	500,000 支	
28.	解剖钳	250,000 支	
29.	外科钳	200,000 支	
30.	5 <sup>1</sup> / <sub>2</sub> 英寸科赫式钳	200,000 支	
31.	5 <sup>1</sup> / <sub>2</sub> 英寸皮安式钳	200,000 支	
32.	2 公分“瑞科”注射器, 附针两枚	200,000 支	
33.	5 公分“瑞科”注射器, 附针两枚	50,000 支	
34.	同上,10 立方厘米	200,000 支	
35.	同上,20 立方厘米	50,000 支	
36.	0.75×35 毫升第 28 号 “瑞科”套管针	5,000,000 支	
37.	同上,0.80×35 毫升第 26 号	3,000,000 支	
38.	同上,0.90×40 毫升第 23 号	1,000,000 支	
39.	同上,0.20×50 毫升第 16 号	1,000,000 支	
40.	输血用针	150,000 支	726
41.	斯替耳式石膏绷带剪	25,000 把	
42.	戈斯伤口扩张器	5,000	
43.	道温—弗里舍式钩	10,000 只	
44.	福克马纳斯四齿尖钩	15,000 只	
45.	钻	5,000 只	
46.	11 <sup>5</sup> / <sub>8</sub> ×21 英寸密蒸器,附 两箱套件和一具取盛温灯	1,000 件	
47.	米林格式电磁体 (眼科 用)	50 件	
48.	X 光透视机	100 部	
49.	30×40 厘米透明屏	1,000 件	
50.	耳夹	5,000 把	



51.	巴克豪斯夹钳	20,000 把
52.	一号解剖刀	100,000 把
53.	三号解剖刀	100,000 把
54.	截肢手术刀	20,000 把
55.	库珀式剪	100,000 把
56.	利斯特式剪	25,000 把
57.	无锋狭剪	100,000 把
58.	巴布科克式脊骨针	20,000 支
59.	马修式针架	25,000 件
60.	各种尺码的消毒器	50,000 件
61.	梅奥—赫加式 6 英寸持 针钳	25,000
62.	法拉伯夫式钩	25,000
63.	恩格尔式锯	30,000
64.	林克—道温式防毒面 具	5,000
65.	法拉伯夫式曲形防毒面 具	15,000
66.	法拉伯夫式钳	5,000
67.	达尔格林式颅咬骨钳	5,000
68.	二号气管插管	5,000
69.	四号气管插管	10,000
70.	六号气管插管	5,000
71.	惠廷氏弯形颅咬骨钳	5,000
72.	道温氏弯形颅咬骨钳	5,000
73.	外科用手套	500,000 双
74.	解剖用手套	100,000 双
727 75.	橡皮保暖器皿	250,000
76.	常规光学检查镜	300
77.	截肢锯	15,000
78.	曲形钳	30,000
79.	橡皮冰袋	150,000

80.	油布	1,000,000 公尺
81.	止血带	100,000 公尺
82.	5 毫米输血橡皮管	3,000 公斤
83.	理查森氏球	150,000

### 第三号附件

#### 英国希望从苏联得到的供应品

<u>物品</u>	<u>要求数量</u>	<u>要求交货期限</u>
沥青	50 吨	6—8 个月内
过氯酸盐	50 吨	6—8 个月内
苯胺或硝基苯	3,000 吨	按 6 个月交货, 11 月至 4 月。
氯化钡	50 吨	交货期限同上
蜜蜡	100 吨	12 个月内
巴拉唐纳叶	共达 10 吨	不急需
巴拉唐纳根	共达 10 吨	不急需
猪鬃	200 吨	12 个月内
铬矿	10,000 吨	急需
中国蜜蜡	5 吨	12 个月内
二甲基一苯胺	200 吨	6—8 个月
麻黄	10 吨	6—8 个月
菲沃斯	共达 5 吨	
马鬃	300 吨	
甘草根	共达 500 吨	
	4 吨	6—8 个月
菱镁矿	15,000 吨	6—8 个月。已经装运了 50,000 728 吨。英国将按苏联的供应量以镁

氯化钾	5,000 吨	产品送还苏联。
胡荽油	共达 500 公斤	到 12 月
茴香油	共达 500 公斤	不急需
松油	共达 1,000 吨	不急需
白金	1,400 公斤	急需
过氯酸钾	50 吨	急需。立即需要 700 公斤。
步枪和子弹	250,000支,每支附子弹	6—8 个月
山道年	1 吨	急需
生丝或碎丝	500,000 磅	6—8 个月
木料	根据吨位尽量装运	到 1941 年底
罐头鲑鱼		

## 附 录 二

### 在马耳他《纳尔逊号》兵舰上的会谈记录

1943 年 9 月 29 日

1. 会谈是由巴多利奥元帅讲话开始的，他谈出了几个要点，据他自己说，这些要点都是他早已想要说的：

甲 他希望看到一个基础广泛的、大公无私的政府的成立。

乙 意大利政府一旦迁返罗马，立即对德宣战。

丙 他着重指出，在这期间，意大利人在科西嘉岛、达尔马提亚等地正处于对德交战状态，并在对敌作战。

丁 他说，一俟意大利部队要从撒丁岛撤出，他就要将八个意大利师交由盟军调遣。

戊 他担心德国人俘获的意大利俘虏会被当作游击队处置，就地处决。

2. 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认为意大利目前正作出的努力足以证明他们

合作的意向,但是鉴于上述戊项情况,巴多利奥元帅的政府,显然有立即宣战的必要,该政府毕竟是意大利唯一的合法政府。

3. 巴多利奥元帅答称,他已考虑过这一点,但是目前政府权力所能达到的地方,只不过是意大利的一小部分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宣战是极其困难的。

4. 但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指出,与此相反,其他一些流亡政府,在国境之内,连一寸领土还没有领占,倒已经对德宣战。他表示希望巴多利奥政府承担起西西里和其他解放区的行政任务,但是如果不宣战,他就看不出怎么能作出这样的安排。

5. 巴多利奥元帅答应将这一问题请示国王。他说,无论如何这个问题总得由国王来决定。根据意大利法律,只有国王才能宣战。因此巴多利奥说,在他能够同国王商议之前,他暂不予以回答。 730

6. 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巴多利奥元帅为积极对德作战所作的每一件事,都会相应提高联合作战国对他的政府的尊敬。他指出,意大利是联合作战国的敌人已经整整三年了,从而造成这样一种群众心理,大家不愿意把原可以被认为是战场上的战士的意大利人承认为战场上的战士。因此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巴多利奥元帅当前的责任就是要尽快对德宣战。他问巴多利奥元帅是否愿以此向国王建议。

7. 巴多利奥元帅回答说,他理解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观点,并且愿意一字不差地转呈国王,因为他的观点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观点并无二致。

8. 艾森豪威尔问巴多利奥元帅是否打算物色几位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邀请他们参加他的政府。

9. 巴多利奥元帅回答说,政府阁员将由国王遴选——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军人,对于政治只是一知半解。

10. 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他作为一个军人具有同感,但是他说,意大利政府必须以反法西斯主义者的面貌出现,如果打算同盟国一起作战的话。

11.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将要给巴多利奥元帅的那封信中(参看下文),艾森豪威尔将军会这样说的,但法西斯主义是与我们势不两立并正在与之进行战斗的死敌之一。

12. 巴多利奥元帅表示他理解这一切。

13. 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再重申,他的政府究竟准许他在怎样程度上与意大利人合作将取决于这一点。

14. 巴多利奥元帅说,我们应该是(一)抗击法西斯主义,(二)抗击德国



人,按照那个顺序。

15. 巴多利奥元帅宣读了国王要求迪诺·格朗迪伯爵参加政府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格朗迪对墨索里尼首先发难,正是靠了他才使墨索里尼垮台。格朗迪参加政府将会摧毁法西斯共和政府的地位。

16. 艾森豪威尔将军说,这个问题,他可请示他的政府。但是照他个人的看法,我们舆论不会忘记格朗迪曾经同法西斯主义有过那样长一段时期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要是现在把他延揽进意大利政府,势必会遭到误解,于事不利。

17. 巴多利奥元帅说,法西斯主义随着“大议会”的解散而垮台。格朗迪是那次发难的带头人。要是格朗迪今天落入法西斯党徒之手,他就会被他们碎尸万段。

18. 梅森—麦克法兰将军在这时候指出,从过去二十年的经过情形看来,利用一些过去与法西斯主义有过瓜葛的人是有必要的。

19. 巴多利奥元帅于是又宣读了一段国王来信,大意是说格朗迪能够在法西斯党徒中间起分化作用,如果要他出任意大利政府的外交大臣,那么对反法西斯主义战争和摧毁法西斯共和政府方面都会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20. 艾森豪威尔将军回答说,作为军人对军人,他完全理解这一切,但是他不能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盟国的舆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很明朗,所以,正如他以前所说,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他需要同他的政府磋商。

21. 巴多利奥元帅然后说,国王打算邀见目前在意大利组成的各式各样党派(也就是政党)的领袖,特别是那些最有影响的人。据他看,目前国王是最熟悉意大利有哪些人可用。巴多利奥元帅说,国王会指出这些人的,因为元帅虽然能遴选将领,却挑选不了政治家。他要艾森豪威尔将军放心,他会给政府以自由主义的性质。要是他发现任何一位大臣不遵守规定的政策路线,那位大臣就必须离职。

22. 艾森豪威尔将军说,这个问题他将请示他的政府。总统和首相已经指示为进行合作所必需作到的事情的轮廓。他说,如果国王要在他的政府增添新人,他可以先通过梅森—麦克法兰将军的使团非正式地提出他们的名字,以这种合作的方法使问题简单化,会是可取的。

23. 艾森豪威尔将军然后解释说,他无意干涉意大利内政,但是他不能不注意我们盟国的舆论。

24. 巴多利奥元帅说,他一心一意要防止意大利政府和盟国之间可能发

生的任何摩擦，他确信他会达成一个总的协定。

25. 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可以指望得到我们的谅解。

26. 在这时刻艾森豪威尔将军以华盛顿的来文告知巴多利奥元帅，说美国希望斯福尔扎伯爵在最近将来能访问布林迪西。

27. 巴多利奥元帅说，他很熟悉斯福尔扎伯爵，并提起以前同他一起签订过《拉巴洛条约》。但是他说，国王对斯福尔扎没有好感，因为他前不久曾声明反对君主政体。巴多利奥元帅说，他承认斯福尔扎在美国正在作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对此非常重视。巴多利奥元帅说，他将进一步努力劝说国王使他了解准许斯福尔扎访问布林迪西是可取的。 732

28. 艾森豪威尔将军着重指出，我们政府对斯福尔扎的重返意大利非常重视，这会对我们把意大利纳入盟国行列起极好的作用。

29. 巴多利奥元帅说，他希望艾森豪威尔将军现在就把他当作是一个完全全的合作者，如蒙艾森豪威尔将军将意大利战役的一些情况和盟军的目标——一点点关于作战计划的概念——相告，他将感激不尽。

30. 艾森豪威尔将军回答说，我们是要加速把德国人赶出意大利。第一步是把德国人赶出南意大利——然后赶出罗马。他说关于计划的某些细节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同亚历山大将军商量，但是他个人认为，德国人撤出罗马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31. 巴多利奥元帅提出，如果需要意大利军队，那么撒丁岛有两个步兵师和一个伞兵师。巴多利奥元帅希望能允许一些意大利军队参加攻进罗马的战役。亚历山大将军说，意大利战役的全面计划已经准备就绪，而意大利军队能否参加将取决于意大利是否宣战。

32. 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这样一项建议：如果意大利宣战并与盟军合作，他个人愿意允许意大利部队在攻进罗马时作象征性的参加。

33. 巴多利奥元帅说，他完全懂得军事计划一经制定，要改变是困难的。他所以建议意大利部队进攻罗马一节，是因为他考虑到：（一）对北方法西斯共和政府所产生的影响；（二）他确信德国人在罗马会照他们在那不勒斯的作法行事，也就是杀、烧、抢、掠。他指出罗马不仅是意大利的首都，而且意大利政府还负有保卫梵蒂冈的特殊义务。由于这个缘故，巴多利奥才请求准许意大利部队参加。意大利部队可以从撒丁岛开到菲乌米齐诺，能在一天之内到达罗马——指宁博伞兵师而言。

34. 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亚历山大将军无论怎样都会考虑利用意大利伞

兵师的。他说，我们听到过关于那个师的累累战功。关于这一点是没有困难的。

733 35. 巴多利奥元帅说，德国人在萨勒诺的抵抗是由于凯塞林的支持，他一直赞成沿战线进行抵抗。据他个人的见解，巴多利奥元帅说，必须请你们原谅，盟军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帮助凯塞林的计划。他建议说，斯佩齐亚—里米尼线上有一个弱点在里米尼附近。巴多利奥元帅谈到他对意大利的了解，识途老马所提的战略性建议不是没有道理的，并为他那种以老者专门欢喜对年轻人遇事指教的倚老卖老的态度微微一笑，表示歉意。

36. 艾森豪威尔将军提醒说，以军人的身份来讲话，意大利军队显然是经历了三年斫伤锐气的战争的。他认为，随着我们的继续前进和意大利军队的参加，至关重要的是巴多利奥元帅必须选拔意大利最精锐的各师，如有必要还需要将其他部队的装备集中起来，以便使选定的这些师在战斗一开始就有充分的给养和精良的装备。他还建议，巴多利奥元帅应该以其他作用不大的部队，用之于交通线、劳动营、码头工作等等。他补充说，由于联合作战国军队的扩充，他不能许以装备所有意大利各师的保证。他又说，作为突尼斯和西西里战役的结果，我们当然会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大量意大利装备来予以帮助。

37. 巴多利奥元帅回答说，他完全同意，并且事实上已按照所建议的行动行事。

38. 艾森豪威尔将军请梅森—麦克法兰将军随时了解按照这类方针所取得的任何进展，以便在适当时候进行必要的视察。

39. 巴多利奥元帅指出，目前他是意大利政府的首脑，这些问题将会由各自的幕僚予以解决。他说，如果我们能将可供利用的一切敌军情报转送给他，并使他随时了解盟军集结的情形，他会感激的。

40. 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诉巴多利奥元帅说，亚历山大将军的总部将随即在10月份的第一周内迁往意大利(巴里)，并将与巴多利奥元帅的参谋部取得联系。

41. 巴多利奥元帅说，他将非常愉快地为亚历山大将军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

42. 亚历山大将军答应向巴多利奥元帅提供一些可供利用的敌军情报，并说他能够就敌军目前在意大利的各个部队的阵地给巴多利奥元帅以大量的详细情报。



43. 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他将指示他的幕僚,关于今天的会议将只以公布对德军事行动细节方面的讨论为限,至于签订任何文件的问题则只字不提。艾森豪威尔将军请巴多利奥元帅采取同样方针。 734

44. 巴多利奥元帅表示同意。

45. 艾森豪威尔将军还请巴多利奥元帅努力策励意大利的对德军事活动,并尽其力所能及从速对德宣战。

46. 巴多利奥元帅指出,他的主要困难之一在于宣传方面。目前他只能利用巴里无线电台。

47. 艾森豪威尔请巴多利奥元帅就这一方面的需要提出他的估计,并说盟军将尽力利用在这个战区可供利用的专家与元帅合作。

48. 巴多利奥元帅请求准许他与现在英国的战俘梅塞元帅联系。梅塞从前是国王的侍从武官,根据巴多利奥元帅的意见,此人可以在英国的英国广播公司发表卓有成效的广播演说。巴多利奥元帅建议利用意大利人民最常收听和最为尊重的海外无线电广播。

49. 艾森豪威尔将军要巴多利奥元帅把他想要给梅塞元帅广播的不论什么材料尽管送来,他答应通过适当途径将建议转陈伦敦。

50. 艾森豪威尔将军向巴多利奥元帅表示谢意,并说他希望这次会议能产生很大的成效。巴多利奥元帅在答词中提到1918年一般的形势,他说当时意大利人曾给德国人以决定性的打击。他还说当时有三个英国师和一个美国团与意大利军队在一起,大家在打败德国人的战斗中合作无间。

51. 会议约在下午12时15分休会。

## 艾森豪威尔将军给巴多利奥元帅函的副本

1943年9月29日

敬爱的巴多利奥元帅:

我们刚刚签署的停战条款是1943年9月3日我们双方代表签订的简单停战协定条款的补充。停战条款是以停止敌对行动以前的形势为依据。此后的形势发展大大改变了意大利的地位,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联合作战国的合 735  
作者。

我所代表的政府完全承认,这些条款在某些方面因嗣后事态的发展而失



效,若干条款已经过时或已经付诸实施。我们也承认,某些条款的履行,在这个时候还不是意大利政府力所能及。由于目前的情况而不能践约,不能认作意大利方面的背信弃义。但是,这个文件体现了意大利政府在力能做到的时应履行的要求。

不用说,无论本文件或9月3日的简单停战协定中的条款,都可以随时予以修正,如果在军事上有必要或者意大利政府合作程度表明这种修正是可取的话。

盟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1943年9月29日

736

### 附录三

#### 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和驻节大臣麦克米伦致首相和 外交大臣电 1945年1月17日

1. 希腊战争业已经过两个阶段,现已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围攻雅典。必要的军事行动是增派援军,以及健全的战术布署;唯一可能的政治行动就是任命大主教为唯一的摄政。这两种行动都采取了。第二个阶段包括最后肃清市内叛乱分子并追逐到广大的野外。在这期间组成了一个比帕潘德里欧更能得到普遍信任的政府。这个阶段是以1月11日签订并于1月15日上午一时生效的休战协议而告终的。第三个阶段于现在开始。

2. 在军事上,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把我们承担的义务缩减到完成我们已经担负的义务和实现我们的政治目标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在政治上,我们必须确保希腊事件的解决是希腊人民可以普遍接受的,而且很可能是持久的。同时,这种解决必须充分考虑到英国的舆论。

3. 休战的目的是要导致和约。

甲. 谈判应该立即开始。拖延将给叛乱分子以喘息时间,会使希腊分裂成为两个“半个国家”: (1) 依靠斯拉夫人支持的北方埃拉斯游击队; (2) 依靠我们支持的南方政府。

乙. 在希腊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埃拉斯游击队残余力量的代

表之间应举行谈判。这是摄政在签订休战条约后立即写给埃拉斯游击队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提出的。我们觉得让分离主义者参加会议是切实可行的。

丙. 我们的意见是应该力劝大主教主持会议。如果由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主持,会议就会一哄而散。

丁. 军事形势已经由英国和帝国军队予以扭转。因此,英王陛下政府有权坚持要希腊政府提出他们认为满意的条件。我们想相机为英国 737 观察家出席任何会议作出安排,只要我们认为这是可取的。

4. 希腊政府只要求两件事:

甲. 释放人质;

乙. 解除一切非正规军——埃拉斯游击队和任何其他部队——的武装。

(凡仍处于德国占领下的地区,例如克里特岛,则不能不作出特殊安排。)

5. 政府的条件反过来也应包括已经开列……和已经明白承认的那些……。但是有三点尚须进一步澄清:

甲. 我们建议解散“山地作战旅”和“神圣团”,而把他们用作新国民军的干部。

乙. 大赦的条件。

丙. 选举。

6. 如果所有非正规军都顺利地解除武装,那么“山地作战旅”和“神圣团”就没有理由不立即解散,象上述5(甲)中所建议的那样。

7. 大赦问题可能会有麻烦。政府当然想惩罚为首的叛乱分子和刑事犯。这自然是埃拉斯游击队未雨绸缪地扣留人质的原因。我们欣悉……您们赞成普遍大赦,只以“个别违反战争条例或依照文明国家通常刑法应行服罪”的人为例外。我们担心这最后一句可能会被误解。在大多数文明国家里,以武力反对国王或现政府就是犯罪行为。我们认为你们的原意完全不是这样,这一点必须澄清。

8. 既然内战完全是一个权力问题,既然在目前的条件下谁在希腊掌握武器和军备谁就握有权力,所以我们应该建议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实行普遍的大赦。这当然只有在全面交出武器后才能这样做。任何出于和约的大赦终归要包括西安托斯等等领袖人物在内。真正危险的人物将会因此而漏网。处决几个低级罪犯只不过是精神上的满足,而不会有什么实际好处。如果无

法媾和，如果必须采用其他手段解除非正规军武装，那么也很可以将大赦证发给个别自愿交出武器的叛乱分子。

9. 至于选举，应该尽早举行，普拉斯蒂拉斯将军所作关于盟军观察员的声明也应重加肯定。

738 10. 因此，我们建议继续从事在上述总的基础上争取早日获致和约。要希腊政府同意第8节是很困难的。我们建议与摄政开诚布公地进行磋商，让他作好准备，以便我们可以得到尽可能豁达大度的办法。应该坚定不移地注意于实现解除武装这个唯一的目的，不容许其他任何事情冲淡它。

11. 此外，我们将建议摄政和普拉斯蒂拉斯在适当时候延揽一、两位退出民族解放阵线的分离主义者的代表参加政府……。如果不能缔结和约，这会证明是特别重要的。

12. 如果和谈破裂，休战当然自动告终。只要我们从埃拉斯游击队的退却中获得军事上的利益，我们就自然会使谈判持续下去。因此，叛乱也许会继续下去，但是要在下列政治情况下进行：

甲. 君主政体问题将在希腊和别处的争论中完全消除。

乙. 将会任命一个在希腊博得广泛信任的摄政和强有力的政府。

丙. 民族解放阵线的联盟将会破产。

丁. 提出但被拒绝的条件在世界舆论看来会是宽大的，或是过分宽大的；英国和美国公众也会相应感到宽慰。

戊. 拒绝和约的人将会暴露出来，并且信誉扫地。

13. 今日的军事形势有如下述：

我们实际上控制着整个亚狄卡、波西亚和塞萨利的一部分，直至包括沃洛斯—拉米亚—安菲莎—伊蒂亚在内的全部战线。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我们有帕特拉斯—阿拉索斯作为可靠的基地，并且正在逐渐控制南至阿戈斯—皮尔戈斯一线的地方。我们控制着自雅典经由科林斯至阿拉索斯的陆上交通。我们在萨洛尼卡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埃拉斯游击队的正规部队将会在1月24日撤退到休战中双方一致同意的界线以外。从军事观点看，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拟议的〕全部军事行动，甚至有过于此……我们已经取得了休战。

14. 拟议中的和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确保希腊非正规部队全部遣散和解除武装。如果作不到，我们面对的形势将是埃拉斯游击队的继续进行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主张由英国军队承担驱逐埃拉斯游击队这个广泛

的军事行动,因为那会是一项重大的、也许是无止境的义务承担。

15. 然而,随着我们在希腊可供调度的英国军队的增强,同时我们目前控制着要害地点,肃清休战协定中所划北部界线以东和以南的全部地区是可能办到的。这将包括伯罗奔尼撒半岛整个地区在内。在这条界线以内,将有待于希腊政府招募、装备和训练足够的兵力来承担全部肃清希腊残余的非正规军的军事行动,如若结果证明做不到的话,那最后还是接收英国军队占领的地区,以便让我们撤出这个国家。这自然会陷希腊于分裂成为两个部分的不利处境:希腊南部由希腊政府控制,连同在萨洛尼卡和科孚的几处前哨站;希腊北部则仍在埃拉斯游击队手中。这种情况是再坏不过了,它意味着三个英国师必须留在希腊,直到政府军队强大到可以接管的时候。这大约要几个月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为希腊军队提供武器和装备的速度而定。另一方面,如果埃拉斯游击队同意遣散和解除武装,我们的军事义务承担将会按照埃拉斯游击队履行这些条件的速度而逐步减少。这就也许是几个星期的事了。但是鉴于有发生新叛乱的危险,所以在希腊政府具有足够的对付叛乱的武装力量之前撤退英国军事上的一切支持将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义务承担大概将是一个师。我们还不曾提到可能涉及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的义务承担。但是对这两个军种的正确评价,如有需要,当可另行奉陈。

16. ……英国大使……同意……

## 附 录 四

740

### 代理主席就盟国委员会所奉有关职权的新指令 内容照会意大利政府而提的备忘录

1. 按照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声明,盟国政府建议放宽根据停战协定对意大利政府日常行政的监管,只是在事关盟国军事利益,遇有必要时,方始实行。

2. 盟国委员会政治组将自1945年3月1日起撤消。凡主要政策问题,应由意大利外交大臣商同委员会主任委员处理,至于次要政策问题和日常公务,则应与委员会各该问题的主管组(经济组或民政组)洽商办理。有关外交

713



和其他公务人员的旅行问题,今后将由常务委员办公室代表委员会承办。

3. 意大利政府仍将如目前一样与派驻该政府的外交代表保持直接联系。凡与其他各国政府进行的谈判,意大利政府一般应随时通知盟国委员会。承认意大利政府在其驻外外交代表通信时有使用机密邮包之便利。未经备案的密码通信暂不允准。

就有关经济和财政问题的谈判而论,应随时以进展情形通知经济组及其财政小组委员会。

如果意大利政府将它与其他各国政府已经达成和正在进行的一切谈判的情况,定期提供摘要,那会是适宜的。

4. 关于意大利政府辖区问题的处理,盟国委员会将只以同意大利政府内阁进行协商和提供意见为限。

5. 在意大利政府辖区内的教育、古迹和美术、地方自治、立法和劳动各  
741 小组委员会,只有在意大利政府提出要求时,方尽其顾问之责。

6. 在意大利政府辖区内,凡意大利政府制定的法令和其他立法,不再需要取得盟国委员会的批准。

然而,在所拟议的法令颁布之前,应通知盟国委员会以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得与意大利政府磋商如何使这些法令适用于盟国军政府的辖区,并在适当时候为法令在这类地区得以有效实施订出计划。

7. 在意大利政府辖区内,不论是国家政府机关或地方政府机关,意大利政府的任命都不再需要取得盟国委员会的批准,而以附表(附注“甲”)中所列具有军事重要性的职位为例外。意大利政府有权变更盟国军政府当局以前作出的任命。

8. 盟国委员会派驻在意大利政府辖区内的官员将予撤出。作为第一步,打算撤销盟国委员会在西西里、撒丁、南方各区和拉齐奥—翁布里亚区的地方政府机关。但是如有必要,得派盟国委员会的代表进驻意大利政府的辖区;某些负有经济任务的专门官员,将仍在这类地区暂留一定时期。

9. 盟国希望促进与意大利人民的经验和知识的自由交流。将作出安排以便利意大利和联合作战国之间进行科学、政治、哲学和艺术的书籍与其他出版物的交流,并加强意大利和联合作战国之间的学者、艺术家和专家的活动。

10. 盟国欢迎在意大利政府辖区内尽快举行地方选举的这项决议。\*

11. 联盟各国,愿对现在或以后被扣留的意大利战俘作出让步,但自停

战协定签订之后捕获的战俘除外。如果能根据盟军最高司令满意的条件，为继续使用这些人作出安排，那么这些人的战俘身份即可结束。

12. 至关重要的一项是，意大利政府应制订和执行适当的经济管制并采取其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便一面保证最高限额的生产和有效而公正的分配，一面管制根据现行条件所能取得的地方资源的消费，并以此作为增加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 742

13. 在政府复兴委员会及该委员会经济组目前正在准备的意大利紧要进口货的联合计划中，有一些供应品将由美英联合军事当局负责洽办（“甲”类），另一些则不由美英联合军事当局负责（“乙”类）。列入“甲”类的供应品，兹规定如下：

A. 为防止不利于军事行动的病疫和动荡所必需的重要的并经约定的供应品，诸如粮食、燃料、衣着、医疗和卫生用品。

B. 因为上述供应品的紧要，于是缩减军事上需要而依照本节宗旨输入的民用的重要供应品，诸如肥料、原料、机器和设备。

C. 为了恢复诸如意大利交通工具、电力系统和运输工具这类会直接促进盟国军事努力所必不可少的那些材料。

14. 由军事当局负责的计划，在（美英两国）在意大利联合作战期间将继续执行。在这个期间，在第 13 节所规定的范围内，意大利将被视为一个整体。结束军事义务的日期将由盟国决定。

15. 除由军方负责取得供应品（“甲”类）的计划外，盟国委员会将帮助意大利政府准备旨在恢复意大利工业的供应品计划。称之为“乙”类的那种计划，将根据已经宣布的程序予以处理。不论目前船运情况如何困难，购买“乙”类供应品的计划当立即着手进行，以便一旦有船可供利用，即可将这样购办的供应品装船起运。

16. 盟国希望，意大利的工业恢复，由意大利政府在意大利资源和根据上列第 13、14 和 15 节的条件及下列第 19 节可能进口的供应品所允许的最大限度上予以完成。这一原则的唯一例外是与生产或修理军需品或其他武器有关的工业；这类工业将只恢复到盟军最高司令为执行他的军事任务所需要的和为促进其他战场上的军事努力所必需的程度。意大利工业恢复的缓急先后（在为了盟国军事用途所必需的工业恢复之后）应由意大利政府决定，由盟国委员会提供援助和建议。 743

17. 控制意大利通货膨胀的主要责任，包括建立和执行适当的财政控制

和经济控制以及库存的适当利用在内，应由意大利政府承担。在这方面，正如其他方面一样，盟国委员会准备随时提供建议和援助。

18. 鼓励出口的程度和处理出口贸易的机构的发展，都取决意大利政府。意大利出口计划暂时有受到一定的船运、军事、财政和供应等因素限制的必要。至于这些因素如何应用于个别计划，则应由意大利政府和盟国委员会经济组遵照经济组与政府复兴委员会业经商定的方针，予以解决。

19. 上述各节不应认为构成盟国在航运方面的义务承担。有待输入意大利的任何供应品，都必须在盟国随时可以分派的船运限度内予以输送。

哈罗德·麦克米伦

1945年2月24日

### 附注“甲”

需要事先取得盟国委员会批准的意大利政府官员

陆军大臣

海军大臣

空军大臣

可能设立的其他任何武装机构大臣

负责电报联络的次官

744

铁路局局长

公共安全总署署长

总司令

总参谋长

野战司令官

在陆军、海军和空军中依现行办法进行任命

封面  
目录  
正文